

世界城市建设与发展方式转变

WORLD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 CHANGE

段　霞◎主编



世界城市建设
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必然趋势，也是不　势和规律，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因此，　界城市，高标准发展自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世界城市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可以获得极大的利益，　发达程度和对全球经济的服务性和引领性功能，但是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不能无视为国际资本服务的市场驱动力量，不能淡漠世界城市奢侈性消费与贫穷并存的社会两极分化态势，不能忽视虚拟经济发展蕴藏的种种风险。

——段　霞

六朝古都北京在元大都时期曾经是世界上最大和规划得最好的城市，在明清古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当代北京历经数百年发展变迁，以16410平方公里的巨大城市向世人呈现；特别是2008奥运会，北京向世界充分展示了古都文化遗产以及现代都市的超凡魅力；终有一天，它将成为一个新兴的世界城市。

——顾朝林

不妨大胆预测一下，如果能把世界100所一流大学拷贝复制到京东100个乡镇，那么自然就会形成全球文化的聚合效应，如果再把外国人才定居问题和外国人购房制度改善了，那么提前准备好的中国临海型首都大舞台，将会成为通吃世界文化的教育大市场和吸纳全球精英到北京安居乐业的"最大世界都市"！

——卞洪登

历史因素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可一蹴而就急于求成；另一方面，如何利用城市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抓住全球化的关键机遇，打破历史传统的路径依赖，创造新的上升路径是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形成需要解决的问题。

——肖亦卓

现有的"世界城市"大多是建立在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下，但随着全球工业化的深入，生态环境不堪重负，全球环境的变化意味着，靠高投入实现高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必须要转变。中国城市的发展，包括北京在内，将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将进入转型期。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也给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李　婧

建议上架：经济类


ISBN 978-7-5136-0971-5

责任编辑：乔卫兵　张梦初

封面设计：华子图文 huazi103@vip.sina.com

定价：52.00元



世界城市建设与发展方式转变

WORLD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 CHANGE

段　霞◎主编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城市建设与发展方式转变/段霞主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136－0971－5

Ⅰ.①城… Ⅱ.①段… Ⅲ.①城市发展—国际化—研究报告—中国—2011 Ⅳ.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5466 号

责任编辑　乔卫兵　张梦初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5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136－0971－5/Z·982

定　　价　52.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19116）

序

近年来，借贷过度、消费过度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整个世界陷入全球性经济危机之中，不仅世界主要经济体欧盟和美国面临着债务危机的考验，新兴经济体也面临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宏观调控压力加大等方面的问题，走出危机需要世界各国联手行动，在全球化时代，宏观经济政策、货币金融政策与市场调控政策只有跳出国家处理的传统思维，才能走出由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集体悲剧命运。就中国的发展来说，特别是城市的国际化来说，必须直面国内国外现实，以全球的视野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按照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对于城市这个复杂系统，不仅要认真分析内在矛盾，更要冷静应对外部环境，要全面转变发展方式，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科学把握城市的国际化进程。

北京正在努力建设充分体现人文、科技、绿色特征的中国特色的新型世界城市。世界城市是全球范围内商品、资本、信息、技术、人员等生产性要素流动的集散地。转变发展方式不是去要素驱动，而是从关注要素规模性增长到关注要素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度，从关注商品、资本要素投入到关注技术、人员、信息投入，通过创新思维、创新管理、创新增长创造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良好生态环境，科学推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实际发展进程。

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有挑战。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如何才能充分扬其所长，尽力避其所短，建设世界城市不走老路、不走弯路，

关键就在于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的内涵比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更广泛、更深刻，它强调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不仅要研究城市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还要研究人口、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的提高，更强调城市系统的科学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用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审视世界城市建设问题，改变整个城市发展建设思路，成为世界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新体制的发源地，帮助首都北京走出目前发展的困难局面，实现更好更快的可持续发展。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首都国际化进程研究基地”是市教委长期支持的科研创新平台项目，经过六年多跨学科、多机构的学术资源整合和产学研一体化研究模式探索，形成了一支由理论经济、区域经济、公共管理和国际战略交叉学科领域在京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取得了一些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在出版《首都国际化进程研究报告》（2008）、《奥运后首都国际化进程的新趋势与新挑战》（2009）、《城市安全：首都国际化进程研究报告》三本学术著作后，今天将基地关于世界城市建设研究方面的成果呈现在各位面前。我们期望这本研究报告不仅体现研究者对转变发展方式建设世界城市面对的现实问题和战略对策的思考，国外研究的新动态和新进展，更要探索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城市建设的一般规律和特殊环境，为北京乃至中国其他城市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当然，世界城市建设是一个新任务、新课题，需要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理论研究和科学求证，现在的认识只是初步的，加上能力所限，缺点和错漏也在所难免，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更新和完善，期待同行学者与广大读者批评和指正。

文　魁

2011 年 9 月 9 日于风格与林苑

目　录



第一章 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与发展趋势



奥运后，北京进入城市国际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新阶段，正在努力建设充分体现人文、科技、绿色特征的中国特色的新型世界城市。研究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与发展趋势不仅应考虑世界城市服务世界、辐射全球的一般规律，也要考虑代表当今城市文明发展水平的后工业阶段性特征，以及世界城市独有的个性特征与发展需求，形成一个科学研究体系推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实际发展进程。

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

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是指在城市国际化进程中处于最高层次，集中了远远超出常规比例的国际商品、资本、信息、技术、人员等要素和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活动，能够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发挥全球性影响的国际城市。建设世界城市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分析国内外学者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①，课题组发现，把握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应将世界城市的共性特征、阶段性特征和个性特征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考虑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处时代的特定约束性、自身禀赋和战略需求。

一、世界城市具有辐射世界、服务全球的共性特征

世界城市首先是个经济概念，具有为全球生产性要素服务的本质特征。世界城市是全球范围内商品、资本、信息、技术、人员等生产性要素流动的集散地。如图 1-1 所示，要素聚集程度越高，流量越大，城市就越繁荣，越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辐射力。

从 20 世纪初，盖德斯（Patrick Geddes，1915）最早提出“世界城市”概念，并定义为“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的绝大部分都须在其中进行的那些城市”。到 20 世纪后期，以费里德曼（John Friedmann）和萨森（Saskia Sassen）为代表的世界城市主流理论，认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其功能是充当全球金融资本运动的空间节点和国际移民的集散地。

① 研究成果在课题组前期研究中有详细整理，参见段霞. 首都国际化进程研究报告.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城市的特质是城市功能辐射世界，城市服务面向全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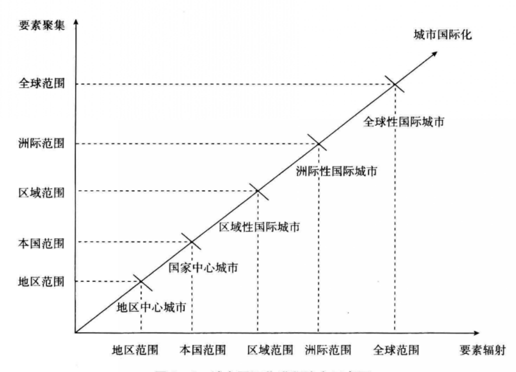


图 1－1　城市国际化进程演变示意图

世界城市的共性特征包括：

1. 当代世界城市存在和发展的背景条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和后工业化时代紧密相关，至今只出现在发达国家；

2. 市场开放程度高，市场经济规律主导作用强，市场经济成熟完善，世界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有助于其在全球经济中获得巨大利益；

3. 政府行政权受到较大制约，管理分散化、调控弱化，资源自由流进流出、资源配置延伸世界范围；

4. 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节点，形成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重要影响和控制；

5. 在全球分工中，以金融、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6. 国际移民的集散地导致的城市生活的趋同性与多元文化并存；

7. 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公司等总部和国际性组织集中，国际性活动频繁；

8. 从中央商务区到周边地区的“中心—边缘”圈层模式，有广阔的地缘基础；

9. 经济不断向外延伸，城市趋中心化；

10. “圈内人”与“圈外人”同城，奢侈性高消费与失业贫穷并存，社会两极分化。

世界城市的以上特征表明，世界城市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可以获得极大的利益，世界城市建设首先应该考虑其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对全球经济的服务性和引领性功能，但是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我们也不能无视为国际资本服务的市场驱动力量，不能淡漠世界城市奢侈性消费与贫穷并存的社会两极分化态势，不能忽视虚拟经济发展蕴藏的种种风险。

二、北京已跨过后工业社会的门槛，重点研究这一发展阶段的世界城市特征与发展趋势

以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为标志，北京已成为中国国内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前卫城市。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人均GDP约3700多美元，城市化率为45%，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2008年第三产业占GDP的40.1%，有学者认为中国将在202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如图1-2所示，与全国整体发展水平相比较，2009年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0070美元，第三产业占GDP的75.8%，2005年的数据显示，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约占常住就业人口的73.5%，北京已经迈过了后工业社会门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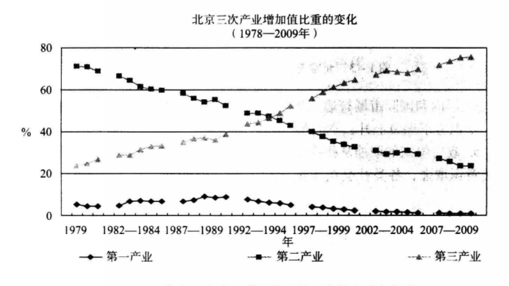


图1-2　北京市三次产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比重变化图

后工业社会是指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后，社会进一步发展所

呈现出与工业社会不同的诸多新特征的社会形态[①]。这些新特征包括：

1. 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资源依赖、环境依赖转化为知识依赖、人才依赖、创新依赖。

2. 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型、高附加值、高创意型经济组织为主，金融、信息、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成为主要组成部分。

3. 企业管理从指挥命令型转向激发创新型，产权意识、品牌意识、低排放意识、文化意识、国际竞争意识明显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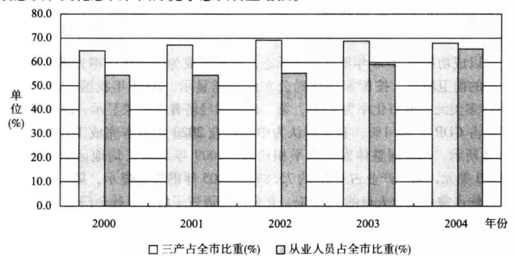


图1-3　北京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比重

4. 国内和国际市场打通，生产型社会逐步向消费型和可持续发展社会过渡，知识分子地位上升，学习型、创新型社会建立。

5. 政府组织的职能从指挥型转向服务型，国际意识和国际交流能力上升，公民意识增强，各类社会组织的地位上升，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上升，强调

① 1973年，哈佛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提出在30~50年内将会出现“后工业社会”。他从经济部门——从产品生产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处于社会主导地位、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社会创新与政策制定的中心地位、未来方向——技术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一切领域造成巨大变革、决策制定——创造新的“智能技术”解决复杂性问题等五大变化分析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此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不断外迁印证了贝尔的观察，这些国家几乎所有的城市都经历了后工业化的洗礼。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的“世界城市假说”理论、沙森（Saskia Sassen）关于世界城市是特殊的生产基地的观点以及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等研究都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中展开的。

多元和谐和复杂性社会问题的解决。

6. 文化凸显多元、开放和大众参与特点。社会由物质消费型逐步转向文化消费型，文化创意成为社会生活的本质组成部分，休闲文化、娱乐文化广泛普及，高雅文化、专业文化创意能力提升。

7. 具有鲜明民族性、历史感和区域性的创意产业和文化事业，成为地区文化认同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人文素养水平成为评判个人、组织、城市、社会发展的标志性准则。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世界城市是世界制造业中心和有形产品集散地的话，那么后工业时代的世界城市则是以知识产出为标志的非物质产品生产中心，文化型、消费型、宜居型、生态型等非物质生产性特征十分明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纽约、伦敦、巴黎等世界名城成功转型保住了世界中心城市的地位，以东京、新加坡为代表的一些新兴工业城市也在向后工业城市转型过程中发展成为全球或区域性的国际经济城市，也有类似底特律、伯明翰这样的一些城市从繁荣和工业领导者的地位沦落到衰落的状态。建立在解决工业社会遗留问题和关注可持续发展理念基础上的后工业世界城市，呈现出以下特征。

1. 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节点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节点，欧洲、美洲和亚洲等区域通过世界城市的连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世界城市也因此演化成世界经济体系中高度集中的指挥控制中心。判断一个城市的控制范围是全球性、区域性还是国家性的，除了关注其作为跨国公司总部的区位作用、作为国际剩余资本投资安全港的地位、面向世界市场的商品流通作用、关注其经济规模实力和对资本的控制能力外，还要关注其作为意识形态中心的作用以及技术创新、政治变革等外界冲击的消化能力。

2. 世界知识的创新中心

世界城市的知识创新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科技创新，而且是通过众多创意产品、创意营销、创意服务展现出知识产业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通过强大的媒介平台和互联网优势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念、新的创造发明传向地球的每个角落，引领世界的潮流与趋势。

3. 以知识产出为标志的非物质产品生产中心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世界城市是世界制造业中心和有形产品集散地的话，那么后工业时代的世界城市则是以知识产出为标志的非物质产品生产中心。进入后工业社会，世界城市的非物质生产性特征，即文化型、消费型、宜居型、生态型发展趋势十分明显。世界城市的非物质产品生产中心地位不仅体

现在其丰富的资本、信息和技术资源上，更体现在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文化遗存（包括工业文化遗产）和历史古迹，以及教育研究、传媒娱乐和时尚文化的影响力上。

4. 国际事务协商中心

人口聚集、交通拥堵、就业压力、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两极分化等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难题，越来越多的国际经贸、卫生、环境、安全等领域的双边、多边国际协商活动在世界城市举行，世界城市成为全球性问题解决的聚会地、协商地和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场。国际事务协商中心功能的发挥不仅有利于世界城市提升其国际服务品质和国际影响力，还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入驻和举办大型国际会议，获得大量最新信息和日后的长远回报，带动旅游、传媒、信息、广告、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产生更好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

5. 发达都市圈的首位城市

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随着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第二产业劳动密集程度下降，就业结构开始偏重第三产业。同时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城市的部分工作和居住得以向外扩散，城市中心就业水平下降，而市郊和周边城镇就业水平上升，传统制造业向郊区或相邻地区扩散而高端业务向中心城市集中。由此，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的进程自然形成了世界城市与周边广大腹地之间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关系。所在区域越发达，地区合作基础越牢固，本地区的国际化水平也比较高，该地区首位城市的影响力就越大。世界城市的影响路径往往是：核心城市——郊区——都市圈——所在国家——所在区域——全球范围。纽约、伦敦、东京三大世界城市均已成为带动本地区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首位城市。

进入后工业社会，北京城市发展面临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和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将解开多年来北京能不能成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心结。工业社会中北京受到资源短缺和区位条件的束缚，作为国家首都更是不宜成为以物质要素投入为重要特征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那么迈过后工业的门槛，丰富的科技、智力、文化、教育、遗产资源以及作为国家首都的政治优势，都是在后工业社会建设世界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和发展条件。北京具备中国城市走向后工业形态世界城市的最优条件，完全有可能建设成为非物资生产型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具体表现在：

1. 城市现代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北京率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进入了以服务和创新型经济为主的后工业社会。

2. 奥运会的举办使北京的城市发展理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大大提升了北京作为国际城市的生活品质。

3. 作为“首善之区”，在基础设施、信息化水平、总部发展、人才聚集、政策资讯等方面优势明显，使北京成为国内外投资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

4. 立体交通网络快速发展，实现了京津两个特大型城市半小时抵达两端的世界之最，城市运载和流动能力大大增强。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经济功能不断增强。

5. 具有丰厚的文化和智力资源。

6. 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更加明确，提出以“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为特征，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世界城市，符合后工业社会世界城市发展的理念要求。

后工业社会城市文明形态反映了当今世界城市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和发展理念。这样的变化既是我们长期努力的结果，又是我们未曾经历、并不熟悉的社会，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需要具备后工业社会城市文明的先进理念与国际化品质，按照后工业社会世界城市建设的新要求认识、管理和发展这样的社会。

三、建设世界城市要体现中国特色和北京发展的独特性要求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无论是方向、目标，还是道路、模式，都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要清楚地认识到建设世界城市有利于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动位置，配置战略资源，获得极大的潜在利益，同时，必须让市民、本地区和全国人民享受到建设世界城市的成果，不能搞社会分化、贫富对立。我们要建的世界城市一定是一种新型世界城市，应该反映一座城市能够承担世界城市功能的综合条件和国际品质，同时也反映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特色和独特性要求，探索在世界体系与国家体系约束下的首都北京应该具备的世界城市内涵。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应满足三大利益主体的需求。

1. 国家需求

世界城市虽然充当着国际资本流动的节点和人员流动的集散地，有超越国家利益的倾向，但国际社会中所有城市之间的竞争，背后实质仍然是国家的竞争。那么，必须考虑在国际社会日益担当重要责任、以和平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崛起中的中国需要首都北京成为怎样的世界城市？中国需要世界城市，成为世界体系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具有核心要素控制力的重要节点，具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重要战略资源、具有经济竞争力、文化影响力、国际话语权和

国际事务协调力的核心城市。

纵观城市发展史，强国才有强市，弱国无强市是一个客观规律。世界城市作为国际城市的高端更是这样。世界城市基本上都位于发达国家，至少也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接近的半边缘地区，发展中国家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世界城市。北京提出世界城市的目标，其基本依据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反过来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又要求城市的发展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所以，北京提出世界城市的目标，也是国家战略目标所使。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本，积极参与资本的国际化运作，服务全球，更要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主导，服务并服从于民族复兴和共同发展。

2. 地区需求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离不开周边区域的协同发展；北京建成世界城市，意味着华北将成为国际化区域，北京建设新型世界城市，应该成为环渤海区域的共同愿景。

日益卷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中的环渤海区域期待北京成为怎样的世界城市？当前，环渤海区域已经出现了加快合作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仍然存在着许多羁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潜在利益还没有清晰地展现出来；新型世界城市的共同愿景，可能是发现潜在利益，形成共识、消除羁绊、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助推器，今年又恰逢制定“十二五”规划，加大新型世界城市和环渤海区域国际化的研究和宣传，以共同愿景凝聚力量，以统一规划引领区域合作，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北京应充分发挥首位城市的作用，形成相互借力、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格局，依托环渤海区域整体竞争力的增强，成为具有全球辐射力的优势之城。

3. 市民和城市发展需求

建设世界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世界城市既要服务全球，更要服务并服从于全体人民的利益。北京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特点和民众诉求可能使北京具备怎样的世界城市品质，成为怎样的世界城市？应该看到，北京的知识资本优势、非实体经济中心的城市定位以及城市发展呈现出的新的社会结构特征，正在使创新、体验、宜居、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本质追求。把握北京在奥运后提出的以人文、科技、绿色为特征的新型世界城市建设要求。

四、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应有之特征

如前所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原则、方法还是内容，都不可能完全照

搬基于西方主要城市发展基础上的世界城市评价体系，必须在充分考虑世界城市建设的一般规律和阶段性特征基础上，基于国家需求、地区发展战略以及北京的资源禀赋、民众诉求和地方特色，有所突破与创新。北京建设的新型世界城市应具有以下特征：

1. 全球信息聚集地。后工业社会知识、文化、技术等信息资源的创新与管理能力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确保国家和城市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全球范围内信息流动无障碍化，把北京建设成世界信息通路型城市。

2. 国际事务协商中心。随着中国日益走向国际社会的前台，北京将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性问题解决的聚会地、协商地，外交机构、国际组织以及各种政治力量关注的中心。

3. 人性化与服务性城市。从关注人的生存环境、幸福感和创造性价值实现出发，解决工业社会遗留问题，实现舒适便利的都市生活环境。在世界上率先实现满足休闲消费型和老龄化社会要求的新型世界城市，实现一种人人安心生活、福利惠及所有阶层的城市生机与活力。

4. 体验型、创意型经济。通过学习和体验培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具有创新能力、探究精神的城市市民，再现城市历史文化昔日辉煌和魅力故事，使城市景观、文化遗产和流行时尚变得生动，吸引世界的眼球，从而创造出后工业社会新的城市财富创造方式和新经济形态。

5. 国际文化魅力之城。重现那种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工业化过程中失去了的绿色的、古都气息的都市形象，在此基础上，加入时尚商贸文化，使历史、文化和建筑拥有鲜活的表现力，创造出美丽的都市景观，提高城市生活品质和观赏价值。

6. 低碳、环保型社会。后工业社会形态的世界城市是非实体经济中心型、非物质资源消耗型的绿色宜居城市，努力将北京打造成对环境负荷最小的世界榜样城市，为中国的节能减排作出示范性的贡献。

7. 发达都市圈的首位城市。打破现有行政区域划分的条条框框，把腹地区域的发展纳入提升北京国际化水平的整体方案中，带动京津之间河北贫困地带的发展，提高北京的对外辐射力和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首都圈。

总之，北京应建立一个非实体经济中心型、非物质资源消耗型、非富人独占型的后工业形态的世界城市，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城市让全体民众享受世界城市建设成果的原则，有利于北京担当负责任大国首都应有的国际责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段霞）

世界城市的形成及其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全球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针对全球化对城市和城市化的影响，西方学术界关于“世界城市”的研究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开始研究、制定和实施竞争战略，以提升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融入全球化进程。20 世纪 90 年代在浦东开放开发的推动下，中国出现了追求城市国际化的浪潮，约有 40 座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城市的战略目标。1993 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首次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发展目标。2003 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进一步将“世界城市”作为北京的城市性质和目标之一。2008 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北京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9 年 12 月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要瞄准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以更高标准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中国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城市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大背景下，提出世界城市的建设目标是否符合实际？如何加快推进北京世界城市的形成？本文拟在借鉴西方现有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世界城市内涵及形成的关键因素，为北京具有综合功能的世界城市形成提供理论依据。

一、“世界城市”应是静态（顶级）目标和动态（连接）过程的结合

自弗里德曼关于世界城市的论文发表以来，30 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世界城市的含义始终模糊。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献，对“世界城市”内涵的理解由窄到宽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作为世界城市体系顶级城市的“世界城市”

如果将世界城市体系看成是一座金字塔，极少数具有全球协调和控制功能的综合性中心城市占据金字塔的顶端。这些居于金字塔顶端最高等级的城市就是世界城市。一般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纽约、伦敦、东京三个。次一级的通常称为国际城市或国际化/性城市，指的是那些跨国界区域性多功能的中心城市，或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某方面具有重要国际功能的城市。这一

观点在国内学术界较为常见。从顶级城市来理解世界城市，通常将研究对象限定于极少数公认的世界城市，绝大部分城市被排除在外；注重研究城市功能、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等属性特征，关注世界城市性质（world citiness），即“是与不是”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建设世界城市的质疑，基本上是以这种观点为基础的，认为中国城市与顶级世界城市相比差距较大，现阶段提世界城市不切实际。

（二）作为世界城市体系/网络的“世界城市”

“世界城市”不但指世界城市体系的顶级城市，还可以指与全球经济体系相连的所有不同规模城市的集群（世界城市体系）。弗里德曼开列的世界城市名单包括 30 个城市，萨森则指出全球城市网络由大约 40 个全球城市组成。这种观点理解的世界城市是一个包括顶级和多个次级城市在内的，在全球化进程中密切联系的多层次城市网络，从而成功地将研究范围从极少数城市拓展到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研究内容侧重城市间联系的测量、世界城市体系/网络的构建。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一是由于城市间联系数据的缺乏导致研究相对较少；二是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时代，很难找到一个临界点，证明“凡‘低于’这一点的城市从某方面讲就是‘非世界性城市’”，从而将其排除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

（三）作为一种全球化连接过程的“世界城市”

基于对上述观点的批判，有的学者认为“世界城市”并非是由一组指标硬性规定和测量出来的顶级城市，甚至处于世界城市体系的“第几级”也不重要，而是将世界城市视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先进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中心的城市及其辐射的区域，被连接到一个以信息流为基础的全球网络里。这种过程的观点给出了“世界城市”最为宽泛的理解。

当今世界，城市不但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各区域连接到全球生产网络的关键环节。发展中国家面对现代化与全球化双重挑战，建设自己“世界城市”已经成为一种客观需要，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提升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带动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形成理论对世界城市内涵的界定，应是静态（顶级）目标和动态（连接）过程的结合。迈向“世界城市”的过程就是回应全球化挑战，不断累积地方竞争优势；利用全球化机遇，持续改善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相对位置，从被动卷入到主动发挥跨国界影响，从一般“节点”上升为“核心”的动态过程。

二、世界城市形成理论回顾和评价

弗里德曼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产生的新国际劳动分工解释世界城市形成。传统国际劳动分工是在国家主导下以产业间（工业制成品与初级原材料）贸易的形式展开。战后，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和交通通信技术的变革，出现了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以公司内部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形式展开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适宜的生产区位，而将决策、资本运营等环节集中在（母国）少数城市，并以其为基点（basing point）来协调和控制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市场，从而导致世界城市的出现。萨森从经济活动的全球扩散和协调控制功能的集中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也做出了类似的分析。

卡斯特尔从信息技术革命产生“瞬时”通达网络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城市形成。他认为，信息技术使得地理摩擦为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由“地方空间”转变为“流动空间”。这样，地理区位及距离的重要性逐渐消失，如何在网络中占据有利的节点位置，提升联系的强度和广度，进而获取对网络的控制权，就成为世界城市的关键。

西方学者以工业化国家少数世界城市为案例总结的世界城市理论，注重全球化、国际劳动分工等外部因素和宏观机制对世界城市形成影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建设则存在相当的局限性。

（一）作为前提条件的城市内生发展水平极易被忽视

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任务都已完成的工业化国家少数世界城市为研究对象形成的世界城市理论强调外部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强调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连接。国家/城市经济社会内在的发展水平作为前提条件隐含其中。运用这种世界城市形成理论考察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城市建设，城市内生发展水平往往容易被忽视。事实上，参与全球化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并不对等。率先现代化国家具有长期累积的先发优势，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中占据有利地位，其他国家则是被动卷入全球化进程。如果忽略了城市内生发展水平提升这一前提条件，单纯强调发展“外向经济”，单纯强调吸引外资和外企，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建设战略的偏差。

（二）存在忽视区域的历史、区位、制度特性的倾向

现有理论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消除了要素移动的空间障碍，世界范围内出现由“地方空间”转向“流动空间”。争取世界城市网络有利地位，提升对外联系强度和广度，成为世界城市形成的关键。实际上，全球化与城市发

展之间的互动过程往往脱离不了当地具体的历史和制度环境；网络地位的取得与区域特征（历史传统、区位、基础设施水平、组织和制度架构）存在一定的延续性。

三、世界城市形成的关键：累积地方竞争优势与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一）策略性地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在交通通信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制度框架的支持下，跨国公司将生产过程分解为价值链上的一系列增值环节，依据要素比较优势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各增值环节的适宜区位求得利润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全球经济体系逐步扩张。凡是被资本抛弃的区位，无论是发达国家早先繁荣的工业区，还是非洲发展中国家，都被全球经济体系排斥在外或边缘化，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萧条。只有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才有机会吸纳投资和经济活动，参与全球化带来的高增长的分配。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是非均衡的。从价值链各环节的利润分配来看，跨国公司因居于从事研发设计（创新）和品牌营销及市场（垄断）环节，占有绝大部分增值，获得了全球价值链的控制权。发展中国家以要素比较优势参与的生产、装配环节仅占有小部分增值，有可能因缺乏升级能力锁定在低增值环节，并随时面临后来者低成本替代的挑战。以美国苹果公司的一款 iPod 音乐播放器在全球的价值分解来看，美国企业以品牌和领先技术所占有的附加值占到了商品最终价值的 65.6%，其中品牌附加值占到了近 30%；提供关键零件设计与制造的日本企业占有了 33.1% 的价值，从事加工和组装的中国代工企业仅占有最终价值的 1.3%。因此，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是实现区域发展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

（二）累积地方竞争优势

在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争取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城市间竞争日益激烈。除劳动力以外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信息传播和知识外溢的速度加快，使得城市区域要素比较优势常常在短时间内被其他区域所模仿和超越，真正构成地方独特竞争优势的是基于本地知识体系和合作网络的自主创新能力。因此累积地方竞争优势、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本地经济活动的集体效率成为世界城市形成的内生关键因素。

1. 地方竞争优势之一：提升特定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

广义的创新可以被认为是企业（生产企业和生产者服务业企业）、科研机

构和公共部门参与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并相互影响的过程。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特别是某些只可意会的隐性知识，其生产、传播和使用依赖个人和企业合作网络分享和传播，这需要企业在空间上集聚、技术上接近和制度上的类似，即通过地方特定的产业集群来完成。

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一方面可以获得跨国公司的投资，从与外部联系中获取知识外溢，并通过乘数效应向城市的其他非基本部门扩散参与全球化的收益；另一方面，城市产业集群升级和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分配份额将受到链条中领先企业网络权力的制约。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有限，它有可能带来投资增长和就业的机会，但有可能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低增值环节，并寻找成本更低的后发地区进行替代。仅仅依靠加强外部联系，加大吸引外资、外企和技术贸易，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和产业集群升级的潜力很小。越向上提升，与全球领先企业的分工关系越是从合作转向竞争，越不可能从跨国公司那里得到技术转移。因而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累积地方竞争优势依赖于地方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只有当地方产业集群能够较好地利用跨国公司技术外溢，在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形成良好的知识共享和互动合作网络，促进本土知识体系的积累，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地方产业集群的集体效率，才能既避免封闭产业集群的锁定风险，又突破跨国公司市场和技术的门槛制约，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扩大在全球价值链上增值分配份额，进而带动所在城市提升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

2. 地方竞争优势之二：培育自主创新所需的地方组织——制度环境

创新活动作为一个生产、传播和使用新知识的相互影响过程，必定依赖本土的组织环境和制度架构。本土知识体系的累积和集体效率的提升，不但取决于企业本身，还取决于企业和科研机构及公共部门等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地方制度架构实际上规定了创新活动各个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方式、规定了它们之间合作网络的运作效率。

全球化由跨国公司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政府为地方产业集群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既包括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又包括通过实施相关政策、规划和战略，改善本地市场环境、促进企业间合作互信关系的发展。

社会组织包括各种行业协会、商会、培训机构、科研机构等。社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良好合作，能够降低企业成长初期的风险，促进企业间网络联系，增进企业间相互信任与合作。

综上所述，基于本地知识体系和合作网络的地方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以及自主创新所需的地方组织制度环境，构成了其他城市难以在短时间内复制和模仿的竞争优势。全球化进程中地方竞争优势从生产要素优势向以组织—制度架构保证的自主创新能力转变，改变了跨国资本主导区域发展，资本选址决定城市区域兴衰的状况，使城市有可能凭借其独特的地域特性主导自身和区域的发展。

四、世界城市形成的规模和历史因素

（一）一定的城市规模保证了综合功能的世界城市在全球范围或区域范围内发挥重要影响所需的集聚经济

一般认为，城市规模由城市职能决定，城市职能的等级越高，城市规模越大。对于全球性或区域性综合功能的世界城市，从供给来看，一定的城市规模能够保证高度专业化技能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从需求来看，一定的城市规模可以为处于产品生命周期初始阶段的创新产品提供具有消费能力的市场。

城市规模通常用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来衡量。霍尔认定世界城市的标准之一就是大的人口中心，尤其有相当比例富裕阶层的存在；弗里德曼设定了顶级世界城市（在都市区范围内）1000万~2000万的人口规模，认为世界城市成为国内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政策上存在“城市偏向”，导致巨型城市增长迅速。这种缺乏相应城市职能支撑的人口规模显然难以解释世界城市的形成。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供给方面体现了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价格和从需求方面体现消费能力市场规模，能更好地反映世界城市的形成。一定的城市规模保证了综合功能世界城市在全球范围或区域范围内发挥重要影响所需的集聚经济，但并不意味着城市规模无限制地扩张。事实上，发达国家已有的世界城市也经历了城市规模的膨胀，如何既享有集聚经济带来的竞争优势，又缓解城市快速扩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是已有的和正在形成的世界城市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历史因素的路径依赖持续影响城市发展，如何实现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造是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形成需要解决的问题

空间可以认为是时间的固化，构成世界的各个地点是历史累积形成的产物。早期一些偶然历史因素导致了某些城市或产业集群的兴起，这种正反馈机制一经建立，城市从此确立对原先竞争者的优势。历史因素和偶然事件的

路径依赖持续影响城市的发展，使得城市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先占性，即使世界城市网络存在不确定性，全球化可能带来城市地位动态变迁，但许多已经在全球网络中占据有利位置的城市，其地位保持了某种稳定性。最典型的例子是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伦敦成为英国乃至遍及全球的殖民帝国的首位城市，近300年来伦敦发展有相对兴衰变化，但作为世界城市体系顶级城市之一的地位从未改变。

历史因素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可一蹴而就、急于求成；另一方面，如何利用城市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抓住全球化的关键机遇，打破历史传统的路径依赖，创造新的上升路径是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形成需要解决的问题。

（北京市社科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肖亦卓）

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

一、世界城市的内涵与特征

（一）世界城市的内涵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现代经济科技信息和社会活动的主要载体；世界城市概念的提出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许多专家学者对世界城市的内涵、特征、功能、分类、形成等进行了大量研究，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定义认为：世界城市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是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对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作为世界城市，至少应具备六个方面的支撑条件：一是有一定的经济规模，GDP 总量位居前列；二是经济高度服务化、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即总部经济发达；三是区域经济合作紧密；四是国际交通便利；五是科技教育发达；六是生活居住条件优越。因此，世界城市应是跨国企业总部基地、国际金融中心、全球产业中心、全球信息中枢和交通运输枢纽。

世界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相互关联、互为依存。但由于各个世界城市自身制度、文化结构的差异，以及全球化经济格局中职能分工的差异，世界城市在类型上表现出多样性或差异性。因而其内涵和职能也不尽相同，有些

城市是综合型的中心，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有些城市是金融中心，如阿姆斯特丹、中国香港；有些城市是物流信息中心，如芝加哥、米兰、法兰克福；也有些城市是历史文化中心，如马德里、罗马、柏林。

世界城市的类型可分为资本吸收型和供给型。各国、各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和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世界城市出现了分型，即各个世界城市形成的路径是有差距的。其中顶级的三个世界城市就分为：资本吸收型或称资本管理型，最典型的就是纽约和伦敦；资本供给型或称产业中心型，最典型的就是东京。

资本吸收型是国际金融和高端服务业的区域或世界中心，也被称为金融中心型世界城市。纽约是现代世界城市的先驱，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构建世界城市的战略时，正值制造业衰退、经济危机，因此，选择了向国际金融和高端服务业倾斜的策略，这种类型的世界城市由于缺乏广泛产业基础，对外界经济的依赖度过高。

资本供给型世界城市集聚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制造业和产业咨询类跨国公司总部，除了具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之外，也是世界产业的中心。日本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因此，东京与纽约不同的是，集聚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制造业和产业咨询类跨国公司总部，除了具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之外，也是世界产业的中心，具有很强的生产型服务业。

（二）世界城市的主要特征

世界城市的重要特征表现在经济体系和人才聚集能力两个大方面：在经济体系上表现为拥有与世界主流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经济体系，在商业、贸易、金融、制造、资本等经济领域，具有世界中心和国际控制能力，是跨国公司的集聚地，是国际主要工商业区的核心城市，具有在较大经济区域范围内协调国际资本流动和生产活动的能力，特别是在提供生产性服务方面，在制造业产品、文化产品和服务业品质等方面均具有良好声誉，是具有国际意义的生产要素聚集和配置的战略中心，是国际商贸等全球组织的所在地。

世界城市另一个方面的重要特征是人才聚集能力。世界城市是所在国及其更大区域的首位城市尤其是国家的首都，拥有足够多的人口，特别是有大量的人才尤其是高端、领军、统帅型人才，是主要的政治中心和政府的所在地，具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并能吸引所需经济活动的专业人才，能不断创造出新的行业，是创造新思想、新时尚、新价值观和新文化的中心，具有引领各种潮流的能力。

具体来说，世界城市至少应当具备五个基本特征。1. 雄厚的经济实力：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程度高；后工业化经济结构明显，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达；总部经济贡献率大。2. 巨大的国际高端资源的

交易和流量：国际高端资源就是国际高端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世界城市不仅看总量，更重要的是看流量，流量就是控制力，交易量就是影响力。3. 发达的、现代化的、立体化的交通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战略、规划、建设、管理、可持续发展，也包括外部区域体系和城市内部体系。4. 安全、稳定、宜居的社会环境。真正的宜居环境，使一个城市需要更加繁荣、更加开放、更加多元、更加包容、具有更多的选择性。5. 良好的国际形象，包括政治形象和社会形象。如诚信环境、公众素质、文明程度、社会风尚等，最根本的是人的素质，这是一个城市的品质。

（三）世界城市的主要功能

世界城市占据着全球经济文化活动的制高点，其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管理和控制中心——企业总部的集聚地。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具有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能力，而控制主要来源于跨国公司总部或区域性总部。

第二，世界城市是全球金融中心。世界城市应具备为企业或市场的全球运营提供服务、管理和融资的能力。在经济金融化趋势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世界城市必然是一定范围内的金融服务中心。最典型的三大世界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就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

第三，世界城市是全球信息中心。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通信系统和网络在全球的延伸，并且全球信息网络与全球金融系统及经济活动紧密相连，信息技术的国际扩张是国际间金融和经济活动联系的技术支撑。因此，对全球化经济的管理和控制需要世界城市成为全球信息中心。

（四）世界城市与国际化城市的区别与联系

世界城市与国际化城市是两种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城市类型。国际化城市是拥有较高国际化程度的城市，即一个城市与世界其他城市之间具有较高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程度。城市国际化程度高仅仅是世界城市的特征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世界城市必然是国际化城市，而国际化城市不一定是世界城市。比如，瑞士的日内瓦国际化程度较高，但因规模小（只有70万人口）等原因，只能称作国际化城市，而不属于世界城市。总之，世界城市是位于全球城市体系的金字塔顶端、对全球经济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现代化的国际城市。

（五）世界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国际经验

目前已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较高层级的世界城市的经验表明，世界城市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主要包括，现代第三产业是世界城市的主导产业。塑

造世界城市的过程是城市经济产业体系的重组过程，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表现，现代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会计、广告、金融和法律等，已成为世界城市的主导产业。世界城市都拥有发达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在70%以上。比如，纽约是世界首位金融中心城市，还领导着美国的艺术、时尚、广告、银行和金融、出版、广播等服务业。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可以用来衡量城市的服务能级。有关研究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率高于全国就业的平均增长率。而且，纽约、伦敦和东京三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率高于全国。

（六）世界城市具有全球市场影响力

全球影响力是衡量世界城市的核心指标，可以通过跨国公司总部数量、跨国投资流量、外贸与运输业的数量、生产与商务活动的集中程度等指标来衡量。全球市场影响力突出表现在应拥有一个全球资本流和信息流的集散港，以此为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提供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纽约、伦敦和东京作为顶级世界城市，聚集了较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国际经济与政治组织。这些世界城市是国际资本和信息的集散中心，在全球市场上占据最高点，它们对全球市场要素和市场信息的控制能力极强，对全球经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作用上讲，世界城市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影响力。影响力是一个城市拥有主导和改变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的能力及权利。在内涵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公认度，世界城市不是自封的，而是公认的，需要有社会认可度和国际公认度。提升国际公认度的前提是要有国际知名度、美誉度、满意度等。二是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影响力就是话语权。话语权是平等参与全球化事务的一种资格。影响话语权的要素有定价权、信息发布权、文化主导权、技术标准权、市场引领权和规则制定权等权利。三是软实力，软实力是影响力的本质。软实力包括国际语言环境、国际机制和对外政策、人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文明程度和大众传媒等。国际语言环境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表现，这并不仅在于多少人会讲外语，关键是跨文化交流。语言是文化的外化，语言环境实际上是文化环境。世界城市不仅是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的控制中心，也是中外文明融合和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心，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高度统一体。

（七）世界城市有较强的国际兼容性

世界城市都广泛开展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交流活动，举办各种国际会议，如巴黎每年举办的大型国际会议达二三百个。世界城市还具有人口

多样性（出生地为外地、外国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和文化多元性（工作语言的多语种化、对非本土文化的一视同仁以及不同背景的居民对市政的参与度）特征，不同语言、文化、民族的集聚和融合，形成一个宽松的文化氛围。文化的多样性是吸引和留住全球人才的主要因素，也是适宜创新的外部环境，纽约是这方面成功的典型。

二、对世界城市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

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是国际公认的 4 大世界城市，其形成与发展过程符合高等级城市的普遍规律，同时每个城市又具有其自身的发展个性。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主导地位突出、辐射力涵盖全球的城市主题文化，并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创造并集聚体现世界先进文化价值的各类载体，达到了城市经济性、文化性、社会性成长的高度统一。

如“二战”前，纽约凭借其有利的地理条件、腹地条件以及轮班制航运制度的确定，极大地促进了港口贸易业的发展，并由此成为连接欧美贸易市场的桥头堡，成为美国东北部地区最发达的城市。“二战”后，通过公立大学的建设、改善劳动力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生产服务业、复兴传统制造业等战略举措，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娱乐业成为世界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导。至 20 世纪 90 年代，民族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包容性发挥了巨大作用，纽约成为全球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地，技术与制度的创新中心，并逐渐由“文化之都”向“世界城市”转变，世界多元文化成为缔造世界纽约的核心要素。

长期以来，伦敦凭借其优越的地理区位，集聚了“日不落帝国”最有价值的资源，成为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的先驱，于 20 世纪 60 ~ 70 年代率先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并依托其庞大的国际市场，在全球化进程中通过金融资本的经营，引导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了由“帝国之都”向“金融之都”的转型。转型过程中，伦敦集聚了大量高端人才与企业总部、构建了诸多世界著名大学，使伦敦成为世界创意产业的集聚地，刺激了伦敦产业结构的再调整，成为由“名牌城市”向“世界城市”成功升级的典型城市。

东京的快速增长集中在明治维新之后的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由于国家战略的影响，资本、人口以及企业中央管理功能向东京集中，使之具备了政治、经济双重中心的功能。“二战”后，凭借全球广阔的大型工业产品市场需求，以及东京城市群的培育，工业主导的城市化进程

明显加快，使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1985 年《广场协议》致使日本的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资本控制市场由亚洲逐渐扩大到欧美，并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管理中心。

巴黎历史上长期作为法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名城，文化成为其主导功能之一，成为世界典型的名牌城市。20 世纪 70 ~90 年代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促使其寻找在世界范围内的功能定位，并形成了《法兰西岛地区发展指导纲要（1990—2015）》，以多中心、区域化、整体性城市新布局适应世界城市竞争，形成了覆盖 4 个国家的 40 个 10 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巴黎都市圈，历史感带来了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逐渐成为法国的企业天堂，高技术工业、以著名奢侈品的高档商业以及金融、文化创意等产业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从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的发展历程看，世界城市的形成与演变具有以下特征和规律：

1. 世界城市均选择了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基本成长路径，并成为世界工业革命先锋；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发达的高技术制造业体系是后工业化时代进行大规模的、高端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源泉。

2. 鲜明的城市主题文化是世界城市率先在经济区层面形成初始竞争力的基础，是保障世界城市在后工业时代体现创新活力的载体，是保障先进生产力充分发挥集聚与辐射作用的核心；反映时代需求的文化裂变是保障其竞争力持续提高的基石，也是世界城市未来的永续发展主题。

3. 世界城市均依托具有区域辐射能力的经济区，经济区内部各节点的协调发展是世界城市发展初期实现快速增长的引擎；集聚和辐射是世界城市发展和演进的重要机制，同时也是保障其持续、稳定、高效发展的物质基础。

4. 以跨国公司为纽带，较高的国际化程度是保障世界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内发挥控制和管理中心职能的基础；包括资本、人才、技术等元素在内的高端生产性要素成为跨国公司控制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又是大规模的小型创新企业实现资源优化整合的中坚力量。

5. 国际金融、文化创意等体现世界城市主题文化精髓的现代服务业是促进世界城市实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助力器和催化剂；是现在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范围内体现世界城市全球价值的有效工具和载体。

综上所述，世界城市主要依托世界经济网络和周边城市体系两个载体，主要体现在管理和控制两大作用，创新是永恒的主题，文化是持续的力量，资本、人才和技术的有效集聚和扩散是确保世界城市两大作用高效发挥的两大载体，而国际金融、文化创意等持续创新的新业态，又是体现世界城市的

全球管理和控制作用的有效工具。

因此，可将世界城市定义为：依托世界经济网络和城市经济区两大载体，通过培育城市文化主题完善多维创新体系，以新兴业态整合资本、人才和技术等高端资源，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快速高效集散，以发挥其对世界经济、社会体系的管理与控制作用的国际一流城市。

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几乎所有的世界城市都经历过由于城市规模过大、人口和产业过于集中所导致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城市无序扩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为此，伦敦、东京、首尔等城市都进行过新城建设，以疏散大城市中心的人口和功能。“二战”后，面对伦敦日益严峻的大城市问题，英国城市化发展主要采用分散化方式，推行了如“大伦敦计划”和“新镇法”。在新城运动中，英国共建设32个新镇，其中位于伦敦地区的有11个。英国的新城运动后来广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效仿。建设新城也是日本东京实施分散城市功能战略的重要途径。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东京周边地区建设了筑波学园城市、多摩新城等。20世纪70～90年代在东京产业结构的提升和转型带动下，又一次出现了人口和功能的集中，导致各种大城市问题。于是东京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调整空间结构，逐渐明晰了“多核心型”城市结构的发展目标，相继建设了池袋、新宿、涩谷、大崎等副中心，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成为东京的区域性中心。

总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全球化格局中的现代“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称全球城市（Global City），其中顶级的“世界城市”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区域经济格局重构的浪潮中，构筑“世界城市”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周伟副教授）

世界城市的地缘基础

一、世界城市带来的新思考

奥运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阶段。面对国家国情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新变化，以及首都在国家工作大局中所承担

的重要任务，北京市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瞄准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审视首都的发展建设。世界城市概念一提出，立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极大关注，什么是世界城市？为什么要建世界城市？如何建世界城市？这些问题，也必然对正在积极推动的华北区域经济合作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仅从世界城市这一新视角对与华北经济一体化进程相关的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理论思考。

（一）世界城市辐射世界、服务全球

世界城市的形态演化和理论进展始终是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20世纪初，盖德斯（Patrick Geddes，1915）最早提出世界城市概念，并定义为“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的绝大部分都须在其中进行的那些城市。”到20世纪末，以费里德曼（John Friedmann）和萨森（Saskia Sassen）为代表的世界城市主流理论，认为世界城市是后工业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其功能是充当全球金融资本运动的空间节点和国际移民的集散地，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城市的特质是城市功能辐射世界，城市服务面向全球。北京提出世界城市的目标，应该认识到，这不仅是提出城市建设的高标准，同时，也扩展了城市辐射世界、服务全球的新功能。北京将不仅是中国的城市，也将是世界的城市。

（二）弱国无强市，强国必强市

世界城市虽然充当着国际资本流动的节点和人员流动的集散地，但依然离不开国家。城市的国际交往，必须在国家之间交往的框架之内，世界城市虽然有超越国家利益的倾向，但国际上所有城市之间的竞争，背后实质仍然是国家的竞争。随着现代国家形态的发展，城市就成为国家疆域内的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是依托于国家的经济实力的。纵观城市发展史，可以说，强国才有强市，弱国无强市是一个客观规律。世界城市作为国际城市的高端更是这样。世界城市基本上都位于发达国家，至少也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接近的半边缘地区，发展中国家至今也还没有出现过世界城市。正如有些学者判断的：“城市在国际上的地位往往要取决于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尹继佐，2003）北京提出世界城市的目标，其基本依据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反过来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又要求城市的发展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所以，北京提出世界城市的目标，也是国家战略目标所使。强国必强市，同样是国家与城市关系的一条规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与西方国家不同，必须体现国家意志、上升为国家战略。

（三）强市不可能鹤立鸡群

城市，从形成之初，其功能就主要是对周边资源的集聚，继而形成扩散，

城市对周边的辐射和带动，形成巨大的经济流量。城市越发展，辐射带动的广度、力度和深度、经济流量的范围、规模和速度，也就越强、越大、越快。一座城市，如果辐射和带动的功能弱化了，与周边的经济流量减少了，也就意味着城市走向衰落，很可能正在由其他城市取而代之。世界城市，不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心，也一定是发达地区的经济中心，甚至地理位置、资源禀赋都占有优势。强市不可能鹤立鸡群，除中国香港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原因外，我们很难想像，一座城市，周边贫瘠，却可以独善其身；如果连周边都带动不起来，怎么可能辐射全国甚至全世界呢？而一座城市，一旦能够辐射全国、辐射全世界，也一定已经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或者说，也离不开周边经济的支撑。

（四）世界城市全景图的启示

世界城市究竟有什么特征，从现有的世界城市的现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景：

1. 世界城市出现和存在的背景条件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特别是和后工业化时代紧密相关，至今只出现在发达国家；

2. 市场开放程度高，市场经济规律主导作用强，市场经济成熟完善；

3. 政府行政权受到较大制约，管理分散化、调控弱化，资源自由流进流出、资源配置延伸世界范围；

4. 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节点，形成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重要影响和控制；

5. 在全球分工中，以金融、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6. 国际移民的集散地导致的城市生活的趋同性与多元文化并存；

7. 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公司等总部和国际性组织集中，国际性活动频繁；

8. 从中央商务区到周边地区的“中心—边缘”圈层模式，有广阔的地缘基础；

9. 经济不断向外延伸，城市去中心化；

10. “圈内人”与“圈外人”同城，奢侈性高消费与失业贫穷并存，社会两极分化。

从世界城市的全景图，我们可以感受到，世界城市的形成，是和后工业化紧密联系的，必须有经济的高度发展；世界城市影响控制全球经济，有极大的潜在利益，但经济虚拟也有脱离实体经济的潜在风险；世界城市高收入、高消费，但社会两极分化，与我们价值追求相左；所以，我们建立世界城市，在获取潜在利益的同时，也要迎战潜在风险。而且，新考验可能不比新利益小，对此，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世界城市的腹地现象

世界城市服务全球，但世界城市的竞争力却离不开国家总体实力和周边地区的支撑力。因此，研究一下世界城市的腹地现象，我们会得到很多启发。

（一）世界城市都有广阔的腹地

世界城市虽然都是以中心城市命名的，但作为世界城市，却是一个包括中央商务区（CBD）、内城区、外城区、郊区和周边地区在内的城市体系。除了城市行政性辖区的中央商务区（CBD）、内城区、外城区和郊区外，还可能包括非行政所属的数个城市在内的周边地区，形成一个经济性内在联系非常密切世界城市的腹地。从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四个主要世界城市看，对周边地区的具体界定，都超出了行政区划，甚至超越了国界，都有广阔的周边腹地。其中，伦敦最小也有 1.6 万平方公里，纽约有 1.8 万多平方公里，东京有 2.3 万平方公里，巴黎则有 14.5 万平方公里的周边腹地，沿塞纳河、莱茵河延伸，覆盖了法国巴黎，荷兰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比利时安特卫普、布鲁塞尔以及德国的科隆等欧洲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学者们将“大”字加在城市名字之前，以标明包括周边腹地在内的世界城市，如大伦敦、大纽约、大东京、大巴黎，或统称为“大都市圈”。

（二）腹地的形成和功能

为什么世界城市都有一个广阔的腹地呢？现代区域空间理论认为，城市发展从孤立个体向区域整体的演变是城市发展的客观必然。

首先，发达国家在后工业时代，随着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第二产业劳动密集程度下降，就业结构开始偏重第三产业；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城市的部分工作和居住得以向外扩散。

其次，微型芯片技术在经济领域的普遍应用，导致服务业发生了一场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不但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极大降低了成本，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发达国家的奢侈消费及相关服务以及和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教育科研集中于大城市；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催生了大城市的高端国际服务业。

再次，市场的全球化，导致传统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地区扩散；高端业务向少数中心城市集中。

最后，技术革命使城市中心就业水平下降，市郊和周边城镇就业水平上升。

总之，世界城市体系是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的进程自然形成的系统，

腹地不但有着生成的客观必然性，而且也成为世界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腹地是世界城市竞争力不可或缺的支撑

腹地，是世界城市形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以自己不可替代的功能支撑世界城市的运转和功能的发挥。

1. 世界城市服务全球的功能，主要集中在中央商务区，但所有确保其正常运转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物资保障、社会服务都离不开内外城、郊区和周边地区的支持；

2. 腹地为大都市圈提供土地、能源、水源、资源、交通、信息等多方面的支持和保障；

3. 低碳经济时代，腹地为确保城市绿色运转的气候、生态、宜居环境等提供不可替代的资源；

4. 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的后台；

5. 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教育科研等只有放到包括周边区域的整体，才能发现优势所在，潜在利益何在，所有资源，在分割状态下，都有缺陷，也只有纳入整体调配才出效益。离开周边，中心城市孤掌难鸣。

三、新型世界城市：华北区域的共同愿景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离不开周边区域的协同发展；北京建成世界城市，意味着华北将成为国际化区域；新型世界城市，应该成为华北区域的共同愿景。

1.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只有顺应这一趋势和规律，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因此，抢占国际化城市的高端形态，建设世界城市，高标准发展自己，成为历史的必然。

2. 中国需要世界城市，是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资本没有祖国，世界城市也会对我们这一目标形成多方面的挑战；中国的世界城市既要服务全球，更要服务并服从于民族复兴，我们的城市不允许引入社会分化；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本，积极参与资本的国际化运作，但城市建设必须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主导。因此，建设世界城市，无论是方向、目标，还是道路、模式，我们都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在迎接国际挑战的同时，必须自主创新，我们要建的世界城市一定是一种新型世界城市。

3. 新型世界城市，包括华北区域的国际化，应该有一个北京大都市圈的统一规划，在规划指导思想上，明确提出以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认识推动区域合作、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意义。以一个广阔的腹地，为我们共同的世界城市，奠定能级提升的地缘基础。

4. 华北各地，都应该以世界城市的新视角对各自对区域发展的企盼和规划进行再审视，提高发展追求的标准，特别是深入了解其他地方的情况和规划，在彼此深入了解、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寻找新视角下的协作，形成对新型世界城市的共同愿景。

5. 当前，华北五省区已经出现了加快合作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仍然存在着许多羁绊，华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潜在利益还没有清晰地展现出来；新型世界城市的共同愿景，可能是发现潜在利益，形成共识、消除羁绊、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助推器，今年又恰逢制定“十二五”规划，加大新型世界城市和华北区域国际化的研究和宣传，以共同愿景凝聚力量，以统一规划引领区域合作，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不能错失良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文魁教授）

从上海世博会看世界城市的未来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副主题有五个，分别是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科技的创新、城市社区的重塑、城市和乡村的互动。这些主题和副主题，意在探讨如何完善城市的自身功能，如何塑造城市与乡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这正是目前全球共同关注的命题。那么，上海世博会将给首都北京的世界城市的建设带来什么启示和借鉴呢？界定世界城市的概念有许多指标，比较抽象和理性。以下通过笔者在上海世博会的所见所闻，向大家报告一些未来城市生活的具体而生动的图景。

“一切始于世博会”，一个半多世纪的世博会舞台见证了人类对科技创新的永恒追求。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为我们打开了未来的城市之门，透过各种新能源、新规划、新建筑、新建材、新机器人、医学技术、智能家居、零排放社区，一个充满幻想、五光十色的未来城市正在向我们走来。

一、新能源：太阳能时代即将到来

太阳能在上海世博会的展示和运用，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人类未来美好生活的图景。太阳能技术被应用在上海世博会多个场馆中。

主题馆、中国馆、世博中心、演艺中心等主要场馆设施以及部分国家的自建馆都应用了太阳能技术，总装机容量超过4.68兆瓦，是中国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应用展示区。在标准输出条件下，一天的发电量相当于150户人家一个月的用电量。世博园成为我国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的最大“秀场”，太阳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博会建筑新能源应用的宠儿，“阳光世博”充分展示了我国太阳能利用技术水平，必将推动我国“太阳能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世博轴由6个花瓶状的“太阳谷”组成，晚上能发出灿烂炫目的灯光，白天又能聚集太阳能充分利用资源，下雨时还能收集雨水，回收净化再利用，世博轴向世界传达了珍惜和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讯息。从天空俯瞰世博会主题馆，24个次第排开的蓝色菱形，正是现已并网发电的太阳能光伏电板。而中国馆“东方之冠”高达69米的屋顶平台也“镶嵌”有光伏组件，后者是目前世界上单体面积最大的太阳能屋面，安装容量2825千瓦，总面积3.1万平方米。这些与建筑相融合的太阳能设施，两大展馆累计的太阳能装机容量可达3127千瓦，1年提供并网发电的电量可达284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000吨。

在2000年的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上，曾展示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太阳能建筑、光伏发电装置和当时世界最大的太阳能游艇，引起世界各国重视，并从此点燃了21世纪“太阳能世纪”的星火。在此后的十年间，全球太阳能利用技术日新月异，太阳能产业也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在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上，曾展示了输出功率分别为200千瓦、30千瓦和100千瓦的多晶硅、双面受光型单晶硅和非晶硅的太阳能电池，充分表明了随着技术进步，太阳能能够以较高的效率提供电力，有效缓解传统能源的紧张。

如果说，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展示了工业文明的未来，标志着钢铁时代的到来；1906年的米兰世博会展示了汽车文明的未来；标志着石油时代的到来；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展示了月亮石，标着太空时代的到来；我们可以预测，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太阳能的展示，将标志着一个太阳能时代的到来。

二、新汽车：取之于自然，还之于自然

进入中国国家馆的低碳区展厅，一款名为“叶子”的双座新能源概念车

吸引了很多参观者驻足。“叶子”车如其名，白色车身顶部是一片绿色的大叶子，四个黑色轮子上分别配载三个风扇叶片，看上去更像一个放大版的儿童电动汽车。

这款概念车设想的是2030年的汽车，最大的亮点是革命性的自然能源转换技术概念。“叶子”汽车重量只有470公斤，车身长为2.9米，高和宽都在1.4米左右。“叶子”车顶部的巨型叶子实际上是一个高效光电转换器，可吸收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以可视化的“叶脉”方式显示能源的流动。独特的阳光追踪系统能使叶片上的太阳能晶体片随太阳照射的方向而转动，无论阴天、雨天都能最大化利用太阳能。带有风扇叶片的四个车轮实际上是四个风力发电机，通过捕捉散逸的风能并转化为电能，充入自身电池储存能源，形成辅助电驱动系统，最大限度拓展利用新能源。

值得一提的是，“叶子”车体外壳采用一种可吸附二氧化碳的材质，能模拟绿色植物从空气中捕获二氧化碳和水分子，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释放出电子形成电流，生物燃料电池再将产生的电能给锂电池充电，由电机驱动汽车。同时，它还能将光电转换中排放的高浓度二氧化碳转化为电能为车内照明，或转化为车内空调制冷剂。不仅如此，汽车在自身“零排放”的基础上还能将产生的多余电能反馈到社会电网中，真正实现“负排放”。

从汽车首次亮相1889年巴黎世博会至今，汽车技术革命不断推动着世界工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进步。而在上海世博会上，无论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叶子”，通用汽车的无人驾驶汽车，还是荷兰馆时速可达上百公里的太阳能汽车等，这些新能源和智能汽车的出现，都展示了21世纪人类对未来出行的新梦想。

三、新空间：地下空间开发大有作为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城市，首先要节约土地资源。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可以实现土地的多重利用。具体来讲就是要把城市的交通、停车库、污水处理厂、商场、餐饮、休闲娱乐等都放到地下去。

上海世博园区的建设就很重视科学规划。世博园区在黄浦江两岸，但是怎样才能节约地面面积？答案就是利用地下空间，同时在黄浦江下面建隧道。另外还把机动车的车道、一些换乘的枢纽、展览的场馆建在地下，这样就节约了土地。如果我们把世博园区做一个立体剖面图，可以看到世博园下面有地下街，地下街可以实现通道、休闲、购物、展览相结合的综合型模式。世博园下面有3个大型的换乘枢纽，就使公共汽车、地铁都可以换乘。黄浦江

过江有地下通道，地下一到两层，地下一层是地下街。上海在20世纪80年代就建成的上海人民广场，地下一层也是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地下二层是600个车位的地下车库，这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最早进行地下空间开发的一个综合设施。目前，上海已经开发了地下空间2700万平方米。

北京奥运中心也有地下停车库，在奥运中心内的大屯路，车道就变成地下的了。北京西单和中关村西区也有地下空间实例，家乐福大型超市就在下面。北京王府井总共规划350万平方米，地下空间开发100万平方米，包括停车、通道和商业。北京国贸大厦下面建有地下滑冰馆。西直门有立体换乘站。目前，北京地下空间开发面积已达3000万平方米，如果合理开发地下空间，可以达到40%，约为9000万平方米。

目前，全国已建了很多地下城或地下设施。例如，杭州要扩大，要建新城，钱江新城建了一个地下城。整个钱江新城地下空间的总量有200万平方米，节约了很多土地。南京玄武湖下面建了隧道，解决了周边交通拥堵问题。杭州西湖下面也建了隧道，解决了湖边人车分流的问题。

从国际上看，也有许多开发地下空间的典型。例如，哈佛大学图书馆要扩大，就是往地下扩。明尼苏达大学的地下实验室，把地面的太阳光通过光学系统引入到地下，获得了总统奖。赫尔辛基的污水处理系统建在地下，节约了土地，闻不到异味，污水也得到了处理。瑞典、荷兰、德国等一些国家则利用地下空间建设储水工程，既安全又没有水污染问题。

合理利用地下空间，不仅可以节约土地资源，而且节约能源。城市建设摊大饼，就会提高对汽车的依赖度。建设紧凑型城市，就可以节约能源。开发地下空间，还可以建设热泵空调，也就是地热空调。上海世博会一些场馆就利用了黄浦江的水温，搞了江水源冷泵空调。

许多人参观世博园区，都首选轮渡，其实世博过江专线才是最快的。可以体验到地下快速道的优势。北京规划中也要建地下快速道。北京南北方向将建四条地下快速道。这同时也可以是地下物流系统。荷兰的郁金香就是通过地下通道运往飞机场的。伦敦的邮件也是通过地下物流系统运转的。可以预见，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将是国际化大城市发展的一大趋势。

四、新电器：机器人将成为家庭新宠

在近几届的世博会上，最吸引参观者眼球的就是机器人，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上，最抢眼的就是机器人乐队。上海世博会上，机器人也是一大亮点，会说会唱会拍照、会拉小提琴、会做菜的机器人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

世博园中，看过日本馆的“小提琴演奏机器人”表演的游客赞不绝口。这个机器人长着黑色的大眼睛，身着银色外衣，出场后先鞠躬，再用左手将小提琴放到下颚处，右手提起琴弓开始演奏。一曲中国民歌《茉莉花》终了，馆内掌声雷动。另一款则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而诞生的机器人“伙伴”，它不仅能够双腿行走，高度的控制技术让机器人手部以及手腕部分的活动灵活细致，不亚于人类。这使得它能够帮助行动不便者，并提供看护、医疗、家政服务。

法国馆中身高 58 厘米的“脑（nǎo）”则被一些观众称为“小天才”。这个机器人会打太极拳，跳舞、爵士乐、足球也样样精通，还通晓 20 多个国家的语言。

在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杭州馆门口，观众会邂逅蓝色的机器人“海宝”。只要拿一个专用话筒，就能和它对话，其面部液晶屏会显示即时表情。如听到“海宝笑一个”，它就会咧开嘴“哈—哈—哈”。“海宝”还擅长诗歌“接龙”。

沪上生态家展馆的四楼是一个老年公寓，那里为老人们打造了一个安享晚年的天堂。在里面，家居监控机器人“灵灵”堪称“大管家”。这台造型可爱、会语音交互的机器人，会接受用户通过手机、电话等方式发出的指令，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家居监控机器人还可以遥控各种电器，并能监测门窗的入侵、火灾等危险信号。机器人的两只机械臂，能帮助主人开门、倒水、取物等动作。它的背后，被设计成一张座椅，并装有控制手柄，可供老人当轮椅使用。

世博园中，还有不少“助手型”的机器人。如意大利馆中，机器人会挨家挨户去收集垃圾。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沪上生态家”展馆，机器人能在厨房中端菜。浦西园区的上海企业联合馆中，还建起了“机器人厨房”。控制人员只需按下几个按钮，厨师“爱可”就会端锅、翻炒、加盐、点醋，制作出美味佳肴。

中控集团研究院机器人事业部总经理郑洪波认为：机器人完全可能在十年内进入家庭，首先会是具备监控、安保等简单功能的机器人，然后会向更复杂的娱乐型和家政服务型发展。在本届世博会上，中控集团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的联合团队受邀研制了 30 多台“智能服务型”机器人，放置于主要出入口。这些机器人可以为游客提供世博信息、公共信息、引路导航等多项信息咨询服务，并能准确辨识来宾的方位、人数和行进方向，自动进入迎宾服务状态，还会讲故事、说笑话，和观众聊天。现在，机器人已经在工业、起居、战争和护理方面得到广泛应用。有科学家预测，到 2050 年，地球将真正进入机器人的时代。

五、新建材：透明混凝土引领绿色建材时尚

走进崇尚“绿色低碳”的上海世博会，到处都能看到绿色节能建筑样本：会呼吸的“紫蚕岛”日本馆、森林造型的挪威馆、竹篮包裹下的西班牙馆……这些绿色建筑的新代表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建筑发展的潮流。

在本届世博会展现的各种新型绿色建材中，一款被称为“透明混凝土”的建筑材料引起广泛关注。在位于浦东园区的意大利馆，参观者可以看到这种能透光的神奇混凝土。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走进意大利馆，在馆内就能感觉到光线从外墙透射进来，而到了晚上，场馆内部灯光穿越到场馆外的街道，折射出正在涌入场馆内的人们的身影。

乍一看上去，意大利馆的外墙好像是一大片灰色的混凝土被镂空出一个个整齐划一的长方形小洞，但仔细用手一摸，却发现这些所谓“小洞”其实是一种类似玻璃的透明材质。

意大利馆馆长米拉格利亚介绍，这种透明混凝土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树脂与水泥的混合，从而具有高质量的透明度。这种混凝土制成品还极具多元化，如果使用大量的、颜色各异的树脂组合，可以折射出五彩斑斓的灯光，为建筑披上神奇的色彩之光。

米拉格利亚说，由这种水泥制成的透明面板覆盖了意大利国家馆40%的面积，随着阳光折射角度的变化，场馆在一天内可连续不断地变换出不同画面。“自然光的射入可以减少室内灯光的使用，从而节约能源。透明混凝土的出现必将成为未来绿色建材的典范。”

六、胶囊内镜：迈向疾病诊断无创无痛时代

走进位于上海世博会浦东园区A片区的以色列馆，以色列馆向参观者展示了一款最新型的体检仪器——一粒长26毫米、宽11毫米、重量小于4克的“胶囊内镜”。

检测者只需将它吞下，伴随肠胃的蠕动，“胶囊内镜”将会对人体消化道进行全程检查，目前已经能够检测出42种疾病。一粒药丸大小的“胶囊”为何会如此神奇？

参观者看到，透明的“胶囊外壳”下面，清晰可见两端各有一个绿豆大小的微型相机，而“胶囊内镜”的原理正是借助两端的成像装置和光源实时

拍摄人体内腔照片，如最新一代食道“胶囊内镜”每秒钟能拍摄近 20 张图片，这些照片通过检测者体外携带的信号接收器被传输到终端信息平台，供医生下载图片进行诊断。

检测者不必担心吞下它会对人体有伤害，因为它就和平时吃药一样轻松，只是这个特殊的药片不会被消化掉，在吞下一天之后会被自然排泄出来。这种“胶囊内镜”已经在以色列、美国等地的医院推广使用，临床证明这种检测方式无痛、无创口，即使儿童使用也是安全可靠的。

相对于传统肠镜、胃镜检查的痛苦经历，“胶囊内镜”的出现无疑将掀起未来疾病诊断的又一场革命。而本届世博会上，包括能进行十项尿检的抽水马桶、家用中医数字化四诊仪、唾液检测肿瘤等在内，越来越多人性化、精细化的现代医疗技术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

科技创新开启了探索人类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畅想，而上海世博会展现的一些医学高科技无疑将在 21 世纪掀起一场“健康革命”。

七、气象预报：随时随地的贴身管家

2030 年，人们将享受到怎样的气象服务？你能想像，一个小小的数字终端就能让你的生活不受糟糕天气的影响，尽享气象服务带来的便利和快捷。

上海世博会气象馆用一部 4 分钟的短片为我们讲述了 2030 年的智能化气象服务——

晚上睡觉前，强尼的爸爸把“一体化天气技术（METENT）”系统连接到了家里的“智能家居系统”端口上，开始了对家庭气候应对措施的全方位管理。

第二天清晨，METENT 提前叫醒了强尼的爸爸，这是因为前一天夜里下雨造成了交通堵塞，METENT 意识到他需要预留更多的出行时间。小强尼上学出门前，METENT 为他提供了最新穿衣指数等生活信息。

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周内将发生台风。强尼的妈妈是位气象学家，她要为将受到台风影响的社区提供预警和指导，确保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2030 年，科学家们不仅能预测反常天气，而且能将反常天气带来的灾害变成可利用的资源，如利用台风的强大风力进行发电。

强尼一家要去参加表姐的婚礼。系统显示，西南地区有风暴，可能会引起大规模航班延误，于是他们决定开车前往。车载系统显示，高速公路上大雾弥漫，系统为他们选择了另一条最佳路径。婚礼现场，METENT 搜索出效果最佳的拍照地点，在风暴到来之前，一张幸福的全家福成功完成！

气象馆副馆长刘欧萱向参观者介绍，METENT 是气象学家们设想的为城市人提供全方位、个性化气象服务的系统。虽然今天看还只是梦想，但基于目前的技术发展，这种随时、随处可得的“贴身管家”式服务很有可能在20年后梦想成真。

八、零碳城市：30 年后城市实现自给自足

开园以来，大批游客专程来到世博园的 E 片区参观两栋并不起眼的灰色四层建筑，这就是复制全球首个“零排放社区”模式的伦敦案例馆，“自给自足”是这里的最大特色。

利用太阳能光伏板和热力电力转化器收集足够的电能供给建筑的日常使用，收集的热能将转化为建筑制冷的动力；雨水收集系统供应馆内非饮用水；太阳能热水板用于家庭用热水收集；食物和有机肥料发酵产生沼气能源；风帽提供被动式风助力通风和热回收；屋顶的绿化又通过光合作用将通过风帽散发的室内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通过复杂而又精细的循环系统，伦敦案例馆仿佛是一株有生命的绿色植物，吸收阳光雨露，生成氧气。

伦敦案例馆中的餐厅也尽显循环再生的理念。每天多余的有机饼干经特殊处理，可变成餐具，以减少洗涤带来的污染和浪费；厨房产生的生物垃圾将被收集到生物能炉内用于发电、发热；就连客人喝剩下的啤酒瓶、可乐罐也被收集起来，做成店内电灯、烛台等装饰。

据介绍，伦敦案例馆的原型、英国贝丁顿社区的居民一年可比普通伦敦家庭少开 2300 公里的车。伦敦案例馆馆长陈硕说，中国的气候条件更适合建设“零碳社区”，不占用“生态足迹”的住宅社区有可能在 30 年后真正来到我们身边。

除了伦敦案例馆，在上海世博会特设的“城市最佳实践区”，你还可以看到其他国家为探索“低碳城市”所做的尝试。无论是“沪上生态家”展示的我国首座“零能耗”生态示范住宅，还是马德里公共廉租屋创新的“竹屋”和“空气树”建筑，抑或通过太阳能达成室内舒适性的阿尔萨斯水幕太阳能建筑，种种案例都在向人们昭示人类城市的绿色明天。

什么样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什么样的生活观念和实践让城市更美好？什么样的城市发展模式让地球家园更美好？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演绎工作以这三个设问句作为起点。主题演绎是筹备上海世博会的一项核心工作，即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而生动的实践形式，将主题变为世博园区内可见、可闻、可感的种种具体呈现的全过程。上

海世博会主题演绎工作的目标，是希望藉此提高公众对“城市时代”中各种挑战的忧患意识，并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促进对城市遗产的保护；使人们更加关注健康的城市发展；推广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理念、成功实践和创新技术；寻求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促进人类社会的交流融合和理解。

熙熙攘攘之间，从5月1日到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开幕184天，客流突破7308万人次。每天都有数十万人来到这里，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经验；每天又有数十万人离开这里，带走人类智慧文明的火花。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演绎成功与否，观众更多的是从世博会上的新科技、新趋势、新理念来做出判断。绿色世博、低碳世博、科技世博、和谐世博会，在本届世博会上人们清晰地看到，解决人类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无不依赖于科学的精神和态度。通过世博会，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应当成为全民族的自觉。我们期待着，通过世博会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这届举全国之力、集世界智慧的盛会，能够成为提高中华民族文明素质的新起点，成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契机，成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动力；让百年奥运和百年世博成为建设首都世界城市的新起点、新契机、新动力。

（中国贸促会世博办高级主管　孟育建）





第二章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评价体系



奥运后，北京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按照世界城市的最高标准来谋划、推动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准确把握城市国际化特别是世界城市内涵、发展规律及其标准，建立一套比较科学、完整的反映城市国际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分析北京的现实国际化水平以及与世界城市之间的差距，探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方向，无疑将对北京在未来5年以及中长期发展中落实世界城市建设目标、进行国际化战略部署和路径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运用价值。

基于不同的服务目标、服务对象和研究定位，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社科院、外交学院、北京市统计局、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者从“评价指标体系”、“考核指标体系”、“监测指标体系”三种测度，从不同学科、理论和观察提出各自观点。并在2010年的“城市国际化论坛”上进行交流。本章汇总在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

基于全景观察的世界城市指标体系

“基于全景观察的世界城市指标体系”研究为北京市领导的重点决策咨询课题“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和努力方向研究”研究成果[①]，研究第一次从世界城市建设应有之流量、体量、容量、储量和能量出发，分析世界城市建设功能、规模、基础、禀赋和品质指标，构建基于全景观察的世界城市指标评价体系。对全球城市体系中相对前位的30个样本城市进行比较分析，共5类26个指标。突破了当前国内研究多以个别城市国际化水平作为城市国际化水平提升或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参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为城市国际化战略提供国际比较依据、测评指标和理论参考。

一、指导思想

北京正处于国家中心城市向区域性国际城市过渡的历史阶段，其发展目标是在21世纪中叶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世界城市。在全球化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结合北京正在迈入的后工业社会的阶段性特征，应该看到北京正在

① 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文魁、段霞、赵文、张贵祥、张智新、马力平、吕淑然、王玺、汤凯、申现杰等。成果论文《基于全景观察的世界城市指标体系研究》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建设的世界城市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规律和路径可以依靠，不能盲目照搬现有三大世界城市在工业时代的发展经验，指标体系设计应该有利于建设符合中国国情、以文化魅力和国际资讯服务为特色的非实体经济中心型、非物质资源消耗型、非富人独占型世界城市，同时也应该充分体现人文、科技、绿色北京的特点。

（一）弄清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内在要求，奠定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

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标志着确立了城市发展的新方向，什么是世界城市？为什么要建世界城市？如何把握通向世界城市的进程？虽然有伦敦、纽约、东京的现实摆在那儿，但是世界城市作为北京城市发展的新航标，不能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包含着我们对理想城市的追求，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首都，我们有独特的国情和市情，所以，不能单纯以伦敦、纽约、东京为模版，而要有清晰明确的奋斗目标。

指标体系设计一定要表明我们的目标是新型世界城市。首先要说清楚北京要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城市，既要反映一座城市承担世界城市功能的一般性特征和阶段性特征，更要反映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特色和独特性要求。之所以强调“新型”，因为现有世界城市，既有值得我们学习和追赶的先进之处，也还存在许多弊端和不理想之处。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指标的提出要使中国的世界城市既能服务全球更能服务并服从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争取全球机遇和利益的同时，也要对潜在风险和可能付出的成本代价有足够的认识，充分体现人文、科技、绿色北京的特征。

（二）反映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和我们对世界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指标设计应引导北京增强辐射世界、服务全球的新功能和在全球体系中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贡献，营造满足国际资本、商品、技术、信息、人员等核心要素合理流动的城市环境和基础条件，体现世界城市辐射世界、服务全球的共性特点，而不能离开世界城市的基本规定性，去罗列一些无关的指标。

要关注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国际组织和国际移民等要素对城市发展和相关产业的实际贡献度分析，目前国内统计指标缺乏对上述要素关联度的考核

指标，需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统计调查中增加或调整相应指标。[①]

（三）适应北京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反映当今世界城市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

后工业时代的世界城市则是以知识产出为标志的非物质产品生产中心，是解决工业社会城市发展遗留问题的榜样城市，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需要具备后工业社会城市文明的先进理念与国际化品质。指标设计应引导北京适应从“以资为本”的工业形态城市转向“以人为本”的后工业形态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培育适应后工业社会需求的城市发展新要素、新特质，培育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和社会文化环境。充分考虑到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困难与压力，甚至为了产业结构的顺利转型可以考虑主动调低经济增长指标，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世界城市。

目前，国家和北京市的统计资料提供的数据和指标还没有考虑或者说不能适应这样的社会阶段发展需求，统计、规划乃至城市管理各个领域的观念都应该适应发展阶段的转变。

二、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指标体系是衡量北京在实现世界城市目标的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国际化水平的标尺，也是公众及决策机构人员认识、考量北京城市国际化程度和建设世界城市进展情况的重要依据。根据指导思想中对北京所处后工业社会阶段的规律性认识和“三个有利于”原则要求，认真研究国内外世界城市指标评价成果、吸取三大世界城市发展经验，从北京建设充分体现人文、科技、绿色特征的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实际出发，确立以下设计原则。

（一）系统性观察和突出本质原则

建设世界城市是城市在国际化进程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各种资源、力量的有机组合，相应的测评指标体系要注重对世界城市服务世界、辐射全球的本质特征的把握，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不能过于庞杂。从世界城市的

① 纽约市政府重视国际组织入驻和举办承办大型国际会议对旅游、传媒、信息、广告、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带动，调查数据显示纽约为联合国每投入 1 美元即可获得 4 美元的收益。2008 年，纽约外籍居民在常住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 36.4%，2010 年公布的《纽约州长报告——移民在纽约市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示，2000—2008 年，移民对纽约地区生产总值（GCP）的贡献增长了 61%。2008 年，移民在纽约市的经济活动约占纽约地区生产总值的 32%。否则，一味地满足外资要求，改善投资环境、建立绿色通道和提供优惠条件等不一定能有助于世界城市功能的实现。

共性特征出发，研究实现这一功能所需具备的规模、结构、资源、设施、运行能力和城市品质风格，把握世界城市应有之特征、发展水平与优势。

（二）可比性、可靠性原则

统计指标口径的可比性和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决定着指标研究的可信性与可用性，各类统计指标具有可比性便于北京与处于世界城市建设过程中各类城市进行比较。研究中需要对目前国际比较来源较稳定，而国内统计缺乏的数据应提出在“十二五”期间统计工作的相应调整，做到与国际公认的世界城市评价标准接轨，有利于国际比较。数据来源以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的统计出版物为主，这些数据一般能够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与数据的可比性。

（三）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

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完美的指标体系来理想地测评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水平，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经常会遇到数据缺失或实际部门难以实现的难题。所以测评指标体系要含义明确，出处集中，数据资料容易获得，计算方法简明易懂，还要考虑现实可能，与当前北京城市发展的现实相适应，且兼顾资料数据的可行性。

（四）质化标准与发展目标与测评指标相结合

城市国际化水平不仅体现在城市的国际服务功能、规模、基础条件、能力等显性、可量化指标上，也体现在城市的国际品质、形象、魅力以及协调发展程度等软性质化标准，是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反映，指标研究要注意质化标准与发展目标与测评指标相结合。

三、指标体系建立的理论基础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是一个基于世界城市一般规律、阶段性特征和内在发展动力需求研究的有着内在有机联系的立体指标体系，不是一系列指标的平行罗列，在弄清世界城市建设的内涵及其内在逻辑联系之后，方能奠定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由 5 大要素基础指标组成的主要内容。

（一）功能性指标（流量）

即世界城市的共性特征。世界城市的共性特征既要包含一般城市的基本功能性内涵，更要标明世界城市区别于其他类型城市的国际性功能特质，即实现服务世界、影响全球的城市功能。从人类出现城市形态以来，城市功能历经了深刻的变化。从现代城市的一般功能看，就是对各种要素的集聚和扩散，进而吸引和辐射。理解城市功能，必须建立“流”的概念。现代城市，正是商品流、资金流、人流、技术流、信息流的节点；一些城市以“流量经

济”统领城市发展，应该说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各种流量中，经济流是基础，经济流速度、规模、范围上的差异，形成国际化进程中的不同类型的城市，可以分为地区中心型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区域性国际城市、全球性国际城市（世界城市）等。从这一点来看，世界城市的经济流量应该是全球范围的，其特质就应该是服务世界、影响全球。

（二）规模性指标（体量）

即为完成服务世界、影响全球的城市功能，必须具备的经济规模、经济流量和城市承载力。

流量的形成，发生于城市的体量，即城市的经济规模。一般来说，城市的体量越大，流量也就越大；而流量越大、越广、越快，城市体量也必然随之膨胀；流量与体量的关系，流量是因，体量是果，违背城市发展规律也可能人为把一座城市搞得体量很大，这种体量由于没有流量的支撑，很难持续，可能最终导致城市的悲剧；但流量的扩张，没有体量的保障，就会严重制约流量，从而影响城市向高端的进一步升级。一座城市要完成服务世界、影响全球的城市功能，必须具备与经济流量相适应的经济体量。所以，经济体量是我们观察一座城市是否具备世界城市功能的第二方面的指标。

（三）基础性指标（容量）

为由于服务世界、影响全球的特大经济流量而出现的巨大经济体量提供发达的城市基础设施、高效的城市运行能力和先进的城市管理水平。

芒福德曾把城市说成“无非就是一个容纳各种容器的巨型容器”，城市最初的这种“容器功能”，对于认识现代城市“流量功能”同样有着重要的启发。“容器”的容量，决定着城市的体量和流量。要承载经济流量所需的经济体量，就要具备相应的城市承载能力，也可以称为城市容量。

（四）禀赋性指标（储量）

即承载世界城市所必须具备的资源禀赋，包括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地形地貌、水资源、土地和能源供给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对城市发展的约束性不同，后工业社会知识、技术、教育等智力资源成为重要的城市发展资源。

城市容量，可以通过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加以扩容，但扩容，既要利用可资利用的资源，同时又不得不在既定资源的约束下行事。这种人不能随意改变的城市发展的资源禀赋，既是城市发展的起点，又是不可逾越的边界。即承载特大城市的资源禀赋，包括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地形地貌、水资源、土地和能源供给等有形资源，也包括文化、传统、教育、智力资源等历史积淀下来的城市发展可以依赖的无形力量。我们也可称之为“储量”，储量不同

于容量，往往是不可再生的，只能去适应，而不能随意滥用，资源的枯竭告罄，意味着城市不可持续的重大危机。

（五）品质性指标（能量）

即对世界产生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城市能量，表现为城市的内在品质和个性特征。包括人文、科技、绿色以及民生、安全等方面的深刻内涵。

城市的发展，取决于城市的活力，活力来自于动力，也是一座城市的能量。品质性指标是一座城市区别于其他同类型城市的个性指标，同为世界城市的伦敦、纽约和东京在城市品质上也各有不同。北京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即使建成世界城市，也必然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的特有品质。北京提出的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及其行动计划，恰恰反映了我们追求的城市品质和深刻的能量内涵。

如图2－1所示，5大要素的指标，是一个内在联系非常紧密、逻辑关系十分清晰的体系，反映了世界城市建设的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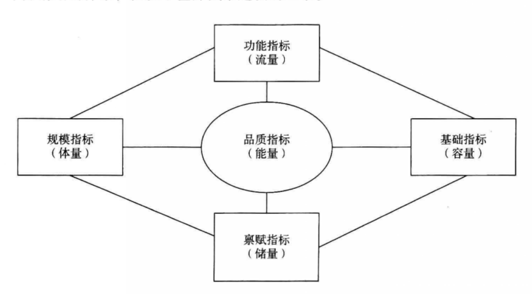


图2－1　世界城市指标体系框架

五类指标之间的关系是：

功能（流量）指标是实质，达不到功能指标，就难以称之为世界城市；

规模（体量）指标是关键，体量指标是功能指标要求的，虽然一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己特殊的历史和环境，但服务世界、影响全球功能的出现，必然发生于城市的体量的形成。所以体量指标既是功能指标的要求，也是功能实现的条件；

基础（容量）指标是体量指标所要求的城市基础设施，也是功能指标实

现的硬条件；

禀赋（储量）指标，既是前两项指标存在的基础，也是其增长和扩张不可逾越的约束和制约；

品质（能量）指标，是保证功能指标实现的软条件，同时，由于它是城市内在的品质指标，所以，其重要性对于一个国家和城市居民来说，远比体量指标更为重要，很多城市，不是世界城市，但生活质量和居民满意度都远远高于世界城市。我们要建立的世界城市，不仅要有一流的体量，而且要有一流的品质，要超越现有的世界城市，是新型世界城市。

四、指标体系的构成与评价方法

1. 为了将世界城市的国际化发展现状及其影响置于全球范围内可比的统一框架下，设计由 5 大要素 26 个分项指标构成的可持续评价体系，指标名称、量纲与数据来源详见表 2－1。

表 2－1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指标评价体系

类别	指　标	打分标准	数据来源
功能指标30分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700 = 5 >550 – 700 = 3 450 – 550 = 1 <450 = 0	2009 年数字 来源：《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7》2009 年 3 月
	航空港货邮吞吐量	>250 万吨货物/年 = 5 >150 万 ~ 250 万吨货物/年 = 3 50 万 ~ 150 万吨货物/年 = 1 <50 万吨货物/年 = 0	2008 年数字 来源：《AIRPORT TRAFFIC REPORT 2008》；北京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
	航空港旅客吞吐量	>10000 万旅客/年 = 5 >5000 万 ~ 10000 万旅客/年 = 3 2000 万 ~ 5000 万旅客/年 = 1 <2000 万/年 = 0	2008 年数字 来源：《AIRPORT TRAFFIC REPORT 2008》；北京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
	入境旅游人数	>800 万旅客/年 = 5 >500 万 ~ 800 万旅客/年 = 3 200 万 ~ 500 万旅客/年 = 1 <200 万/年 = 0	2008 年数字 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美国统计年鉴
	全球 500 强企业总部数	>50 家 = 530 – 50 家 = 35 – 29 家 = 1 <5 家 = 0	2010 年数字 来源：《财富》杂志
	举办国际会议数量	>100 次/年 = 5 85 ~ 100 次/年 = 3 75 ~ 84 次/年 = 1 <75 次/年 = 1	2009 年数字 来源：ICCA 组织统计数据

续 表

类别	指　标	打分标准	数据来源
规模指标30分	GDP 总量	>10000 亿美元 =5 >5000 亿 ~10000 亿美元 =3 1000 亿 ~5000 亿美元 =1 <1000 亿美元 =0	2008 年数字 来源：普华永道
	政府财政支出	>600 亿美元 =5 >400 亿 ~600 亿美元 =3 200 亿 ~400 亿美元 =1 <200 亿美元 =0	2008 年数字 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State and Metropolitan Area Data Book：2010》
	外贸进出口总额	>5000 亿美元 =5 >3000 亿 ~5000 亿美元 =3 1000 亿 ~3000 亿美元 =1 <1000 亿美元 =0	2008 年数字 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金融业产值占 GDP 比重	>15% =5 >10% ~15% =3 5% ~10% =1 <5% =0	2008 年数字 来源：根据各城市统计年鉴计算得出；《State and Metropolitan Area Data Book：2010》
	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5% =5 >3% ~5% =3 1% ~3% =1 <1% =0	2008 年数字 来源：《creative industries 2008——the 50 city report》
	全球商业枢纽研究指数	>65 =5 55 ~65 =3 45 ~55 =1 <45 =0	2008 年数字 来源：万事达卡全球商业枢纽研究报告
基础指标20分	城市基础设施指数	≥105 =5 100 ~105 =3 95 ~99 =1 <95 =0	2009 年数字 来源：美世咨询公司发布 http://www.mercer.com
	轨道交通里程	>400km =5 >200 ~400km =3 100 ~200km =1 <100km =0	2008 年数字 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
	每十万人拥有医生数	>300 位 =5 >200 ~300 位 =3 100 ~200 位 =1 <100 位 =0	2008 年数字 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State and Metropolitan Area Data Book：2010》；《世界统计年鉴》
	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逆向指标）	< 40 微克每立方米 =5 40 ~60 微克每立方米 =3 >60 ~100 微克每立方米 =1 >100 微克每立方米 =0	2006 年数字 来源：《2010 国际统计年鉴》

续 表

类别	指 标	打分标准	数据来源
禀赋指标20分	自然区位便利度	城市拥有沿海港口 =5 城市拥有内河港口 =3 临近周边城市港口 =1 城市无港口也不临近周边城市港口 =0	专家组打分
	人口密集度	>5000 人/ km^2 =5 >3000 ~5000 人/ km^2 =3 1000 万 ~3000 人/ km^2 =1 <1000 人/km^2 =0	2008 年数字 来源：根据各城市统计年鉴和普华永道的数据计算得出
	世界文化遗产	≥5 个 =53 个 ~4 个 =3 1 个 ~2 个 =1 <1 个 =0	2008 年数字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专利申请数量	>15000 件 =5 >5000 件 ~15000 件 =3 3000 件 ~5000 件 =1 <3000 件 =0	2007—2008 年数字 来源：《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 2007—2008》
品质指标25分	人均 GDP	>60000 美元 =5 >30000 ~60000 美元 =3 10000 ~30000 美元 =1 <10000 美元 =0	2008 年数字 来源：普华永道
	生活质量指数	≥103.6 =5 >99.5 ~103.5 =3 95.5 ~99.5 =1 <95.5 =0	2009 年数字 来源：美世咨询公司发布 http://www.mercer.com
	25 岁以上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占比	>30% =5 >20% ~30% =3 10% ~20% =1 <10% =0	2008 年数字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State and Metropolitan Area Data Book：2010》
	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逆向指标）	<200 件 =5 200 ~500 件 =3 >500 ~700 件 =1 >700 件 =0	2008 年数字 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County and City Data Book：2007》
	通勤时间（逆向指标）	< 30 分钟 =5 30 ~40 分钟 =3 >40 ~50 分钟 =1 >50 分钟 =0	2008 年数字 来源：《State and Metropolitan Area Data Book：2010》；《2010 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
	常住人口外国人占比	>20% =5 >5% ~20% =3 1% ~5% =1 <1% =0	2008 年数字 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London：a Cultural Audit》；《State and Metropolitan Area Data Book：2010》

2. 综合借鉴权威国际组织及研究机构通行的指数评价法或打分法，采用四级量表制给出样本城市具体评价；如表2－1所示，每个分项指标分值为四档，最高分为5分，由高到低，大致对应全球性国际化标准——洲际性国际化标准——区域性国际化标准，0分则视为该项指标值在区域性国际化标准以下①。覆盖五方面要素的指标体系框架下，单个样本城市总计为130分，得分大于95分，符合全球性国际化城市标准；得分在65分（含65分）与95分之间，符合洲际性国际化城市标准；得分低于65分，则表明该城市的国际影响力仅限于相邻区域。

3. 依照前述有关全球性国际化标准——洲际性国际化标准——区域性国际化标准意义和相应评分标准，观察在全球城市GDP排名中前30位城市②，通过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城市、拥有洲际影响力的洲际性国际城市以及在相邻区域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化城市三个层次的比较③，分析出区域性、洲际性和全球性国际城市（世界城市）在不同层级上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共性要求，为北京确立建设世界城市的评价指标和努力目标提供测评依据。

表2－2　比较城市地域范围与统计口径

比较城市统计口径描述	比较城市	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人）	2008年GDP排名	备　注
	大纽约地区	23859	1900	1	纽约市5个区，加上纽约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的26个县市
	东京都	2187	1283	2	包括23个特别区、26个市、5个町、8个村

① 世界城市之所以是城市国际化进程的最高阶段，是因为它体现了城市国际化的最高水平。城市在其不断国际化进程中集散力和影响力超出国界，从国内——相邻区域——跨洲际——全球范围，方能成为世界城市（Global City或World City），据此给出样本城市具体评价分值。——作者注

② 根据普华永道（PWC）发布的2008年世界城市GDP排行榜确立测评城市。详见：《PricewaterhouseCoopers UK Economic Outlook November 2009》。

③ 由于国内外学者对第三层级城市是否属于国际城市有较大分歧，提法不一，我们将第三层级城市定义为能够在相邻区域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化城市，包括区域性国际城市和一些正在迅速国际化、具有较大区域影响力的国家中心城市。而第一层级全球性国际城市（世界城市）和第二层级洲际性国际城市则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参见段霞：《首都国际化进程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作者注

续　表

	比较城市	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人）	2008年GDP排名	备　注
比较城市统计口径描述	洛杉矶	14763	1287	3	大都市区（Los Angeles-Long Beach-Santa Ana, CA）
	芝加哥	24810	956	4	大都市区（Chicago-Naperville-Joliet, IL-IN-WI）
	伦敦大区	1580	756	5	包括伦敦城、内伦敦12个区和外伦敦20个区
	巴黎	12012	1174	6	大都市区
	大阪	1898	1131	7	大阪府
	墨西哥城	1547	1918	8	
	费城	12614	583	9	大都市区（Philadelphia-Camden-Wilmington, PA-NJ-DE-MD）
	圣保罗	8051	1909	10	大都市区
	华盛顿	15612	535	11	大都市区（Washington-Arlington-Alexandria, DC-VA-MD-WV）
	波士顿	11684	452	12	大都市区（Boston-Cambridge-Quincy, MA-NH）
	布宜诺斯艾利斯	4758	1290	13	大都市区
	达拉斯	24045	630	14	大都市区（Dallas-Fort Worth-Arlington, TX）
	莫斯科	1081	1047	15	
	香港	1104.3	697	16	
	亚特兰大	21963	537	17	大都市区（Atlanta-Sandy Springs-Marietta, GA）
	旧金山	8869	427	18	大都市区（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CA）
	休斯敦	26060	572	19	大都市区（Houston-Sugar Land-Baytown, TX）
	迈阿密	15895	541	20	大都市区（Miami-Fort Lauderdale-Pompano Beach, FL）

续 表

	比较城市	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人）	2008 年 GDP 排名	备 注
比较城市统计口径描述	首尔	605. 41	1046	21	
	多伦多	7125	529	22	大都市区
	底特律	10968	442. 5	23	大都市区（Detroit-Warren-Livonia，MI）
	西雅图	16341	334	24	大都市区（Seattle-Tacoma-Bellevue，WA）
	上海	6340. 5	1888	25	
	马德里	607	564	26	
	新加坡	710. 2	484	27	
	悉尼	12428. 4	439	28	大都市区
	孟买	603. 4	1935	29	
	里约热内卢	1260	1189	30	
	北京	16410. 54	1695	38	

注：人口为 2008 年数字。

五、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测评依据

通过三个层次的比较，分析不同层级城市国际化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共性要求，有利于我们突破当前已有研究中多以个别城市发展水平与路径作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参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建立一个覆盖世界城市全部要素的可持续评价体系，描述样本城市在当前国际化进程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及优劣势，从而有助于北京认识自己在各方面发展现状和潜力，为未来北京确立 30～40 年的阶段性发展方向和努力目标提供依据。

（一）总体判断

根据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指标体系评测结果，将北京与全球城市 GDP 排名中前 30 位城市进行比较①，依照前述有关全球性国际化标准——洲际性国际化标

① 根据普华永道（PWC）发布的 2008 年世界城市 GDP 排行榜确立测评城市。详见：《PricewaterhouseCoopers UK Economic Outlook November 2009》。

准——区域性国际化标准意义和相应评分标准，从总体发展水平判断如下：

第一层级——世界城市。总体得分在95分以上，全球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枢纽，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只有纽约、东京和伦敦三大都市，这与目前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一致结果。

第二层级——洲际性国际城市。65分（含65分）与95分之间，拥有洲际影响力，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新加坡、巴黎、中国香港、马德里、芝加哥、首尔、洛杉矶、悉尼等8个城市处于第二层级，可以被称为洲际性国际城市。

第三层级——区域性国际化城市。从总体发展水平判断，属于能够在相邻区域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化城市。30分（含30分）与65分之间。比较城市中得分低于65分属于区域性国际化城市，多伦多、华盛顿、旧金山、波士顿、费城、大阪、北京、上海、西雅图、亚特兰大、迈阿密、休斯敦、达拉斯、莫斯科、孟买、底特律、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圣保罗等19个城市处于国际化进程的第三层级。

北京的位置——区域性国际化城市。北京排名第18位，说明北京建设国际城市的基础性条件已经具备，是正在东亚地区迅速崛起、快速推进国际化进程的第三层级城市。

表2-3　比较城市国际化水平分级评价表

城市	功能指标（30分）	规模指标（30分）	基础指标（20分）	禀赋指标（20分）	品质指标（30分）	总得分（130分）	城市排位
世界城市（全球影响力）							
大纽约地区	19	26	18	12	24	99	1
伦敦大区	18	26	16	16	22	98	2
东京都	21	24	16	15	20	96	3
洲际性国际城市（洲际影响力）							
新加坡	19	20	10	11	26	86	4
巴黎	20	20	16	11	18	85	5
香港	16	20	8	10	18	72	6
马德里	13	12	14	11	18	68	7
芝加哥	7	18	14	6	22	67	8
首尔	14	16	11	12	14	67	8
洛杉矶	7	20	11	6	22	66	10
悉尼	7	15	11	6	26	65	11

续 表

城市	功能指标（30分）	规模指标（30分）	基础指标（20分）	禀赋指标（20分）	品质指标（30分）	总得分（130分）	城市排位
区域性国际化城市（相邻区域影响力）							
多伦多	11	18	9	4	22	64	12
华盛顿	4	17	14	4	24	63	13
旧金山	5	12	11	9	26	63	13
波士顿	4	13	12	6	24	59	15
费城	2	15	11	7	22	57	16
大阪	9	8	12	13	14	56	17
北京	14	12	7	8	11	52	18
上海	14	14	7	7	9	51	19
西雅图	1	9	11	6	22	49	20
亚特兰大	5	10	11	4	18	48	21
迈阿密	5	7	11	6	18	47	22
休斯敦	4	5	9	8	20	46	23
达拉斯	4	9	9	4	18	44	24
莫斯科	3	8	13	10	8	42	25
孟买	6	8	4	12	10	40	26
底特律	1	5	10	3	18	37	27
里约热内卢	4	5	8	10	8	35	28
布宜诺斯艾利斯	4	8	4	6	12	34	29
墨西哥城	4	4	5	11	9	33	30
圣保罗	5	5	8	6	6	30	31

（二）指标测评分析

依据所有样本城市在世界城市评价中的功能、规模、基础、禀赋及品质等各方面表现，分单项要素的具体测评结果如下。

1. 功能性流量指标方面

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航空港货邮吞吐量、航空港旅客吞吐量、全球500强企业总部数、举办国际会议数、入境旅游人数等六个分项指标来考量流量

经济所达至的城市服务能力及影响力，排名前十的城市有：东京、巴黎、纽约、新加坡、伦敦、中国香港、上海、首尔、北京、马德里，北京位列第九。

通过北京与其他30城市在该分项平均表现上的对比，入境旅游人数、航空港货邮吞吐量指标表现均弱于平均水平，北京的金融中心指数、航空港旅客吞吐量指标表现均强于平均水平，全球500强企业总部数以及举办国际会议数均远高于平均水平；充分表明上述指标表征的北京城市枢纽作用以及在世界经济管理控制、国际事务等方面的支配影响力，经与国际水平对比，显示出一定优势，具备了一定的城市服务及国际影响竞争力，但在社会文化及国际旅游方面，城市对跨境人流的吸引力以及城市间商品运载、流动力度均有待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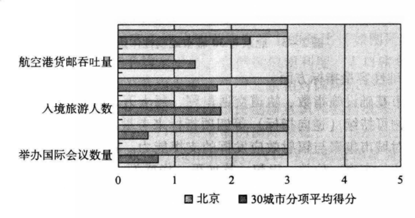


图2－2 北京与30城市功能性流量指标

2. 规模性体量指标方面

以GDP总量、政府财政支出、外贸进出口总额、金融业产值占GDP比重、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全球商业枢纽研究指数等六个分项指标来考量城市为完成服务世界、影响全球的城市功能所必须具备的经济规模与绝对经济实力，排名前十的城市有：纽约、伦敦、东京、洛杉矶、巴黎、中国香港、新加坡、多伦多、芝加哥、华盛顿，北京在此分项要素排序中位于第17位，在其前列的城市依次为首尔、悉尼、费城、上海、波士顿、旧金山等六个城市。

通过北京与其他30城市在该分项平均表现上的对比（如图所示），GDP总量、全球商业枢纽研究指数两项指标表现远低于平均水平，外贸进出口总额也弱于平均水平，但政府财政支出、金融业产值占GDP比重、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均已高于平均水平，这些表明北京基于经济规模与绝对经济实力之上的对外影响力和控制力从基础上而言与国际城市对比尚存较大差距；但政府对经济的掌控能力相对强于其他城市，此外基于知识经济和后工业社会时代的来临，世界城市功能打造将有赖于新的城市财富创造方式和新经济形

态的贡献，北京在以金融业产值占 GDP 比重、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指标所表征的这方面表现较好，已充分显示出新经济体量特征和增长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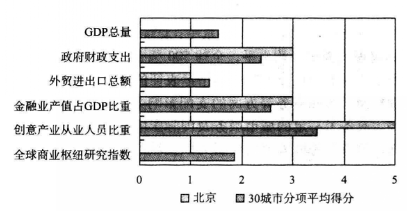


图 2－3　北京与 30 城市规模性体量指标

3. 基础性容量指标方面

以城市基础设施指数、轨道交通里程、每十万人拥有医生数、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可持续（逆向指标）等四项指标来考量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及城市运行效力对城市集聚与辐射效应发挥的支撑能力。该分项要素排名前十的城市有：纽约、东京、伦敦、巴黎、芝加哥、华盛顿、马德里、莫斯科、大阪、波士顿；北京在此分项的表现较弱，仅列于第 27 位，悉尼、西雅图、亚特兰大、迈阿密、洛杉矶、费城、旧金山、首尔、新加坡、底特律、休斯敦、多伦多、达拉斯、中国香港、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 16 个城市均在北京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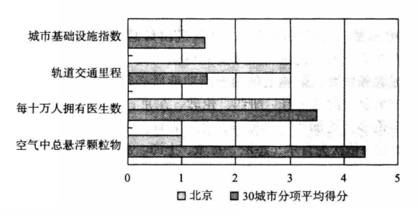


图 2－4　北京与 30 城市基础性容量指标

通过北京与其他 30 城市在该分项平均表现上的对比（如图所示），除轨道交通里程指标表现强于平均水平外，城市基础设施指数、每十万人拥有医生数、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可持续（逆向指标）等三项指标均低于平均水平，

表明北京虽已具备一定的交通基础硬设施条件，但与城市现代化活动以及区域产业活动相关联的包含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设施在内的整体基础设施状况的国际比较不佳，尤其以空气质量类指标所表征的绿色基础设施从可持续意义而言，显示北京未来对服务世界、影响全球的支撑力有限。

4. 禀赋性储量指标方面

以自然区位便利度、人口密集度、世界文化遗产、专利申请数量等四项指标来考量城市自然区位条件和自然资源供给，包括对城市发展路径、财富创造意愿及潜力能够产生潜在影响的城市基因或人文资源供给条件。此分项要素中排名前十的城市有：伦敦、东京、大阪、纽约、首尔、孟买、巴黎、墨西哥城、马德里、纽约，北京继新加坡、中国香港、莫斯科、里约热内卢、旧金山等五个城市之后，居第 16 位。

通过北京与其他 30 城市在该分项平均表现上的对比（如图所示），除世界文化遗产指标表现强于平均水平外，自然区位便利度、人口密集度、专利申请数量等三项指标均低于平均水平，表明北京相对国际水平而言拥有较优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良好文化传承，但以市民创新意识和创新成果所表征的城市创新能力相对较弱；通过人口要素集聚的国际对比，也显示出土地资源天然供给背景下，北京跟多数世界城市相比，人口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未达致由人口高度集聚引致经济繁荣的国际化水平。此外，北京自然区位便利度处于相对劣势，唯有通过与自然区位便利度优势的邻近城市有效实现区域一体化，扩大自身腹地范围，才能改进先天禀赋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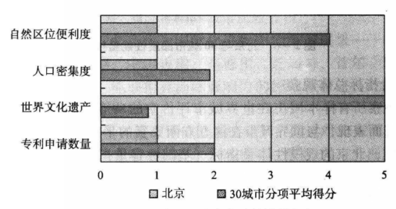


图 2－5　北京与 30 城市禀赋性储量指标

5. 品质性能量指标方面

以人均 GDP、生活质量指数、25 岁以上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占比、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逆向指标）、通勤时间（逆向指标）、常住人口外国人占比等六项指标来表征和考量包括人文、科技、绿色以及民生、安全等方面内涵的

城市内在品质。此分项要素中排名前十的城市有：旧金山、新加坡、悉尼、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洛杉矶、芝加哥、伦敦、费城；北京排名相对靠后，居第25位，还有多伦多、西雅图、东京、休斯敦、巴黎、迈阿密、达拉斯、中国香港、亚特兰大、马德里、底特律、大阪、首尔、布宜诺斯艾利斯等14个城市在城市品质方面的表现位于北京之前。

通过北京与其他30城市在该分项平均表现上的对比（如图所示），除以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指标所表征的社会安全表现远远优于平均水平外，其余人均GDP、生活质量指数、25岁以上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占比、通勤时间（逆向指标）、常住人口外国人占比等五项指标均显著低于30城市平均水平；表明城市居民生活富裕程度及生活质量水平相对较低，由能量内涵所凸显的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活力不足，国际交往影响力和集聚力有限，北京应着力综合环境建设，营造开放而富有活力的城市形象和独特魅力来彰显国际品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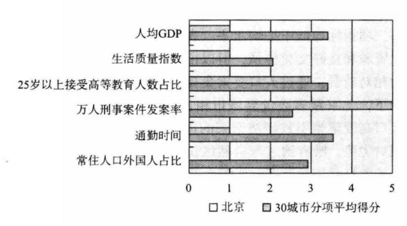


图2－6　北京与30城市品质性能量指标

6. 评价指标总体观察

总体观察所有样本城市在世界城市评价中的功能、规模、基础、禀赋及品质等各方面表现，与世界城市在这五方面要素的平均值（如图2－6、2－7所示）相比，北京的规模性体量指标、基础性容量指标以及品质性能量指标三项分值均弱于世界城市平均水平，其中品质指标单项分值与平均水平差距较大，主要体现在与居民财富水平、日常出行有关的生活质量相对较低，对国际人士的城市吸引力不够等。而在功能性流量指标由于作为中国首位城市的枢纽作用以及在国际经济文化资讯服务、国际事务协调等方面的优势，具备了一定的国际要素聚集和辐射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影响力；禀赋性储量指标方面由于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突出了北京软实力的相对优势，表明北京未来建设成为全球性影响力的国际城市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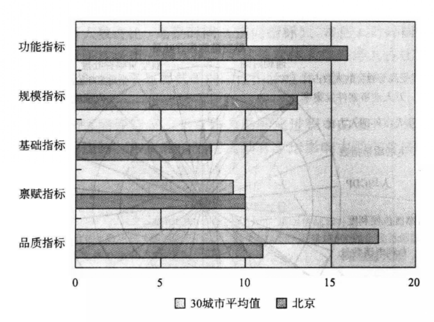


图 2－7　北京与 30 城市国际化水平比较

（三）层级水平测评分析

北京要在中长期内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流世界城市，必然先确立 30～40 年的阶段性发展方向和努力目标，其路径就是以全球性国际化和洲际性国际化二级标准分别对应的样本城市发展水平为参照，在明晰差距的基础上分步推进建设步伐和实现阶段性任务目标。

1. 北京与第二层级——洲际性国际城市比较分析

依据前述测评结果，北京作为国际化进程中的第三层级——区域性国际化城市，与新加坡、巴黎、中国香港、马德里、芝加哥、首尔、洛杉矶、悉尼等八个处于第二层级，能够拥有洲际影响力的国际城市进行比较，以要素分项指标所表征的差距分解如下。

如图 2－8 所示，在世界城市评价体系框架下，通过对北京与新加坡、巴黎、中国香港、马德里、芝加哥、首尔、洛杉矶、悉尼这八个洲际性国际城市各要素的平均表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在功能性流量指标方面，北京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航空港货邮吞吐量、入境旅游人数三项指标均低于八城市平均表现，其中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仅呈微弱之势；而优势则突出表现在航空港旅客吞吐量、全球 500 强企业总部数、举办国际会议数三项指标上；这些都表明以流量经济来考量北京现有的城市服务能力及影响力，北京城市枢纽作用以及在世界经济管理控制、国际事务等方面的支配影响力已基本达到或超越洲际性国际城市一般水准，但在金融资

本控制、商贸往来以及国际旅游环境方面，尚不及洲际性国际城市一般水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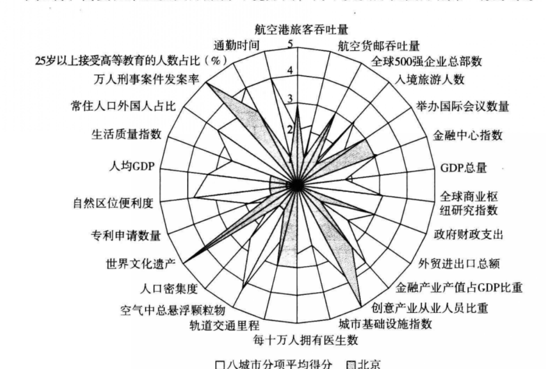


图 2－8　北京与洲际影响力国际城市在各分项表现上的比较

规模性体量指标方面，除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超出八城市平均水平外，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与八城市平均水平持平，而其他 GDP 总量、外贸进出口总额、金融业产值占 GDP 比重、全球商业枢纽研究指数等四个分项指标均低于这八个洲际性国际城市的一般水准，尤其在 GDP 总量、全球商业枢纽研究指数两项指标表现上处于绝对劣势；突出反映出北京在打造服务世界、影响全球的城市功能上，虽然显现出较好的新经济态势，但现有经济规模与绝对经济实力远不及洲际性国际城市一般水准。

基础性容量指标方面，城市基础设施指数、轨道交通里程、每十万人拥有医生数、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可持续（逆向指标）这四项指标表现均在八城市一般水准之下，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指标及环境可持续指标所表征的北京对城市集聚与辐射效应发挥的支撑能力与洲际性国际城市一般水准差距较大。

禀赋性储量指标方面，除世界文化遗产指标表现明显优于八城市一般水平外，其他自然区位便利度、人口密集度、专利申请数量等三项指标来考量城市自然区位条件、自然资源供给及人文资源供给条件，就北京整体禀赋性储量要素而言，低于以八城市为代表的洲际性国际城市一般水准。

品质性能量指标方面，仅以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逆向指标）所表征的

社会治安秩序优于八城市一般状况外，其他人均 GDP、生活质量指数、25 岁以上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占比、通勤时间（逆向指标）、常住人口外国人占比等五项指标表现均低于八城市一般水准，尤其是常住人口外国人占比指标反映出北京人口构成国际化水平显著低于洲际性国际城市一般水准。

2. 北京与第一层级——世界城市比较分析

进一步依据上述测评结果，北京作为国际化进程中的第三层级——区域性国际城市，其与纽约、东京和伦敦三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城市的差距分解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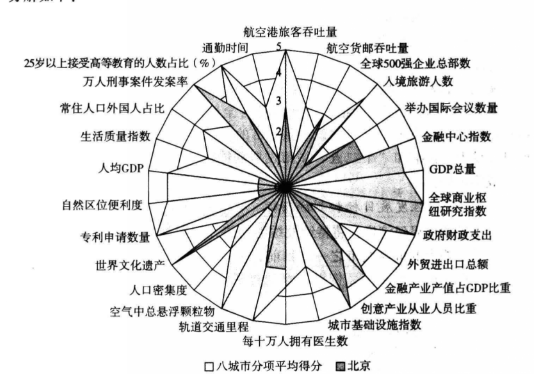


图 2-9　北京与纽约、东京和伦敦三大世界城市各分项表现的比较

如图 2-9 所示，在世界城市评价体系框架下，北京与纽约、东京和伦敦三大具有全球性影响地位的都市进行分项要素比较，可以发现。

在功能性流量指标方面，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航空港货邮吞吐量、航空港旅客吞吐量、入境旅游人数等四项指标低于全球性国际城市一般水准，但北京的全球 500 强企业总部数和举办国际会议数量指标均领先于三大国际城市，表明近年来北京在国际经济管理控制和国际事务等方面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崛起于东亚的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也已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另外，规模性体量指标方面的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禀赋性储量指标方面的世界文化遗产、品质性能量指标方面的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逆向指标）

等三项指标在与新加坡、巴黎、中国香港、马德里、芝加哥、首尔、洛杉矶、悉尼这八个洲际性国际城市比较中表现占优的同时，与纽约、东京和伦敦三大都市相比，北京在历史文化传承和社会安全方面同样优于全球性世界城市一般水准。

六、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与努力方向

图2－8与图2－9均反映出，目前处于第三层级的北京虽与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的国际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但在世界城市全要素比较中并非处于绝对劣势。把握指标体系内涵和世界城市不同层级析分标准，以数据为参照，可以确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三步走”战略，制定阶段性发展目标。即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的十年间，将北京发展为东亚地区发挥重要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城市；再用10～20年时间建成在亚太地区要素聚集的首位城市；在21世纪中叶建成具有全球影响的世界一流的国际城市（世界城市）。据此确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三步走”战略。并据此确立建设世界城市的标准和“十二五”城市发展功能定位，完成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的战略布局。

（一）阶段性发展目标和测评指标

考虑近期世界经济增长将持续放缓的趋势，假定到2050年，北京成为全球性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城市之一，目前三大世界城市维持本指标体系框架下的主要指标一般水准不变，依据北京现有基础、发展潜力和态势，建议阶段性发展目标和测评指标如下（表2－4）。

表2－4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与测评指标

类别	指标	2015年（约束型）	2020年（约束性）	2050年（预测性）	备注
功能指标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670 赶超城市：上海、芝加哥	>700 赶超城市：新加坡、东京	>750 赶超城市：纽约、伦敦	参考《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7》2009年3月
	航空港货邮吞吐量	160万吨/年	200万吨/年	250万吨/年	
	航空港旅客吞吐量	7000万人次/年	8000万人次/年	10000万人次/年	
	入境旅游人数	500万/年	800万/年	800万/年	
	全球500强企业总部数	35家	40家	50家	东京为目前最高水平：51家
	举办国际会议数量	100次/年	110次/年	130次/年	

续 表

类别	指 标	2015 年 (约束型)	2020 年 (约束性)	2050 年 (预测性)	备 注
规模指标	GDP 总量	2000 亿美元	3000 亿美元	10000 亿美元	以绝对数粗略估算 2050 年应达至的世界城市一般水准
	政府财政支出	450 亿美元	500 亿美元	1000 亿美元	以绝对数粗略估算 2050 年应达至的世界城市一般水准
	外贸进出口总额	3000 亿美元	3500 亿美元	5000 亿美元	以绝对数粗略估算 2050 年应达至的世界城市一般水准
	金融业产值占 GDP 比重	15%	16%	18%	
	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12%	13%	15%	
	全球商业枢纽研究指数	> 63 赶超城市：中国香港、巴黎	>66 赶超城市：新加坡、东京	>72 赶超城市：纽约、伦敦	参考：万事达卡全球商业枢纽研究报告
基础指标	城市基础设施指数	> 98 赶超城市：马德里、波士顿	>100 赶超城市：纽约、东京、伦敦	>105 赶超城市：新加坡	参考：美世咨询公司发布指数
	轨道交通里程 替代指标：地下空间利用率	>400km —	>450km —	>650km —	2050 年达至世界城市一般水准
	每十万人拥有医生数	250 位	300 位	350 位	
	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 替代指标：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 75 赶超城市：中国香港、上海 20%	<60 微克每立方米 赶超城市：孟买、墨西哥、新加坡 40% ~45%	< 40 微克每立方米 赶超城市：东京、伦敦、纽约 —	
禀赋指标	自然区位便利度	拥有沿海港口	—	—	通过京津冀一体化实现都市圈港口功能
	人口密集度	>1500 人/ km^2	>2000 人/ km^2	>4000 人/ km^2	
	世界文化遗产	—	—	6 个	北京目前居世界城市最好水平
	专利申请数量	5000 件	8000 件	20000 件	2050 年达至世界城市一般水准

续 表

类别	指 标	2015 年（约束型）	2020 年（约束性）	2050 年（预测性）	备 注
品质指标	人均 GDP	15000 美元	20000 美元	60000 美元	以绝对数粗略估算 2050 年应达至的世界城市一般水准
	生活质量指数	—	—	>100 赶超城市：纽约、伦敦、东京	参考：美世咨询公司发布指数
	25 岁以上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占比	25%	30%	35%	
	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	< 50 件	—	—	北京目前居世界城市最好水平
	通勤时间	< 45 分钟	< 40 分钟	< 30 分钟	
	常住人口外国人占比	1%	2%	5%	

实际工作中须考虑到由于评价指标缺失难以反映后工业社会新要求的部分，充分考虑经济转型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难与压力，为实现产业结构的顺利转型可考虑主动调低经济增长类指标，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世界城市。

（二）努力方向与对策建议

北京要适应进入后工业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根据后工业形态世界城市发展规律，精心培育新产业的生产性要素、新经济的发展活力以及新社会的发展环境，努力消除作为国家首都出于政治安全考虑牺牲经济活力的负面影响，正视转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问题，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和耀眼政绩，经过 10 年 20 年的扎实推进，完成向后工业社会的顺利转型，在国际合作交流中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实现城市发展、市民福利和辐射全球能力三大价值最大化，建设体现社会主义中国核心价值和文化认同的新型世界城市。

1. 关注要素的实际贡献率，消除制约要素国际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城市财富创造、扩大就业和国际服务的能力与活力。

2. 支持智力资本创业，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高创意、定制性和虚拟型新经济。大力发展信息、科技、低碳、金融、创意、体验、旅游、会展等产业。

3. 打造全天候不夜城，创造代表时代文明标志的城市夜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缓解北京因观光展览以及上下班高峰引起的塞车问题，实现全天候机

场、地铁、车站、商场、书店和大排档便民服务，让更多的富余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

4. 拓展空间承载力，转变城市化过程中摊大饼、大拆大建、断历史文脉的发展模式，发展虚拟空间、地下空间、向山区要地、借津出海，建设一个崛起在东亚地区的临海型世界城市群。

5. 精心打造城市礼乐节庆仪式，变说教、宣传、灌输式的文化表现形式为体验型、学习型，恢复古都风貌，留住城市的记忆，创造生动的城市文化景观和新的财富创造方式。

6. 成为国际教育东亚化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促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教育体系和管理理念与国际接轨，方便外籍人士子女入学，吸引海外精英聚集京城。

7. 增强城市多元化和包容性，参照国外城市唐人街模式，试点建设外籍常住人口聚集区。通过使馆区东迁，建立突出各国和地区文化特色的集聚区，带动京津之间河北贫困地带的发展。

8. 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品质，坚持"公交优先"和"非机动车优先"原则，对陌生人或弱势群体提供"无歧视服务"和"微笑服务"，使北京成为一个有人情味的城市。

9. 全面立体盘活城市资源，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降低城市能耗水耗，消除交通堵塞这一最大劣势，有效疏解人口压力，应对各种城市突发事件和安全危机，实现舒适便利的都市生活环境，提升城市的美誉度。

10. 政府退出传统的社会服务领域，向第三部门转移社会公共服务事权，使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通过三大部门各行其责实现城市良性治理、市民积极参与、社会工作扩大就业的社会和谐环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世界城市指标体系和努力方向研究课题组"）

基于网络联系的世界城市指标体系研究

一、概述

理论视角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世界城市的认定标准。世界城市的研究经历了一次重要的研究范式的转型，由世界城市等级体系论转向基于网络联系的

世界城市研究，相应地世界城市的识别指标也从反映城市内部组织构造及其属性的指标，转向反映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相互联系与影响的指标。前者如彼得·霍尔关于世界城市的 7 项识别性要素，弗里德曼概括的衡量世界城市的 7 项标准，戈特曼提出的 3 个方面的世界城市判断标准，伦敦规划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世界城市发展的综合指标，诺克斯提出的世界城市的 3 个判别指标，斯瑞福特选择公司总部数量和银行总部数量两个指标来划分世界城市等级，萨森则以全球生产服务业的角度来进行全球城市的判定等。后者则如泰勒等从“容纳力、支配指挥力和通道”等三个方面和七个不同侧面对全球城市网络作用力进行了测度，史密斯等人提出根据城市与城市间人口、劳务、商品、资本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强度和流动方向划分世界城市等级，此外还包括泰勒根据全球城市报刊业的地理分布、Tee 等采用国际航班旅客资料对全球城市网络之间联系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国内公开发表的世界城市指标体系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屠启宇（2008）提出的“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另一个是金元浦（2010）提出的“北京世界城市指数”。“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的主要设计思路分为目标性指标群和路径性指标群，目标性指标群提示的是世界城市建设的最终结果，而路径性指标群提示的则是世界城市建设工作的路径、抓手，因此该指标体系是一个侧重工作考评，同时兼具评价功能的世界城市指标体系。“北京世界城市指数”包含了政治、经济、基础设施、社会人文、科技创新、人口、生态等诸多维度，该指标体系属于比较典型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不追求对世界城市的量化描述，而是更关注给出我们所要建设的世界城市的“全面的印象”。

二、城市在世界上的地位从何而来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核心目的是提高城市在世界上的地位，成为世界城市体系中有实力、负责任的一员，在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获取相应的利益。那么城市的世界地位是从哪里来的呢？哪些要素是城市世界地位的源头呢？研究认为，世界城市指标体系应该能够反映那些构成城市世界地位的内生性要素，而非单纯反映世界城市的外在特征。

首先，一个城市在世界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总体实力。这里所谓的“总体实力”是一个类似于“综合国力”的概念，反映的是城市规模体量和绝对实力的大小。城市总体实力是一个城市对外发挥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基础，是一个城市“力量”的来源之一。世界城市无一不具有超强的总体实

力，足以对国际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以至支配作用。一个总体实力较弱的城市是不可能成为世界城市的，至少不能成为顶级的世界城市。仅以经济规模为例，根据2009年普华永道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诸多世界城市在全球城市GDP排名中处于领先位置，全球顶级的世界城市东京、纽约和伦敦的排名分别为第1、第2和第5位。

然而，也确实有城市的相对重要性与其自身的绝对实力不相符合的情况。研究发现，城市的经济规模与其世界城市能级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盈余”或“赤字”，即城市能级超前或落后于城市的经济实力，这说明城市的世界地位不是完全由其绝对实力决定的。事实上，全球化和信息化促成了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城市不是依靠它所拥有的东西而是通过流经它的东西来获得和积累财富、控制和权力”。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地位不仅仅是由城市的规模和形态、所拥有的资源量和存量资本堆积决定的，而且也是由该城市是否处于全球城市网络的主要节点上——即它的网络地位决定的。如果说城市的总体实力反映的是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那么城市的网络地位则反映了其所拥有的巧实力。

城市总体实力和网络地位的提升，是建设世界城市的必要条件，但不足以保障城市对世界具有长期的、持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事实上，城市的总体实力和网络地位本身既受全球化的影响，同时也深深依赖于城市的地方性资源，包括文化氛围、制度环境、自然环境等。这些地方性资源正是城市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全球性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资金、人才、信息的支撑条件。从长远来看，城市需要这些支撑条件，才能保障城市长期、持续、高效率地运行，才能保障城市对全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可持续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城市的世界地位来自于其总体实力和网络地位的总和，同时城市世界地位的巩固和维持也离不开必要的支撑条件。

三、北京世界城市指标体系的框架

根据我们对城市世界地位源头的理解，北京世界城市指标体系共包括3个评价维度：总体实力、网络地位和支撑条件。

（一）总体实力

一个城市的总体实力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反映其经济规模和结构的硬实力，反映其科技、文化和品牌实力的软实力，以及反映城市服务功能完善程度的基础设施水平。我们主要使用各种总量指标来反映城市总体实力的大小。硬实力是一个城市总体实力的核心，是发挥城市对外服务功能和影响力

的物质基础。我们选择了GDP总量、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现代制造业增加值等4项指标来反映城市的硬实力。GDP总量反映一个城市经济规模的大小，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反映一个城市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程度。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是对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的评定。现代制造业增加值则反映了一个城市现代制造业的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软实力主要反映一个城市科技、文化、制度等蕴涵的力量，由世界排名500强的大学数量、城市品牌指数2项指标组成。世界排名500强的大学数量反映一个城市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力量的培育和聚集能力，城市品牌指数则是反映城市众多无形资产的一个指标。基础设施是一个城市发挥生产功能、服务城市运行的物质载体。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世界城市的重要特征，是世界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来源。我们用轨道交通运营里程、五星级酒店数量、宽带用户比例3项指标反映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反映市内交通的发达程度，五星级酒店数量反映城市的高水平接待设施的数量和服务水平，宽带用户比例反映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程度。

（二）网络地位

城市的网络地位是个多向度的复合体。城市只是一个地域单位，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通过个人、群体及其活动实现的，因此国际人流、国际机构以及国际活动的会聚显示了一个城市对外联系的广度和深度。

早期的认识认为对于塑造世界城市人口规模是重要的，现在认为人口规模并不是世界城市的充分条件，但高强度的人口流动则是世界城市的普遍特点。我们选择了航空客运量、入境旅游人数和留学生数量三个指标来反映世界城市的人流汇集程度。现代世界城市大都是国际国内交通的枢纽，尤其是国际航空交通枢纽和中转中心地位，对城市国际化的作用极为重要。旅游业由于关联度大、经济带动性强，往往成为世界城市的主要产业之一，境外游客人数反映了这一产业的发达程度。另外，由于旅游者对服务依赖程度的提高使得城市与旅游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因而游客人数也反映了世界城市接待服务能力的高低。留学生数量则反映了世界城市在科技文化领域的领先地位。

国际组织与机构指标之所以也能反映城市之间的联系，是因为城市之间的互动很大一部分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机构内部的互动而发生的。我们选择了全球500强企业总部数、国际组织总部数量、国际零售商的比例三个指标来反映城市拥有各类国际机构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与服务活动的控制与管理主要集中在某些大城市，才导致了世界城市的形成，并以之为重要节点形成全球城市网络，因此拥有大型跨国企业的数量反

映了一个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拥有国际组织总部的数量则反映了世界城市的政治影响力。拥有国际零售商的比例则反映了城市的国际商贸中心的地位。

城市中发生的国际活动及事件指标无疑也能表征城市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我们用年举办国际会议次数、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次数以及友好城市数量三个指标来反映城市国际活动的活跃程度。国际会议是国际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表现。体育赛事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已经成为一个衡量城市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友好城市是城市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渠道和形式之一，现如今，友好城市的交往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在城市对外交往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三）支撑条件

世界城市支撑条件是指保障城市长期、持续、高效率运行的要素，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活力、创新和宜居。我们主要使用各种结构和比例指标来反映世界城市的支撑条件。活力是指容纳多样的人和事物，促进城市协调并且持续发展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结构。包容多样性的文化氛围是城市充满活力的首要条件，收入分配和人口年轻、结构合理也是城市能否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我们选择了外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基尼系数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 3 个指标来反映城市的活力。创新既包括科技创新也包括文化、管理等领域的各种创新。创新可以保障城市提升效率并从知识产权获取竞争优势，是控制全球经济、文化、政治和建设世界城市的关键之一。我们选择每万人口高校在校生数、人均专利申请指数和创意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 3 个指标，分别从创新主体、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等方面反映城市的创新能力。宜居是指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提供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环境。我们选择失业率、人均预期寿命、空气污染指数 3 个指标，从安全性、健康性、舒适性等侧面反映城市的宜居程度。

四、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指标体系的特色

首先，本指标体系实现了判别标准和建设路径的统一。理想的世界城市指标体系，应该既能反映世界城市的核心特征和判定标准，又能作为指导发展方向的标杆。在我们的指标体系中，总体实力、网络地位、支撑条件既反映了城市世界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也指明了建设世界城市的主要着力点：提

升总体实力是建设世界城市的基础工作，提高网络地位是建设世界城市的直接着力点，完善支撑条件则是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保障。

其次，本指标体系实现了世界城市与“三个北京”的有机统一。北京市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新目标后，必须处理好与“三个北京”的衔接关系。世界城市与“三个北京”是一种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我们的指标体系中，“三个北京”构成了世界城市重要的支撑条件，活力、创新、宜居与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呼应关系。

再次，本指标体系超越了传统国际城市指标体系。从国际城市到世界城市，显示北京在城市国际化问题上由被动国际化向主动国际化的转变。北京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国际化浪潮的影响，而是开始考虑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如何扩大城市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相应地，我们的指标体系也从单纯关心外向性（国际成分的增加），转变为更加关注集中性（国际性活动集中程度）和关联性。

最后，本指标体系超越了传统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传统的城市竞争力理论及指标体系研究将注意力集中于城市内部的因素上，过于强调内部经济与战略因素、禀赋比较优势等对城市竞争力的决定作用，而忽视城市成功发展中的外部因素，特别是与外部的连通性。我们认为城市的外部联系因素与内部因素一样重要，相互联系是城市获取世界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

五、北京世界城市指标体系的测评方法

制定本指标体系的目标，除了明晰世界城市概念的内涵外，还希望对北京目前在世界上的城市地位做出客观的评价。城市地位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在相对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我们的思路是在某个指标上将北京与世界城市的一般水平（我们用平均值来反映这个一般水平）相比得到一个比值，这个比值反映了在该指标上北京对世界城市的实现程度。逐层计算多个指标的平均实现程度，我们就能得到北京在各个领域乃至整体上对于建设世界城市目标的实现程度。目前，获得公认的世界城市是纽约、东京和伦敦三个城市，这三个城市也是最顶级的世界城市，因此我们以这三个城市的数据计算各个指标的平均值作为比较的基准值。

六、北京世界城市指标体系的测评结果

从北京在 27 个指标的实现程度看可谓参差不齐，既有五星级酒店数量、

友好城市数量、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每万人口高校在校生数、创意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失业率、人均预期寿命等7个指标。北京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城市的一般水平，也有GDP规模、世界排名500强大学、城市品牌指数、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国际组织总部数量、外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人均专利申请指数等7个指标，北京的实现程度不足40%。

逐层向上计算各个领域的平均实现程度，可以看到：在总体实力上，北京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最高，接近世界城市一般发展水平的70%。但是，在软实力方面，北京只到达世界城市一般发展水平的27%，总体偏低。在网络地位上，北京市在吸引跨国企业、国际组织等落户方面较弱，国际机构的实现程度只有世界城市一般水平的65%。在吸引国际人流和国际活动方面略好一些，但也只达到世界城市一般水平的70%略多。在支撑条件上，北京在宜居性方面相对较好，已经接近世界城市一般水平。但与其他主要世界城市比较，北京在激发城市活力、提高城市的创造性方面仍有非常大的差距，需要大力推进。

从构成世界城市地位的总体实力、网络地位和支撑条件三个方面来讲，北京市在总体实力上的实现程度最低，只有57%。在网络地位上的实现程度稍高，为69%。在支撑条件上的实现程度最高，为73%。这表明，虽然北京的总体实力与主要世界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提高和世界经济中心的东移，北京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枢纽作用已经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同时，北京在社会和谐、科技发展、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为北京进一步提升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将所有指标综合在一起，我们就得到了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目标上的综合实现程度——66%。可以看到，北京目前的发展水平接近于世界城市的门槛值或“及格分”。彼得·J.泰勒等人曾把世界城市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是最高层级的世界城市，北京是第三层级的世界城市，这一评价结果与对北京的这一定位基本吻合。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　齐心　张佰瑞　赵继敏）

基于经验特征与价值理念的世界城市指标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

的选择。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全面而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城市在朝着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世界城市的目标发展。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金融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国际化大都市。2005年，在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明确提出，北京必须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2009年底召开的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进一步提出，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审视首都的发展建设，提高科学发展的水平、规划建设的档次和服务管理的水准。

一、世界城市的经验特征

什么是世界城市，学界和政界出现了诸多解释。在这些解释中，绝大多数是从经验特征上来定义的。从经验特征上看，世界城市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第一，经济实力雄厚，经济国际化程度高。世界城市既是一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区域性和世界性的经济中心。它聚集着国际高端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的国际高端资源，是世界经济决策中心和资本运营中心，并且能在某种程度上左右全球经济的活动。

第二，社会发展指标高，是人文和自然环境协调的宜居城市。安全是宜居城市的第一要求，城市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环境、社会治安状况和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宜居城市还要具备宜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以及良好的文化氛围，要实现城与人的和谐一致、共同发展。

第三，拥有主导和改变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的能力及权利。这在内涵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公认度，世界城市需要有社会认可度和国际公认度。提升国际公认度的前提是要有国际知名度、美誉度、满意度等。二是话语权，是平等参与全球化事务的一种资格。三是软实力，包括国际语言环境、国际机制和对外政策、人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文明程度和大众传媒等。世界城市不仅是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的控制中心，也是中外文明融合和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心，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高度统一体。[①]

第四，具有良好的国际形象。世界城市是国际交往、交流和活动的聚集地，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来源。城市形象既现代化设施、宜人的自然环境，也包括诚信环境、公众素质、文明程度、社会风尚等。但一

① 连玉明. 世界城市，北京的抉择. 人民日报，2010－5－13（23）.

个城市的品质最根本的体现为人的素质。

从世界城市的内涵上可以归纳出它具备以下特点：1. 中心性。世界城市既是世界的经济中心，也是国家和国际政治权力的中心，同时还是全球的文化、艺术中心，集中了各种大型的国际交流和大型活动。中心性特征使得世界城市不论是对周边区域的经济还是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都具有一种辐射力。2. 开放性。世界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都要具备一种开放的心态与意识，要敢于竞争、积极进取，更要加强与世界各国、各民族间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3. 包容性。世界城市因为是开放的，它汇集了世界上的各种文化观念，这就需要在珍视和传承本地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在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对立基础上，形成多元共存的文化体系。

二、世界城市的价值理念

关于世界城市的思考不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从理论层面上，世界城市应该体现现代社会的基本的价值理念和世界发展的价值诉求。这包括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

（一）以“人”为本理念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应该是“人”的发展，“以人为本”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历史进步的前提。“人”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体现在人的精神文化领域。城市的规划、管理和服务都要贯穿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要做到以“人”为本，就要关注“民生”、“民居”、“民需”，不仅仅是人们物质上的需求也包括人们精神上的需要。

（二）民主法治精神

民主法治是世界城市的基础和保障。民主是表达权利和实现平等的根本手段。民主包括民主制度、民主权利和民主观念。民主制度指的是运用制度的力量为公共权力的产生、更换和制约，公共权力机构和公职人员的决策和管理，公民的参与活动，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保障公民对政府决策过程和议事规则的最终控制。而民主权利和民主观念所表征的是公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表达个人的意志和行为自由的变量函数。民主与法治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真正的民主政治必然是法治政治。只有实行法治，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社会成员依法享有民主权利，才能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只有实行法治，通过法律程序和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纠纷和矛

盾，才能通过程序正义体现和维护实质正义，才能保证社会公正；只有实行法治，坚持依法执政，把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并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履行职责、行使权力，才能防止社会矛盾激化为对抗和冲突，从而保证社会稳定有序；只有实行法治，使社会成员的民主权利制度化、法律化，才能引导人民群众通过法律程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能保证民主的真正实现。世界城市应该具备民主法治的精神和相应的完备制度的保证。

（三）公平正义原则

公平正义是一个具有广泛内涵的社会学范畴，它指的是全部社会资源和社会福利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效率的公平、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等。社会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尺度。世界城市的建设须坚持公平正义原则，这就要求城市的各成员之间、组织之间和部门之间都按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形成人与人之间彼此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抛开其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和经济状况等的区别，在城市生活中一律平等，组织与部门之间也不因其规模、职能和作用的大小而有区别。在世界城市建设中，要特别关注特殊困难群体，重点发展面向特殊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以稳定协调和平衡发展为目的，进行利益整合，使城市各要素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三、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

从世界城市的经验特征与价值理念的思考中，本文得出世界城市的三个重要指标体系，即制度体系、文化观念和服务网络。

（一）制度体系

制度是指由社会确认的社会规则和一定行为规范的综合系统，是关于人们权利、义务和禁忌的规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这样认为，“制度提供框架，人类得以在里面相互影响。制度确立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一个社会……制度是一整套规则，应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政策、契约和决策程序等，非正式制度包括惯例、习俗、文化信仰、亲属关系、伦理约束等。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而非正式制度不具有强制性。在本文中，制度被界定为具有强制性特征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划入文化观念范畴。

世界城市的制度应该包括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健全的民主自治机制，

以及其他利益协调机制等。一个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包括由政府主管、各基层部门积极配合的领导机制，和高效的居民自治组织。健全的民主机制包括民主领导体制和由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等构成的基层民主机制。世界城市的制度体系首先要具备有效性，它要能在四个方面满足人们的理性预期：（1）它使人们看到保持连续性的价值，（2）它提供了互惠的机会和可能，（3）它提供了流动的信息，（4）它为解决或缓和矛盾提供了机会和可能。也就是说，“制度创造了一种建立和发展出稳定和平的氛围”。其次，制度要具有强制性，通过惩罚不遵守制度者来约束行为者行为，使制度得到强制性执行。任何一项制度都为人们的行为划定了一个可行与不可行的界限。关于制度的强制性特征，格拉斯·诺斯说：“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制度是为决定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它旨在约束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最后，制度不仅有规范和引导作用，还具有社会化作用，它能渗透到一个团体的习惯中或一个民族的习俗中。因为制度能产生一种“适当性的行为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行为体的行为不是如理性主义所说的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为了去做符合规则和规范的“正确”的事，因为行为体都已深深地嵌入到了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并受其影响，从而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形成一种集体身份认同。

（二）文化观念

文化观念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也是其凝聚力和自信力的源泉。它体现为城市的社会环境、文化品位、道德水准，以及市民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世界城市的文化观念应该具有国际性和多元性特征。

国际性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市民的国际意识（或称世界意识、全球意识）。它是人们对于本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界各国之间关系和世界事务的总的认识。国际意识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统一。它是一种积极主动地面向世界、学习汲取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态度与观念，是具有宏观历史视野、正确把握时代潮流，全面、整体、发展地思考与分析世界事务的方式与方法，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事务管理、自觉遵守国际规则与制度的品质和能力，是个人对本民族、国家，以及对全人类的责任与义务的意识，是一种人类共同体的意识。国际意识体现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以及整个国际形势变化的敏感度和关注度。国际意识的内涵包括开放竞争意识、平等合作意识和国际规则意识。

多元性是世界城市的一大文化特征。在世界城市发展中，总会面临外来

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交流，乃至冲突的问题。中国传统儒家曾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认为，“从对立的东西中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中产生和谐”。世界城市建设要在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对立基础上，形成多元共存的文化体系。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曾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也就是说，文化建设需要在保守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爱护、发掘、吸收和探讨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通过各民族文明的交流、对话、借鉴与融合，力求使本民族传统文化在保守中得到创新。

（三）服务网络

完备的服务体系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它为城市居住者和往来者提供一个良好、优质的服务，可以增强对城市的认同，提升城市的“软实力”。完备的服务体系首先要完整系统。既包括物质性资源也包括非物质性资源。物质性资源包括服务设施和服务人员。服务设施有服务中心、劳动保障所（站）、警务室、卫生服务站、图书馆、居民公共活动广场等场所，及其场所内的服务办公设施。服务人员既有专职人员也有兼职和志愿组织与团体。非物质性资源有服务意识、服务机制和服务信息网络。较强的服务意识有助于提高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完善的服务机制则是高效服务的制度保障，便捷的信息服务系统能提供信息服务平台，为市民提供良好的服务。其次，服务要有专业性。世界城市的发展对城市服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问题的多样性和需求的多元化，对服务工作者的知识与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服务提供者要具备专业水准。最后，形成服务网络，由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家庭和志愿者队伍等共同组成。政府与各种自治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充分发挥志愿团体的作用，鼓励居民家庭及个体的参与。通过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发挥作用，形成一个相互关联、共同发挥作用的服务网络。

世界城市三个重要指标：制度体系、文化观念与服务网络，是紧密相关联的。文化观念作为理念形态，在城市建设中具有统领地位，制度与服务一方面是文化的具体体现和实践形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文化观念形态的形成。当然，世界城市的建设离不开相互交流与借鉴。2010 年举办的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Better Life）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就为各参展方提供了一个推介城市发展经验、交流城市化发展理念的平台，城市建设者们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学习、去借鉴，把城市建设得更美好。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卢静副教授）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监测评价体系

21 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两大主流趋势的交织与融合，城市作为全球网络化的重要节点，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正逐渐成为全球社会经济活动的动力中枢，并代表国家直接参与到全球竞争的大舞台。2008 年第 29 届奥运会在北京的成功举办，极大提升了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为北京在全球化城市发展趋势中脱颖而出奠定了坚实基础。瞄准今后几十年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以及在后奥运时代谋求更高层次发展的战略需求，2009 年 12 月，市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发展目标，以更高标准和更高要求来勾勒北京未来的发展蓝图。

一、世界城市的概念及评价标准的演变历程

（一）世界城市的概念

“世界城市”一词最早出现于 1889 年，德国学者哥瑟（Goethe）将罗马和巴黎描述为世界城市。而“世界城市”概念的界定则最早由苏格兰的城市规划师格迪斯（Geddes）于 1915 年在《演化中的城市》一书中提出的，是指那些在世界商业活动中具有突出优势的城市。“世界城市”概念的提出距今已有近 100 年的历史。

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德・霍尔（Peter Hall）是现代世界城市研究的先行者。1966 年，他提出世界城市是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产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一流大城市。

1986 年美国的城市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n）提出了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之下的空间组织形态角度来研究世界城市，认为世界城市是资本控制中心，并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的七大假说：1. 一个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形式和程度以及它在新的国际地域劳动分工中所担当的职能，将决定该城市的任何结构转型。2. 世界范围内的各主要城市均会被全球资本用来作为其进行空间组织和协调其生产与市场的基点，由此导致的各种联系将会使世界城市形成为一个复杂的空间等级体系。3. 世界城市的生产活力和就业结构直接决定了其全球的控制职能。4. 世界城市是国际资本集中和积累

的主要地点。5. 世界城市是大量国内和国际移民的终点。6. 世界城市使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更加显现，其中空间与阶层的两极分化成为焦点。7. 世界城市增长带来的社会代价之大和之快有可能超越一个国家的财政负担能力。

1991 年美国经济学家萨森（Sassen）认为全球城市是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是那些能为跨国公司全球经济运作和管理提供良好服务和通信设施的城市，是“全球性服务中心”。

同年，卡斯戴尔斯（Castells）在全球网络化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流动的空间”的概念，他指出，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而世界城市是在这种流动的空间内，连接各种全球网络的连接点。

（二）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的演变历程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世界城市的内涵和特征纷纷做出描述，但对于世界城市形态和评价标准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时至今日，理论界和学术界仍无法做出统一的界定。通过对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的演变历程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准确把握世界城市的核心内涵，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基础的理论依据。

1. 以政治、商业影响力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彼德·霍尔认为世界城市的评价标准包括：成为所在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拥有大型国际机场、较大的港口或铁路等交通枢纽，发达的新闻出版业和无线电、电视网络，较大规模的人口并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发展良好的娱乐服务业等。彼德·霍尔关于世界城市的评价标准体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国家政治权力在城市形成和发展中的影响力，因而形成了以政治权力中心和商业中心作为世界城市主要评判标准的阶段。

2. 以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下的区域特征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1986 年，美国的城市学家弗里德曼经过潜心研究，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下的空间组织形态的角度来研究世界城市，并归纳出判别世界城市的 7 项标准，包括：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包括地区性总部）所在地、国际组织所在地、商业服务部门的高速增长、重要的制造中心、主要交通枢纽、人口规模，标志着世界城市及识别标准研究转向了世界城市形成的内在动力机制，对世界城市研究起到划时代的作用。弗里德曼是在新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格局和经济结构形成过程中提出的世界城市的判别标准，他认为世界城市的识别标准集中体现那些处于核心地位并对全球经济文化生活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发达国际大城市的特质。

3. 以生产者服务业的集中度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美国经济学家萨森在弗里德曼等人的研究基础上，于1991年提出了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全球城市应该是“全球性服务中心”，在生产者服务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和优良的基础设施及服务下，能够提供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和金融产品，并具有全球控制能力的大城市，银行和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是用来识别世界城市的主要标志。

1999年，由英国的毕沃斯托克（Beaverstock）、史密斯（Smith）和彼得·J. 泰勒（Taylor）等人在拉夫堡大学组成了“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aWC），他们提出从全球城市网络的角度，以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接结性和影响程度的大小来判断世界城市，认为现代服务业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世界城市作为全球化的结果是现代服务业的聚集地，因此将现代服务业中的会计、广告、金融和法律等4个领域的服务能力作为界定世界城市及其等级的依据。

这种评价标准主要缘于20世纪90年代后，知识经济在发达国家逐步成为现实的经济形态，国际分工格局再次出现调整，并形成新的产业分布特点，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优势使得美国、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不仅进一步拉大了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更加带动了发达国家服务经济的发展和全球性服务中心地位的提升。因此，这一评价标准突出了世界城市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控制力和集中度。

4. 按照综合发展标准设置的多元评价标准

1991年，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The London Planning Advisory Committee）开创性地提出一套旨在促进世界城市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指标，认为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较强的财富创造能力、就业和收入的增长、较高的生活质量是判断世界城市的核心标准。而诺克斯（Knox）在1995年提出，以功能分类的方法来评价和判定世界城市，包括3类标准：跨国公司商务活动，即世界500强企业数；国际事务，即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数；文化集聚度，即城市在国家中的首位度。

此类标准表明世界城市的关注点正逐步由单一功能型转向多功能型甚至是综合功能型城市的判别。识别要素不仅包括经济的首位度，还包括社会、文化、环境等各领域内容。而以单一功能见长的国际大城市已很难再作为世界城市体系中的核心城市。所以，反映综合发展能力的评价标准不仅反映了世界城市研究要点的变化，而且说明综合型世界城市是未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5. 以城市网络体系节点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在历经几年的研究与观察后，1995年，弗里德曼再次将世界城市的评价

标准归结于世界城市的经济规模及控制实力，以城市空间体系中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来判别世界城市所处的全球“基点”或“控制中心”。2000年以后，GaWC小组也继续拓展了研究工作。他们利用100家全球性服务公司数据，从容纳力、支配力和通道三大方面的指标入手，进一步测定了316个城市的网络作用力和等级体系，再次界定并细化了世界城市的等级。

弗里德曼和GaWC小组在初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世界城市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方向，这种变化代表着国际学术界对于世界城市发展研究的角度已由单纯地、割裂开地观察世界城市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规律，转变为明确提出要在国家背景甚至更加广阔的世界城市网络的整体发展背景下开展城市研究的趋势。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作用力、影响力等指标的内涵理解不同，但这类评价标准无疑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研究的启示

1. 现代意义的世界城市

通过上述演变历程，现代意义的世界城市已经脱离了传统世界城市的概念，不再单纯以经济体量、人口和城市规模、商业交往能力作为评判标准，而是越来越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多维度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强调能够前瞻性地引领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当今的世界城市首先表现为综合性、多功能的国际城市，同时，还要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重要的经济节点、金融节点、贸易节点、国际交往节点，在处理全球经济、社会、政治和人文事务中具有核心地位。

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是世界跨国公司总部、国际高端人才、重要国际活动的聚集地，是以自身实力为基础，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物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成为全球社会经济活动的动力中枢和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核心节点的城市。

2.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应该遵循世界城市发展的共同特征

通过研究，当今世界城市具有共同的发展特征，包括以经济规模为代表的雄厚的经济实力，以人口规模、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总部为代表的集聚能力，以通信和交通网络设施、文化交流活动为代表的交往能力。这些特征决定了世界城市对国际社会经济事务具有核心作用力和影响力。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应该首先遵循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世界城市的内涵和共性特征，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扩大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影响作用，力争做到与国际公认的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相衔接。

3.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应该具备个性特征和特色发展路径

人们对于世界城市形态的争论源于当今世界城市的发展路径各有不同，城市发展形态各具特色，金融地位、政治地位、科技创新、文化艺术都是决定世界城市地位的重要因素，因此，理论界和学术界始终无法给予明确界定。基于上述原因，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可以立足于北京实际，突出北京优势，着眼现阶段的城市发展需求，在遵循世界城市共性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建设具有北京特色的世界城市。

上述研究表明，从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的演变历程来探索当代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和核心特征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研究工作中不可回避的理论环节。按照市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的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在新的起点上谋求更高层次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后工业时代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因此，开展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研究工作要首先以世界城市理论为依托，借鉴发达国家主要世界城市的发展经验，从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和核心特征出发，结合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四个服务”的具体要求，明确建设符合中国特色、北京特点的世界城市，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构筑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特色路径，为实现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提供参考依据。

二、世界城市评价指标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代表性学者和著名研究机构关于世界城市评价指标的研究与分析，目前有关世界城市研究的指标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反映世界城市一般性特征的识别导向类指标、突出竞争力思想的比较导向类指标、引导世界城市发展方向的规划导向类指标。

（一）反映世界城市一般性特征的识别导向类指标

识别导向类指标是基于对已有世界城市共性特征归纳形成的，具有识别特质的指标。世界城市通常具备如下七项共性特征：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人口规模大、构成多元化；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高端服务业较为发达；具备较高的国际化水平和开放度，并具有较强的世界影响力；具有独特的城市特色与魅力、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城市群的带动效应、核心辐射能力强；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水平。

通过梳理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机构提及的识别导向类指标，我们看到，尽管不同时期的研究视角在不断转变，识别的内容在不断延伸和扩展，但主要涉及三大领域，一是以经济规模为代表的“发展实力”；二是以人口规模、

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组织所在地为代表的"集聚能力";三是以国际交通枢纽为代表的世界城市的"交往能力"。

表 2-5 开展世界城市研究的学者和机构涉及的识别导向类指标

	发展实力	集聚能力	交往能力
彼德·霍尔（1966）	良好的娱乐服务业	较大规模人口并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发达的新闻出版业和无线电、电视网络	大型国际机场、较大港口或铁路等交通枢纽
弗里德曼（1986）	商业服务部门的高速增长	重要的制造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主要的金融中心、人口规模	主要交通枢纽、国际组织所在地
萨森（1991）		跨国公司总部、银行	
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1991）	就业和收入的增长、较高的生活质量	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较强的财富创造能力	基础设施
弗里德曼（1995）	经济规模	控制经济的实力	
诺克斯（1995）		世界 500 强企业、文化集聚度	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数
GaWC（1999）		现代服务业中的会计、广告、金融、法律	
GaWC（2000 以后）		现代服务业的容纳力、支配力、控制力	

通过上述分析,"发展实力"、"集聚能力"和"交往能力"是世界城市识别导向研究中具有核心价值的领域，对于开展世界城市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应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予以持续的关注。

（二）突出竞争力思想的比较导向类指标

比较导向类指标是用于衡量不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单一或多个领域竞争能力的指标。

1. 单一竞争力特征比较的世界城市指标

2009 年，美世公司根据城市生活条件开展了"全球城市生活质量"调查[①]。调查涉及影响生活质量的 10 大类 39 个因素，包括：政治和社会环境、

① http://www.mercer.com

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医疗和卫生条件、学校和教育条件、公共服务和交通运输、休闲娱乐、消费品、住房、自然环境。

2009 年，《财富》杂志按照各城市拥有的“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500 强企业收入总和”两项指标对全球城市进行比较。

美国《幸福》杂志从人口、生活消费指数、飞往其他城市的直达航线、办公用房每平方米年租金、对其他文化开放程度 5 个指标开展比较研究，评出世界十大贸易城市。

2008 年美国媒体评出的“世界十大科技城市排行榜”，2009 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信息部公布的一年一度的“世界宜居城市排行榜”都是针对单一竞争力开展的比较研究。

2. 多竞争力特征比较的世界城市指标

2008 年，由中国社科院倪鹏飞博士和美国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的彼得·卡尔·克雷索教授（Peter. Karl. Kresl）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展了全球城市竞争力研究，认为竞争力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就是领先的世界城市。2007—2008 年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①]使用了 9 项指标对全球 500 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进行测度，即 GDP、人均 GDP、每平方公里 GDP、劳动生产率、城市拥有的跨国公司数量、专利申请量、价格优势、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

2008 年 10 月，美国《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按照 5 个领域设置全球城市的比较指标，即商业活动、人力资源、信息交流、文化积累及政治参与，用于对全球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并排序。

2010 年 3 月，纽约合作组织与普华永道联合开展了旨在考察“城市繁荣推动因素”的研究工作，研究涉及 10 项总体指标，包括：智力资本、技术智商和创新、经济影响力、交通和基础设施、宜商环境、成本、可持续性、健康安全和治安、人口结构和宜居性、生活方式资产，并设置了 58 个变量。

在不同的研究成果中，比较导向类指标所代表的世界城市的特征各有不同，既有着眼于商业活动、信息交流、政治参与、文化交流等城市综合发展特征，也有针对科技、生活质量、贸易、城市财富等单一特征开展对比研究。而无论哪一类指标，都是在具有共性特征的世界城市核心功能要素基础上，进一步补充的竞争要素，重点关注世界城市的竞争实力、竞争能力和竞争潜力；强调智力资本、科技研发水平、宜居环境、生活质量、可持续性是未来

---

① 倪鹏飞，彼得. 卡尔. 克雷索. 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7—2008）[R].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世界城市发展的着力点；强调致力于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提升自身地位的城市需要具备的比较优势。因此，比较导向类指标突出体现了当前以及未来世界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三）引导世界城市发展方向的规划导向类指标

1. 规划导向类指标的基本情况

规划导向类指标是用于指导如何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美国城市学家弗里德曼曾经提到，“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政策的结果”，而“下一世纪的城市必然是规划的结果”[①]。从当前世界城市的发展路径看，越来越多的世界城市具有明显的政府公共政策指导下的规划发展痕迹，可见城市规划对于未来世界城市发展所具有的战略引领意义。建立和研究规划导向类指标在世界城市研究过程中显得愈发重要。

早期的世界城市是市场因素主导自发形成的，但现代世界城市越来越显露出政府规划引导的痕迹。《东京构想 2000》提出，到 2015 年东京城市的发展目标包括：舒适的东京；人员、物品、信息顺畅流动；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富有个性和能力的人才；多彩社会；产业活跃发展；安全；环境与健康；可持续发展；社会基础设施；自立发展；下一代培育；就业充足；信息化；交通运输；提升城市控制力和地位，并围绕规划制定了城市发展步骤和措施。

1995 年，“伦敦荣耀计划”（the London Pride Prospectus）被公布，它设定了城市重点战略发展框架，包括：实现世界级生产力；更强的社会凝聚力；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生活设施。其目的在于确保伦敦作为欧洲唯一的世界城市地位。而随后的英国中央政府也提出“将伦敦提升到世界城市的首都的地位是当前政府的基本政策”。为适应与巴黎、法兰克福、巴塞罗那和柏林等城市的竞争，“伦敦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而战略规划导则给城市规划一个涵盖发展过程各个方面的框架”。

2006 年，纽约市提出的《纽约 2030》[②] 规划，刻画了未来 25 年纽约将要建设成为一个更大、更加绿色的纽约。《中国香港 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③] 将香港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定位为“亚洲国际都会”。悉尼市政府在 2008 年 5 月公布了《可持续发展的悉尼 2030 远景规划》[④] 征求意见稿，从可持续发展

① 约翰·弗里德曼著．陈闽齐译．世界城市的未来：亚太地区城市和区域政策的作用，国外城市规划，2005，Vol. 20，No. 5.

② http://www.nyc.gov/html/planyc2030/html/home/home.shtml.

③ http://www.china-up.com/international/message/showmessage.asp?id=941.

④ http://www.cityofsydney.nsw.gov.au/2030/.

的视角，指导悉尼市未来20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其中规划确定了悉尼未来发展方向的三大主题，绿色的、全球化的、相连的。

2. 规划导向类指标的着力点

从东京、纽约、巴黎等顶级世界城市，以及中国香港、悉尼等新兴世界城市的战略规划看，虽然内容不一，形式多样，但均涉及了三个共性主题。

一是强调对人文社会领域的关注。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涉及更加多元的人文发展空间，东京的战略发展目标包括社会机遇、人才、自立发展、下一代培育、就业、交通运输等多元领域；中国香港特别提出要加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悉尼确定“连接性”主题，强调高质量的公共交通、世界一流的通信系统，以提高社会虚拟交流的能力；巴黎提倡和谐城市建设理念，建设自动交通网络、加强港口和塞纳河整治，增加就业岗位。由此可见，以关注人的发展、展示多元文化、塑造城市形象、构建社会和谐为代表的人文发展是未来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主题。

二是强调城市发展实力和整体地位的提升。几个城市的战略规划均提出通过经济手段，有效提升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其中，强化信息化能力、提升城市控制力和地位是东京在《东京构想2000》中提出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香港在《中国香港2030》中强调提升经济竞争力，勾画了竞争力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蓝图；悉尼提出了全球化主题，突出了经济发展方向的外向性和开放性；巴黎提出以土地资源整合促进巴黎大区经济发展，带动城市整体发展。这些内容强调了以竞争力为代表的城市综合实力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根本所在。

三是强调绿色发展。《纽约2030》提出要建设“更加绿色的纽约”，对水、能源、空气、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保护和有效应对是使纽约更加绿色的核心内容；悉尼不仅将未来城市发展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更在《可持续发展的悉尼2030远景规划》中强调了“绿色”是悉尼未来城市发展的首要主题，这种绿色体现在绿色的环境、绿色的产业、绿色的基础设施、绿色的生态系统；东京在《构想2000》中提出了环境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措施；《中国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将优质的生活环境作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巴黎明确指出要打造更加绿色环保、更有持续性发展的城市。这些内容均体现出绿色对于未来城市发展的战略指导意义。

上述研究表明，以人文发展、竞争实力、绿色发展为代表的主题是未来世界城市发展的共性趋势和目标选择，对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提升城市文明、塑造城市形象、推动人文领域的全面发展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根本；通过提高信息化和科技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竞争力，

打造综合经济实力是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实现绿色、宜居、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

从构建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以及城市远景规划来看，规划导向类指标主要用于指导如何建设世界城市。指标涵盖的领域更宽、范围更广、内容更加丰富，不仅在城市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远景发展目标的指标设定，而且更加关注时代发展的动态趋势，往往包含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众多控制因素。因此，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城市间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规划导向类指标为不同城市提出了方向性的发展目标要求，这种要求既符合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特点，又立足于世界城市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和变化趋势，代表了世界城市建设和研究的发展方向，是对世界城市指标研究的进一步延伸。

综上所述，识别导向类指标、比较导向类指标倾向于对现有世界城市的研究分析，为我们开展世界城市和指标设置研究提供了公认的核心功能性指标和具有特色的竞争力指标选取的参考价值。而规划导向类指标则更倾向于对未来世界城市的规划和构建，为北京这样的后发世界城市提供了可以遵循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思路。

三、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监测评价体系

（一）设计原则

一是突出国际性原则。评价体系应注重对世界城市内涵与本质特征的把握，做到与国际公认的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相衔接，有利于国际比较。

二是突出首都特色。突出中央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和“四个服务”的要求，突出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突出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战略任务。

三是突出阶段性特征。评价体系的设计，既要充分体现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又要立足于北京的实际，着眼于现阶段的发展需求。评价体系将随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历史进程适时进行调整，以引导北京工作向着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不断迈进。目前，评价体系涉及的内容着眼于2010—2020年阶段。

四是突出可为性原则。评价体系设计既要与北京的发展规划、战略目标、重点任务相衔接，更好地服务市委市政府的科学决策；又要从目前国内外开展世界城市研究面临的数据缺乏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指标数据的可得性

（特别是国际比较数据）和数据来源的稳定性，以保证评价监测工作的有效实现。

（二）设计思路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既要与世界城市的通行标准和发展趋势接轨，又要与北京的功能定位、城市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理念相承接，在遵循共性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突出个性和特色化发展道路，探索出一条在发展中国家建设一流世界城市的崭新模式。

通过对识别导向、比较导向、规划导向类指标的比较分析研究，以识别导向类指标为基础构建“共性指标”，以比较导向和规划导向类指标为基础构建“特色指标”成为我们设置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监测评价体系的总体思路。

（三）评价体系

在学习和借鉴相关研究成果设计思路的基础上，本着既要体现共性特征，更要突出北京特色、简洁明了、具有工作导向性的要求，本文提出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监测评价体系（2010—2020 年）》。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评价体系的总体框架包括四个层次，即维度层、领域层、要素层和代表性指标层。

1. 维度层：是对评价体系框架的总体把握，突出体现世界城市发展的共性特征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特色发展路径。

分为“共性指标”和“特色指标”两大类。“共性指标”主要反映当前理论界关于世界城市内涵与核心特征的认识；“特色指标”主要反映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个性化特征和发展路径。

2. 领域层：是对维度层的细化。

在“共性指标”维度下，基于国际公认标准，主要设置了“国际影响力”这一领域。

在“特色指标”维度下，由于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现阶段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不能简单地模仿和复制已有世界城市的形态和发展路径，而要立足于首都功能定位，着眼于“四个服务”，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积极借鉴其他世界城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北京特点的世界城市。

2008 年 10 月，北京提出了按照“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要求推动城市发展，随后又分别详细制订了“三个北京”行动计划，不仅成为北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而且成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

目标的实现途径。其中，“人文北京”提出以推进民生发展、文明发展、文化发展、和谐发展为基础，把北京建成最具人文关怀、最显文明风采、最有文化魅力、最为和谐宜居的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科技北京”以把北京建设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核心引领区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发展目标；“绿色北京”提出将北京建设成为生产清洁化、消费友好化、环境优美化、资源高效化的绿色现代世界城市的远景目标。

比较以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部分世界城市的规划内容，“三个北京”战略目标的提出，不仅契合了未来世界城市以人文发展、竞争实力、绿色发展为代表的发展主题，符合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性、趋势性内容，而且更加突出了具有首都特点和规律的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是实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目标的路径和工作抓手。因此，将“三个北京”行动计划作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体系的重要内容，不仅遵循了世界城市发展的共性思路，更体现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特色所在。

因此，在“特色指标”维度下，主要是基于“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设置“人文发展”、“科技发展”、“绿色发展”三个领域。

3. 要素层：是对领域层的进一步细化，各个要素分别代表每个发展领域中的观测重点，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体系的支撑点和在工作要素层面上的具体分解。

关于“国际影响力”领域，理论界普遍认为，世界城市的国际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包括拥有较大规模的经济体量、较高程度的经济水平、较为明显的后工业化经济结构特点；二是具有较强的集聚和控制能力，成为全球资本流动控制中心和全球经营管理调控中心，在人才、物质、资本、技术和信息顺畅流动的基础上发挥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三是具有良好的资源流动的承载能力和国际交往能力，形成较高的国际化水平和开放度。因此，在“国际影响力”领域下，我们设置了“经济水平”、“集聚水平”和“交往水平”三个要素。

关于“人文发展”、“科技发展”和“绿色发展”三个领域，根据“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三个行动计划和今后应当努力的重点，分别设置了“人口素质”、“公共服务”、“城市文明”、“文化发展”、“科技资源”、“科技成果”、“信息化水平”、“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以及“生态文明”十个要素。

4. 代表性指标层

为便于操作，评价体系不能过于庞杂，在每个评价要素中只分别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指标用于实际监测和评价，既要遵循首都特色，立足于现阶段城

市的发展目标；又要数据易获取，便于开展国际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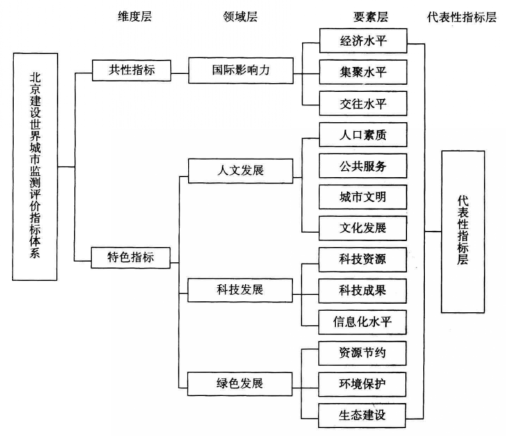


图 2－10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表 2－6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监测评价体系（2010—2020 年）

维度	领域	要　素	序号	代表性指标	单　位
共性指标	国际影响力	经济水平	1	人均 GDP	美元
			2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
		集聚水平	3	金融机构总部、全球 500 强企业总部数	个
			4	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组织总部数	个
			5	大型国际会议展览数量	个
			6	外籍常住人口数	万人
		交往水平	7	入境旅游人数	万人次
			8	航空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续 表

维度	领域	要　素	序号	代表性指标	单　位
特色指标	人文发展	人口素质	9	平均期望寿命	岁
			10	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公共服务	11	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	公里
			12	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	-
		城市文明	13	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	-
		文化发展	14	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数	个
			15	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科技发展	科技资源	16	每万人口中研发（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人年
		科技成果	17	专利的国际申请数	项
		信息化水平	18	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	%
		资源节约	19	每千人宽带用户数	个
	绿色发展	环境保护	20	万元 GDP 能耗、水耗	吨标油、立方米
			21	清洁能源比重	%
		生态建设	22	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浓度	微克/立方米
			23	城市绿化覆盖率	%

（北京市统计局　苏辉　王红　潘建民　崔萍杜　明翠；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李萍）

北京与主要世界城市的指标比较与建设建议

德国学者 Goethe 早在 1889 年就使用有“世界城市”之义的德语“Welstadt”来描述当时的罗马和巴黎，旨在从文化的优势上凸显这两个城市。时隔一个世纪，我国国务院 1993 年 10 月 6 日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要将北京市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城市。2005 年 1 月 12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 - 2020 年）》将北京的发展目标确定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2021 年至 2025 年左右进入世界城市行列。北京 2010 年的政府报告

再次明确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可见，建设世界城市是北京经过长期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北京屹立于国际竞争前列的一个平台。因此，有关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研究引起许多学者的极大关注，本文在梳理这些文献的基础上重点是找出北京与世界城市的差距，并探讨北京市建设世界城市的可行性。

一、世界城市评价指标的二维研究

1915 年 Patrick Geddes（Geddes，1949）从经济和商业两方面提出“世界城市”（Word City）的概念“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的绝大部分都须在其中进行的那些城市”在世界商务中具有异乎寻常优势的那些城市。辛梅尔（1972）认为，公司的决策机制在全球经济之中至关重要，而代表公司决策机制的跨国公司总部往往集中在世界的主要城市中，因此，应选择拥有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来对世界城市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彼得·霍尔（Peter Hall，1984）用范围的大小和强度两个概念来衡量城市的功能，认为“世界城市”应该是“主要政治权力中心、国际最强势政府和国际商贸等全球组织的所在地”。弗里德曼和沃尔夫（Friedmann，J. and Wolff，G.，1982）认为世界城市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控制和服务中心，是跨国金融机构、跨国公司总部的集中地。弗里德曼（1986）认为全球性企业创造了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并从新国际劳动分工的角度，提出“世界城市假说”理论，他根据跨国金融机构、跨国公司总部的位置划分世界城市，把世界城市的特征概括为：主要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包括地区性总部）、国际化组织、商业服务部门的高速增长、重要的制造中心、主要交通枢纽和人口规模。1995 年，弗里德曼又增加了人口迁移目的地这一指标，进一步发展为：（1）与世界经济融合的职能，（2）空间组织与协调基点，（3）全球经济控制能力，（4）国际资本积累之地，（5）国际与国内移民的终点。并改变了以往区分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做法，按照城市所连接的经济区域的大小，重新划分了世界城市，提出了 18 个核心和 12 个半外围的世界城市的等级结构和布局。沙森（1991、1994、1995、2001）通过对全球领先的生产性服务公司的分析，她认为生产者服务业越来越具有世界范围，生产者服务业集中在世界城市，这些城市逐渐成为“全球性服务中心”，因此，她把世界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泰勒和毕沃斯托克为首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aWC）主要吸收了萨森以全球生产服务业判定全球城市的思想，从全球城市网络角度，具体分析了城市按照会计、广告、金融及法律四种主要生产者服务业的分布状况。2002 年 GaWC 小组进一步拓展研究，

从容纳力、支配力和通道三大方面入手，测定了316个城市的网络作用力和等级体系。类似研究还有格罗斯韦尔德（2002）从11个方面对94个城市的城市竞争力进行了对比，提出“成就城市要素”（citymakers）的指标群概念。泰勒（2004）归纳了1975年至1999年涉及82个城市的16项主要的世界城市研究文献，其中达成全面共识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

近几年，国内学者也纷纷研究世界城市，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对上海、北京、中国香港等地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差距及路径选择上，主要是静态研究，关于世界城市的指标研究以及动态研究比较少，有显著成绩的是屠启宇（2009），他提出了从“识别导向”转向“塑造导向”的世界城市建设路径，并构建了涵盖城市规模、控制力、沟通力、效率、创新、活力、公平、宜居和可持续等9个组别的后发世界城市指标体系。

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1991年，伦敦规划委员会（London Planning Committee）提出了一套关于世界城市发展的综合指标。其中包括：（1）基础设施，（2）国际贸易与投资带来的财富创造力，（3）服务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与收入，（4）满足国际文化与社会环境需求的生活质量。1996年英国环境部与伦敦政府办公室组织重点对伦敦、巴黎、纽约、东京4个城市的金融与商业服务、旅游、创新与文化产业、权力与控制力、交通运输、信息技术和教育7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2000年伦敦金融城当局（Corporation of London）围绕纽约和伦敦两个城市的经济驱动力量以及未来面对的主要挑战重点研究了衡量世界城市的7个指标：金融服务业、商业与职业服务业、媒体、旅游、交通运输、政府管理、经济发展政策。

此外，纽约市为成为21世纪的模范城市①，设定了土地、水、交通、能源、空气质量、气候等6个方面的目标，并根据具体情况设定了每个子项目的未来目标。《中国香港2030》规划中，将自身未来定位为世界主要城市、亚洲国际都市以及中国的主要城市。其具体角色包括：全球及亚太金融商业中心、跨国公司地区中心、华南地区贸易转口港、国际及亚太海运空运中心、主要旅游目的地、华南科技创新中心、亚太广播、电讯及互联网枢纽、亚洲艺术、文化、娱乐以及体育赛事中心。悉尼于2006年制定的2031年远景规划——《城市中的城市》，明确提出其定位为全球城市，包含经济与就业、国际走廊、住房、交通、环境与能源、公共空间以及政府执行力等7项主要方面。在201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配发的名词解释中明确指出，“世界城市”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

① 《纽约2030》规划中将其21世纪的目标定为“一个更伟大，更绿色的纽约”。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多数学者认为世界城市应该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除此之外，笔者认为：（1）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世界城市有不同的界定；（2）世界城市应该是有发展潜力或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因此，对世界城市的判别不应割裂历史进程，而应该动态地看待城市的发展情况。由此可见，判别世界城市的指标应该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的指标，具体包括：（1）城市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以及发展情况；（2）三次产业的结构及变化趋势；（3）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情况及动态变化；（4）国际事务的组织能力和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与潜质；（5）交通基础设施的便利性及发展情况；（6）环境问题及治理环境问题的潜力。

二、北京与主要世界城市的指标比较

（一）北京与世界城市的规模比较

从人口规模上讲北京市足以成为世界城市，但经济实力尚需加速发展，主要表现：（1）GDP 总量和人均 GDP 都远远落后于纽约等世界城市（见表 2－7）。（2）北京 GDP 占全国 GDP 的比重较低。按照 2009 年全国 GDP 335353 亿元，北京 11865.9 亿元，天津 7500.8 亿元，河北 17026.6 亿元核算，京津冀三地 GDP 占全国 GDP 仅为 10.85%，与成熟世界城市差距较远。北京 2009 年 GDP 仅占全国 GDP 的 3.53%，而 2005 年东京及首都圈的都市生产总值占日本 GDP 的 60%，纽约大都市区 2006 年的 GDP 为 1.13 万亿美元，占美国 GDP 的 8.6%，同期伦敦的 GDP 占英国 GDP 的比重高达 16%。

表 2－7　北京与世界城市的人口及 GDP 情况表

年　份	城　市	国　家	人口（万人）	GDP（亿美元）	人均 GDP（万美元/人）
2004 年	东京	日本	1321	8061	6.1
2007 年	纽约	美国	836	6106	7.3
2008 年	纽约	美国	827	14060*	17.00
2008 年	上海	中国	1888.46	2004.24	1.06
2008 年	北京	中国	1695	1660*	0.98
2009 年	北京	中国	1755	1737	1.007
2007 年	伦敦	英国	973	5252	5.4
2008 年	巴黎	法国	980	5640	5.76

但从动态角度看，近些年北京市的GDP总值和人均值在稳步上升（见表2-8）。按照世界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5万美元的基本标准，北京市预计在5年内可以达到这一要求。

表2-8　北京地区生产总值情况表（2000—2008年）

年　份	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美元/人）	地区生产总值环比增长速度（%）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环比增长速度（%）
2000	3161	24122	2914	—	—
2001	3710.5	26998	3262	17.38%	11.94%
2002	4330.4	30840	3726	16.71%	14.22%
2003	5023.8	34892	4216	16.01%	13.15%
2004	6060.3	41099	4966	20.63%	17.79%
2005	6886.3	45444	5548	13.63%	11.72%
2006	7861	50407	6323	14.15%	13.97%
2007	9353.3	58204	7654	18.98%	21.05%
2008	10488	63029	9075	12.13%	18.57%
2009	11865.9	68788	10070	13.14%	10.96%

数据来源及说明：北京市2009年统计年鉴，并根据该市的常住人口计算整理。

（二）北京与世界城市高端企业和银行机构数的指标比较

近几年北京市的高端企业和金融类企业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1）在北京对跨国公司总部落址北京实行优惠政策后，大型跨国公司数量急剧上升，2007年底为42家，2009年10月底为48家；（2）银行机构的数量大量增加，2006年至2008年北京市的银行机构数分别为2673家、2764家和3084家，其中2008年银行机构数占全国总银行机构数的54.74%；（3）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逐年上升（见表2-9），尤其是2008年和2009年北京市拥有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东京和巴黎（见表2-10）。

表2-9　北京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情况表

年　份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中国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总数（家）	18	23	30	35	43
北京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家）	12	15	18	21	27
北京占全国的比重（%）	66.67%	65.22%	60.00%	60.00%	62.79%

数据来源：根据国际统计年鉴整理。

表 2－10　2008 年北京与世界城市拥有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数比较

城市名称	纽约	伦敦	巴黎	东京	北京
拥有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数量（家）	18	15	27	51	21

数据来源：根据国际统计年鉴整理。

（三）北京与世界城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三次产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城市发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诸多学者判断世界城市的依据。由表 2－11 可知北京市的三次产业结构在过去 15 年中进行了明显调整，第三产业优势突出，尤其是 2009 年北京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 75.8%，服务业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主体；2009 年北京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1720 亿元，金融业对北京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16.7%，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第三产业比重尚未达到世界城市的水平，2007 年东京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为 84.8%，巴黎为 85.2%；2006 年伦敦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为 88.2%。

表 2－11　主要年份北京三次产业结构表（按 GDP 计算）

年　份	1995 年	2000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第一产业	4.9	2.5	1.9	1.8	1.6	1.4	1.1	1.1	1.1
第二产业	42.8	32.7	28.9	29.6	30.6	29.5	27.9	26.8	25.7
第三产业	52.3	64.8	69.2	68.6	67.8	69.1	71	72.1	73.2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 2009 年。

（四）国际事务中的组织能力比较

近几年，北京正在争取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和国际协调中（见表 2－12），但静态上讲，一方面，在北京设立的国际组织总部数量较少，只有国际竹腾组织（1997 年设立）和联合国亚太农业工程与机械中心（APCAEM，2002 总部迁至北京）等少数几个，而目前国际组织分布列前 10 位的城市依次是：巴黎、布鲁塞尔、伦敦、罗马、日内瓦、纽约、华盛顿、斯德哥尔摩、维也纳和哥本哈根。另一方面，北京在举办国际会议的能力上还有差距，以 UIA 标准，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和北京举办国际会议的次数分别为 127 次、103 次、315 次、126 次和 88 次。从动态上看，2008 年北京市的国际会议次数减少，收入却明显增长，表明北京市举办国际会议的能力和实力在提高。

表 2－12　国际会议及展览活动情况表

项　目	2007 年	2008 年	增长幅度（%）
国际会议收入（万元）	59851.5	70965.3	18.57%
国际展览收入（万元）	183255.5	291618.3	59.13%
国际会议次数（次）	7421	6857	－7.60%
大型国际会议次数（次）	1256	782	－37.74%
国际展览个数（个）	246	188	－23.58%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年鉴 2009 年。

（五）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比较

北京的交通设施总量基本上达到世界城市的水平，主要表现在：（1）现代化世界城市地铁线总长度一般在 100 公里以上，北京 2004 年的地铁总长度为 142 公里，年运载乘客 6.1 亿人次左右，占全市客运总量的 11.8%。到 2009 年北京地铁总长度也仅为 228 公里。根据规划，到 2015 年，北京地铁线路总长将达到 561.5 公里。（2）在国际交通方面，世界城市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通常在 1000 万人次以上，货邮吞吐量在 100 多万吨以上。2009 年首都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超过 6500 万人次，成为世界第四、亚洲第一大机场。但目前交通拥堵依然是北京居民日常出行的最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的正常运行和市民的社会经济活动。究其原因，一方面，北京地区的城市功能规划较为紊乱，另一方面，北京人口明显多于其他主要世界城市的人口。

（六）城市生态环境比较

经济学人信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对全球 140 个城市 2009 年的政治稳定、医疗保健、文化与环境、教育、基础设施等五大类 30 个指标进行调查得出温哥华以总分 98 分高居榜首，巴黎、东京、伦敦、北京、上海分别居于第 17、19、54、76 和 83 位。表 2－13 中的数据也表明北京市的生态环境距世界城市还有很大的差距。

表 2－13　北京与主要世界城市空气污染状况比较

城　市	城市人口（万人）2005 年	总悬浮颗粒物（微克/立方米）2004 年	二氧化硫（微克/立方米）1995—2001 年	二氧化氮（微克/立方米）1995—2001 年
北　京	1072	89	90	122
东　京	3520	40	18	68
纽　约	1872	21	26	79
巴　黎	982	11	14	57
伦　敦	851	21	25	7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8 年。

综上比较分析，北京一个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50多年建都史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经济环境，并于2008年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具有良好的国际影响力，这些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基础。而且许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已经成为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主要成员。比如沙森（2001）根据世界前50家商业银行及前25家证券公司的累计资产与收入，对世界12个最大的金融中心进行了排名，其中1997年北京的收入排名和资产排名分别为全世界第8位和第6位。根据泰勒等人（2001）研究，北京已经成为主要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业、法律业和广告业的主要集聚地，成为Gamma级世界城市。Beaver-stock等（1999）的研究显示，北京已经是第三层级的世界城市。可见，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可行性，但北京市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缺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环境问题比较严重、城市功能规划紊乱导致的交通拥堵，而且不是港口城市等现实使得北京市的综合竞争力与世界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见表2－14）。

表2－14　世界城市综合竞争力九项指标排名比较

城市名称	综合竞争力指数	综合竞争力排名	GDP规模	人均GDP	地均GDP	劳动生产率	跨国公司分布	专利	价格优势	经济增长率	就业率
纽约	1	1	3	2	1	2	1	5	356	410	321
伦敦	2	0.9453	4	6	12	1	2	4	470	332	252
东京	3	0.791	1	39	15	69	5	1	448	480	122
巴黎	4	0.7598	2	12	34	47	4	3	434	445	390
北京	66	0.457	23	277	358	291	7	56	59	79	14

数据来源：倪鹏飞，彼得·卡尔·克拉索《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59－318页。

三、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几点建议

北京与主要世界城市的评价指标比较不难看出差距依然存在，可喜的是这些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但差距的缩小并不意味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只是时间问题，而应该动态看待世界城市的建设。从多数学者对世界城市界定的变迁及主要世界城市的发展历程看，世界城市的建设首先是城市功能建设，即世界城市在世人心目中的认同感源于对其城市功能的认同，因此，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绝非简单地追赶这些评价指标，而要立足于思考未来对世界城市功

能的需求，这需要政府高瞻远瞩地指导和政策引领，需要学者们负责任的研究建议。

笔者在借鉴主要世界城市的发展经验和立足北京实际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

（1）正确面对和分析差距，建设宜居城市。尽管目前北京与世界城市有较为明显的差距，但要看到北京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这些世界城市，这给我们建设世界城市的信心，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要冷静思考，不能盲目求速度，更要注重建设效益和效果，处理好环保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处理好长远发展和短期发展的关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2）继续优化资源配置和调整产业结构，在产业结构升级中要注重实体经济的稳步发展，谨慎对待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和泡沫经济的不断膨胀，因此建议积极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为基础带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从而增强对北京的文化认同感。

（3）以北京市的人文环境为突破口，抓住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汉语教育，重点在旅游服务和教育质量上下工夫，积极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我国参观考察和学习交流，不断繁荣北京本土文化。

（4）利用天津的港口优势，重视与其他城市特别是环渤海地区其他城市的联系，特别是加强合作与交流，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讲师、会计师　韩文琰博士）



第三章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与努力方向



Beijing: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as a New World City

Beijing, in the year in which new China was established, was a dilapidated old city, with an urban area was of just 62.5 square kilometers and an urban population less than 210, 000. By 2008, Beijing had developed into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with an urban area of 1085 square kilometers, permanent population of 16.95 million people, and a GDP that reached nearly 1.05 trillion yuan. The percentage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secondary indust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was 1.08, 25.68, and 73.24. The housing use area per capita was 21.56 square meters, public green land per capita 12.6 square meters, with a green coverage rate of 40% in the city.

Today, Beijing is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and dynamic cities on ear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Beijing from recently being a rather drab, dull and austere production city, albeit one with long historical roots, towards being a city of hi-tech manufacturing, service provision and mass consumption has been breathless in its speed and scope. Planning has played,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major role in guiding and directing the nature of new developments, including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hutong areas on the one hand, contrasting with the high rise cathedrals of consumption on the other. Not, however, that this planning process is unproblematic. The drive to build at such a rate and scale can lead to problems: social, environmental, cultural and governmental, and planning must adapt and change in order to keep up with the new challenges posed in the new century. Unlike other cities in this volume, Beijing is both a socialist capital of a modern China tha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lf-confident and assertive, and a city that is also a new world city, prepared to engage at a global level beyond the confines of China itself. In this chapter we examine urba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towards a world city.

1. Changing urban landscapes and social spaces: towards a world city

Before the Reform Period, the domination of production units in the danwei noted above resulted in Chinese cities being full of "functionally and visually homogeneous landscapes" (Gaubatz, 1995: 31) that could extend over vast areas. As

Gaubatz notes, the reforms ushered in a reduction in the planning power of the work-units and an increase in overall municipal planning that was to lead to a growing separation of work and residence, although these residences, as in the example of Fangzhuang in South East Beijing might be dominated by the workforce of specific work-places, in this case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his separation was to bring urban features similar to those in many other large cities around the globe and the next two sections will illustrate the building types that were to become typical of the 1990s and the 2000s. The desire for planning on the grand scale was laudable, in the attempt to regulate and direct the move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industries, offices, hotels and ministries. However, although the power of work-units was lessened, the power of the market system, in part due to the desire to introduce "a mixed system of plans and markets" (Chan, 1994: 98), increased in the 1990s and after, and as in other parts of the globe led to a number of problems.

For example, Liu et. al. (2002) noted that urban growth in the outer area in the years 1982—1992 was concentric, at an average distance of 7. 5 km from the city centre. By 1992—1997 growth was now mainly in the North, and to a lesser extent to the South, at an average that was now 10. 8 km. Such sprawl "seriously violated the General Plan of Beijing" which designated growth towards the southern and eastern parts of the city (ibid: 272). Other problems included the fact that such suburban growth led to a "huge loss of high quality arable lands", "encroached upon limited open space" and of course "caused traffic burden" to these areas (Jiang et. al.: 475). In part, such changes are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land market that:

"drives the spatial separation of land use. In other words, office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have an economic advantage in locations close to the city centre, where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pushed farther away towards the suburbs.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is most likely to take place in between" (Ding, 2004: 1904)

Such separation of form and function has led to Beijing suffering from many of the problems of other great cities in Asia, with, for instance the city being measured as being the most polluted city on earth by 2005, causing great concerns in advance over the Beijing Olympics of 2008 (Cook, 2007).

1. 1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landmarks

There are different Beijing landmarks to create a look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se 3 landmark buildings reflected the spirit that the city animates, recording of economic, technologi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ut more importantly, trend-setting to promote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pattern of evolution.

1. 1. 1　A modern tradition before 1976

In the 1950s,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in Beijing, architecture of socialist realism or "Socialist Content with National Form" was promoted. The Friendship Hotel by Zhang Bo (Beijing, 1956) and some of the Ten Grand Projects such as the Palace of Nationalities and the Beijing Railway Station (by Zhang Bo and Yang Tingbao respectively, 1959) are primary examples. In some important cases, such as the two Grand Projects to the east and west of Tiananmen Square, that is , the Museum of Revolution and History and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by Zhang Kaiji, Zhao Dongri and Zhang Bo, Beijing, 1959), Chinese roofs were not used but decorative motifs were applied extensively.

In the case of socialist modernism, architecture was to serve large, public, collective functions. As a consequence of radical campaig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pular and literal icons such as large portraits of Mao, characters of revolutionary slogans, and sculptures of red flags, red torche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asses" in a socialist-realist genre were applied on or around the buildings, as per the Memorial Hall of Chairman Mao to the south of Tiananmen Square completed in 1977 (Zhu, 2009).

The celebration project for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in 1959 marked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is destructive-constructive effort of Maoist China. It included the completion of the 400, 000 m^2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Ten Grand Buildings by 1 October 1959, the PRC National Day.

1. 1. 2　"Neo-National Style" and "Modern Vernacular" in the 1980s

The 1960s were quiet in construction, and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reached its apogee in 1966—1969. There was a wide range of approaches from straight revivalism to creativ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lements with Post-Modern influence (Western Railway Station, Beijing). Another one was modern vernacular. Instead of employing Chinese roofs of the imperial tradition as in the National Style, a regional, vernacular language (including pitched roofs, traditional window patterns, wall textures in vernacular houses) is employed in a design which is also consciously modern or abstract (Denton Corker Marshall's Australian Embassy in Beijing (1982—1992) (Zhu, 2009).

1.1.3 Neo-Classical or Late Modern in the 1990s

The third style was more neo-classical or late modern, for example, Wu Liangrong's Juer Hutong Houses (Beijing, 1992), Guan Zhaoye's New Library at Tsi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991), Liu Li's Yanhuang Art Gallery (Beijing, 1991).

1.1.4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in the 2000s

To produce marks of distinction in global media and for global competition, and also in relation to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state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 have proposed to build large-scale cultural facilities in Beijing. Through design competitions, many foreign architects with portfolios in the new and radical modernism of the 1990s won the commissions. Many projects are now under construction or have recently been completed. These include the new headquarters of China Centre Television (CCTV) by Rem Koolhaas (with ECADI), the National Olympic Stadium by Herzog & de Meuron with China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Research Group (CAG), and the National Grand Theatre by Paul Andreu. Some structures are modernist with a proper image for public institutions by Chinese architects, such as the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Research, by Cui Kai in 2003.

What is emerging in Beijing today is a special landscape for which the Chinese state has invited the most suitable architects around the world to design the landmarks of an "open, modern, international city" of Beijing, as "new images of the nation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This landscape is a spectacle with great symbolic capital, a spectacle of great marks of distinction, which will showcase Beijing and China in the global media with its pervasive and instantaneous circulation of images. These buildings, in fact, are themselves symbols and material components of a real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Beijing and in China (Zhu, 2009).

1.2 After 1976: a social landscape

As we have shown, the radical change and transition in Beijing happened from a radical vanguard of Marxism-Leninism in the earlier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of the 1990s. The process may be regarded as involving two phases, the 1980s and 1990s, with 1989 as a dividing point. The first decade was characterized by grand idealistic debate with a profound uncertainty, and a successful rural reform but an increasingly difficult urban reform with rising corrupt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need for further privatization and the need for social

stability, between corruption and social critique, and between a neo-liberal/conservative elite and a rising social critique based on ideals of equity and "democracy" voiced by students, erupted in the late 1980s. The 1990s started with stronger state control and a further opening up of the market economy after Deng's speech in 1992. The neo-liberal and neo-conservative package was further implemented with apparent ease and success.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now fully installed, allowed a liberal market economy to prosper alongside or within the strong centralist state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This package has delivered an apparent social stability together with a staggering economic growth rate, which has been continuously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Yet underlying problems, notably income disparit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neglect of social welfare, are accumulat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 of this process is that a different urban society has emerged.

1.3 Grea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the 2008 Olympics

1.3.1 Refocusing the City on its Central Axis

On July 13, 2001, the Olympic Committee named Beijing as the site for the 2008 Olympic Games. It is "New Beijing, Great Olympics" that foretells the ambitions of promoting a series of transformations connected to the event, suited to forge a radical change and present the new face of the ancient capital, talking advantage of the high impact the event has always had in host cities (Gold and Gold, 2007).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philosophy of the central axis of the old city of Beijing, the Olympic Green was designed as new part of the old North-South central axis. The northern end of the central axis dissolves into the waters and hills of nature, with a water system running through the whole area adding life and beauty to the city's built environment. The layout framework is built on the four key functions, i. e. sport, culture, convention exhibition, and business. These functions shall be on both sides of the central axis. The hill, the water system, the central axis and the various function zones present a myriad of landscapes.

1.3.2 Beijing Olympic Park

The general plan of the Olympic Park was awarded to the American firm Sasaki Associates, for its symbolic scheme using likenesses of water dragons and meandering greens. It is planned as a multifunction public area, holding such activities as sport, culture, exhibition, leisure and sightseeing. As the core area for the Olympic Games, it accommodates 10 venues and 10 events, as well as key facilities such as the Olympic Village, the International Broadcast Centre and the Main Press Centre.

The sports activities are concentrated principally in a vast area along the north-south Central Axis beyond the Fourth Ring Road, called the Olympic Green. It refers to an area of 1159 hectares situa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Beijing that was the fulcrum of the 2008 Olympics. Arranged along the capital's historic Central Axis, it extends from the Chinese Ethnic Culture Park on the Fourth Ring Road, to just beyond the Fifth Ring Road. It includes the Wali Forest Park, the Olympic Central Area, the National Olympic Sports Centre and the Chinese Ethnic Park. The area is configured as a multipurpose, open public space, subdivided into three principal sectors. The first, to the south inside the Fourth Ring Road, had already undergone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development, well before the Olympic events. In fact, it had been the site for the XI Asian Games in 1990. An international congressional centre was inaugurated, as well as three stadiums, numerous hotels, some parks, and a few museums.

1.3.3 National Grand Theatre

The National Grand Theatre was awarded to Paul Andreu and has a huge curved dome in titanium plates and glass panels above an underwater tunnel. The performance complex is conceived as a citadel of theatres enclosed on the inside by an elliptical cupola, semi-transparent, in glass and gray titanium, surrounded by water. The entrance to the north on Chang'an Avenue is connected to the subway station and to a huge parking garage for 2500 vehicles. The interior i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the opera house, a concert hall and a theatre. Broudehoux (2004) discusses the controversies concerning this radical design.

1.3.4 The Bird's Nest

The Bird's Nest: National Olympic Stadium is the new landmark of Beijing. It was awarded to Swiss architects Herzog & de Meuron with CAG, Beijing. It i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dea, simple but closely boun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a " 'bird's nest," or as described by artist Ai Weiwei, who collaborated with the Swiss masters in conceiving the work, of the traditional local porcelain bowls, with their minute craquelet network of tiny cracks. The rigid and functional sporting volume is thus transformed into a poetic yet powerful architecture, which has already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new symbol of the ancient capital.

1.3.5 Water Cube

The National Aquatics Centre is affectionately dubbed the "Water Cube". It was awarded to the Australian firm PTW. The Water Cube is a large, reticular en-

closure with walls that look like water bubbles, obtained using a complex spatial structure of steel tubing, over which is extended a filling of an innovative, translucent, inflatable material. The inspiration of the "Water Cube" structural design originates from Kelvin's "Bubble" theory, enlarging the bubble structure to the dimensions of a building structure. This structural system is based on the most effective segmentation model of 3D space that universally exists in Nature. As the sunlight filters through, spectators and athletes feel they are inside a magical underwater world, and by night the Cube is transformed into a luminescent aquarium.

1.3.6 National Indoor Stadium

The National Indoor Stadium is 213m long from south to north, and 123m long from east to west. It was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by Chinese people. The building is partly sunken under the ground. There is a green slope square for the spectators, who can go from the urban roads through the green slope square to enter the spectator section of the gymnasium and thus avoid intersection which other people (athletes, media and so on) and vehicles.

1.3.7 Digital Beijing

By use of topology, Digital Beijing was designed as a new aesthetic image for the Olympic Games by Zhu Pei. It looks like an enlarged part of an integrated circuit board or a microchip growing out of quiet water with water outpouring downward from the top like a waterfall, and gradually changing into a star shower. It displays as enlarged microscopic digital world to people. It has now become the headquarters for the Municipal Office for Information System, as well as an exhibition center for creators of digital products. The building is situated on the Olympic Green's west edge, north of the Water Cube.

1.3.8 The CCTV New Tower

The headquarters for Chinese Central Television is composed of three buildings: CCTV, the Television Cultural Centre (TVCC) and the Media Park. Rem Koolhaas won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new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headquarters (CCTV) in 2002, completed in 2008.

1.3.9 Beijing Xihuan Plaza (Xizhimen Station)

Situated on the Second Ring Road to the northwest of Beijing, tt was designed as an important nerve centre for the city. The French company AREP was awarded the large office complex for the northern station of Xizhimen. It is the meeting point of the vital North Railway Station, an interchange station between principal and re-

gional lines, with 18 public bus lines, a subway station, and a highway terminal. This interchange point is crossed through daily by 3 million travellers. It also has a services and offices complex that covers an area of about 75000 M2, subdivided into a basement portion, three office towers, a hotel, a shopping mall and a restaurant, all connected to the railway station.

1.3.10 The Olympic Village

The Olympic Village is composed of two areas, i. e. the Residential Area and the International Area. The Residential Area is located to the south of Kehui Road, covering an area of about 35 hectares. The International Area is located in the Olympic Forest Park to the north of Kehui Road with an area of about 35 hectares. The Olympic Village is a residential area for the athletes and for local people after the Olympic Games. The International Area has been converted into a green landscape.

2. Urba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In this chapter we have shown the development of planning within this amazing city, a city that faces the demands of being capital of the largest populated nation on earth, of being run within a socialist system, albeit one in which the market economy plays a major role, and being increasingly presented as a New World City that is recognized across the globe. The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have taken place within a remarkably short period, and have been fundamental in range and scope. The Beijing Olympics of 2008 were generally a superb event and marked the high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which the city aspires. The planning process has sought, not always successfully, to guide and direct this incredible pace of change, encouraging dramatic new developments across many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ity. In this concluding section we examine some of the main challenges that remain for the next decades of the 21st Century.

2.1 Social polarization and social injustice

Beijing is increasingly a city of great contrasts in income, with marked inequaliti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within the population. For instance, under Maoism, China introduced the Hukou registration system that entitled officially sanctioned residents to access to housing, health, food rations and other benefits. In the Maoist period migration was tightly controlled via this system bu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rural migrants have flooded into China's cities, including Beijing. Known as the luidong renkou (floating population) they are " 'in' the city but not 'of' the city" (Tang and Parish, 2000: 31). Gu et. al. (2006: 275) showed

that there were over 1 million of these in Beijing by 1989, followed by a dip in 1990 and then a steady expansion up to 3. 85 million by 2004. These people are without hukou registration, and are the people who often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s stallholders selling a range of clothing and foods, or as taxi drivers for instance, all jobs which are highly demanding, and from which the original Beijing population have tended to move on. "Through their visibility to tourists and outside visitors, these 'marginal' groups disturb the modernization project and question Beijing's alleged modernity, symbolically regaining their right to the city" (Broudehoux, 2004: 136).

These are the people that would be regarded as being in the informal sector, living in shanty towns in other large cities of Asia. But these migrants do not live in shanty towns, rather they are likely to live in crowded conditions with people from their own town or province within urban enclaves in Beijing, with over 100 migrant villages such as 'Zhejiang Village' for example (Gu et. al. 2006). They face a regular threat of demolition should their dwelling-place or street location be required for urban new building, or as the authorities seek to regulate the informal system via provision of new covered markets for example, as per the Silk Markets in Jianguomenwai or Sanlitun for example. In 2009, with the current recession, many have returned to their home villages and towns but will likely return as the economy recovers in the next few years. When they do they will face the same issues of lack of access to schooling for their children, plus lack of "access to low-cost health services and housing, and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r foreign and joint-venture companies" (ibid.: 288). Singly, and with others, Gu has conducted a range of studies into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and segregation of these migrant groups, showing clearly that social polarization is a key feature of Beijing's current situation (Chan, Gu and Breitung 2000; Gu 1998, 1999, 2001; Gu and Kesteloot, 1997, 2001, 2002; Gu and Liu 2001; Gu and Shen 2003; Gu, Wang and Liu 2005). The challeng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poses is one not just for Beijing itself, but for the PRC government more generally.

2.2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Just as there are questions of social (in) justice with which to contend, planning also has to consider the environmental equivalents. Over the years Beijing has had many successes in the struggle to overcome such environmental negatives as water shortage, air pollution, desertification or water pollution (Cook, 2007a, 2008;

Murray and Cook 2002, 2004). Massive afforestation programmes, increased use of liquid petroleum gas, restriction on trucks entering the central area during daytime, regulations to limit the use of poor quality coal and the like have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blue sky days" that the city has annually. Greening was also a major part of the Olympics as shown above. Nonetheless, Beijing was identified by the European Space Agency in October 2005 not just as a polluted city but as the most polluted city on earth (Cook, 2007a). "Beijing throat" is a regular threat to the visitor, and resident, and coal remains the main energy source in Beijing as it is in the rest of China. Vehicle emissions are a major contributor to this, and to a high level of respiratory disease, but vehicle growth continues to outstrip forecasts. Even in the capital of an increasingly wealthy China, a country with the 3rd largest world economy at the time of writing, it is inadvisable to drink the tap water.

Despite optimism over tree planting, the city is still subject to periodic massive sandstorms, air pollution from industry remains a major issue, and the proposed South-North Water Transfer Scheme to help resolve water shortage in North China itself poses many ecological questions. Wealthier residents can afford to relocate farther away from pollution sources or apply pressure on the authorities to ameliorate the worst impacts of pollution; poorer people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have to put up with such conditions with detrimental effects on their health (Cook 2007a, 2008).

2.3 Olympic legacies

The Olympics of 2008 has left a number of important legacies.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re is some debate as to just how successful they were in improving Beijing's environment (Cook and Miles, 2010). For instance, a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UNEP) analysis complemented the authorities for the improvements that were made to raise the environmental bar in terms of higher vehicle emissions standards, green space addition, millions of trees and rose bushes planted and a rise in blue sky days from 180 in 2000 to 274 in 2008. Restrictions on vehicle use proved so effective that these have been extended for another year in the first instance (ibid.). In contrast, however, an analysis of particulate matter by US and Chinese scientists for an 8 week period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particulate pollution was twice as bad as in Athens, Greece; three times as bad as in Atlanta, Georgia; and 3.5 times as bad as in Sydney, Australia" (ibid.: in press). There is also the issue, common for other Olympic Cities of how to sustaining world classfacilities. The superb Bird's Nest for instance is still being paid for via loans and also has

high maintenance costs. It was thought at one point that Beijing's main football team, Guo An, might take over the stadium, but not only is the stadium too large for most of Guo An's matches, there are technical restrictions and costs in providing the pitch for each game. It now seems probably that the combined income from visitors plus cultural events will pay off the loans and ensure that the stadium is preserved for many years to come as a major venue.

2.4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The Olympics were the latest, most grand example of how culture is being commodified in Beijing as it has been in other world cities. This process began some years ago, paradoxically via Mao becoming a tourist commodity via marketing of Mao caps, watches, cigarette lighters and street sales of the Little Red Book (Cook, 2008). The hutongs similarly are often a tourist attraction, with the "hutong tour" on pedicabs being a popular part of the tourist experience. Gu Huimin and Chris Ryan (2009) have studied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the largest of the hutong protection zones, Shichahai,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residents and local tourism business people. Scores on Likert-type scales identified traffic congestion as the main problem with tourism and locals tended to 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Local residents are the people who mainly suffer from living in a tourist area". Many recognized that the area, via tourism, was cleaner than before, yet "48 per cent 'strongly agreed'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I feel tourism is growing too fast for the hutong to cope with'" (ibid.: 318). Longer-term residents were likely to be more negative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s. Hutongs are laid out along narrow lanes so it is small wonder that congestion is a potential problem for residents; but increasingly congestion is also a problem for other tourist sites in and around Beijing, such as at the Great Wall at Badaling for example. Beijing is a growing cultural attraction for people from within and outwith China, and planning will have to increasingly deal with the issues that cultural tourism raises.

2.5 Questions of governmentality

Prior to the Olympics, concerns were raised in the West concerning the thorny question of human rights. Tian'anmen in 1989 has proven hard for the PRC to shake off, and such issues as use of the death penalty, treatment of the Buddhist sect Falun Gong and Tibet have been controversial for Western human rights activists (Cook, 2007b). The Olympic Torch was attacked by Free Tibet supporters and this led to counter-protests by PRC supporter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itself (Cook and Miles,

2010). Journalists were also concerned that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report freely in Beijing due to restrictions placed upon them. In the event, there were only a few problems at the Olympics themselves, and the PRC government would defend itself against critics of its human rights record by noting that human rights are less than ideal in some of those countries which are most vociferous in criticism, while noting that security ensured that there were no major terrorist incidents during the Games. Further, China is gradually developing a legal system that is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and is also reducing the use of the death penalty. China is changing, so too is the way in which it is run.

2.6 The changing planning system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tnessed many changes to the way in which Beijing was planned. From the first faltering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lanning idea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through to Soviet and Maoist-influenced planning and 'anti-planning' in the 1950s—1970s and the modern planning system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since then, we have seen the main debates and directions that have influenced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the current c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ny more changes will occur, some fairly predictable and others not. But we hope that the emphasis on a more humanistic, liveable city is the one that dominates. In order for this to occur, local people, hukou and non-hukou alike, will need to be more fully involved in planning for their own areas of residence and of helping the planners to decide between alternative models of planning development. The seeds of such a system have already been planted via the growing number of NGOs and community groups found in China generally and Beijing specifically (Cook, 2008). These seeds will require careful nurturing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of social inequality, environmental threats, periodic economic downturns and political change that will take place in the decades to come.

Conclusion

Beijing, as ancient capital for six dynasties, is a city with a long history of Oriental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period when it was the Yuan Dadu, Beijing was the largest and best planned city in the world. The contemporary Beijing has grown into what it is now on the basis of the old cit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fter hundreds of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now Beijing has emerged as a megacity with an area of 16410km2. The city is growing very rapidly with each passing day. Thanks to the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Beijing displayed the cultural her-

itage of the ancient capital and the elegant charisma of the modern metropolis, it will become a Chinese socialist capital and a new world city.

(Gu Chaoli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Ian G. Cook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UK.)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定位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应该在满足国家、区域和市民三大利益主体需求的前提下，探索在世界体系与国家体系约束下的首都北京应该具备的世界城市内涵①。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无论是方向、目标，还是道路、模式，都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要清楚地认识到建设世界城市有利于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动位置，获得极大的潜在利益，但经济虚拟也有脱离实体经济的潜在风险；建设世界城市既有为国际资本服务的市场驱动，也有建立和谐首都的内在渴求；另外，世界城市往往奢侈性高消费与失业贫穷并存，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与我们的价值追求相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既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本，积极参与资本的国际化运作，也要有迎战潜在风险的思想准备。同时，必须让市民和全国人民享受到建设世界城市的成果，不能搞社会分化、贫富对立。

一、战略目标与分步走战略

在21世纪中叶，北京可望建成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流国际影响的世界城市。为此，应采取三步走战略，即实现北京从国家首选—东亚首选—亚太首选—世界城市的战略提升：

1. “十二五”期间完成战略布局，按照建设世界城市的标准确立城市功能定位和环境建设规划。

2. 2020年成为东亚地区发挥核心影响的区域性国际城市，国际商品、资本、信息、人才、技术等五大要素在东亚地区的主要聚集地；实现以下9大功能定位：（1）国际经济总部东亚聚集地；（2）国际组织总部东亚聚集地；

①

（3）国际时尚商贸中心；（4）国际信息资讯中心；（5）国际金融资本管理中心；（6）国际会议东亚首选城市；（7）国际旅游东亚首选城市；（8）科技创新之都；（9）文化体验创意之城。

3. 2040 年成为在亚太地区发挥核心影响的洲际性国际城市，9 大功能在亚太范围内得以提升。

4. 2050 年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经济资讯发达、满足国际事务协调需要、适应后工业社会发展趋势，具有鲜明中国风格、东方风采、时代风貌，以“人文、科技、绿色”为特征的世界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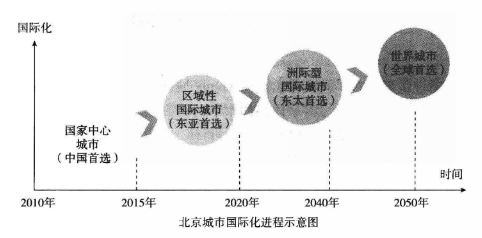


图 3-1　北京城市国际化进程示意图

二、近期目标与功能定位

北京立足于在 21 世纪中叶建成世界城市，“十二五”期间应按照建设世界城市的标准确立城市功能定位，完成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的战略布局。建设世界城市需要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理念的更新，经过十年的努力，到 2020 年将北京建设成为在东亚地区发挥核心影响的区域性国际城市，国际商品、资本、信息、人才、技术等五大要素在东亚地区的主要聚集地，实现以下 9 大功能定位：

1. 国际经济总部东亚聚集地

经济总部是产业聚集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体现，跨国公司在选择全球总部、地区总部的时候，都关注城市的市场规模、吸引力、影响力和区位优势。

中国以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和巨大的市场规模吸引了全世界跨国公司的注意力，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具有政策优势，政治稳定优势，与政府政策部门

和监管部门的信息沟通和理解的优势，以及在重要问题的讨论和咨询方面的较大优势。这是别的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也是一些跨国公司总部选址北京的重要原因。虽然上海的金融人才比北京要充裕，税收政策也比北京优惠，但是很多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设在北京。在空间布局上，北京初步形成了商务中心区（CBD）、金融街、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等几个特色总部聚集区，成为北京总部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仅商务中心就聚集了世界500强企业102家、跨国公司600余家①，有较大的产业聚集力。

因此，未来十年北京应瞄准东亚第一的位置，集中全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经济总部东亚聚集地，再用20～30年的时间，扩大其在全球范围的影响，争取在21世纪中叶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总部经济聚集地。

表3－1　2009年进入全球500强企业数

城市	企业数（家）	《财富》排行榜名次
纽约	18	5
伦敦	15	4
东京	51	1
新加坡	2	
中国香港	3	
首尔	11	6
北京	26	3
上海	4	
广州	1	

数据来源：《财富》杂志2009年7月。

2. 国际组织总部东亚聚集地

拥有一定数量的国际组织是城市发挥国际事务协调作用的重要体现，除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外，也包括众多的跨国民间组织机构。

国际组织的总部往往落户在世界权势中心地区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目前国际组织分布列前10位的城市依次是：巴黎、布鲁塞尔、伦敦、罗马、日内瓦、纽约、华盛顿、斯德哥尔摩、维也纳和哥本哈根，这10个城市有8个在欧洲，2个在美国。随着东亚地区和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重要性上升，北京所具备的政治中心优势将使其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著名的“组织之

① 赵弘. 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都”，近10年应做好准备，使北京成为国际组织在东亚地区的主要聚集地[①]。

3. 国际时尚商贸中心

商品是国际城市的重要组成要素，体现在交通流量、贸易集散、商贸规模、服务水平等方面，世界城市往往是名品荟萃、潮流先导的商贸中心，不仅具有消费示范效应，围绕商务活动需要大量的配套设施和服务产业。

从北京的市场规模及商业国际化程度来看，北京有望率先在全国成为国际商贸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589亿元，是伦敦的78%，是中国香港的1.5倍，北京的市场规模已经具备了国际城市的商业规模。目前世界顶级280家零售商已有101家进驻北京，在《福布斯》杂志排名中，北京被列入全球15大购物之都，在美食之城评选中名列第八。未来应成为大宗商品的交易平台、战略资源和大宗商品的定价中心，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

4. 国际信息资讯中心

世界城市通过信息的汇集和传播带动经济社会发展。信息资讯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开放度、反应速度、传播效应以及对决策的影响力，是互联网时代世界城市发挥全球管理控制中心作用的基本保障。

北京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信息产业基础雄厚，信息发布渠道畅通。2008年城镇居民移动电话191.4部/百户，互联网用户普及率为60%，有337家外国新闻机构和700多名外国记者常驻北京。在服务业当中，金融业、信息服务业、科技研发业、商务服务业等信息密集性产业在经济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在2007年The Age（澳大利亚新闻媒体）公布的世界城市信息化程度排名榜上名列第九。加快智慧城市（Smart City）系统建设满足城市运行、管理、决策和突发事件应对需求，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信息资讯中心。

表3-2　2008年互联网用户普及率比较

城　市	互联网用户普及率（%）
纽约（2007）	68（纽约州）
伦敦	
东京	81.3（2006）

① 北京与区域性国际城市首尔、新加坡、中国香港比较，在国际政治与外交事务中的优势明显。以拥有政府间国际组织机构为例，北京和首尔的机构数均为2个，新加坡最多也只有4个，中国香港为3个，但是，北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首都，随着中国多边外交活动的开展，未来作用空间将会大大超出这些城市。

续　表

城　市	互联网用户普及率（%）
中国香港	68.7
新加坡	88
首尔（2006）	70.65
北京	60
上海	61.4
广州	39.2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香港政府统计处，新加坡统计年鉴，东京都统计年鉴补充资料。

5. 国际金融资本管理中心

资本是资源配置的核心要素，目前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中有2/3是首都，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中约1/2是首都，在一国国内金融中心中4/5是首都。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拥有发展金融业的特殊优势。一是作为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所在地，以及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总部的聚集地，首都金融业的发展拥有巨大的资本管理优势；二是近年来，北京经济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增长，金融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金融发展环境不断优化，金融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三是已初步形成了与首都地位相称、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国家金融资本管理中心。

应通过政府引导模式有意识地促进金融业的国际化，使国际金融业、国内金融业及国内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产生互动效应，促进北京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管理中心，加强我国在全球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我国资源配置效率。

表3-3　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时　间	外企驻京代表机构数量	外商投资企业签约项目数	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
2005	10132	2136	35.2
2006	11311	2106	45.5
2007	12877	2177	50.7
2008	14411	1897	60.8

数据来源：依据《北京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外企驻京代表机构包括港澳台地区。

6. 国际会议东亚首选城市

世界城市无一不是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海外游客数是衡量城市国际化

水平、开放程度和国际交往能力的重要指标。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代表性城市，也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技术、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集中了众多的驻华使馆、外国商社、中央在京单位以及全国性的专业行业机构，北京独特的影响力对各类国际会展和国家级大型会展项目都极具吸引力。北京还具有巨大的金融交易能力及市场消费示范作用，依托高新技术、汽车、电子等生产领域及进出口贸易的优势，以及日益完善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基础设施，为会展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发展会展业条件得天独厚。

根据 UIA 的统计，中国国内城市只有北京挤入了 UIA 国际会议城市排名的前 20 位。北京在举办国际会议和展览方面在国内有很大的优势，国际会议资源丰富，会议设施良好，今后的发展潜力很大。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北京会展业的优势地位正在被上海取代。2008 年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别举办了 233 场、445 场和 188 场展览会，分别占到总数的 22%、51% 和 27%。从这一数据中可以看出，在京、沪、穗三地展览会总体数量中，上海已经占据半壁江山。随着 2010 年世博会的到来，上海的会展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北京欲成为世界会展中心，首先得在国内竞争中赶超上海，成为在中国举办国际会展的首选城市。通过确立国际会展首选城市的目标，认真排查会展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经过 10 年的努力成为东亚地区国际会展首选城市。

表 3-4　2007 年 UIA 统计的国际会议数目

城市	UIA 统计的国际会议数目
纽约	128
伦敦	103
东京	126
新加坡	465
首尔	121
中国香港	72（ICCA 统计）
北京	88
上海	—
广州	—

数据来源：UIA Online Databases.

表3－5 2008年北京会议及展览收入情况

项　目	收入（万元）	2008年为2007年%
会议收入	648062.6	120.4
其中：国际会议收入	70965.3	118.6
展览收入	670123.8	129.5
其中：国际展览收入	291618.3	159.1
会展活动收入合计	1318186.4	124.6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

7. 国际旅游东亚首选城市

国际化大都市无一不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海外游客数是衡量城市国际化水平、开放程度和国际交往能力的重要指标。

北京目前的国际旅游接待水平与其他国际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02年伦敦的海外游客接待量已达1000万人次以上。2008年，新加坡的年海外游客接待量突破了1000万人次，纽约和中国香港也在900万人次以上，北京才335.7万人次，远远低于这些城市。国内城市中，上海与广州的海外游客接待量均已在600万人次以上，而北京近几年来的海外游客接待量一直在350万人次左右徘徊，国际旅游接待能力明显不足。

明确提出建设国际旅游首选城市目标，有利于北京从建设世界城市的要求出发，发挥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城市。

8. 科技创新之都

世界城市也是全球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聚集区，世界前沿技术研发和先进标准创制的引领区，国际性领军企业的发展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技术产业的辐射区。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新的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将会出现。

北京是中国的教育科研中心，是我国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高端人才密集度最高之地。北京市民的学历水平为国内最高，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7倍；2007年，北京地区两院院士人数达719人，2008年北京地区科研院所达266所。北京的智力密集与其他国际城市相比并不逊色。根据国务院对中关村的战略定位，将中关村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一环。

表3-6　研发（R&D）支出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

城　市	研发（R&D）支出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
纽　约	2.68（2007）
伦　敦	1.79（2007）
东　京	3.39（2006）
香　港	0.77（2007）
新加坡	2.52（2007）
首　尔	3.23（2006）
北　京	6.39（2008）
上　海	2.64（2008）
广　州	1.87（2007）

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UK 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07。纽约、东京和首尔统计的是研发（R&D）支出占本国生产总值的比重。

表3-7　专利申请量与专利授权量比较

城　市	专利申请量（项）	专利授予量（项）
北　京	43508（2008）	17747（2008）
上　海	52835（2008）	24468（2008）
广　州	12057（2007）	8524（2007）
香　港	14150（2008）	4436（2008）
新加坡	1739（2007）	941（2007）

数据来源：Singapore in figures 2009，中国香港政府统计处，北京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广州统计年鉴。

9. 文化体验创意之城。

通过文化体验和创意，北京完全可以向世界展示一种真正具有重大文化生态价值的东方文明和中华文化，展现北京独有的文化品位，成为展现东方古老而现代、民族又多元特色文化的国际文化魅力之城。

北京是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年建都史的世界著名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也是世界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区之一，有举世称羡的文化遗产和丰富悠久的文化传统，这是北京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之魅力所在。北京是世界上文化遗产拥有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即使是居于世界城市格局顶尖地位的纽约和东京都相形逊色。

北京与纽约、伦敦和东京等世界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是一个简单的图书

馆、博物馆、影剧院等文化设施的数量和利用率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观念问题。城市的文化魅力虽然需要文化设施、文化景观、文化活动与文化产业的支撑，但更需要通过创意和体验使文化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文化创意思维的空前活跃，博物馆、展览馆不再仅仅是文物展示宣传橱窗，而是在通过创意产业留存文明记忆的同时，创造着新型的学习、体验型城市文化景观。在文化经济化时代，北京只有首先成为文化体验创意之城才能建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化名城。

表3-8　文化存量国际比较

城　市	世界文化遗产（个）	图书馆（座）	博物馆（个）	文化影剧院（座）
纽约	1（2002）	2533（2007）	431（2007）	1528（2007）
伦敦	5（2008）	149（2002）	200（2000）	
东京	0	396（2007）	264（2007）	324（2007）
新加坡	0	24（2008）		174（2008）
香港	0	76（2008）	14（2009）	15（2008）
首尔	2（2007）	21（2006）	26（2006）	120（2006）
北京	6（2008）	25（2008）	148（2008）	70（2008）
上海	0	29（2008）	110（2008）（含档案馆）	172（2008）
广州	0	14（2007）	31（2007）（含纪念馆）	49（2007）

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2007 Economic Census – U. S. CENCUS BUREAU.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首都国际化进程研究课题组）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努力方向[①]

北京正在建设的后工业形态的世界城市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规律和路径可以依靠，不能盲目照搬现有三大世界城市在工业时代的发展经验，转型期间难免经历一个发展的低潮，不必过分强调指标赶超。针对北京市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应整合跨学科研究团队和各委办局的力量，进行联

① 此节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承接的前述北京市委和发改委两大课题研究的后续成果。课题组成员包括：段霞、文魁、彭利芝、吕淑然、李婧、马力平、张智新、张贵祥、夏翊、邱爱军、卞洪登、刘建一、谷军、王玺、代帆、申现杰。

合攻关，借鉴国际先进理念、技术和方法，综合治理，协调解决。此外，还须洞察30—50年后世界体系发生的深刻变化，立足于2020年在东亚地区发挥首位作用，避免与上海恶性竞争而导致市场为外国企业掌控、民族经济和自主科技创新受损，应量力而行，对城市国际化进程所需付出的成本和负面影响有清醒的认识。

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根据对三个层级部分城市的国际化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并以调查问卷和高层访谈等形式了解中央商务区、使馆区的涉外机构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对北京国际化水平的认识，查找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压力过大，城市发展承载力不足

1. 人口过多是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首要难题，水资源严重短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51立方米，远低于世界公认的1000立方米的缺水下线。

2. 城市绿化用地和开放空间不足。从指标看接近世界城市水平，但是居民小区、商业街和交通要道依然被包裹在“水泥”世界里。

3.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严重。道路的扩展远远赶不上车辆的增长。据统计，近十年北京道路年增长率为3%，而车辆年增长率为15%，车流量则为18%。

4. 城市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现有垃圾处理设施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设施超负荷率达67%，填埋量相当于每年占掉500亩土地。

5. 城市总体抗灾防损能力脆弱，各项城市防灾系统达不到世界城市要求。如每万人中消防队员和消防车辆数，北京仅为东京和纽约的1/6。

6. 城市发展成本增大。在2010年1月《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人口最稠密城市排行榜中，北京排名第十二位，生活品质不高。

（二）常住外籍居民比例较偏低，市民的国际化素质有待提高

截至2008年底，北京常住外籍人员占城市总人口的0.63%。不到东京的1/3，差距十分明显。影响外国人在京生活的主要原因有：

（1）交通不畅，出行难。地铁和公交乘车环境差，双语标示、指南和服务也不够。

（2）医疗条件与服务水平有待提高。表现在医院人多，环境差、语言障碍、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问题、看病太麻烦、就诊费用过高以及社区医院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等。

（3）教育国际化程度不高，外国人居住地的国际教育学校较少，孩子不

适应学校教育体制和管理理念。

（4）制度、规则人为控制因素较多，不能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突出反映在政府机关办事凭关系、警察不完全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等。

（5）公共场合中不文明现象仍普遍存在，一些规矩流于形式，影响外国投资者对北京的印象。

（6）城市生态环境亟待改善。从空气综合污染指数（P）来看，北京空气污染问题依然较为严重，与国际城市的差距仍然非常显著。

（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较弱，辐射力不足

1. 与成熟的世界城市相比，北京经济总量水平还比较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较弱，基本谈不上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

2. 经济总量水平较低，主要靠房地产、汽车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拉动，贸易增长主要依靠进口拉动，结构仍需改善，国际资本聚集能力有待提高。

3. 北京经济对外辐射力不足，对周边区域的带动力很弱。京津冀地区在单位国土面积 GDP 产出和人均 GDP 都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之后，并且差距十分明显。

（四）国际服务意识不强，服务质量与效率有待提高

1. 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的态度生硬、能力不强，尚未真正建立一套符合国际规范的社会服务系统。

2. 公交出行比例仍然偏低，东京为86%，巴黎是61%，伦敦是70%，中国香港则近90%，北京目前为36.8%。公交服务效率和质量均亟待提升。

3. 投资审批环节偏多、周期偏长。

4. 公共财政支出范围过大、结构不合理。

5. 互联网服务还不能覆盖到交税、网上支付电费、天然气费等业务，给市民提供便捷服务不够。

（五）城市包容性不够，国际交往能力有待提高

1. 北京人地域优越感很强，瞧不起外地人，对外来打工者和外地游客冷漠，城市管理者和服务窗口对外来者的服务意识差。

2. 在北京落户的国际组织数量过少且落户组织层次影响偏弱，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北京注册难、办事难。

3. 国际旅游接待能力不足。近年来，上海与广州的海外游客接待量均已在600万人次以上，而北京的海外游客接待量一直在350万人次左右徘徊。

4. 会展业发展环境急需改善。北京会展业的优势地位正在被上海取代。2008年北京、上海和广州举办的展览会分别占总数的22%、51%和27%。

（六）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文化的表现力与创意能力不足

1.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不足，表现方式过时，不能吸引游客和年轻人的普遍关注与兴趣。

2. 文化设施利用率低，未能成为城市文化休闲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学生吸取知识的学习体验场所。

3. 城市节庆活动商业气息太浓，文化品质有待提升，高雅活动的价位超出普通市民承受能力，也未能成为吸引游客的城市品牌。

4.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猛，但国际竞争力不足。演出市场一年收入 4 亿元至 5 亿元，仅相当于日本四季剧团一个剧团一年的演出收入的 1/3。

5. 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错位造成对文化市场的干扰，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受到文化监管尤其严格，不利于文化领域的创新与发展。

二、建设世界城市的努力方向

（一）吸引核心要素聚集，增强服务世界、影响全球的整体实力

北京正在积极行动，吸引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研究与开发机构、外资银行、国际组织、国际知名体育赛事、会议会展和文艺演出团体等入驻北京，应该看到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利益与吸引地民众或政府利益不可能总是保持一致，Google 在英国逃税 4.5 亿英镑并被英国媒体公司指责为“数字内容盗窃者”等现象就证明了这一事实。因此，在消除制约国际要素正常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各种国际要素流动的便利化的同时，要关注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国际组织和国际移民等要素对城市发展的实际贡献度分析，目的是通过机构入驻吸引国际资本、技术和知识精英等核心要素聚集和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增强城市财富创造能力、扩大市民就业的前景和为国际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此外，要努力消除作为国家首都出于政治安全考虑牺牲经济活力的负面影响。

1. 国际资本。依托现有的总部经济聚集区，吸引国际金融、生产性服务业、科技和环保产业的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研究与开发机构、营销培训机构入驻北京。着力构建电子化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引进国际著名的零售品牌企业和商品，打造特色国际商业街，成为国际时尚商贸中心。

2. 信息服务。通过减免税等一系列政策，吸引全球知名信息高科技企业和信息资讯公司入驻，积极发展满足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需求的信息服务业，在确保国家和城市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全球范围内信息流动无障碍，通过数字化北京连通全世界，建设成世界网络中心和信息服务中心。

3. 国际活动。吸引国际组织入驻，出台吸引国际组织落户的系列优惠政策，重点吸引经济、文化、科技、旅游、体育、社会等方面的国际组织总部。建设国际政务功能服务区，着力吸引亚太地区新兴国际组织总部机构入驻。积极承办旨在进行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的非政府议事活动、重要大型国际会议、学术论坛以及国际文化体育赛事活动。

4. 国际移民。增强城市包容性，参照国外城市唐人街模式，研究出台相关管理办法，试点建设外籍常住人口聚集区。鼓励外来移民组成社会团体，开办中文、职业发展等培训班，以帮助新移民融入北京。鼓励移民积极表现本民族饮食、音乐、服装、宗教等各方面的特色，增强北京时尚文化和国际文化的生命力。吸引技术、教育和文化精英云集北京，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5. 国际教育。做好准备，迎接来华留学高潮。当前国际教育已经出现东亚化趋势，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城市纷纷将教育作为支柱产业发展。促进北京市内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方便国外留学生进京。引进各国名校学生，降低国民接受国际优质教育的成本。

6. 国际文化。通过发展京津之间贫困带，打造多元化的国际文化功能区。通过使馆区东迁，建立突出各国、各地文化特色的集聚区，如文化主题商业区、文化场所等，带动京津之间河北贫困地带的发展，提高北京的对外辐射力和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首都圈。

（二）扩充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形成适应世界城市建设的新经济形态

人类经济生活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三个发展阶段后，随着信息产业和创意时代的到来，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体验经济。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创造出满足消费者个性追求的有意义的活动，在活动中完成交易，创造高科技、高附加值、高创意和虚拟型经济。娱乐体验、教育体验、虚拟现实体验、审美体验等多种体验形式正在被广泛运用于工业、农业、信息业、旅游业、商业、服务业、娱乐业（影视、主题公园）等领域，成为后工业社会新经济的重要特征，个性化产品、定制型经济正在取代标准化产品和规模经济获得比工农业产品还要大的剪刀差，后工业社会经济形态和财富创造方式呈现出与工业社会截然不同的新经济特征。

1. 服务。大力发展总部经济、金融保险业、物流和商贸等生产性服务业和个性化定制服务业，积极承接国际性的商务洽谈和广告会展。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打造与国际接轨的高端产业配套环境和产业链。

2. 科技。以中关村国家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契机，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

体制和政策环境，实现重点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新突破，在下一代互联网、低碳环保技术等新兴产业领域加快形成产业联盟，力争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制定相关产业标准。

3. 创意。创意产业是指那些用与常规想像不同的方式创造财富并提供就业机会的产业，不能简单地将其与文化产业划等号。要鼓励市民参与创意，让街头立体画、招牌广告、各种建筑标识都来自市民的参与与创造，让反映老北京文化和传统的各种创意活动而不是电视、麻将、扑克、酒桌成为城市景观。建立专项基金讲述老北京的历史故事，吸引全世界有才华的创意经济企业家和艺术家来京发展。

4. 体验。开展文化资源产业化运作、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生产力等研究，借鉴伦敦经验，把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场所建设成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探究精神的年轻一代的学习体验场所，打造皇家文化、胡同文化、时尚娱乐文化和首钢工业文明等体验场所，鼓励市民挖掘民间文化资源，建立千姿百态的家庭博物馆、档案馆、国际观光点，留住城市的记忆与历史，再现城市昔日辉煌和魅力故事，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眼球，按照后工业社会文化市场运行规律，真正做好文化体验经济的大文章。

5. 数字化。将所有文化资源数据档案数字化，构建馆藏民生档案信息共享平台，为以北京风貌为景观、讲述老北京的故事、挖掘北京传统文化、为北京人就业创造机会的国际文化公司提供信息资源和外景数据库服务，吸引国际影视公司来京发展，在胶片转为数字化的媒体时代抢占先机，确立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

6. 低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推动产业优化升级，重点支持一批环境效益明显的环保示范项目，参与能源和低碳技术，培育北京地区的碳交易市场体系。积极探索农业、建筑等行业低碳生产和绿色管理办法，制定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生产的二氧化碳减排标准，在重点污染和能源消耗行业试行碳交易，在市民生活用品消费中引入低碳交易方式。

7. 旅游。大力发展国际旅游，推动旅游咨询国际化、解说系统国际化、旅游基础设施国际化、无障碍设施国际化，公共场所危机管理理念国际化。营造轻松愉快的旅游氛围，减少人为管制，为国外散客来京旅游提供方便。深度开发皇家园林和皇城文化，重点开发奥运遗产游和工业遗产游，重点发展高端会展游、国际商务游，提供便捷舒适的全天候服务和魅力演艺空间。

（三）转变圈地扩张发展模式，从时间和空间两大领域拓展城市承载力

为保证全球范围的巨大要素规模和流量正常运行，缓解人口聚集中心城区带来的对资源、环境、交通、住房、安全等方面的巨大压力，除了加速建

设轨道交通建设、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效率、建设低碳城市和绿色北京建设、减少资源消耗和排放之外，还要转变城市化过程中摊大饼、大拆大建、断历史文脉的发展思路，挖掘新的城市资源，在时间和空间领域拓展城市的承载力。

1. 全天候服务。打造全天候不夜城，创造代表时代文明标志的城市夜生活方式，是世界城市的重要标志。按照世界城市标准提高全天候服务水平，重新设计一套北京全天候公共服务作息表，全天候延长公共服务时间，最大限度地缓解北京因观光展览以及上下班高峰引起的塞车问题；提高首都机场利用率，实行 24 小时全天候服务；在商业人流集中区域倡导全天候地铁、车站、商场、书店和大排档便民服务。全天候服务可以让更多的车辆在夜间有一个流畅的空间和宽松的停车地方，让更多的富余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

2. 虚拟空间。加快建设电子北京、数字北京，并与国际接轨。完善首都公用信息平台以及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系统，机构网页设置英文主页同步更新，建立电子交通导航系统。下大气力把北京建设成“世界信息通路型城市”，大力发展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购物，网上办公，通过数字化北京连通全世界，建设成世界网络和信息服务中心。减少出行压力和文件证件签发等带来的资源浪费现象。

3. 地下空间。一个城市可开发利用地下空间资源量一般是城市总面积乘以开发深度的 40%。目前发达国家都把地下空间作为新型国土资源。一是可以优化地下交通结构，对重点地区的地下空间统一规划，提高目前互不连通、产权零散的地下空间的利用率。二是推动大型基础设施地下化，重点建设综合管廊——城市共同沟、地下变电站、地下市政站点。三是发展地下物流。四是做好地上地下规划的衔接，研究地下空间开发的法规政策、产权和使用权界定等。

4. 向山区要地。为了改变首都变首堵的塞车状况，北京应做利用好 70% 的山区，鼓励市民从拥挤的城市搬到山上居住，建设美丽的立体化山城。北京西面的石景山区，门头沟区和北面的延庆、昌平、顺义、密云和平谷区都有条件向山上发展，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广大面积，可以给未来居住在“世界城市”的北京人创造更多的生存空间，在更大的范围提升北京的经济增长点，缩小城乡差距。如果按照中国香港岛富人住山上的习惯，未来北京最有生态环保居住价值的可能就是现在穷得丁当响的北京周边山区村庄居民。

5. 生态补偿。水资源短缺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资源短板和制约因子，应建立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对跨行政区界的饮用水源地区，如河北张家口市，建立新的生态补偿机制、水资源补偿机制及水权交易机制。对生态旅游

赋予生态教育功能，提升市民生态环保自觉性，强化分质供水，分质排水，中水利用及雨水收集工作等。

6. 都市圈协同。改造区域内农村成为千姿百态的村镇花园和市民休闲场所，将230个形态各异的卫星城镇之间的快速交通网络连成一片，把京、津、唐、廊、承、秦6个城市区间内的落后农庄改造成世界城市大花园，形成同城效应，可以带动地处环渤海核心区域的京津唐廊与承德、秦皇岛六市地带1500万农村人口尽早摆脱贫困，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休闲娱乐场所，鼓励城镇居民到小城镇购买住房或者是租赁住房，从事各种类型的经营活动，缓解北京的人口压力。

7. 借津出海。河北、天津与北京地缘临近，是北京发展为“世界城市”的天然腹地，且天津拥有海港、河北拥有丰富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把京津冀腹地的发展纳入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整体方案中，作为北京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载体，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促进产业一体化和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天津作为北京的海运交通枢纽，作为副都承担北京在物流和交通枢纽方面的功能，将使北京跳出16800平方公里的首都平台，建设一个崛起在东亚地区的临海型世界城市群。

（四）恢复古都风貌，留住城市的记忆，创造生动的城市文化景观

“古都”文化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城市之根、发展之本、旅游之魂”。但北京古都风貌损坏严重，城市特色文化正在消失，说教式、宣传式的文化表现形式正在使文化散失市场意义和年轻人拥戴。

1. 恢复。加大对古都风貌的保护力度，丰富首都城市的文化内涵，使传统文明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重点保护好旧城完整的格局、轴线和色调等核心要素。逐步剥离旧城的大部分行政、经济、交通功能，对传统建筑与历史街区进行保护、修缮、整治和恢复，让老北京人成为古都风貌中美丽的风景线，让每一个景点、每一家商铺、每一声吆喝、京城里的每棵树、公园里的每张长椅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记忆。

2. 发展。出台激发创意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升传媒、出版、设计、音乐、动漫、演艺、艺术品交易等领域的市场活力。将旅游产品融入北京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开展主题性文化体验之旅、博物馆学习体验、多层次的创意大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与应用，培养年轻一代的博雅情趣和文化创意能力。

3. 经营。精心打造城市礼乐节庆仪式，拥有名扬天下的城市文化品牌。

（1）皇家祭祀仪式。包括太庙祭祖、社稷坛祭祀（社为土神，稷为谷神，社稷代表国家）、天坛祭天、先农坛祭祀（先农即神农，就是炎帝，这个祭祀

是祈求农业丰收）、孔庙祭孔，除太庙祭祖外（是祭明清皇帝的祖先），其他几项都可考虑。

（2）民间节庆活动。可重点考虑有正月十五的上元节、端午节、中秋节、九九重阳节。前三个是北京传统的三大民间节日，都有丰富的民间文化活动，建议将上元节打造成类似巴西狂欢节那样的大型民间狂欢活动，上元节一直是北京的传统，以展示灯、观灯为特色的活动在世界范围也是一个特色亮点。重阳节已经初步形成登山健身为特色的节日，可进一步形成全民健身节。

（3）天安门卫兵换岗仪式。天安门广场升降旗仪式吸引着无数市民和游人的目光，但是由于观看人多和时间关系，许多中外游客未能如愿以偿。建议每天增加带有表演观赏性质的天安门卫兵换岗仪式，类似英国白金汉宫皇家卫兵换岗、孙中山纪念堂护卫队交接仪式，展现人民解放军的风采，世界上许多历史名城的换岗仪式都是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城市仪式。

4. 培育。改变传统的宣传、说教、灌输式的历史文化教育方式，适应信息社会和读图时代人们接受观念方式的变化，用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市民接受城市文明观念，提升市民在观看文艺演出、体育赛事、观看展览时的素质，力争做到影剧院、体育场等场所安静、文明、秩序良好，无大声喧哗、无污言秽语、嬉闹现象。培育市民平和、理性、自信、开放、包容之美德，善待京外、境外人士，善待不同宗教信仰人群的公共交往行为。

（五）提高公共服务品质，营造温馨城市氛围，使北京成为有人情味的城市

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北京对外籍人士的吸引力。针对课题组“北京城市国际化调查”所显示的医疗、教育、交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公共服务部门对陌生人或弱势群体提供“无歧视服务”和“微笑服务”有助于增强这些部门对中央机构和部门、首都市民、外来流动人口、外国人等所有民众的平等服务理念，改变窗口服务单位和政府机构只把笑脸留给熟人和关系户的现象，积极提倡社会公益与市民互助精神，这是吸引国际游客和国际人才聚集北京的关键要素。

1. 医疗服务。借鉴国际上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模式，完善医疗基础设施，简化就医手续，规范医疗收费标准，提高从业人员服务意识。让前来就医的人在视觉上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把儿科病房变成儿童乐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改变服务态度。

2. 教育服务。教育应该与国际化挂钩，知识体系和学校教育体制及管理理念应与国际接轨，建设一批国际教育学校，配备充足的外文书籍，使外籍人士子女能够方便地入学，并得到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体系。

3. 移民管理。改进对外籍人员的管理和服务。为外国人来京办理出入境手续、长短期居住、工作、学习提供便利条件，积极招收外国留学生。及早研究建立外籍人员管理制度。解决多头管理、条块分割、权责不清、信息孤岛等问题，推动建立“大外管”工作机制，对来华外国人出入境、居留等进行全程监控和管理。成立外国专家管理的协调机构，严格外籍人员行业准入标准和背景审查。

4. 满意服务。建设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效政府，提升城市运行管理的人性化水平，建立起面向所有居民的政府服务满意度监测指标体系，以季度、年度为单位发布部门和区域政府服务满意度指数，通过媒体曝光、奖励先进、警示甚至惩戒后进等方式，并在纪委监察部门设立全市统一的投诉监督中心（包括统一投诉电话、电子邮箱、短信平台等），以确保政府服务整体效率和质量的稳步提升。

5. 民生服务。坚持“公交优先”和“非机动车优先”原则，大力提升公共交通服务的供给能力、水平和质量等，降低预算支出中资本性和建设性支出比重，严格控制行政经费开支比例，大力提升公共服务、民生保障开支比例，让北京的财政按照世界城市标准以尽快实现“公共财政”、“民主财政”、“民生财政”和“透明财政”。

6. 公益服务。民间参与公共服务事业使得非营利机构不仅能够在非常广泛的领域有效地完成一些政府部门难以覆盖的人性化救济和服务，而且可以成功地发展成有许多产业链组成的社会企业生态系统。迈入后工业社会门槛，北京应跳出追求 GDP 和经济增长的思维定式，培育志愿者精神和社会企业家队伍，发展城市公益文化。政府退出传统的微观服务领域，向第三部门转移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事权。通过提倡社会公益与市民互助精神，使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通过三大部门各行其责实现城市良性治理、市民参与决策、扩大社会就业，创造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环境，实现城市发展成果人人享有的局面。

（六）适应后工业社会发展变化，有效提升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国际品质

国际品质是一个城市在其国际化进程中形成的个性特征和核心内涵，是每个市民和城市过客能够感受到的城市魅力和气息。城市的国际品质由其发展资源、历史传统、文化特色和国际化水平决定。建设世界城市需要有一流的建设理念，才能建设一流的产业、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国际会议或会展中心、一流的博物馆、一流的物流航运中心、一流的交通设施等。

什么是一流的建设理念？就是要适应北京进入后工业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根据后工业形态世界城市发展规律，精心培育新产业的生产性要素、新

经济的发展活力以及新社会的发展环境，敢于正视转型中的困难，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和耀眼的政绩，经过十年二十年的扎实推进，完成向后工业社会的顺利转型，在国际合作交流中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实现城市发展、市民福利和辐射全球能力三大价值最大化。应具备以下发展意识：

1. 创造魅力城市景观。重现那种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工业化过程中失去了的绿色的、具有古都气息的都市形象，并在此基础上，加入时尚商贸文化活力，创造出美丽的都市景观，提高城市生活品质和观赏价值。

2. 克服发展瓶颈。通过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引进，立体盘活城市空间资源，消除交通堵塞这一最大的劣势，有效疏解人口压力，应对各种城市突发事件和安全危机，提高北京吸引国际要素集散的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舒适便利的都市生活环境，提升城市的美誉度。

3. 降低城市能耗。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和资源耗竭的环境危机，转变市民工作生活观念，应用先进的能源节省技术，努力将北京打造成对环境负荷最小的世界榜样城市，为中国的节能减排作出示范性的贡献。

4. 实现社会和谐目标。在世界上率先实现满足休闲消费型和老龄化社会要求的新型世界城市，实现一种人人安心生活、福利惠及所有阶层的城市生机与活力。

5. 提升城市国际形象。向世界积极推介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现代城市文明魅力的北京文化，有重点地培育信息、文化、科技、低碳产业，通过产业转型来确立北京作为后工业社会世界文化名城的地位。

（首经贸课题组）





第四章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建设世界城市的要害

北京要想成为世界城市，就必须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人手，起先就要解决三大问题：

一、彻底改变城乡两重天的二元化结构，将郊区农村变成为城市化经济发展方式

彻底改变城乡两重天的二元化结构，北京要积极响应中央一号文件有关于城镇化的号召，将更多的北京乡村建设成为便捷交通连锁的星星城市。也就是说要将京东大地上250个乡镇，变成个个都有特色的“星星城市”。

世界上有星星城市经验可循吗？在此我就要给大家讲述我在考察5000人的加拿大麦肯锡市的时候发现全市机关干部只有8个人，女市长本人既能自己开车又能自己当秘书，有陪同人员介绍说：麦肯锡市在卑斯省北方算是比较大的中等城市，周边还有许多500人左右的星星小城镇烘托着。等我回到北方中心大城市的王子市时，才知道其总人口仅不到10万人。当他们听说我是从1700万人的北京大城市来的客人，顿时大家都肃然起敬地嘀咕讲：这么大的城市岂不是相当于半个加拿大人口多了吗？可是我毫不掩饰地说：北京还要扩大，为了解决“首都变首堵”的问题，中国首都还要东扩到环渤海。本来就拥有四万个乡镇的中国，应该会出现上万个卫星城镇的。

尽管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仅达到46%，但是全国2900多个县城和640个百万人以上的城市。并没出现按比例数达到2万个镇级城市。如果未来4万个乡镇达到70%城市化率，那么中国就应该达到3万个城市，如果按照加拿大500人建市标准，北京有些千人以上村庄都可以建成星星小城市。这样就可以把北京建成遍地是星星城市的“银河系”了。这样就可以让“银河系”的北京城变成浑身闪闪发光的超级富有的“世界城市”。综上所述，这也就是我要向大家解释的“星星城市”这一举措的缘由了。

有人会提出质疑，这样做能为北京创建世界城市带来多少好处？这样可以带来三大好处：

其一，可以让北京更多的低经济增长农田变成高经济增长的新城区储备用地，为北京市构建不断增值的造钱机器。除了土地升级外，未来的城镇化

建设房屋，也因首都的区位优势而产生房屋租赁、转售等的税费收入。

其二，可以遏制城市中心区房价增长过快的问题，可以吸纳更多老城区居民向生活成本低的星星小城镇转移。

其三，通过众多的乡村变城镇的建设格局改变，从而使得北京变得更加高大、更加亮丽，更快地迈向世界城市的行列。通过消灭二元化结构的努力建设，从而使得北京城区空间向郊区农村扩展一倍以上，这样更能够接纳国际友人在北京这座星星城市群安居乐业。

二、北京应该利用好70%的山区点石成金，做足做好山城文章

为了改变首都变首堵的塞车状况，当下的北京人应该从拥挤的城市里疏散一些人到山上居住，利用好70%的山区面积。中国最早的人猿化石是北京的山顶洞人。这项考古发现表明了北京猿人早在万年以前就已经习惯在山上生活了。据统计，16808平方公里的北京市，其中有13008平方公里的面积是山区。由于蒙古骑兵登山困难厮杀不方便，所以打下了金国中都之后，便在平原上选址，建设了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元大都。而近百年来的城市发展理念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决策者们都愿意在风景秀丽的山上筑城，尤其是欧洲古城堡，之所以安道尔古城与摩纳哥王宫和王国都建立在山上，以防蒙古骑兵这样的马队攻城略地。今天的北京建城理念仍然以太行山余脉与燕山山脉之间的盆地为主。这就造成了住在山下城里人越来越拥堵。为了疏散人口把北京建设得更加美好。北京应该利用好70%的山区点石成金，做足做好山城文章。

北京有条件建造亮丽山城。中国新兴城市重庆和青岛就是两座美丽的立体化山城。今天北京西面的石景山区、门头沟区和北面的延庆、昌平、顺义、密云和平谷区都有条件向山上发展。只有迈开向山区要地的新步伐，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广大面积，才能够点石成金，给未来“世界城市”的北京人创造更多的生存空间，才能够更大范围地提升北京市的经济增长点。其实现在昌平与延庆之间的长城地带，已经形成了山城文化。由此点引申思考，类似这样的山城旅游景区，还有很多等待我们去开发。

如果按照中国香港岛富人住山上的习惯，未来北京最有生态环保居住价值的就是现在穷得叮当响的北京周边山区村庄居民，中国古代的北京人就是住在山上的山顶洞人，但当代山顶洞人更值钱。

三、建设移民城市，实现海纳百川“世界城市”的包容目标

北京变成移民城市或许经济增长方式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要好。从国际知名度上讲，北京早已是“世界城市”了；从历史履历上讲，北京早在元大都时代就已经是万邦朝贡的“世界城市”中心了；但是，如果按照外国人居住户口统计，目前1700万人口的北京尚没有10万外国人拿到北京户口。试想，一个容不下占城市总人口0.5%外国人的北京市，又怎么能够称得上“世界城市”呢？

有人担心说：“外国人来京太多无处安身。”其实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就是通过移民政策，通过吸纳更多有钱人买房子刺激百业发展的。如果北京试图将原来“内陆型首都”打造成为现代化的“临海型首都”，就自然会在“首都东扩”的大格局态势下，彻底解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空间吃紧问题。

最后再说说北京现有房地产的“禁外令”是不符合“世界城市”标准的！换句话说，在外国人选择到北京市创业时，连起码的购房居住资格都要遇到排外的歧视性政策，那么咱们的北京城又怎么能称得上世界城市呢？如果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新的“黑体战略”，就难以成为“吸金大王”。如果不像物理学所讲的那样，启动超强吸光吸热的黑体战略，也是很难早日实现海纳百川“世界城市”的包容目标的！

四、突破行政区域限制，实行积极地跨区域发展

历史上的北京通州行署13县，今天已经变成了散落在京津冀三角地带的飞地。其中河北省的飞地香河、大厂和三河市最早都是北京通州行署的。还有现在隶属于天津的宝邸、蓟县，历史上也是通州行署的。今天若要将“首都变首堵”的北京城发展成为“世界城市”的最大瓶颈就是空间出了问题。地方小、现代化车辆太多摆不下，很难让北京成为一个交通合格流畅的世界城市。

今天，北京市刚到400万辆机动车就已经“首都变首堵”人满为患了。如果再像美国纽约、日本东京、法国巴黎、韩国首尔那样，机动车达到800万辆以上，北京就将会是全城瘫痪、无法行车的世界城市。然而很不幸的是，根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预测，5年之内，北京就将达到700万辆机动车，而且每天超过五小时的车速低于15公里。试想一个“人走比车快，车走比人

慢”的都城能算是一个合格的“世界顶级都市”吗?

基于上述难题和城市交通的急速膨胀发展。我们的大都市发展也应该突破行政区域限制，实行积极地跨区域发展。不妨可以这样调整一下，在廊坊、天津、唐山、秦皇岛和承德市南部郊县区空间支援帮助下，迅速可以从过去北京16800平方千米的首都平台，一下子扩大到六市合建的4万平方千米的“临海型首都”大舞台。有了京东大地250个乡镇卫星城参与“世界都市”建设，即使将来有1000万辆机动车行驶，也将会畅通无阻。

跨区域的城区扩大以后，必然会带来后面的一系列问题：以为京津冀六市合一的5000万人超级大都市中的50%失地农民生存问题和教育再上岗问题怎么办?笔者认为，只有将跨区域的星星城市群规划好，把每个村打造成为开放式的生态公园社区，将每个乡引进一所超级大学，这样就可以解决好失地农民教育和重新择业的问题。如果再能将每个农民平房合法引进资金改造成五层左右的小公寓，那么失地农民就可以在管理公寓中获得就业，自己搞家庭旅游也行。中国的教育制度如果不与国际惯例相适应，仍然过滤着外来文化，那么无论如何都难以被国际社会承认为“世界城市”。

我们也可以这样预测一下，如果能把世界100所一流大学复制到京东100个乡镇，那么自然就会形成全球文化的聚合效应，如果再把外国人才定居问题和外国人买房制度改善了，那么提前准备好的中国临海型首都大舞台，将会成为通吃世界文化的教育大市场和吸纳全球精英到北京安居乐业的“最大世界都市”!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中国房地产学会　卞洪登）

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涉及的若干问题

一、北京要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城市

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北京为什么要建设世界城市，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城市。

北京为什么要建设世界城市，这既与北京城市建设发展相关，北京在成功举办奥运会后，无论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或还是城市的人文环境、经济发展实力，北京城市发展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需要设定更加长远发展目标以

凝聚力量，推动城市发展；更重要的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又是与中国整体发展密不可分的。北京近年来的迅快发展，本身就是中国32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显现，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凸显，需要北京、上海这样一些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能够快速发展与之相适应，通过提升这些城市国际化水平，进而引领和推动中国整体发展。也就是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既是北京城市发展的逻辑性演进，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需要。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与中国整体发展相适应，进而引领和推动中国整体发展。那么，就涉及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如何与中国整体发展相适应，能够在哪些方面推进中国整体发展这样一个命题。也就是说，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城市。

这首先需要对世界城市有所认识。什么是世界城市呢？笔者以为，所谓世界城市，就是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引领和影响的城市。所谓引领和影响，就是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示范、辐射、推进和带动的作用。

世界城市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是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大，人均GDP水平高，产业结构水平先进，建立了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行业，金融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血脉，其发展在全球有着重要影响，并有相当数量的跨国公司总部聚集。

二是有着巨大的国际高端资源流量与交易。世界城市，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重要的表象特征是，世界城市，也是“五流”——物流、资金流、人流（人才）、信息流和技术流——会聚的城市，每天有大量的高端的生产要素在流进和流出。为此，必须要有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证券市场、高端人才引进与消化市场、全球影响的新闻媒体和技术交易市场相适应，这样才能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

三是高度发达的城市软实力，这是世界城市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产生引领和广泛影响的内在特征，“软实力”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的。在不同时期，约瑟夫·奈对“软实力”做出了多种不同的界定。就城市软实力而言，主要包括：城市综合创新体系、法律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文化，特别是创新文化、市民素质、社会风尚等内容。

在世界城市上述三个特征中，世界城市的经济实力和水平、巨大的国际高端资源流量与交易，这些外在的表象特征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则是城市的软实力，而这是世界城市之所以能够产生引领、影响和控制力的主要源泉

和动力。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虽然创造了经济史上的奇迹，人均GDP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300美元跃升到2009年的3400美元，经济实力从世界前十位进入到世界第三位，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中国30多年建立在依赖能源和原材料基础上的发展方式，虽然解决了10多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自然也是对世界的贡献，但并不能认为是对人类发展的贡献；由于对能源和原材料的过度依赖，以及能源利用绩效过低，中国的发展不仅使自身跃居到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前列的国家，也使中国相当多的地区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并且，这种建立在能源和原材料过度依赖基础上的增长，由于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依赖进口，在世界能源和原材料日益紧缺的情况下，中国的这种发展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可持续的，并已走到尽头，中国转变自身发展方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中国虽然号称“世界工厂”，但几乎没有在全球产生具有足够影响力的品牌和竞争力的产品及技术，中国出口商品和劳务已经在2009年跃居世界第一，但一半以上的出口是由外商在华的投资企业提供的。发达国家通过产业结构转移，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也将大量的污染留给了中国；由于处在整个产业链条的中下游环节，“中国制造”出口所获得的利润极其有限，而这个局面之所以能够长期支撑，又是以长期实行的低工资、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实现的。而要使“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并尽可能缩短这一过程，转变发展方式，提升中国软实力十分关键，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起到能够引领和影响的作用，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提升首都软实力。也就是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就是要建设一个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建立以雄厚软实力为特征的世界城市，而这对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长期持续发展至为关键。

关键在于实现“第三个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括一国或地区实现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结构的优化、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也包括降低消耗、改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以及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协调与和谐等各多方面内容。其实质在于全面地追求和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整体的协调。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的是实现“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

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就“三个转变”而言，北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在“三个转变”中，初步实现了“两个转变”，即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北京目前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工作，就是要在进一步实现上述两个转变的同时，加快实现“第三个转变”，即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为使经济发展更加符合首都的功能定位，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提出了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2001年7月，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后，为了兑现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也同时借助奥运会这一难得的机遇大力发展与奥运会相关的产业，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95年，北京市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了50.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经过14年发展，2009年达到75.8%，比2009年全国服务业水平高出33个百分点，以服务业作为支撑和主导的经济结构已成为首都经济的最主要特征。由于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一些新兴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例如，“十一五”以来，由于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已经连续5年增长速度超过15%，远高于全市平均增长速度。2009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到1497亿元人民币，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12.6%。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也是北京近年来大力发展的行业，2009年，金融业的增长速度达到13.9%，增加值达到1720亿元人民币，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4.5%。也是全国省一级行政机构中金融业比重最高的。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北京市积极推进服务业朝着更加高端、高效、高辐射的领域推进。例如，通过规划6大高端功能区，以占北京6%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市40%的GDP、40%的税收和40%的就业；集聚了全市90%的高技术产业、80%的现代制造业、5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52%的生活型服务业，使6大高端功能区成为首都经济发展的6个“发动机”。

从资产总量看，北京市的资产总量中有96.1%是服务业的资产；从效益指标看，80%的财政收入来自服务业；另外，北京市75.4%的就业岗位由服务业提供，72.9%的外资投向服务业。这些数据表明，北京服务经济总量越来越大，比例越来越高，质量越来越好，已经成为首都经济的主要支撑。

北京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中，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未来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例如，相当多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缺乏，直接影响了产业竞争力的形成。而在这些方面，都与“第三个转变”

没有完成密切相关。实际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完成了“第三个转变”，关键在于科技的发展、应用和自主创新。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所指出的那样，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为科技创新提出需求、提供动力，科技取得重大突破和创新会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

二、培育创新文化，是实现“第三个转变”、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环节

北京要加快实现“第三个转变”，即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一项重要内容，是创新文化的培育。而这是实现“第三个转变”、建设世界城市的关键。

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追赶者，中国改革开放 32 年的发展，虽然也有思想解放，也有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但就总体而言，关键词是“复制”、“模仿”。作为后来者，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已有的成就和经验，采用“拿来主义”，通过消化吸收，就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发展。以市场经济制度为例，市场经济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多方面缺陷，但人类至今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制度。通过“复制”和“模仿”，将市场经济体制移植到中国，并加以“中国式”的改造，经过 30 多年的实践，虽然有最初水土不服问题，目前也还存在诸多的不完善，但目前正愈益适应，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则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项发明，一项技术专利，研究者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研究探索，但通过技术引进，通过消化和吸收，后来者可能只需要几个月、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几个小时的学习就可以掌握技术原理。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较短时间里，走完别人需要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走过的道路，这应当看作十分自然的过程。但要转变发展方式，特别是加快实现第三个转变，通过建设世界城市在全球起到引领和影响的作用，仅靠复制和模仿就不行了，必须要有创新。而这种创新，不是个别领域的创新，而应是整体创新水平的提升。

世界城市也同时是全球创新中心。创新不仅仅指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和社会创新。因而，构建城市综合创新体系是世界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点，也是世界城市建设之所以能够起到引领

和影响的主要因素。而要构建城市综合创新体系，成为全球创新中心，就必须要有创新人才，而创新人才的培养，则需要有创新文化作为支撑和条件。

要构建综合创新体系，北京目前面临的挑战是，没有形成有利于推进改革创新的体制机制，没有建立诸如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品牌专利、鼓励创新创造、推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成果转化、尊重人才和吸引人才特别是一流人才等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或者换一句话说，在一些领域，虽然也试图建立起有利于推进改革创新的体制机制，但其不完善则是十分显然的。而在这背后，文化上深层次原因，则是创新文化的缺失。

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活力的标志。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决定了它所造就社会的兴衰和国家的强弱。18 世纪以来，世界的科学中心和工业重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实质上是创新能力强弱的转换，其中无不包含深厚的文化根由。这也就意味着，创新文化成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软实力，一个城市创新能力的高低、创新精神的强弱，皆源自于是否有丰厚的创新文化底蕴。

但要形成创新文化，何其艰难，涉及的面也十分广泛。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利于创新的消极因素。“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样的文化心理，泯灭了多少创新的火花；敢于冒尖者被视为“冒失”，打破常规者被看作“异类”，富有个性者被当成“不成熟”。而要对这种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任务十分艰巨。

要形成创新文化，教育是其中最为重要且基础性的一环。人们把创新活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种子、孵化和开花结果。种子阶段也就是新思想、新观念的孕育形成阶段，通常表现为新点子、新构想的生成。如同种子的萌芽生长需要土壤、阳光、空气、水分等外界条件一样，创新思想萌生后也需要精神和物质的支持，需要适宜的环境条件，由此“种子”才能生长成参天大树。而教育，正是形成种子的阶段，即新思想、新观念的孕育形成阶段。但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重灌输轻培养、重应试轻素质、重趋同轻个性、重服从轻创造，严重影响着青少年创新素质和创新品格的养成。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几乎使青少年创新的种子难以形成。所谓“钱学森之迷”，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其根源可能也就在这里。

创新文化实际就是一种科学精神。而这种科学精神，不应仅仅只是科技人才应具有的精神，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需要具有科学精神。2006 年 1 月 10 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要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完善创新机制，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但遗憾的是，

包括大学，甚至十分著名的大学，科学精神都普遍缺乏。全社会普遍缺乏怀疑、批判、质疑的意识。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怀疑、批判和质疑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起点。而这种科学精神的普遍缺乏，又是与现有的体制机制密切相连的，具有批判精神、怀疑品德的人，往往在社会、在单位不受欢迎，甚至难以立足。而科学精神普遍缺乏的社会，是极不利于创新文化的形成，不利于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

要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创新文化滋长的土壤，就要学会宽容。只有宽容，才能包容；只有宽容，不同意见不同观点才能够交锋，才有可能撞击形成火花；只有宽容，包括宽容失败，允许失败，失败才有可能成为成功之母。创新活动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科学探索也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失败者。只能成功、不容失败，必然导致不求作为、无所作为。宽容失败，善待失败，才能使失败变为成功之母。

要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创新文化滋长的土壤，就要学会尊重，包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同样也要尊重奇思妙想、异想天开，因为正是在被常人看作奇思妙想和异想天开中，可能就有创新的种子和创新的萌芽。创新对规律的发现首先来自对规律的尊重。从形式上看，创新表现为标新立异，但精神实质恰恰是求真务实。尊重又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尊重，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行为，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体现出这种尊重。

正是由于创新文化的缺乏，科学精神尚未在许多科技工作者的头脑中生根，怀疑、批判的意识不强，进取、超越的信心不足，我们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上还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徘徊。

正是由于创新文化的缺乏，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普遍淡薄，关键技术自给率低，80 %的企业尚未形成研发能力，竞争能力的形成过于依赖引进而非自身创造。

正是由于创新文化的缺乏，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方面，虽然实践有强烈的呼唤，但行动上却十分迟缓。

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创新的文化氛围，在目前看来，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并且涉及政治体制、教育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这也说明，建设世界城市，特别是培育创新文化，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　陈剑副院长）

主动参与国际分工　促进北京发展方式转变

"世界城市"在工业化与信息化两次革命中孕育而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经济发展本质上就是总量增长和结构演化的过程。城市经济发展就是伴随着全球工业化与信息化，城市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不断提升和变革，参与国际分工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都是在其经济总量提升与结构变革的相互作用下，实现了城市生产方式的改变、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城市经济活动的扩张，表现在城市经济结构、城市人均产值等经济指标的变化上。城市通过不断吸收外部资源实现高的经济增长、并以产业调整为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进行再配置，最终成长为"世界城市"。

21 世纪，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国际分工与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资源约束、环境变化让全人类面临前所未有危机。中国虽然长期来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并非"风景这边独好"，考虑到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低端位置、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消耗、高投入等因素，令全球瞩目的"高增长"背后是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不和谐。经历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已发展成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引擎，在整个国家的复兴道路上承担着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相统一的重大使命，中国城市的崛起将会改善中国经济发展及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位置。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具备中国城市走向"世界城市"的最优条件，并且已经成为正在发生的事实。在过去的 5 年间，北京积极转变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并借奥运经济的东风，适时配合中央，做出调结构、保民生的政策选择，采取积极政策应对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周期下行带来的国内经济增长的放缓。在结构方面，随着北京市第三产业占地区 GDP 比重超过 7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比重达到 70%，北京已经率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进入了以服务性经济为主的后工业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为北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高的平台，并为首都北京迈向"世界城市"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奥运会的举办使北京市的城市发展理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北京发展的目标也出现了多元化。北京正在改变中国城市发展的传统模式，向新的模式迈进。从全球看，城市发展与工业化的阶段相关。现有的"世界城市"大多

是建立在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下，但随着全球工业化的深入，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由于全球气候恶化、海平面上升，已经开始威胁到人类的生死存亡，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把限制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碳排放放在讨论的首要议题。全球环境的变化意味着，靠高投入实现高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必须要转变。中国城市的发展，包括北京在内，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的高投入实现的，这是一种比较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城市是中国经济内外联系的重要节点，中国将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将进入转型期。而且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给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外部环境变化要求世界各国把目光的焦点从促进经济总量增长转为调整产业结构，以改善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当前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元区经济受到欧洲猪五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新兴市场化国家都面临改革的难题，全球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巨大。因此，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实现一个城市（作为经济交往的重要的节点）发展模式的转变面临绝大的挑战。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北京市在“十一五”期间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中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提出北京未来参与全球分工水平的要达到的目标及政策建议。论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总结 2005 年以来北京在经济总量和结构调整方面取得的成就和不足；第二部分，分析北京和成熟世界城市在参与全球分工方面的差距；第三部分，以上述分析为基础，依托北京的资源禀赋，提出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发挥北京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引领国内城市结构调整，未来 5—10 年要达到的发展目标；第四部分，就实现以上目标提出政策建议。

一、2005—2009 年北京市经济总量和结构状况

影响城市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位置的决定性因素是该城市的经济总量水平和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

（一）经济总量分析

2005 年到 2007 年底，北京市经济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 11% 以上，2007 年地区生产总值 9353.3 亿元，增速高达 13.3%；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国内经济周期下调的双重影响下，北京市经济由繁荣转向衰退，2008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下跌 4.3 个百分点，滑至 9.0%，经济低迷一直持续到 2009 年第一季度，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仅增长 6.1%，为 1993 年以

来的最低水平，但随着一揽子保增长、调结构的政策措施的效果显现，2009年第二季度扭转了北京经济五个季度连续下降的态势，累计地区生产总值上升至7.8%，随后，全市经济逐步步入回升通道，社会投资强劲上升，消费增速平稳增长，经济企稳向好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全市经济呈现加速回暖态势，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完成8161.4亿元，增长9.5%，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加快3.4和1.7个百分点。从人均生产总值来看，经济不景气时，仍保持人均1000美元以上的增长，由于2009年经济已经企稳回升，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并无悬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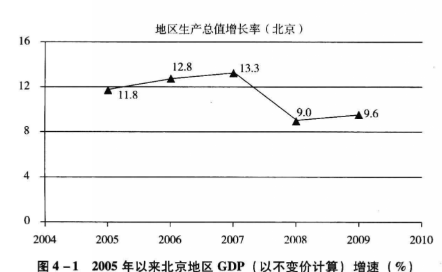


图4－1　2005年以来北京地区GDP（以不变价计算）增速（%）

表4－1　2005年以来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均生产总值

时　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美元/人）
2005年	6886.3	5548
2006年	7861.0	6323
2007年	9353.3	7654
2008年	10488.0	9075
2009年	8161.4（前三季度）	—

资料来源：2006—2009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北京统计信息网。

但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2009年第一季度以后开始的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是国家为克服经济衰退而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未来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基础则主要依靠经济扩张的力度和产业调整后所释放的新能量。因此，2010年以后，北京市最重要的任务是“调结构”，这既是经济维持可持续增长的客观需要，又是适应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

（二）经济结构分析

2005年以来，北京市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对全市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拉动作用进一步显现，2008年，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比重达73.2%，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体从业人员比重达72.4%，第三产业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2.1%；前两个70%的突破标志着北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而第三产业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起到决定作用。截至2009年上半年，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比重已达到74.6%，该比重不断增加说明北京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成效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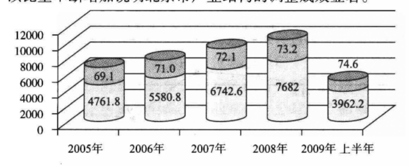


图4－2 第三产业产值（亿元）及第三产业占地区GDP的比重（%）

现代国际化城市经济上最突出的特点具有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的职能，北京市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在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带动下，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势头，金融业增加值在第三产业的比重由2005年17.6%提高至2009年上半年的21.6%，创近年新高，金融业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而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支持科技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信息产业增加值在第三产业的比重也有所增加；随着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2005年的10.2%上升至11.4%，创意产业发展优势更加突出，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更加强劲。

表4－2 金融、信息及文化创意产业所占比重

时　间	金融业占第三产业比重（%）	信息业占第三产业比重（%）	文化创意产业占GDP比重（%）
2005年	17.6	11.2	10.2
2006年	17.5	12.6	10.3
2007年	19.1	12.8	10.6
2008年	19.4	12.7	11
2009年上半年	21.6	12.9	11.4

资料来源：2006—2009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北京统计信息网。

北京市的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反映了城市国际化的要求，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渐趋合理，但是产业内部仍存在均衡发展、合理布局、提高质量等问题。此外，与第三产业相关的如知识产权保护和信用体系建立等软环境问题也有待解决。

可以从产业结构关联的角度来简要地分析三次产业内部的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第三产业内部一些产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下文将从通过计算北京市 2002 年和 2005 年 42 个部门之间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比较产业之间的关联系数变化，来分析北京市产业结构变动特点。[①]

从北京市 2002 年和 2005 年的影响力系数平均值来看，42 个行业中系数大于 1 的行业共有 24 个，这些行业对其他行业所起的拉动作用较大，最大的 6 个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和建筑业，其影响力系数平均值分别为：1.71、1.495、1.31、1.295、1.27 和 1.27。虽然对其他产业生产的带动作用最大的行业基本上都属于第二产业，但可以看到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对其他行业生产的带动作用增大。

影响力系数增大明显的行业有：旅游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综合技术和其他社会服务业。随着北京市经济向着轻型化和服务型经济转变，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综合技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对其他产业生产的带动作用也逐渐增强。影响力系数减小明显的行业有：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金属制品业和金融保险业。随着北京市产业结构的调整，重工业对其他产业生产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从北京市 2002 年和 2005 年的感应度系数平均值来看，42 个行业中系数小于 1 的行业有 26 个，平均值最小的 5 个行业分别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旅游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与水的生产和供

---

① 产业结构关联是指产业结构的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业间关联系数的疏密说明了产业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常用的衡量指标是由拉斯姆森（Rasmussen）提出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又称为带动力系数，它是指某一个产业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需求的波及程度，即对其他产业生产所起的带动作用。影响力系数越大，表示该产业对国民经济各产业生产的需求带动作用越大。感应度系数又称推动力系数，它的含义是一个经济系统的各产业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需求时，该产业部门因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反映该产业部门产出对其他产业部门生产的推动作用程度。感应度系数越小，表示该部门供给推动力越大，瓶颈地位越突出。

应业，这些部门的产业化程度不是太高，但对其他产业的生产制约作用很大，是北京市的瓶颈产业。

对比2002年和2005年感应度系数减小明显的行业有：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化学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大，对其他产业的推动作用加强。而由于北京市自然资源短缺，所以2005年供给工业生产燃料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推动作用一度增强，但是随着现在北京市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一产业对其他产业生产的推动作用会减弱。

感应度系数增加明显的行业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综合技术和其他社会服务业和非金属矿采选业。可以看出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在经济生产中的重要性逐渐减弱，这同北京产业结构的轻型化和信息化趋势是一致的。

表4-3　北京市产业关联度系数

项　目	2002年		2005年	
	影响力系数	感应度系数	影响力系数	感应度系数
农业	0.92	0.84	0.94	0.64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16	2.36	1.33	1.51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①	0	1.02	0	0.75
金属矿采选业	1.26	1	0.8	1.11
非金属矿采选业	1.39	0.51	1.04	1.18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1.07	0.54	1.11	0.86
纺织业	1.37	0.89	1.18	0.69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0.96	1.16	1.18	1.13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1.46	0.63	1.26	0.37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1.07	1.56	1.08	1.02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03	1.93	1.06	1.89
化学工业	1.2	2.94	1.14	2.07

①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影响力系数为零是因为北京市没有该部门的生产，所有增加值为零，但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部门生产时需要石油和天然气，需要从其他地区调入或进口，所以该部门感应度系数不为零。

续　表

项　目	2002年		2005年	
	影响力系数	感应度系数	影响力系数	感应度系数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18	0.73	1.14	0.46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33	1.78	0.84	1.76
金属制品业	1.43	1.11	1.11	0.78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1.41	1.32	1.18	1.1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48	1.12	1.51	2.5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44	0.76	1.18	1.06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84	2.78	1.58	2.56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3	0.67	1.22	0.88
其他制造业	1.29	0.14	1.14	0.24
废品废料	0	0.18	0	0.14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0.75	2.2	1.08	3.29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81	0.19	0.44	0.0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7	0.2	1.1	0.12
建筑业	1.25	0.27	1.29	0.7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0.94	2	1.01	2.58
邮政业	0.8	0.15	0.67	0.24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0.86	1.31	1.05	2.06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0.6	0.45	0.72	1.07
住宿和餐饮业	0.86	0.66	0.97	0.87
金融保险业	0.68	2.94	0.37	1.82
房地产业	0.84	1.08	0.49	0.1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67	2.32	1.08	1.84
旅游业	0.7	0.02	1.43	0.18
科学研究事业	0.84	0.48	0.96	0.26
综合技术服务业	0.88	1.45	1.19	2.1

续 表

项　目	2002		2005	
	影响力系数	感应度系数	影响力系数	感应度系数
其他社会服务业	0.83	0.31	1.18	1
教育事业	0.74	0.12	0.54	0.26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04	0.15	1.02	0.0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8	0.73	0.96	0.52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0.82	0.02	1.43	0.03

以社会平均值 1.0 为界，将“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2002 年和 2005 年系数平均值）分割为四个象限，如图 4－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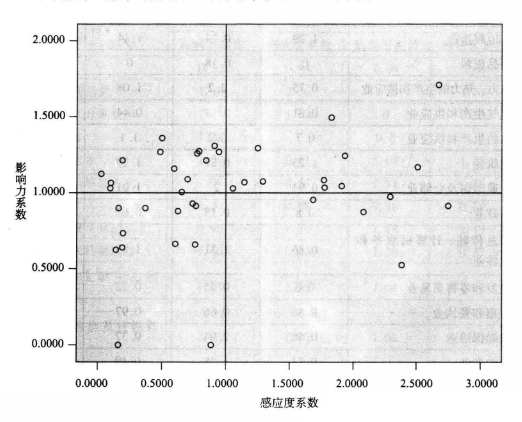


图 4－3　2002 年和 2005 年北京市 42 个部门产业关联系数平均值

1. 处于第一象限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大于平均值 1.0，这些产业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的生产依赖性较大，对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拉

动作用较强，但推动力不强。这些部门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金属矿采选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位于这一区域的产业基本上都属于第二产业，它们对产业生产的带动作用较大，但感应度不强。

2. 处于第二象限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大于1.0，感应度系数小于1.0，这些部门对其他部门生产的带动作用较大，同时推动力较大。部门包括：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建筑业、旅游业、其他社会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其中，建筑业、旅游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产业的影响力系数2005年均比2002年有所增加，表明这些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加强。

3. 处于第三象限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小于1.0，这些部门对国民经济影响较小，但是有些产业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对经济的推动力较大，并且有些产业发展潜力很大。这些部门有：农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邮政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事业、教育事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其中，房地产业发展潜力较大，近五年来，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对其他产业生产的推动力也越来越大。而科学研究事业、教育事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影响力系数2005年均比2002年增大，对国民经济带动作用加强，感应度系数均有所下降，对其他产业生产的推动力增强，在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增强。尤其是奥运会的举办，加快了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产业的发展，2008年前三个季度，该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4%。

4. 处于第四象限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小于1.0，感应度系数大于1.0，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强，推动力也不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产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会越来越强。这些部门包括：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近几年发展迅速，在北京市GDP中的比重也逐渐增加，成长为北京市支柱产业，金融保险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最大，为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北京和部分代表性世界城市在参与全球分工方面的差距

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尽管其目标追求或定位可能趋于相同，但是由于所处的背景条件、自身基础、区位因素、历史过程等不同及其构成的特定路径依赖，通常呈现多元演化的发展形态。与发达国家的全球城市相比，中国世界城市崛起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基础及其约束条件与此大不相同。因此，中国在世界城市崛起的目标追求及其定位上，可以将发达国家的世界城市作为主要参照系，但是在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上并不能简单仿效，而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

（一）北京市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水平

目前，北京市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吸引各种资源要素向其集聚，但如果不能对这些资源要素进行集约化的配置，至多只是形成城市规模的扩大或城市存量资本的大量堆积，而难以形成对外强有力的辐射能力。因此，北京市作为“世界城市”崛起要求以经济集约化为重要基础。在经济集约化过程中，也将发生两方面重大的变化：一是由于北京市在超越其本身地域范围内实行大规模的资源配置，要求将分散的功能相对集中，以促进产业集群，形成良好的产业经济功能区，并要求深化与强化其主要的功能、突出特色，形成核心竞争力；二是要求进一步增强经济运行的集约化，如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程度，降低资源要素的损耗和运作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促进资源的高效流动。

1. 北京参与全球分工水平：与其他城市在总量与结构方面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首都北京加快了实现现代化的步伐，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分工中，初步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提升与产业结构的变革，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加强，但是，与全球比较成熟的“世界城市”相比，经济总量水平还比较低，第三产业占地区 GDP 的比重也比较低；而与国内比较发达的城市相比，经济总量水平低于上海、广州，但第三产业占地区 GDP 比重却远高于这两个城市，这主要是由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决定的。

表 4-4　代表城市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情况

城　市	地区 GDP（10 亿美元，2008 年）	人均 GDP（美元/人，2008 年）	第三产业占地区 GDP 中的比重（%）
纽约	1406	73845	87.6（2004）
伦敦	565	65951	85.2（2002）

续 表

城 市	地区 GDP（10 亿美元，2008 年）	人均 GDP（美元/人，2008 年）	第三产业占地区 GDP 中的比重（%）
东京	1479	41456	86.0（2006）
新加坡	215	48467	72.5（2008）
中国香港	320	44407	92.3（2007）
首尔	291	29706	84.8（2004）
北京	166	14947	73.2（2008）
上海	233	15547	53.7（2008）
广州	147	16650	59.0（2008）

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ities_by_GDP，表 4-4 地区与人均 GDP 值均以 PPP 计算。

从表 4-4 的数据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北京经济增长水平在国内不如上海、广州，更远不如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中国香港、首尔等国际城市，在经济方面并不具备成为“世界城市”的条件，但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在国际舞台上更倾向于担当专业性国际化城市的角色。所以，提高北京经济的国际化水平以成为综合性国际化城市任重而道远。

2. 北京市参与全球经济网络的主要表现

在资源的配置方面，多年来北京主要是被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主要是通过“输入式”卷入全球化进程，表现在北京有较大的产业聚集力：跨国公司、外资银行、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增加较快，但是辐射力不足。而其他的世界城市采取的是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的分工，发挥自有禀赋，在提高“聚集力”的同时，辐射力也不断提高。

城市全球交易网络节点的流动对象包括货物流、资金流、人力流、技术流和信息流，而能够带来或促进大规模经济流量的机构和组织有：大型企业集团，包括生产型企业集团和投资公司、公司总部，主要指跨国公司总部及其他地区总部、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国内金融机构总部或业务执行总部等；服务类组织机构，包括研发机构、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企业咨询机构等市场中介结构以及行业协会等；国际性组织：包括联合国机构及主要国际组织总部（联络处）；媒体组织、包括报纸、杂志、图书出版、电影和电视、在线信息服务以及艺术设计、时尚等文化传播和创意机构。目前这些组织和机构是北京参与全球经济网络的主要载体。

中国以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和巨大的市场规模吸引了全世界跨国公司的注

意力，而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又具有别的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很多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设在北京，截至2007年底，设在北京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有42家，包括ABB、欧姆龙、松下、索尼、爱立信、摩托罗拉、三星、西门子、佳能等著名企业。[①]

在空间布局上，北京初步形成了商务中心区（CBD）、金融街、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等几个特色总部聚集区，成为北京总部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仅商务中心就聚集了世界500强企业102家、跨国公司600余家。[②]

北京是中国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的集聚地，截至2007年，在北京的外资银行分行有36家，外资银行支行19家，外资银行代表处82家，外资汽车金融公司5家，外资和合资证券公司代表处53家，外资保险公司代表处104家。外资银行分行包括美国花旗银行、美国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日本瑞穗实业银行、日本三菱东京日联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荷兰银行等国际著名银行。证券公司代表处包括美国高盛公司、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日本瑞穗公司、日本三菱证券公司、日本野村证券公司、法国里昂证券公司等国际上著名的投资银行或证券公司。[③]

以上数据表明北京具有较大的经济聚集能力，北京对外经济联系的程度还可以从北京市参与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情况来分析。

北京市从1996年至2007年，出口依存度平均值为33%，进口依存度平均值为94%。北京市进出口之间的差距比较大，贸易逆差从1995年的165.3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951亿美元，2008年1－9月贸易逆差为1285.1亿美元，同比增长89.7%，增幅同比提高85.9个百分点。2008年1－9月进出口对贸易总额增长的贡献率分别由上年同期的56.3%和43.7%变为89.8%和10.2%，贸易增长主要依靠进口拉动，见表4－5。

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这将导致各主要经济体缩减外部需求，拖累国际贸易增长。目前，尽管各国相继推出了稳定金融秩序、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但全球市场信心的恢复需要较长的时间，而次贷危机引发的连锁反应仍未结束，金融市场动荡局面仍将持续，对实体经济的伤害也在不断扩大。在外部需求全面收缩的情况下，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使得北京市出口增长呈现明显的回落态势，2008年1－9月增幅

①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 总部经济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② 赵弘. 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③ 北京市金融年鉴2008.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同比下降9.5个百分点。2009年1—10月北京市地区进出口总额达1712.4亿美元，出口额达388.3亿美元，进口达到1324.1亿美元。

表4-5 北京市外贸依存度

外贸依存度					单位：万美元		
年份	进出口总额	出口	进口	GDP	出口依存度	进口依存度	依存度平均值
1995	3703378	1024993	2678385	1805913.3	56.76%	148.31%	102.53%
1996	2933018	813118	2119900	2151458.4	37.79%	98.53%	68.16%
1997	3037848	960059	2077789	2504366.5	38.34%	82.97%	60.65%
1998	3051739	1052335	1999404	2869643.3	36.67%	69.67%	53.17%
1999	3433845	989059	2444786	3234844.1	30.58%	75.58%	53.08%
2000	4962177	1196801	3765376	3818569.8	31.34%	98.61%	64.97%
2001	5154131	1178687	3975444	4483165.8	26.29%	88.67%	57.48%
2002	5250870	1261464	3989406	5231864.6	24.11%	76.25%	50.18%
2003	6846262	1685173	5161089	6070257.0	27.76%	85.02%	56.39%
2004	9465509	2057493	7408016	7322672.0	28.10%	101.17%	64.63%
2005	12557127	3087062	9470065	8407092.8	36.72%	112.64%	74.68%
2006	15817669	3798364	12019305	9860754.1	38.52%	121.89%	80.21%
2007	19294629.7	4892328	14402301.7	12299869.1	39.78%	117.09%	78.43%

数据来源：依据《北京统计年鉴2008》数据整理。

从北京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来看，2005年以来，北京市实际利用外资的水平逐年提高，说明北京的经济聚集能力不断增强；但从表4-7中可以看出，北京与全球性国际城市差距很大，北京2008年外国直接投资额是伦敦2006年国外直接投资额的1/15。与区域性国际城市相比，北京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差距也很明显，国外直接投资额是这两个城市的约1/10。从国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来看，中国香港2008年国外直接投资额比2005年增长了66.1%，新加坡2008年比2005年增长了210.1%，北京外国直接投资同期相比增长了72.5%。从国内三个中心城市来看，北京的国外直接投资额位于上海与广州之间，包括北京在内的国内中心城市的国际资本聚集能力都有待提高。

表 4－6　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时　间	外地企业驻京代表机构数量	外商投资企业签约项目数	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
2005	10132	2136	35.2
2006	11311	2106	45.5
2007	12877	2177	50.7
2008	14411	1897	60.8

数据来源：依据《北京统计年鉴2008》数据整理；
外地企业驻京代表机构包括港澳台地区。

表 4－7　各城市利用外资情况

城　市	外国直接投资（亿美元）
纽约	—
伦敦	894.4（2006）
东京	—
新加坡	622.6（2007）
首尔	64（2006）
香港	596.25（2008）
北京	60.82（2008）
上海	100.84（2008）
广州	32.86（2007）

数据来源：伦敦投资局；新加坡统计年鉴；http://english.seoul.go.kr/gtk/about/fact.php；中国香港政府统计处；北京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广州统计年鉴，其中中国香港数据是由2008年中国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的平均汇率计算得出，2008年1美元兑7.787港元。

而北京市经济辐射能力的体现可以从北京对周边腹地的经济影响进行考察，从国内的三大都市圈比较来看，北京所在的京津冀地区的GDP与GDP占全国的比重位于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但是与位于首位的长三角相比差距很大；从京津冀地区在单位国土面积GDP产出和人均GDP来看都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之后，并且差距十分明显。可见，北京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力要弱于上海和广州。

表4－8　2007年中国三大都市圈GDP统计

三大都市圈	GDP（亿元）	占全国GDP的比例（本国为100,%）	单位国土面积GDP产出（万元/平方公里）	人均GDP（元/人）
长三角	46862	18.78	4279.64	56001.43
珠三角	25416	10.19	4638.88	98017.74
京津冀	28113	11.27	1518.39	30840.57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双三角洲统计数据；中国统计年鉴。

从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基本判断：

1. 北京对外部资源的聚集力较强，但与全球性国际城市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2. 北京对外经济的联系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受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比较大。

3. 北京经济辐射力很弱，对腹地区域影响不大。

（二）成熟世界城市的发展演进路径

借鉴成熟“世界城市”在历史发展演进路径中的成功经验，有助于首都北京利用其比较优势、充分考虑内外部环境，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历史阶段，产业调整的方向整体上是由一、二次产业向三次产业转移，从目前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构成的统计平均值看，人均GDP小于800美元的地区，第一、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较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较少；人均GDP在800～8000美元之间的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开始超过第一、二产业之和；人均GDP在8000美元以上的地区，第三产业占绝对优势。显然，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其产业结构的特点，随着城市经济的扩张和规模扩大，城市产业的构成会不断向高度化发展。

而“世界城市”的最终形成又要依靠城市的资源禀赋，使产业结构与外部环境相匹配，制定经济发展规划，主动将自己城市定位成全球或区域的交通枢纽、贸易集散地、制造业基地和服务业中心，积极开展这些领域的国际竞争，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即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具有前期基础世界城市，开始大力发展金融、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会展行业，并成为综合性或专业性的“世界城市”。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产业的更新换代，“世界城市”的内涵和功能将变得更加丰富。

从纽约、伦敦、东京、首尔的城市发展演进的进程来看，这些城市发展

为目前全球经济网络的重要节点的共同特点是：在工业化时代的不同阶段，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顺应外部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及时调整本国产业结构，并主动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例如，在工业化时代，世界城市是国际制造业的中心，高度集中了制造业生产和对生产的协调功能，从而体现了当时全球经济发展先进水平的基本特征。但是，进入后工业时代，全球经济呈现更高水平的发展，赋予了世界城市全新的内涵和时代特征，使其成为国际商务服务中心，从而对其产业基础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在这一产业基础上，才有全球之间进一步细化的产业定位与产业分工问题。所以，对世界城市的产业基础问题，结构调整问题，要放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层面来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产业结构呈现的“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世界城市适应全球经济服务化要求，通过构建以服务为主导的产业基础来提升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北京也适应全球产业结构转型的大趋势，提升了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水平。当前，全球产业结构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其本质特征是，经济运行的集约化，如，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程度，降低资源要素的损耗和运作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促进资源的高效流动。北京应该借鉴以上代表性世界城市的发展经验，顺应全球产业结构的新特征，改善参与全球分工的方式，引领低碳经济潮流，提高国际化水平。

三、未来5~10年北京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

根据上述分析，北京目前以高投入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其自有禀赋、全国产业结构调整、全球产业调整的趋势是不匹配的，这必然会使北京面临更大的发展矛盾，加大城市承载压力，弱化其比较优势，阻碍其向“世界城市”发展的步伐。

北京未来5~10年内的发展的目标应该努力成为促进大规模经济流量的全球交易网络的节点。这种网络节点的形成需要北京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抓住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契机调整产业结构、释放生产能力，通过聚集与辐射效应，主动参与全球分工，提升北京国际化水平。

（一）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地位带动中外经济交流

未来5~10年，随着全球气候进一步恶化，碳关税问题将引起更为激烈的国际贸易摩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会更加激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北京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中心，进而成为全球重要的政治一极；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北京古老的文化内涵将吸引更多

的外国人旅游参观，并成为一种世界时尚；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反映为与机构管理和文化服务相关的产业可能成为北京未来的支柱产业，如北京更有可能成为金融管理中心，而非金融中心，北京聚集着各大银行的总部，这就为结算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北京同时又是高校、研究所、博物馆等文化机构聚集的城市，相应地与文化相关的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就有可能迅速发展起来，这些产业的发展将引领未来第三产业的发展方向，从而引致更多的中外经济交流，增强北京经济的外向型特征。

（二）短期内不会成为世界的经济、金融中心

通过第一、第二部分的分析可以得出的判断是：北京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金融业发展不足，现阶段，北京只能算是专业性的国际化城市。从产业结构看，虽然北京已经步入后工业化社会，但需考虑到首都功能的影响，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给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北京与首尔对比，同作为政治中心，但首尔的第三产业占地区 GDP 比重接近 85%，说明中国的产业调整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而北京的经济实力既与国际经济大都市相差甚远，也不如本国的经济发达的城市，所以，短期内北京不会成为世界的经济、金融中心。

（三）通过结构优化释放生产能力

未来 5 ~ 10 年是首都北京继续提高国际化水平的过程，将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只有在经济结构得以优化的基础上才能释放出经济总量持续增加的生产能力，第三产业占地区 GDP 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而相应的金融、信息、文化创意产业的比重也将进一步增加。首都北京未来最重要的任务将是在发展低碳经济基础上谋增长、保就业、调整产业结构，这就需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四）变卷入性为主动性参与全球分工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特质。在经济上反映为对外部要素的集聚效应大于辐射效应，从而卷入性地、被动地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中。而资源的单向流动并不是最佳状态，只有资源双向流动、各自发挥比较优势，才能达到更高的福利水平；从北京市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来看，效果很不明显，北京对周边地区尚未形成有效辐射，其经济影响力更难以走出国门，成为世界型的经济中心，而从现在成熟的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过程看，都对腹地产生了深刻的经济影响，形成了大规模的都市圈和都市集群，如纽约、东京和巴黎。由此可见，现阶段北京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来自政治与文化方面，未来北京应该在促进要素的双向流动、对外进行经济辐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动参与全球经济网络分工。

四、建议

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将面临重大的调整。其影响是，全球产业链将进行新的整合。中国需要抓住机会，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北京成为连接全球经济网络的节点，对改善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有重要价值。

北京如果要加快国际化进程，成为“世界城市”，不仅要充分调整产业经济结构、提升经济总量和扩大经济发展规模，还要以源头地位扩散其经济影响力。北京提升经济的国际化水平根本上就是建立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结构，也就是符合北京城市性质功能和布局要求，以首都科技文化优势为依托，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第三产业为主体，三次产业结构协调，技术先进、布局合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高效益、高素质、开放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同时，以北京市和周边腹地为经济扩张的基础，促进资源的双向流动，积极主动参与世界经济分工。

（一）深化产业结构调整 释放新的生产力

1. 稳步提升具有区域优势的金融、文化创意、房地产和商贸等支柱产业

金融业在北京市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最大，但是和一些国际化城市诸如中国香港、伦敦等相比，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还是较低。所以应该进一步以资源集聚和金融创新为重点发展壮大金融业，基本建成“开放、创新、完善、协调”，与国民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现代金融体系。具体的任务是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着力引入金融机构、加快金融服务创新，推进金融街、CBD和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金融区的建设。

围绕内容创意和交易传播两大核心环节，加快发展以文艺演出、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和交易、动漫和网络游戏研发制作、广告和会展、古玩和艺术品交易、设计创意、文化旅游等为主的文化创意产业，使文化创意产业成为首都经济新的增长点。日本丸红经济研究所所长杉浦勉认为文化力是一种有力资源，经济上可成为相当大的力量。北京借助奥运会这一契机，文化创意产业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了10%，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迷人的文化力对国家、城市、城镇、企业都相当重要，经济上可成为相当大的力量。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北京是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文化古都，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把北京建设成为文化创意之都，带动全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以“稳步发展、优化结构、稳定价格”为目标，改善住房供应结构，培

育住房二级市场，合理安排房地产开发布局，优化发展房地产业。

以提升生活品质和引导相关产业发展为出发点，调整发展商贸服务业。建设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符合世界城市、宜居城市发展要求的现代都市商业体系，基本达到国际大都市现代化商业发展水平。

2. 积极培育发展空间较大的旅游会展、总部经济、现代物流和商务服务等潜力产业

以成功举办奥运会为契机，提升发展旅游会展业。把北京建设成国内外旅游首选之地、世界一流的旅游城市和国际会展之都，塑造国际一流的旅游会展城市品牌。后奥运经济阶段面临着奥运场馆等设施的利用情况，所以我们应该加快大型旅游、会展设施建设。重点引进高科技含量的大型主题公园，加速国家会议中心、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建设，充分利用奥运会的体育会展设施，举办经常性国际重大专项体育赛事、文艺演出和商务会展。在入世和奥运等多种因素的带动下，北京市会展经济的整体规模迅速扩大，产业体系逐步成形，在信息交换、商品交易、技术交流和资金引进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会展业已成为新时期首都经济发展中的特色产业，应该培育使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同时借助奥运会集聚起来的品牌效应，积极引进跨国公司总部进驻北京，促进总部经济在北京的发展。企业总部是企业配置资源的中枢，可以带来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等在所在地的汇集，从而形成集群效应促进所在地的经济的繁荣。北京总部经济的发展除直接增加财政税收、创造就业机会和吸引人才外，还显示出很强的关联带动作用，如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实现以外资企业带动出口增速等，为全面提升首都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国际化转型奠定基础。

以建成现代化物流体系为切入点，加快发展物流业，基本建成体系完整、结构合理，满足首都产业发展、生活消费需求并辐射国内外的现代物流体系。

以市场化、专业化为导向，着力发展商务服务业，建设产业层次高、辐射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务服务体系，依托 CBD 改造提升国际商务环境，把北京建成全国乃至亚太地区重要的商务服务中心。

（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以科技进步加快低碳进程

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整体产业竞争力为核心，把握发展低碳经济的契机，把科技进步与生产力水平提高结合起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创新模式为支撑，以高技术服务和高新技术制造业相互融合相互支撑为取向，以国际产业转移和信息化快速发展为契机，重点发展以软件产业、信

息服务业、研发产业为主的高技术服务业，和以电子信息制造业、生物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制造业。我们应该抓住北京高校集中的优势，抓住人才优势，加强高校、研究部门和事务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推动产、学、研的结合，加强研究成果的产业转换能力。积极面对中国与发达世界发达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合理引进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同时要重视自主开发、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以软件产业基地为重点，大力发展软件业，加大软件外包出口，依托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加快软件产业国际化的步伐，把培育商务、研发设计服务业作为现阶段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任务，推进本地资源与国际品牌资源的同化，加大对日本、韩国、美国、欧洲等软件外包市场的开拓力度。

以实施信息化和信息技术升级换代为契机，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同时发展以移动通信、计算机及网络、集成电路、生物为主的高新技术制造业。目前北京已经研发出了 TD-SCDMA 新的移动通信业技术标准。

坚持退出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领域，适度发展现代制造业，稳定提升汽车制造业，加快发展生物医药、新能源和再生材料等潜力产业。此外，在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中大力推行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最后，建立一整套机制顺畅的政策支持体系，解决生产服务商最初产生难、发展难的问题，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创新金融支持体系。

（三）加强经济辐射作用　促进资源的双向流动

从纽约、东京等成熟“世界城市”的发展路径来看，北京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深入，有必要和附近腹地区域进行资源整合，形成大都市集群或大都市圈作为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载体，在经济影响力上提升国际化水平，这就需要北京市打破现有行政区域划分的条条框框，把腹地区域的发展纳入提升北京国际化水平的整体方案中。

河北和天津和北京地缘临近，是北京发展为“世界城市”的天然腹地，且天津拥有海港、河北拥有丰富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京津冀地区需要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促进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前，北京对天津、河北地区主要是经济聚集，但经济扩散作用不强，造成北京经济发展明显好于天津、河北，而天津、河北发展水平的落后，导致京津冀都市区在中国三大都市圈中经济实力最为薄弱；在未来，北京需要充分考虑对这些地区的辐射效应，肩负起京津冀都市区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重担，这是北京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化水平的必经之路。

可以尝试考虑加强北京在全球网络格局中分工的专业性，把一些成本较

高、关联性较强的产业有规划地转移到腹地区域，而集中发展与金融管理、商品流转、文化服务相关的产业，在北京经济影响力得以进一步扩大时，就可以考虑把整个环渤海地区作为北京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载体，成为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大都市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李婧教授）

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世界城市

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后，一些城市的外部性问题凸显出来，尤其是资源利用过度、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危害到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世界城市意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并采取措施，节省资源、减少能耗。这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就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换句话说，循环经济是指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节约，实现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最小的污染来获取最大的发展效益。发展循环经济，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战略举措，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对破解北京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北京发展循环经济的因素分析

（一）世界城市的定位决定了北京必须发展循环经济

根据中央对北京做好“四个服务”的工作要求，北京确立了建设世界城市的努力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首都在国家经济管理、科技创新、信息、交通、旅游等方面的优势，建设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宜居城市，创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首善之区。而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必须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手段改造传统经济产业体系，构建以企业绿色制造为基础、以生态工业园区为主体、以资源再生产业为补充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实现产业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为成为世界城市奠定良好的产业基础和经济基础。

（二）资源危机决定北京必须发展循环经济

2010 年，北京实际常住人口已经达到 1972 万人，提前 10 年突破国务院批复的到 2020 年北京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 1800 万人的目标，也大大突破了“十一五”规划末常住人口 1625 万人的控制目标，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随着人口持续增加，对水、能源的消费量和土地占用量不断加大。地表水的资源开发率高达 86%，地下水过度开采，人均水资源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8，是全国严重缺水城市之一。北京能源资源极为有限，本地自供能源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6%。100% 的天然气、100% 的石油、95% 的煤炭、64% 的电力、60% 的成品油从外地调入。人口、资源逆向互动，使得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剧，城市摊大饼式地无序发展，导致城市生态承载能力下降、生活垃圾问题严重。废弃物产生量逐年递增，资源化水平亟待提高，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率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约为 1.0%，低于全国 4% 的平均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北京地区的人口和城市建设仍在高速增长，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将无法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发展，还会因环境的恶化与资源的难以为继把北京变成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只有发展循环经济北京才可能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使经济发展引发的环境、社会矛盾有可能得到缓解。

二、北京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

“十一五”期间，北京围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战略目标，结合北京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和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从资源节约利用入手，以节能、节水、节地为重点，以高消耗行业作为突破口，加强监管整治，积极通过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强化管理等手段，依托北京的科技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循环型社会的建设。

（一）出台了立法和优惠政策手段

北京针对自身产业结构特征制定一些循环经济的地方性法规，并配合国家《循环经济促进法》实施出台了中国内地省市首个循环经济鼓励政策——《北京市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按《实施意见》要求，北京在区县（城镇）、园区和企业三个层面选择循环经济试点，并对试点机构给予政策、资金、税收、土地申请、政府采购等多方面支持。首批入选的 24 家机构涉及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废弃物循环利用、都市型生态农业等多个领域。

（二）循环经济链条渐具雏形

北京以提高资源附加值为主题，积极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改造传统产业过程中，改变过去传统的生产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积极构建产业链，逐步形成了“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产业链条。如在海淀区建立起电子产品回收—再利用—环保处理的“IT环保产业链”；德青源已形成了一条由订单农业，到生态养殖，再到食品加工、清洁能源以及有机种植为一体的循环农业产业链条等。这些产业链条的形成、发展、成熟，促进了资源集约化利用和废弃物资源化。

（三）成长起一批基本成型的循环型企业

随着国家节能降耗和节能减排工作力度的加大，在北京市政府的积极引导、扶持下，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认识到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自发地走上了循环经济发展之路，涌现出一批基本成型的循环型企业。如金隅集团已有23家政府认证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年资源综合利用产值超过60亿元，每年通过资源综合利用消纳粉煤灰、脱硫石膏、废陶瓷、矿山尾矿石等各类工业废弃物1000多万吨，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四）农村新型清洁能源工程发展势头强劲

北京在发展农业生态产业方面，支持农村以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技术支撑的新村建设示范试点工程。大力推广生物质能转换技术的应用，集约化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实施农村沼气开发利用示范工程，把畜牧业与种植业连接起来，形成了以“猪—沼—果”、“猪—沼—菜”、“猪—沼—鱼”为纽带的农村循环经济模式。大力发展太阳能、地热能等示范工程建设，广泛推广新能源在发电、照明、制冷、供暖、制热水等方面的实际利用，缓解了北京供电紧缺的局面。如试点单位北京市密云县十里堡镇通过发展以绿色安全农产品生产为特色的生态农业，积极探索农村清洁生产、农业资源节约以及再生能源综合利用的循环经济实践新模式，目前全镇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95，畜牧污水处理率达到80%以上。

（五）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北京加强对耗能耗水大户的监管和限制，引导企业积极参与节能计划。在市区推广使用节能环保车辆，推行快速公交和上下班通勤铁路以节约石油并减少污染。积极实行自来水上下水双向收费，使用季节水价和阶梯价格鼓励节水。政府还通过改进排污和污水处理系统，立法禁止或减少工业排污，推广使用可被生物分解的清洁剂。目前，北京大中型企业基本自觉实行清洁生产，30%～50%的中小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工业万元产值能耗下降15%；

工业万元产值水耗下降30%；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96%；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90%。

三、北京发展循环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循环经济发端于人类对资源供求矛盾和环境污染的关注，源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结果。"十一五"期间，北京循环经济发展成效明显，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北京循环经济在实施过程中，按照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发展目标，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制约因素：

（一）责任主体不明确，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激励机制

循环经济涉及面广，各部门协同工作体系尚未形成。北京循环经济发展普遍存在技术供需信息不对称，企业面临技术困惑缺乏解决途径，科技资源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的问题。环保审批和环境稽查与治理工作比较到位，但对企业的生产运营缺乏有效监管。对宣传发动和教育培训工作也重视不够。工矿企业和广大群众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和理解还很肤浅，就是现有发展较成熟的循环型企业，其当初的本意也多是出于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支撑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土地、价格、金融、奖励、处罚等政策还不完善、不配套。资源再生企业废弃资源收购成本高、企业负担重，市政府对相关企业的扶持力度不够，影响了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

（二）循环产业链的构建，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循环经济，也可以说是一种技术经济。没有强大的技术作为支撑，发展循环经济只能是纸上的空谈和美好的愿望。支撑北京各重点领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明显不足。北京能源外埠依赖性强，各行业领域能源利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建筑节能技术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应用，水资源供应紧张，以农业为首的水资源利用水平急需提升。城市废弃物产生量逐年上升，缺乏先进实用的处理技术。再生资源集中处理环节严重缺失，下游再生资源加工利用规模小、技术落后，没有形成专业化经营，难以产生规模化、高附加值、高竞争力的产品，资源浪费严重。目前，北京已经发展起来的循环模式，普遍存在着循环链条不长、链条科技含量不高，企业内部循环多，企业之间循环少，纵向循环多、横向循环少等问题。

（三）产业园区建设过度专业化，缺乏循环链条的对接和延伸

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载体。从

北京现有的产业园区布局来看，产业集中度高，具有很强的专业化色彩。虽然相同或相似产业集聚发展，可以形成规模效益，但是由于产品单一，上下游产业脱节，难以形成彼此之间的链接，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形成，很难建立起园区系统内资源—能量—产品—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的循环网络。而且企业之间还容易出现恶性价格竞争。此外，北京现有的关联产业共生关系不强，产业布局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在工业行业产业共生方面，仅冶金、电力与建材产业在利用粉煤灰、煤矸石、脱硫石膏等工业固废再生建材方面有一定共生基础，但产业空间配合不好，关联产业间能源、水梯级利用较少。如何把大量工业固废和建筑废弃物变成新型建筑材料，将是循环经济技术领域的重要方面。

（四）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薄弱，缺乏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

社会对循环经济的认知度不高，生态环境意识薄弱使社会公众缺乏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社会公众或者将循环经济万能化，或者将其等同于污染治理，或者简单地把循环经济理解成生物链，缺乏自然资本的观念，缺乏应有的环境和法律意识。而这种经济发展中的短期意识导致了短期行为。目前北京公众的节约意识仍然不高、绿色消费意识淡薄，过度消费现象较为普遍，垃圾分类措施落实较差，生活垃圾分类率仅为15%。为了追求生活上的便利，大量使用一次性物品，使用短生命周期电器和生活用品，并且过分追求高档物品而忽视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等等。公众非理性的消费方式与循环经济的要求相违背，严重制约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四、北京发展循环经济的措施和建议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政府、企业、科学界和公众的共同努力。市政府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利用法规、政策和标准等手段对循环经济发展方向和重点进行调研引导的积极作用，通过加大资金、科技投入力度，联合企业、中介、行业协会等多方合作，构建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打造技术、人才、信息服务平台，扩大宣传教育等措施来推进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编制总体规划和科学布局，将循环经济发展引入快车道

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周密可行的战略规划作指导。北京应以贯彻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为政策导向，结合建设世界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适合北京循环经济发展需要的科技创新体系。充分整合北京相关资源，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污染物排放为核心，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迅速提升城市环境承载能力。在企

业、行业（产业）、园区、社区、区域等多个层次着力推进资源循环式利用，产业循环式组合，区域循环式开发，建立适合北京市产业特点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适用范围、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目标体系和保障体系，提出循环经济的资源效率标准、能源效率标准、废弃物排放标准。同时，加快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资源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循环经济发展重点领域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建立科学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发展循环经济战略目标及分阶段推进计划，依靠科技创新、技术产业化实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促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建设都市型农业，改善生态环境。

（二）加强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增强循环经济技术创新能力

循环经济发展必须要有技术作为支撑，需要一大批成熟的节能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和生态工业链接技术，以及再制造技术、废旧原料再生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等作为支撑，而这些支撑的供给应当通过科技创新来完成。一是发挥政府统筹协调功能，采用各种鼓励和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地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加强科技队伍建设，提高北京市的科技创新能力。二是安排财政资金，吸引社会资金，组织力量进行科技攻关，力争在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能源梯级综合利用技术、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接技术、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技术、废旧产品和物资的回收及再生利用技术、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及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与处理技术、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技术等方面有所突破，加快循环经济发展。三是以项目为依托，推进循环经济技术装备的研发制造和改进。通过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的改进和管理进步，推进企业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四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技术指导和服务作用。要建立和发展专业化的技术咨询服务、信息服务和管理服务机构，广泛开展循环经济宣传培训、引进推广先进技术，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三）要按照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建设产业园区

产业园区建设要体现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企业集中布局、土地集约使用、污染集中处理和废弃物循环使用的功能。在北京今后的产业园区的发展建设上，要按照循环经济发展理念，产业链构成的基本定位，下游原料之间的供求关系，做好前期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避免重复“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一是搭建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招商引资平台，营造良好的基础环境，加强基础、政务、土地、政策、市场、法制、安全等软环境建设。二是要以科技为支撑，以高新技术嫁接、改造传统产业为手段，着力促进产业园区内各类产业、企业进行废弃物交换利用、能量梯级利用、土地集约利用、水资源逐级利用和循环利用，共同使用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设施。三是在引进入驻产业园区的项目上，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考察项目的关联度，把好入

口关。不仅要控制污染，保护产业园区生态环境，还要看项目的科技含量，看项目在产业园区产业发展中的“链接性”，特别要注重引入具有“补链”和“延伸链条”作用的项目，实现产业园区层面上的“链式发展”，使产业园区内企业之间形成一批相互对接、相互支撑、互为依托、相互促进、互为供求、综合利用的高新技术产业链群。只有按照高起点、高科技、高产业链、高附加值、高度环保的标准建立起来的产业集聚发展、“三废”循环利用的新型产业园区，才能以最低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

（四）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循环经济发展良好氛围

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建设社会层面上的大循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行动。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循环经济、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社会对循环经济的认知程度，激发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循环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来。要使更多的公众树立可持续的绿色消费观和节约资源、增强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自觉参与循环经济建设，逐步使节能、节水、节材、节粮、垃圾分类、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等与发展循环经济密切相关的活动变为公众的自觉行动。二是对政府领导干部、公务员、企业家、技术人员和员工开展多层次的培训工作，并发挥他们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三是在中、小学校深入开展“绿色学校”创建活动，开展国情及市情教育，编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教育手册，将可持续发展观教育普及到每个孩子身上。

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具体化，是解决北京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矛盾的根本出路。立足于北京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解决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资源、环境和经济问题，实现把北京建成产业优化、资源节约、环境舒适、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的世界城市的有效途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　王颖副教授）

发展低碳经济　建设世界城市

目前北京已进入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以更高标准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阶段。建

设世界城市既是北京城市发展和中国走向国际社会前台的内在需求，更是改善北京经济发展结构、增强中国国家竞争力的迫切要求。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必将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衡量标准之一，因此，北京应该尽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尽早培育低碳生产模式，为建设世界城市和绿色北京提供有力的支撑。

一、低碳城市是北京世界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低碳城市的基本概念

随着气候变化对于人类影响的既定事实，国际社会对于气候问题日益关注，世界各国为应对全球变暖而承担的CO_2减排任务也在不断加强，低碳城市的概念应运而生并成为城市研究的热点问题。低碳城市要求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CO_2排放处于较低水平。就是在城市实行低碳经济，包括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能源生态体系。具体而言，我们可以这样界定低碳城市，即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公务管理层以低碳社会为建设标本和蓝图的城市。

（二）北京建设低碳城市的重要意义

中国目前处于快速城市化的时期，GDP在过去20年间保持近8%增长速度的同时，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也对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资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北京的发展需要。加快北京低碳城市建设，不仅是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低碳城市建设是缓解北京能源消耗的路径之一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人口密集，资源消耗明显的城市。北京工业的能源消费占全市的近50%，交通占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85%。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北京实有房屋建筑总面积2.9亿平方米，每年的建筑能耗达到1700万吨标准煤，超过能源消耗总量的1/3。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涌入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将会加剧城市能源消耗总量增加。这就迫切要求发展低碳经济，加快低碳城市建设，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从而缓解北京能源消耗的问题。

2. 低碳城市建设是保护和改善北京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

北京城市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交通噪声、城市固体垃圾处理等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指标虽然逐年得到改善，但是依然还存在严重问题。例如，机

动车尾气排放问题。北京市政协关于机动车总量调控与需求管理问题的调研报告指出，由于购买车辆的门槛低，使用成本低，市民绿色出行意识低，替代出行方式的服务水平低等原因，截止到2010年2月底北京汽车保有量已达413.2万辆，其中私人小汽车329.1万辆。城市中心区过多的车流量导致交通拥堵严重，加重了城市中心区的环境污染。

3. 北京实施低碳城市建设会起到示范引导作用

目前各个城市政府为了提升城市形象，吸引更多投资，拉动城市经济生产和社会消费而进行不懈的努力。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2007年公布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均作为重要的竞争力指标，是城市社会发展的指标。很多城市的政府都认识到，不进行低碳发展不仅没有前途而且最终要受到限制和惩罚。因此北京积极构建低碳城市，不仅能够给其他城市低碳城市建设提供参考经验，又能为北京创建世界城市奠定基础。

（三）北京发展低碳城市的可行性分析

从北京奥运到2020年，北京城市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建设世界城市和宜居城市。这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而且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产业转型、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举措，还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形成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必然选择。在第六届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著名城市专家、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已经提出，北京已具备建立世界级低碳示范城市的条件，“十二五”期间应率先在全国建设低碳城市的论断。北京的低碳城市建设不仅刻不容缓而且完全具备条件。

首先，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政策资金具备优势。北京已经意识到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因此，在调整结构布局方面，北京市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关停和退出了一些资源消耗大、影响生态环境的产业项目。在资金方面，北京也加大了投资力度，从2001年至2006年的环保投资约计970亿元，占GDP的3%以上，在全国名列前茅。其次，积极推进环保项目，取得初步成效。北京一直积极推进节能环保项目进行，到2007年底，累计建成节能住宅2.48亿平方米，累计建成节能建筑2.75亿平方米，完成既有居住建筑改造60万平方米，公共建筑改造156.3万平方米。北京不仅累计安装了180万只节能灯，还完善了节能产品的标准制订和市场准入机制。再次，早已确立了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战略。《北京交通发展纲要》的出台确立了公共客运在城市日常出行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坚持公益性定位，实行低票价政策。此外，北京市公交运营的全部车辆均为绿色车辆，其今后的更新工作也以发展节能环保

的新能源车为主。最后，相对完善的节能环保制度与措施。北京制定了《北京市“十一五”时期能源发展及节能规划》、《北京市节能监察办法》、《北京市加强节能工作实施方案》等大量的政策措施，形成了全社会促进节能的制度环境，为北京进行低碳城市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北京发展低碳城市的必由之路

目前世界经济正朝着“低碳化”的方向发展，纵观20多年来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情况，都充分证明要想真正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实现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全球资产配置与转移方式全面向低碳经济转型。因此，随着人们对低碳发展的认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城市提出建设低碳城市的理念，并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下，依托自身的资源、产业特点探索适宜的发展方式。

（一）国外低碳城市建设对北京的借鉴意义

在世界性大都市的建设中，英国是低碳城市规划和实践的先行者。伦敦市在低碳城市建设方面更是起到了领跑者的作用。2007年，伦敦市长利文斯顿发表《今天行动，守护将来》（Action Today to Protect Tomorrow）计划，提出了在2025年使CO_2排放量相比1990年水平减少60%的目标。《伦敦气候变化行动计划》（London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更是制订了许多具体措施和目标，致力于解决绿色家园、商业、能源效率和运输等问题。

伯明翰曾经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中心，但是随着资源的枯竭和产业专业而逐步走上衰落。经过在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方面的努力，伯明翰又发展成为一座富有文化内涵的会议、展览和商业旅游城市。其成功转型的真正原因在于产业定位明确，将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金融、咨询、零售、会展等行业作为重点，培育创意园区，建设知识城市，并成立了自己的文化产业区。

丹麦哥本哈根则是分两个阶段实施低碳城市战略。第一阶段目标是到2015年将全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0% ，第二阶段是到2025年将排放量降为零。在推出的50项建设低碳城市的措施中，涉及了推行风能和生物质能发电，实行热电联产，推广节能建筑，发展城市绿色交通，鼓励市民垃圾回收利用，依靠科技开发新能源新技术等方面。[①]

综合上述国外低碳城市发展的情况，可以发现，不同的城市虽然选择了各式各样的低碳发展模式，但从根本上讲，各个国际城市都意识到了低碳经

① http://www.china.com.cn/fangtan/zhuanti/2009-07/08/content-18092404.html.

济的核心是新能源技术、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因此，各个城市纷纷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入手，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积极探索低碳技术的创新以及新能源的利用与开发。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低碳城市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 总量跃居世界前列。在这一增长过程中，工业生产领域始终是主导力量。1991 年以来，第二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基本上在 60% 以上，工业发展比重大的产业格局，导致我国碳排放量也逐年快速增长。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的数据显示，2009 年中国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 9%，而全球范围的此类排放呈下降趋势。中国成为首个单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 70 亿吨的国家，世界第二大排放国，美国与中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于 2008 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排放国。[①]

首先，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求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相应的转变。由于我国最初具备劳动力资源充分的优势，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具备了相对的优势地位，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在于对生产要素投入的过分依赖，而没有形成生产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方式。在全球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这种高投入、高消耗、粗放型增长的传统经济模式必然难以为继。其次，各国在进行低碳城市构建中都积极探寻发展方式的转变。低碳经济作为一次深刻的产业革命，不是宣传口号，也不是单纯减碳，而是一种新的产业模式，因而，各国在创建低碳城市的过程中，都在积极探索全新的低碳产业，并对已有产业的低碳化进行调整。更重要的是，围绕低碳形成的低碳技术研发、低碳产业的开发与建设等都应运而生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北京已开始探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道路并且成效显著。近年来，北京市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降低能耗，不仅推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形成服务业主导型的经济结构。2008 年 1 月，北京市服务业比重已超过 71%，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领先中国平均水平 30 个百分点，率先在国内构建起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09 年上半年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 74.6%，且万元增加值能耗仅为全市万元 GDP 能耗的一半。

---

①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EnvNews/idCNCHINA-2464020100611? feedType = RSS&feedName = CNEnvNe.

（三）北京发展低碳城市的政策性建议

低碳问题是一个涵盖了气候、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内涵的综合性问题，其实质和核心是一个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在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下，我们要从思想上转变传统的发展观念，积极探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进而为北京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寻找新的突破点。针对“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这一目标，主要有如下几点具体的措施：

1. 尽快制定首都低碳城市发展规划，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北京的示范带头作用建议在“十二五”规划准备中应确立建设低碳城市的目标。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第二阶段的目标，到 2020 年左右，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国际城市的地位。毫无疑问，届时的现代国际城市标准之一无疑会是低碳排放。

2. 尽快建立低碳标准体系。建议北京加紧研究企业碳排放标准的衡量体系，设定行业排放上限，并借助环境交易所等机构进行排放权等市场交易。这样不仅能对企业进行良好的控制，而且能利用碳金融手段，建立低碳投资机制，设立低碳技术奖励基金以及利用股市吸收社会资本。

3. 调整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形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实施技术创新，提高技术水平。政府应制定详细的低碳技术发展的路线图，采取综合措施，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为技术创新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不断促进生产和消费各个领域高能效、低排放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逐步建立节能和提高能效、洁净煤和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以及自然碳汇等领域的多元化低碳技术体系，提高产业化发展水平，为低碳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4. 加大绿色交通的投入力度。目前，北京市的私家车数量仍然增长，除公交车乘车环境不好，人多以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公交车的速度不够快。而公交专用道在真正的实施中也不尽完善，存在违规现象。因此，需要在低碳城市发展理念指导下对道路交通进行绿色设计和规划，这直接影响到居民通勤和出行的方式选择。便利的公共服务点的设立和优化的公交系统可以大大减少居民开私家车的选择，为城市交通低碳开辟途径。此外，应继续加大可再生燃料的研发和使用力度，尽可能采用推广新能源车，并辅以政府的财政支持及补贴。

5. 加大低碳生活的宣传力度。需要加强对城市居民的低碳消费观的教育。推广应用节能产品，鼓励节约用能，倡导环保。建议对包括各有关委、办、局在内的市政府部门负责人进行低碳经济发展的理念培训，分期分批举办培

训班。并朝着建立“低碳政府”的目标迈进。北京市政府可以成立一个“低碳经济协调领导小组”，各种规划和计划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等都应经过该领导小组的讨论，以确保与首都低碳发展方向一致。

综上所述，北京未来的十年是发展世界城市、低碳城市的关键阶段，我们应抓住这个机遇，转变发展方式，积极培育低碳生产方式。尽早地建立起低碳衡量体系、评价标准，进一步增强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创新能力，为北京建设低碳城市、世界城市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使北京低碳城市建设具有可复制性，在全国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从而推动全国低碳城市的建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 刘丹萍教授 研究生 陈姿璇）

低碳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与竞争

目前，作为中国首善之区的北京市已迈入了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发展新阶段。“十二五”时期对首都北京来说，既是后奥运时代、后工业化社会时代，也是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社会、建设低碳城市的时代，是建设节约型城市的时期，也是通过加强有效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国际城市品位的时代。要进一步提高首都北京服务国家政治外交功能，提升北京作为全国国内国际交往中心的功能，强化作为亚太地区区域性国际城市的综合功能，辐射东亚乃至世界，为逐步迈向绿色现代化世界城市的目标奠定基础。

美国宇航局航测到南极东部冰盖每年融冰570吨，说明全球气候在变暖。过去100多年，人类向大气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CO_2，使CO_2当量浓度增加了约60%，全球平均气温也因此上升了0.74 °C。全球气候变暖导致部分生物物种灭绝，生态环境恶化，极端天气现象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海平面上升，这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在气候危机下，“低碳”的理念日益在生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推广。城市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中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超过75%的温室气体从城市排放，世界上很多城市开始以低碳城市作为其发展的目标。

2009年12月7—19日，超过130位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在联合国历史上史无前例，所有这些领导人都承诺应对气候变化，所有国家都表现出了要采取行动的意愿。

哥本哈根会议虽未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基础和行动指南。

"十二五"期间及未来中长期，北京仍将处于城市化、国际化快速发展，并逐步向现代化世界城市迈进的关键时期，对能源的内在需求将保持较快增长，也带来碳排放的进一步增加。低碳发展带来的全球交流和合作是当前国际合作的一个热点，也是完善北京市低碳市场机制的重要机遇期。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关注意味着巨大的技术和设备的需求，低碳技术蕴涵的商机是各国新的竞争领域，北京市需要借助低碳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

一、环境与能源领域国际合作的现状

加大环保国际合作的力度已被作为21世纪中国环保工作的重点。我国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合作重点在能源、环境等领域，除了资金还有技术等合作。1997年以来，中国从世行、亚行等机构获得用于环境治理工程的优惠贷款累计达32亿美元，获国际多边金融组织赠款4.2亿美元。目前，中国国际环境合作正向深层次、多渠道、全方位推进，推动了中国重点流域、区域、城市的环境治理和环境质量改善。

为控制首都大气污染，北京市利用亚行贷款实施陕北天然气进京工程，从根本上调整了北京的能源结构；北京奥运会前，北京市还通过与法国巴黎开展友好合作，利用法国政府提供的2000万法郎低息贷款，增建16个空气质量监测子站。世界银行向北京环保项目二期工程提供3.49亿美元贷款，以治理空气污染和改善污水管理系统。全球环境基金同时为这一项目提供赠款2500万美元。北京环保项目二期工程总投资为12.55亿美元，实施时间从2000年至2006年。这个项目的成功实施，使北京空气和水的质量提高到符合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标准。此前，由世行贷款的北京高碑店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已于1999年10月交付使用。位于京城东郊的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占地千余亩，规模居全国之首、亚洲第二，二期工程投入运行后，日处理污水能力达100万吨，占北京每日污水排放量的近40%，可完成市中心区及东郊地区总计9000多公顷流域范围内的污水治理，并提供工业回用水水源和农业灌溉用水。2010年前北京市建成16座新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及其他排水设施，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日益高效地得到处理，北京周边的河、湖、沟、渠，日益变得透亮起来。2004年4月，北京市与意大利签订了关于进行生态城镇、风沙治理、环境教育以及培训等四个项目的备忘录，如北京及阿拉善地区风沙

治理项目。2005 年 11 月，中意北京“绿色奥运”环保合作大会签署了奥运村太阳能热水项目，奥运大厦太阳能热水系统项目等合作协议，项目完成后运行良好。2008 年 8 月 12 日，国际奥委会、北京奥组委和北京市环保局共同举办了第一次环境问题观察员圆桌会议。来自伦敦 2012 年夏季奥运会、温哥华 2010 年及索契（俄罗斯）2014 年冬奥会、新加坡 2010 年青年奥运会等组委会以及申办 2016 年夏季奥运会的芝加哥、东京、马德里及里约热内卢等城市的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巴西里约热内卢获举办权）。北京市环保局介绍了北京市七年来为履行“绿色奥运”承诺，在大气污染治理、全面改善生态环境以及环境宣传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及经验。[①]

二、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的建立

2009 年 11 月 25 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2020 年中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 ~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 5 次缔约方会议。包括全球温度控制长期目标、发达国家强制减排目标、发达国家资金支持等内容的《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温家宝总理在会上指出，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近年来节能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难，但仍始终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战略任务。中国会以实际行动证实自己的诺言。早在 2009 年 9 月 22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发表题为《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讲话中，已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明确提出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将采取的重大举措。[1]

加强对节能、提高能效、洁净煤、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完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政策措施，健全管理体系和监督实施机制。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引进、

---

① 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会观察员召开第一次环境问题观察员圆桌会议，2008 - 08 - 14. http://www.bjepb.gov.cn/bjhb/tabid/68/InfoID/17376/frtid/98/Default.aspx.

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低碳和气候友好技术，提高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增强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加快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接近并超过第一排放大国美国，人均排放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化石燃料 CO_2 排放，1751—2007 年累计排放占 8.5%，低于美国（27.2%），略高于俄罗斯（7.3%），2007 年排放占 20.6%，略高于美国（19.3%），已排世界第一，人均排放与人均累计排放较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 9 月 22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将进一步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 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有显著下降。同时还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 左右，即未来十多年这个比重将提高 5 个百分点。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全国“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十二五”规划八大战略重点之一，包括通过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有专家建议“十二五”期间的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5 ~ 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再次下降 10%。

所谓排放权交易，是按照《京都议定书》协议，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可以通过向不承担义务的国家购买排放权来完成承诺，而不承担义务的国家可因此获得资金来改善环境。排放权市场蕴涵大商机。自《京都议定书》于 2005 年 2 月 16 日开始生效后，温室气体的减排量也就演化成了商品，发达国家可以把帮助别国实现的减排量充当自己国家与公约约定的减排指标。据世界银行估计，2008 年至 2012 年，全球“碳交易”需求量为 7 亿至 13 亿吨，交易值每年可达 140 亿至 650 亿美元。其中，中国将提供 1/3 的碳减排量，由此产生的交易额将超过 150 亿美元。中国虽然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之一，但因为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还不在强制减排国之列。不过，从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发展趋势看，中国最终会加入强制减排国行列。国内企业适应这种刚性变化需要有一个市场机制作缓冲，环境交易所的建设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国，前来购买减排量的国外投资基金越来越多。除了碳排放，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交易、节能量指标交易、二氧化硫等排污权交易一样拥有很大市场。

国际碳交易，主要是目前实施的 CDM 项目的碳交易。联合国发起的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即部分发达国家签订了《京都议定书》，为了在 2012 年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承诺，一方面通过自身努力在国内减排，另一方面为了降低减排成本，向其他国家购买温室气体的

"减排量"额度。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任务，并且减排措施刚刚起步，只需要较低成本就可以实现部分减排，因此可以向 CDM 委员会申请认可来获得"减排额度"，这种减排额度类似于信用额，可以在国际温室气体减排市场进行交易，出售给需要购买"额度"的发达国家，从而获得报酬。CDM 赋予一国的 CO_2 排放额度具有交易性的特点，通过允许其买卖而达到全球减排的目标。但是，在 CDM 国际交易框架中，并非所有的温室气体减排量都是可以随意出售的。只有得到 CDM 国际委员会认可的并经过证明的确发生的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ER）才可以被交易并认为有效。简单来说，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果认为自己的某种生态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想将其出售，首先要向国家提出 CDM 申请，得到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再向国际 CDM 委员会申报。目前 CDM 执行理事会已经批准的方法共有 89 个（截至 2007 年 7 月 12 日）[①]，随着 CDM 的发展，这个数字还将不断更新。

北京环境交易所，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下，在国家发改委、环保部等部委和北京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北京环交所立足于环境权益公开交易一个中心，围绕"节能环保技术转移"和"排放排污权益交易"两条主线，搭建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交易平台，专业从事节能环保技术交易，SO_2、COD 排污权交易，节能量交易以及碳汇交易等有关业务，引领我国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走向，利用市场手段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并推进企业的技术升级和行业的科技进步，在国际市场获得话语权。业务方面，主要在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交易、节能量指标交易、二氧化硫、COD 等排污权益交易以及温室气体减排量的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方面发挥作用。

节能减排市场机制的建立，是奥运后北京城市环境保护工作新的重要举措。2008 年 8 月 5 日，北京环境交易所在北京金融大街正式挂牌。标志着中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事业从单一的行政配置向市场化配置的重大转型，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行方式，有利于完善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奖惩机制，有利于完成"十二五"期间节能低碳的约束性目标，并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

2009 年 8 月 5 日，国内自愿碳减排第一单交易达成——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 8026 吨碳减排指标，

---

① 这 89 个方法论涵盖范围包括：46 个一般方法论（可再生能源、垃圾填埋气、提高能效、生物质能、HFC23 及氧化亚氮等）；11 个整合方法论（可再生能源发电、垃圾填埋气、水泥生产能源利用、煤层气方法论等）；24 个小项目方法论；7 个造林方法论；1 个小规模造林方法论。

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全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成为第一家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量实现碳中和的中国企业。

北京市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前景广阔。以风能利用为例，位于官厅水库南岸的北京官厅风电场，2008年7月27日一期工程最后10台风机正式并网发电。工程装机容量为6.45万千瓦，安装了43台1.5兆瓦直驱式风电机组。2009年6月，二期工程110kV升压变电站设备采购项目经国家批准立项。[3]从此，北京地区风能开发利用实现零的突破。与其他风机不同，官厅风电场采用的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风机，不使用齿轮箱，也不需要润滑油，大大减少了能耗和污染。官厅风电场的二期工程也正在前期筹备之中，项目建成后，总装机容量将超过10万千瓦。官厅风电场平均每天可向电网输送绿色电力30万度，每年提供约1亿度的绿色电力，可以满足10万户家庭生活用电需求。据测算，官厅风电场启用后，北京市使用这种绿色电力，相当于全年减排二氧化碳10万吨、二氧化硫782吨、一氧化碳11吨、氮氧化物444吨，同时节约煤炭5万吨。

三、国内碳补偿市场机制——植树购碳汇

近期新出台的《北京市绿化条例》明确提出，北京市要推进林业碳汇工作，普及碳排放知识，倡导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和实现碳中和的绿色环保理念，引导公众参与碳补偿活动。《北京市绿化条例》于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碳汇，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在林业中主要是指植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该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北京市从2008年开始启动林业碳汇工作，公众或者单位通过购买碳汇集中资金，用于大规模植树造林。平均每出资1000元，即可在北京造半亩林地，20年之内可吸收二氧化碳大约5.6吨。“碳汇”作为北京市林业工作的亮点写进了《北京市绿化条例》。《条例》规定，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认建认养树木绿地、购买碳汇、参与绿化宣传咨询等多种形式履行植树义务。《条例》还首次提出，小区绿化用地的面积和位置要在房屋买卖合同中予以明示。小区附属绿化工程竣工后，开发商应制作绿地平面图标牌，在小区显著位置进行永久公示。未按要求公示绿地平面图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罚款。

《重庆市森林工程建设管理条例》（2010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规定，对未履行年度植树义务的单位和适龄公民，各级绿化机构可以征收以资代劳绿化费。

四、北京“十二五”新的碳强度指标

据《绿色北京行动计划（2010—2012年）》，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巩固扩大“绿色奥运”成果，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资源环境约束的新挑战，全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入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推动“绿色北京”建设，促进首都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全面贯彻“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将城市发展建设与生态环境改善紧密结合，以切实提升首都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把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建设低碳城市作为首都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以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为动力，深入推进节能减排，积极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全力打造绿色生产体系，积极创建绿色消费体系，加快完善绿色环境体系，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更加繁荣、文明、和谐、宜居的首善之区。

表4-9 2012年“绿色北京”建设的节能减排指标与目标

指标名称	单 位	2008年	2012年	指标性质
1. 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销售收入总额	亿元	958	1450	引导性
2. 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	2.5	5	引导性
3. 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	34	25	约束性
4. 单位GDP能耗	吨标煤/万元	0.66	按国家下达要求执行	约束性
5. 单位GDP水耗	立方米/万元	36.62	32	约束性
6.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	吨/万元	—	按国家下达要求执行	约束性
7. 再生水利用率	%	57	70	约束性
8. 林木绿化率	%	52.1	54	约束性
9.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13.6	15.5	约束性

资料来源：北京市发改委，《绿色北京行动计划（2010—2012年）》，2009年。

为实现“到2020年北京市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升级，绿色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弘扬，宜居的生态环境基本形成，将北京初步建设成为生产清洁化、消费友好化、环境优美化、资源高效化的绿色现代化世界城市”的远景目标，到2012年“绿色北京”建设的近期目标是：通过构建生产、消费与环境三大体系，实施九大绿色工程，完善十项保障机制，为把北京建设成为绿色现代化世界城市奠定坚实基础（部分指标见表4-9）。

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和长远发展。通过切实有效的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这是我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我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巨大努力。据国家2020年的碳强度目标设计北京市“十二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目标（指标见表4-10）。

表4-10 北京市2015年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目标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	森林面积增加（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达到%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	国际约束力
中国（2020年，15年）	40%~45%/15年	4000（国土4%）	23%（比2010年提高3%）	15%左右	不具有
北京市（2015年，10年）	30%/10年（15%/5年）	国土面积的约2.6%	比2010年提高1.67%	10%	

居民的资源集约（节能、节水、节地）与环保的意识与自觉性将进一步提高，城市的蓝天数将进一步增加，保障并改善饮用水的水质水量，积极推行绿色消费，保障食品安全、优质，城市环境舒适度、宜居水平进一步改善，城市复合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五、北京提升国际化及绿色竞争力的若干对策

借鉴世界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北京在建设低碳城市的同时，注意以下问题。

（一）积极构建碳金融体系，推进碳交易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

“绿色金融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碳金融将成为低碳经济的战略制高点。低碳经济的发展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应提高对碳资源价值的认识，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培育碳交易多层次市场体系，开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证券、低碳期货、低碳基金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改变中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获取国家最大的战略权益。

国际碳交易使用欧元计价结算的需要近年不断提高。此外，美元、日元、

英镑、澳元、加元等都具提升空间。伴随各国在碳交易市场的参与度提高，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搭乘碳交易快车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加速走向世界主导国际货币的行列。中国必须抓紧这一机遇将人民币与碳排放权绑定，推进碳交易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

积极研究国际碳交易和定价的规律，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研究探索交易制度，建设多元化、多层次的碳交易平台，并且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加快构建中国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

开展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目前世界银行已经设立了总额达10亿美元的8个碳基金。此外，挪威碳点公司、欧洲碳基金也非常活跃。中国要借鉴国际经验，着手设立中国CDM基金，同时加快开发各类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衍生工具，加强全球碳金融的监管与合作。碳金融将成为低碳经济战略制高点。

（二）强化中水利用与生态补偿工作

北京市建设世界城市，水资源短缺仍是主要的资源短板和制约因子，为此，“十二五”期间，北京市要继续强化分质供水、分质排水、中水利用及雨水收集工作。分质供水工程的进一步推广、投入资金和工程设施。分质排水的设想、建筑及小区中水的利用。雨水洪水收集利用工程。

发展生态教育旅游和生态文化创意业，建立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科学可行的长效机制。对生态旅游赋予生态教育功能。对跨行政区界的饮用水源地区，如河北张家口市，建立新的生态补偿机制、水资源补偿机制及水权交易机制。市民生态环保意识与自觉性进一步提高。

（三）提升城市国际化及其功能核心区的其他对策

加强外语标识、涉外人才培训、外语学校、国际化医院、交通、信息服务，重视外文网站建设。

“十二五”期间公共服务业应增强的部分指标和抓手包括：每千人拥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数/护士数；每千人拥有具有双语教学资格的教师数等等；配备外语导购的商场数。

从2008年4月10日市民讲外语活动暨公共场所英语标识工作会议上获悉，截至2007年底，北京市已有外语人口550万人。这意味着本市每100位常住人口中就有35人可以阅读简单的外文文章，用外语进行简单的交流。自2003年以来，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和规范公共场所英语标识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截至2007年底，全市超过八成街道、近五成社区都开展了外语学习活动，全年开展的各类学外语活动超过4万次，培训、学习两万余次，讲座1400余场，参与学习人次超过65万人。

（四）诚信社会与“非营利组织”

对公益事业，要充分发挥志愿者、义工与“非营利组织”的积极作用。

另外学习借鉴国外城市如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等的诚信管理的成功经验，建立诚信社会机制，为外籍及本国外来人口、本市常住人口建立档案，采取分别管理。学习印度等国家的经验，要充分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机会，尽可能详细地收集城市人口相关信息，有利于促进人们的诚信为人和诚信办事的意识和自觉性，有效降低城市公共管理的成本，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张贵祥教授）



第五章　转变文化发展方式



借文化之力　建世界之城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世界城市集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于一身，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正是鉴于其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将建设世界城市确立为北京未来的发展目标，并在2010年北京市“两会”上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如果我们审视全球公认的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不难发现，它们不仅拥有金融中心、较多的跨国公司总部、众多的国际机构和大量的国际会议等“硬”指标，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全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控制力和辐射力等软实力。这就启示我们，在建设世界城市的历程中，文化的全球化对城市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城市能否合理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在融合中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软实力至关重要。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主要靠挖掘城市文化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文化产品或服务来实现，这些都是城市文化软实力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的合理构建已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的主要标志，也为城市跻身于世界城市提供了条件。

一、北京文化软实力的条件和优势

一个城市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主动吸收、聚合周边地区文化，进而融合、更新、创造新文化的能力。虽然北京在一些硬条件、有形的实力上与世界城市有差距，但是北京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潜力巨大，国际文化影响开始显现。

（一）厚重的文化积淀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了强大的软实力保障

北京历史悠久，秦汉以来，北京地区一直是中国北方的重镇，是我国的六朝古都，有三千年的建城史，历史上曾经作为世界城市而闻名海内外，文化底蕴十分丰富。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故宫、周口店猿人遗址、长城、颐和园、天坛、明十三陵等6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固然要使北京具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力量，但更重要的是要注重打造北京独特的文化软实力。北京的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其他城市难以相比的，在世界各大城市当中也是罕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底蕴优

势将有利于北京形成独具特色的国际大都市，对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了高起点、高平台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世界城市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提升了北京国际化、现代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三大理念全面集中地反映了社会公认的文化理念，正在成为北京现代文化的基础。以厚重的历史文化为载体，以丰富的奥运理念为基础，以高端的国际化 CBD 为起点，北京一定可以打造建设世界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美国商会会长 Michael Barbalas 认为，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影响力的增长，北京天然的政治中心优势，经济的持续良好发展，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成功举办奥运会的经历和经验等都将为北京成为世界城市奠定重要的基础。

二、北京文化软实力面临的挑战

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北京有着良好的条件和机遇以及真实的现实需要，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一）文化多元化带来的挑战

世界城市居住着相当数量的国际人口，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有着很大差异，使得世界城市呈现出文化多样性。因此说，世界城市是多元文化的中心。纽约、伦敦的国际人口比重都超过 15%，东京国际人口比重最少，但也超过了 6% 以上。而北京目前的国际人口比重不足 1%。北京固然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但要具备世界城市的文化影响力，要使具有不同文化、理念的不同的民族在北京和睦相处，就需要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宗教习惯能够理解和尊重。这对北京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宗教习俗，有些并不为我们所认同。我们不可能只选择那些我们能够接受的文化，而排斥那些我们难以接受的文化和习俗。鉴于东西方在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理念方面的差异，北京弘扬中国文化，无疑要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冲决西方文化模式，因此难免会彼此发生剧烈碰撞，且需要较长时期的磨合。城市主要功能就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这种文化权能通过制度文明、科技创新、观念先进、引领时尚借以展开和实现。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成为世界城市，城市硬体和经济上面临的挑战相对比较直接，而文化上面临的争夺和竞争将更为深刻和持久。未来，北京能否以谦和的姿态，包容的心态学习吸收人类一切好的文化；能否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

世界优秀文化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并世界化；能否在城市运营和治理、环境保护、市民生活方面提供21世纪的城市生活样式；能否在营造创新氛围、孕育时尚观念、繁荣文化艺术方面体现21世纪的潮流；能否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层次和国际化水平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正确应对，在制度和文化上不断探索和创新。

（二）城市改造中古都风貌的保存与开发

北京是全球拥有世界遗产项目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然而近年来，各地进行的造城、改城、扩城运动，已使反映老北京风貌的旧城传统建筑，以年均减少一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亡。在北京约62.5平方公里的旧城里，有关数据显示，旧城四合院传统建筑风貌区以及传统和现代混合区的面积，不到总量的40%；完全现代化风貌的区域已占40%多；道路、现代广场的面积大约占20%。原有的3000多条胡同，保存至今剩下不足500条。从大约1200平方公里建成区的大范围来看，北京的旧建筑业已成为零星的散落，整个城市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大量的新奇建筑出现在北京，许多新建筑几乎没有任何中国元素，找不到中国文化的熟悉和亲切感，从而使北京城市特征、城市风貌和城市气质模糊化。建设世界城市，北京如何能以保护和发展兼具的眼光看待传统建筑和旧城风貌，实现发展性保护而不是发展性毁坏；如何使北京成为面向未来，兼顾传统与现代，中外合璧的高品位、高境界的世界之城。虽然北京已新奇高楼满城，面对诸多尚未遏住的冲动，补牢仍尤可期。

（三）文化产业集群效应较弱

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一个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程度。北京在文化产业发展上还有些不足，具体表现在：首先，政府对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这不利于降低文化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效率，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也不利于形成文化产业价值链，发挥产业集群效应，使文化企业实现真正的整合和优化。其次，文化产业布局分散、规模小。每个区几乎都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产业，造成文化资源的严重浪费。同时，政府在管理文化产业时缺少必要的经济手段，有关税收、赞助、信贷等文化经济政策还不完善，无法起到引导文化产业良性发展的作用。最后，文化投融资渠道单一，资本市场不发达。在世界文化产业发展中，社会资本的流向是要靠政府的导向，靠软硬环境的改善，靠项目个性推介，靠外力拉动等共同作用。而我们主要采用由政府主导文化投资，融资渠道较单一的机制模式，它导致与市场严重脱节，行业垄断和地区分割现象时有出现。

三、提升北京文化软实力的对策和建议

建设世界城市，涉及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内容，也涉及首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没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在发展中容易丧失个性和特色，城市建设容易千城一面，缺乏内涵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所以，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大背景下，要发挥首都优势，提高北京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完善政策体系

近年来，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愈来愈深，一些世界城市的政府愈来愈重视文化的发展，对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目标。最为典型的是伦敦。进入21世纪后，伦敦在文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伦敦市长于2003年2月公布了《伦敦：文化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提出文化战略要维护和增强伦敦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声誉，成为世界级文化城市。很明显，在伦敦市政府的目标中，世界城市不仅在经济上是世界的中心之一，在文化方面也应该是世界的中心之一。因此，其所实施的文化战略着眼于能够维护和增强这个“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及世界级文化城市”。

实践表明，在世界城市建设中，政府行为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构建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推进北京向世界城市迈进，政府需要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各个角度去塑造、维护和提升北京的国际形象。比如，积极筹办大的国际赛事和展会宣传北京；积极引入总部经济特别是跨国传媒集团进入北京，借船出海，利用他们的平台扩大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大力支持本地文化产业集团，积极培养本地创意人才等。同时，通过政策创新吸引外资参与北京传统文物的开放与运营，保护、完善北京的人文品牌，延续扩大人文氛围，凸显“京味儿”人文色彩。

（二）重视城市空间规划，挖掘城市文化特色

城市空间是指“城市中的人们所体会到的包罗万象的感受”。而城市空间规划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是城市政府关于城市发展的蓝图和公共政策，是政府合理配置城市文化资源，保护城市文化遗产遗迹，打造城市文化特色魅力和吸引力的重要手段。

第一，合理挖掘文化资源，体现城市特色风貌。一个城市的文化能否体现城市的特色，彰显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关键在于对城市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北京在挖掘城市文化资源时，要提高文化资源配置效率，尽力克服条块分割、重复建设、自我循环、浪费资源等现象，把城市的地理特征和文

化资源的特点充分整合，强调城市发展的整体性和和谐性，塑造具有城市特色风貌的城市文化景观。同时，政府也应对城市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开发和利用，树立“开发性保护”的观念。

第二，注重城市面貌打造，保护文化遗产遗迹。城市面貌打造是技术含量极高的政府行为过程，在打造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城市本土的人文环境、民风民俗，还要体现城市的文化底蕴，避免“城市景观机械化”。因此，北京应从城市自身固有的建筑文化风格出发，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旧城改造。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延伸古城文脉，在不断固化旧城区区位优势的同时，要积极改善环境质量，并注意对首都城市传统历史风貌及文物古迹的维护；另一方面，要展现当代风采，提炼出当代文化的精髓，妥善处理现代化建设与古都风貌保护的关系，倡导在文化遗产的开发中进行保护利用，努力实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复兴，将城市建设在丰厚的文化基础上。

（三）加强文化包容度的建设，形成世界城市吸引力

和谐、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形成世界城市吸引力。不管是纽约、伦敦，还是东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社会环境和谐、开放、多元。纽约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20 世纪 80 年代，纽约市民使用的语言就多达 121 种。今天的纽约已成为全球最活跃的文化中心之一。伦敦也是一个人口结构极其多样化的城市，过去 20 年，经历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置身于伦敦街头，多元面孔已成为平常景象。东京也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化城市，只要符合规则、满足条件，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在东京发展自己的事业。世界城市建设不仅要满足本地居民的需要，更要适应和引导更广阔区域内的人群需要。文化多样性取决于社会活动和社会阶层的多样性，这就要求北京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应当是高度丰富和高度开放的，应具有极强的吸收、融合、集聚、辐射、再造的能力。这种宽松、兼容的城市文化环境，是一个城市吸引各类人才集聚的重要条件，也是培育城市创造力的最好温床。经济全球化时代，自主创新能力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而极具包容性的文化氛围则为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了不竭动力。

（四）繁荣城市文化市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世界城市的发展，无一例外都占据了文化产业的制高点。以文化产业为支柱产业之一的美国，其电影、图书、音乐、动画、游戏、体育、主题公园和其他衍生产品的开发与销售，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凸显了文化软实力的渗透作用；英国从 1997 年起把发展创意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法国和奥地利等都举全国之力做好重大文化产业品牌项目的扶持和经营；日本政府要

员甚至提出“动漫外交”的口号，要通过亲和力强的文化产品销售改善国家形象。这些国家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中都取得了各自的优势地位，发展起独特的文化产业，甚至成为该国的产业支柱和民族精神的支撑。1998 年世界银行发布《文化与持续发展：行动主题》报告，提出“文化为当地发展提供新的经济机会，加强社会资本和社会文化凝聚力”。北京应充分遵循文化产业发展规律，通过政策引导发展，以产业促进结构优化，以机制健全文化市场，促进投融资渠道多元化，催生和加速文化与经济的融合，通过培育和扶植有竞争实力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使其能够带动中小文化产业实体，形成文化产业集群。同时，要大力发展新媒体、动画等文化产业新业态，通过科技与创意的完美结合，宣传北京，塑造时尚北京、科技北京的新形象，进一步增强北京的软实力，提高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和区域辐射力。此外，政府还应该努力促进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将文化内涵注入城市各个产业发展中去，用文化产业带动城市其他产业的发展，促进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终使城市的综合实力得以提升。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交流方面，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但是，以世界城市的标准来看，北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充分发挥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三个北京”的全面建设与扎实推进，为北京赢得了全球声誉，呈现了北京作为现代国际大都市的崭新面貌。北京要以此为契机，重点弘扬东方文化，重视发挥文化底蕴的优势，凸显北京的历史文化古迹以及几千年的传统积淀的城市文化魅力和个性；大力发展国际传媒、动漫和休闲旅游等重点行业，综合提升软实力，扩大北京文化的国际控制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　王小莹副教授）

北京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难点与发展思路

世界城市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是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它集国际金融中心、全球产业中心、全球文化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居地和高端人才集聚中心于一身，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世界城市有模板可循，也就是当前获得公认的纽约、

伦敦、东京。因此，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标准、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期望以及世界的影响力去设计。而在世界城市的诸多构成要素中，文化是北京的灵魂，是建设世界城市的立足之本，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大都市，北京的文化事业、产业的发展与世界城市的期望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一、建设世界城市文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世界上各个民族愈发重视文化在发展和传播中的地位，北京从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高度出发，必须关注首都世界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打造与中国文化、京味文化相适应的世界城市文化体系。

（一）城市文化是建设世界城市题中应有之意

世界城市不是一个城市概念，而是一个区域概念；不是一个静态描述，而是一个动态建构；不是一个经济指标，而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生活质量、心理期望以及居民文明素质等一系列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世界城市不仅表现在拥有金融中心、较多的跨国公司总部、超大的经济总量和大量的国际会议等“硬”指标，更在于自身对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指导、控制、辐射和影响意义等软实力方面。因此，建设世界城市的着眼点应该是各领域、各层次、各方面的协同发展，重点是打造世界城市文化。历史上，北京曾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发达、最辉煌的城市，其代表的东方文化、儒家文化具有世界影响。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反映着中国的形象和城市发展水平。北京的改革和发展为世界所瞩目。在 2009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上，市委书记刘淇作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号召要瞄准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以更高标准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历史逻辑和现实目标都明确地宣示，首都的文化建设是世界城市建设的目标和方向之一，是政府工作和市民群众自觉的建构方向。

（二）城市文化是世界城市的灵魂，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虽然目前关于世界城市评价的指标体系还不统一，但从总体上来看，北京与其他国际城市相比，硬件的差距越来越小。这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均 GDP、第三产业的比重、外贸依存度以及 R&D（研究与

开发）占 GDP 的比重等；生活水平与社会发展指标，其中主要有人文发展指数[①]（HDI）、人均住房面积、信息化综合指数等；城市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指标，主要有轨道交通客运比重、航空港年旅客吞吐量、空气污染指数等；国际开放交流程度的指标，如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外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国际会议次数等。然而，在软件方面，距离世界城市的差距还很大，这主要体现在管理上、服务上、文化特色上。“世界城市并不仅仅以经济数据来衡量，更重要的是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在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明不断提高的同时，还需要提升文化品位，塑造城市精神。因为没有与经济繁荣相称的文化繁荣，没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文化中心地位，一个城市是没有资格被称为‘世界城市’的”[②]。在建设世界城市的历程中，文化的全球化对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城市能否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在融合中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在发展中展现自身的内在活力，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软实力至关重要。

（三）城市文化是一种低碳经济

世界城市首先是低碳城市，文化经济具有很强的产业效应。文化一直被认为主要起到知识的学习与传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和国际交流等作用。但是近年来，文化的经济功能正在逐步被发现、认同和推动。1998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文化与持续发展：行动主题》报告，提出“文化为当地发展提供新的经济机会，并能加强社会资本和社会凝聚力”。在一些地区，文化经济化的新形式和新概念正在不断出现和推出，如文化产业、新媒体产业、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版权产业等等。文化经济具有非常明显的低碳经济的特征。文化经济主要是以知识经济为发展基点，以工业设计、创意设计、理论创新为原动力，具有低污染、低能耗的特点，而且能够循环利用，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纽约市政府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1966 年纽约市电影电视生产的直接开支仅为几百万美元，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上升到 5 亿美元/年，80 年代中期则增加到 10 亿美元/年，而在 1998 年至 2000 年的三年中保持在每年 25.6 亿美元左右，

---

① 人文发展指数（HDI）由三个等量权重的指标构成：期望寿命指数、教育指数和 GDP 指数。计算方法是：单项指数 =（实测值 - 最小值）/（最大值 - 最小值），公式中的最大值、最小值由联合国计划发展署（UNDP）统一给出。另外，教育指数 = 2/3（成人识字率指数）+ 1/3（综合毛入学率指数）。2003 年北京城镇人文发展指数 0.907，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的人类发展水平，与新加坡比较接近。参见《北京日报》，2007 年 5 月 18 日。

② 郑伟，晓慧. 打造世界城市的文化名片. 上海财税，2003（6）.

而且每年25亿美元的开支还给纽约当地市场消费带来了乘数效应。伦敦的文化创意产业是伦敦主要的经济支柱。据2003年2月公布的《伦敦市长文化战略草案》披露，伦敦的创意和文化产业估计年产值为250亿~290亿英镑，从业人员达到52.5万[①]。可以说，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主要靠挖掘城市的独特文化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或服务来实现。文化产业的合理构建已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的主要标准，能为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提供强大动力。

二、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文化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从全国来看，北京的文化事业、产业走在全国前列，但从世界城市的目标来看，北京的文化事业、产业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相比、与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的期望相比、与“人文北京”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文化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世界城市文化建设重视不够，统筹和开发首都文化资源的意识和能力不够

当前首都世界城市建设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大多从经济角度以及国际交往方向来界定，从文化要素、价值观念来谈建设世界城市的尚不多见。“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文化建设的滞后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在我们大力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同时，西方的文化、价值观长驱直入，对我国的文化生态，尤其是城市的文化生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②]。世界城市是多元的文化中心，这需要使不同文化、不同理念的各民族在北京和睦相处，需要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宗教习惯等能够理解和包容。世界城市必须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这需要我们不得不面对东西方文化在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差异和冲突。北京要建设中国文化、京味文化，无疑要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冲破西方文化模式，这难免会彼此发生剧烈碰撞。对于这些，政府和社会的绝大多数民众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同时，整合文化之源、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信息技术、营销手段，拓展文化产品和服务，利用社会的资金、其他领域人才发展壮大

---

① 杨荣斌，陈超．世界城市文化发展趋向——以纽约、伦敦、新加坡、中国香港为例．中国网，2004年2月．

② 许光中．城市文化生态与现代城市文化建设．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自己等方向，自觉自主的意识还非常缺乏。

（二）文化体制、机制封闭性有余、开放性不足

改革尚不到位，远不适应世界城市建设的需要。比如，首都一些电影公司、音像出版社等长期以来全部实行事业单位体制，在国家长期统包统管下形成的“等靠要”思想是院团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有的院团经营入不敷出，却“谈企色变”，抵触情绪很大，事业单位改革进展缓慢。当前，市和区县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主要是因为内部管理不活，在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规定不健全，不能科学合理地统筹事业发展和职工权益保障关系，单位内部活力和创造力不足。同时受上级管理部门和有关制度的约束，事业单位制定内部机制改革措施权力有限，不能很好地发挥内部管理机制的作用。首都的文化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传统的工作体制、工作方式仍然以其巨大的惯性，制约和影响着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制约和影响着文化产业、事业的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事业、产业发展涉及人事、劳动保障、财政、发展改革、土地、规划、工商、税务等诸多领域，改革难度很大。改革政府管理文化的体制机制，加强政府的服务功能和行政执法功能，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人才结构不合理

人员进出渠道不通畅，高层次、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和各类专业人才短缺。从国内来看，北京人才资源优势明显，但结构不合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所必需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高端创意人才、特殊艺术人才缺乏。国际文化艺术人才竞争加剧，一些高职称、高水平的专业人才随时都有被其他国家和地区挖走的可能。当前留住人才的手段和机制主要还是工资待遇、政治待遇、身份待遇，缺乏必要和一以贯之的感情注入，不注重培养城市认同感。城乡人才分布不均衡。部分区县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单位还没有完全落实编制，缺乏具有专业水平的文化服务工作人员，出现“有设施无人员，有人员无专业”的现象，严重影响到管理和服务的水平。对于特殊艺术人才缺乏有效的培养、保护和使用政策。在人才发现、培养、使用、管理上还缺乏必要的措施，缺乏必要的人才流动机制，竞争和淘汰机制，缺乏激励机制，缺乏人才引进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才的才能，北京的文化人才资源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和整合出来。

（四）文化产品特色不足，推陈出新速度慢，创造力不够，核心竞争力不强

文化产品贸易的发展是近年来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特征。“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技术，一流企业卖观念”成为贸易领域的发展趋势。从发达

国家的贸易结构发展变化来看，美国近年来包括影视、音像制品、图书出版在内的视听文化产品出口规模已经超过航天工业出口规模，跃居其出口贸易的首位。北京的文化产品总体上科技含量少，形式陈旧，内容单调，领域性和结构性缺失；文化企业规模小，缺乏竞争力，产品和服务的集约化程度不高，知名企业、驰名品牌还不多，北京风格、古都特色还不完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不突出；文化经济政策滞后，法规体系还不完善，产业发展缺乏统一的规划和保障，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产业优势。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化产业发展落后、文化企业缺少国际竞争力、文化产品在传播过程中的折扣度高等”①。

三、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文化的致思理路

北京世界城市文化建设的目标是成为世界文化中心，把文化打造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也是一种生产力，文化产业具有隐性、低碳、高附加值等特点，符合产业发展的方向。要积极打造文化事业、产业发展的环境和体制机制，创新文化发展的路径。

（一）着重打造城市文化的北京风格、古都特色、中国品位

探索北京古都风貌与世界城市的结合点，在民族特点上下工夫，用传统和现代揉出北京特色。北京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与东京、纽约不同，这种不同最明显的就是文化的差异，如果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经济、政治已被高度同质化了，唯有文化才能打造有独特精神气质的世界城市。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北京有三千年的建城史，八百年的建都史，这是任何一个国际大都市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应该成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核心和重点。如果说建设世界城市是一曲磅礴雄壮的交响乐，文化建设则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华彩乐段。北京应当有计划、有数量、有规模地建设博物馆、纪念馆、文化聚居区，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聚居区的建设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打造如同纽约百老汇一样的文化名片、文化景观、文化场所。找出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同时又是世界城市之间的结合点。

（二）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提高政府文化建设的能力

世界城市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规制和引导，文化建设领域内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进程，政府职能转变非常重要，它关系到企业是不是真正能够活起来，产业能不能健康发展。这方面

① 李程．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现状、问题及对策．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8）．

有前车之鉴。伦敦市长2003年2月公布了《伦敦：文化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提出文化战略要维护和增强伦敦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声誉，成为世界级文化城市。纽约市政府的文化事务部提出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提高文化对于经济活力的贡献度”，而且纽约市政府专门成立了“电影戏剧和广播市长办公室”来推动纽约市电影、电视产业的发展。文化无论是作为一项公益事业，还是作为一项具有经济功能的产业，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国际先进城市的文化发展，政府在其中都起了主导性作用。提高政府文化建设的领导能力，就要像其他世界城市的政府一样，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建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规则和制度，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文化发展环境。

（三）加大国外文化人才引进力度，提高现有人才使用方式，实施文化人才发展战略

人才是创新之本，是世界城市文化的锻造者。世界城市，如纽约、伦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十分尊重、爱惜人才，包括重金吸引、培养人才，提供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待遇。世界城市的胸怀就在于能够广纳和包容各种价值观和专业技能的世界优秀人才，就在于能够提供世界优秀人才所需的经济水平、生活标准和情感认同。建立人才优惠政策，培养、吸引、用好高层次文化人才。对于首都文化建设所需的荣获国际、国内一流奖项，国际、国内知名的文化艺术杰出人才及紧缺急需人才，在聘用的同时直接办理户口进京手续。加快制定文化人才教育培训、引进文化人才等政策，选拔文化人才到国外进修、观摩、学习深造，努力培养和引进一批高层次的文化专业人才、管理人才和经营人才，造就一批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名人和文化大师，形成文化名人梯队阵容。培育文化人才市场。发挥文化群团的组织、协调和桥梁、纽带作用，建立人才中介机构。完善人才激励机制。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确立以业绩为重点的人才价值观。建立对优秀文化创意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特殊艺术人才的奖励制度。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发挥文化名人效应，探索建立以知识产权、无形资产、技术要素等参与收益分配的新路子。

（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完善法规体系

根据政事分开的原则，理顺政府与文化行业、部门、单位的关系，把人权、财权、事权最大限度地下放给基层，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单位的社会化。在事业单位推行聘用合同，实施岗位设置管理，建立健全岗位管理制度，加强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管理，建立以业绩为重点的人才使用、管理和保障制度；进一步理顺文化艺术单位与职工的关系，转变人事管理模式，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从单纯行政管理向依法管理转变、从国家用人向单位用人转

变；改变对文化事业单位资金投入的方向与方式，即在总体上保持国家逐步增加对文化事业投入的基础上，逐年减少固定投入的比例，增加动态投入的比例；解放思想，发挥优势，打破地域、行业、部门团体的界限，充分利用社会文化资源（包括人才、资金、设施、市场），实行“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进行艺术创作和生产，特别是“拳头”产品的生产。积极推行市场化的艺术生产运作方式。转变文化市场管理方式，由侧重市场准入向侧重市场监管转变，由侧重管理经营方式向侧重管理经营内容转变，由侧重权力型管理向侧重服务型管理的转变。加强文化市场的法制建设，完善文化市场的法规和条例，继续完善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监督体系，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做到依法行政、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

（五）促进文化与经济相融合，创新文化产业体系

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与特色，增强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20 世纪 90 年代后，“世界各先进城市注意到文化经济化将成为 21 世纪全球经济中的亮点和焦点，而其中文化的经济功能向城市会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因此，这些城市十分注重文化与经济的融合”。[①] 根据世界经济形态的新变化和世界城市的任务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设定的发展框架，构建北京文化产业创新体系。以资产为纽带，运用市场机制，推动联合、兼并、重组，实行多媒体经营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发展，重点发展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文化创新能力、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实现北京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变文化部门办文化产业为社会办文化产业，特别要加大非公有制经济所办的文化企业的比例，形成一个有利于吸纳国内外资本的文化产业体制，形成与信息、教育、旅游、体育等相结合，有利于发挥综合优势的新格局。实现北京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建立一个既能充分释放古都文化潜能，又能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成果的北京文化产业结构体系；建立、健全北京文化产业的市场调查机制，避免盲目发展和没有效益的发展，使北京文化产业走入市场化的轨道，并能根据消费的需求，开发新产品和新的服务品种。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同时，尽量减少、避免文化折扣。选择外国观众熟悉的文化样式传播北京城市文化，如故宫、长城、四合院等。扶持文化产品的世界品牌，加大推进力度。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李劲博士）

---

① 刘江华，张强，李雪琪．国际先进城市提升竞争力的主要经验及启示．珠江经济，2008（5）．

发展标志性文化创意产业

2009 年，国务院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明确了文化产业振兴的发展框架，标志着文化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2010 年 7 月 23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会时再次就文化创意产业发表讲话，指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胡锦涛总书记还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文化产业须重点抓好的几项工作明确提出了“三加快一加强”的指示精神。北京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地落实中央相关指示精神，不仅明确提出要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北京市支柱产业的城市发展战略，而且还提出了北京要发展成“世界城市”的更高端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据统计，2010 年 1—9 月，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1245 亿元，同比增长 12.8%，文化产业正日益成为北京市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有关打造一批国有控股的特大型文化产业集团的指示精神，北京市相关部门积极行动，加大了资源整合力度，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比如，随着 2010 年 5 月 31 日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成立，北京市出现了第一家资产规模过 200 亿元的特大型国有文化产业集团。眼下进行的北青报和京报集团的资源整合，以及北京演艺集团的成立和北京出版集团转企改制的进行，这些举措都是北京市加快推进经营性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培育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的重要举措之一。目前，我们北京发行集团也正在根据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指示精神，思考自己下一步进入资产规模和经营收入超百亿元的发展战略。

一、不同地域不同资源不同优势的城市需要有不同的定位、不同的产业设计和不同的产业布局要求

我们知道，一个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定位有其特定的规律，不同地域不同资源不同优势需要有不同的定位，不同的产业设计和不同的产业布局要

求。比如，美国的洛杉矶是电影之都、英国的伦敦是创意之都、日本的东京是古旧书店之都，在东京竟然拥有1000多家古旧书店，其中形成规模和品牌效应的高达100多家，这些古旧文物书店年营业额平均都超过1000万美元，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到东京去淘宝，德国的法兰克福是会展之都，韩国首都首尔附近的波州市是一座国际图书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标志性形象。这些都市的形象都会和某种文化产业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

我们还注意到，不仅城市对自己的产业发展有不同的追求，而且一个国家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布局也有其各自不同的强调。比如，英国把博物馆和体育作为创意产业的内容。美国提的是"版权产业"，更多考虑它的知识产权的价值和转移。所以，美国的内容产业其中包括很多软件产业，因为它提出的版权产业，电影产业和版权产业占主导地位。日本提出的是内容产业，特别是以动漫为主的内容产业，这是日本的优势。韩国提出文化产业，"韩流"和游戏在这方面占有全世界的主流地位。

之所以不同城市不同国家对自己的文化创意产业有不同的发展定位，是缘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布局有它特定的规律，比如报刊业的布局，因其会产生一定的污染和噪声，世界多数大城市一般都不会考虑将它布局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区，而是将它设置在次中心区。图书发行则一般要考虑将其营业网点放在人流最为密集的商业中心区。广电业要考虑到安全播出问题，一般都要独立占地。电影业考虑到生产和发行，它对上下游空间的设定是不一样的。会展业要求交通便利，会展中心周边最好都是高档的四星、五星宾馆，需要有大的物流集占场所。所以我们说，每个产业都有自身的要求空间和发展规律。

那么北京的定位应该是什么呢？特别是按照"世界城市"这个标准定位，北京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定位标准应该以什么为主呢？什么行业的文化创意产业内容更能彰显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的独特风采和魅力呢？这就引出我们下一个话题。

二、世界级城市标志性文化创意产业的标准和条件

既然我们把文化创意产业纳入到"产业"的范畴来看待，那么我们在讨论到世界级标志性文化创意产业的标准和条件之时，首先就必须弄清楚一个概念，什么叫"产业"？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中，"产业"主要指生产物质产品的集合体，具体地说是指经济社会的物质生产部门。一般而言，每个部门都机制专门生产和制造某种独立的产品，某种意义上每

个部门也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部门。它有时专指工业，如产业革命；有时泛指一切生产物质产品和提供劳务活动的集合体，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服务业、文教卫生业等部门。

创意产业，又叫创意工业、创造性产业、创意经济等。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经济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它通常包括广告、建筑艺术、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品、时尚设计、电影与录像、交互式互动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业、软件及计算机服务、电视和广播等等。此外，还包括旅游、博物馆和美术馆、遗产和体育等。

作为一个“世界城市”，其文化创意产业不可能是单一的，不仅需要丰富多彩的各类文化创意产业，而且还要求其文化创意产业整体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态势是高度发达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其所有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都要追求等量齐观，都要全面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一个城市若没有自己的标志性文化创意产业，那么首先它根本不可能进入世界城市的行列，其次是它也不具备独特的世界文化影响魅力。因而我们每个城市都要根据自己的特定发展历史，特定发展环境和特定发展资源来打造自己标志性的文化创业产业。

那么进入世界级城市标志性文化创意产业的标准和条件有哪些呢？我个人认为，能纳入世界城市标志性文化创意产业的考量因素主要有这几条：

第一，该产业是否已经形成固有的市场盈利模式，如果是靠财政补贴“圈养的”宠物型行业，那属于是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事业如何能进入市场成为持久产生利润的文化创意产业呢？如果是仅靠政府拨款或是依赖特殊政策给予的市场垄断生存模式，这样的行业虽然可以做大，但难以做强，最终很难发展成世界城市的标志性产业。

第二，该产业虽然已经形成固有的市场盈利模式，但是是否已经形成具有市场核心竞争力的态势，如果没有形成核心市场竞争力，那么这样的产业是无法做大，更是无法做强的。它随时有可能面临被挤垮或被淘汰掉的市场竞争威胁。所谓市场核心竞争力，主要指的是具有可持续的、别人无法竞争的市场经营能力。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逐渐积累起来的，支撑其持续发展的知识和技能的有机结合。就专业市场而言，其核心竞争力的本质是由专业市场本身内在的一般规律所导致的多个保持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知识和技能的完备结合。它由核心产品经营技能、组织协调技能和现代信息技术、组织关键能力三个要素构成，企业的品牌效应往往能集中体现这三种要素的聚合效益。

第三，该产业必须具有产业规模化生产模式，特别是要形成完整的上下

游产业链，或是能控制上下游产业链的延伸、市场销售和产品调剂，并具有一定的市场扩张力，而不是仍停留在以往的小作坊经营模式上。

三、北京目前具备成为世界城市标志性行业条件的文化创意产业潜力的行业不少，但近期能“达标”的屈指可数

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经过“十一五”规划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飞跃式的进步。特别是在市委宣传部的正确领导之下，全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各个行业和部门加快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例如，2010 年全市广播影视行业累计创收 145 亿元，同比增长 32.4%；电影票房全年实现收入 11.8 亿元，同比增长 45.7%，连续四年位居全国城市之首；全市 82 家营业性演出场所共演出 19095 场，实现演出收入 10.9 亿元，比上年增长近亿元；北京演艺集团所属 4 家改制院团全年演出 3945 场，收入达到 1.3 亿元；全市 80 家文物拍卖企业全年共举办拍卖会 195 场，成交总额 326 亿元，同比增长 158.7 亿元。

尽管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若按照“可创造经济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产业化标准来衡量和要求，特别是按照世界级城市标志性文化创意产业的三条标准和条件来衡量和要求（比如，该产业是否已经形成了稳步增长的长效市场盈利模式；该产业是否已经具备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巩固了产业的支柱地位，是否能够支配和掌控市场经营的主渠道；该产业是否已经具有形成规模化生产的态势，特别是能否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并能控制上下游产业链的延伸、市场销售和产品调剂，而且具有一定的市场扩张力），我觉得就北京市目前的情况来看，具备成为世界城市标志性行业条件的文化创意产业潜力的行业虽然不少，但想要近期内达标的仍屈指可数。

一是因为北京要打造的“世界城市”是一个必须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而“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既要为“创造经济财富和就业机会”、打造支柱产业、形成“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冲锋陷阵，又要为主动承担其在国家政府深化拓展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以及教育引导人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公益责任出钱出力。两者都要兼顾，特别是要“承担公益责任”这一条，往往会影响或减少企业的正常盈利收入。

比如，北京歌华有线 2010 年完成高清交互数字电视 100 万户的推广任务，移动电视新增终端 1020 块、总量达到 2.4 万块，地铁电视终端达到

10826个，为宣传党的声音，为丰富市民们的文化娱乐消遣内容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要承担特殊的公益责任，他们为市民们提供的“服务”很多是低于经营成本的，比如，歌华有线电视面向市民的收费每户每月是18元，可实际他们支出的经营成本在38元左右。再看北京的演艺产业，2010年北京演艺集团所属4家改制院团全年演出3945场，但为了兼顾更多不同收入群体的市民们都能消费得起看戏“门票”的支出，他们的很多门票只卖40元，远远低于经营成本。由于这些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在一定时间内自身消化掉这部分因承担公益责任而造成的“赔钱买卖”，因而，短期内要求这些产业完全依靠产业的自身发展来支撑所属产业的发展是很难的。

二是因为北京的大多数文化创意产业行业由于客观环境、相关政策、历史成因、转企改制起步晚等因素，与世界城市标志性文化创意产业的标准和要求均有较大差距。也就是说，我们有些行业要么是距离世界城市先进级别的差距过大，要么是一旦失去政府保护性政策和扶持措施，失去财政补贴，一些行业抗拒市场风险，抗拒市场打击的能力还有待大大提高，还需要走过一段很长的路子。

例如，北京文化演艺产业，由于一些演艺剧团改制较晚，刚迈开企业化经营的路子，短时间内暂时还难以形成较大规模的创收盈利，因而距离产业做大做强的日子还会有些时日。

另外，体育产业经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有了卡足发展，但是距离世界性的产业生产规模化仍有太多路子要走。比如，伦敦的体育产业就是一个颇为赚钱的行业。当球迷们在足球比赛或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看台上摇旗呐喊、吹口哨的时候，每个人可能都花了几十英镑甚至上百英镑购买入场券。据报道，伦敦的体育设施一年的收入大约是50亿英镑，大约占英格兰经济的1%。相比之下，体育设施诸如鸟巢等场馆的如何高效利用对我们仍是一个难题，体育产业的盈利模式始终是困扰这个行业发展的艰难命题。

再看广播电视业，北京的广播电视近年来成就突出，有“次中央电视台”之称，不论节目内容和收视指标在全国都属排头兵。但是由于北京首都的特殊地位，使得它在一些节目的经营上须更讲究政治导向和更讲究艺术高雅，对一些介于可播出或不可播出界限的导向不突出或精神文明格调不高的媚俗文化节目，通常是不可能像外省市电视台那样轻易就让它播出。可是，这些节目往往可能带来较高的商业利润。这无形中也会影响其与其他省份电视台的收入对比。比如，以中国各大省市广播电视业2008年度总收入为例，广东省广播电视总收入是125.13亿元，上海市广播电视总收入是115.55亿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收入是98亿元，而我们北京广播电视总收入是72.65亿元。

再看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经营情况，由于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广电总局的相关规定，歌华有线公司经营的北京地区的有线电视网点都没有开通中国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但其他外省市的有线电视普遍都开通了中国香港的凤凰卫视，这无形中也会影响到北京有线电视与外地有线电视的广告收入。因而，要完全要求循规蹈矩的北京广电产业去与一些外地不完全循规蹈矩的产业进行经济创收 PK，要付出的努力往往要更大和更多。

三是我们的一些文化创意产业收入模式过于单一，经济收入支撑体系“抗震”脆弱。

以报刊行业为例，像世界报刊业染上的怪病一样，中国的报刊业经过一段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之后，近年来受互联网的影响和打击，经济收入增长趋势也步入了一个减缓或衰退期。继世界著名的《洛杉矶时报》、《花花公子》、《读者文摘》相继倒闭之后，整个世界报业进入了衰退期，有人预言，除非有外助资金扶助，否则报业有可能在未来的 30 年内走向消亡。那么，中国的报业目前能盈利维持生存和发展的虽然数量仍不算少，但普遍不像前些年那样能创造经济上的大收大利，如果没有经费补贴，或是指令性地公费订报，很多报纸是难以维持生计的。不仅一些中央大报如此，就是北京的多数报刊情形也一样。

报刊之所以沦陷到这样的不景气境地，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人们过去需要通过付费订阅报刊才能获得的信息现在互联网已经在大量免费向读者提供；二是缘于报刊的收入模式过于单一，过于依赖广告收入。

可以说，除少数靠政府财政补贴或是靠领导机关下文公费订阅的媒体外，中国媒体目前的经营模式普遍靠广告支撑，广告收入占它们收入的 90% 以上。这样，纸质媒体一旦遇上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互联网和电视的竞争，它原先占有广告这块“蛋糕”的份额就会被它们所分割，而随着互联网、电视以及新媒体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演进和普及，纸质媒体控制的广告“蛋糕”份额将会越来越小，直至可能完全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纸质媒体不断败走麦城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但即便现在仍高枕无忧的盈利大户广播电视行业，也面临着纸质媒体可能面临的威胁。以北京电视台为例，2008 年北京电视台全台经营总收入 27.69 亿元，其中广告收入达到 25 亿元，其他经营收入为 2.69 亿元。北京电视台的现象并不是特例，全国各省市广播电视台，甚至中央电视台都普遍存在着这个情况。这些数字表明，广播电视行业同样存在着可怕的收入模式过于单一的风险，如果这种情况长久不改，一旦将来三网融合、三屏合一、IPTV 进入市场旺盛期，一旦移动收视和阅读技术的普及和电子传媒终端的数

字存储空间大幅度地提升，人们将轻松地由“看电视”转入到实现“用电视”的时代之后，那么传统的广播电视行业同样也要步入纸质媒体惨淡经营的境地。可是这项技术的广泛使用已为期不远，潜在的威胁已迫在眉睫。

四是北京地区的一些盈利文化创意产业的市场“霸主”地位一直被牢牢掌控在央企或中央一些文化产业部门，它们因长期享有的特殊性优惠政策而造就了它们行业的支柱以及对市场的垄断地位，短期内北京地方的文化产业难以在经济上与它们匹敌抗争。比如，中央电视台，它对电视频道资源的垄断地位任何省市目前是无法与它抗衡的；而北京的商业会展，一年举办各种规模的国际、国内会议多达 22 万个以上，会议、会展所创造的直接经济收入达 131.8 亿元。但其中，央企包揽了 70% 的展会和展会收入，北京市和外来地区包揽了剩余的 30% 的展会和展会收入。这种央企做大、与央企“虎口夺食”的局面，短期内我们北京地区的文化产业部门还较难以突破。

四、北京图书、音像制品发行和文物拍卖行业以及会展具有成为世界城市标志性行业先行一步的优势和条件

首先，北京图书、音像制品发行和文物拍卖以及会展行业已经形成了固有的市场盈利模式，市场化经营是这一行业领域里的主要发展模式，完全靠国家财政扶持、政府补贴、税费减免、特殊垄断市场政策等支撑该行业服务营业网点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国有、民营和私人等多元化经济构筑，造就了北京这一行业在全国市场的主导地位。目前，北京发行和文物买卖收藏行业从业人员 10 万多人，图书批发企业 1326 家，零售企业 4606 家，合计 5932 家，批发和零售总值 280 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此行业总产值 400 亿元的 70%。而北京发行集团作为北京市出版物的主要批发零售商，年图书发行和古旧书籍买卖收藏的零售产值占北京整个市场总份额的 80%。这个百分比没有包括教材和教辅材料，因为整个中国出版业的图书销售份额中，教材占 40% 以上，如果再加上教辅，估计要占 70% 左右的份额，而北京发行集团的教材和教辅材料发行只占自己整个业务的不到 10%。

其次，北京图书、音像制品发行和文物买卖收藏行业不仅已经形成固有的市场盈利模式，而且已经形成具有市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团。以北京发行集团为例，目前已形成了五大市场核心竞争力。一是拥有一批高卖场的巨大图书商城网点，如西单图书城，每年销售额 5 亿多元（2010 年度实现销售 5.5 亿元）；王府井图书城及中关村图书城及中国书店的古旧图书城，这三个卖场的年销售额全都超过了 2 亿多元，亚运村图书城、望京图书城、王府井

外文图书大厦等年销售额也都超过 1 亿多元。全国最大销售量图书城排名前 5 名北京发行集团榜上占三名，排行榜前 10 名北京发行集团则占有 5 名。二是拥有世界最大型、科技含量最高端的图书物流配送中心，北京发行集团位于通州台湖的北京国际图书城建筑总面积 25 万平方米，投资 10 个亿，年配送 50 多万个品种，10 多亿册图书，配送销售达 50 亿元（其中 15 亿元为自己配送发售）。在配送环节，我们还实现了中盘物流配送中心配有电子标签系统、自动分拣机退货系统、主配线及流水线系统等世界先进的物流设备，以按品种拣货模式为主，为批发、零售、网上书店等多种类型客户的订单订货提供配送服务。目前我们已经与全国 580 家出版社的 576 家、254 家民营图书公司、83 家音像公司、380 多家外国出版公司及代理商有业务联系，已经打造成全国最大的出版物集散中心。三是拥有以中国书店为品牌的文物古旧图书字画收藏买卖一支专业队伍和收藏拍卖一条龙队伍。北京发行集团属下的中国书店，以北京的琉璃厂为基地，在那里已经打造成了北京古旧书店字画的旗舰店，这家集团下属公司年销售额 2 亿多元，去年被国际古旧书协接收为成员，成为中国唯一一个拥有国际古旧书协会员资格的企业。还被国际古旧书协授权承办 2011 年国际协会年度大会。四是拥有一支中外文图书进出口专业队伍，年出口中国图书 1600 万册，采购进口过亿元。五是拥有一支设施完善的图书销售网络和世界尖端的信息搜集系统，我们投资 3000 万元建设的北发图书网 2010 年实现网上销售额 2500 万元，未来几年将依托通州台湖国际图书城物流配送中心为依托，争取突破年销售额 2 亿元。

最后，以北京图书、音像制品发行和文物买卖收藏行业为北京地区，甚至全国、全亚洲为龙头老大的北京发行集团，已经具有产业规模化生产模式，特别是正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或是上下游产业链的延伸、市场销售和产品调剂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并具有一定的市场扩张力，早已摆脱了以往的小作坊经营模式。比如，我们的北京国际图书城常年汇集 1290 多家国内外出版社、图书、音像发行公司的全品种图书、音像制品，为全国图书批发商、零售商、机关团体、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图书馆等客户提供了“365 天的一站式”采购场所，并形成常年图书会展和每月固定两次的逢 15 日和 30 日的全国书市大集。

五、做大做强北京图书、音像制品发行和文物买卖收藏行业的未来努力方向

对于北京发行集团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四个意识”：

首先是服务意识，图书、音像制品发行和文物买卖收藏行业都是处于市

场最前端的行业，因而服务意识特别重要，过去书店卖书就行了，现在则要求书店不仅要卖书，还要把书店打造成读者的心仪之地。因而书店的布局和建设将会像要求现代影院一样，朝着舒适、方便的方向发展。

其次是创新意识，以理念创新来引领发展模式创新。这是因为几个因素的变化，一是现在人们由于交通工具的改善出行的半径扩大了，购物距离扩大了；二是供货品种增多了，人们的选择范围更多样化了；三是网络销售的形势出现后，远程购物的现象会更频繁了，所以我们的市场理念也必须注入更多的创新意识和理念，要把我们的服务卖场办成读者和客户的心仪之地。

再次是扩张意识，强调的是企业不仅要有跨地域的扩张，更要有跨行业的扩张，否则，产业就无法做大做强。以举办上海世博会为例，我们一定不能办成仅是中国人自娱自乐的世博会，若那样的话，我们承办的国际活动就可能让外国人失去参与的兴趣，造成外国访客会来者不多，而最后有关的活动就有可能只能成为赚赚中国上海以外的外地人的钱的一次聚会。只有具有跨越地域、跨越行业的服务和业务扩张意识，我们的事业发展才能最终向世界冲刺。

最后是资本运作意识，上市运作，做大做强。

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做好以下几项具体工作：

1. 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造工作，进一步做大做强图书发行主业。2011 年 1 月 20 日市委宣传部部长办公会正式批准了我们北京发行集团的改制方案，这为我们集团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有一个发展新机遇。通过股份制改造，有利于我们企业建立更加适合市场经济环境的新体制新机制，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切实提高企业资产运营效率和整体经济效益；通过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人，可以充分发挥股东间的协同效应，借用合作方在客户资源、渠道资源和技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极大地拓展企业的经营领域和业务范围，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和跨所有制发展，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2. 以大型图书商城和通州台湖图书物流集散中心的地利和地产优势为基础设施硬件，打造首都的“文化地产商圈”。北京发行集团属下的五大图书商城、西单图书商城二期工程、通州台湖图书物流集散中心的地产，如能把书业以及文化的优势最大化地嫁接到地产上来，打造成文化地产商圈，那么其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将是不可估量的，而绝非是这两者之间的简单相加。又比如，集团属下的中国书店是中国最大的古旧书店，它就位于北京和平门外闻名中外的京城琉璃厂文化街，琉璃厂有许多著名老店，如槐荫山房、古

艺斋、瑞成斋、萃文阁、一得阁、李福寿笔庄等，如果我们能在这里以中国书店为主体，建立一个5000平方米的中国古籍书店大厦，集古书修复、鉴定、展示、拍卖、教学于一体，那么，这种浓郁的古旧书籍字画文化地产氛围会给我们北京古城带来更诱人的魅力，同时也能带来更实惠的经济效益。目前，国内有些图书发行企业刚一上市，融到一些资金，就忽视图书发行主业，而以“文化多元化发展”为借口，主张进军房地产、旅游、宾馆等领域，这种做法是欠妥当，也是欠思考的。因为房地产、旅游和宾馆等领域它们生产对象的实体、技术手段及运作平台与图书发行行业都是完全不同、相互分割的，其资源无法有机整合，人员和机构间不能协同，不同业务之间无法融合起来。最后非但主业没搞好，地产开发也会陷入困境。

3. 着力打造通州台湖图书物流集散中心的品牌，确保其“五大中心功能”在全国业内的龙头老大地位：全国图书集市中心、全国图书配送中心、全国图书“馆配”中心、境外图书订购中心、全国图书数据采集中心。据商务部公布的相关数据，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为总成本的8%～9%，我国的平均物流成本为20%。另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出版行业的物流成本则为24%～25%，而我们北京发行集团的物流成本是11.32%。可以看出，我们北京发行集团的物流成本具有很强的竞争态势，国内其他同行企业想要在物流方面形成对我们的竞争威胁短时间是难以做到的。因而，只要我们保持这个优势，就能做大做强图书发行主业；只要我们借助并发挥这个优势，就能依托图书发行主业延伸和扩大产业链。

4. 发展和做大北发图书网，打造境内外图书销售的最大网上销售平台，特别是力图开发国外图书销售市场。2010年北发集团境外图书销售达到530多万元，今年应当有更大飞跃（厦门外图年售中国台湾书籍达4000多万元）。北发图书网拥有四大优势使得它有可能成为中国境内外图书销售的最大网上销售平台。一是有着台湖图书物流基地为依托，能低成本、高效率运营；二是北京发行集团已经与中国台湾书业开通了“海峡两岸出版物信息交易平台”，两岸读者可以通过这个交易平台网上订购所需图书；三是北京发行集团属下的北京图书进出口公司拥有图书进出口权，这项特许权有助于北发图书网开展国外售书业务，而且，目前我们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就设有一家书店；四是北京发行集团属下的中国书店，其主营的古旧书籍和字画业务最适合在网上“开设高端销售书架”，供海外喜欢收藏的人士光顾。

我们注意到，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人走出国门的越来越多，不仅中资机构遍布世界，中国劳务人员输出很大，中国海外留学生比比皆是，中国海外新移民也不断增多，外国人学习中文、阅读中文的也越来越多，因而

中文图书在海外的市场也会越来越大。我们一定要整合集团的整体优势，把网上书店、网上销售尽可能开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将通过外文书店和图书进出口公司以及以经销古旧书为主要业务的中国书店，大力发展海外主营业务。我们还可以探索如何通过在海外设店经营、参股、收购、兼并等多种形式，寻找海外合适代理商、积极组织国际出版发行行业展会、建设海外出版物网络销售平台等多种方式，大力拓展海外出版物销售渠道，推动文化“走出去”。

北京发行集团所属北发图书网最近刚荣获“2010 年全国出版业网站年会”上颁发的荣获最高奖项——“十一五突出成就网站”奖，北发图书网董事长孟凡洪同志荣获“十一五出版业网站突出贡献人物”奖。这是一项全国出版业网站建设最高等级的奖项。根据我们发行集团 2008 年制定的总体规划，北发图书网的未来发展设“三步走”的战略思路：第一步，力争用 1 年左右的时间，进入全国网上书店第二阵营；第二步，用 2 年左右的时间进入全国网上书店第一阵营，从国有发行集团网上书店中脱颖而出；第三步，再用 2 ~ 3 年的时间，力争赶上或超过其他知名的图书发行类电子商务网站，占据全国图书发行网站的主导地位。自 2007 年 11 月 8 日北发图书网开通以来，北发集团全力推进发展战略，网站建设全面提速，2010 年实现销售 9100 万元，其中主网站销售额年均增长超过 150% 。

5. 打造全国最大的数字出版物平台。目前，数字出版受到业内外的广泛关注，但尚未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正是发展此项业务的最佳时机。北发集团这些年一直在尝试如何充分利用与国内外出版社多年来的良好合作关系及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优势，通过与北大方正等一流国内数字出版技术提供方合作，建设全国最大、最规范的数字出版物平台，整合数字出版物内容资源，并通过满足在线阅读、章节下载、电子阅读器阅读、手机阅读等多种形式的数字阅读需求，率先在业内建立数字出版物运营模式，引领制定行业规则。目前，我们已经与多家出版社进行洽谈，与北大方正已经达成合作意向。

6. 借助书店会员资源大力发展各种增值服务在线业务。我们将充分利用北京市新华书店 270 多万会员的资源，大力发展以文化和旅游为特色的各种增值服务业务。

2010 年 7 月 16 日，我们和北京建设银行推出了“购书龙卡银行信用卡”，改变了过去各大书城一直实行的一店一卡、互不通用的会员卡管理模式。过去，读者去不同的书店购书，享受会员优惠，需要分别办理各个书店的会员卡。为给广大会员提供便利、实惠的服务，北京发行集团大力优化会员管理

系统，联合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推出了“新华书店（北京）龙卡”。使用这个银行卡享受消费支付、积分累计、折扣优惠、统一回馈、积分查询、优惠预定机票酒店等增值服务，一卡即可实现积分和付款等多种功能，免去了读者购书“一人持多卡”、“多跑冤枉路”的不便和困惑。下一步我们还将探索如何协调和整合集团系统内部各大图书系统、各个书店门市的不同积分返点的处理机制，开发更多增值服务功能，更多为会员读者服务，提供诸如“读书聚会沙龙”和学术讲座等等，真正实现“一卡通用，一卡多能”，并借此发展更大的会员读者群。

7. 实行跨行业、跨地域发展，拓展经营网点体系。北发集团将尝试和探索通过特许加盟、联营、直接投资经营等多种方式，在北京各区县及河北、天津、内蒙古等周边省市市场空白区域和发展潜力较大的区域迅速发展新的经营网点，占领市场空白店，实现对北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全面覆盖，并将逐步向全国甚至国外拓展企业发展链条。此外，我们也会努力探索如何在做好图书发行主业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延伸产业链，诸如大力发展电子产品、文化产品、网上销售等各类业务。一旦集团股份制改造得以完成，我们集团还将以资本为纽带，努力实现跨区域、跨行业的发展，我们将以资本为纽带，通过控股、参股及直接投资等方式，尝试与一些外省市的新华书店进行合作，实现跨地区发展，并加强与北京电视台等广播电视单位以及新媒体合作，尝试合作开发电视或新媒体的读书频道。

六、当前发展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仍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市委宣传部的正确领导下，北京市的文化创意产业高举旗帜，服务大局，服务人民，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为首都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既为首都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又为自身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下一步，北京市的文化产业要再上一个台阶，我觉得仍需思考几个问题：

1.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各个行业和部门，大多数长期以来要么是事业单位，要么是公益事业，要么是能够获得一定垄断性政策优惠的行业，因而造成了这支队伍普遍缺少市场经营意识的高级专门人才和尖端骨干，更缺少具有资本运作能力的高级金融人才；有的企业或行业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产业盈利模式，企业依靠自己的产能要么是难以养活自己，要么是活得很艰难。我感到，我们有一支特别善于完成上级交给我们各项政治任务的可靠团队，不管是奥运会还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他们一定会按质按量地出色

保障任务的完成，但却缺少一支能自己开拓市场，寻找商机，不断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高级尖端人才队伍。对有的单位或部门来说，如果没有上级的项目，没有上级的拨款，就有可能无米下锅，或找不到食吃，这种“家养”似的产业或企业一旦“断奶”就会举步维艰。

2. 与其他物质生产行业或产业相比，文化创意产业由于其涉及精神产品制作，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其市场行为更容易受到行业主管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行业监管是政府的职能，这毫无疑问。但问题是由于代表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其市场行政干预常常很难影响到民营或私有经济。换句话说，行业主管部门的政令很难约束民营或私营企业的市场行为，因而作为政府归属和领导下的国有企业往往就成了在市场竞争中被束缚手脚的被动企业，从而失去与民营企业竞争的优势。另外，个别政府部门领导或工作人员也习惯于用政府的工作和办公模式管理和约束所属企业，长期如此有时容易造成企业过度依赖上级管理部门，另外，有时也容易削弱国有文化企业的盈利创新能力。比如，盗版行为，政府有种种规定和惩罚措施，但这些措施和规定往往只能约束住正规的国企文化创意产业，却很难约束得了大批民营和私营企业的盗版行为，这就是近年来为什么在音像制作产业里民营和私营企业有越做越大，甚至把国有企业挤垮之趋势。

3. 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不足，打击侵权力度不够，甚至政府一些部门采取“打鸟”政策——“开一眼闭一只眼”，特别是互联网的侵权和盗版，已经造成了全国音像产业的几近崩溃。以北京音像公司为例，这是一家拥有高深制作技术和人才队伍的著名国企，该公司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一直产销旺盛，鼎盛时期能买楼置地，成了全国最有影响力的音像发行公司之一。但是后来因为盗版猖獗，企业经营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今便一蹶不振。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2009 年时逢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大庆之时，全国只有北京音像公司一家借资 20 万元从新翻唱和灌制经典红歌《歌声回首 60 年》唱片光碟，其他的经典红歌光碟均是社会上小作坊的简单复制，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很多音像公司经济状况困窘，拿不出资金翻唱。由于市场上缺少这样高质量的新唱片光碟，北京音像公司这套光碟出版发行之后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但尽管如此，北京音像公司也不敢出大投资投入生产这套光碟，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形成市场畅销产品，他们的投资和辛勤劳作就会因盗版而经济效益上无所收获。

4. 文化创意产业的进出口关税问题严重影响和妨碍文化产业的“请进来”和“走出国门”的问题。文化创意产品的进出口关税政策能否有别于其他一般商品的进出口政策，一方面对“走出国门”的文化创意产业加大关税

优惠政策扶持力度，因为与普通商品不一样的是，文化创意产业既能为国家带来外汇收入，又多多少少能从外宣角度提升国家形象，我们政府部门能否针对不同的文化创意产业给予免除或减少关税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对“请进来”的文化创意产业如果涉及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回流”项目上，更要在关税减免问题上给足优惠条件，特别是当涉及是珍贵的中华传统文化回流或是这些回流“产品”只是用于收藏和观展而不进人商业拍卖场所时，能否不按一般商品非要征以高税，以便有利于我们对这类相关产业做好中华传统文化的回流工作。因为对这类产品不同于现代工艺产品和艺术品，它们是不可再生的，本来在国外发现就不容易，征集回国本身花费就不菲。

5. 适当增加相关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转变中国民众长期以来一直把文化产业看作公益事业的传统观念，不能一谈收费就谈“虎”脸色变。应当让文化创意产业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运作，这样文化企业才能正常发展。比如，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主营北京地区的有线机顶盒业务。该公司近年来为北京市民收看有线电视服务作出了功不可没的业绩，他们向每户市民免费提供一部机顶盒，10 米电视天线，并帮助北京市民逐步实现了由标清电视向高清互动电视的过渡。按照他们的服务成本每户市民每月应收 38 元，但是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每月只收 18 元。为了能有更好更大的发展，歌华公司曾多次拟提高每月收视的标准以补贴亏损部分，但很多市民不予理解，更不同意“涨价”。他们对电话部门每月收取座机费 28 元钱这种明显不合理的做法没有异议，相反却对歌华公司欲提高月收视费的做法耿耿于怀，就是因为许多人一直存有文化产业是公益事业的传统观念，不消除这种观念就会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的成本核算和资金筹措，进而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的长足发展。

6. 国内目前没有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专业评估公司，这也成为束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项瓶颈。由于文化创意产业九大门类形成产品的差异性比较大，人们在进行估价时也就存在很多不同的考量标准。以古旧书画为例子，从文物角度讲，古董的鉴定就需要有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而出版行业就会有专门的出版经纪人，虽然都归属文化创意产业，但在评估的时候却需要对细分领域有相当的了解，因此一直以来关于文化产业的无形资产评估体系都还没有很清晰的标准，这将会影响到文物收藏行业的融资上市和资本运作。

七、当前图书出版业所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1. 北京市相关文化创意产业部门和单位努力落实中央、北京市委有关做

大做强文化产业的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宣传部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北京市支柱产业的城市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各项工作进展明显，取得了优异的业绩。据统计，2010 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1600 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为 12.6%。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速度近年来明显加快，创造的产业增加值已经超过批发零售、房地产、商务服务、交通运输等行业，而且已经成为北京市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数据显示，2006 年至 2009 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 21.9%，高于全市 GDP 增长率 7.5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效应、集群效应已初露端倪，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市已有文化创意企业单位逾 5 万家，从业人员 114.9 万人。

北京市文化产业收入增幅高达 24%，演出、动漫游戏、影视、出版、新媒体收入增幅达 40% 左右。文化产业正日益成为北京市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而且，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有关打造一批国有控股的特大型文化产业集团的指示精神，北京市相关部门积极行动，加大了资源整合力度，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飞速发展的形势对我们既是发展机遇，更是竞争挑战，无疑对我们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我们必须紧跟形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寻找机会，同样我们北京发行集团目前也正在根据中央和北京市委关于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指示精神，思考自己下一步进入资产规模和经营收入超 200 亿元的发展新战略。

2. 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文化产业转企改制工作都已经基本完成，各项转企改革工作陆续到位，生产力焕发出更大的产能，各家出版社今年会比去年有更多更好的图书面世。2010 年出版物虽然数量增多，但质量明显下降，精品不多，超级畅销书不多，即便偶尔有一两本畅销书也被下架了，如张悟本。原因是因为许多出版社忙于转企改制，员工思想波动大，缺少精力组织好书。但今年形势会不同，完成转制后的出版社都在铆足劲筹措好书上市。因而，要抓好畅销书的出版和发行工作。因为畅销书是注意力，是人流量，是销售码洋；而且，还因为畅销书是市场的催化剂，是低增长时期的成长力，畅销书对市场的贡献能力是不可忽视的。

3. 中国的图书零售市场已经进入低增速时代，但并未进入下滑通道，因而，北京发行集团未来的发展战略定位一是仍然必须紧紧围绕纸质图书的发展布局谋篇，二是在做好传统卖场业务的同时必须开拓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展望未来，今后 5 年或更长一个时期，传统书业依然要依靠纸质图书创利生存，目前电子书属于市场增量，不会快速和全部取代纸本书。这一是因

为人们的生理阅读习惯短期内还难以适应电子屏幕的阅读方式；二是因为目前各出版社的主要盈利模式仍主要是靠销售纸质图书，如果出版社过早将图书版权卖给电子书商将会影响到其纸质图书的销售和批发，这是出版商不愿看到的，而过迟转让图书版权，其后果就是电子图书的内容会滞后于纸质图书，这当然又会影响到电子图书的销售；三是电子图书的版权目前尚有许多问题没能很好解决，比如，版权出售后如何保证和防止盗版问题，因为与纸质图书相比，电子图书的盗版或称“免费下载”更容易发生，这种行为如果不能杜绝势必会影响到版权所有者的经济权益；又比如，电子版权的转让价值或回收成本很难评估，因为版权销售者无法准确查取到或计算出购买版权者销售其版权电子书的销售“量”，因为销售者销售电子书除了销售阅读器需要到卖场直接向顾客销售外，其电子书的阅读内容是不需要进卖场进行公开销售的，它更多的形式是客户自行通过网上付费获授权后自行下载，这种交易行为可以完全背着版权销售者，版权销售者也根本无法知道其商品或“货物”的真实销售情况，这样当然也就无法公平地获得自己的经济收益，这种情况自然也会影响到电子版权交易者的销售积极性。

4. 图书发行行业内的市场竞争形势更加白热化。出版社自办的书店和民营书店已经大规模进入发行领域，特别是在馆配和团购业务上发展迅猛；外地发行集团对北京市场虎视眈眈，试图强力进入首都图书发行业；当当、卓越等第一方阵的网上书店快速发展，使市场竞争环境更加复杂；电子书、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等新的阅读方式对传统纸质图书市场带来一定冲击，整个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

5. 教材和教辅材料的书籍仍存下滑趋势。由于大中小学校招生生源明显减少，也造成课本教材明显减少，现在教材销售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生源数量。

6. 音像市场受网络下载和盗版冲击比较厉害更是整个比较疲软。需重点加强营销手段和创新形式。目前是营销手段老办法多，适合现代读者的新的方式少。

总之，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北京发行集团　李湛军）

塑造“创意之都”的城市品牌

2009年12月，北京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构想。北京的世界城市战略，就是要打造成为ALPHA + +级世界城市，成为与纽约、伦敦并列的世界第三极，即北京市要成为：世界级文化旅游区、全球化文化产业区、世界级金融商务区、国家级中央政务区。作为文化、科技和经济深度融合的产物，文化创意产业凭借独特的产业价值取向、广泛的覆盖领域和快速的成长方式，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和现代产业发展中的新亮点，它对一个城市的城市品牌竞争力具有提升作用。因此，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北京市建设世界城市的重点任务。

一、城市品牌的含义

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密集的社会有机体，是区域发展的中心。有了城市，就有城市的名称，而城市品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延伸出来的。借鉴国内外有关城市品牌研究的成果并结合笔者近几年的实践总结，笔者认为城市品牌（City Brand）的含义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地理资源、经济技术等诸要素被社会公众广泛认同的某种最具典型意义的称谓。城市品牌是城市形象的核心和内涵，是城市形象的集中体现。城市品牌竞争力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的诸多城市都已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为自己的城市品牌定位：上海成为了“设计之都”、成都打造了“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杭州塑造了“东方休闲之都”、呼和浩特建设着“中国乳都”等，而且这一趋势还在迅速地扩大。正因为这样，研究城市品牌问题就逐渐成为一种强烈的客观需求。建立城市品牌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不仅仅要有一套名称、标志和象征，更重要的是要从全社会发展的角度找到自己城市的核心价值和品牌定位，并且要整合必要的资源，持续不断地经营和推广自己的核心价值，从而逐步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建立起来。

二、城市品牌效应及定位

打造城市品牌需要为城市形象正确定位，合理确定城市的发展目标，以

科学理念规划城市，以艺术手段建设城市，以现代经营理念管理城市，大力培育城市人文精神，塑造城市文化氛围，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城市品牌构建常用方法如下：

（一）塑造城市品牌的“品牌效应”

城市品牌的“品牌效应”是与城市有关联的社会公众在选择城市旅游、居住和投资时，对品牌城市的偏爱、兴趣。品牌城市能吸引愈来愈多的社会公众前来定居，品牌城市能使人产生愉悦感、信赖感、可靠感和安全感，其地位一旦在人们心中确立，就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1. 附加效应

品牌城市能给当地居民及旅游消费者带来附加价值，有时这种附加价值甚至超过旅游消费行为本身的价值。

2. 光环效应

品牌是城市为自身营造的光环，它能有效地影响社会公众对城市自身形象的看法和评价。

3. 激励效应

城市的品牌效应能鼓舞市民的士气，能激励市民更重视城市自身的环境、文化建设，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加强自律意识，增强城市的内聚力、荣誉感。

（二）塑造城市品牌要注重城市形象的正确定位

合理进行城市形象定位，突出塑造城市个性，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形象设计。城市形象定位是城市形象建设的目标基础，也是城市形象建设的方向。科学合理的城市形象定位，使城市形象战略具体化，构造起城市形象建设框架，奠定好的城市形象基础。

1. 档次定位

不同的城市品牌在社会公众及旅游者心目中按价值高低常会被区分不同的档次。城市品牌价值是城市功能、城市环境、城市品位、旅游设施、旅游产品档次质量、消费者的心理感受及各种社会因素如价值观、文化传统等的综合反映。

2. 利益定位

根据城市品牌向投资者和旅游消费者及其他群体提供的利益定位，而这一利益点是其他城市品牌无法提供的。因此是独一无二的。运用利益定位，在城市品牌众多、竞争激烈的情形下，可以突出自身品牌的特点和优势，让投资者和旅游消费者按自身偏好和对某一城市重视喜好程度，更迅捷地选择品牌城市。

3. 消费者定位

按照城市特色与某类投资者和旅游消费者的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关联密切的推展作为城市品牌的定位。成功运用投资者和旅游市场消费者定位，可以将城市品牌个性化，从而树立独特的城市品牌形象和品牌个性。

4. 文化定位

将城市文化内涵注入城市品牌之中，形成城市文化上的品牌差异。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和灵魂，文化定位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城市品牌的品位，而且可以使城市品牌形象独具特色。城市文化内涵丰富是一个城市极具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塑造城市综合竞争实力必须从提升城市品位、丰富城市文化入手。

5. 个性定位

城市个性，主要是由它的形象来体现的，首先又是由其外在形象体现出来。因此，一定要依据所处区域，按其风情、地理、气候等条件，吸引国内外建筑设计的精华，力戒雷同和硬性模仿。城市的建筑艺术与风格，特别是标志性景观、城市雕塑景观及其民俗景观，一定要体现城市的特点、特色。

三、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总体状况

根据《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括九大行业：一是文化艺术；二是新闻出版；三是广播电视电影；四是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五是广告会展；六是艺术品交易；七是设计服务；八是旅游、休闲娱乐；九是其他辅助服务。

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确立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打造创意之都”的发展战略。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支撑首都经济发展信心的重要力量。经过几年的培育和发展，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取得较大发展。2006 年至 2009 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北京市 GDP 比重分别为 10.3%、10.6%、12.1% 和 12.6%。2009 年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 150.8 亿元，占全市 GDP 新增量的 20.1%。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第一个特点是结构逐步优化。第二个特点是布局日趋合理，文化创意产业适合集聚发展，北京市分三批认定 23 个文化创意产业区，涵盖了 9 个行业，各区产业特色鲜明，具有一定的产业规模，而且管理和运营水平相对成熟。第三个特点是文化创意产业人才会聚优势明显。2004 年至 2007 年从业人员平均增长 11.1%。中央在京文化企事业单位也形成了全国各级的高端策划人才、管理人才和投资经营人才。政策逐步落实到位，文化创意产业环

境不断优化，设立各项文化创意资金也落实到位。地方税收减免政策逐步实行，有关区县安排配套资金予以支持，辐射和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为带动文化创意企业形成集聚规模，促进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会同北京市委宣传部研究编制了《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认定和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支持集聚区建设的支持政策。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产业集聚和辐射带动效果日渐明显。各集聚区均吸引了一定数量的骨干龙头企业，集聚区年均吸引企业入驻超过1000家，特别是吸引了一些重大产业项目落户。截至2009年底，集聚区企业总数近万家，累计吸引投资超过百亿元，23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土地一级开发储备已达万余亩，为集聚区今后的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从2006年起将认定3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截至2010年7月底，已认定完成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共有23个，剩余7个名额将于2010年底进行认定。

北京市第一批1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为：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海淀区）、北京市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石景山区）、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东城区）、中国（怀柔）影视基地（怀柔区）、北京市798艺术区（朝阳区）、北京市DRC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西城区）、北京市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朝阳区）、宋庄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通州区）和中关村软件园（海淀区）。从涉及的产业类别看，这10个集聚区涉及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等6个大类，占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9个大类中的2/3。

第二批11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为：北京CBD国际传媒产业集聚区（朝阳区）、顺义国展产业园（顺义区）、琉璃厂历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西城区）、清华科技园（海淀区）、惠通时代广场（朝阳区）、北京时尚设计广场（朝阳区）、前门传统文化产业集聚区（东城区）、北京出版发行物流中心（通州区）、北京欢乐谷生态文化园（朝阳区）、北京大红门服装服饰创意产业集聚区（丰台区）、北京（房山）历史文化旅游集聚区（房山区）。

第三批9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为：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审议并通过首钢二通厂中国动漫游戏城（石景山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朝阳区）八达岭长城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延庆县）、北京古北口国际旅游休闲谷产业集聚区（密云县）、斋堂古村落古道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门头沟区）、中国乐谷－首都音乐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平谷区）、卢沟桥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丰台区）、北京音乐创意产业园（朝阳区）和十三陵明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昌平区）。至此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数量已达30家。北京16个区县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数量如表5－1所示。

表5－1　北京16个区县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数量

区县名称	朝阳区	海淀区	通州区	石景山区	东城区（含崇文区）	西城区（含宣武区）	顺义区	怀柔区
集聚区数量	8	3	2	2	2	2	1	1
区县名称	大兴区	丰台区	房山区	昌平区	平谷区	门头沟区	密云县	延庆县
集聚区数量	1	2	1	1	1	1	1	1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分析所得。

从表5－1可以看出，朝阳区以8个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独占鳌头，海淀区为3个紧随其后，东城区、西城区、通州区、丰台区和石景山区各以2个并列第三。其余8个区县均为1个。

四、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城市品牌

文化创意产业在总供给方面具有增长效应。文化创意产业所引发的巨大的需求必然刺激各行业的供给相应地增加，行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于是城市的就业水平也就相应地增加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也会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创意设计大赛及行业交流会的开展和增加培训、学习的机会而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加城市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增长。

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表现在增加与创意产业相关的投资、消费、出口需求，以及增加城市的就业水平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这种经济增长效应对城市品牌竞争力的经济效率、可持续发展能力都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增加城市的就业水平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仅有利于城市文化及品牌形象的内在提升，而且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保证。

创意可以塑造城市的品牌。文化创意产业所造就的品牌，不仅能集中体现创意主体的文化见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想像力，而且这种品牌更适合创造人们生存发展的良好文化生态环境，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的追求，

对于增强城市凝聚力、影响力、开放度、美誉度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对城市的忠诚度都有重要的作用。

文化创意产业在塑造城市的整体形象，增加城市文化含量，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方面有显著强化作用。使整个城市增值，促进城市的流量发展。经济的发展主要看流量，人流、物流及信息流在城市里交会，城市就发展了。文化创意产业不断促进城市中心和边缘地区的空间结构变化趋于优化。中心城区的文化地位日益凸显，文化创意产业附加值又为不同区位的土地增值产生了作用，而且不断地调整地价杠杆作用，使整个城市空间形成有类型的差别，而不是一种层级的差别。

五、北京市城市品牌构建的思路

北京的城市品牌要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满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符合建设世界城市的要求，同时要有鲜明的北京特色。因此，建设“国家首都、国际城市、历史名城和宜居城市”，构筑人、城市、自然和谐的城市整体形象，应该是北京将要打造的最大品牌。笔者认为打造北京城市品牌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涉及城市的方方面面，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营销思维与品牌定位。北京的发展最终是要提升北京的城市品牌竞争力，而城市品牌竞争力最核心的就是环境竞争力——软环境和硬环境，打造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标就是提高北京环境竞争力，争取更多的、高质量的国内外游资前来北京落脚并生根，经济的良性发展带来高级人才的加盟和商贸活动的繁荣，借以形成互动，推动城市环境建设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截至2009年底，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连续6年稳步增长，不仅巩固了自身在首都经济中的支柱地位，而且显著增强了北京的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推进了创新型城市建设，有力促进了北京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北京的一些遗留问题，完成从“北京制造”到“北京创造”的飞跃，从而以累积了强大的品牌资产，这是北京市一笔最大的财富，对北京市建设世界城市大有裨益。北京市的城市品牌分析如下：品牌知名度较高；城市文化较高；品牌忠诚度继续提高；品牌美誉度继续强化；城市其他资产继续挖掘。

构建北京市城市品牌所运用的品牌定位模型来自于目前最为成熟的品牌三角定位模式。模型如图5－1所示。

综合比较分析，从意识情感的角度去挖掘北京的目标消费群——投资者、创业者、城市居民的感受和需求来寻求差异，而这点正是其他内地大城市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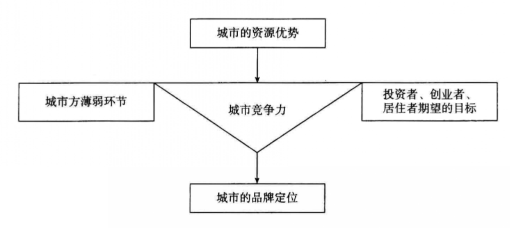


图 5-1 城市品牌三角定位模式

忽略的。从投资者、创业者、城市居民的普遍需求来看，财富对于他们都是令人向往的字眼，他们渴望获得财富，渴望生存在财富集聚的现代生活社区，他们更多地考虑投资和创业的便利性、持续性，更多地选择财富积累的优越环境，同时他们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舒适性、便利性等也存在需求。城市经营者必须通盘考虑，既要从创业投资者内心的心理需求出发进行营销规划，又要从城市居民的生活要求出发，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正好为两者提供了共同的纽带。

在这里，将北京市的城市定位为：创意之都，如图 5-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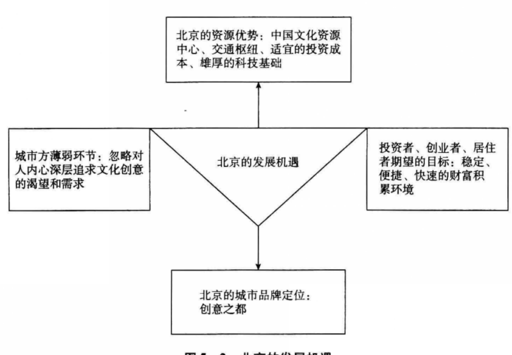


图 5-2 北京的发展机遇

六、实施与推广北京城市品牌的具体建议

（一）北京的城市品牌构建与营销系统建设

北京的“创意之都”城市品牌定位出来之后，今后一个时期内就必须围绕这一定位开展一系列的城市营销。在整个品牌构建系统中，城市经营理念、城市精神等属于城市系统中最为灵魂的部分，是北京城市品牌的核心价值所在，在这个核心价值的指导下，品牌定位方向属于核心价值的执行层次部分，由它所引申出来的一系列创作系统、宣传物料系统、公关活动系统、城市开发建设系统均属于品牌定位指引下的城市营销系统。目前北京正在通过建立全国的文艺演出中心、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中心、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和交易中心、动漫游戏研发制作中心、广告和会展中心、古玩和艺术品交易中心、设计创意中心、文化旅游中心、文化体育休闲中心等多个“中心”的方式，塑造自己的“创意之都”的城市品牌。如图 5－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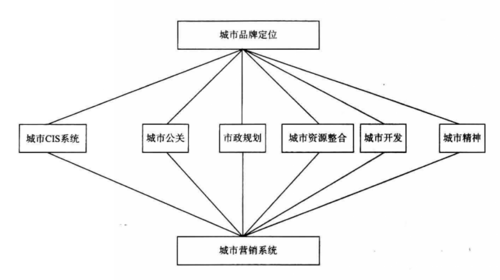


图 5－3　北京市城市品牌构建与营销系统建设

（二）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势在必行

全球创意城市网络（Creative Cities Network），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2004 年推出的一个项目，旨在通过对成员城市促进当地文化发展的经验进行认可和交流，从而达到在全球化环境下倡导和维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被列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意味着对该城市在国际化中保持和发扬自身特色的工作表示认可。成员城市加入时需要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可以自由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可以在其失去代表性后建议其退出。创

意城市网络分类，一个城市只能选择申报一种称号，每一种称号都有相应的标准。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被分别授予七种称号："文学之都"、"电影之都"、"音乐之都"、"设计之都"、"媒体艺术之都"、"民间艺术之都"和"美食之都"。目前加入情况如表5－2所示，其中有中国的深圳市、上海市和成都市。

纵观目前"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成员，普遍具有大力提升创意产业发展的愿景，且都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一领域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并愿与其他创意城市共同致力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文化多样性使命。这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北京业已形成的支柱地位，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所将承担的责任都相吻合，对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十分有利。一是利于北京扩大自身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争取更强的话语权和控制力；二是利于北京增进与世界其他重要创意城市的了解、交流和共赢，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融入国际氛围；三是利于北京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引入国际元素，提高城市凝聚力、吸引力和竞争力，从而进一步促进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四是提升北京市"创意之都"城市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王晖副教授）

借力电影产业加快世界城市发展

2010年5月，《求是》杂志发表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世界城市建设"[①] 的文章。文章对后奥运时代的北京市在发展模式与方向上作出了前瞻性的规划与指引。如此，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何方？这种转变又如何推动世界城市的建设？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无疑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近些年来，笔者对我国的电影创作及产业做过一些探索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参与。基于此，我们发现这样一条基本思路，那就是当我们将电影置于产业经济的构架之下，从经济学、传播学，尤其是市场营销学的角度下地进行解析时，电影产业之于一座城市的经济价值与意义便会逐渐明晰，以至于一个叫做"城市电影营销"的新概念已经悄然诞生。

---

①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世界城市建设．求是，2010（10）．

由此，本文将以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发展为主要背景，联系国际电影产业动态，结合一些典型的城市电影营销案例，就如何以电影产业为动力，加快世界城市的建设理清若干思路，提出若干想法。

一、电影搭台，城市唱戏——国际都市的营销策略

城市电影营销的做法在我国尚属新鲜事物，而在国外却早已形成一条完备的商业模式与产业链条。利用电影巨大的影响力与辐射力，不少城市已经把经营电影产业作为提高地方知名度、增加就业、促进旅游的一条有效途径。

世界各城市的电影营销基本上遵循以下三种模式：

（一）电影节（颁奖礼）模式

谈到这一模式，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的好莱坞与天使之城洛杉矶。一年一度的好莱坞颁奖典礼，不仅会聚了全世界媒体与影迷的目光，同时也让举办地洛杉矶大发电影财。在这当中，首先获利的就要属影片的制片商。他们为了宣传影片，会毫不吝啬地为卡拨出专门的款项进行宣传营销。为此，当地的主流报纸，如《洛杉矶时报》之类每年都可以有相当可观的拉票广告收入。

除此之外，大量明星纷至沓来也给这座城市带来无限商机。仅住宿一项，光是洛杉矶的四季酒店，“奥斯卡周末”就可以多赚几十万美元。与此同时，奥斯卡当晚，洛杉矶当地也会上演多场庆祝派对。譬如由《浮华场》杂志举办的派对，花费都在百万美元以上。奥斯卡之夜，更是堪称顶级与奢华。

同时，还有一些外围效益也在贡献着它们的价值。以举行奥斯卡典礼的柯达剧院为例，这座坐落在洛杉矶一家商城内的剧院因举办奥斯卡而声名鹊起之后，该商场的收益与周边的房地产也跟着沾光，价值倍增。难怪有专家将这一系列围绕颁奖礼发生的爆发式消费称为“凑热闹经济”。

除好莱坞以外，以电影节（颁奖礼）等作为城市经营模式的还有法国的戛纳（戛纳电影节）、意大利的威尼斯（威尼斯电影节），德国的柏林（柏林电影节）等等。

电影节（颁奖礼）模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它可以在观众心目中就电影与城市之间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品牌关联。如说到戛纳本是法国一个小城，之前少有人知晓，但如今一说戛纳人们就第一时间想到电影节。而媒体报道中高频率地出现戛纳电影节这一词语又无数次地在提升着这座城市的知名度。

（二）拍摄基地模式

电影的拍摄制作，尤其是前期制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前面讲到的对场景依赖之外，同时还需要在美工、道具、演员，以至交通、后勤、住宿等诸多方面形成配套。随着电影向着工业化发展，选择影视基本地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

影视拍摄基地的建成，不仅方便了剧组，同时也往往成为所在城市的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点。因为大量剧组的入驻，必然带来人员的大量流入，这首先会带来大笔的服务业收益。同时，基地内的设施场景在不影响拍摄的情况下又可以作为主题公园吸引游客作为旅游收入。

温哥华，便是一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尤其是地缘优势打造北美影视基地的典型。经过十几年发展，温哥华已戴上了“北方好莱坞”的桂冠。这是因为近些年来好莱坞片商加快了在海外，尤其是加拿大拍片的步伐。因为比起各方面成本都较贵的美国本土，加拿大紧邻美国，又具有价格优势。这其中，又以接近好莱坞中心洛杉矶的加拿大西部名城温哥华条件最为得天独厚，甚至从这里也走出了一批电影精英。如 2010 年大片《阿凡达》导演卡梅伦便来自温哥华。

温哥华制片业的迅猛发展，甚至让美国老大哥好莱坞也感到了压力与不安。有媒体称，“由于电影制片业纷纷转到比较便宜的地方拍摄影片，好莱坞的电影业在 2001 年损失了一万八千个工作职位，而温哥华则被指为抢走好莱坞就业机会的罪魁祸首之一”。好莱坞的电影业者对于这些竞争对手崛起的情形日感忧心，甚至一度呼吁华府对非法提供拍片贴补的国家实施制裁。制片商仍不忘把矛头指向他们所谓的加拿大对影视制作的贴补优惠，又指陈加国当地雇用非工会工人拍摄影片等状况。

（三）场景植入模式

所谓场景植入，就是将影片的主要故事情节放置到某一城市中展开。观众在收看电影的同时，便很自然地受到了这一城市场景的影响和感召。因为几乎所有的电影都需要在一定情景中展开，所以这种植入更加显得自然、到位，深受制片人与城市经营者推崇，十分容易达到双赢的效果。此外，前面提到的两种模式都需要城市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还有硬件设施基础。所以，对一般城市来讲追求起来并不完全现实。然而，场景植入的模式运作起来则可以灵活许多。对城市来讲，可以选择与自己风貌相关的电影进行合作，甚至根据自身要求量身打造一部电影。

《达·芬奇密码》是一部根据热销悬疑小说改编的好莱坞大片。这部电影在全世界的热映，不仅在影迷中掀起了一股密码热，而且同时带来了一股宗

教艺术文化热。这得益于影片的主场景选择了著名的巴黎卢浮宫。影片使得卢浮宫的名声从艺术爱好者的小圈子进一步扩大到了普通大众。通过卢浮宫，甚至让观众进一步领略了法国作为一个艺术文明大国的独有魅力。与此同时，卢浮宫的神秘气息也在影片中得到更深层次的强化，欧洲的宗教文化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一次效果巨大的宣传，让世界更进一步了解基督教的文化。当然，这当中最受益的依然是卢浮宫所在的法国首都巴黎。

与此类似，纽约通过《西雅图不眠夜》《金刚》等电影展示了纽约大都市的形象，尤其使帝国大厦通过这些电影成为纽约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伦敦借助《三十九级台阶》《哈利波特》系列等电影，使其许多地区、建筑成为世界游客向往的地方。

除了这些早已名声在外的大都市外，一些原先不太为世人所知的小城市，甚至小镇也不乏类似的例子。例如我国台湾的恒春古镇。随着中国台湾电影《海角七号》的热映，本非旅游热点的恒春受到了热烈的追捧。恒春的古朴风情、当地特色的建筑特征、浪漫的海滩场景都成为中国台湾甚至是东南亚的游客必游之地。电影宣传让恒春的风情更真实更完整地展现出来，这样的营销效果是其他的营销手段所无法比拟的。此外，借着魔幻大片《指环王》的东风，原本地处偏远南半球的新西兰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为澳大利亚之外南太平洋上又一热门旅游景点。

二、国产电影的城市营销之路

（一）国产电影产业化进程的简要回顾

与很早就实行工业生产的好莱坞模式相比，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自己特殊的规律与历史轨迹。这里先简单归纳一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长期被作为一种宣教工具存在。政治性重于艺术性。20 世纪 80 年代起，又出现了艺术电影的热潮。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黄土地》等便是这类影片的代表。但不管是政治电影还是艺术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基本上不与市场挂钩，不以票房为目标，不以普通大众的接受为主导。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影响力也逐渐从实体产业波及到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业。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传统国有电影厂制片体制改革的深入，垄断性发行体制的打破，国产电影终于开始向着产业化的方向迈进了。

这里有两个里程碑式性质的影片是必须要提到的。第一个是 1994 年在国

内上映的美国电影《亡命天涯》。这是采取分账式合作引入的第一部"好莱坞大片"。以此为起点，从《终结者》到《泰坦尼克号》，一直到最近的《阿凡达》，中国观众迎来了进口大片时代。

第二个是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武侠片《英雄》的问世。这不仅仅标志着张艺谋个人从过去的第五代导演旗帜人物转变为商业片导演，同时也开启了全明星、大制作，高成本、高回报的国产大片的时代。

至此，国产电影的产业化时代真正到来了。城市与电影的联手也真正有了基础与土壤。

（二）城市情景植入，激活旅游产业

在我国，城市与电影的这种结缘可以追溯到20世纪，例如《庐山恋》《芙蓉镇》等等。但当时尚不存在城市营销的概念，两者之间更谈不上商业合作。进入产业化之后，城市营销的步伐大大加快。国产电影中城市营销的色彩日益浓重。

较之文学作品，电影最擅长的就是视觉表现。因此，城市场景植入电影最直接的受益方莫过于旅游业。电影精美的镜头设计与后期技巧，再加上相得益彰的剧情融合，有时往往能把电影当做该城市的旅游宣传片来看。

前文提及的《英雄》不仅开启了国产电影产业化大片之路，其中的城市旅游元素植入也颇为显著。甘肃的雅丹地貌、九寨沟的山水风情无一不为电影增光添色，为这两地的旅游做足了广告。

经过十年的发展，这种营销模式更趋成熟。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公司或团队来运作此类事宜。例如，2010年出品的《好雨时节》便是由近年来在新媒体和城市营颇有销领域建树的中博传媒有限公司来动作。影片讲述了一位来成都出差的韩国男子东河（郑雨盛饰），偶遇自己美国留学时的同学MAY（高圆圆饰），上演一段浪漫邂逅引出的唯美爱情故事。影片将成都的特色与故事糅合得水乳交融，容纳了成都的城市特色和许多知名景点，展露无形，不着痕迹，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无形中加深了对成都的印象。

自然，将城市旅游与电影结合最成功的当数冯小刚的《非诚勿扰》系列。之前一般认为，冯小刚的个人风格更符合北方观众的口味，所以以往"冯氏贺岁"一直是南冷北热。但《非诚勿扰》则由于很好地进行了城市营销，极大地推动了杭州和三亚这两坐座南方城市的旅游热，乃至地产热。

以杭州为例，有媒体报道，当年上映的《非诚勿扰》在杭州院线的单日票房已经超过了《赤壁》，仅次于《英雄》。其中男主角葛优的一句电影台词"西溪，且留下"，为杭州新开发景点——西溪湿地国产公园湿地做了最响亮的广告。影片上映后，杭州旅游部门即刻启动一个西溪短线游，与旅行社合

作开发“《非诚勿扰》旅游团”，让慕名而来的游客集中在一起，穿梭于湿地的秋雪庵景点附近的芦苇荡，参观文化创意园“艺术部落”的别墅，享受鸟鸣水静的湿地美景。据公园公关部人士介绍，《非诚勿扰》公映后，湿地的游客比以往增加了四成左右。

此外，影片中葛优与舒淇对话的那某餐厅也变得异常火暴，甚至有客人专门来预定他们坐过的那对红色餐椅，而葛优和徐若瑄约会的那家茶楼也因此变得宾客满门。

凭着第一部的成功，《非诚勿扰2》继续复制着这一商业模式。这次主要植入的是海南三亚。作为本片的主场景，男女主人公度蜜月所住的房间被安排在有着“鸟巢”之称的亚龙湾森林公园度假村之中。影片过后，这所客房立刻变得奇货可居。旅游黄金时间，这间客房的标价竟达到了9999元一夜，黑市炒作价更是上万元。

（三）政府投入，资本运作，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提供自己的场地用于电影拍摄，并在电影放映后获得广告效益。这还仅仅是一种表层的合作模式。而将自己作为合作方，甚至投资方之一投入到一部电影的策划与制作发行中去，共享利润分成，以获得全面城市价值与形象的提升，这才是城市电影营销的一种更加前沿的模式与思维。在这方面，2010年热映的冯小刚又一力作《唐山大地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典型的研究样本。

随着环渤海经济圈的崛起以及京津唐一体化的规划定位，地处渤海湾重要交通枢纽的唐山迫切需要一个窗口，向世人展示自己应有的形象与风采。就经济水平而言，唐山在全国同等城市里可以排到20名以内，但在文化认识上却上却明显滞后。2007年底，唐山市高层便意识到，必须在全国打响唐山的品牌，改变唐山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匹配的现状。于是，由市政府作为最大股东，投资一部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表现唐山人精神风貌电影的设想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项目确立之后，唐山市面临三种资本运作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参照《云水谣》，投资在5000万元左右，票房不能保证，但能赢得口碑；第二种是参照《集结号》，投资在1.2亿元，能够双赢；第三种是参照《后天》、《赤壁》，总投资在3亿元，能够拿到世界市场上去。

最终，《唐山大地震》选择了第二种模式。1.2亿元的投资额度中，唐山市政府出资6000万元成为最大股东（之后又追加了1000万元用于电影宣传）。值得一提的是，唐山市政府实现了政府投资电影定位的转换，由以前的电影赞助商变成投资商的角色，《唐山大地震》也被舆论定义为是唐山市政府

的“定制电影”。[①]

从2008年秋天开始，唐山市与制作方冯小刚以及华谊兄弟决策见面，确立了以“一个遭遇地震的普通家庭浓缩千万个家庭情感故事的电影”的影片总体架构，该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为确保影片与预先确定的宣传意图相一致，唐山市政府在影片全程都进行了有效的监控。市委及宣传部门领导亲自阅读剧本，参与剧情，甚至亲自通电话与导演沟通剧情。在片名的选择上，唐山市政府明确提出要叫《唐山大地震》，而非制片方提出的《余震》或者《大地震》，以此来凸显唐山的特质。

在监督干预的同时，唐山还较好地遵循了平衡关系，利益共享的原则。对于其他投资方的广告植入以及宣传攻略，唐山市政府也没有一口否决，“求全责备”，而是允许一定范围内植入，以使电影的利益最大化。在确保电影符合唐山城市营销需要的同时，唐山市政府的配合工作也是一路绿灯。为电影拍摄免费提供基地、人工降雨消防车、在唐钢拍摄开新闻发布会等。同时，唐山市政府还要支出首映礼、城市宣传片制作以及给电影院的广告等费用。

就电影最后的传播实效来看，这一切的努力获得了应有的回报。《唐山大地震》以6亿多元的票房收入成为2010年国产电影票房冠军。对于唐山市政府而言，票房盈利还不是最主要的。连续高密度的曝光度，以及深厚的唐山式人文精神所带来的效应远远非票房所能衡量的。

另外一种效益就在于，对其他有意通过电影进行城市营销的城市而言，唐山市提供了一种十分值得参照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意志和商业公司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磨合和满足。艺术规律与主流意识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融合。与大多数的政府投资电影“领导专家叫好，观众不买账”的情况相比，《唐山大地震》以自己的高票房说明，“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运作获得叫好又叫座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三、利用首都文化资源，打造城市经济新增长点

介绍完世界及国内一些城市的电影营销经验之后，下面我们有必要将目光转到北京这样一座特殊的城市。这些年，北京的城市定位与功能发生了一系列调整与变化。其中较为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三条：

第一，2004年底，《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修编基本结

① 《唐山大地震》：城市营销运作新典范. 领导与决策，2010（32）.

束。此次规划首次提出了“宜居城市”的概念，明确提出要将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国际大都市”。至此，“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这四大目标定位便正式浮出水面。并且，这也是在过去描述的诸多“中心”之中，北京首次未提“经济中心”。

第二，2010 年，《求是》杂志也撰文指出，北京市“一是狠抓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出了优化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和坚持高、精、专、强的思路，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的发展”。

第三，奥运会之后，北京的世界化、国际化态势日益加强。在国际化城市的基础上，北京市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口号。作为对国际化城市的一种高端形态，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北京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国际化浪潮的影响，而是开始考虑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如何扩大城市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综合上述现实，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以文化消费为代表的软性指标正在被放置到日益重要的位置上来。这也为北京市加快发展电影产业，促进自身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事实上，从电影产业的现状上看，北京市也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一组近期的数据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据北京电台报道，2009 年北京电影业发展迅速，全年票房 8.1 亿元，比 2008 年增加 2.8 亿元，增长率 52.8%，占全国票房总量的 13%。年产影片 230 多部，继续占据全国电影产量的半壁江山……北京电影市场投资主体增多、投资额度加大。2009 年底，本市已有影院 84 家，观影座位总数 7.44 万个，银幕 373 块，其中数字影厅 165 个，3D 影厅 87 个，IMAX 巨幕影厅 3 个。全市已基本完成每个行政村一套数字电影放映设备的配置建设。2009 年，北京农村数字电影固定放映设备共放映电影 27 万场，观众 1599 万人次，全市流动放映设备放映电影 5.06 万场，观众 455 万人次。另外，北京地区电影节、展映展览和对外交流更加活跃，法国、澳大利亚、朝鲜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一系列电影展映相继在京举办，同时大学生电影节、青少年公益电影节、科普电影周也丰富了本市的电影市场。”[1]

面对这样的态势，北京市也早就已迈出了电影营销的步伐，并且取得一些宝贵的合作经验。例如，电影《非诚勿扰Ⅱ》就是北京市旅游局以首席合

---

① 2009 年北京电影业发展迅速全年票房 8.1 亿元. 新浪网，2010 - 1 - 13.

作伙伴的身份与华谊兄弟公司开展系列合作的第一个举措。影片一开头，剧中的葛优向舒淇求婚的场景就放在了北京著名景点睦田裕长城。雄伟的城墙、金色阳光下，加上浪漫的爱情桥段，让观众对这一场景印象深刻。

除了为制片方提供外景地支持以外，这次北京市更着力通过电影《非诚勿扰Ⅱ》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营销。如“通过投放电影帖片广告、冠名电影全球首映礼、举办各地行业看片会、网络互动活动等系列营销手段，宣传独特京味文化、打造热点旅游景区、推广特色旅游产品，进而实现丰富旅游产品、拉动旅游市场、增加旅游消费的目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旅游局也借助电影《非诚勿扰Ⅱ》推出了‘非常北京 非常旅游’的事件营销主题和‘北京旅游非线路’系列旅游新产品。”①

除了《非诚勿扰 II》这一部电影之外，双方的深层次战略合作将整合涉及华谊兄弟 2010 年及 2011 年多部电影、电视剧及大型娱乐活动。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双方的合作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资源，通过广告、媒体、公关等系统的手段推广北京旅游。自此，北京市旅游局将着力构建北京旅游影视营销体系，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在写作本文之时，笔者收到这样一组数据。2010 年全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 100 亿元已成定局。截止到这一年的 12 月 27 日，共有 17 部国产电影票房过亿元，总共收获了 34. 6 亿元。而排名前 17 名的进口片总票房约为 37. 9 亿元。也就是说，在第一集团的比拼中国产片和进口片打了个平手。而在整体的比拼中，国产片再次以 60 亿元票房战胜进口片 40. 4 亿元。②

毫无疑问，这是一组让人兴奋的数据。城市管理决策层在面对这一数据时，是否也应该谋划着下一次有效的营销合作呢？

（首都经贸大学人文学院　吴三军副教授）

确立全球观念　打造东方美食之都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餐饮产业的文化定位

世界城市的核心标志，就是对世界有控制力和影响力。金融体现控制力，

---

① 北京旅游借《非诚勿扰Ⅱ》构建旅游营销新体系. 腾讯网，2012 - 12 - 24.

② 盘点 2010 年中国影市全年百亿票房国片占据六成. 新京报，2010 - 12 - 18.

文化展示影响力。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不能照搬纽约、伦敦和东京的模式，必须要有中国特色。在文化上找突破口，把美食文化作为一个亮点，以此增强北京在世界的影响力。为此我建议，可把打造“东方美食之都”，作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餐饮产业的文化定位。

一、为什么是“东方美食之都”，而不是“世界美食之都”

许多人认为，北京餐饮文化产业定位，应该是“世界美食之都”或“国际美食之都”，成都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国际美食之都”后，希望北京争取“世界美食之都”的呼声越来越高。我认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餐饮产业文化定位，应该是“东方美食之都”，理由如下：

（一）客户群体的认知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文化要有世界影响力，所影响的不是国内的人群，而是世界各地的人群，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的人群，换句话说，这些人群是北京要吸引的客户，北京美食定位表述，要得到他们的认知和认可，才是最重要的。在西方人看来，东方充满诱惑，具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中国就是东方的代表与中心。在他们的语境里，“东方美食之都”理应更具有吸引力和亲和力。“世界美食之都”的气势固然庞大，但寓意太宽泛，特色不明显。况且，我们自己喊出的“世界美食之都”，国际机构颁发的“国际美食之都”，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具有针对意义，有待实践检验。

（二）美食结构的现状

北京市餐饮市场的产品结构，决定美食之都的范围定位。由于中餐在中国具有强大的市场和文化感召力，其他国度的饮食模式很难为中国人接受，所以，尽管北京已经发展为国际大都市，但在餐饮市场中，中餐仍然占有绝对的比例。目前北京市有各种餐饮网点5万家，其中非中餐约4500家，还不到10%，远远支撑不起“世界美食之都”的概念。另外，北京本地风味也不足10%的份额，80%的市场是全国的各地风味流派，鲁菜、川菜、湘菜、粤菜、徽菜、闽菜、苏菜等等，30多个地域风味，50多个民族特色，丰富多彩，应有尽有，这是北京的优势。在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找不全中国各区域、各民族、各种风味的餐饮集合。只有在北京，才能让世界各地的食客在同一个城市体验到丰富多彩的中餐全貌。

（三）地域文化的特征

全世界的饮食，主要有三大流派，即西方饮食文化、东方饮食文化、伊斯兰饮食文化。国际餐饮界公认的观点是，法餐为西方饮食文化的代表，中

餐为东方饮食文化的代表，土耳其餐为伊斯兰饮食文化的代表。中餐作为东方美食的核心代表，具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众多地方风味的烘托，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菜系格局，释放着东方民族特有的美食魅力，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中餐以东方特色而彰显烹饪技艺与生活品位，在全世界的地域文化中都能与同类文化抗衡争辉。同时，北京根植于深厚的东方文化沃土，有着得天独厚的首都优势，地理位置上属于东方方位的核心。因此，在北京突出“东方美食之都”的特色，应该是切合实际的明智之举。东方美食看中餐，中餐精华在北京，这早已成为共识。

（四）招徕优势的选择

世界城市的影响力，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招徕力，如果定位在东方文化的概念，则更有个性，更有神秘感，更具招徕性。东方美食之都的招徕力，应该远远大于世界美食之都、国际美食之都。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招徕更多的海外客人来北京是硬道理，并不是口号喊得大，人家就乐意来，而是要喊到他们的心里，人家才乐意来。

“东方美食之都”是一个符合世界语境、恰如其分的亲和称谓，易让海外客人所接受。“东方美食之都”的概念，给了世界各地人们来北京一个重要理由。让大家知道，来北京，看故宫、登长城之外，还可以体验东方美食的诸多精华。当然，“东方美食之都”并不排斥世界其他地域的美食内容。在“东方美食之都”的北京，照样能够吃到世界各地的风味（尽管比例只有10%），更能吃到东方其他国家的美食（如日本、泰国、韩国、印度等，比例为15%）。

有礼有俗，礼俗即文化，文化自尊，中餐不仅是文化，是本位文化，本位文化的重建，大礼三百，小礼三千，失范，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尊重

二、饮食不仅是文化，而且是东方文化的亮点

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这样一种现象，在餐厅里，不管什么样的专家、学者，都在大谈饮食文化，都能认可饮食文化。但在其学术论述、学科体系中始终找不到饮食的文化子项。饮食是不是文化，应该如何定位，在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遗憾的是，在一些专家有关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理论框架中，在如何增强文化影响力的体系里，恰恰没有饮食文化。

（一）饮食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

从历史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来认识饮食事像，或许能够得出更准确的结论。“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饮食不仅是文化，而且是大文化，我们的

饮食中，有礼仪、有情义、有孝道、有民俗、有和谐，饮食文化在东方表现的更极致，包涵的文明内容更多，这是西方饮食所不能比的，有人说东方是饮食文化、西方是男女文化不无道理，东方人更加讲究味觉审美。东方饮食选材广泛，追求食物多样性，菜品丰富，口味多采，荤素搭配，营养合理，饮食讲究天人合一、四时有别，东方人更加讲究食疗食补。东方人喜欢用吃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与观念，既追求身体与食物的和谐，也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这种东方饮食文化的深厚含义，在中餐体现的更是淋漓尽致。

（二）中餐是国家软实力

在打造软实力方面，许多东方国家把美食作为文化出口，并在国际上竭力推广。韩国政府 2009 年投资 240 亿韩元推动“韩餐世界化战略”，第一夫人金润玉亲自上阵，担任“韩餐世界化推进委员会”名誉会长，在《纽约时报》刊登大幅“韩国拌饭”广告。日本成立了“日本料理海外普及和推进机构”。面对东方各国在餐饮文化方面的国家动作，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中餐，不应仅有在文化属性上的讨论，而应放在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高度来认识它。无可否认，中餐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优秀载体，更是传播中华民族价值观绝佳载体，如何开发它、弘扬它，为本世纪的民族复兴做出贡献，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有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餐馆。中餐走出国门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中餐馆仅在美国就有四万多家，在全世界约二十万家。在我国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的载体，能够与中餐文化的世界传播力相比。在海外人们的心中，中餐是中国文化的第一张名片。

（三）中餐烹饪术的先进性

任何一门学科，分类越细先进性就越强，中餐的烹饪术分类之细，是世界任何一种烹饪术所不能比的。比如中餐常用的烹调方法有 40 种，而法餐不到 10 种，中餐的品种近 3 万个，而法餐的品种不足 3 千，中餐的口味变化万千，形容口感的词汇，大部分没有翻译成英文，因为英语中根本就没有相应的词汇。品尝中餐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讲，是人生味觉的崭新体验，是从未有过的味觉审美享受，中餐讲究色香味形养五大要素，这是中餐能够征服世界各国人们味觉的重要原因。

三、北京是中餐文化的汇聚中心

提出把美食作为北京的文化亮点，不仅是从中餐的优势着眼，同时也是在对比了三个“世界城市”的饮食现状而得出的结论。

首先看美国纽约的饮食：纽约的饮食是多元的，但最优秀的代表还是快餐，美国人对快餐情有独钟，汉堡包、炸鸡、薯条是最常见的食品。《美国餐厅新闻》（National Restaurant News）报道，美国最大的100家快餐连锁集团的销售额占了全美所有餐厅销售额的80%以上。①纽约作为美国的第一大都市，餐饮流行的是快餐文化，而快餐文化的核心是商业文化，追求的是速度和效益，缺少文化的厚度和招徕性。

其次看英国伦敦的饮食。说到英语，大家可能都很佩服，是一种很强势的文化，几乎成了世界语。但说到英餐，大家一定觉得很陌生，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压根就没有英餐这个说法，提到英国菜，大家的评价都不太高。英国菜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Simple”（即太简单）。英国菜的制作方式主要有两种：用烤箱烤，或者用火锅煮。做菜时什么调味品都不放，吃的时候再依个人爱好放些盐、胡椒、芥末、辣酱油之类。伦敦的饮食文化也不是正餐，较有特色的是英式下午茶。

再看日本的东京饮食。日本料理是有特色的，以丰富的海产品和新鲜蔬菜为主要材料，加工精细，保持了食材的本味，日本料理借鉴了中国菜肴传统的一些制作方法并使之本土化，其后西洋菜也逐渐渗入日本，使日本料理从传统的生、蒸、煮、炸、烤、煎等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日本料理。东京饮食的骄傲是生食（刺身）文化。

纽约、伦敦、东京三地的饮食，纽约的快餐、伦敦的下午茶都不能形成本地文化中的突出亮点，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日本的饮食有特点，但其基本的饮食内涵虽与中餐一脉相承，却远不如中餐的丰富多彩。如此看来，在饮食文化方面，以上三个世界城市的相对贫乏和缺失，给北京留出了机会和空间，这既是历史给我们的机遇，更是中餐文化先进性的必然。由此，北京以饮食作为文化的突破口，形成特色的文化竞争力，据此立于世界城市之中，是可行的。

文化特色是建设世界城市的基础和优势。文化影响力是世界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纽约以百老汇为文化亮点；伦敦以创意产业为文化亮点；东京以动漫文化为亮点。北京应该拿出什么文化展示给世界，并以此增强影响力和招徕力？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许多人并不否认中餐的文化性，但如果真拿中餐做文化亮点来展示时，则顾虑重重，怕影响形象，怕格调不高，怕登不上大雅之堂，不敢正视。其实大俗中才见大雅，海外的认知胜于自我的认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餐是世界公认的中国特色文化，是可以影响全球的文化。北京又是中餐文化的汇聚中心，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理应把中餐的文化亮点放大，做好

做足做深中餐文化这篇大文章，用中餐文化叫板纽约的大片儿、东京的动漫和伦敦的创意。

四、打造东方美食之都的几点建议

作为东方美食之都的北京餐饮业，是首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肩负着全市1900万人的外餐需求，而且是向全国、全世界展示首都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悠久历史文化的窗口。北京餐饮业的发展带动各个相关产业的发展与进步，每年向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是社会再分配的一个重要环节，更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直接体现。

打造东方美食之都的同时，也是对北京餐饮产业的推动。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餐饮业企业网点数量超过4万家，从业人员约27.3万人。2009年，北京市餐饮业营业额477.7亿元，对GDP的贡献值为6%。2010年一季度，北京餐饮业营业额达到159亿元，同比增长13.3%。餐饮业已经是北京消费市场中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自1980年以来，北京餐饮业零售额年均增速20%左右。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中，如果增加了“东方美食之都”的名号，将会对北京的餐饮产业产生更有力的推动。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东方美食之都的规划

打造东方美食之都，首先要对整个餐饮布局的风味结构有一个科学的定位。

目前，北京餐饮现状是10%的外餐，近10%的北京风味，还有80%的国内各地风味。

北京打造东方美食之都，荟萃中外美食，不应仅仅定位于北京菜系，北京菜系占5%即可，世界各地的风味可以占到15%。

中国有四大饮食文化圈，分别是黄河流域的鲁菜文化圈，长江上游的川菜文化圈，长江下游的淮扬菜文化圈，珠江流域的粤菜文化圈。四大饮食文化圈又衍生出八大菜系，一般是指：山东菜、四川菜、湖南菜、江苏菜、浙江菜、安徽菜、广东菜和福建菜。此外，其他省区也都具有各自的风味特色，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民族饮食特色也很丰富。来自全国的菜系和民族风味，在北京占到80%的比例，既是市场的自然构成，也是我们实行规划的依据。

（二）呼唤透明的政策扶持

目前的北京餐饮业面临着三高一低（即：房价高、人工高、食材成本高、

利润低）的局面，餐饮企业生存环境日渐显差。因此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

1. 请政府考虑给餐饮企业适量减税或返税。

2. 餐饮用水、电、气、暖与工业同价，降低餐饮企业的成本。

3. 银行卡刷卡手续费与商场同等，即从2%降到1%。

4. 每年从餐饮营业总额中拿出0.2%，设立餐饮业奖励、扶持基金。

（三）在北京建立高等烹饪学院

北京是我国的文化中心，但烹饪教育明显滞后。

目前我国烹饪教育院校有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青岛酒店管理学院三所专科院校，北京却没有一所。全国开设有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本科专业的高校有扬州大学、湛江师范学院、安徽科技学院、河南科技学院、济南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湖北经济学院等9所，北京仅北京联合大学一所。全国有多所大专开设有烹饪相关专业，但是北京的院校很少开设这个专业。

我们这样的餐饮大国，一直没有设置餐饮本科高校，烹饪教育更多的处于中专和职业培训阶段，这与我们饮食大国的地位很不匹配。

巴黎和中国香港在烹饪教育方面值得北京学习。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职业训练局于2000年创立了“中华厨艺学院”。早在1895年，巴黎成立世界上第一所厨师学校——法国蓝带学校。一百年后，法国蓝带分校遍布全球15个国家共30多所学校，每年来自70多个不同国家的2万多名学生得以入学，为世界各地提供了餐饮管理和酒店管理学士、MBA和美食学硕士学位。

中国烹饪的技艺几千年来主要靠师徒传承，代代相传。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师徒传承有很多局限性。烹饪教育理应是现代教育的一部分，在北京建立一所高等烹饪学院，全力培养餐饮高等职业人才，是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美食之都”的教育基础。

（四）重点引进知名餐饮品牌

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世界各地的餐饮品牌，积极引进国内各省市优秀餐饮品牌。

为突出东方特色，重点引进亚洲餐饮品牌，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韩国等国的餐饮品牌可以优先考虑，这样能够更好地烘托北京“东方美食之都”的声势。同时引进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餐饮品牌，提升北京的餐饮规格，优化餐饮布局。

北京打造东方美食之都，需要遴选并引进全国各地有特色的餐饮品牌，充实北京的餐饮体系。现在，北京的著名餐饮如湘鄂情、苏浙汇、顺峰、净雅、倪氏、永利、味千拉面、真功夫、大娘水饺、小肥羊、三只耳、海底捞、

赛百味、汉堡王、吉野家、棒约翰、赛百味等，都是起源于外地或者外国，经过市场的自发推进，进入北京的。鉴于北京房租、人工等成本高，应该推出引进餐饮品牌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地方特色餐饮品牌进入北京。

（五）扶持老字号发展

北京作为中华古都，有着悠久发达的餐饮文化与餐饮企业发展史，产生了众多的知名餐饮企业，长期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成为老字号。他们是北京餐饮的重要代表，是近 10% 北京风味的精髓。全聚德、便宜坊、东来顺、丰泽园、仿膳、鸿宾楼、都一处、正阳楼、功德林、馄饨侯、护国寺小吃、同和居、曲园酒楼、庆丰包子铺、砂锅居、烤肉宛、烤肉季等北京老字号驰名中外，深受海内外食客欢迎。在中华餐饮老字号中，北京的老字号占有很大比重，是中国餐饮业的宝贵遗产。

如今，餐饮老字号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老字号并不缺乏特色，但缺乏资金、经营思路，尤其缺乏政策扶持。北京打造“东方美食之都”，需要这些老字号的文化象征。政府的政策扶植，可以首先考虑老字号。

（六）举办北京餐饮国际展

世界有三大餐饮酒店食品展会，分别是“美国芝加哥国际餐馆、酒店用品及餐饮展览会”、“日本东京国际餐饮、酒店设备展览会”、“亚洲食品饮料、酒店及餐饮设备展览会”。

美国芝加哥国际餐馆、酒店用品及餐饮展览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酒店用品及餐饮展，始创于 1919 年，每年一届在美国举办，云集了当今世界酒店业的领先者以及业内商用最具创意的尖端、时尚的产品与设备。东京国际餐饮、酒店设备展览会由日本酒店业展，日本酒店用品展和日本餐饮设备展合并而成，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是世界上最专业的酒店业贸易展览会之一。两年一度的亚洲食品饮料、酒店及餐饮设备展览会自 1987 年创立以来，至今已发展成为全亚洲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的国际餐饮业产品供应展览会。

专业性的展会凝聚了全球餐饮同行的目光，更汇聚了行业最先进的理念和设备，提升了城市餐饮的发展。

然而，北京目前举办的餐饮行业展会影响力有限，还没有去构思世界级的餐饮展会。应该打造出与“东方美食之都”相匹配的专业展会，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七）关注美食教育，提升全民美食鉴赏素质

美食鉴赏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创造的美食的审美价值。美食鉴赏素质或多或少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食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人们更好地享受美食、享受生活。在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注重“以

人为本”的今天，有必要加强包括餐饮从业者在内的全民的美食鉴赏素质教育，通过各种教育和实践，从生理、心理、美学、营养卫生和饮食知识等方面培养和提高全民的美食鉴赏素质，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美食家或有较强美食鉴赏能力的人，更好地创造和推广美食，传承和发扬美食文化，促进美食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北京的全民美食鉴赏教育应该走在全国的前列。

（八）创建美食博物馆

经过了几千年的培育和现代活力的注入，中餐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积淀，把这些文化积淀发掘展示，光耀当代，传递后世，是我们“东方美食之都”义不容辞的责任。发掘和展示东方美食文化，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在北京建设一座“东方美食博物馆”，这是打造“东方美食之都”的重要标志。

在北京建立的东方美食博物馆，应以中华民族的美食为主题，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力争重现中华美食在东方大地萌芽、发展、繁荣、昌明的历史进程，揭示东方美食的内涵及风格特征，同时汇集当代美食创新的最高成就，体现当代人对美食的追求与理解，最终通过全景式的文化构造来展示“东方美食之都”的文化气势和至高品位。

在北京建设东方美食博物馆，不但能够充实中国博物馆行业在饮食文化方面的强大实力，提高中国美食在世界范围的知名度与认可度，壮大中华文明的整体声势，更重要的是，能够为中国乃至世界提供一个认识“东方美食之都”的文化平台，提升中国餐饮行业的经济影响力，从而带动北京饮食行业的繁荣发展。同时，东方美食博物馆的建立，还能够丰富旅游项目，让国内外来宾亲身感受北京美食园地的魅力，此外，还能为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学习和深造的基地，为研究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场所。这对于促进北京饮食事业的发展，展示东方生活品味，传播中华文明，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梁明珠. 餐饮业竞争力研究.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 《北京餐饮业现状和发展趋势》北京饮食行业协会
3. 《光明日报》2002 - 03 - 22.
4. 《文汇报》2009 - 09 - 03.

（东方美食杂志社　刘广伟）

构建世界城市的主题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城市的血脉和灵魂，世界城市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文化特质，建设世界城市就是要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城市文化魅力，提炼出与众不同的文化价值，给人以独特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力和强大的文化号召力。

世界城市并不仅仅是以经济数据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城市特色文化和城市特色精神。因为一个世界城市如果没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色文化，没有世界影响力的特色文化氛围，这个城市是没有资格被称为世界城市的。

北京曾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发达、最辉煌的城市，其代表的东方文化一直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走向。

一个城市的文化能否体现城市的特色，彰显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决定世界城市建设的成功与否。因此，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首先要发挥北京特色文化的优势，以此提高北京在全球文化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北京市委刘淇同志指出，从国情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五千年历史和辽阔国土的发展中大国，在这样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因此，作为首都，北京的发展不能套用别人的模式，只能从中国国情和历史出发，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来探索和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和定位，建设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不能照搬现有发达国家世界城市的模式，而必须在充分研究和消化其基本经验和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吸收其优异成果，进而探索北京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世界城市的发展道路与独特性。

文化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最重要的资源和特点，在建设世界城市的探索中，北京除了必须借鉴各个世界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的基本构成和各自的独特成就外，还要选择撷取最合宜的“点”来重新“合成”，如纽约的百老汇、伦敦的创意产业、巴黎的文化底蕴，创造一个具有独特品格的东方文化型的世界城市。

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必须要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文化，必须要有自己的主题文化，主题文化影响力在世界城市建设中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世界城市伦敦越来越重视主题文化的发展，对城市文化提出了

更高的标准和目标，那就是把创意作为世界城市文化的主题，最终通过创意城市主题文化，提升伦敦世界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

鲜明的城市主题文化是世界城市形成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基础，是世界城市在后工业时代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利器，是体现世界城市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核心。因此，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第一要务是构建北京世界城市的主题文化。

北京，在文化上没有哪个城市有资格同它相比，没有哪个城市敢与它争锋。这座千年古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历史的荣耀非他莫属。因为北京蕴藏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最深厚，承载的中华民族文化内涵最厚重，折射的中华民族文化光辉最耀眼，弘扬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最大气，呈现的中华民族文化形式最堂皇。它的城市文化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观，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之所系，脉之所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所以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打好中华文化这张牌，要打好东方文化这张牌。以此，通过世界城市建设再次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文化的高峰。

北京到底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主题文化呈现在世界面前，这对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至关重要。在以往的城市化建设中，因为北京缺乏鲜明的、起主导作用的城市主题文化，所以在城市文化建设上，优秀的传统文化被抛弃，一些人把优秀灿烂的传统文化当成了历史的包袱，把国宝国粹当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绊脚石，最终让北京这个中华文化最灿烂的城市失去了文化魅力、失去了城市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世界城市建设让北京城市主题文化确立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如果抉择的正确，既可通过打造城市主题文化影响世界和吸引世界，又可以把城市主题文化融入到世界城市的建设之中。否则，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就将迷失方向，北京优秀灿烂的文化就无法得以体现。如果北京世界城市建设没有城市主题文化的方向引领，北京就将成为一个靠现代符号和概念堆砌起来的城市，一个充满商业动机、好奇心态、猎奇心理、满世界找创意的城市。北京就不再是一个体现中华民族悠久历史，释放中华民族文化光芒，承载中华历史文化血脉的城市。北京从现在开始构建城市主题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进行一次系统的“寻根、理脉、塑魂”，不仅可以使北京世界城市建设找到城市文化的坐标，同时还将为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创造一个恢弘灿烂的前景。

一、主题：“千年古韵”英雄所见略同

北京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建筑学家、文化名人，近年来为构建北京

的城市主题文化纷纷向中央领导、北京市领导进言，希望北京能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出北京真正的城市主题文化。

最近北京系统工程学会召开了首都城市发展和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就城市历史文化所包含的主题文化意义，如何将城市历史文化与现代城市的规划设计、城市发展模式、城市文化品牌构建、城市战略定位融合在一起，进而构建出城市主题文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节目最近也邀请了国家故宫博物院院长等学者，就北京到底以什么样的城市特征呈现在世界面前进行了研讨。最后，专家、学者一致提出"要把北京建设成以历史文化古都为特征的国际化都市"的观点。这个观点和上面专家、学者提出构建北京城市主题文化的观点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历史文化古都的主题又是以什么样形态出现呢？这就需要北京构建一个以历史文化古都为特征和具有系统工程意义的城市主题文化。

作为城市主题文化的提出者，我们认为北京能够在现在这个时候提出构建城市主题文化，能够把构建城市主题文化提高到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这对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将起到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北京这座举世闻名的千年古都来说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以笔者数年研究城市主题文化的经验，构建北京城市主题文化应该首先要挖掘、遴选、界定出城市的主题。

北京是中华民族文化信息储存、交融和对外传播最集中的地方。中华民族所有文化都集中体现在北京这座千年古都之中，形成一种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完整体系。比如，它的建筑风格集中华民族建筑风格于一身，江南的灵秀，中原的雅致，边塞的雄浑都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皇家宫殿和皇家园林建筑风格，形成了中华民族标志性建筑群体，成为印记中华民族建筑特征的世界性符号。它的文化血脉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像一条条涓涓的小溪从四面八方流向这里：《风、雅、颂》使古都充满了儒雅飘逸，昆曲、京剧让古都余音绕梁，文房四宝让古都墨香四溢，评书大鼓让古都神采飞扬，唐装华服让古都雍容大度，满汉全席让古都名振四方，十大名曲让古都韵味无穷，国宝国粹让古都气宇轩昂，《红楼梦》《四库全书》让古都文苑生辉，儒家思想在这里得到升华，道家思想在这里得到释放，佛家思想在这里得到发扬。这一切使北京形成了以中华民族经典建筑艺术为载体、以中华民族经典文化为特征、以中华民族经典哲学思想为基础，一个代表着中华古老文明"千年古韵"的城市。所以北京的城市主题文化应该界定为"千年古韵城市主题文化"。千年古韵就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根，城市文化的脉，城市文化的魂。

二、思路：六大举措打造北京城市主题文化

北京构建千年古韵城市主题文化，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打造好一批以千年古韵为主题的文化精品力作

现在，北京商业文化气氛过浓，而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受到冷落。构建北京的城市主题文化，实际上就是构建北京的特色文化，打造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根基的强势文化品牌，形成中华民族文化高地和世界级文化展示与交流平台，以此确立北京在世界上的文化地位。

北京蕴藏的传统优秀文化，都是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瑰宝，只要经过稍加包装和打造，就可以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品牌。重新打造《贵妃醉酒》等中国京剧剧目，使中国国粹成为莎士比亚戏剧那样的世界级戏剧品牌；重新打造《高山流水》等中国名曲，使中国民族乐曲成为贝多芬音乐那样的世界级音乐品牌；重新打造《春江花月夜》等民族舞剧，使中国传统舞剧成为《天鹅湖》那样的世界级舞剧品牌；重新打造唐诗宋词诗歌朗颂音乐会，使唐诗宋词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诗歌朗诵品牌。通过上述传统文化艺术打造，北京就不仅仅是以北京的传统文化姿态站在世界面前，而是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姿态站在世界面前。这些以千年古韵为载体的城市主题文化将释放出中华民族文化最灿烂的光芒。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些传统的东方文化能反映出现代城市的精神吗？这不必担心。同样是古老和传统的艺术，爱尔兰的踢踏舞风靡世界；美国的乡村音乐成为现代时尚音乐；贝多芬、莫扎特的古典音乐一直是现代乐坛的主流音乐；莎士比亚的话剧让世界人民百看不厌。作为文化的属性，越有历史感，它的文化附加值就越高，文化穿透力就越强；越有地域感，它的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就越大。

（二）举办好一批以千年古韵为主题的大型国际文化活动

北京可以举办一个千年古韵旅游皇帝（皇后）评选的大型国际旅游活动。通过这一活动，让国内外游客从观光旅游转变到体验旅游上来，从争当千年古韵旅游皇帝（皇后）的过程中充分了解北京千年古韵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这一活动，把颐和园、圆明园、北海、天坛、故宫旅游活动景点都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千年古韵的旅游强势品牌；通过这一活动，把全世界游客的目光都吸引到北京来，让北京旅游长盛不衰。还可以再举办千年古韵国际艺术节，千年古韵时装节，千年古韵诗歌艺术节，千年古韵建筑博览会，千年古韵国宝世界巡回展，千年古韵书法绘画国际大赛，千年古韵美食节等一系列

活动，以此把北京的千年古韵城市主题文化充分展示在世界面前。

（三）建设好一批以千年古韵为主题的雕塑大道、雕塑广场

现在北京的城市公共艺术视觉系统略显杂乱，一些广场、街道脱离了城市文脉，过于超前和抽象。北京应该把那些千年古韵的文化融入城市的广场、街道，以此提高古都的精、气、神，把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气质体现出来。

打造一条千年古韵国宝雕塑大道。即以故宫中的国宝为艺术原型打造千年古韵雕塑艺术大道，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打造一条千年古韵国粹京剧人物雕塑大道，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魅力；打造一条千年古韵民族文化雕塑大道，集中展示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精神意向、精神符号，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打造一个千年古韵文房四宝雕塑广场，体现出北京人寄托精神情趣的一个侧面；分别建造儒家、佛家和道家思想雕塑广场，使北京城市弥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气质，充满传统哲学氛围。

通过以千年古韵为主题的街道、广场打造，城市的人文品格，艺术气质，哲学思想就此提升起来，北京就会把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美轮美奂的艺术，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来。

（四）建造好一批以千年古韵为主题的标志性建筑和标志性社区

北京是一座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经典建筑风格的千年古都。其建筑以气派的皇家宫殿和皇家园林为代表，具有独特的东方审美艺术神韵和审美艺术造型。它那美轮美奂的雕梁画栋，飞檐拱柱，红墙绿瓦，灵山秀水，集中体现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文化内涵，构成了北京建筑的文化灵魂。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建设北京十大建筑中，都能把这种建筑审美艺术元素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和北京的历史建筑形成了和谐的关系，既能体现历史审美，又能体现现代的风格。而在改革开放后，受商业利益驱动和外来文化影响，北京在城市建筑风格上开始偏离东方建筑艺术审美逻辑和规律，让一些和古老建筑风格相对峙的建筑充斥于古城之中，造成了城市建筑风格的激烈矛盾和冲突，严重地破坏了城市的审美环境，甚至达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今天，我们要重新找回北京建筑文化灵魂，把这些中华民族最经典的建筑文化艺术元素融入城市的建筑之中去。建设一批与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圆明园建筑风格相协调的大型文化设施、大型购物中心、五星级宾馆、写字楼、大型社区等，形成像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香山饭店那样的标志性建筑和标志性社区。使北京的城市建筑既能体现传统文化精神，又能以现代意识对传统艺术文化进行全新演绎，最终把北京打造成传

统建筑文化和现代建筑文化相互融合，传统建筑艺术元素和现代建筑艺术元素相互统一的现代版新北京。

（五）开发好一批以传统工艺美术为载体的千年古韵系列旅游产品

千年古韵城市主题文化博大精深，可开发的旅游产品何止成百上千。仅以故宫中存放的国宝、名人字画这些世界上最精美的艺术品为例，如果把它们复制出来，就是最具价值的艺术品。通过这些旅游产品的开发，既可以弘扬北京千年古韵城市主题文化，又可以给北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可谓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六）对北京城市进行千年古韵城市主题文化空间战略发展规划

北京的城市规划一直在保护古都和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矛盾的进行着。在改革开放初期，以破坏古都为代价建设新北京的势力占了主流地位。随着一个个城建败笔的出现，保护古都，以传统建筑文化融合现代建筑文化建设北京的势力才渐占上风。现在，北京要按照千年古韵城市主题文化发展理念，制定新的城市空间战略发展规划，包括千年古韵文化区、旅游区、艺术区、商业区、标志性社区、教育区、历史保护区规划及千年古韵雕塑和色彩总体规划。通过这些规划，把北京建设成一个具有千年古韵文化功能、艺术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城市。而这些城市功能都将以中华民族文化作为平台，发挥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功能、艺术功能和经济功能。

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打造，中华民族文化之脉就被梳理出来，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就被提升出来，中华民族文化之魂就被塑造出来，北京就会依托千年古韵这个大主题把北京推向世界。北京世界城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就在于它独特的文化特质，就在于它独特的文化魅力。因此，北京世界城市建设要以千年古韵这个大主题来提升城市品牌，以中华民族璀璨夺目的文化来展示北京文化的魅力，最终把北京建设成以“千年古韵”为主题的世界城市。

（中国国际城市主题文化设计院　付宝华）



第六章　培育世界城市之良好环境



世界城市环境特点及与北京的差距

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为此，从世界城市的高度审视首都的环境建设，分析北京城市环境与世界城市环境的差距，尤其是与公认的世界城市纽约、东京、伦敦的差距，吸取和借鉴世界城市环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形成首都环境建设的鲜明特色，提高环境建设的成效和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世界城市发展都经历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在工业社会阶段，市政基础设施已经完备，生活水平有待提高，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现代城市特色和贫民窟同时存在。在后工业社会，市政基础设施和交通体系实现现代化，生活质量全面提高，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城市风貌和特色形成。进入信息社会后，城市人文特色、创造性和活力彰显，城市生态环境再造广泛开展，形成充满活力、特色彰显、生态良好的城市环境。总体上看，目前世界城市的环境呈现以下共同特征：

一、空气清新、河流清澈的生态环境

三大世界城市都饱尝了工业化的恶果。日本于 1972 年发布了《自然环境保护法》，同年制定了《关于东京自然保护和恢复的条例》，开始通过公害对策和城市绿化等措施形成良好的大气环境，对受工业化过程损害的生态系统和水边环境进行再生活动，开展以公害患者为首的居民健康建设、生活质量建设活动。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开始制定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措施。现在，伦敦已变成了一个比较清洁的城市，蓝天白云，绿树成荫，成为美不胜收的宜居城市。美国 1970 年出台的《清洁大气法》，使全国大气可吸入颗粒物降低 22%，SO_2降低 50%。经过治理，目前，三大世界城市空气和水体都恢复了清洁，环境质量明显好于北京，以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指标为例，2008 年北京指标约是伦敦和纽约的六倍、东京的三倍，二氧化硫指标也大幅超过这三个城市（见表 6－1）。

表 6－1　三大世界城市与北京空气质量比较

空气质量（ug/m^3）	伦敦	纽约	东京	北京
PM10（2004）	21	21	40	122
SO_2（2005）	25	26	18	36
NO_2（2005）	77	79	67	49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2007 年报告，2009 年北京市统计年鉴。

二、绿地充足、人与生物共栖的绿色家园

伦敦高度重视绿地和开放空间建设。大伦敦 2/3 的土地为绿色空间和水面，绿地覆盖率达 4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30 平方米。内伦敦的绿化带和都市开放地，占到内伦敦总面积的 11%。外伦敦的绿带和都市开放地占外伦敦总土地面积的 32. 3%。伦敦是保护多样性方面国际公认的领先者。纽约的曼哈顿只有 56 平方公里，80% 的土地是绿化面积，可供开发的建筑用地只有 20%。各社区都有休闲健身绿地。东京的绿化覆盖率 1972 年为 65%，1991 年为 60%（不包括岛屿地区）。东京的城市绿化，更注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从城市绿化指标来看，纽约和伦敦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是北京的两倍以上，特别要注意的是，北京的人均指标不是按常住人口，而是按户籍城市人口计算的，居然东京的人均公园面积都超过北京。在绿化的可达性、地域性、生物多样性方面，这些城市的做法也比北京更先进。

表 6－2　三大世界城市与北京绿化情况比较

城市名称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平方米/人）	绿化覆盖率（%）	人均公园面积（平方米/人）
纽约	30. 5	21	13. 5（街道公园）
伦敦	30	42	
东京		65. 5	5. 18
北京	13. 6	43. 5	8. 57

数据来源：三大世界城市数据根据相关文章和城市政府网站整理。北京的数据来自北京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整理。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公园面积按户籍非农业人口数计算。王郁：《城市管理创新：世界城市东京的发展战略》，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年，东京 2001 年 23 区的绿化率为 29%，多摩地区为 80%，作者推算出东京都城市绿化率为 65. 5%（包括屋顶绿化和河湖水系）。

三、充满都市活力、人文气息的公共空间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的“眼睛”，街道、广场、公园特有的空间类型具象而浓缩地揭示了每个城市的地方精神、人群和文化。三大世界城市的一些商业街区、商务设施、文化设施、政府设施和历史建筑前面，多设有丰富多样的广场，河岸和码头、风景区和特色市场，都建有供行人聚集、休憩、交流的公共空间，居住区建有可健身和交流的公共绿地或社区公园。这些公共空间常常聚集着多样的人群，自在休闲或观演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伦敦 GAMDEN 要求每年在公园或开放空间里举行不少于 24 次较大型活动。相比而言，北京近些年建设了一些公共绿地，但总体上公共空间仍存在数量少、尺度大、少趣味、不留人等弱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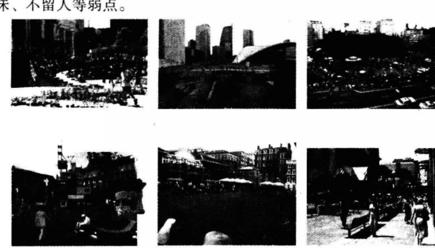


图 6－1　欧美城市的公共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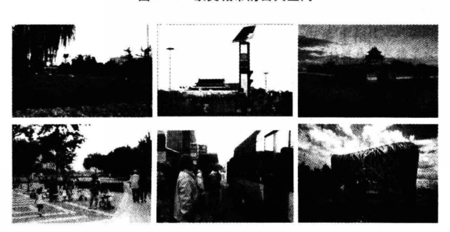


图 6－2　北京城市公共空间

四、代表民族文化和都市文明的观光胜地

伦敦和纽约都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东京虽不是标准的旅游城市，但也是令人向往的国际观光城市。三大城市都具备了知名旅游景点的五大基本要素：民族精神胜地、地域风光胜地、都市观光胜地、文化娱乐天堂、购物美食天堂。北京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都市观光、文化娱乐、购物美食的代表性的景点尚需进一步打造，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尚不完善，见表6－3。

表6－3　三大世界城市与北京的著名旅游景点比较

城市名称	海外游客接待数（万人）	民族精神胜地	地域风光胜地	都市观光胜地	文化娱乐天堂	购物美食天堂
伦敦	1390	白金汉宫、西敏寺、大本钟和议会大厦、唐宁街首相府	塔桥及泰晤士河、格林威治山、海德公园	伦敦眼、特拉法加广场、牛津广场、匹卡德利广场	大英博物馆、舰队街、伦敦动物园、皇家植物园、蜡像博物馆	庞德街、牛津街、丽晶街、柏灵顿市场街、皇家市场街、格林威治市集
纽约	950	自由女神像、华尔街、世贸广场遗址、联合国大厦	中央公园、布鲁可林大桥及环岛游	新时代华纳中心、洛克菲勒中心、时报广场	百老汇歌剧院、哥伦布广场、圣派翠哥教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第五大道、唐人街、华尔街、百老汇和外百老汇
东京	449	皇宫、东京塔、雷门、浅草寺、伊纳里参道、枝神社	上野公园、小笠原群岛筑地市场、新宿御苑	丸之内、谷涩、原宿、新宿、六本木	上野公园、博物馆、六本木、金阁寺、台场、两国	银座、新宿、涩谷、池袋、浅草、淺田、秋叶原
北京	379	长城、故宫、天坛、潭柘寺、历代帝王庙、孔庙、十三陵	龙庆峡、北海、颐和园、香山、十渡、百花山	奥林匹克公园、CBD、天安门广场	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三里屯、什刹海	王府井、西单、建国门、燕莎

资料来源：著名旅游景点根据旅行社网站整理。伦敦游客数量来自于李关云：《加速！伦敦2012》，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6月6日，第025版，伦敦主管经济的副市长John Ross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发言，为2006年伦敦接待海外游客数。纽约、东京游客数据来自首都经贸大学的段霞，北京数据来自北京统计年鉴，皆为2008年数据。

五、现代化的市政设施和可持续交通体系

三大世界城市具有发达的市政交通基础设施。纽约100多年前就基本建成了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具有绿色供水系统，无须建设自来水厂；公共交通24小时运行。伦敦的航空运输十分发达，市内交通方便，地铁是市内主要交通工具，伦敦地铁干线有9条，全长414公里。东京的基础设施始建于十九世纪末。1872年第一条铁路线启用，城市污水收集系统建于1884年，污水收集管网1994年在23区实现了100%覆盖率，2006年在多摩地区实现了97%的覆盖率。城市供水服务自1898年开始，覆盖率就达到100%。1964年奥运会在东京举行，新干线（"子弹列车"）开始运行，首都高速公路开通，成为东京今天繁荣的基础。

目前北京地铁有7条线路同时在建，预计2015年能达到市区每1000米有一地铁站的目标，但中心城市区站点密度不够，新城线网处于建设初期，近期还不能全面缓解交通拥堵状况，见表6－4；城市边缘地区的污水处理管网仍严重缺失，见表6－5。

表6－4　三大世界城市与北京轨道交通情况比较

城市名称	开通年份	地铁线路长度（公里）	市郊线路长度（公里）	线路条数	中心城区线网密度	中心城区站点数量
纽约	1927	293.2	1600	12	2.6	77
伦敦	1863	415	3070	12	3.49	72
东京	1900	213.5	3100	14	3.76	158
北京	1971	228		9	1.08	40

资料来源：根据周楠森、刘志洋、吴唯佳、宁阳在《北京规划建设》2010年第2期上发表的关于轨道交通的文章整理。北京的250公里轨道交通长度已经包括了大兴、亦庄两条地铁的延长线，所以市郊铁路长度未填写。

表6－5　东京与北京污水处理情况比较

城市	开通年份	东京23区和北京城区	东京多摩地区和北京郊区	全市
东京	1884	100%	97%	97.9%
北京	1958	94%	50%	80%

资料来源：东京数据根据东京都政府网站近日公布的数据整理，北京数据来自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员会提供的2009年数据。

六、多元文化与较高的市民文明素养

三大世界城市作为国际政治、文化、经济和管理中心，集聚了全世界众多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优秀人才，以本土文化为本底，具有多元的种族、宗教和文化。纽约和伦敦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35%的伦敦市民并非本地出生，纽约的该项比例则高达40%，远高于北京。三大都市都是人口众多、交通相对拥挤的城市。但公共生活中秩序井然，市民文明素养很高。如伦敦、东京的街头时有堵车现象，但汽车排列整齐，少有加塞、随便停车和鸣笛现象。高峰时地铁十分拥挤，但大家都遵守秩序、彼此礼让。广场、饭店、车站等公共场所，没有大声喧哗和吸烟现象。纽约和伦敦街头及地下通道中常有街头艺术家表演，演出者经过了严格的视听或相关艺术的测试，才被允许在此献艺，以确保表演能给过客以美好的视听感受。

北京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的丰富性和包容性为社会各界所共识，但居民的文明素质仍有待提高，参见表6－6。

表6－6　三大世界城市与北京国际人口比例及文化设施情况比较

城市名称	常住外籍居民比例（%）	世界文化遗产数	图书馆数	博物馆等其他文物机构	影剧院数
纽约	20	1	253	431	1528
伦敦	30	5	149	200	
东京	3.05	0	396	264	324
北京	0.63	5	25	148	160

资料来源：世界城市的数据来自首都经贸大学段霞，根据各城市统计年鉴整理。常住外籍居民比例中，纽约、伦敦为2005年数据，东京为2007年数据。图书馆数中，纽约为2007年、伦敦为2002年、东京为2007年数据。博物馆等其他文物机构中，纽约、东京为2007年、伦敦为2000年数据。影剧院数中，伦敦和东京为2007年数据。北京均为2009年数据，根据北京城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年鉴整理。

七、城市贫富差距拉大与空间隔离现象

城市贫富差距拉大并出现空间隔离的现象，学者们称作城市内部结构“二元化”倾向，是伴随经济和信息全球化而产生的城市社会空间的分裂现象，主要特征是新经济与非正规经济、富有与贫困人口、本地居民与移民

（或少数民族）相互依存并差距拉大，而居住空间相互隔离。学者们的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伦敦、马德里，还是圣保罗、墨西哥，大城市中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一直存在，并不断加剧"，"纽约作为资本精英的首选地，可以说是世界经济之都，城市二元化现象也很严重……令人震惊的是，这种二元化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最为明显，即城市金融与房地产的繁荣时期，尤其是曼哈顿地区。"萨森（Sassen，1988）指出，资本密集型的消费模型对劳动密集型的消费模型具有依存关系，即位于社会结构顶层的广大专职阶层人员，其消费模式依赖于非正式劳动力，如家政服务、儿童保姆、饭店或酒吧、保安、个人服务。

北京也存在一些与欧洲城市类似的境况："城市中心地区正在成为全球的联络点，但边缘化的群体存在于商业中心和国际酒店的周围；同时，也形成了不少少数民族聚居区，一些处于边缘化地带，如伦敦的陶尔哈姆莱茨或哈克尼区，巴黎的金滴街区（阿拉伯工人之家）。""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经历了这一发展过程，因为内在逻辑是由新的技术经济发展模型所致的。"北京边缘化人群主要聚居在旧城的平房区和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聚集区，与三大世界城市比较，上述区域呈现出片状和圈层结构，覆盖面积更大，人口更加密集，文化差异较小，居住条件更差一些。

总之，北京要在较短时间内建成世界城市，必须找出差距，认真借鉴和学习世界城市环境管理经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在遵循共性和规律的同时突出个性和特色，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城市环境建设创新模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刘欣葵　武永春）

世界城市建设与世界公民培育

北京定位为世界城市，是首都新一轮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真正成为世界城市，必须提高居民的文明素质，努力培育"世界公民"。

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背景

世界城市，又称全球城市（Global City），指在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

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

按照美国地理学家弗里德曼的观点，国际大都市应考虑七个标准：(1) 主要的金融中心；(2) 跨国公司总部设置；(3) 国际性机构集中度；(4) 商业服务部门的高速增长；(5) 主要的制造业中心；(6) 主要交通枢纽；(7) 人口规模，还要考虑人口迁移的目的地。

国际城市是城市形态的高级阶段，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是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主要节点。世界城市就是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城市，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现象，是充当全球金融资本运动的空间节点和国际移民的集散地。

从特征上看，世界城市是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通道和战略性产业的控制中心，是全球跨国公司的集聚中心、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全球重要的政治中心、全球制造业和高科技结合的市场中心，全球资本流、信息流、人才流、技术流和物流的集散中心，也是世界文明融合与交流的多元文化中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具有国际高端资源流量、具有全球国际影响力。

世界城市的标准主要包括：

(1) 国际性大都市，相当多的人口，包括有许多外国籍人士常年居住，设有相关的移民社区。

(2)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且具影响力。

(3) 先进的交通系统，如高速公路及大型公共交通网络，提供多元化的运输模式；重要的国际机场，作为国际航线的中心。在近海城市中，拥有大型港口。

(4) 先进的通信设备，如光纤、无线网络、流动电话服务，以及其他高速电讯线路，有助于跨国合作。

(5) 国际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公司总部（尤其是企业集团）和股票交易所，对世界经济起关键作用。

(6) 蜚声国际的文化机构，如博物馆和大学；浓厚的文化气息，如电影节、首映礼、热闹的音乐或剧院场所、交响乐团、歌剧团、美术馆和街头表演者；强大的体育社群，如体育设施、本地联赛队伍，以及举办国际体育盛事的能力和经验；强大而有影响力的媒体，着眼于世界。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 年至 2020 年）》，确定北京城市发展目标定位："按照国家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总体部署，第一阶段，全面推进首都各项工作，努力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阶段，到 2020 年左右，力争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具有鲜明特

色的现代国际城市的地位；第三阶段，到2050年左右，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

2009年，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强调，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中的高端形态，是落实国务院对首都城市规划批复的应有之义。12月下旬，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七次会议决议号召，当前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阶段，瞄准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审视首都的发展建设，加快提高科学发展的水平、规划建设的档次和服务管理的水准，使首都发展建设与国家和人民的需求相适应。2010年1月，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首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阶段，必须立足当前，着眼建设世界城市，坚持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管理、高水平服务，进一步提高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建设世界城市成为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

北京定位为世界城市，是首都新一轮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将促进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和国际事务，提高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带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进一步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通过扩大对外交流，进一步发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就是要瞄准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再度崛起，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大提升，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迅速变化，中国国际责任的逐步强化的现实，从更深远的历史视野来进行战略部署。

二、“世界公民”的形成

真正成为世界城市，必须培育“世界公民”。

人生活在世界上，属于一定的民族，在某个国家居住和生活，有自己的国籍，也就是某个国家的国民。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强，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个人也从某个民族、国家的一员成为“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概念最早由古希腊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提出，原来的意思是：每一个人既是城邦的公民，又是平等的世界公民。当然，当时他们所认识的“世界”跟现在的世界的范围、特征都不同。有人认为，全球化的进程是从15世纪开启的。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世界历史”的概念。他认为，由资产阶级发动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交通革命，打破了民族国家以往的孤立封闭状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已不可逆转。

1840年，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历史大潮。经过一百多年的奋争，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人们看

到了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

在英国培格曼公司出版的《邓小平文集》序言中，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说："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这里有几层意思：第一，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一再告诫：中国人要有自信心、自尊心，要懂得"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并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第二，作为"世界公民"，必须要有世界眼光，了解世界局势的发展；第三，中国必须融入世界，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世界公民"的思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戈尔巴乔夫认为："邓小平的最主要的成就就是经济改革。这是邓小平在世界共产主义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先例。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把他列入约翰·凯恩斯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行列中，后两人曾经强有力地影响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思想。"俄罗斯学者威廉·奥弗霍尔指出："在过去的世纪中，邓小平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人。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由于保证中国加入到世界秩序的行列而不是破坏世界秩序，这给亚洲带来了和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曾说过："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亚洲有30亿人口，中国大陆就占11亿之多。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

每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对"天下"、"世界"范围的拓展而不同。早先是对家族、氏族部落的认同，由于民族的形成而具有了民族意识，而在市民社会，作为市民而存在，随着朝代的更替、国家的兴衰，从臣民到国民，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法治社会，应强调"公民"的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享有基本的人权，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等。

居民或者居住在城市，成为市民；或者居住在乡村，就是村民。在某个国家，有自己的国籍，就是国民。"世界公民"，则是一个特定的概念。

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概念，是随着私有制、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将来必定消亡。国家有几个要素：国土、国民、国语、国家政权、国家主权等。由于全球化进程加速，世界各国相互交往、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家庭，国际移民越来越多，许多人改换国籍，加入长期居住地所在国家的国籍，其种族不能改变，而身份却发生了变化。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世界经济一体化，伴随着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人们逐渐冲破传统的国家意识的束缚，不再狭隘地"爱国"。据考证，列宁在给"爱国主义"下定义时是从狭隘的民族、乡土意义上来说明的，并非褒义词。狭隘的"爱国主义"其实是眼界的狭小、胸襟的限制，而不适应于全球开放

的时代。欧盟为打破国家的局限性做了示范。当然，它还不是取消国家。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把经济和社会的高度发展作为国家消亡的前提，未来将代替国家的行政性管理的乃是经济本身的有机联系和社会的公共管理。社会从国家手中收回了本来属于自己的全部权利，全体人民都成了权利的主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作为一对历史范畴也就不复存在了。

马克思指出："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列宁指出："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并进而认为："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劳动日，发动群众去建设新生活，使大多数居民都能够毫无例外地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完全消亡。"由于"国家职能"大部分是社会职能，而且大多数居民能执行"国家职能"，参与国家管理，国家不再高居于社会之上，而是回归社会，因而"国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世界城市具有对世界各国人口的巨大吸引力和包容性，由此带来文化的多样性和科技、经济的创造性。纽约和伦敦有占人口近1/3的人是在国外出生的。

三、北京如何吸引和培育"世界公民"

"世界城市"建设要靠"世界公民"，而"世界公民"只有在"世界城市"中才得以生存和发展。

（一）吸引国际人才

北京作为首都，有世界各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160多个，这些使领馆可以成为展示各国历史文化的窗口，而不单纯是办理签证的场所。

还有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和企业的办事机构上万个。外国在京常驻机构日益增多，包括新闻机构、外国人学校、经贸金融机构、运输机构，等等。许多跨国公司拥有国际化的员工，他们往往分属多国国籍，这也是世界城市的一个突出特征。由于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习俗有很大差异，这使得世界城市呈现文化多样化，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中心。

有学者提出，衡量世界城市人口国际化水平和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世界城市中侨民、外国移民以及经商、科研、教学、旅游等方面的外籍流动人口的比重。在世界城市，不仅外籍人口比重较大，而且城市人口的国

际流动也较大，人口异质性非常高。只有人口异质性高，才能使城市真正成为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和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国际性新移民是新文化和新文明的传播使者，移民文化是新文化的催化剂，是促进文明国际化的重要方面。对城市的国际化评价，除了城市经济国际开放度，还有城市人文国际开放度，主要包括移民人口指数、外语普及率、外来文化影响度。

世界城市的评价指标，在社会人文方面，主要考虑以下要素：外国领事馆数量、国际性机构数量、与外国建立姊妹城市的数量、高等院校数量、大型国际会展数量、和谐的社区文化和公共文明秩序、市民文明素质，以及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城市品牌的形成、外语普及率、外来文化影响度、休闲娱乐和公共艺术等。还需要经常开展国际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交流活动。

世界城市需要具有一定的人口规模，特别是需要提高人口质量，如人口学历比重、精英人才数量、留学生数、新移民数量、外国人口的出生数、外国旅游者数量、流动人口数量等。

在生态环境方面，需要有良好的自然环境，空气质量上乘，拥有富有特色的丰富的旅游资源，适于居住和生活，具有较高的幸福指数。

世界城市是全球高端人才的聚集地，是拥有一定国际人才的全球化城市，形成明显的国际人口社区以及多元的国际亚文化，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人口中包括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常住人口要达到一定的数量，非常住人口能长期维持一定的规模。一个城市拥有的跨国精英的数量与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位置成正比。跨国精英是世界主义的区域化推动者。职业流动性与地理流动性相结合，同时由于跨国精英在世界城市流的空间中，其社会、文化占有优势，处在把自身的习惯由世界城市向所在城市扩散的有利位置。在培育世界城市的过程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有意识地构建和形成高级劳动力国际流动模式。

汇聚大量国际人才，形成雄厚的智力资本，是决定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的首要条件。需要专门建立国际人才社区，建立配套设施如国际学校和双语学校，解决国际人才子女教育问题。

（二）利用和开发独特的文化资源

随着文化产业、创意经济的兴起，文化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驱动力。独特的富于魅力的文化品格、城市形象和市民文明素质，成为世界城市获得最佳品牌效应的重要途径。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是一个城市向高端发展的必要保障，是走向世界城市的必备要素。宽容和谐的城市氛围、舒适的生活、文明的城市环境，是吸引外来人才和国际人口的重要因素。未来的世界城市之间的竞争将从经

济实力竞争转向文化的竞争。

近年来，北京通过保护历史文化环境、建设文化设施、开展文化活动、发展文化产业等途径，营造了富有人文内涵的城市文化环境，正在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加快建设世界城市的步伐。文化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最重要的资源和特点，社会和谐是最重要的保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出发点。北京是一个具有古老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和全国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密集，汇集了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素，具有宽容博大的城市品格。北京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处，呈现出多样化的文化特色。

朱自清把北京文化特色概括为“大”、“深”、“闲”三大特色。林语堂分析了北京个性的自然、艺术、日常生活三要素。阎崇年概括了北京的四个特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主客分明，布局宏大；宫殿园林，珍宝荟萃；各个民族，熔冶一炉。朱耀庭总结了北京文化的五个特色：（1）特殊的环境，历史的选择——悠久的建城史；（2）中华文明的结晶——东方明珠，世界之最；（3）皇家文化的缩影——建筑、园林、陵墓；（4）帝都文化与民风民俗的物化——胡同、四合院、老字号、茶楼、会馆、学校、书院等；（5）民族交融、中外交流的历史见证——长城、运河、桥梁及宗教建筑。王东在《魅力北京——北京文化与北京精神新论》中把北京特色概括为九个方面：（1）风水宝地，生态多样；（2）人类文明、东方源头；（3）都市文化，源远流长；（4）六朝古都，皇家气派；（5）长城、运河，双龙交汇；（6）祭坛帝庙，东方神韵；（7）纵横中轴，胡同小院；（8）政治文化，交往中心；（9）古今中外，文化熔炉。其共同点在于：北京城悠久的建城史和建都史、灿烂的文化遗产、文化的多元性等。金元浦等把北京的城市精神概括为：多元、和谐、开放、创新。多元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交融，是北京的内在素质，也是北京走向未来的活力之源；和谐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天人和谐”、古今和谐、民族和谐、国际和谐等方面，也是北京的城市灵魂；开放是一种海纳百川、包容天下的胸怀，是北京不断发展前进的力量源泉；创新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北京文化的革故鼎新、发展创造，更是北京不断发展前进的力量源泉。

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了北京特殊的文化特色和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浓缩和结晶。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契机，北京展示了历史悠久、创意无限、活力迸发、热情好客的城市风貌，积淀了巨大的城市品牌资产。北京的文化特色和城市精神，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基础和突出优势，

因而首先要确立“创意之都”、“文化之都”的目标。

（三）确立“世界公民”意识

通过确立“世界城市”和“世界公民”意识，落实具体的举措，建设创新型北京，提升北京的形象，使北京成为具有无穷魅力和吸引力的“世界城市”，使居住在北京的人率先成为“世界公民”。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礼义之邦，北京走向“世界城市”，需要培养具有丰富文化素养的居民，体现开放、进取、坚定、自信而豁达、开朗、谦恭、敦厚的文明风范。

北京走向“世界城市”的过程，要发挥政府管理、市场运营、民间社会的力量。政府起着主导的作用，制定富于前瞻性的宏观整体战略，而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力量，需要平衡多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集团利益，这里，公民参与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以家庭和城市为单位，不再有国籍之分，但保留有民族的特质，个人的身份以平常居住和生活的城市为立足点，也即生活在市民社会之中。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不再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分。扩大城市的自治功能，以城市为社会组织的聚合地，消除国界，避免国际争端。不再有领土纠纷和战争，不再有杀伤对手的武装力量，只保留处理公共事务的警察。各个城市之间形成不同层次的“城际联盟”。如京津冀城际联盟、华夏城际联盟、亚洲城际联盟、全球城际联盟。

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类社会也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那时，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人际关系非常和谐，人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得到全面的发展。在“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人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不把人当敌人和对手，而是互相帮助，协同工作。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所有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前提。

这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也就是“世界公民”真正实现之时。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林坚）

世界城市的人文环境建设

建设人文北京是实现现代化国际城市发展目标的需要。国务院批准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将北京定位于“首都城市、世界城

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市委继往开来高瞻远瞩地适时提出“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城市发展战略，这恰恰是建设“世界城市”和“文化名城”发展目标定位和中央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

一、人文北京的文化界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文北京主要就是文化北京。因为“人文”最原始、最本质的意义就是“人”和“人的文化”。

（一）人文的基本概念

“人文”是个外来词，是 humanisim 的一种翻译，还可以翻译成“人道”和“人本”。主要是指以人为本，以区别于“神、动物和机器”，基本内容包括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还含有良好本性和心地慈善的意思。

随着奴隶制民主城邦的出现和政治、经济的繁荣，古希腊人创造了与古代东方风格迥异的灿烂古文化，它强调那些属于人和人性品质的领域，并在人类历史上首先明确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主张。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出现以人为本的古希腊人文精神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以“神”为中心的基督教封建文化的主宰下，人在现实生活中成了卑微渺小，毫无意义的躯壳。14世纪，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文主义者发起了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它以人为中心，同以“神”为中心的封建教会思想相对立。人文主义者以各种形式赞扬人的伟大和尊严，重视人精神和肉体的全面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处于生机勃勃时期的思想。

但是，自从 humanisim 的概念一引进我国，它就有了自己的中文所附加独特的含义。按照中文字典的解释，所谓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这是人文的主要内涵。“‘人文’是‘人’与‘文’的统一。‘人’是指理想的人性概念，强调的是以人为本；‘文’是指培养之中力量的人（性），悠久的历史文化、文化底蕴、文明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通过教育方式、手段对人的文明程度的提升，强调的是‘以人化人’。”由此说来，广义的人文相当于广义的文化，涵盖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政治文明、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科技发达和生态友好等。

（二）人文的文化定向

现时北京市委提出的“人文北京”，其主要内涵就是“文化北京”。因为严格地说，“科技北京”和“绿色北京”都属于大的“人文北京”的范畴，

而为了区别于“科技北京”和“绿色北京”，“人文北京”就需要限制确定为“文化北京”，包括“北京的政治文明、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

文化是城市生存、发展和品位升格的主要途径。“康德说，缺乏文化的城市生活是盲目的，脱离了城市生活的文化是空洞的。”城市的表象是物质环境，文化才是城市的本质和灵魂。美国著名城市研究专家路易斯·芒福德在他的《城市的形式与功能》著作中有这样的论述：“如果说，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一些名城，如巴比伦、罗马、雅典、巴格达、北京、巴黎、伦敦，成功地支配了各自国家的历史的话，那只是因为这些城市始终能代表它们的民族的文化，并把其绝大部分流传给后代。”建设“人文北京”，为的是提升北京的城市品位，提升人们的文化生活质量，提升北京城市的凝聚力、创造力和吸引力。“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人文北京”建设，是落实中央“十七大”指示精神的具体措施，是促进北京文化繁荣、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英明决策。

二、北京人文的国际比较

目前，国际公认的综合型国际化的大都市是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日本的东京、法国的巴黎。这 4 个城市被誉为“世界城市”，应该以它们的现代化、国际化的程度作为依据，提出北京达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奋斗目标。上海是我国的发达城市，在国际上也有较大知名度。与这几个城市相比，北京既有自己某方面的优势，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

（一）综合条件和实力

自然状况总体有利。北京的辖区面积较大，人口密度相对来说不太高。在 6 个比较城市中，北京的地域面积最大，有 16411 平方公里，人口 1743 万人，辖区人口密度不高，只有每平方公里 0.11 万人，比巴黎的每平方公里 0.10 人只多一点，大大低于东京和纽约的辖区人口密度。城区面积为 1370 平方公里，城区人口大概为 850 万人，城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0.62 万人，处于一个比较中间的位置，略高于上海和伦敦，是纽约城区人口密度的 58%，只有东京的 45% 和巴黎的 28%。从自然环境来说，北京和巴黎差不多，既有山区，又有平原，地貌、植被和气候的多样性较好，更加适合人文的发展。但是由于北京的水资源短缺，人口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经济实力差距较大。经济是人文发展的基础，与几个主要世界城市相比，北京尽管改革开放后这些年经济发展很快，但由于起点较低，仍然存在较大

差距。在世界城市评价标准中，服务业最为重要。银行、广告、会计和法律服务是世界城市的四个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评价标准，伦敦、纽约、巴黎、东京、芝加哥、法兰克福、中国香港、洛杉矶和米兰排在世界城市前列。经济实力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在世界城市中，伦敦经济实力最强，人均达到55000多美元，其次是巴黎39400多美元，接着是东京39200多美元，纽约是27000多美元，北京和上海差不多，都不到5000美元，比发达城市差得很多，比伦敦差10多倍，比纽约差4倍多。

外籍人口比例较低。世界城市是移民流动的聚集地，而现代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外籍人口的持续增长，这也是城市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元素。在这方面，纽约、伦敦和巴黎的特征都比较突出，东京相应差很多。北京的外籍人口数量尽管增长很快，但总数及比例仍然比较低。外籍人口比例也是国际城市的一个重要指标。纽约的外籍人口比例在国际城市中是最高的，达到314人/10000人，占纽约总人口的33.7%，这与它的联合国总部、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伦敦的外籍人口也比较多，达到194人/10000人，占伦敦总人口的27.0%，这与它的经济实力、城市环境有关系，与它的文化也有很大关系。伦敦现任市长肯·里维斯都恩说：“人们从世界各地来这里居住，伦敦的文化是他们选择的至关重要的因素。”[①] 北京的外籍人口还很少，是7人/10000人，占北京总人口的0.43%，这当然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但北京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还不够理想和文化多样性还不够突出也是重要的原因。

市民素质有待提高。城市是由人建设的，是为人服务的，城市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口素质，人口素质中最重要的指标当属受教育程度。在“城市和国家大学以上人口比例”一栏中可以看到，巴黎的数字最高，达到了31%，后面是纽约、伦敦和东京，分别为30%和28%，上海是18%，差距较大。北京的数字为“24.43%”，比上海高出6个多百分点，但与世界发达城市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① 伦敦发展署. 伦敦：一次文化大审计，2008年。

表 6－7　比较城市的基本情况[1]

城市名称	辖区面积和和城区面积（平方公里）	辖区人口和城区人口（百万）	辖区内人口密度[2]和城区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	外籍人口（万人）占本市人口比例	人均产值和国家人均产值（美元）	城市和国家大学以上人口比例
北京	16411 城区 1370	1743 城区 850	0.11 城区 0.62	7 0.43%	4554 2532	24.43% 6%
上海	6341 城区 2649	18.15 城区 1270	28.62 0.48	30 1.6%	4736 2532	18% 6%
东京	2155 城区 621	3560 城区 865	1.65 城区 1.39	191 2.4%	39218 27501	23% 18%
巴黎	12012 城区 105	1140 城区 230	0.10 城区 2.19	108.2 17.6%	39424 28117	31% 19%
伦敦	1577 城区 303	751 城区 272	0.48 城区 0.9	194 27.0%	55051 45513	28% 19%
纽约	945 城区 790	1800 城区 836	1.90 城区 1.06	314 33.7%	27420 25267	30% 25%

经济发展水平固然重要，但人文也是国际城市，特别是城市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伦敦的前市长肯·科文斯说过：‘正是伦敦的文化优势，才使其成为一个了不起的都市，很多人到伦敦访问只是为了这里的银行家。这个城市让人怀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经济，而更在于它的文化成就。’”而要进入世界城市行列，文化实力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按照文化实力指标评价，纽约、伦敦、洛杉矶、巴黎、悉尼和东京排在前列。那么北京在人文方面，与上海和几个主要国际城市相比，目前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二）文化遗产和设施

城市文物是城市人文的名片。城市文物记载着城市的历史，文物遗存越多，历史就越清晰，内容就越丰富，魅力就越强大。

---

① 本表中北京的数字来自《北京统计年鉴 2008》，而上海、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的数字均出于伦敦发展署的《伦敦：一次文化大审计》，以下各表同此。

② “城市人口密度”由作者计算。

文化遗产优势明显。历史文化是构成城市人文的最重要的元素，北京在文化底蕴这方面与其他世界城市相比，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从燕京古城的兴建直至元、辽、明、清，五个朝代都在北京建都，中华文明的火花可以说在北京长盛不衰。“在世界各国的大都市中，北京是东方文化积淀最丰厚的古都，建城史已有3000多年，城市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045年，比堪称世界文化中心的巴黎还早945年。北京历史文化悠久，人文景观壮丽，宫殿等皇家建筑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全市共有文物7300余项，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处，地方文物保护单位262处。”北京的周口店猿人遗址、明十三陵、故宫、长城、天坛和颐和园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目录》，世界文化遗产多于伦敦等世界城市。要实现“世界城市”和“文化名城”发展目标，就要保护好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北京的城市文化景观，在国际城市中彰显出鲜明的北京城市的文化特质、文化魅力。“要具备国际视野，善于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国际大都市在古都风貌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国外发达城市的政府、文化组织和普通市民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古建筑的保护和使用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政府制定新的建设规划必须事先公布方案，然后举行会议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方能得以实施。

表6-8　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比较

	北京	上海	伦敦	纽约	巴黎	东京
世界文化遗产数量	6	0	4	1	2	0

文化设施比较齐全。北京文化氛围浓郁，文化设施也比较齐全。北京的博物馆有179个，影剧院有286座，都基本达到了世界城市的水平。但是，尽管北京的博物馆数量不少，可参观博物馆的人数可能比伦敦和巴黎等城市少许多。伦敦前五名博物馆和艺术馆的参观人数达到年均2000多万，平均每人每年参观2.7次。巴黎的参观人数也达到年均2000多万，平均每人每年参观1.8次。遗憾的是，北京和上海在这方面都没有统计，估计年参观总数和年人均次数都会大大低于伦敦和巴黎的数字。

表 6-9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①]

	北京	上海	伦敦	纽约	巴黎	东京
国家博物馆数量	38	6	22	16	19	8
其他博物馆数量	141	100	162	85	138	71
公共图书馆每 10 万人口数量	25 1. 53	248 1	395 5	255 3	303 N/A	369 3
书店数量	127	300	927	498	1076	N/A

注：(1) 巴黎和东京的剧场演出数量是所有剧场而不是大型剧场的数字。

(2) 巴黎的数字来源于《法国国家统计》。

(3) 数据来源：由 BOP/Experian 统计合成 (2008)。

	伦敦	纽约	巴黎	东京
前五名博物馆和艺术馆的参观人数(百万)	20. 4	8. 3	20. 2	6. 7
人均年参观前五名博物馆和艺术馆的次数	2. 7	1. 0	1. 8	0. 5

数据来源：由 BOP/Experian 统计合成 (2008)。

提高城市人口素质是建设人文北京的关键。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的品位由人来塑造。人的素质是城市品位、城市文明的主导因素。人又是受环境影响的，由人塑造城市的品位反过来也能塑造人。城市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城市居民的素质。人的素质包括政治社会素质、法律道德素质、文化艺术素质、身体心理素质等。人口素质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教育的发展程度、城市文化设施水准、民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质量，等等。北京的电影院、剧院和音乐厅等设施的数量都不太少，但是展演的数量如果以上海为参考依据，应该就比伦敦和纽约少很多。

表 6-10　艺术文化设施和展演数量比较

	北京	上海	伦敦	纽约	巴黎	东京
电影院	65[②]	49	105	264	88	105
电影屏幕数量	199[③]	N/A	516	N/A	376	211

① 本表中上海、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的数字均出于伦敦发展署的《伦敦：一次文化大审计》。

②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 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 2007》，北京年鉴社。

续　表

	北京	上海	伦敦	纽约	巴黎	东京
大型剧院 每年演出数量	43 9288	19 3117	55 17285	39 12048	N/A 15598	N/A 8281
大型音乐厅和 每年演出数量	4 N/A	2 11736	9 32292	12 22204	5 3612	N/A 7419

（三）文化活动和活力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那么，文化活动就是一个城市的活力，就是一个城市的魅力。以伦敦为例，"在'开放、迷人、自信和动力无限'的品牌格调的基础上，伦敦的'文化多元化、无限创造性、充满机会以及无穷积极的推动力'的品牌价值也凸显了出来。"[①]为了不断增强城市的活力和魅力，也为了吸引国内外游客，促进经济特别是旅游经济的发展，伦敦每年举办几十项大型国际文化活动。而每一年的大型文化活动，除了传统活动外，都是在前一年就策划好的，并且以各种媒体向世界公布。2009 年，伦敦的大型文化活动就有 60 多项，而其中大多数都是国际性的。如一月的"新年游行"和"伦敦艺术展览会"；二月的"中国新年庆典"和"伦敦时尚周末"；三月的"河王之争"和"活力展"；四月的"伦敦华神马拉松赛"和"伦敦高尔夫展"；五月的"青年艺术节"和"伦敦城市节"；六月的"伦敦国际音乐展"、"品味伦敦"、"伦敦国际戏剧节"和"温布尔登草地网球锦标赛"；七月的"逍遥音乐会"、"伦敦设计节"、"市长泰晤士节"和"英国国际车展"；八月的"诺丁山嘉年华"和"伦敦铁人三项赛"；九月的"伦敦时尚周末"和"英国之旅"；十月的"世界艺术锦标赛"、"英国电影协会伦敦电影节"和"伦敦十月啤酒节"；十一月的"伦敦市长游行暨烟火表演"和"伦敦 BBC 美食展"；十二月的"网球大师赛"、"河畔冰雪节"和"除夕庆典"。"节日庆典活动是伦敦城市营销沟通的重要手段之一，伦敦在举办城市活动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大型的庆典活动。其中一些惯例化的、成功的节日活动，如 Regent Street 的点灯仪式、每年 8 月的狂欢节、皇家庆典等已成为其特殊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知名度、认知度及其对提升伦敦城市形象的贡献极为重大，不仅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同时随着电视的转播使数亿观众了解了伦敦。"伦敦现任市长肯·里维斯都恩说："广大

---

① 周丹. 伦敦城市品牌是怎样打造的. 中国报道，2007（3）.

的而且是愈来愈多的重要人物来伦敦参加庆祝活动，比去纽约的多一倍，比去巴黎的多50%。”

“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提出来的。它从诞生到今天，不过短短10几年左右的时间。而在英国，创意产业产值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第二大产业，是就业人口最多的第一大产业。法国、新加坡、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也都成为创造产值和出口创汇的重要产业。霍金斯预测，到2020年，全球创意产业创造的产值将达到8000亿美元。

文化产业的经济贡献率很能体现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色和文化活力。以伦敦为例，伦敦的“创意产业就业人数”达到55万多人，占伦敦就业总人数的11.7%，占英国创意文化产业就业总人数的25%，占英国就业总人数的1.88%。从就业上来看，伦敦的创意文化产业可以算作伦敦总就业中的重点行业。而从行业产值来看，文化创意产业也是伦敦的经济支柱产业。根据2007年的统计，伦敦的文化创意经济的产值达到210亿英镑，占到伦敦经济总量的16%。

表6－11　伦敦创意文化产业就业分布、总数及比例（单位：万人）

	出版	游戏软件	音乐、视觉、表演艺术	电台和电视台	广告	电影和录像	建筑设计	艺术和古董	时装	其他创意产业	总数和比例
伦敦创意产业就业和总就业	7.8	7.8	7.0	4.8	3.8	2.5	1.2	7	4	19.4	55.3% 471
占伦敦创意产业就业总数占比	14%	14%	13%	9%	7%	5%	2%	1%	1%	35%	100% 11.7%
英国创意产业就业和总就业	19.7	34.9	21.3	9.0	10.4	6.0	6.5	4.0	1.9	104.7	218.4 2946
伦敦占英国创意产业就业总数占比	40%	22%	33%	54%	36%	42%	18%	18%	23%	19%	25 % 1.88%

资料来源：《CLA经济》（2007），伦敦发展署2008年的《伦敦：一次文化大审计》。

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文化活力迅速提升。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2006 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 89.5 万人，创造增加值 812 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 10.3%，比 2005 年增长 15.9%。今年 1 至 9 月，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实现收入 2568 亿元，同比增长 19.3%；实现利润 127 亿元，同比增长 43.3%；上缴税金 103.9 亿元，同比增长 28.8%。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人士透露，2008 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占到地区生产总值的 10.6%，创意人才在北京已逾 100 万，成为服务业中仅次于金融业的新兴支柱产业。北京大山子“798”艺术区，是北京市最早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之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了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靓丽名片。2007 年 11 月 26 日，在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来到了“798”艺术区参观，他把参观“798”艺术区作为他此次行程的亮点，称之为“与 21 世纪的约会”。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于城市旅游经济有很大的助推作用。伦敦是一座驰名世界的旅游城市，旅游业是其最大的行业之一，每年的旅游收入大约为 150 亿英镑（合人民币 2000 多亿元）。旅游部门提供大约 25300 个全职岗位。在过去十年里，伦敦海外游客数量增长迅速。2007 年伦敦共接待了 2545 万游客，其中海外游客 1564 万人，年旅游外汇创收首次突破了 80 亿英镑。而北京 2007 年入境人数为 435.5 万人，旅游外汇收入 4.58 亿美元，尽管发展也比较快，但是比起伦敦，仍然还有较大差距。

表 6－12　城市国际游客数量比较

	北京	上海	伦敦	纽约	巴黎	东京
年国际游客数量	4355000	4300000	15640000	8140000	9700000	1470000
占城市人口比例	27%	24%	208%	99%	85%	12%

三、建设人文北京的建议

通过对北京人文状况的国际比较分析，结合北京的现时情况，要更好地建设人文北京，可以考虑是否能够实施这样一些发展措施。

（一）建设中央文化区

北京应该建设中央文化区（CCD，Central Cultural District）。城市要重视功能区的建设。一个大型城市，特别是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应该有若干特殊功能区，既要有电子城、金融街，商务区等经济活动专门区域，还要有比较集中的供人们进行文化消费的地方。文化功能区的建设比其他功能区的

建设更加重要，因为文化才是城市特色中最根本、最突出、最诱人的元素。

城市文化特色需要有集中展示的区域。例如，纽约有百老汇戏剧街，巴黎有红磨坊夜总会区，东京有新宿文化城和六本木青年乐园，莫斯科中心区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等等。而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和首都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要积极推动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北京现在缺少一个中央文化区。“我们已经新建了西单金融街、建国门商务圈，可惜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可以供普通市民从事文化休闲活动的新的文化中心区。”

建设北京中央文化区，不仅是为了满足普通民众的精神文化需要，让普通民众在轻松享受文化生活的同时得到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熏陶，同时也是为了提高北京的文化活力和魅力，更快地发展北京的经济。中央文化区是人类追求知识、掌握信息、享受科技成果、丰富想像力与创造思维空间的现代吸引物。北京人文化经典很多，但尚没有一处这样文化种类极为丰富、高科技表现力极强，环境极为优美的代表首都和国家形象的规模宏大、内容新颖的文化聚集区——中央文化区。中央文化区可以是一个城中之城，也可以是一座郊区新城，它融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为一体，融艺术观赏、娱乐参与、休闲餐饮、图书和艺术品展销为一体，集中展示北京地区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甚至可以展了国外优秀文化，以此来增强北京文化名城的吸引力，促进北京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央文化区的建筑一定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设计应该进行国际招标，建筑样式要体现民族建筑的风格，材料要取自天然，建筑工艺最好也是传统的，一切都要精益求精，以确保建成精品，使之成为北京一组新的扬名国际的标志性建筑。

（二）创办国际文化节

北京是国际上少见的文化遗产特别丰富的城市，市俗民情、民间艺术、胡同民居、宗教信仰、节庆活动等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进入 21 世纪，北京在举办世界性大型文化活动方面进步巨大，目前已经形成传统的有较大影响的文化节庆活动有：“相约北京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北京国际旅游文化节”、“北京国际时尚文化节”，“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等，但这些文化节庆活动与“巴黎国际时装节”、“法兰克福图书节”、“慕尼黑啤酒节”、“伦敦铁人三项赛”、“里约狂欢节”、“马德里斗牛节”和洛杉矶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等世界重名节庆相比，影响力还相差不少。而要进一步提高北京文化名城的世界知名度和影响力，就应该创建一两个具有北京特色的世界文化节日。

（三）建设文明新北京

一个充满人文气息的世界城市，一定是一个程度很高的文明城市。“建设

‘人文北京’的关键是涵养浓郁的文化特质，提升北京文明程度，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北京要建文明城市，最重要的就是城市物质形象和精神形象。城市物质形象是构成国际城市至关重要的因素，包括城市风貌特点突出，城市街巷清洁卫生，城市环境健康美丽，城市交通方便畅通等。而一个城市的精神形象更加重要，因为给人的感受更深刻、更久远。城市精神形象包括城市居民素质较高、公共服务齐全优质、日常生活安全有序、人际交往友好礼貌等。

要更好地建设人文北京，就要更加重视北京的文明建设，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文化名城、充满美丽绿色的宜居城市，充满现代活力和魅力的名副其实的国际城市。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　白志刚）

向绿色交通模式转变

一、世界城市对城市交通系统的要求

城市交通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它是指人们的出行方式，是承载出行工具的基础设施和由出行工具构成的综合体系。现代城市交通已经发展成了一种立体化、综合化的系统，包括城市内部交通系统和城市对外交通系统。城市交通系统主要由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系统、城市客货运输工具系统、城市交通控制系统构成。当前，世界现代城市交通正进入以信息化为目标的新时期，一个包括道路建设、客货运体系和交通控制管理组成的快速、便捷、舒适、高效的城市交通系统，不仅是衡量当前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世界城市必须具备的条件。

“世界城市”的特点是有很强的聚集力、有很强的辐射力，能聚集全球的资源，能影响全球的发展。有极高的经济发展水平；顶级的国际集散能力；高水平的基础设施；顶级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应是主要的金融中心；是跨国公司总部；国际化组织；商业服务部门的所在地和主要交通枢纽。而构成世界城市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城市交通应设施齐全、现代化程度高，能形成网络，从而能满足要求的国际流动。所以，城市交通系统的建设是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方面。

二、建设世界城市北京交通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北京市机动车的持续快速增长给城市交通带来了巨大压力，路、桥等交通设施建设的速度难以满足汽车高速增长的需要，逐年递增的汽车出行需求总量与市区有限道路资源的矛盾异常突出，普遍出现大范围街区道路交通拥堵现象。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测算，北京市因堵车造成的社会成本约为4000万元/天，相当于146亿元/年。从零点调查公司与《商务周刊》发布的《中国城市宜居指数》看，北京的交通便捷程度是所有二级指标中与总体差距最大的一项。此外，中国美国商会2006年5月发布了名为《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白皮书，明确指出急剧恶化的交通拥堵极大地影响了北京整体上的适合居住性。另据2006年6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首部《宜居城市蓝皮书：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北京）》显示，半数受调查的居民认为，交通便捷度是居住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可以说，交通拥堵已成为影响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制约因素。

从交通需求方面看：

第一，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加

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迅速，从1978年的7.7万辆增加到100万辆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从100万辆增加到200万辆用了6年半的时间；而从200万辆增加到300万辆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2008年6月，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达到329万辆。截至2010年4月11日，北京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21万辆。北京已经进入了快速机动化的“汽车时代”。所以创建可持续的交通发展模式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意义重大。

第二，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

北京除了具有居住、生产、交通、休憩等基本城市功能以外，又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经济管理中心、科技中心、信息中心、交通中心，等等。北京长期沿用的单中心市区连片扩展蔓延的空间发展模式，使市中心城市功能的过度聚集和土地的超强度开发，形成人口与就业岗位高度集中的格局，并由此带来交通出行的高度集中。目前北京交通出行量集中于城近郊区，三环以内集中了全市区50%以上的出行量，向心交通十分明显。汽车拥有量和汽车交通出行量的超常增长，导致市区道路网的高峰时段交通平均负荷度达到0.7左右，其中旧城区高达0.9，处

于交通饱和甚至超饱和状态。首都功能全都集中在市区，导致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客货交通流量高度集聚在市区特别是中心区。应该充分估计到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调整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近期，中心城功能高度集中的状况难有根本性改变，中心城交通压力仍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从交通供给能力方面看：

第一，道路面积率、道路网密度与国外同类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北京市区（中心城）道路网经过长期建设，基本形成方格网与环路、放射线相结合的布局，但道路建设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交通需求的增长势头。目前，市区人均道路占有面积仅为3.39平方米，市区道路面积率仅为12%，按照规划最多也只能达到18%到20%，发达国家一般在30%左右，据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分析，三环以内道路网密度为3公里/平方公里，道路用地率8.7%。而东京道路用地率为23.9%，伦敦中心区为24.8%，道路网容纳能力不能满足交通需求。

第二，公共交通的分担率低。

2004年上半年发布的《北京交通发展纲要》对伦敦、东京圈、纽约、巴黎、北京、上海出行方式进行了比较。伦敦、中国香港、纽约等大城市的当地人乃至包括富裕的中产阶级出行，主要交通工具是地铁或是公共汽车。私车相当普及，但主要用于通往公交车站的路段。资料表明，在进入伦敦、纽约、巴黎、东京核心地区的交通结构中，公共交通占67%~87%，居绝对主导地位；公共交通中又以轨道交通为主体，占55%~86%；小汽车交通（包括出租车）只占12%~32%。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首次达到45%。但与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公共交通占67%~87%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而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中的比例更低，2003年，轨道交通承担日常出行量的份额还不足5%，尽管到2008年8月北京已有8条在运地铁线路，总里程达到200公里，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比例还是较低；与北京交通规划的要求——2015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561公里，轨道运输比重占到公共交通运输总量的50%以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公共客运交通系统基础薄弱，公共交通的吸引力不足，难以应对小汽车交通的强劲挑战。

北京目前处于小汽车进入家庭的快速发展期，而且小汽车在日常出行中的使用率高于发达国家一些大城市的水平。这种出行方式的需求与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供给的矛盾日益加剧，是导致城市交通拥堵的首要因素。与国外同类城市交通发展状况相对照，北京的不利条件在于公共客运系统基础相对薄弱，轨道交通承担日常出行量的比例低，地面公交系统结构单一，到2008年

7月31日，北京只有3条大容量公交线路，运营里程约达55公里。难以充分满足日常出行的多样性要求。因此，在推行合理使用小汽车、改善城市交通出行结构策略计划上，北京面临着挑战。

当前，北京经济社会现代化、城市化及机动化同时步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期，城市交通的紧张局面是城市快速发展进程中多重矛盾的集中反映，城市交通发展始终伴随着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的调整、城市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机动化发展进程，从根本上缓解交通拥堵状况不仅要从城市规划、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入手，还必须转变交通发展理念，发展可持续交通，向绿色交通模式转变。

三、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思路——向绿色交通模式转变

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是集约化的绿色交通模式。社会化、集约化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和大容量快速公交BRT）与非社会化、离散化私人小汽车和公务车交通在市内客运交通中的客运分担率之比，是决定特大城市交通运行状态和服务水平的关键。改变小汽车和公共交通并行发展的现状，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快轨道交通和大容量快速公交（BRT）建设，制定高效率和有吸引力的公交政策，是提高交通效率、缓解北京城区交通压力的关键所在。这一点在社会上已经达成了共识。绿色出行理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这也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要求。

（一）打造世界级的公共交通系统——提供方便、快捷的公共交通，为绿色出行提供条件

便捷的公共交通不仅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关键，也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心城交通规划与建设应首先考虑公共交通因素，这既能有效地保护文物古迹，展现文明古都的文化魅力，又是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香港和首尔公共交通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案例。

中国香港依靠“公交优先”化解交通拥堵。①

公交种类繁多、功能互补，收费合理，市民可视需要选择城市铁路、巴士、小巴、电车、出租车、渡轮等公交工具。

城市铁路是中国香港公交的骨干，日载客量占市内公交载客总量的30%、前往内地旅客总量的70%。

---

① 市委研究室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

专营巴士是中国香港公交的主体，占全中国香港每日公交载客总量的37%。中国香港目前有5家巴士公司，拥有5000多辆巴士，运营线路近600条，日载客量超过400万人次。

非专营巴士等提供辅助服务。全中国香港有近7000辆非专营巴士，主要为游客、社区居民、公司雇员、学生等提供服务。全中国香港有4000多辆公共小巴，还有近2000辆只提供团体服务的私人小巴。

俗称“丁当车”的有轨电车已在中国香港岛主要市区运行102年，成人全程票价仅2港元，日载客量23万余人次，是游客浏览中国香港岛市容的上佳选择。

中国香港拥有出租车18138辆，车型主要是丰田，日载客量超过100万人次。

从中国香港岛到九龙有3条海底隧道及数条航线过海，还有几十条航线前往各大小离岛，从港澳码头前往澳门、深圳、珠海也十分方便。

道路设计及交通管理尽可能为公交畅通服务，为巴士、出租车等公交工具准备充足的上、下车站，严格限定非公交车辆停车占道。在城市铁路车站附近多建大型停车场，鼓励市民转乘火车去市区，在市区尽量少设停车场，使有限的道路尽可能供车辆行驶。

韩国首都首尔，四色公交车颇具特色。[①]

红黄蓝绿色公共汽车是外国留学生和自助旅游的游客们经常利用的交通工具，首尔四色交通体系，其通俗易懂的服务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出行方式。

红色的公交车，目的地一般是首尔的郊区。人们如果要到郊外去旅游，大都乘坐红色的公交车，外国游客要到机场也要乘坐红色的公交车。首尔公交系统中，共有43条专供红色公交车行驶的路线，交通管理部门把9100到9999的号码规定为红色公交车专用。这样，乘客在选择乘何种公交车时就大大缩小了选择范围，节省了时间。

黄色的公交车通往城市的中心区。由于是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市中心行驶，黄色公交车乘坐的人较多。它们的号码也好记忆，只有两位数。

蓝色的公交车是运行在首尔城市主干道上的汽车。而绿色的公交车又叫支线公交车，主要运行在首尔市的支线道路上，它们的任务就是把乘客送往换乘地点，比如各个地铁站。

过去到首尔的外国人往往分不清该乘几号车，被首尔复杂的公交车体系弄得晕头转向。由于国际交流、发展旅游业等多方面的需要，终于使政府下决心对交通体系进行改革。从2004年7月1日起，四色交通系统正式开始实

① 国际城市发展动态（2008）内部资料。

行。自从公交车改成了四种颜色之后，交通秩序有了很大改观，以前，公交车拥挤、不方便等缺点都得到了解决。由于人们觉得乘坐公交车很方便，乘坐的人越来越多，无形中减少了私人驾车对城市交通造成的负担，缓解了交通拥堵问题。今天，行驶在首尔大街小巷的四色公交车，可称得上是让人们体会韩国大众文化的课堂。人们可以乘坐公交车方便地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沿途则能以愉快的心情观赏首尔这个国际大都市。便捷的公共交通一方面缓解了交通压力；另一方面提高了城市吸引力，提升了首尔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

《北京交通发展纲要》提出建立“新北京交通体系”要以现代先进水平的交通设施为基础，构建以公共运输为主导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信息化与法制化为依托，提供安全、高效、便捷、舒适和环保的交通服务。要实施以公共运输为主导、公交优先的发展战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加快轨道交通和大容量快速公交（BRT）建设；进一步优化公交线路网结构；加强交通换乘枢纽建设，方便不同交通工具间的转乘等来提高公共交通的吸引力。要认识到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财政支持、路权优先、票制改革、加大投资、轨道建设、线网优化、解决拥堵等诸多方面。

（二）实施可持续城市交通战略，倡导步行、骑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

应加快自行车专用道路网体系及停放场地的建设；提供四通八达的绿色林荫步行道系统；为“绿色出行”创造条件。北京有史以来第一个交通发展纲要《北京交通发展纲要（2004—2020）》，改变了近几年因汽车拥堵而选择的以汽车为导向，牺牲自行车、行人交通利益的思维方式。首次明确提出，建立自行车和步行系统。今后，本市将充分利用旧城胡同和支路，开辟自行车交通系统，逐步形成地区性的自行车通行网络。在新建住宅区，建设良好的自行车交通和步行设施，提高居住环境质量。完善人行过街设施和行人步道系统，禁止挤占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确保自行车和行人出行安全、便利。同时，在市级商业区、中央商务区（CBD）、奥林匹克公园、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城市功能区以及新城，普遍建立与城市风貌和自然环境和谐的无障碍步行系统。这将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步行、自行车出行，绿色、健康、环保。这不仅有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也有利于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改善环境质量，为建设世界城市，打造顶级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创造条件。

以北京2008年奥运会为例，奥运期间，北京市日停驶机动车195万辆，

粗略估算，停驶 1 辆车每年可以减少温室气体 1.8t、燃油消耗 800L、周转量 1 万车公里。那么，奥运会期间停驶的 195 万辆小汽车将为整个城市减少 87.8 万 t 温室气体、3.9 亿 L 燃油和 48.9 万车公里的交通负荷。奥运期间北京市空气质量好于 2 级天数同比大于 16 天。

绿色交通出行取得的综合效果大大超越了交通本身，成为城市节能环保的有力支撑。从世界城市发展历程看，国外各大城市机动化进程最终都必将走上环保与节能的发展道路。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　张晓萍副教授）

以京津冀竞合为发展背景

经济增长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经济增长情况不仅关系到首都社会经济建设和城市现代化进程，而且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如何进一步转变首都北京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摆到了政府部门和业界面前。当前，北京正积极筹划建设“世界城市”。建设“世界城市”，北京首先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北京城市经济从外延扩张型、粗放的、靠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转到内涵集约型的、精细化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北京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及走向“世界城市”的必由之路。

然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并不是北京一个城市的事情，它还是京津冀城市群区域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天津、河北是北京的经济腹地和战略发展的区域支撑，京津冀竞合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区域背景。在建设“世界城市”战略目标下，北京应当尊重这个区域背景，遵循科学的发展理念，积极选择既符合“世界城市”发展目标，又充分考虑京津冀竞合背景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路径，努力实现北京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

一、以“世界城市”为目标，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大力发展面向“世界城市”的北京现代服务业

作为首都，北京市和天津市、河北省相比，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具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就要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北京市“十一五”规划早就指出，北京要注重发展知识型服务业，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增强服务功能和辐射力。稳定提升具有比较优势的金融、文化创意、房地产等支柱产业，积极培育旅游会展、现代物流、商贸商务服务业等潜力产业。

经过几年的努力，北京的现代服务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对于北京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与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世界城市相比，北京的现代服务业影响力仍有不足。尤其是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涉外旅游会展以及商贸商务服务业。因此，面向“世界城市”的北京，必须进一步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突出北京不同于天津、河北的产业特点，也为建设“世界城市”奠定产业基础。

（二）加速发展京津冀竞合中北京具有优势的现代高技术产业

在“十一五”发展的基础上，继续重点发展以特色软件、技术研发以及软件服务、信息增值服务和网络信息服务业为主的高技术服务业和以电子信息产业、生物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制造业。特别是要进一步提升北京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整体产业竞争力。积极发挥中关村科技园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推动上述产业发展的同时，北京还应积极培育数字电视、汽车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等潜力产业。截止到2010年12月22日，北京市高清交互数字电视用户已达130万户。按照计划，2011年北京市还将推广高清交互数字电视130万户。发展数字电视前景可期。当前，北京要继续做好北京数字电视产业园的建设与管理。汽车电子化被认为是汽车技术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革命。北京发展汽车电子有自己的优势，也是因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需要。发展新材料、新能源产业是北京一贯的政策，未来需要做的是继续挖掘潜力，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提升这方面的竞争力。

（三）借鉴世界城市的经验，选择发展具有北京特色的都市型工业

纵观世界各地特别是国际大都市，乃至世界城市，其都市型工业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以世界城市纽约为例，服装业、出版业、食品制造业、玩具制造业、化妆品制造业为纽约都市型工业中的龙头，服装企业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就连曼哈顿地区也有不少服装服饰业、黄金首饰加工业、旅游用品业等。

目前，都市型工业已经成为城市工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都市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传统生产方式向都市型工业集约生产方式的转变。建设“世界城市”，北京首先应顺应这个潮流，在综合北京在京津冀竞合中的地位以及北京

建设“世界城市”目标的基础上，选择发展与天津、河北有所区别，具有自己特色的都市型工业，包括已有一定优势的文教体育用品、服装纺织、食品饮料、家具制造、包装印刷、工艺美术等行业，积极培育名优品牌，服务北京乃至全国的消费需求。

二、以世界城市为蓝本，利用总部经济带动北京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一）发展总部经济是世界城市的基本策略

通过吸引企业总部集群布局，形成总部集聚效应，并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由此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发展总部经济可以为区域发展带来多种经济效应，如税收效应、产业乘数效应、消费效应、就业效应、社会资本效应等。大批国内外企业总部入驻，可以提高区域知名度、信誉度，加快城市的国际化发展。

三大世界城市，在城市发展中都很好地把握了发展总部经济与寻找新的支柱产业的问题。例如纽约，从表面上看，纽约基本上没有制造业加工工厂，但实际上纽约的制造业总部都留了下来，纽约以外的制造企业总部也搬了进来，制造业中的高端部门如研发、销售等环节在城市中发展，同时城市的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也实现了较快发展。在这种条件下，纽约实现了由制造业中心向商业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管理控制中心等城市功能的转化，发展成为了世界城市。

（二）以总部经济带动北京制造业的发展

北京应学习纽约的经验，通过总部经济模式，吸引全球跨国制造公司和外部制造企业总部入驻，这也是北京完善制造业配套体系的一种新模式。近些年来，北京总部经济发展很快，已经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国内大企业集团等总部聚集，在空间上初步形成了商务中心区 CBD、金融街、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三大总部聚集区。总部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北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

在京津冀竞合和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北京市更应该大力发展总部经济。要积极学习纽约制造业发展模式，将总部留在北京城区内，而将其制造基地外迁到郊区县，直至天津和河北，比如临近北京的廊坊、唐山等地。与此同时，北京必须与津、冀周边城市协同发展，构造“总部—加工基地”的链条关系，形成制造业发展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北京通过强化

研发、设计、营销和管理控制等方面的总部功能，同时疏解部分生产加工功能，与津、冀城市一起打造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中国第三制造业中心。

（三）发展总部经济推动北京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现代服务业的特点是知识和信息的高度集中，而总部经济恰恰能够成为集合前沿信息与快速更新知识体系的载体。因此，北京在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的基础上，要积极发展为国内外和京津冀都市圈企业生产经营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业、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现代知识服务业、房地产业等。

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背景下，北京更应充分利用自身总部经济发展的优势，立足“世界城市”，顺应总部经济推动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在追踪国内外现代服务业发展最新趋势的基础上，努力发挥总部经济对现代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同时，积极借鉴纽约等三大世界城市发展总部经济、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成功经验，力争实现北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

三、遵循“世界城市”的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一）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是世界城市的基本做法

循环经济以“减量、再用、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准则，是追求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的先进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是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深化。低碳经济是要解决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问题；循环经济是要解决资源有限和需求无限的矛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很显然，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是当今城市发展的一般要求，更是作为全球众多城市表率的世界城市首先应该做到的。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不可能跨越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一阶段。

当前，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城市竞争的新高地。三大世界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更是走在前列。以纽约为例。纽约推动循环经济的具体做法包括：颁布节约能源水源、垃圾分类丢弃和回收处理等相关法律；倡导市民参与节能节水、垃圾分类丢弃；引导企业参与政府的环保节能、循环经济计划；发展专业节能技术咨询服务公司；发展民间旧货中介信息机构；组建废弃垃圾回收“正规军”，指导垃圾收集处理的市场化、专业化

和产业化的发展；积极发展公共和共乘交通，以减少汽车尾气，等等。发展低碳经济模式方面，纽约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成立能源规划部门、政府拨款支持节能、提高建筑物能源效益、增加清洁能源的供应、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场、减少交通温室气体排放等。建设环保、清洁、低碳的“世界城市”，北京应该借鉴纽约等世界城市的做法。

（二）以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为基点，调结构促增长

北京应向世界城市纽约、伦敦、东京看齐，积极宣传和培育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观念意识。以资源节约、资源再生利用以及减少碳排放为突破口，尽快和进一步调整北京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要研究和充分利用北京的资源条件和区域特点，用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理念指导区域发展、产业转型，促进北京产业布局和合理调整。要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工业生态效应，开展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试点。通过引进关键链接项目，实现耦合和整合，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增强综合竞争实力。

当前，北京的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还不快，还需要加快步伐，进一步淘汰、关闭或转移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企业，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积极置换劣势产业存量，用于优势产业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努力实现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以及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的要求。通过若干年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北京能在京津冀竞合中确实起到带头作用以及为建设“世界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建立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引导保障体系

北京市“十一五”规划曾对搞好循环经济提出了几点具体措施，即建立产业项目筛选评价机制；推进循环经济体系建设，包括建立健全资源消耗管理制度、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制度，加强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产品开发与推广，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处理，扩大再生水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促进资源的再利用和产业化；搞好循环经济示范；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强化政策法规保障等。这些措施对于北京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关键是要继续完善和保证这些措施能够切实实施。

借鉴三大世界城市的经验，北京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需要建立和不断完善上述引导保障体系，特别是要切实和真正做到。下一步，北京还可以或者继续从贷款政策上、项目审批上、土地供应上、事后处罚上进一步加强管理。实行“绿色信贷”，从资金的源头上切断对高污染、高能耗、高碳排

放项目的资金供给。同时要加大环境保护监察处罚力度，不能以收费代替管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把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作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长远战略来看待。

四、参考世界城市都市圈发展经验，积极寻求与天津、河北的产业协调发展

纽约、伦敦、东京三大世界城市的发展，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自身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的作用。研究表明，三大世界城市都市圈城市产业布局虽然各有特色，但都具有产业衔接、呈梯度转移的圈层结构。以纽约为例。以纽约为核心，制造业带、交通带、城市带融为一体，形成了多核心的城市群体系。纽约都市圈区域内产业布局合理，城市间互补性强，提高了整个都市圈的经济稳定性，也为纽约世界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习借鉴三大世界城市都市圈产业布局的经验，北京应进一步依托京津冀都市圈，积极进行产业转移。要站在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积极营造京津冀产业协调发展的良好氛围。

（一）借助天津滨海新区优势发展北京高新技术产业

天津滨海新区制造业能力的增强为北京高新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科技创新和研发能力是北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北京不断研发出具有较高水平的科技成果。但由于作为首都生产成本较高等原因，使得在北京进行产业化的程度不高。而滨海新区依托自身的优势成为进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基地，与北京毗邻的地理位置也可以更加有效地实现研发和制造环节的互动。因此，从都市圈和经济腹地的角度出发，北京应该积极寻求与滨海新区在相关产业发展上的合作，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关键技术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制造业，借助天津滨海新区产业分工和产业配套的有利条件，保证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产业链支撑，促进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二）努力形成与天津、河北的产业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在以自主创新驱动为主导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京津冀产业互动应该呈现出错位发展的态势：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速，突出服务业优势；天津以滨海新区的现代制造业为新的增长极、河北以曹妃甸工业区为引擎，逐步发展成为新型工业化基地。在京津冀区域内形成北京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和津冀以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这两条不同的产业发展路线使得京津冀区域内各城市的产业结构呈现错位发展的态势，这种产业发展格局不

仅能够使三地各自保持自身的经济发展特色，为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也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三）将首都功能与区域核心城市的功能结合起来，挖掘产业发展潜能

北京要想在京津冀区域内充分地发挥首都功能及核心城市的功能，最好的方式就是将首都功能与区域核心城市的功能结合起来，挖掘产业发展潜能。北京应该借助首都文化、政治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商务服务业等，同时借助其核心城市的功能向周边区域进行产业扩散和产业链延伸，实现以知识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端产业带动津冀低端产业的发展。当然，北京作为核心城市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产业整合和协调发展的进行，鼓励企业等市场主体在京津冀区域内配置经济发展资源、进行产业链整合，实现互利共赢。在整个区域实现协调发展时，个体城市才能够从中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系副主任　谭善勇）

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目前，建设世界城市是国内外学术研究以及各国政府关注的热点之一。而北京正在建设世界城市，通过分析和把握世界城市圈发展的态势和特点，对于促进北京世界城市的发展，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世界城市的含义及对区域协同发展的要求

（一）世界城市的含义

1. 北京市政府对世界城市的定义

根据北京市政府 2010 年 1 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计划报告、财政报告名词解释》，世界城市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巴黎、伦敦、东京。其具体特征表现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五个方面，并具备以下六个支撑条件：一是一定的经济规模；二是经济高度服务化、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三是区域

经济合作紧密；四是国际交通便利；五是科技教育发达；六是生活居住条件优越。

这个定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是经过对已经存在的世界城市的研究而概括总结出来的，既是对世界城市基本概念的描述，也是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这一目标的宏观要求。

2. 国外对世界城市概念的研究

对于如何定义世界城市，先后有霍尔、J. 弗里德曼、萨森和卡斯特斯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比较具有影响力的是 J. 弗里德曼和萨森的观点。

J. 弗里德曼对世界城市的界定主要体现在他于 1986 年发表的《世界城市假说》一文中，强调了世界城市的国际功能决定于该城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联系的方式与程度的观点，采用“核心—边缘”的方法阐述了有关世界城市的七个基本观点：(1) 主要的金融中心； (2) 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3) 国际性机构所在地；(4) 商业部门（第三产业）高速增长；(5) 重要的制造中心；(6) 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7) 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这些衡量的指标开始注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市场外扩，功能延伸。弗里德曼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组织节点，它集中了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各种战略性的功能。

与弗里德曼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世界城市的发展相比较，研究世界城市的另一著名学者萨森着重从微观的角度即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来研究她所称的全球城市。他认为，全球城市就是那些能为跨国公司全球经济运作和管理提供良好服务和通讯设施的地点，是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地。萨森认为世界城市具有以下 4 个基本特征：(1) 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2) 金融和特殊服务业的主要所在地；(3) 包括创新生产在内的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4) 作为产品和创新的市场。

世界城市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关于世界城市概念的研究也日益深化，基于各个国家不同的发展历史、文化风俗、社会条件和地理条件等各个因素，要给世界城市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世界城市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它是在全球事务一体化进程中，世界多数国家或人民对一个国家中某个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综合因素的认知和审美认可，它往往体现着世界对一个城市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的肯定。

（二）世界城市对区域协同发展的要求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空间限制是每个大都市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一个城市走向世界城市的进程中，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因为资源、人口、经济

活动的承载力在有限的空间内都是有限的，它们有限的承载力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支撑无止境的增长，只有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各种交换，增长才有可能持续。这种交换，不仅体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也体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通过区域之间的协作，可以达到节约成本、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

我们在对世界城市的研究中，对世界城市的理解都要有一个区域的视角。要看到受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对世界城市形成的影响，使得世界城市的发展表现出新的特征，即城市发展的区域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的地域扩张不断向郊区扩散和再集中，包括农村城镇化和卫星城的兴建，形成多中心的区域城市形态；另一方面，在区域范围内，城镇群体化发展并形成由多个核心城市组成的连续城市化区域，即大都市区（带）或大都市圈。从区域层面来看，现有的世界城市；无论是纽约、巴黎还是东京，其发展都有一个支撑其发挥控制职能的高度发达的城市区域。纽约在全球经济的控制能力更多地取决于美国东海岸大都市带的强大支撑，而东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则主要来源于东京大都市圈和日本太平洋沿岸工业经济带的强大经济基础。甚至一些世界城市（比如荷兰兰斯塔德）的发展表明，世界城市的职能往往并非集中在一个重要的城市，而是在区域的核心城市间分散融合，形成高度整合、一体化的区域体系。

由此看来，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首先是建设世界城市区域，在区域层面要依托京津冀地区，构建区域城市网络，以连接世界城市网络。

二、东京、巴黎区域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对北京的启示

从当前形势来看，各世界城市周边都拥有幅员辽阔的腹地，这对世界城市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城市能级提升的地缘基础。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为学者公认的四大世界城市都已在大都市圈的层次上，建立了行政管理或协调机构，对周边地区的具体界定都已经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只是在城市功能上与其他功能区域紧密相连。这就使得中心城市能够在整个大都市圈的尺度上协调城市规划，调配公共资源。

（一）东京在走向世界城市进程中形成了“首都圈”

北京从单纯的政治中心到中国第二大经济中心，如今又向世界城市迈进，与东京从封建社会小城堡向现代资本主义大都市的转变、从一国政治中心向全国经济中心、世界经济中心转变的过程有着相似的历史轨迹。按照杨建荣先生在《论中国崛起世界级大城市的条件与构想》一文中所提到的都市圈形

成的条件即从区位位置、历史基础、产业转换和创新、高度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人口众多五个方面来看，以北京为中心的首都圈在都市圈形成的条件方面与日本首都圈具有同质性。因此，研究东京在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首都圈的形成与发展，对走向世界城市的北京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1. 首都圈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首都圈的核心城市东京集政治、经济、文化与对外交往等多种功能于一身，被誉为“纽约＋华盛顿＋硅谷＋底特律”型的国际化大都市，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人口和产业向东京集中的现象，不仅导致了交通拥挤、用地紧张、生活质量下降等负面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他地区的发展。面对这些问题，日本政府注重从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来考虑首都东京的发展，于1956年制定了《首都圈整备法》，使得东京与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被正式提上国家议事日程。这就是日本政府实施首都圈战略，通过东京的职能分散和东京周围地区的职能培育来解决上述问题。

从1958年至今，日本首都圈整备委员会根据《首都圈整备法》的规定共制定了五次首都圈基本计划。从第三次首都圈基本计划（1976年）开始，日本政府强调分散中枢管理功能，建设多中心城市，提出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建立多中心结构，明确提出要改变首都圈“东京一极集中”的空间结构，促进多极构造的广域都市复合体的形成，通过向周边地区疏散工业、大学和大型综合服务机构，合理安排功能，适度增加人口，并以此为依托建设副中心，减轻对东京中心区的依赖。此后，这种指导思想一直延续下来。第四次首都圈基本计划（1983年）的重点内容是提出发展新的产业核心，形成副都心。发展副都心的意图是把部分产业和政务功能分解出去，以缓解东京都中心区的压力。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一些新产业又集中在东京都，各类产业和公共服务功能仍高度集中在东京都中心区。针对这种情况，1999年3月制定的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计划提出，要改变首都圈“一极集中”的空间结构，形成自立、互补、相互联系的分散化网络型空间结构，并提出了三方面的措施：通过在东京圈内重新调整城市的空间布局与职能分工、继续整备业务核心城市来加强据点建设，形成多个自主性强的都市圈、对区域基础设施的整备，推动地域间的横向联合等措施，实现整个首都圈的一体化。日本五次首都圈基本计划的指导思想一直是通过东京都中心区的功能分散来改变首都圈“一极集中”的空间结构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对“东京一极集中”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2. 目前，以东京为中心，从中心向四周扩张，开发卫星城，构成“大东

京圈”。

1995年11月，东京都政府颁布了《将东京建设成生活型都市》综合建设计划，提出了将东京建设成为“安全、充满希望的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环境舒适、生活优裕，让每个人充分施展能力的城市。为实现这一目标，改善东京都的现状，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

在东京都中心以外，规划建设了新宿、池袋、上野——浅草、棉细——龟户、山崎和东京湾多个副中心，在八王子市、立川等地区建设多摩中心，将中心区的城市功能、设施和人口向这些地区分散和疏解，形成一批人口增长的“反磁力中心”，有效地缓解了中心区压力，其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趋势。

通过兴建卫星城，东京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形成，改变了原有的单中心模式，有利于扩大东京横向的地域空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通过建设副中心，集中容纳国际控制功能，扩散次级功能，控制城市规模过度扩张，有利于东京世界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利于发挥东京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城市、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

（二）巴黎——通过建立副中心和新城，实现区域整体发展

从传统上来说巴黎就是法国和欧洲的中心。20世纪后半期，欧洲城市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欧盟东扩后，巴黎位于由伦敦—法兰克福—米兰构成的欧洲核心区以外，这使巴黎的欧洲中心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因此，城市发展规划调整成为保持巴黎国际城市地位的有效措施之一。

1. 建立副中心——商务区西移

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巴黎保持着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19世纪开始，巴黎成为仅次于伦敦的欧洲第二大金融中心，中心商务区位于第一、第八、第九区。到20世纪前半期，由于老城区出现物质性衰落，高收入阶层离开市中心向西迁移，在城市西侧形成高级住宅区，商务活动也随之西移。战后经济恢复，尤其是以商务办公为主的新兴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商务写字楼需求增长迅速，推动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转换。为满足迅速增长的商务办公活动对空间的需求，保护旧城区的历史风貌，1958年规划部门对商务办公活动“西移”倾向加以确认，决定在城市轴线西端紧邻巴黎城的近郊区拉德方斯建设新的商务区。拉德方斯的规划、建设由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开发机构负责。经过30多年的开发建设，拉德方斯已入驻公司1500余家，可容纳15万人就业，成为以商务办公为主，兼有会展、政府办公、商业、娱乐、居住功能的欧洲最大的商务办公区之一。同时，在紧邻巴黎城外形成了一个风貌与城区截然不同的现代化的副中心，其标志性建筑拉德方斯大拱门

的建成，使得巴黎的历史轴线得到了延续和升华。

2. 建立新城

20世纪50年代末，为解决战后的房荒，在巴黎郊区匆忙建起的高层公寓楼群，虽然满足了居民的住房需求，改善了居住条件，但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生活单调，被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所诟病。1965年，巴黎在区域规划中首次提出建设新城，“解除快速城市化和城市蔓延对巴黎形成的制约”，向外围地区疏散中心区过于集中的人口，并对自发形成的郊区进行重整，新城作为郊区的“中心”，为周边居住区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商业娱乐设施。这一计划最初规划了九座新城，后来减少为五座，并且调低了新城的人口规模，从原先乐观估计的50万人调整为10万人。目前，在巴黎城的外围地区，沿塞纳河、马恩河、卢瓦兹河河谷方向的城市扩展轴向，形成了五座新城。这些新城的共同特点有：（1）新城中心距离城市中心（巴黎圣母院）较近，平均距离为25公里左右。（2）新城都有良好的公共换乘系统，通过轨道交通与市区相连，快捷方便，但新城内部结构较为松散，内部交通主要依赖私人小轿车。（3）强调新城的就业功能，新城集聚了众多的商务、服务业、研发和轻工业等产业活动，成为巴黎大区新的增长中心。例如，在圣康坦—昂—伊夫林，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的就业人数占了总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强，服务业就业更接近70%。（4）为保证平衡，增强新城吸引力，就近满足郊区居民工作需求和生活需求，新城功能较为综合，包括娱乐功能，如马恩拉瓦莱建有欧洲迪士尼乐园，为其直接提供了1万多个就业岗位；研发功能，如在埃夫里，建有欧洲著名的生物科技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功能，每座新城都有自己的大学和众多职业技术学院。（5）新规划的社区都以低层、低密度为特点，在规划建设中注重与自然环境相结合，将天然水系或人工湖泊巧妙地组织进来，外围有绿带环绕，并与原有的城市化区域隔离开。

巴黎的轴向空间发展战略既保持了中心区的繁荣，较完整地保护了老城区的历史风貌，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组织有序的增长空间，但是郊区各区之间，新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相当突出。

通过对东京和巴黎在走向世界城市过程中城市圈形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世界城市圈的发展不仅可以从总体上促进区域非农产业的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张，而且城市圈的形成和发展还根本改变和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建设城市圈形成的人口、产业和城市的非均衡的集中布局十分有利于人口、经济和资源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够促进国土的科学、充分的综合开发。

因此，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要注重以北京为中心的区域间的

协同发展。

三、北京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可行性及发展趋势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周边地区。随着北京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周边地区的发展水平也越来越成为支撑或制约北京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应从更大范围的视角来考察北京的经济增长，并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协调发展作为北京在建设国际型大都市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取向。

作为我国环渤海经济圈核心的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产业密集区和经济发达地区，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但是相对于北京、天津来说，河北一带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在世界城市周边，落后区域无疑成为制约经济圈中心城市发展的阻碍。在建设北京为国际型大都市这一背景下的京津冀地区区域协同发展，不仅对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促进北京周边地区发展、缩小城市间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形成北京的广阔腹地、为北京提供支持和发展空间，促进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

（一）北京在建立世界城市过程中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可行性

作为我国环渤海经济圈核心的京津冀地区具备良好的区域经济合作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京津冀地区地理区位优势明显，交通条件优越。北京、天津、河北三个地区共同位于华北平原的冲积平原上，地理位置上紧密相连，便于共用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便捷的交通网络。京津冀地区目前已经建立起便捷畅通的铁路、公路网，京津城际高速铁路的修建及北京公交系统向河北地区的延伸，加上京津冀地区已基本形成了以北京为主、天津、河北为辅的陆海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使得三个地区的交通联系得更加紧密。

二是京津冀地区聚集了全国最多的高等院校、科研基地和高科技产业园区，是全国综合科技实力最强的地区，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和科技人才优势。

三是京津冀地区生产要素资源和产业布局具有互补性。河北省的矿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从而第一产业和重工业比较发达，第三产业比较薄弱，能够为京津地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备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而京津地区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金融、高科技、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达，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工业制造能力很强，可以为河北提供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支持，并且可以为河北劳动力的转移提供空间。此外，北京的高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具有优势，天津的加工产业发达，而河北的采掘业、重

加工工业占据优势，三地可通过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合作，走经济一体化道路，达到人力资源、资本要素、实物资源的整合，实现高速发展。

四是京津冀地区彼此之间在城市功能上存在很大互补性。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天津是金融、物流、制造业中心，河北则定位于港口、京津装备制造业与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这些不同的城市功能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五是京津冀以前具有初步合作基础，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发展平台。京津冀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历史悠久，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京津冀三地就被作为区域经济的主体进行考察；改革开放以后，京津冀逐步形成了京津地区以第三产业为主，河北以第二产业为辅的“三三二”产业格局和发展模式；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举办，京津冀地区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快了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了真正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尝试。

在如今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看到，丰富的人力资本，雄厚的经济基础及以北京为中心所享有的各种发展机遇，不仅是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具有的可行性也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独特的区位优势。

（二）在北京走向世界城市背景下的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趋势

京津冀区域是我国北方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发展潜力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域。依据这一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可以认为未来的京津冀区域将是以知识型经济为龙头，以现代制造业为重点，以加工型工业、资源型工业为支撑，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我国北方经济核心区，成为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强有力的腹地和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基地。

京津冀区域经济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背景下的协同发展，既要注重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也要注重以文化、意识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1. 加快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首先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树立区域整体发展意识，加快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各级政府要从长远利益出发，建立整体发展意识，逐步消除地方经济壁垒，建立区域统一大市场，以促进京津冀地区间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人才、技术、资金等的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外，政府还要积极转变自身职能，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做好服务工作。

明确定位，制定合理区域整体发展规划是区域建设重要的依据和制度保障，也是区域各界达成共识的重要过程。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

新背景下，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应先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协调领导机构，明确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这个局面，立足于整个地区，做好各个城市之间的分工规划，从整体上整合区域内的经济资源，并统筹解决京津冀地区资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重大产业布局、城市规划等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问题。

立足比较优势，加强区域合作，合理配置资源。由于京津冀三个区域资源禀赋不同，侧重产业不同，因此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京津冀三个地区的城市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在此基础上，加强三个区域之间的合作，达到合理配置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积极促进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发展。

积极改变原有的以环境保护为代价的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世界城市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是世界多数国家或人民对一个国家中某个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综合因素的认知和审美认可，这就要求京津冀区域经济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背景下的协同发展，更要注重环境的保护，注重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这就要求京津冀三个地区共同合作与政策支持，在加强在环保技术研究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制定统一的规划、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以达到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统一。

2. 注重文化建设，促进文化一体化，形成富有特色的京津冀文化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京津冀三地虽属燕赵之地，但是由于本区域一省二市的格局长期存在，所以形成了功能定位差别和文化背景差异。北京要走向世界城市，与经济腹地水乳交融的文化趋同不可避免。

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要素市场人才自由流通的阻碍。不同区域之间人才流通不畅，行政分割是外因，究其根底，文化差异是内因。

由于历史原因，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北京是“官文化”或称为“皇城文化”，大气并带有一定的霸气，官气明显且十足；天津是“漕运文化”，又称“小市民文化”，天津自古受“京城”影响大，天津人顺民思想比较严重，“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忍则忍，长期以来形成了“小富即安”的思想；河北是典型的“燕赵文化”，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河北人憨厚、朴素、慷慨悲壮、崇尚侠义，长期以来形成了“重义轻利”的道德取向，商业意识淡薄。这种不同的文化取向，形成了京津冀文化上的分割。

加快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就要打破文化上的分割，转变文化观念，培

育市场经济观念，促进区域间人才流通的同时，以北京为中心，以富有魅力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形成富有特色的京津冀文化圈，推动北京走向世界城市的进程，建设魅力北京，魅力中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　谷军副教授　研究生　杨雅琳）



第七章　关注世界城市之安全问题



地下空间开发与城市安全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进入高速发展期。截至2007 年年底，全国设市城市共 656 个，建制镇近 2 万个，全国城镇人口已达5. 94 亿，城市化水平达到44. 9%，而且形成一批城市密集地区。据预测，到2020 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 8 亿多，在净增 3 亿，届时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 60. 5% 以上。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展，城市发展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如土地资源被大量占用、建筑空间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灾害频繁发生、城市综合防灾能力薄弱等。正视城市生存环境恶化的现状，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已成为保障城市安全的迫切要求。

关于城市安全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开展研究，但几乎都是以城市地面空间为研究对象。一些研究虽涉及城市的地下空间，但多以研究地下空间内部灾害及其防范、传统的人防和消防工程为主。当然也有一些国外学者较早地从地下空间综合利用的角度对城市安全问题展开了研究。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也开始从地下空间综合利用的角度对城市安全问题做出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不少学者研究认为利用地下空间是解决城市地面拥挤、优化交通和污染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有效利用地下空间能带来宜人的城市环境和提高城市的安全性，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在地震灾害中能够发挥防灾、抗灾的巨大作用。

一、现代城市存在的安全问题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城市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导致城市资源的紧张和环境的恶化，使得城市系统的内部结构无法满足城市安全的要求，即城市系统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比如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群体事件、暴力事件等；二是随着城市中人类活动产生的反馈效应日益强化，导致城市对自然的或人为的灾变敏感度高、承受弹性小，即外界的干扰和胁迫（自然的或人为的）易使城市系统遭受损失或产生不利变化，城市的抗灾能力变差。如 SRS、禽流感、甲型 H1N1 流感、汶川地震、吉化事件等。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城市系统内部本身的因素，如城市人口水

平、城市功能布局、基础设施状况、防灾减灾能力等，会导致城市系统内在的不稳定性的问题加大。

二、利用地下空间解决城市安全问题

地下空间作为目前未被充分利用的自然资源之一，具有扩大城市空间容量、改善城市环境、节约能源、抗灾、防灾、减灾的功能，把城市中相当一部分的功能性设施转入地下，是有效解决城市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如果一座城市的地下世界比地上空间还要精致、丰富，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该城市的发展水准。

（一）扩大城市发展空间

开发地下空间，扩大城市空间容量、改善生态环境、减少灾害事件的发生概率。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带来了土地紧张、交通拥挤、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增加了城市系统的不稳定性，阻碍了城市发展。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通过修建地下交通系统、建造地下工厂仓库、把商业文娱项目转入地下、将城市中有污染的项目（如污水、垃圾处理厂等）置于地下，不仅扩大了城市空间容量，而且可以腾出地表以增加城市绿化面积，减少城市污染，促使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从而降低灾害事件的发生概率。

对于北京而言，北京市总地域面积没有增加，而城区面积则不断扩大，由四环、五环以致扩大到六环。北京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对城市生态环境、地面开敞空间的要求提高，部分城市功能转入地下，有利于改善地面环境品质；同时，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风貌的保护范围很大，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可满足城市容量扩大的需求，更好地维护地面环境，保护历史风貌。

（二）提高城市的抗灾能力

城市基础设施地下化，减少暴露、降低城市对灾变的敏感性。城市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给排水、电力、燃气、热力等系统，城市安全对基础设施的依赖性极强。城市基础设施的破坏本身就是灾难性的，不仅使城市生活和生产能力陷入瘫痪，而且也使城市失去抵抗能力，增加了城市对灾变的敏感性。与地面空间相比，地下空间具有较强的抗爆、抗震、防火、防毒、防风等抗御外部灾害的防灾特性。将城市基础设施地下化，减少暴露，提高其防灾能力和抗灾功能，是提高城市抗灾能力的重要手段。

（三）提高城市防灾减灾能力

利用地下空间的防灾减灾特性，提高城市对灾害的承受弹性。在灾害发

生、地面上的城市功能大部分丧失、基本上陷于瘫痪时，地下空间可以保存部分城市功能并得以延续，如执行疏散人群、转运伤员、物资供应等任务的应急交通功能，各种救援物资及设施的储备与供应功能，低标准空气、水、电的保障功能，各救灾系统之间通信联络的功能，以及保障救灾指挥机构正常工作的功能等，这些对于地面上的救灾活动和灾后恢复是十分必要的。

三、利用地下空间增加城市系统内部的安全性

（一）利用地下交通系统优化城市交通结构

地下交通系统具有不占用地面空间的优势，能够避免沙尘暴、大雪和暴雨等恶劣天气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地下交通系统与地面交通系统的协调发展，保证了城市交通的高效运转，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以美国为例，美国城市高度集中，城市矛盾十分尖锐，美国政府对此专门进行了地下空间的开发。美国纽约市地铁在世界上运营线路最长，达 443 公里，车站数量最多有 504 个，每天接待 510 万人次，每年待近 20 亿人次。纽约中心商业区有 4/5 的上班族都采用公共交通设施。市中心的曼哈顿地区，常住人口 10 万人，但白天进入该地区的人口近 300 万人，多数是乘地铁到达的。典型的洛克菲勒中心地下步行道系统，在 10 个街区范围内，将主要的大型公共建筑在地下连接起来。

（二）利用地下综合管廊整合城市生命线系统

地下管道网是城市生命线系统的主体部分，是维持城市功能正常运转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地下综合管廊是把市政管线中的电力、电信、燃气、供水、中水、排水、热力等管线中两种以上集于一体，在城市道路的地下空间建造的一个集约化隧道，设有专门的检修口、吊装口和监测、控制系统。由于具有现代化、集约化及防灾抗灾的特点，地下综合管廊便于平时和灾时各种管线的铺设、增设、维修和管理，在灾害发生时能有效避免灾害对城市管线的破坏，大大提高城市管网的防灾能力。

北京的燃气、供热、供水、雨水、污水、电力、输油、照明、通信等 12 大类地下管网近 3 万公里。北京市管网污水比城市道路总长少 193 公里，污水管网已经长达 3807 公里。一旦地下管线都改造完成，全部实现雨水污水分流，污水管网的长度应该是道路的两到三倍，也就是说拉直这些管线，可以一直从北京通到巴黎。

一些先进国家的城市，如美国的芝加哥、挪威的奥斯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以及日本的一些城市，在地下空间建立了下水道和污水收集与处理的统

一系统以及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的统一设施。

在我国，预计到2030年，在中等干旱年份，缺水300多亿立方米，但同时我国有400多亿~500多亿立方米的城市生活污水，其中80%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形成污染。如能达到英.国（100%）和美国（89%）的处理水平，则不但解决了污染问题，回收后也解决了缺水问题。因而，在我国城市中利用地下空间建立封闭性再循环的中水系统非常必要。

北京更是一个缺水的城市，因此能否建立大型地下无水处理系统、垃圾处理系统十分值得论证，利用地下空间建立封闭性再循环的中水系统非常必要。

（三）利用地下仓储系统分散城市危险品源

对于城市危险化学品，一般主要面临3种灾害形式：爆炸危险、火灾危险和毒物泄漏危险。利用地下仓储空间，将易燃易爆或有毒有害物资储存在地下，凭借覆盖层的保护，可以避免战争或其他意外事故（如撞击、雷电）的干扰，并避免发生上述灾害。即使发生上述灾害事故时，其蔓延或扩散的机会也会很小。同时利于战时伪装，把军工需求的危险品生产场所转移至地下，既有利于坚持生产，又增强战争潜力。

（四）扩大城市空间

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中心区都曾经出现过向上部畸形发展，而后呈现“逆城市化”的教训。由于城市中心区经济效益高，而以房地产业集中于城市中心区投资，造成了城市中心区高层建筑大量兴建。为了解决人流、车流过分集中问题，又兴建高架道路，高层建筑、高架道路的过度发展，使城市环境迅速恶化，城市中心区逐渐失去吸引力，于是出现居民迁出，商业衰退的“逆城市化”现象。城市的发展历史表明，单纯以高层建筑和高架道路为标志的城市向上部发展模式，不是扩展城市空间的最合理模式，向地下要土地、要空间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当今发达国家已把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作为解决城市人口、环境、资源三大难题的重要措施和医治“城市综合征”、实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些地下空间利用较早和较为充分的国家，如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和日本、加拿大等，正从城市中某个区域的综合规划走向整个城市和某些系统的综合规划。欧美国家在城市改造的同时，开发大量地下空间。在北美、西欧及日本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大型地下公共建筑：有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会议中心、展览中心以及体育馆、音乐厅、大型实验室等地下文化体育教育设施。

四、利用地下空间完善城市防灾体系

完整的城市防灾空间体系应包括地面空间、地下空间和建筑物内部空间在内的城市物质空间结构与形态，具备灾前风险减轻、灾时疏散、避难及救援、灾后人员安置、物资配送和医疗救护等功能。作为城市空间的子系统，地下空间应是城市防灾空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地面防灾空间的联系表现在功能的对应互补上，在平面布局上应与地面的主要防灾功能相对应，是地面防灾功能的扩展及延伸，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综合防灾的整体效应。根据地下空间在防灾、减灾时的功能不同，可将城市地下防灾空间划分为灾害防御空间和灾害应急空间。

五、结语

在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空间资源日益紧缺的今天，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已势在必行。通过把城市中相当一部分功能性设施转入地下，进行地下点、线、面状空间开发，扩大城市空间容量、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减少暴露、降低城市对灾变的敏感性、完善城市防灾空间体系、提高城市抗灾、防灾能力。可以预见，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作为一种解决城市安全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必将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发挥重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吕淑然教授）

都市发展的“烫手山芋”

一、何谓道德性政策

将“道德性政策”（Morality Policy）作为政策分类面向的作品，首见于Meier的“罪恶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in）一书，作者认为美国毒品以及禁酒政策的冲突，均出自于其道德性政策的特质，于是“部分民众希望通过政府力量将自身的价值观强加到其他人身上”，但因此处重分配的并不是经济收入，而是价值，所以其乃“重分配政策的特殊形式”。（Meier，1994：4－8）

在学者 Mooney（2001：3－4）定义下，所谓的道德性政策乃出于个人将争论的议题视为道德或罪恶，是出自主观的认知，因此并无客观因素可供观察。然而，现实中某些议题的确常被美国社会公认为是所谓的道德性政策，例如：酗酒及药物滥用（Meier，1994）、堕胎（Meier & McFarlane，1993；Mooney & Lee，1995；Norrander & Wilcox，2001）、死刑（Mooney & Lee，1996；1997；2000）、赌博（Pierce & Miller，2001）、同性恋（Haide-Markel & Meier，1996；Haide-Markel，1999）、色情刊物（Smith，1997；2001）、禁烟（Licari，1997）以及强制性交（Cocca，2002）等议题。

在新保守主义政治的环境当中，传统的重分配政治已然消逝（passe），社会福利的改革方案乃朝减少供给的方向前进，意即，在美国的政治当中，政府在不同阶层之间的财富重分配力量似乎越来越弱，但是相反的，利用政府力量进行价值重分配的道德性政策，却愈发蓬勃地发展起来。（Meier，1999：681）

二、道德性政策与都市发展

虽然，上述议题多属于国家层次常发生的冲突，也因此学者多是由国家的研究层次切入进行观察分析，（Sharp，2005：6）然而，近年来在地方都会区中的这类问题也层出不穷，诸如争取同性恋权利、堕胎权利、合法赌博、情色产业的主张，都造成了都会政府治理的难题。（Sharp，2005：6）这些问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各国都会区较工业区更早迈入“后工业世纪”（postindustrial era）（Rosdil，1991：81），重视妇女的社会角色、高学历素质的市民、非传统家庭形式、新形式的人力服务业，这些非传统的社会价值，必然造成各种道德性政策冲突，也因此使得都会治理更显复杂。

吾人可预料到的，已经发生在美国政府治理下的道德性政策冲突，未来也将成为各个迈向后现代国家所必须共同面临的困境。

以中国台湾的政治发展而言，在历经早期转型正义、宪政架构等国家结构议题，以及当代的治理效率改革（政府再造、区域重划、公私协力）之后，也将逐渐迈向后工业世纪，因此可预料到此类道德性政策的议题将渐渐跃上政策舞台。在中央层次，近期政策如死刑争议，便导致王清峰部长在没有任何违法或失职的情况下黯然下台（刘荣等，2010），也使欧盟检讨是否给予中国台湾落地签（法新社，2010）；为了保障日本情色影片的著作权，日本八家AV业者跨海申诉（新华网，2010）；雇主强迫穆斯林外劳吃猪肉事件引起国际关注（庄嘉惠，2010）。而各都会区也陆续因道德性政策引起争议，较大政

策如台北市郝龙斌市长取缔《苹果日报》禁毒新闻的议题引起媒体自由权的争议（林睿康，2001）；澎湖县设置博弈特区的公民投票引起当地居民的严重对立（徐沛然等，2009）；都会区内设置红灯区的议题，也造成都会首长正反两派的壁垒分明，云林县长苏治芬、屏东县长曹启鸿、宜兰县长吕国华三人明确表示赞成设专区，台北市长郝龙斌等十个县市则强烈反对（苹果日报，2009）。另外，小则如动物权问题，包括：是否应停止将收容所流浪动物安乐死措施（施如芬，2004），也都成为动保人士及部分议员的关切重点。

也因此，都会区的道德性政策研究，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新兴议题。

三、中国台湾有关道德性政策的研究进程

将较于西方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将道德性政策作为政治（或政策）研究上的一个专属议题进行研究，中国台湾截至目前并未将此类议题进行整合及系统性地讨论。虽然关于各种道德性议题（包括娼妓、赌博、死刑、同性恋、酗酒）的讨论从未曾间断，然而窥诸上述议题的讨论，在哲学或宗教层次，多集中讨论应然面的问题，即上述行为的道德与否；在犯罪学领域，则是讨论形成这些行为的心理或生理原因，并进一步找出解决之道。对于这些道德性议题（包括情色行业、赌场设置、死刑、性别、毒品）在政治或者公共政策运作上所造成的影响，虽然讨论的不少，但将这些相关议题整合成“道德性政策”概念，全面而系统地观察此类议题在政策上的运作表现的研究，则付之阙如。

中国台湾期刊首见也是目前唯一一篇明确以“道德性政策”为名的文献，系李美贤于1996年发表于政治科学论丛之“道德性政策之政治：以事件历史法来探讨美国各州死刑政策之立法（The Politics of Morality Policy：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U. S. States Death Penalty Policy Adoption）”，该文探讨影响美国死刑立法的因素，唯该文讨论者，仍是美国的案例。且彼时至今，便未再有讨论道德性政策之文章出现。因此，将相关研究成果转引至中国台湾，并以中国台湾的案例进行实证，有其必要。

正因为在中国台湾系统地讨论道德性政策之文献较少，因而欧美针对道德性政策所建构的一系列假设，并未有中国台湾内部案例的实证分析，因此，道德性政策的研究在中国台湾便有学术应用的价值。

国外对于道德性政策的实证研究，采取数种不同的研究策略，其中最大宗的便是跨州的比较量化研究（Meier，1994；Mooney & Lee，1999；Norrander & Wilcox，1999；Smith，1999；Mooney & Lee，1999；Mooney & Lee，2000；West & Orr，2007），以每个州作为分析单位，再以每个州的统计资料

为基础，对所挑选的变项进行交叉分析，进一步了解影响道德性政策的因素（相关说明将在文后进一步叙述）。

中国台湾一方面因行政透明化的要求，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化，一方面因应理性的循证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的需求，不论中央或地方政府，其所统计并公开的各项信息越来越多，也提供有意研究道德性政策者一个丰富的数据库，增加研究的可行性。而近几年中国台湾地方政府因应小区化的潮流，小区的差异及主体性高，治理形式多样，因此通过比较政策方式似可为道德性政策建构更丰富的理论模式。

四、国外有关道德性政策的研究进程

以公共政策本身的特性来分析可能造成的政策结果，原本就是政策研究中的基本课题。也因此，公共政策学界从不曾忽略政策分类学（typology）的发展。Lowi（1964，1972）早在四十年前便试图将公共政策依其特性区分为：分配性政策、管制性政策、重分配政策以及建制性政策。其后，尚有许多其他学者（例如：Schneider & Ingram，1997）亦试图将政策进行其他种类的区分。道德性政策与非道德性政策的分类，便是在此动机下的产物。

（一）道德性政策的特征

至于道德性政策的研究议题已如前述，包括堕胎政策、同性恋议题、死刑的兴废等，这些政策之所以格外难以处理，导因于此类政策与非道德性政策在几个方面上有所不同：

1. 民众对道德原则格外坚持

Meier（1994）及 Mooney（1999）都谈到，道德性政策所涉及的是每个人对“最核心的价值（first principle）”的判断，由于涉及的是根本上对错的信仰，是一种价值偏好的重新分配，若以公共政策光谱来描绘整体公民的偏好模式，则它与主流政策常见的趋中的中型分配偏好模式不同，而呈现往两端分裂的模式，也因此难以与政策的另一极取得共识，产生妥协的政策。（Lowi，1998）

2. 专家决策的比例甚低

第二个与主流公共政策不同的特质是，由于这类政策涉及的专业政策知识的密集度较低，故公民得到这类讯息的成本较低（low information cost），因此公民汇总信息得出结论的动机较强，专家或者特定利益团体操纵决策的可能性较低。公民愿意也易于参与政策的状况下，政府所有的措施将面临来自各方民意的挑战，将难以形成政策共识。（Meier，1994；Mooney，1999）

3. 议题具有高度媒体张力

道德性政策的最后一个特质，就是它“高度的能见度（high salience）”（Meier，1994；Mooney，1999），主要是因为媒体习惯于报道具高度敏感性、具有冲突性的政策议题，而道德性政策几乎具备了这些特质，便常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二）道德性政策在政治运作上的模式

正因为上述特质，道德性政策的研究者进一步假设该类政策在运作上会呈现某些特质，例如：

1. 公民在道德性政策的态度上，比较受到价值，而非利益所影响。（Lewis，2006；Patton，2007）

2. 在道德性政策的公民参与上，参与公投比率的会比其他非道德性议题来得高。（Schecter，2009）

3. 在道德性政策进入政策议程时，较受到一般公民力量的影响，而非政治菁英的主张。（Gulik & Hutchinson，1999）

4. 在涉及具争议性的道德性政策议题时，议员会扮演政治企业家的角色，积极响应占多数公民的立场（Meier，1994；Meier，1999；Haider-Markel，1999；Norrander & Wilcox，1999；Cocca，2002）

5. 因为道德性政策立法时标准过高，官员在执法时会产生较大的政策落差。（Meier，1994；Meier，1999；Smith，1999；Sharp，2005）

6. 法官在面对道德性政策的判定时，会在制度规范与自己的意志之间摆荡。（West & Orr，2007）

7. 若中央联邦政府要求州地方政府对道德性政策采取一致的立场，会引起中央与地方之间更大的紧张关系。（Mooney，2000）

8. 因为道德性政策的光环，使得提供服务的企业（如烟酒商、赌场、情色行业等）因不具道德正当性，而容易潜入地下化，各企业间不容易产生一般商业公会的结盟或竞租的现象。（Meier，1994；1999）

9. 道德性政策的变迁路径较不容易掌握，因为理性官僚在进行政策学习时，很容易受到公民意见的干预而产生变化。（Mooney & Lee，1999）

（三）道德性政策的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道德性政策因其本身的特性（民众对信仰较为坚持、专家决策程度低、媒体曝光度高），使得政策在运作时，会对政策当中不同的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同的作用。例如：代议士会更重视多数公民的意见、官僚在执行政策时会有政策落差的现象、企业不敢公开游说立法机关、中央政府不愿统一地方政府的规范等，这些现象以学者 Meie（1999a）的“罪恶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Sin) 一书中说明得较为全面，本文所提其他研究者则或多或少谈论其中一两个利害相关人的行为模式。而 Meier 的著作，虽然没有明示其所依赖的研究途径，但深究其内容，隐含着以理性选择途径以及利害相关人途径来分析问题的模式。这样的立场，在其另一篇论文中则更为明显，其通过公共选择理论所惯用的形式理论，描述公民的政策需求与立法机关的政策供给之间有高度的落差，导致道德性政策的紧张关系。(Meier, 1999b: 682 - 683) 但除了 Meier 的著作，其他道德性政策研究则多仅是验证前人所做出来的假设，并未分析这些假设背后的演绎逻辑。

至于目前道德性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最多研究所使用者，是以州或个人为分析的单元，将不同个人或州的特质，与所欲探讨的政策议题，通过各种统计方法进行交叉分析，例如：个人的财富背景或意识形态影响了对道德性政策的态度、州的公益团体数量或者受管制企业的数量，才会影响到道德性政策是否制定。(Meie, 1999a; Haider-Markel, 1999; Norrander & Wilcox, 1999; Smith, 1999; Mooney & Lee, 2000; Lewis, 2006; Patton, 2007; West & Orr, 2007; Roh & Berry, 2008; Schecter, 2009) 这其中以州为分析单位者，数据均系由政府既有统计得来，而以个人为分析单元者，其数据的搜集则兼用政府统计以及问卷调查。

其次乃通过政策个案的二手文献或访谈资料，归纳出道德性政策在运作上的逻辑，当中虽然有应用到统计资料，不过仅是基于说明之用，并未进一步进行交叉统计。(Meie, 1999a; 1999b; Mooney & Lee, 1999a; 1999b; Mooney, 2000; Cocca, 2002; Sharp, 2005; Schecter, 2009) 最少使用到的是贯时性分析，通过同一道德性政策的分析单位的历史演变观察，了解该单位随时间产生的特质变化，与政策制定或执行的变化之间的共变性，此方法则是设法将历史事件数量化并加总，再使用统计上的方法进行交叉分析。(Meie, 1999a; Cocca, 2002)

五、都会道德性政策的研究展望

(一) 道德性政策的“正名”问题

首先，到底是否存在道德性政策与非道德性政策的分类，便是许多学者所质疑的问题。Mooney, C. Z. & R. G. Schuldt (2008) 在“Does Morality Policy Exist? Testing a Basic Assumption”一文中，便通过了统计的方法来验证道德性政策的存在。此外，Smith (2002) 则认为传统公共政策当中所使用的分类学 (typology) 乃从理念型产生，会遭遇无法适用到实际政策系络的问

题，例如，某些被人认定是重分配性的政策，同时却会被其他人认定是管制性的政策；相反的，道德性政策则是由物理上的分类（taxomony）产生，凡存在某些特质者（如基于基本信仰、媒体高度关注性等），才能认定为道德性政策，进一步观察这些政策衍生出来的运作模式，才有意义。正因为在定义上充满争议，吾人在未来研究过程中，可能需要再进一步思考。

（二）应试图建立更细致的分析架构

前文曾提及，Meier（1999）目前的研究成果隐约透露出以利害关系人结合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道德性政策的企图。吾人认为为了解决道德性政策研究中的过多归纳，而无法提出政策建议的缺失，因此，通过理性选择理论结合利害相关人的分析架构，更全面性地解释各方利害关系人互动关系、道德性政策形成、执行以及演变时，之所以呈现迥异于非道德性政策运作的原因，是接下来应该努力的目标。

最早应用利害关系人概念的是学者 Barnard（1938），这些概念后来在系统理论当中也呈现出来（March & Simon，1958），虽然利害关系人是组织管理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直到 Freeman（1984）才试着将之理论化，以利害关系人的角度去思考组织的策略。公共政策学者嗣后也将利害关系人用来描述公民团体、劳工联盟、政党组织、民选领袖等（丘昌泰，2000；刘宜君等，2005），政府的政策制定及执行都必须整合这些利害关系人。（周国雄，2008；谢炜，2009）

但是，Rowley（1997）在检讨利害相关人理论后，发现利害关系人理论还停留在众说纷纭，尚未建立共识的状态下，就以最简单的利害相关人定义和认定来说，就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并认为若欲将利害关系人“由俾女概念成为主人理论（handmaiden concept to master theory）”，利害相关人途径必须与其他理论结合应用才是。

结合利害关系人概念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两者以发展理论者，以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的作品较为出色，不论是 Forecasting Political Events：The Future of Hong Kong（Mesquita，1985），还是 Predicting Politics（Mesquita，2002）或者 The Predictioneer's Game（2009），都将政策或政治事件当中的理性利害关系人作为主角，在其等互动之后而预测政策的可能结果。作者甚至根据理性利害关系人的逻辑发展出一套预测政策结果的程序（http://imcomputerconsulting.com/Predictioneers Game），提供有意预测政治事件者得以应用。未来学界可循此研究成果在继续往上建构，丰富道德性政策在演绎理论上的成果。

（三）道德性政策产生的争议及政策执行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在美国民主中，虽然人们对于这种道德论证的冲突并不陌生，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多是通过媒体中三言两语所做的交流，通过诋毁人格来进行

的竞争或通过追求私利的讨价还价来解决冲突，有学者因此认为应该建构更完善的审议式民主原则（Gutmann，1996：13），也有学者认为应降低道德性政策当中意识形态的色彩，将其重新建构成较小型，较容易处理的重分配性政策，（Meier，1999：685）才不至于形成“泛道德化”压迫“个人自由”的状况（Smith，1999：724），进行较理性的政策学习而产生政策扩散。（Mooney & Lee，1999：766）

反观自身，在中国台湾，道德性政策又何尝不是充满意识形态而难以处理呢？因此，道德性政策的冲突应该如何解决，实已成为中央及地方政府方兴未艾的议题，对公共事务“善治”有其迫切的重要性。唯相较于欧美国家，学界对此类议题关心仍缺，实值吾人投注心力。

此外，Milward（2007）在研究秘密与非法活动组织网络（如盖达组织）时，提出所谓“阴暗网络”（dark networks）的用词，希望了解阴暗网络的形成、运作的模式、造成的问题、消失的原因等。而在观察道德性政策的运作时，不乏这种受管制的企业所形成的阴暗网络。本文认为若能通过理性利害相关人的分析，或许能够了解政策的运作过程中为何造成“说一套、做一套”的政策落差。也只有了解道德性政策管制的企业如何形成阴暗网络，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政府管制执行为何失灵，才能进一步分析解决之道。

（四）道德性政策应通过实证研究予以验证

道德性政策的实证研究，是中国台湾学者未来应该强化的部分，而笔者未来拟以动物权研究作为分析对象。动物权议题近年来已逐渐受到欧美国家的关注，除了著名的 Tom Ragan 以及 Peter Singer 等人在哲学领域的探讨外，政治领域学者 Robert Garner 也已经研究动物权政策议题近二十年，著作除了探讨动物权与动物福利两种思维的优劣以外（Gaarner，2002；2003；2008；2010），也论及不同的动物权政策网络对政策的影响，更谈到各种不同的利害相关人的行为及其间的互动模式（Garner，1999；2002；2004），唯由道德性政策以往的研究观之，尚未有政治学者将研究议题涵括动物权领域。

动物权政策所关心的议题，大致可区分为同伴动物、经济动物、实验动物以及野生动物的问题。若从媒体报道的数量分析，吾人亦不难发现近年来相关的议题蓬勃发展的趋势，并且更是如其他道德性政策一般极具争议性，例如保育思维与经济发展的冲突、人道屠宰与社会习俗的冲突、实验动物福祉与人类利益的冲突、流浪动物安乐死与人性的冲突等，也因此造成政府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格外棘手，然而，相对于大众的高度关注，该议题在政策研究上并未得到等比例的对待。因此，若以动物权研究作为道德性政策的案例，除可增加道德性政策理论的应用议题外，也希望能对中国台湾目前动物权政

策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

笔者未来将以理性选择演绎出来的各种政策假设，通过中国台湾动物权政策上所搜集到的相关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至于将使用的研究方法，亦将循目前研究道德性政策惯用的三个策略来分析，视资料取得的可行性，采取质化的个案分析、跨县市的比较或者贯时性研究。

（台南大学行政管理系　吴宗宪）

北京的应急管理体制建设

应急管理体制主要是指应急管理机构的组织形式，即综合性应急管理组织、各专项应急管理组织以及各地区、各部门的应急组织各自的法律地位、相互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及其组织形式等，并且应急管理体制是一个由横向机构和纵向机构、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相结合的复杂关系，主要包括应急管理的领导指挥机构、专项应急指挥机构、日常办事机构、工作机构、地方机构及专家组织等不同层次。它主要侧重于应急管理的行政体制，即由应急性机关、应急性权力和应急性机制所组成的制度体系。

自2003年爆发“非典型性肺炎”以来，北京市在应对各种危机的挑战中，积极推进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完善。但相比纽约、伦敦、东京三大公认的世界城市，北京市应急管理体制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分析三大世界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的经验及其启示，对于进一步完善北京市应急管理体制，提升北京应急管理水平和能力，进而加快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整体步伐，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世界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的特点分析

（一）纽约应急管理体制的特点

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对城市应急管理的挑战，纽约市政府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发展出一套完备有效的应急管理体制。

纽约成立了以纽约市危机管理办公室（OEM）为核心指挥部门的危机指挥协调体系。这个办公室是纽约市进行危机管理的常设机构。但是对各种危机事态的有效应对，并不是危机管理办公室所能独立完成的，而是依赖于以

危机管理办公室为核心的一个组织网络的保障。危机管理办公室是纽约市进行危机管理的最高指挥协调机构。

首先，危机管理办公室与纽约市警察局、纽约市消防局以及纽约市医疗服务机构各司其职的同时通力合作，共同设计并组织实施对各种危机事态的应急方案。

其次，纽约市危机管理办公室与许多州和联邦一级的政府机构，有日常的合作关系。这些机构包括纽约州危机管理办公室、联邦危机管理署（FEMA）、国家气象服务中心（NWS）、司法部（DOJ）以及能源部（DOE）。危机管理办公室与这些机构互通信息，协调彼此的规划方案，共同进行培训和演习活动等。通过这些合作联系，建立起地方、州、联邦整体联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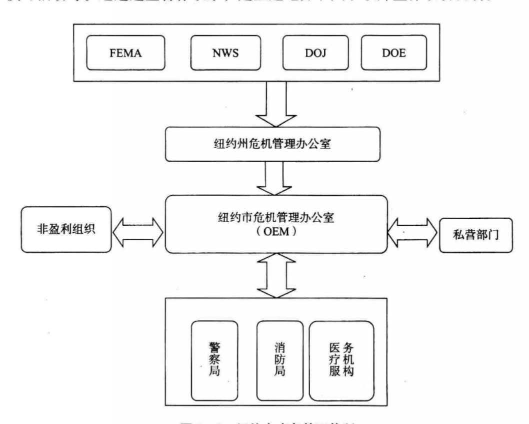


图7－1　纽约市应急管理体制

最后，危机管理办公室还与私营部门如爱迪生电力公司，以及非营利机构如美国红十字会通力合作，以保证纽约市的商业活动和居民生活能够在各种可能的危机中尽快恢复正常；在参与主体方面，则提倡多元化，危机应对网络化，合作区域化。同时，通过公民团体的组织形式，提高公民的志愿者服务水平和危机防范意识；在信息的沟通与披露方面，以政府为主导，建立

发言人制度，友好和有效地与媒体合作，对市民进行公开透明、及时、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的危机信息沟通。

（二）东京应急管理体制的特点

为了改善防灾应急管理体系方面的要求，2002 年东京都提出了建设面对多样危机迅速正确应对的全都体制战略。从应急管理体制的发展阶段上看，东京也已经历了由单项防灾向综合防灾，再转向危机管理的渐进型、均质型发展的过程；在组织机构建设方面，2003 年 4 月，东京建立了知事直管型危机管理体制，该体制主要设置局长级的“危机管理总监”，改组“灾害对策部”，成立综合防灾部，建立了一个能够统一应对多种类型危机、协调各个职能部门的应急管理体制。危机管理总监的职责是：发生紧急事件时直接辅助知事、强化协调各局的功能以及快速向相关机构请求救援。当灾害危机发生时，危机管理总监直接辅助知事，在知事的指挥下综合协调各局的应急活动。自卫队、警视厅、消防厅各自派遣干部职员 2 人直接置于危机管理总监的管理之下；在参与主体方面，东京吸取神户大地震的教训，提倡“自救、共救、公救”的理念，由包括居民、企业、NGO、NPO 在内的社区和政府共同组成，建立了市民自主防灾组织和企业自身防灾应急体系。同时对外建立了首都圈相互应急救援协作机制，东京积极研究开发和建设信息系统，加强信息的统一性和共享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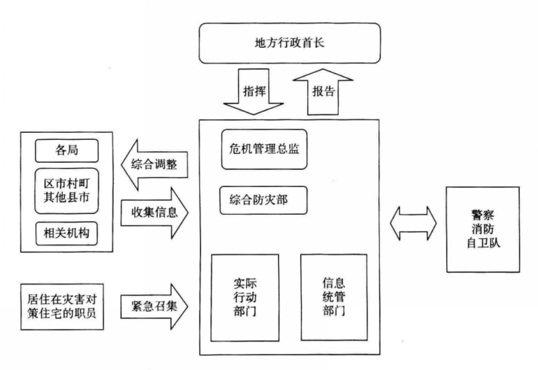


图 7－2　东京都应急管理体制

(三) 伦敦应急管理体制的特点

伦敦作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其应急管理体制建设的发展已比较完善，目前已形成了立体化、网络状的应急指挥协调体系；伦敦市应急管理体制框架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国家、地方和地区层面，便于形成决策、组织、指挥和协调应急管理；另外，以救援为主要宗旨，各部门职责明确也是伦敦市区应急管理体制运作的又一大特点。

国家层面上，在英国内阁中，设立了专门的伦敦应急事务大臣，监督伦敦重大违纪事项的准备工作和危机应对工作。该大臣的办公室设在副首相办公厅，作为内阁成员的副首相主管伦敦地区的应急事务。

地区层面上，伦敦市应急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伦敦应急小组、应急论坛、市长办公室和大伦敦议会以及伦敦政府办公室。伦敦应急小组主要由来自代表伦敦应急论坛各个机构的二把手组成，负责应急管理的调研和政策性建议工作。伦敦应急论坛主要负责监督伦敦应急小组的具体工作，其成员都是各应急机构和合作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市长办公室和大伦敦议会为伦敦地区层面应急规划机制的核心决策和协调部门，市长负责处理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各部门间的协调工作。伦敦政府办公室是伦敦应急小组的主管部门，承担与其他一些政府部门的辅助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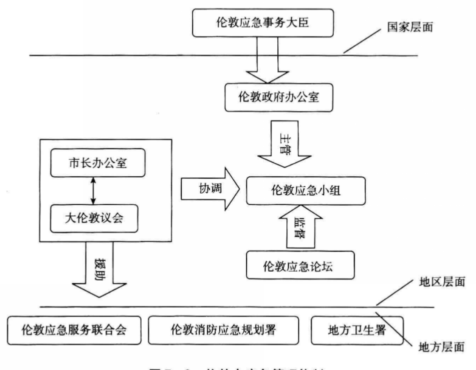


图 7－3　伦敦市应急管理体制

地方层面上，伦敦33个区政府都有自己独立的应急规划职能。因此，这一层面的危机应急机制侧重于各政府间的协调、沟通和对他们的统一领导。主要组成部门有伦敦应急服务联合会、伦敦消防应急规划署和地方卫生署。伦敦应急服务联合会的宗旨是“确保各有关机构在规划、应对任何重大事故时的伙伴关系”，其承担的主要职责是促成各区政府部门间的合作，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的反应。伦敦消防应急规划署主要是协助地方政府进行人员培训，具体执行计划，还要促成社会各方力量的合作，帮助他们各自明确在应急管理中所负的职责和义务。地方卫生署与伦敦地方政府职责有很多交叉的地方，主要负责地方的医疗救助和基本医疗保障。

二、北京市应急管理体制的特点和问题

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成为北京市应急管理体制建设的最大推动力。这一年9月，《北京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应急预案》公布，随后颁布了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在其随后修编发布的城市总体规划中也专章阐述首都综合防灾减灾专门机构的构建问题，北京应急管理体制初步建立成形。在此基础上，北京开始搭建应急管理委员会指导下的管理体制。随着2006年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编制完成，北京市应急管理体制逐步趋于完善。

（一）特点分析

2005年4月，北京市成为全国第一个成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构的城市，正式成立了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组建了13个专项应急指挥部，分别设在市政府有关委办局，以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全市18个区县也先后成立了应急委和应急指挥中心，有的区县结合各自特点在街道、乡镇和各个系统设立应急分中心。

北京市应急体制建设的基本框架简称“3+2”模式：“3”即市级应急管理机构、市属13个专项应急指挥部和18个区县应急管理机构，“2”即以110为龙头的市紧急报警服务中心和以市信访办12345为统一号码的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

尽管从建立成形算起历时不长且有待完善，但北京市现行应急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了自身特点。

特点之一是决策中心集中，纵向单向授权，决策和执行的有机融合。决策层即统一由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市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工作。市应急指挥中心是集信息收集、处理和形成应急决策方案的枢纽，

既有部分应急决策权，更是执行机构，从性质上看是决策和执行的有机融合，更有利于应对危机过程中的各种突发情况，执行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的决定，统一组织、协调、指导、检查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工作。而以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为核心的包括市属 13 个专项应急指挥部和 18 个区县应急管理机构等，其主要的职能是执行决策层的决定，处理应急管理过程中的各种突发状况。另外，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市应急指挥中心——区（县）应急委、应急指挥中心，纵向上单向授权，有利于信息上传下达的通畅性，避免由于层级过多，延误应急处置的时间并影响其效果。

特点之二是责权较为明晰，便于究责和监督。为高效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北京市应急管理体制构建了明确的责任体系，分别确定了各应急管理机构和专项应急指挥部的第一责任人和主要责任人，并要求做到领导决策不能远离第一现场，专业应对不能远离第一现场。在日常监管中，要求建立全过程管理的责任体系，各级政府对本地区的安全工作负总责，安全责任分解落实到岗、到位、到人。

特点之三是依托中央集权行政体制，充分发挥集中统一优势。北京现行应急管理体制凸显了政府机关的主导性，显示出动员性强等特点。在这一体制框架下，由北京市政府统一指挥协调所辖地区的中央机关、企事业单位，实现应急管理过程中的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分类执行，有利于提升应急指挥的效率和质量。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部门分割、条块分治、资源整合效率低，缺乏统一的协调机构是北京应急管理体制存在的首要问题。从组织管理看，应急管理存在着部门化倾向，各应急管理部门的垂直管理较为完备，但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关系并不十分明确，职责交叉和管理脱节现象并存，协调力度不够，协同性较差。虽然目前北京市政府都建立了“应急管理办公室”，作为应急管理的日常办事机构。但在日常运作中，却与值班室没有明显区别，不能很好发挥应急办的作用，一旦发生特大灾害，很容易影响应急办工作职能的发挥。

其次，政府间的相互援助和合作程度较低，跨部门、跨地区的合作机制尚未完善。信息的收集、发布、决策、执行与监督过程都需要协调，这其中包括中央政府与北京市政府的协调，北京市政府与区（县）、社区居委会的协调，北京市政府与毗邻省市政府的协调与合作，以及市政府内部各部门间的协调、沟通与合作。

再次，应急管理主体单一，社会合作机制尚未形成。当前应急管理体制仍然过分依赖政府所属部门的力量，不重视发挥社会组织体制的作用，不能

充分动员群众，不注重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和作用，咨询制度还不完善，造成应急管理的主体单一，社会参与度较低。各种非政府公共部门、社会组织、社区、企业、新闻媒体和公众在应急管理中都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目前除了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这样的老牌组织外，我国的一些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很少和国际上的专业组织和国际志愿者组织接轨，而能够吸纳各种捐助的民间基金会也很少，这就严重限制了社会组织力量的发挥，也就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另外，对全社会防范风险和应急管理处置的教育、培训和演练工作不够，措施不到位，具体要求不明确，社会危机意识、风险防范意识、自救互救知识和能力、主动参与程度都十分薄弱，社会参与的动员体制亟待加强。

最后，应急管理的信息机制、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仍不健全。关于应急管理工作应承担的责任，仍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有明确、具体的分级分类责任标准。目前，像一些信息瞒报、救援不到位的情况，基本上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在预警预测、应急准备方面，工作职责不到位的情况却往往没有追究责任，而这部分恰恰是最重要的。强调预防、强调防患于未然，已成为应急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有效控制突发事件发生和最大限度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的主要方法。因此，只有加强预警预测、应急准备部分职责的清晰界定，以及加大对信息瞒报、救援不到位行为的问责机制，才能够提高应急处置的工作效能。

三、特点比较和启示借鉴

三大世界城市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起步较早，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对于北京市应急管理体制建设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表 7－1　纽约、东京、伦敦和北京应急管理体制的比较

	纽　约	东　京	伦　敦	北　京
组织机构	1. 专业部门分工明确 2. 综合协调的核心指挥部门：紧急事态管理办公室	1. 注重协调的危机管理机构：综合防灾部 2. 专业水平相当高的各个部门	核心决策和协调部门：市长办公室和大伦敦议会	以管理单项灾种为主的各个部门
部门协调	部门内、外协调	跨部门的协调、部门中的内部协调	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的内外协调	条块分割

续 表

	纽 约	东 京	伦 敦	北 京
区域合作	地方、州、联邦整体联动	应急救援协作机制完善，区域合作应急能力强，整体联动性高，首都圈八都县市联合应急	地区、城市、大都市区、中央政府整体联动	机制不健全，区域合作能动性弱
信息沟通和披露	1. 公开、透明、及时、便民 2. 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	以政府为主的信息公开和透明	政府主导，统一信息发布	政府管制为主，部门和地区封锁问题仍存在
参与主体	政府、公众、私人企业、志愿者、NGO、媒体	政府、社区（居民）、企业、NGO、NPO	政府、跨区域政府协调组织、专业机构、智囊机构，其他主体参与相对较少	政府唱主角，市民和企业参与少

（一）强化应急管理决策层协调能力

东京和纽约建立了常规的应急管理组织机构，强化了应急管理过程中的领导权威，注重部门之间的协调应对。北京过去是以管理单项灾种为主的各个部门力量很强，综合协调的核心部门则刚刚建立，危机应对的协调合作机制有待加强。发达城市中政府能够友好和有效地与媒体合作，对市民进行公开透明、及时、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的危机信息沟通。北京在这方面仍需加强。

（二）应急管理体制趋于网络化、立体化

三大世界城市都已经历了由单项防灾向综合防灾，再转向危机管理的渐进型、均质型发展的过程。另外，2001 年起上海市就实践从城市减灾的单灾种管理向综合减灾管理转变，并且建立了“条、块、点”相结合、全覆盖的应急管理网络。而北京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是以单项防灾为主，最原始的、最基本的防灾工作与最现代的应急管理同时存在。

（三）加强政府间的援助与合作

三大世界城市都十分注重政府间的相互援助与良好合作，形成政府间的危机管理联动系统。美国、日本等国家都以政府系统为基础、构建了多层次的城市危机管理体系，以及区域政府间的相互援助与合作机制。例如东京，为了强化东京都的应急能力，东京都与其他地方政府签订了相互援助合作协

定。在协定中，对救灾物资的提供和调拨、公务员的派遣、救援车辆和船只的供应、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的辅助性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北京在这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

（四）强化全民参与机制

在高度分化和多元化的城市社会基础上，三大世界城市都注重依托城市政府之外的发达社会组织系统，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社会参与机制。纽约、东京提倡多元化，危机应对网络化，合作区域化。北京则主要是由政府唱主角，市民和企业参与较少，社会应对能力薄弱，没有建立起由市民、企事业单位、政府等联合应对的稳定应急网络。

北京今后应该重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团体的作用，推动应急管理主体的多样化，提高社会参与度。要鼓励企业、NGO 组织积极主动地参与应急管理过程，尤其应强化中央企业应急管理的能力，并带动私人企业的逐步加入。除了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这种传统 NGO 组织外，北京还要大力扶持民间组织的发展，使它们也逐步成为应急的又一大主体。另外，社区和街道还可鼓励居民积极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系　张智新副教授　研究生　周萌）





第八章　世界城市建设的经验启示



加拿大城市发展中的公众参与

加拿大是一个有悠久民主传统的联邦制国家，有众多不同的民族、种族，使用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分布在广大的地域，而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异。但是，通过建立具有包容性特征的公众参与方式，加拿大在其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不断吸纳民意，协调各种利益和冲突，沟通政府与民众，从而使规划决策更加科学合理，较大程度上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理解。

一、加拿大公众参与概述

（一）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

加拿大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之一是1969年美国学者谢里·阿恩斯坦发表的“公众参与阶梯理论”。该理论认为不同的公众参与具有不同的参与程度，体现公众参与程度的“概念”正如由低到高的不同阶梯（见图8－1）。公众参与的本质是公众对决策过程及决策本身的知晓、评论及影响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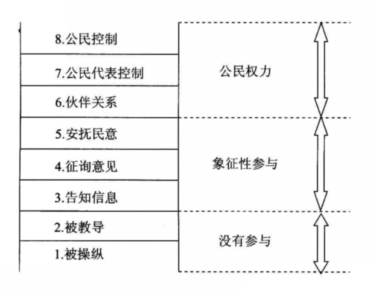


图8－1 谢里·阿恩斯坦公众参与阶梯

按照阿恩斯坦建议的范围分布，在梯子的最底端，公众完全没有发言权

或没有任何权力。往上移，公众将获得一定的知情权和信息，更进一步，主管机构将会向公民征求对项目的想法和意见，但是最终决策权仍然保留在当局手中。因此，此时的公众参与仍处于“象征性参与”阶段。再往上移，决策权力将进一步向公民转移，最终达到最高点“公民控制”，即公民被政府完全授权进行决策。

（二）公众参与的价值理念

加拿大公众参与实践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包括：（1）任何受到决策结果影响的个人或群体都有权参与到决策制订过程中，并为其提供公平和平等的有效参与途径；（2）向公众允诺其参与会影响到最终决策，且所有参与者影响决策结果的机会是平等的；（3）通过不同利益群体间的交流促进可持续、均衡决策结果的产生；（4）通过设计公众参与的模式，积极寻求不同利益群体的参与投入；（5）鼓励为参与者提供所有与决策相关的信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评估最终决策结果；（6）通过与参与者交流，告知其参与投入是如何影响最终决策的。

（三）加拿大公众参与的历程

加拿大公众参与的历程一般划分为三个阶段[①]（见图8-2）：（1）1930—1950年起步阶段。加拿大这一阶段的决策模式被称为 Decide-Announce-Defend（DAD）模式。即政府、主要研究机构和专家掌握着所有的信息，整个决策过程由政府官员和学者独立完成，公众没有任何的参与机会。政府只是在最后才将决策结果公之于众。而面对随之而来的公众质疑，政府则积极进行辩护；（2）1960—1970年变革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公民权利、女性平权、反越战、环境保护等运动的爆发和相互结合，极大地冲击了西方传统的主流文化和决策模式。加拿大公众的声音开始被政府倾听，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出现并迅速崛起，成为加拿大公众参与的一个重要力量；（3）1970—2009年审议式民主阶段（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这一阶段，加拿大的公众参与开始制度化，并形成了完善的法律保障。例如1992年加拿大环境评估法就明确规定，列入综合研究目录的所有项目，主管部门在项目信息收集、分析主导因素、方案设计等各个阶段都必须保证公众咨询的有效进行。目前，加拿大公众参与的领域已经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城市规划领域，社区居民正在成为规划编制的和实施的主体。

---

① 详见加拿大纪念大学基思·斯多里（Doug House）教授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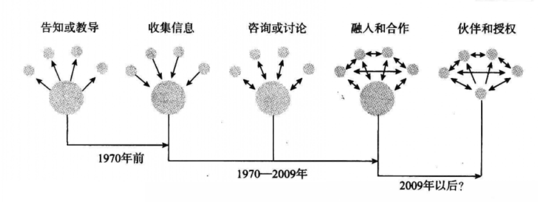


图8-2　加拿大公众参与演化历程

（四）公众参与的主要技术方法

依据不同的参与程度，加拿大将公众参与划分为5级：告知、咨询、参加、合作和授权（见表8-1）。每一级都对应有不同的公众参与目标、对公众的允诺和典型技术。

表8-1　公众参与影响程度的目标矩阵

	告　知	咨　询	参　加	合　作	授　权
公众参与目标	为公众提供客观的信息，协助他们理解问题、机遇和解决方法	获得公众对分析和决策的反馈	全程与公众一起工作，确保他们的顾虑和期望被有效考虑	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包括最终方案的确定）与公众建立伙伴关系	给予公众最终决策权
对公众的允诺	他们将被告知尽可能多的相关信息	他们的意见将被听取，并被告知其对决策结果的相关影响	他们的顾虑和期望将被直接反映在备选方案中，并被告知其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他们的建议和创新将成为最终方案的一部分，他们的建议将被最大程度采纳	他们的一切决定都将被执行
典型技术	材料手册、网站、公共开放日	公众意见收集、小组讨论、民意调查、公众会议	研讨会、审议式投票	公民咨询委员会、共识构建会议、参与式决策	公民评审团、公众投票、公民代表决策

资料来源：国际公众参与协会培训手册，2006。

针对政府决策制定过程，加拿大将公众参与规划划分为5个阶段：（1）获得项目管理机构的内部认可和支持；（2）向公众发布和交流信息；（3）确定公众参与的程度和级别；（4）确定决策制定过程和公众参与目标；（5）设计公众参与规划。在每一个步骤中，都明确有满足公众需求的目标要求（见图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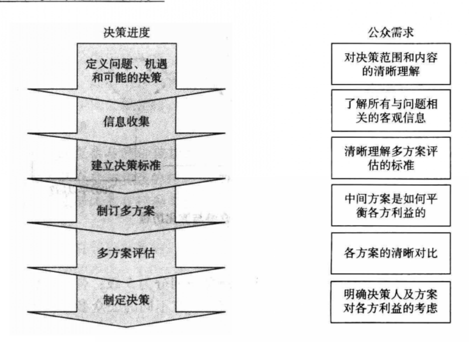


图 8-3　决策进度与公众需求的阶段关系

二、加拿大公众参与规划的典型模式

（一）新斯科舍省“志愿规划”

志愿规划是新斯科舍省公众参与的一种独特模式。志愿规划由该省志愿规划协会（Voluntary Planning，VP）组织实施。该协会的组织形式十分具有特色，它既与新斯科舍省政府保持着所谓“一臂距离”（arm's length）的关系，享受着省财政拨款支持，并对省财政厅和政策委员会（policy board）负责①，同时又独立运作，不受制于任何政策制定部门。这种“一臂距离”关系一方面有利于协会同公众公开、透明、公正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有利于协会为公众提供更多协助或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机会。

每当新斯科舍省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时，省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便以具体项目的方式委托给 VP，并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然后针对每一个问题，VP 都将在互联网和其他媒体上发布“××问题志愿任务小组/委员会成员招募”公告。该小组的所有成员均由个人自愿报名，再由 VP 按照满足项目要求的程度进行选拔。此后，在 VP 的指导下，志愿任务小组将全权负责整个项目中的

① 在收入来源和与政府的关系上，志愿规划协会与中国省级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有些类似。

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开展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研究，并将重要发现撰写为最终报告。任务一旦完成，志愿任务小组也将自动解散（见图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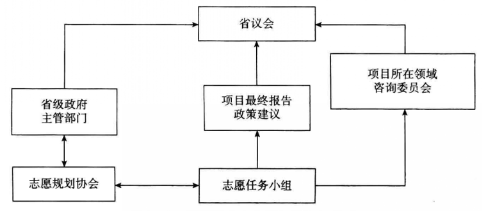


图8－4　新斯科舍省志愿规划组织模式

（二）哈利法克斯地区“社区愿景规划”

该规划由哈利法克斯地区政府（Halifax Regional Municipality，HRM）社区发展部主管。2006年6月，哈利法克斯地区完成了历时3.5年的新一轮区域规划（Regional Plan）。该规划为哈利法克斯地区未来25年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性框架。同年9月，为了加强公众对社区发展的参与，哈利法克斯地区议会启动了一项为期12个月的“憧憬哈利法克斯”（Vision HRM）试点项目，确定马斯科多比特港（Musquodoboit Harbour），福尔河（Fall River）和贝德福德（Bedford）3个社区作为第一批试点。试点内容包括：在HRM规划人员指导帮助下，每一个试点社区均成立一个社区联络小组（Community Liaison Group）。该小组由7～9名社区居民以志愿者身份构成，具体负责编制和实施“社区概况”（Community Profile）、“社区愿景规划”（Community Vision）和“社区行动计划”（Community Action Plan）等（见图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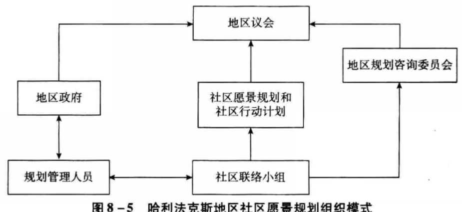


图8－5　哈利法克斯地区社区愿景规划组织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社区愿景规划不同于一般的土地利用规划。首先，土地利用规划必须符合地区政府法案（Municipal Government Act）的相关规定，而社区厦景规划则不受任何法规和条例的制约，是非法定规划。其次，社区愿景规划也没有明确的规划内容要求。事实上，社区居民关心的一切问题都可以成为该规划的重点，如人口结构、社区感受、健康与生活质量、社区安全、文化和遗产、住房保障等。

（三）尼亚加拉地区“增长管理战略规划”

1. 合作：规划与增长管理的新方式

近年来，尼亚加拉地区政府、成员城镇政府和尼亚加拉半岛保护局正致力于建立一种合作的规划方式。为此，各团体共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以期提高尼亚加拉地区的规划职能。地区议会于2007年7月26日批准了这份备忘录，并声明备忘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整合的、无缝对接的，容易被议会、公众和申请者接受并理解的，并且能够鼓励参与政策制定与申请过程的规划体系”。“尼亚加拉2031”是在备忘录政策合作框架下制订的第一个重要规划。

编制增长管理战略过程中的合作主要由技术支持委员会和规划审查委员会来加以实施。技术支持委员会由尼亚加拉半岛保护局代表、尼亚加拉地区政府组成部门代表，以及12个成员城镇各自的规划官员共同组成。技术支持委员会成员在提供战略和技术支持两方面都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规划审查委员会则由地区政府议员组成，主要提供战略决策的政策支持和引导。

2. 居民调查

2007年春季，为了更好地了解尼亚加拉各社区对未来发展的需求与期望，地区政府雇用了一家市场调查公司进行了一项居民调查。

2007年6月4日至15日，规划一共对1200位地区居民进行了电话访问。这些受访者分别来自12个成员城镇，每个城镇100名。在具有1200个样本数的情况下，区域分析结果的精确度可以达到2.8%以内；在各地100个样本数的情况下，各地分析结果的精确度可以达到9.8%以内。总体看来，调查结果对该地区居民有足够的代表性。

调查结果揭示出的不同观点为尼亚加拉地区实现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建议，主要包括：（1）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城市中心区亟待进一步开发，并且最适宜建设多单元的住宅，但是仅有8%的受访者愿意居住在中心城区；（2）70%居民认为他们的社区未来20年在区域面积和人口方面会发生变化；（3）在所有工作者中，仅有2%乘坐公共交通；（4）大多数居民对当前的受教育机会表示满意，但对工作机会的缺乏表示不满。

3. 可视化集成系统的使用

为了更好地使公众了解展现不同政策选择对未来发展的可能影响，地区政府使用了名为“NiagaraQuest 在线”的可视化集成系统。通过选择不同的发展政策，该系统可以展现不同政策选择对 2031 年尼亚加拉地区发展可能的影响，并通过可视化手段对发展愿景加以演示。系统共包括 15 项指标：住宅密度、人口分布、就业密度、就业分布、农业用地、道路与运输、交通选择、能源与空气质量、水资源与污染，以及人口与经济。通过“NiagaraQuest 在线”，公众能够在 6 个政策范围内进行选择体验，包括人们在哪里居住和工作、人们的出行方式和环境影响等。“NiagaraQuest 在线”将以图表的形式向公众展示他们所选政策在 2031 年可能带来的结果。

“NiagaraQuest 在线”的参与结果显示：(1) 公众更喜欢支持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政策；(2) 在现有的城市增长范围内进行最大限度地开发；(3) 更好的住房选择；(4) 提高基础设施供应的成本效益；(5) 创造更多收入高、职业导向的工作，尤其是在尼亚加拉南部地区；(6) 优先发展区域和本地的公共交通，尤其是高速铁路等；(7) 积极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医疗保障和教育设施。

4. 第三阶段的公众参与

在第三阶段“制订备选方案”的过程中，地区政府和咨询公司收到了大量关于三个备选方案的评论和意见反馈，这些反馈分别来自于公众、省政府、成员城镇政府、尼亚加拉半岛保护局、各地区委员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5 月 12 日至 15 日，咨询公司还分别在韦兰、伊利堡、尼亚加拉湖镇和格里姆斯比等社区举行了 4 场研讨会，旨在向公众介绍 3 个备选方案的内容，并搜集公众对每个备选方案的看法。与会人员有机会对评估标准提出意见，同时也有机会提出更好的潜在备选方案。遗憾的是，研讨会并没有形成最优方案的共识。

地区政府鼓励成员城镇政府对备选方案和评估标准提出正式意见。有 11 个城镇政府做出了正式回应。其中，分别有 5 个城镇支持备选方案 B 和 C，剩下的 1 个城镇没有明确的偏好。没有任何一个城镇支持备选方案 A。

5. 修正案准备阶段的公众参与

在增长管理战略的前期，为准备修正案进行了广泛的公众参与，并贯穿始终。这些参与工作涉及了绝大多数增长管理的问题，同时也尽可能多地扩大参与者的范围。

修正案的制定坚持了谅解备忘录中的合作原则。这些合作包括两个地方规划长官广泛参与的研讨会。研讨会得到了 Dillon Consulting 咨询公司的技术

支持。他们以政策组合图表的形式分析了省级政策、区域政策和地方城镇政策的联系。这些图表也得到了省能源与基础设施部的支持。讨论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并纳入到修改后的修正案中。

修正案也反映出了如下各方的投人，包括咨询顾问、尼亚加拉地区公务员、地区住房局、地方规划实施委员会、经济增长执行委员会、生态环境咨询委员会以及健康生活委员会等。其中，健康生活委员会的代表来自所有地区部门。

2009 年 4 月 24 日，地区政府向公众和社会机构发布了修正案初稿，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并分别于 5 月 6 日和 14 日举行了公众开放日、公众会议。公众和社会机构的意见以备忘录的形式集结成册，一并提交给地区议会。

此后，修正案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提交给企业管理小组讨论。企业管理小组支持该项修正案，同时根据自身视角提出了具体建议。这些建议被纳入到修改后的修正案中。例如，关于经济适用房的条款被加入到愿景宣言部分，关于景观道路规划的条款被添加到交通政策部分。

三、加拿大公众参与对中国的启示及借鉴

公众积极和广泛参与使加拿大的公共政策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吸纳民意，协调各种利益和冲突，沟通政府与民众，从而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和理解。针对我国公众参与规划的实际和现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落实《城乡规划法》，增强公众参与规划的可操作性

我国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行的《城乡规划法》在“城乡规划的实施”和“监督实施”部分都明确提出了公众参与规划的要求。但对照国际公众参与协会的相关标准，总体上我国的公众参与程度仍处于告知阶段，其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举例来说，目前我国城市规划在市县一级“告知信息”的具体实现途径有 2 个：批前公示和批后公示。一项规划在递交政府正式审批前与审批通过后都会通过网站向社会公示，时限一般是 30 天，但其中的显著缺陷是网上公示的信息非常少，仅有几个重要的图纸（一般是：土地利用规划图、土地利用现状图、近期建设规划图、交通、公共设施、市政设施等专项图纸）和少量的文字说明。“征询意见”阶段进行得很不完善，仅是在公示的网站（有时也会同时在报纸上刊登）上留下意见反馈的电话、电子信箱（E-mail）等渠道。而对于公众通过电话、书信等反馈来的意见，大多数处理方式是先转交给设计单位，让他们去参考。然后，在由“城市规划委

员会”组织的专家评审会上，将整理出来的公众意见发给各位专家。不过，据笔者参加过的专家评审会来看，很少有专家专门就公众的意见提出来讨论。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对待公众参与的态度是“走过场”为主，仅履行法规中的部分程序要求。因此，建议在国家层面尽快出台《城乡规划公众参与办法》，界定一些主要的原则与方向，同时允许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本地的实施细则。

（二）基于国情，坚持效率优先，选择合适的公众参与方式

借鉴加拿大公众参与经验，需要对比考虑两国基本国情。加拿大国土面积为997万平方公里，超过我国居世界第二，而总人口规模却远远低于我国，2009年仅为3350万。加拿大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其公众参与由1930年起步发展到现在，尚经历了近80年时间。这说明推进公众参与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目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在这一时期，大力推进公众参与的过程中，难免存在激发矛盾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的风险。为避免这种风险，在选择公众参与方式时，应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不拘泥于公众参与的形式而消耗性地延长决策时间。具体来说，在规划的编制阶段，规划设计单位应尽可能多地采取访谈、调查问卷等形式，充分了解规划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和规划愿景，并以单独一章或附件形式列入规划说明书。规划编制完成后，规划设计单位应通过网站、报纸、城市规划展览馆等媒介尽可能多地公众展示规划成果，时间应不少于30天；在规划实施阶段，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建设单位和开发商可以在不经过公众参与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途径改变规划，如改变某一地块的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建筑后退红线等。目前，这些违反规划实施的行为在我国还很普遍，并且往往很隐蔽，公众根本无法干预。因此，针对规划实施阶段，应尽快将建设项目的主要建设指标、方案等规划成果向公众公示，设计合理的公众参与程序，让公众参与（尤其是与该项目利益直接相关者）来监督那些违反规划的权钱交易。

（三）将决策过程细分，促进规划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规划的最终目标是要将公众意见纳入到最终决策（Arnstein，1969）。加拿大的经验表明，在政府决策过程的不同阶段，公众参与的需求程度是不同的。可以借鉴加拿大的模式，将我国政府规划决策过程细分为6个阶段，即定义问题、信息收集、设定决策标准、制订多方案、评估多方案和制定最终决策。针对不同阶段，设定不同的公众参与目标和方式，渐进式地将公众参与引入到我国政府规划的决策过程中。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政府决策应重点抓好“定义问题和信息收集”两个环节。如规定规划研讨会必须

要邀请一定比例的市民代表旁听和参加；规划评审结束后要公布公众意见的采纳情况，允许政府决策不完全（甚至全部不）采纳公众意见，但对未采纳的内容要申明缘由。规划机构设置上，应提高城市规划委员会中公众代表的比重，增加在重大问题上的发言权；建立公众参与规划管理的非政府组织，完善居民会职能，使之成为公众参与规划管理的组织者和代表。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邱爱军
许锋　纪熠　文辉　郑明媚　吴斌）

日本的低碳城市建设

进入21世纪以后，低碳城市发展开始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世界各国都充分意识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从不同途径摸索低碳城市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由于低碳城市建设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崭新课题，因此互相借鉴、全面交流以求得共同进步就是各国政府机构、学界和业界的共同诉求。近几年来，我们有不少吸收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低碳城市建设经验的努力，[①] 但不能否认，就世界大都市进行详尽的个案分析，提炼出对中国有启发意义的成果还不多。本文希望在对日本的低碳城市建设基本情况进行介绍的基础上，专门以日本东京都为个案进行全面介绍和分析，并总结出一些具有可供中国借鉴的特点。

一、低碳城市与日本的低碳城市建设

低碳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学界虽然有一定的共识，但由于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以及面对的不同挑战，因此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普遍接受的定义。胡鞍钢在《“绿猫”模式的新内涵——低碳经济》一文中，只是简单罗列了低碳城市的内涵包括“开发低碳能源，提高燃气普及率，提高城市绿化率，提高废弃物处理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任驻华代表处主任夏堃堡认

---

① 例如对东京模式的关注，参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著．2008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政策回顾与展望．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对日本“低碳社会”的关注，如刘志林、戴亦欣、董长贵、齐晔．低碳城市理念与国际经验．城市发展研究，第16卷，2009（6）．

为，“低碳城市，就是在城市实行低碳经济，包括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能源生态体系。”相比较而言，付允、汪云林与李丁的认识比较全面，“低碳城市就是通过在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创新低碳技术，改变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彻底摆脱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形成结构优化、循环利用、节能高效的经济体系，形成健康、节约、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终实现城市的清洁发展、高效发展、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有必要介绍的是日本学者的观点。东京大学大西隆与日本环境次官小林光在合编的《低碳城市——今后的城市建设》一书中提出，“低碳城市，是指与现在伴随着各种城市活动导致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相比，出现大规模削减的城市。为此，需要有与现在不同的能源供给与利用的思路和方法。也就是要意识到资源与能源的大量消费并不是文明发达的象征、增加可再生而不是化石燃料的能源供应量、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发展而防止资源浪费、社会活动中利用各种机会大幅削减资源与能源的浪费等课题。当然，为实现低碳城市，需要实现城市建设方方面面政策的重大转换，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从城市的规划和基础，一直到转变的方式，都需要贯彻低碳城市的思想与实践。”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低碳城市建设问题上的很多关注是非常一致的。

日本的低碳城市构想有更为宏大的背景考虑，直接与日本的战略发展联系在一起，与日本和世界范围内的低碳经济、低碳社会发展的潮流密不可分。早在1994年6月，日本政府当时的通商产业省就提出《长期能源供给需求展望》，希望同时实现“3E”的目标，即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和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 Protection）。但众所周知，“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不是容易的课题。”特别是日本进入平成不振的长期低迷之后，面临的能源缺乏形势非常严峻，诸如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等，都对日本提出了挑战。特别是1997年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签署后，日本希望能够成为世界环保的有力推动者，承诺作为负责任的发达国家，主动削减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2004年日本环境省委托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环境研究所、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60余位著名学者，利用四年时间展开《2050年脱气候变暖社会项目》综合战略性研究。试图从制度、技术和行动三个侧面出发，统筹考虑城市、交通、产业、能源等领域的重要转型，并探讨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

型和妥善对策相整合的道路。[①] 2007 年开始，项目各小组陆续推出报告，引人关注的如 2007 年发表（2008 年有修正）《2050 日本低碳社会说明：削减 70% 温室效应气体的可能性探讨》，2008 年 5 月发表的《迈向低碳社会的 12 种对策》，以及 2009 年 2 月以东京大学花木启祐教授为领导的城市研究组发表的《迈向实现低碳城市的解析》等。提出了诸如紧凑型城市规划、导入可再生能源以及通过节能来有效减排等具体措施，并对日本各地大城市到 2050 年低碳建设的前景进行了预测。

2006 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新国家能源报告”，重点是建立依靠先进能源技术的能源供需结构，提高能源效率、优化结构、引入新型能源、大力发展核能等，实际上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构建了日本国家的能源战略。2007 年 6 月日本内阁会议审议通过《21 世纪环境立国战略》，要以低碳社会为基础，建设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新日本，并且将此提升为“日本模式”的软国力向世界宣传。

2008 年 1 月 18 日，福田康夫在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就任以后首次施政演说时，就提出将充分利用节能技术，使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低碳社会”，并构建“资金机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援助发展中国家。[②] 同年 6 月，福田推出了一项新的全球变暖对策，提出到 2050 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较目前减少 60% ~80% 的目标，被称为“福田愿景”。作为这一理想的具体阐释，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在 7 月 29 日通过了《建设低碳社会行动计划》，既包括关于二氧化碳的捕捉及封存技术（CCS）、太阳能发电、电动汽车等技术层面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在排放量交易制度、“地球环境税”、夏令时等制度和法律层面的新探索。同年 12 月 14 日，日本政府推动成立低碳城市促进协议会，其中包括 86 个市区町村、46 个都道府县、12 个相关政府省厅、27 个政府相关机构和 16 个民间团体，事务局设在日本内阁官房地域活性化综合事务局，向全国推广环境模范城市的经验，并积极推动与海外的交流合作。经过严格的审核，已经评选出日本国内包括北九州市和东京都的千代田区为代表的 13 个环境模范城市。

尽管日本在环保领域着力甚巨，但与欧洲部分先进国家相比，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一次能源消费、新能源开发等领域，优势并不明显。鸠山由纪夫的民主党在选举时，就打出了“环保牌”，得到了民众的支持。随后鸠山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日本到 2020 年实现在 1990 年实现的基础上减排

---

① 藤野純一. 脱温暖化 2050 研究——2050 年日本温室效应ガス排出量大幅削減への道筋. かんきょう. 2005 - 10.

② 于青. 日本首相福田发表首次施政演说. 人民日报，2008 - 1 - 19.

25%，表现出了比其前任的自民党历届政府都要积极得多的姿态。2010年5月14日，日本众议院环境委员会通过“气候变暖对策基本法案”，提出日本中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提出要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及开始征收环境税。在所有主要国家就构筑公平、具有实效性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框架和设立积极的减排目标达成一致的前提下，日本要在199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基础上削减25%；到2050年时要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80%。2010年6月18日本内阁审议通过《新成长战略》，其中七个重点战略推进领域中，第一个就是“通过绿色革新实现环境与能源大国战略”，此外还提出“大城市的再生”以及“环境未来城市”等重要设想都与低碳城市建设密不可分。低碳城市领域里最新的进展是今年6月日本国土交通省都市地域整备局设计的《建设低碳城市导引（草案）》，草案共分为三部分：“建设低碳城市的思考”、“建设低碳城市的方法”以及“建设低碳城市政策的效果分析方法”。虽然草案暂时还处于意见征集和修改的阶段（意见征求截止日期为7月10日），但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对于低碳城市的总体设计和具体实施办法。

可以说，建立低碳社会、低碳城市已经成为日本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与此同时，这种战略已经不再是政治思考和宣传口号，而已经通过政府和全社会的努力，日益丰满和成熟。

二、东京都建设低碳城市的举措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也是闻名世界的国际大都市。作为日本面向世界的门户，东京建设低碳城市的举措不仅是日本低碳城市建设的重点，也是各国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引人注目的个案。早在1986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尾岛俊雄就反思过东京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当时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不断扩张，东京也出现了所谓的“沙漠化现象”、热岛效应明显、城市洪水泛滥，他慨叹这些都是留给二十一世纪的重要课题，如果想真正保全环境，那么有必要从“二十世纪的问题解决性行政向二十一世纪的环境事前评价行政转换”。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东京的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按照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来看，东京的人均5吨，与人均6吨的伦敦和人均7吨的纽约相比，有明显的优势。但总体来看形势仍不容乐观，按照日本学者的统计，东京都一个城市的年能源消耗量，超过了北欧的丹麦、澳洲的新西兰；而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达到了6430万吨，超过了挪威和瑞士一国的排放量。日本的山崎养世和竹村真一曾提出，东京应该建设成为“生命城市”，也就是“正如被称为

大自然的一个器官那样的崭新都市"①。要实现这个理想，要想保持在低碳领域发展过程中的先进地位，东京都意识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低碳城市的提出是新世纪的事情，但东京都低碳城市建设的开始应该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公害治理，特别是与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垃圾治理活动密不可分。从1990年的垃圾问题紧急对策室的设置开始，垃圾减量和清扫工厂建设极大推动了东京都的环境治理。虽然东京在环保和低碳领域的举措比较早，如1987年就制定了"东京都环境管理计划"、1992年制定了"东京都地球环境保全行动计划"、1995年制定了"东京都防止全球变暖对策地区推进计划"，但真正全面推行低碳城市还是与日本乃至整个世界发展的潮流密不可分。2000年东京都正式成立了环境局，提出了"绿色东京计划"；2002年制定"东京都环境基本计划"；2006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东京都制定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东京新战略计划"、"东京都可再生能源战略"以及反映东京都长远发展的"10年后的东京计划"。2007年制定了"东京都气候变化对策方针"以及"绿色东京十年计划"，2008年重新制定了"东京都环境基本计划"，这些就是理解东京都低碳城市发展的基本脉络。

东京都建设低碳城市尤其引人注目的举措，主要体现在三个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上。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计划各有重点但又互相联系，共同构成了东京都低碳城市建设的宏观战略。

首先要关注的是2006年3月公布的《东京都可再生能源战略》。建设低碳城市必须首先考虑替代高碳的基本途径，东京都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充分意识到可再生能源开发的重大意义，在详细介绍和总结世界各国和日本国在该领域内重要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发展思路。根据东京都的统计，2003年东京都能源消耗量为83万焦耳（TJ），而2005年东京都可再生能源提供量为5600焦耳，仅占0.7%，即使把东京电力公司供电总量中水力发电部分计算在内，这个比例也仅仅为2.7%。而发展可再生能源，不仅可以实现低碳目标，可以为东京都的可持续发展、为大规模自然灾害发生时的危机管理提供可能，而且可以通过高科技开发来获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为此，东京都大胆提出，到2020年，要把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提高20%。作为具体的实施手段，东京都希望能通过政府各项政策和努力，推动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与选择，并通过金融、税制等经济手段来进行引导和调控，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针对不同领域、不同主体的具体项目设计。当然，这个计

① 山崎養世、竹村真一．環東京湾構想—新たな成長と人間本来の生き方のために．東京：朝日新聞社，2009年．

划的真正实现，“在都政府积极实施的同时，还期待非营利组织、民间企业等主体推进各项事业的展开。为此，重视非营利组织、民间企业以及各区、市、町、村之间的协调合作，确立共同的项目小组等具有发展性的体制。”

作为这项战略的具体实施，东京都已经在第二代生物柴油燃料（Biodiesel Fuel）开发、公交巴士燃料电池化、大力推动东京沿海风力发电、更好地开发废弃物发电、从东京都都厅开始向全市推广太阳能发电、全面探索海洋温差发电、波浪发电、潮汐发电以及潮流发电等可能性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为低碳东京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和保证。

第二个计划是2006年12月东京都提出的《十年后的东京——东京在变化》，计划的提出应该说与当时东京都成为2016年夏季奥运会候选城市有密切联系，这个计划简单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即利用重新申请举办奥运会的奇迹，消除东京都20世纪发展过程中负面遗产，建立美丽、安全和在世界范围内富有魅力的大都市；“三个视角”，包括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优秀人才集中、在技术革命和先进的环境政策方面成为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中心；“八个目标”，其中与环境和低碳有关的内容包括建立绿色通道和网络，建设1000公顷的绿地，以及通过各种措施发展世界最高水平的节能政策，实现世界环境负荷最少的城市等。作为具体的实践手段，东京都希望能够提出有特色的先进环境政策、推进安全、可口饮用水供应和水资源利用、减少废弃物并推动回收利用率，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是设立《东京减碳十年项目》，其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东京都要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2000年相比减少大约25%”。

作为《十年后的东京——东京在变化》项目的一项具体落实，东京都在2007年1月建立跨部门的“推动创造绿色都市本部”，并在同年6月设立了“绿色东京10年项目”，提出到2009年年末的三年间，通过海岸植树、街道树木倍增等手段增加300公顷绿地的计划。2010年3月，东京都推出“绿色东京10年项目的实施状况2010”，对既有计划执行进行检查和确认，通过查找问题寻找对策，进一步强化充实政策的实施，提高效率，确保计划的最终实现。据统计，三年来东京都绿色东京共募集资金5亿6千万日元，增加海岸植树7公顷、街道树木增加60万棵，城市绿地共增加306公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未来三年的实施目标和计划，增加海岸植树16公顷、街道树木增加80万棵，城市绿地增加400公顷。同时，政府各部门还提出了继续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如增加市民对绿色工程的关注和参与、发动更多的志愿者等，产业劳动局还针对东京都市民花粉症普遍的特点，提出了“培育很少花粉的森林运动推进委员会”，得到了市民、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高度认可。

作为《十年后的东京——东京在变化》项目的另一项具体落实，2007年1月东京都特别设置了“推动减碳城市建设本部”并设立“全球变暖对策应对基金”，2007年6月通过的《东京都气候变化对策方针》，核心是围绕《东京减碳十年项目》提出的目标进行具体筹划和落实。其中勾勒了东京都希望在减碳方面的努力方向是建立低二氧化碳、低能耗城市，全面普及相关技术并把东京都的温室气体排放降到最小程度。基本思路包括在减碳领域充分发挥日本的环境技术优势；大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市民家庭各自分担责任；最初的三四年要确定为转型的开始阶段，需要展开有战略性、集中的对策；以及充分利用民间资金、基金和税制等手段，实现大胆的投资计划等。具体的努力方向有五个：全力推进企业的减碳、真正开始家庭减碳、城市建设中减碳的规则化、加速汽车交通的减碳、各部门共同协作，构建有东京都特色的减碳机制。东京都希望，从市政府开始做起，全面修改和健全相关法规，进一步推动首都圈和全国范围城市之间的合作，并通过强化市民环保低碳意识、加强与世界大城市，特别是亚洲各城市之间的合作，全面推动深入的减碳运动。2010年，东京都对这个计划的执行进行了阶段性总结，2008年该项目共98个项目、预算203亿日元；2009年涉及107个项目、预算365亿日元；而2010年的计划则达到115个项目、预算391亿日元，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同时，文件还明确提出未来发展的举措，如大企业从2010年4月开始履行减碳义务，9月要提出基础排放量的申请，11月提出具体计划书，从具体方法上看，除了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来内部挖潜削减外，还可以通过排放量交易来实现；对中小企业则提出“推动中小企业节能信用贷款项目”，在政府的严格审核和监督下，2010—2011年两年内为中小企业节能环保设备提供资金补助；从对市中心大型建筑物的减碳关注，逐渐普及到各区町村的中小型建筑的减碳努力；修改《东京都节能方法2007》以及培养东京各基层单位的节能环保人才工程等。

第三计划是东京都在2008年3月制定的《东京都环境基本计划》，这是在2002年1月《东京都环境基本计划》基础上，结合新世纪以来东京、日本乃至整个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提出的重要指导性文献。这份文献有自己的思考方式：通过东京都追求高目标和战略性政策展开，引领日本及其他地方团体；按照“十年后的东京”计划来整合发展，主要面向2016年设立目标；要前瞻2050年等各种预测和可能来思考；通过反推或者反演的方法（back casting）来思考现实政策；目标设定、实现途径以及检验标准都要通过市民容易理解、便于执行的方式来设定。

根据统计，东京都发现2000年以后，传统产业部门与交通运输机构的减

碳成效非常明显，但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大量事业部门与家庭的碳排放量不减反增，应该成为今后继续努力的焦点；从能源消费统计来看与减碳的统计基本一致，事业部门中的写字楼能耗持续攀升，家庭中空调和电脑的耗能居高不下，这也体现在能源类别的差异变化——燃油、液化天然气的使用量从1990年以后呈明显减少趋势，但电力和煤气消费的上升比例仍很大。根据这种科学统计的结果，东京都重申中短期低碳城市建设目标仍是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2000年减少25%，也就是要从5768万吨减少到4326万吨。为此，以2000年为基准，传统产业需要削减10%，第三产业等事业部门要削减7%，家庭部门削减20%，交通运输部门削减40%。同时，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东京都能源消耗中的比例要提高到20%，其中包括对太阳能的利用要实现“飞跃式的扩大利用”，重点开发目前尚未得到重视的如生物质能源等领域。在注重城市建设中的节能减碳的同时，东京都也在思考对既有建筑和设施进行节能减碳改造的可能性。

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东京都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要将考虑环境作为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范来内在化”，也就是说从城市建设、殖产兴业一直到市民生活，都要把环境问题作为基本规范来给予最大限度的重视。其原则包括：回避、低减、修复、补偿和创造五个方面。具体推进的办法包括：遵守相关为减轻环境负荷而制定的法令、条例等纲领和指导方针；对周边环境资源和土地利用等问题有全面把握；与周边土地利用进行整合，根据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原则来确定事业的规模、构造以及布局；即便已经确定的规划，也必须根据保证环境的原则重新审视；为市民提供准确的信息等。通过这些努力，东京都希望能起到以下作用：预防、追根溯源采取对策、造成问题者自我负担、恢复原状或者重生。为保证这项政策不流于形式，东京都专门制定了详细的指针，从大企业建立工厂一直到普通市民日常生活，都规定得非常详细。

三、对日本低碳城市建设的思考

中日两国政府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从体制上看，既包括多边合作如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和环境部长会议，也包括双边合作如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和中日环境保护合作委员会，后者从1994年开始，至今已经过了16个年头，举行过近10次会议。

从1994年5月28日中日两国签订政府间《环境保护合作协定》开始，中日之间在环保、低碳领域内的合作日渐深入。1998年11月26日双方签订

《面向21世纪环境合作联合公报》，2007年4月11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环境保护合作的共同声明》，同年12月又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合作推进环境和能源领域的共同声明》，2008年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正式启动在二氧化碳地下储留技术领域的合作。从更深入的合作层次来看，2009年6月，中日两国召开“中日循环经济与生态城国际论坛”，沈阳市政府、日本国立研究所、中科院生态研究所三方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承诺三方共同开展沈阳市“循环经济城市模拟系统”研究开发，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和日本国环境省关于建设中国沈阳市—日本川崎市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合作备忘录》，努力推动两个城市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希望借此机会能为两国低碳城市建设积累更多经验并建立合作的新模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3月27日，中日两国在北京举办了“中日低碳社会论坛2010”，并成立了“中日低碳社会共同研究委员会”。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两国之间在低碳城市建设上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合作与交流。在了解日本政府以及东京都发展的经验基础上，有必要对日本建设低碳城市的若干特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做一个重点的思考和分析。

第一，我们有必要认真反思造成当前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低碳城市建设的主题和前景。早稻田大学尾岛俊雄教授总结东京发展过程中的教训时认为，东京本来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从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战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逐渐形成了大首都圈，从三个阶段彻底破坏了东京的生态系统：第一次破坏是让整个关东平原披上了钢筋水泥的外套，绿地、农田、河流、大海遭到致命性破坏；第二次破坏是在这钢筋水泥之上，人们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形成了能源滥用社会，大肆浪费资源并造成了大气和水的污染；第三次破坏是人们的生活态度发生异常，充满了傲慢的态度造成了进一步的恶性循环。简单说，低碳城市建设首先要做的是对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城市建设目标与发展模式的检讨，是国家、城市一直到普通市民都必须进行的反思，从而推动一种更长远、更深刻的变化和转型。这不是通过掀起一次绿色运动，不是通过制定几个吸引世界眼球的规划和文件，不是通过简单地削减二氧化碳、增加城市绿化等具体措施就能实现的，而且需要国民、市民对大量固定观念、生活习惯，甚至也包括价值判断标准进行重新审视。因此，低碳城市建设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城市各级组织、民间团体，最重要的还是广大市民。

第二，有必要对建设低碳城市的意义进行全面的评估和重视。一般来说，低碳城市的建设需要依靠城市所在国家政府宏观政策的完备，很难想像某一

个或某几个城市能超越国家现阶段的政策平台，而出台更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和思路。东京都在 2007 年 6 月制定了“东京都气候变动对策方针”，经过一年集中探讨，次年的 6 月在东京都议会上一致通过。这意味着东京都从 2010 年开始在日本首先开始实施西方发达国家采取的“总量管制和交易”（cap-and-trade）原则。而反观日本政府，尽管早在 2005 年就已经开始筹划这项规则的实施，2008 年专门设置专门审议会进行讨论，但由于以经团联为代表的产业界的反对，仅仅通过了没有规定削减义务的排放量交易试行措施。其实在东京都内部也存在着大量不同的声音，类似重大决策越过政府、由东京来推动是否合适？但更多人意识到在低碳城市建设中采取大刀阔斧政策的深远意义。率先大规模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是东京作为世界大都市的基本义务，不是能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行为；同时，气候变化的确在影响着普通市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东京希望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最后，面对着欧洲和美国在低碳社会与低碳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在政府动作迟缓的背景下，作为首都和日本最大自治体的东京都，实施一系列超前的政策有助于建立示范带头的榜样，推动整个国家在此领域内出现更大的进步。2008 年 8 月 1 日，东京召集全国主要的自治体对气候变动对策的条例化进行研讨，全国 46 个都道府县有 41 个参加、17 个政令制定城市（法定人口在 50 万人以上的城市）中有 15 个参加，其示范效应表现得非常明显。

第三，低碳城市建设应该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已经有很多中国学者注意到，日本在低碳社会与低碳城市领域内的立法非常完备，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经过长期发展和完善，日本“构建了由能源政策基本法立法为指导，由煤炭立法、石油立法、天然气立法、电力立法、能源利用合理化立法、新能源利用立法、原子能立法等为中心内容，相关部门法实施令等为补充的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能源法律体系。近年来针对能源的相关方法不断出台或修改，以适应日本‘低碳社会’建设进程。”从东京都的经验来看，这一点也表现得非常明显。1969 年，日本针对当时的环境污染制定了《东京都公害防止条例》，随着时代的发展，2000 年 12 月 22 日，东京都在上述条例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制定了新的《为确保都民健康安全与环境相关条例》，其中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一款为“削减温室效应气体排出量”，第二款为“登录检察机关”，其中的具体规定精细到“中小规模单位”与“能源供给单位”等具体区别。第二年的 3 月 9 日，东京都政府专门推出与这个条例相配套的“实行规则”。与这个被称为“环境确保条例”相匹配的，还有一个“东京都自然保护与恢复相关条例”（简称为自然保护条例），在 2005 年和 2008 年，随着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全面发展，东京都对环保确保条例进行了两次重要

改正。在各个具体的低碳城市建设领域内，东京都还有相关的专门法律法规，如1992年制定的“东京都废弃物的处理以及再利用相关条例”以及1994年“东京都环境基本条例”等。可以说，这些重要的法律法规已经成为东京都低碳城市建设的基本法律保障。

第四，低碳城市的建设需要增加国内和国际的合作。东京都意识到，低碳城市的建设，仅仅依靠东京一个城市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大气、水源、能源、交通还是人口流动，都需要从一个更广泛的视野进行审视和平衡。早在1979年日本关东地区的“六都县市首脑会议”，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员不断增加，到2010年已经成为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横滨市、川崎市、相模原市、埼玉市等新的“九都县市首脑会议”，也被称为“首都圈峰会”。除了负责规划的部局长会议外，设有废弃物问题探讨委员会、防灾危机管理对策委员会和环境问题对策委员会。其实这几个机构与全面建设低碳城市都有联系，特别是环境问题对策委员会，下设全球变暖对策、大气保全、水质改善和绿化政策四个分会，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对推动东京都自身和首都圈的低碳城市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如2007年各都县市共同开展“夏季生活方式”和“冬季生活方式”以及“节能型家电普及”等推广活动，对促进普通民众参与节能环保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9年开始，各都县市合作展开对东京湾水质的集中调查，共计有143个机构和团体参与，设置调查点包括海上312个、陆地447个，共计759个，得到了很多宝贵的数据，并为共同开展保护活动奠定了基础。可以想象的是，单凭东京都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如此复杂和庞大的环保调研和保护的。

与此同时，东京都还积极与世界很多国家的大城市进行沟通合作，共同探讨交流在推动低碳城市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经验教训。2006年5月，东京都与伦敦市签订《东京都与伦敦市政策合作相关协定书》，决定在环境、交通等共同课题上密切合作。同年12月，东京参加了由伦敦市倡导的世界四十个城市的气候领导小组；2008年，东京都与美国加利福尼亚洲之间就进行了诸多交流和合作；2009年10月，东京都与日本环境省、环境能源政策研究所等机构合作，在东京举办了“地方自然能源、气候政策东京会议2009”，来自世界各国、相关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前提出了《地方政府自然能源政策世界白皮书》，而会后则签署了“东京宣言”，呼吁世界各国地方政府在推动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日本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低碳社会、低碳城市建设的重大意义，2007年10月，第168次国会决定设置有关参议院国际·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调查会，在最终发表的《国际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相关调查报告》中，将低碳

社会、低碳城市建设上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主张“构筑低碳时代创造富裕的日本模式”和“推动世界范围内文明转换发挥日本的领导力”。可以预见，在21世纪低碳环保领域的竞争，当然也应该包括合作会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低碳城市建设，说到底是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处，是保证每一个国民的生命与健康，这与我们国家倡导的“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完全一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政府和东京市以及其他世界各国和国际大都市在建设低碳城市中的经验教训，都应该得到我们足够重视和全面借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初晓波副教授）

国外城市节能节水经验

进入“十二五”时期，北京市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标志着城市由中等发达阶段开始向发达阶段迈进，这就决定了未来北京市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特征，比如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方式不再是扩张式的，另外，公众意识的崛起、民众对环境的要求和支付意愿等，都会有新的特点。“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将进入低碳时代，借鉴发达国家尤其国际大都市的成功经验，全面厉行节能减排、节水减污，建设节约型城市，将对首都北京可持续发展，实现绿色现代化和谐安全的世界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一、节能低碳城市建设

（一）伦敦低碳城市建设

英国是最早提出“低碳”概念并积极倡导低碳经济的国家。前任伦敦市长利文斯顿于2007年2月发表《今天行动，守候将来》（Action Today to Protect Tomorrow），计划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定为在2025年降至1990年水平的60%。伦敦市政府认为，转用低碳技术的成本，比处理已排放的二氧化碳所需要的成本低。节能及提高能源效率等措施，不会令原有的生活品质下降。反之，加强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有助于伦敦发展成为环保技术的研发中心。

伦敦政府计划提出的措施能够在2025年前，令该市的二氧化碳排放每年

减少1960万吨。然而，要达到减排目标，伦敦还要每年减排1340万吨二氧化碳，这需要英国政府推动全国性的政策配合。因此，现任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在2008年5月当选以来游说英国政府加快推行相关政策，例如在全球大规模投资可再生能源，向各行业征收二氧化碳税等。伦敦市低碳城市建设有如下几个政策方向。

1. 帮助商业领域提高减少碳排放的意识，并给他们提供改变措施的信息。鼓励所有商业在他们投资的时候都要向低碳一体化过渡。

2. 降低地面交通运输的排放。引进碳价格制度，根据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向进入市中心的车辆征收费用，致力于使伦敦成为欧洲国家中电力汽车的首都。

3. 改善现有和新建建筑的能源效益。推行“绿色家居计划”，向伦敦市民提供家庭节能咨询服务；要求新发展计划优先采用可再生能源。

4. 发展低碳及分散（low carbon and decentralized）的能源供应。在伦敦市内发展热电冷联供系统（combined cooling，heat and power），小型可再生能源装置（风能和太阳能）等，代替部分由国家电网供应的电力，从而减低因长距离输电导致的损耗。

（二）东京低碳信息化的样本

作为日本的首都，东京的商业实体和社会组织众多，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巨大，而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是东京大学，2006年其碳排放达到13.6万吨，其每年消耗的电费成本则高达6000万美元。因此，一项旨在降低电能消耗、减少碳排放的“绿色东京大学计划”于2008年6月开始执行，其目标是“利用信息技术以智能和智慧方式改善环境”、“将以强制被动方式改善为以自觉方式打造低碳环境”。

东京，充满现代气息的国际化大都市，不仅因其利用物联网等高科技手段创造了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更因其低碳节能、注重社会协调发展而闻名于世。

目前，物联网正成为我国乃至全球信息产业的新亮点。在东京，一项于2007年由东京市政府及国土交通省发起、倡导移动观光与RFID导游的“东京无所不在计划”便已在全市成功进行了物联网应用。“东京无所不在计划”采用ID识别技术，将东京市内所设“场所”及“物品”赋予唯一的固有识别码，由后台系统自动识别，用户通过移动装置读取实体位置或物体上的资讯标签，将真实世界的资讯或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后与虚拟现实空间结合，以获取便捷、个性化的资讯服务。该计划于2007年至2010年先后在银座、新宿等地购物区进行了成功的RFID导游项目部署。其中，“东京银座购物区

试验计划”范围涵盖其地面商场及地下街道，并可提供英、日、韩、繁体中文、简体中文5种不同语言操作。整个银座区域内设置上万个RFID标签，系统平台可将道路方向、商店折扣及餐厅菜单等资讯，用信号台传送到游客或消费者的手持式接收器上，手持接收器配有3.5寸OLED触摸屏，具备RFID识别、红外线扫描、429MHz无线传输、Wi-Fi及蓝牙传输功能。除了可以实时接受以上资讯，游客也可以通过手机读取二维码，获取包含商店资讯、地图路线、观光资讯、设施导游等旅游信息。只要手持此移动装置，游客无论想找哪家名店喝茶或哪家精品店购物，都能快速获得资讯。如当步行经过某家商店前面所架设的无线标签，游客即能收到当前该区域商店的促销计划或餐厅的菜单等资料，同时也可标示出游客所在的位置，并可提供临近公共交通搭乘的方式和线路等，达到无所不在的购物乐趣。

由于2007年的“银座计划”成效显著，2009年2月至3月，及2009年10月至2010年3月，东京市政府再度实行第二、三阶段试验计划，将新宿及银座地区的资讯服务进行了充分整合。新宿地区信息平台使用东京都市政摩天大楼瞭望台的全景影像，提供资讯、周边设施导游及地铁、公交线路导游，而“自动无线支援方案”则为残疾人士提供了无障碍路线的搜寻与服务，为其提供了舒适、安全、放心的服务。

掀起低碳节能风暴。作为日本的首都，东京的商业实体和社会组织众多，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巨大，而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是东京大学，2006年其碳排放达到13.6万吨，其每年消耗的电费成本则高达6000万美元。因此，一项旨在降低电能消耗、减少碳排放的“绿色东京大学计划”于2008年6月开始执行，其目标是“利用信息技术以智能和智慧方式改善环境”、“将以强制被动方式改善为以自觉方式打造低碳环境”。该计划以东京大学工程院2号楼信息网络为样板试验平台，通过利用传感器等先进的元器件及IPv6下一代互联网协议平台，将建筑内的空调、照明、电源、监控、安全设施等子系统联网，形成兼容性系统综合数据并进行智能分析，对电能控制和消耗进行动态、有效地配置和管理。

传感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应用大大减少了电能消耗，如当学生进入研究室时，其所经过的照明系统和其独享的空调设施会及时开启，而当其离开系统则会立即关闭。而整个建筑都采用了此类技术，从而立即为东京大学树立了低碳节能的榜样。

该计划的影响绝不止于这所日本最负盛名的大学，由于该计划由东京大学、名古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东京中心地区政府、IT非盈利组织以及开发商、总承包商、建筑设计部门、设备制造商等30余家公司组成的联合财团

发起成立，在项目形成结论并公开后，将迅速扩展应用至日本各地区的各行各业，造福全社会。

类似的应用也被松下电器应用于“现场 E1”项目。松下电器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主要体育场内，安装 IPv6 照明控制系统，从而有效地控制和检测奥运主场馆区域的 1.8 万盏照明灯，该系统直接降低了 10% 的电能消耗。类似的应用还被广泛用于东京的湿度、温度、气压、降雨量等气象监测领域，并大大降低了能耗，而日本的跨国公司更将此应用延伸到了几十个海外市场。

（三）纽约的新能源政策

面对严峻的能源形势，纽约市从 2007 年以来通过加强规划、成立专门组织、加强监管和立法、扩大清洁能源供应等一系列能源发展新举措，取得了显著的能源供需平衡效果。

1. 制定能源发展中长期规划，引导能源可持续发展

2006 年纽约市制定了能源发展中长期规划（2007—2030）。其主要目标是降低能源需求、增加新的清洁能源供应、促进能源基础设施现代化。纽约市规划到 2015 年，确保清洁、安全、可承受的电力供应大幅度提高。为此纽约市加大了对综合能源效率计划的投资幅度，加倍供应清洁能源。

首先降低公共部门的能源消耗。针对公共机构大楼，商业和工业建筑，多户住宅建筑等高耗能单位，通过系统激励、委托授权、强制执行等措施加快能源效率提升；其次替代陈旧和低效的能源生产力，通过实施能源效率战略增加供应。通过这些举措，纽约市电力和热力费用每年降低 20 亿至 30 亿美元，到 2015 年，平均每年每户节省能源费用 230 美元。到 2015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 700 万吨，到 2030 年城市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30%。

2. 成立能源规划委员会，实施并改进能源规划

为了确保能源供应方和需求方协作起来共同谋求城市的能源安全发展，纽约市成立了能源规划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审查和批准城市需要的能源供应和需求战略规划，并提交给公共事务委员会以便获得拨款，并接受其监管。在能源规划委员会下专门设立纽约市能源效率管理局，负责实现降低城市能源需求的目标。该局直接指导纽约市的能源效率和能源需求减少活动。管理局将依照能源规划委员会制定的能源需求减少目标来实施并管理有关项目。设立一定的奖励活动来促进有关能效创新活动的开展。纽约市、纽约州能源研究发展中心、爱迪生电力公司等都是管理局委员会的成员，这些机构支持管理局进行协调行动，以促进能源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

3. 加强监管、立法和培训，减少能源浪费

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已将能源效率作为市政府行政的基石。市政

府通过优化监管来促进能源协调发展，为了鼓励更多人参与能源效率创新活动，政府改变了从能源公司收益中抽取利润的做法，代之于刺激降低能源需求的活动，加强对需求方的激励。

一是在重点领域加强节能监管。纽约市首先加强了公共机构和政府大楼、商业和工业建筑、住宅楼、新建筑、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领域的节能监管。其次侧重于提高现有建筑物的能源效率。市政府投入年度能源收入的10%，支持建立城市建筑物的能源使用管理系统和城市运营中的节能活动。并开展日常的能源审计和建筑物节能监控，加强城市建筑物节能改造，电费和供暖费节约激励，节能灯更换等。

二是加强纽约市能源和建筑能效法律法规建设。纽约市通过加强能源和建筑法规建设以支持能源效率战略和其他环境目标的实现。纽约市提出建筑规范的全面绿色化，重点在建筑方面实施城市能源效率战略，把新的、可持续发展技术应用到建筑节能中去。同时纽约市还强调建筑法与节能法、消防法等法律法规的协调，以共同致力于能源可持续发展。

三是加强节能激励和峰值负荷管理。政府创建了电力期货市场，未来用户可以提前付费购买未来的用电量，这保障了供应商提前收回投资和资金回报。在峰值需求减少项目中，政府对峰值期间的需求赋予高价，以激励用户减少需求，参与者在注册后可以获得补偿。目前纽约市注册用户使城市集体高峰负荷降低大约500兆瓦或4%的城市高峰电力需求。纽约市政府还通过安装智能电表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实时电价。智能电表可以使建筑物追踪自己的能源使用，包括实时的和某个时段的个别用户的能源消费情况。预计到2015年纽约市有50%的小型企业和居民加入；城市公共事业委员会强制100%的中型和大型非住宅用户在2015年前加入实时电价项目。

四是开展能源教育和节能培训运动。纽约市通过能源教育和培训运动来提高能源意识，提升能源效率。在许多情况下都存在节能的机会，但是只有在公众和建筑专业人士深刻认识到节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熟知可能的节能选择方案，他们才会理解并实践节能行为。为此纽约市能源效率管理局开展了广泛的能源教育、培训和能源质量控制项目，以提高能源效率。纽约市与学校，市场专业人士和非营利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针对不同部门的公众开展定制化的能源教育活动，比如媒体、小学生、商厦里的商业等。

4. 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扩大清洁能源供应

为了应对2015年900兆瓦新增电力需求，纽约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一是加快电力重组、清洁电厂建设和电网建设。二是扩大清洁分布式发电项目（Clealq DG）。分

布式发电效率高于传统发电的2倍，在建筑能效改造中使用分布式发电装置，3~5年就可以收回成本，而传统的能效改造需要5~7年才能收回成本。三是积极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场。纽约市通过有关政策着力培育可再生能源竞争性市场，比如为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减税，可以抵消前三年安装费用的35%，第四年和第五年的20%。

5. 促进能源传输设施的现代化，改进城市电网的安全性

一是通过立法和政策来保护电网，促进电网现代化。市政府要求其他单位在从事街道改建等项目时，必须保护电缆，同时交通运输部门要为电力公司运输大型变压器提供便利场地和运送设施。纽约市投资支持爱迪生公司研发新的技术用于电网现代化。市政府支持爱迪生公司开展了一项面向未来的3G系统项目，主要是在电力传输中引进先进设备，促进系统的电子化和自动化，以便能够在需求波动和电网出现问题时做出快速反应并迅速找到问题所在，以有效提升电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二是加强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纽约市有4条燃气运输管道，在一年中最热和最冷的季节，燃气需求就会超出这些管道的容量。随着燃气需求的增加，这一情况更加严峻。为此纽约市加强了包括管道建设和液化天然气终端建设在内的燃气传输设施建设。

（四）对北京的启示

制定明确的减排目标。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战略，需要清晰的目标作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三个城市都是共通的。东京的目标是以2000年为基准，在2020年时减少25%的排放；伦敦决心到2025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60%的二氧化碳排放；纽约计划于2030年，在2005年的排放水平上减少30%的温室气体。只有制定了具体的减排目标，才能让公众参与、政府为主的节能减排措施更加有效。

联合不同部门的全方位减排。城市生活的不同层面，如交通、住房、供电等均与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息息相关。换言之，从政府管制的角度看，应对气候变化并非任何个别部门能够独立担当的工作。东京强调以城市作为规划单位，制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战略；伦敦和纽约也制定全面战略，从提高能源效率、改善交通规划、提高建筑物设计标准、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正好说明决策者制定高层次全面政策，协调不同政策的重要性。

第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是艰巨的，决策者必须有坚定的政治意愿，而三个城市对自身发展的成熟程度有相当的自觉，不约而同地强调要带领国内其他城市甚至全世界，制定严格的温室气体减排措

施和标准：东京政府坚决推行“世界最高水平的应对战略。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法上领先全国”；伦敦计划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研发和金融中心；纽约政府决心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先锋。

第二，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经济并行不悖。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之间取得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而伦敦和纽约的经验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不但不会妨碍经济发展，更能带来经济效益。纽约政府估计，通过节能和增加供应清洁能源，全市的电费和暖气费开支，可望在2015年前每年减少20亿~30亿美元。伦敦政府估计，节能措施可以在未来二十年替市民节省10亿英镑的能源开支。此外，伦敦决心把握发展环保技术带来的商机。由此可见，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

二、城市节水经验

（一）伦敦泰晤士河的治理经验

泰晤士河的治理成功，关键并不是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与工艺，而是开展了大胆的体制改革和科学管理，被欧洲称为“水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他们对河段实施了统一管理，把全河划分成10个区域，合并200多个管水单位而建成一个新水务管理局——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局。然后按业务性质作了明确分工，严格执行。在水处理技术上运用传统的截流排污、生物氧化、曝气充氧及微生物活性污泥等常规措施。处理后的废水用于养鱼、栽培等，从而给水务工作带来了活力。其优越性主要表现为：1. 集中统一管理，使水资源可按自然发展规律进行合理、有效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杜绝了水资源的浪费和破坏，提高了水的复用系数。2. 改变了以往水管理上各环节之间相互牵制和重复劳动的局面，建成了相互协作的统一整体。3. 建立了完整的水工体系，从水厂到废水处理以至养鱼、灌溉、防洪、水域生态保护等综合利用，均得到合理配合，充分调动了各部门的积极性。

（二）东京：日本雨水利用技术

日本是一个水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因此日本政府除了开采措施和提高水的利用率、鼓励全社会利用循环水外，十分重视对雨水的利用。早在1980年，日本就开始推行雨水贮留计划。采用雨水贮留渗透计划，可以有效地补充涵养地下水，复活泉水，回复河川基流，改善生态环境条件。利用雨水贮留渗透的场所一般为公园、绿地、庭院、停车场、建筑物、运动场和道路等。采用的渗透设施有渗透池、渗透管、渗透井、透水性铺、渗透侧沟、调节池和绿地等。

在东京都，已有8.3%的人行道采用了透水性柏油路面。雨水通过透水性

柏油路面入渗到地下，经过收集系统处理后加以利用。此外还在建筑物上设计了收集雨水的设施，将收集到的雨水用于消防、浇灌、洗车、冲厕和冷水补给等，也可以经处理后供居民饮用。

在建筑物上收集雨水，多采用沉淀和过滤的方法，维修管理很方便，一般只要清扫沉淀池和过滤池。未解决降尘和酸雨，通常采用设置分离微滤网，以清除雨水贮存池内的泥沙，部分集雨设施还备有注氯装置，对雨水贮存池进行定期消毒。

（三）纽约城市节水

纽约市有《安全饮水法》《地表水处理规定》等多项法规；这些法规涵盖了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的全过程，涉及政府、企业、居民各个方面，特别对工业和商业用水进行严密监控。美国节水最主要的一招是大力提高循环用水率，特别是对炼油、化工、排放有毒物质的制造业的循环用水率要求都很高。1975 年美国工业平均循环用水率仅为 54. 3%，2000 年提高到 94. 1%（其中化工和石油行业的循环用水率分别高达 96% 和 97% 以上）。从 1975 年到 2000 年，美国总人口增加 24%，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 1. 4 倍，全国总取水量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约 9%，其中制造业的取水量减少 62%。纽约家庭节水措施，见表 8－2。

表 8－2　纽约家庭节水措施对比

项目	旧习惯	用水量（升）	好习惯	用水量（升）	节省水量（升）
刷牙	水长流	38	牙刷浸湿，短时冲刷	2	36
刮脸	水长流	76	用水池里的水	4	72
洗手	水长流	8	用盆洗	4	4
洗碗	水龙头冲洗	114	在盆中清洗，漂净	19	95
洗碗机	满周期使用	61	不满周期使用	26	34
洗衣机	满周期（满载）	227	不满周期（不满载）	102	125
淋浴	水长流	95	冲湿，抹肥皂清洗	34	61
盆浴	满盆	132	1/4 满（最少）	38	95
马桶	老式设备	19～26	新设备或老式设备改装	11～23	3～8

（四）对北京市的启示

1. 以节水为导向，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水资源是北京最紧缺的资源。近年来，北京市政府高度重视新形势下的

水务发展，多次从制度建设上下大力度，积极推进北京节水型社会建设。通过实施综合措施，北京形成人口和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用水总量稳定下降的好局面。同伦敦、纽约、东京这些世界城市相比，北京在产业结构、用水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调整空间。转变发展方式是基本国情的要求，以节水为导向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是北京基本市情的要求。以节水为标准推进北京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符合世界城市建设的方向，也是适应北京缺水实际的要求。

2. 创新政策管理，引导公众参与

开展节水型单位和小区创建，以优秀的典型经验带动全社会的节水意识，同时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节水工作中来。2009 年北京市从市政府机关大院和老旧居民小区入手，大力推进节水型单位（企业）和节水型居民小区的创建工作。全年新创建节水型单位 110 个，节水型小区 85 个。去年还在农村开展了节水示范村的试点。居民家庭节水器具普及率达到了 91.4%，其中城区达到了 92%，郊区达到了 90.4%。未来北京市将进一步推动互动型的社会参与节水体系。通过营造节水舆论氛围和加大社会监督等方式，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3. 以科技促节水，推广节水器具

北京市将不断完善节水高效的产业体系，结合东京的案例，扩大再生水和雨水等非传统水资源的利用。依托首都科技优势，着力研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提高用水效率的方式方法，推广先进节水技术和产品。

北京市每年举办的节水器具推介会，由市节水中心主办，2008 年有一款全自动节水器，是把洗脸和洗澡水回收进行冲马桶，设计美观、方便、实用，它可以每天节约大约 36 升水，一个家庭一年可以节约 14.13 吨，一个城市最少可以节约 1413 万吨，节约的同时也可以减少污染。

总之，建设首都北京节约型城市和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都市圈前景十分广阔，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张贵祥教授）

香港地区的国际化大学成长

大学，尤其是知名大学，不仅是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科技创新的基地，而且为所在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不断提供能量并注入新的活力，已然成为城市的名片。而作为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大学所在城市

也为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支撑。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国际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上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如何与国际化接轨，实现城市国际化和大学国际化，并成功地实现两者间的良性互动，是当前中国城市与大学面临的共同课题。

一、大学国际化与城市国际化：概念界定及评价指标

关于大学国际化，最早明确提出这一理念的是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会主席克拉克·科尔，他在1980年出版的《扩展高等教育的国际维度》一书序言中指出："我们需要一种超越赠地学院[①]传统的新的高等教育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是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或者说高等教育要国际化"。其后，国内外学术界对大学国际化从不同维度给出了很多不同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大学国际化是一个"过程"，有人认为是"结果"，有的则强调其是一种过程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所属的国际大学联合会（IAU）则认为："大学国际化是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变化过程，既有学校内部的变化，又有学校外部的变化；既有自下而上的，又有自上而下的；还有学校自身的政策导向变化"。该定义不仅指出了大学国际化所处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大背景，更强调大学要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注重文化的多元共存，较为科学地总结出了现代大学国际化的基本内涵，给予大学国际化的概念较完备的定义。

毋庸置疑，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当今时代，与国际高等教育市场发生联系、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大学国际化既是一般大学自身发展战略的目标定位，同时也是其发展的实际过程，"还是其朝向目标定位而发展的结果。"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大学国际化包含着极为广泛的内容，涉及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既可以作为一个目标，也可以看作是过程或结果，大学国际化必须通过全方位的国际化活动才能最终实现，于是，便形成了衡量一所大学国际化程度较完整的指标体系，大体上分为教育观念国际化、教授构成国际化、学生构成国际化、教学过程国际

---

① 又称赠地大学"Land-grant universities 是美国由国会指定，得益于莫雷尔法（Morrill Land-Grant Colleges Act）的高等教育机构"。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案》，规定各州凡有国会议员一名，拨联邦土地3万英亩，用这些土地的收益维持、资助至少一所学院。这些大学的宗旨在于教授农学、军事战术和机械工艺，不排斥古典教育，使得劳工阶级子弟能获得实用的大学教育。

化、办学条件国际化和信息化、高校办学和科研的对外合作、高校对外成果交流七个一级指标，37 个二级指标（后附表一）。

同“大学国际化”一样，“城市国际化”也是国际社会20 世纪80 年代提出的新概念。其本质在于以国别为尺度来衡量城市对地域影响程度的强弱。日本东京规划审议室的国际化问题研究会在《东京的国际化与市政问题》报告中提出：“所谓（城市）国际化，是指开辟一个日本与海外诸国进行物资流通、人员交流、信息传播、文化交流等活动的场所或领域，并使这个场所内双方交流活动的比例不断增加的过程。”换言之，在文化、物质、资源、信息及人员等方面进行跨国界的相互交流与往来，并使城市知名度提高及城市整体功能提升的过程，就是城市国际化。作为当代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分别提出了城市国际化发展战略。与大学国际化需要一个评价指标体系同理，定位城市国际化发展战略目标及制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步骤等，也需要有一套衡量城市国际化发展进程的指标体系。根据联合国伊斯坦布尔城市年会提出的城市国际化指标体系，可以简单测算城市国际化的绝对水平。其主要内容包括：总体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要素、基础设施要素、人文环境要素、政府作用要素、管理绩效要素、科技开发要素、人力资本要素、生活质量要素等，可细分为 17 个指标进行评估和计量（见附表二、表三）。

比照大学国际化和城市国际化的指标体系，不难看出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共性，均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两大层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其中在硬实力评价指标上，二者均包括较高的现代化程度，如大学国际化需要办学条件的现代化和信息化，先进的办学条件和优良的教学研究设备是提高教学水平和研究水平的物质基础。具体而言，学生和教师吸收国外前沿科研成果、获取外界信息、接受先进思想离不开计算机的运用、网络的开通和普及、图书馆图书与设备的补充更新以及现代先进媒体手段的运用。而实现城市国际化同样需要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诸如生产、生活、交通和娱乐设施较全，城市功能完备。在软实力评价指标上，无论是实现城市的国际化还是大学的国际化，都需要增强其开放性、融通性、辐射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提高国际知名度。

因此，我们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从外在的表象上看，城市国际化是大学国际化必备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而大学国际化是城市国际化重要的品牌和标识。而从内在的影响力分析，城市国际化与大学国际化在参与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在运行体制和机制方面逐步与国际惯例兼容和接轨，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互为发展的助推器。

二、大学国际化与城市国际化互动发展的关系探讨

（一）从地缘影响力角度分析，“大学的城市、城市的大学”理念使大学与城市互为“国际名片”

从城市国际化的评估标准不难看出，一个城市的国际化水平高低与否不仅受制于城市的硬实力，也受制于城市的软实力。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城市离不开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科技创新的现代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特质决定了它是城市软硬实力不竭的源泉之一。同时，大学选择城市的实例屡见不鲜。以中国为例，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以城市或城市近郊作为地理位置首选，而一流的大学也大多落户在一流的城市。“在2005年度中国管理研究院组织的中国大学排名榜中，前100所大学集中在33个城市，平均每个城市3个，其中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六个城市占到53个。”而从这六个城市综合实力（以GDP为据）在全国城市中的排名来看，上海、北京、广州长期稳居前三名的位置，武汉、南京、西安也居于前三十名的位置。显然，大学与城市之间大体上保持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同样，与大学具有历史和现实联系的城市在迈向国际化发展目标中，也会更加注重扶植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学，以提升城市的品味和国际知名度。城市与大学因彼此的相互需要和渗透而被称之为“大学的城市，城市的大学”，这一理念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整体性，也反映出人们主观认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还应该看到，大学作为一种重要资源，不仅对所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还会由于其源源不断的毕业生给城市带来更加广泛和深远的政治与社会影响。例如，哈佛大学坐落在美国波士顿地区，这里先后走出7位美国总统，使得这座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大大提升；坐落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诞生了两位美国总统，使纽约这座世界顶尖城市更加闻名遐迩。而泰晤士河谷地的主要城市牛津，之所以闻名全球是因为英国牛津大学在此诞生并以此命名，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收获更加密切了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大学国际化还是城市国际化，二者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都需要在发展理念及管理体制等方面与国际社会进行接轨。在日趋民主、自由的国际社会里，大学与城市也必然要共创自由与民主空间。一方面，大学在国际化进程中必然会营造一个更加开放、独立、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而这种鼓励创新发展的意识和文化对城市国际化会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城市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会为大学提供更加和谐、良好的社会政治氛围，

并与大学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借力大学的国际化程度，进而提升自身的国际化水平。总之，在地缘影响力这一层面上，大学国际化与城市国际化的互动发展可以使两者成为彼此映照的“国际名片”。

（二）从发展的角度分析，大学的“学术创新”与城市的“科技创新”促使两者互为“发动机”

就大学而言，大学传统的职能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而现在服务社会也成为重要的办学理念之一。其国际化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还表现在为社会经济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表现为科研成果可以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学云集了众多的学者和富有创新精神、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实现科技兴国的重要人力资源。据 2007 年 2 月 28 日《中国教育报》公布的 200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有关资料显示：“国家自然科学奖授奖项目 29 项中，高校参与获奖 15 项，占 51.7%，其中国家技术发明授奖项目 41 项，高校参与获奖 25 项，占 61%；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项目 184 项，高校参与获奖 106 项，占 56.7%。”可见，大学科研成果在中国各行业科研成果中所占比例达半壁江山，是进行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从城市的角度而言，国际化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增强经济实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而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是科技创新。一方面，大学通过学术创新和科技创新以保证或获取其在教授知识及前沿科学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进而提高其国际化程度。另一方面，也同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繁荣与昌盛，为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市更因大学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知名度也将随之提升。以北京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上海交大昂立等高科技企业为例，它们通过“产—学—研”结合的途径进入了国际市场，不仅提高了所在大学和城市的国际知名度，而且使城市的国际竞争实力得到增强。所以，在国际化进程中，大学和城市因对学术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共同需要而逐渐融合、互相依赖，彼此促进。

（三）从文化软实力角度分析，大学国际化与城市国际化皆因“多元文化”而互为“助推器”

无论是大学国际化还是城市国际化，都需要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以提高文明程度，即都需要通过文化的多元化实现文化软实力的增长。所谓文化软实力，指的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在城市国际化指标中，表征城市社会开放水平和程度的四个指标皆与此有关，用来表现其国际化水平或国际化程度的高低，成为衡量

一个城市或大学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同样，无论对于城市或大学，文化软实力同等重要。无论是城市还是大学如要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走出国门被国际社会所认可，也必须有先进的文化和符号作支撑。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提出了建立“首善之区”的口号和目标，其内涵主要是认为首都理应成为众城之表。在中国古文献中，用到“首善”二字的一是见之于《汉书·儒林传序》：“建首善自京师始。”后用“首善之地”，指首都。《金史·礼志八》曰：“况京师为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观仰。”也作“首善之区”。二是见之于《续资治通鉴·宋哲宗元祐元年》：“学校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从出，非行法之所。”“首善之地”泛指最好的地方。可见，在人们的理念中，首都和学校同样应该是最好的地方，虽然二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功能和作用不一样，但是其重要性和基本属性是可以相互比照的。

在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中，文化的多元化主要是通过教师队伍的构成，学生的国际化成分，教学过程的国际化内容，对外办学与合作的数量，举办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等内容具体化和精细化。但是强调和评价的指向性十分清晰，这就是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和创新。从与城市互动的关系分析，大学国际化所引领、传播的各国优秀文化完全可以辐射到城市，为城市国际化营造良好的国际文化环境，进而助推城市对多元文化的认可与接纳，增强城市自身的文化软实力。例如，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和学者们到北京来既有游览八达岭、故宫、CBD 的要求，也有一睹北大、清华等名校风采并进行交流的欲望。反之，城市国际化对多元文化的兼容并蓄，也使得大学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的多种资源，提高自身文化的多元化程度。总之，在国际化进程中，大学与城市因对多元文化的共同需要而成为彼此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助推器”。

三、大学国际化与城市国际化关系的个案分析——香港地区

作为一个港湾城市，香港不仅土地匮乏而且崎岖多山，除海湾外自然资源缺乏。但正是这样一个自然条件并不优越的城市，“二战”后却以罕见的速度跻身于世界先进城市行列。美国《幸福》杂志曾把香港列为“世界对外文化开放程度最高的 5 个商业城市之一，”[①] 即便是东京、巴黎、柏林这样的城

① 乐正．清除殖民色彩 拓展国际空间——“九七”后中国香港国际化的发展路向［J］．特区理论与实践（1997），增刊，23.5 个城市分别是纽约、伦敦、亚特兰大、芝加哥和中国香港。

市也未享此殊荣，香港的国际化魅力可见一斑。

（一）中国香港城市国际化的现状与特点

香港的国际化具有历史渊源，作为英国殖民化的一个副产品，衍生于英国在远东的商业扩展计划。作为19世纪世界上最强盛的工业化国家和海上殖民帝国，英国依仗其在国际商业领域的成功，在使香港变为一个由其控制的远东国际贸易中转站的同时，也加重了香港的国际化色彩。

时过境迁，今天的香港国际化程度更加引人注目。从硬件上看，中国香港具有发达的海、陆、空交通和通讯，亦称两通，这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核心。作为国际空港、海港转运中心，香港的国际机场现阶段每年可处理旅客5000万人次及货物400万公吨。现有89家航空公司每日提供约750架次定期客运及全货运航班，来往中国香港及约150个遍布全球的目的地。从通讯角度而言，香港已建成具有现代化通讯设备、资料库和信息产业，是世界上信息制造、加工、传播量最大的城市之一。

从软件上来看，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贸易、制造业及国际性旅游中心，除了自由港背景外，还得益于其国际化进程中的体制政策保障。以金融为例，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实现离不开三大政策举措：（1）1972年与1973年放弃外汇与黄金管制；（2）1978年放宽外资银行执照，根据“领土来源”的原则，只向源自中国香港的所得或收益征税，对源自中国香港以外的所得或收益不征税；（3）1989年取消利息税和部分证券交易的印花税。此三项举措保证了香港金融业的极大自由度和高度繁荣。历经百余年的演变，及至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已成为亚太地区多功能的现代化国际都市，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自由港，享有“东方之珠”的美誉。

（二）中国香港地区大学国际化的基本情况和特色

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国际地位对中国香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条件，促进了香港地区大学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日益提高。香港现有八所高等院校受到政府资助。它们分别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教育学院和岭南大学，其中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属综合性大学，皆以高度国际化闻名于世。

香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办学理念与机制的国际化、师资构成的国际化、学生来源的国际化、课程设置与管理的国际化以及办学条件的现代化等方面，一些知名大学与世界其他著名大学并驾齐驱，毫不逊色。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该报与英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Quacquarelli Symonds）联合进行的2009年世界大学评估中，中国香港有3所大学

进入榜单前50位，分别是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位次分别为24、35、46[①]。而在2010年亚洲大学排行中，排名前十的高校中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位次分别为1、2、4，其中香港大学蝉联排行榜第一。特别是香港科技大学，虽然成立于1991年，建校不到20年，但已成为一所具有高度国际化水准的研究型大学，它由理学院、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及霍英东研究院五所学院组成，在多种大学排名中均在世界前50名之列。在2010年被评为亚洲第二，超过香港中文大学，仅次于香港大学。

从办学理念上来讲，香港高校普遍认识到大学国际化的前提首先在于具备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在认识教育规律、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问题上要有全球视角。因此，为了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树立“国际大学”的形象，香港各专科以上的院校普遍重视发展与国外和其他地区的广泛交流。以香港大学为例，其办学目标明确提出：“一是为中国而立，二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而香港中文大学首任校长李卓敏教授为该校确定的发展目标则是：“要成为一所有声望的大学。成为国际大学界和学术界的一分子，而且必须具有世界性的学术水准。”

从办学机制上来讲，香港的高等教育法律体系完备，各高校都有制订详细的“大学条例”，无论是行政管理模式、学位结构还是学位考试等，都综合了欧美大学之特长。而大学的管理人员因大多具有西方教育背景，他们所带来的管理理念、方式方法乃至所形成的运作机制等，也都体现出鲜明的国际化特征。从师资构成及人才培养上来讲，香港各大学在选聘教师时大多注重国际教育背景，进而直接推动了教学、科研向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在大学课程设计和教材使用上，香港各大学除了许多课程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外，还开设许多涉外课程，不仅增强了学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的认识，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对不同文化的认同感，这些措施既有利于学校的教学内容与水平与国际接轨，也提高了学校的国际知名度。在加强对外联系上，香港高校不仅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而且大力推进对外合作办学。高度的国际化办学程度吸引了内地大量的优秀生源来港留学，促使香港诸大学生源结构有了新的变化。以香港大学为例，2010年港大在内地录取284人，其中10名是来自内地各省的高考状元。为了更好地吸引非本地学生来港学习和工作，自2008年5月起，中国香港政府还放宽了

① 英国泰晤士问高等教育杂志和英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Quacquarelli Symonds）是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权威评价组织，从2003年起与英国《泰晤士报》联手对世界大学进行评估。

非本地生源就业限制，明确规定应届非本地毕业生经申请可无条件留港12个月。

表8-3　近两年来香港8大高校非本地学生情况（人）

内容 / 年度	副学位课程	学士学位课程	研究院修课课程	研究院研究课程	总计	占学生总人数比例
2007—2008	1	3979	88	3225	7293	10%
2008—2009	5	4790	58	3560	8413	12%

（三）香港城市国际化与大学国际化的互动发展

百余年来，香港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国际化都市，其中极为关键的一条经验是开放性地发展教育事业，并对人力智力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开发。多年来，香港城市国际化进程与大学国际化发展紧密配合，彼此互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香港高校不断根据社会发展制定和调整国际化发展战略，努力适应城市国际化需求创新办学模式、挖掘区域资源，形成国际化的办学特色，多层次、多元化、功能齐全的国际教育体制，为香港城市国际化的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另外，香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所产生的教育、学术和文化氛围，对城市国际化又产生了巨大的辐射作用，加速了其国际化进程。

从城市国际化对大学国际化的影响来看：

一方面，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市国际化需求客观上促进了香港高校的国际化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作为一个东西方文化高度融合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及信息中心，香港各高校的国际化办学理念来源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根源。早在殖民地初期，中国香港政府就针对本地经济发展落后的实际状况，奉行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通过有效的制度本土化创新，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香港实际的高等教育模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中国香港国际化水平的日益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的相对低下对中国香港社会发展的制约日益凸显，中国香港政府及高校及时调整教育发展战略，在解决好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化矛盾的基础上，实现了质量和规模的飞跃，数所大学跻身于亚洲一流甚至是世界一流行列，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特别是1991年的香港科技大学，在短短十几年间迅速发展成为国际知名大学，创造了中国大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其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学校定位准确，招聘优秀师资队伍，加强科学管理，更重要的是来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充分利用了香港的区位优势。

另一方面，“两文三语”的独特背景和较高的国际化水平为香港高校的国

际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文和社会氛围。随着香港国际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发达的经济、林立的跨国企业及多元的文化交汇成为香港社会环境的一大特色。香港各高校结合自身“两文三语”的语言优势，不仅非常重视国际性学术交流，而且通过向全世界招贤纳才聚集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学界精英。同时，香港各高校还十分重视语言和文化上的国际化，香港的大学教育中，几乎所有课程均以英文讲授，不仅采用世界最先进和最新版的教科书，而且在人才培养上注重国际交往能力的提高和国际视野的养成，使之更加通畅地与国际社会接轨。可以说，正是城市国际化所提供的这种社会氛围和物质条件促进了香港高校在开放办学、全面掌握全球最新资讯、培养世界性人才等方面如鱼得水，浑然天成。

从大学国际化对城市国际化的影响来看：

中国香港一些大学的发展战略与定位对城市国际化、现代化的影响不可估量。以中国香港科技大学为例，2000 年校董会便确立要成为“一所在国际上具有深远影响，而又致力于为本地服务的优秀学府。”按此定位，香港科技大学要在每一个精选的教研领域游走在世界前沿；还要坚持对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将学校的发展与服务地方紧密结合。校方明确表示学校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为香港及邻近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一些大学的教师招聘制度中，考察和评审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这其中包括参与不同的社会机构，例如政府的一些咨询会议、专业团体的非牟利性的工作。当前香港经济正在转型，作为科学的“大本营”和“人才库”的大学，将成为香港向知识型社会转化的重要支点和有力杠杆，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的崛起无疑从整体上提升了香港的文化品相。因此，大学国际化发展与城市国际化的塑造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可以并行不悖，互为补充。在培养人才方面，基于香港多元文化的区域特色，香港科技大学努力给学生创造多元文化学习机会、配备国际一流的配套设施，学生出口定位是跨文化管理和沟通，强调学生要具备与不同国家、不同国籍的人一起工作的能力和经验，大大提升了毕业生在当地的就业率。再如，美国硅谷之所以世界闻名，其根本原因是斯坦福大学能为周边的 IT 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软件人才。香港高校的国际化定位不仅保证了香港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而且为其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变、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香港各高校利用自身的地缘和区位优势，汲取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多元文化的生成。在香港，人们一般会认为老牌的香港大学是英式教育的代表，香港中文大学则饱受中

国文化的浸泡，而后起之秀香港科技大学则是典型的美式教育。而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的卢乃桂教授却认为，应该说它们现在都是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是混合的、港式的教育模式。人员的国际交流是大学教育国际化中最活跃的方面，以香港大学为例，有50%以上的老师来自国外，学生来自50多个国家。有不少于50%的学生通过“香港大学世界联系网”计划，以交换生身份前往世界各地超过80个以上学府，进行最少一个学期的交流学习，其中包括牛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柏克莱分校及麻省理工学院等。同时，学校也与其他世界著名大学保持着广泛的国际化教学联系和学分互认制度，世界各地的学生也源源不断地涌进香港校园，在学校里随时可以看到各种不同肤色、操不同语言的人。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宝贵的国际性人力资源，港府、企业和其他组织为大学生积极提供实习岗位和便利条件。来源于政府部门、跨国公司、校友机构等多种渠道的实习单位既有政府机关，也有跨国公司、银行、商会等，政府与学校加强合作，共同培育人才。香港高校国际化所产生的教育、学术和文化氛围，对香港城市国际化产生了巨大的辐射作用，多元的文化氛围不仅增强了香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从整体上进一步提升了香港的国际化水平。

四、结语

通过对大学国际化与城市国际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探讨，以及香港高校与香港经济社会相互促进的个案分析，探索大学国际化与城市国际化互动双赢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内地城市国际化及大学国际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通俗地讲，城市是大学的载体，大学是城市的名片，二者是彼此的荣耀和见证。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二者同样应密切联系，相互滋养。

毫无疑问，城市国际化可以为大学的办学提供良好的空间和条件，加速大学开放办学的步伐，扩展办学空间，丰富办学资源，提高国际化水平。利用城市的地域优势，大学可以汲取地域特色和传统精华，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把城市的国际化作为实现国际化的基础，同时又可以按照国际化对大学的要求，加强大学国际化的建设和管理，制定近期和长远发展规划，并与所在城市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协调和互动。另一方面，大学国际化的进程又可以为城市发展高科技企业和知识密集型经济提供了高质量的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持，大学国际化所产生的教育、学术和文化磁场，对城市国际化可产生强大的辐射作用，增强所在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国际影响力，加速城市国际化进程。因此，城市在加强国际化建设的进程中，应该注意到并有效利用大学国际化

所提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能量，不断增强综合实力，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使两者相互影响共同受益。

（中国政法大学　刘长敏教授　北京语言大学　马方方讲师）

“世博会”对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目标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政府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城市化，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尺度，而且也是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规律性选择。有学者指出：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城市经济的竞争①。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客观上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世界级大城市的出现和建设。

根据大城市优先发展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城市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上海市政府在 2002 年明确提出上海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建设“世界城市”。2010 年世博会的举办，无疑是上海建设国际城市、建设世界性城市的一次重要契机。这届世博会将会既是上海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机遇，也是其周边地区城市发展的转折点。世博会对上海其周边区域的功能结构、产业结构、就业机会、空间结构、城市形象及城市功能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充分利用世博会这个平台，协调世博园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确定地区中、长期发展战略，是实现世博园周边地区发展的关键，也是不断提高上海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早日实现“世界城市”目标的重要契机。

本文主要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分析“世博会”对上海市建设“国际城市”的影响：在定量方面，在中国人民大学张可云教授等提出的现代国际城市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对“世博会”对于上海市的影响进行评价；在定性方面，主要结合条件路径对上海市的环境条件、区域影响力条件、国际影响力条件、产业转型条件和资本融通条件改善的影响进行分析。

---

① 法里德·扎卡里亚. 未来属于中国吗. 新闻周刊，2005－5－9.

二、世博会对上海建设国际城市的指标体系影响预测

表 8－4　现代国际城市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table>
<tr><td rowspan="2">一级指标</td><td rowspan="2">二级指标</td><td colspan="2">三级指标</td><td rowspan="2">评价标准</td></tr>
<tr><td>指标项</td><td>权重</td></tr>
<tr><td rowspan="3">一般性指标 0.1</td><td rowspan="3">一般性指标 10</td><td>人均 GDP（美元）</td><td>4.0</td><td>20,000</td></tr>
<tr><td>城市化率（%）</td><td>2.0</td><td>65</td></tr>
<tr><td>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td><td>4.0</td><td>70</td></tr>
<tr><td rowspan="20">现代化指标 0.5</td><td rowspan="5">经济指标 2.0</td><td>金融、证券、保险、信息占第三产业比重（%）</td><td>2.5</td><td>70</td></tr>
<tr><td>农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td><td>1.0</td><td>1</td></tr>
<tr><td>非农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重（%）</td><td>2.0</td><td>75</td></tr>
<tr><td>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美元）</td><td>2.5</td><td>4000</td></tr>
<tr><td>城镇登记失业率（%）</td><td>2.0</td><td>4</td></tr>
<tr><td rowspan="8">科技化指标 1.5</td><td>每年科技经费占预算财政支出比重（%）</td><td>1.0</td><td>5</td></tr>
<tr><td>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td><td>1.5</td><td>70</td></tr>
<tr><td>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td><td>2.0</td><td>70</td></tr>
<tr><td>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td><td>1.5</td><td>5</td></tr>
<tr><td>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td><td>1.5</td><td>70</td></tr>
<tr><td>科学家和工程师占科技活动人员比例（%）</td><td>1.0</td><td>90</td></tr>
<tr><td>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td><td>0.5</td><td>70</td></tr>
<tr><td>重大科学工程占全国比例（%）</td><td>1.0</td><td>5</td></tr>
<tr><td rowspan="7">文化体育指标 1.0</td><td>每万人口拥有博物馆数（个/人）</td><td>1.5</td><td>0.297</td></tr>
<tr><td>人均图书占有量（册/人）</td><td>1.5</td><td>30</td></tr>
<tr><td>每万人口拥有影剧院数（座/人）</td><td>1.5</td><td>0.187</td></tr>
<tr><td>图书馆数（座）</td><td>1.5</td><td>200</td></tr>
<tr><td>博物馆数（座）</td><td>1.0</td><td>150</td></tr>
<tr><td>人均公共体育用地（m^2/人）</td><td>1.5</td><td>1.6</td></tr>
<tr><td>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td><td>1.5</td><td>3</td></tr>
</table>

续 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
		指标项	权重	
现代化指标0.5	教育指标1.0	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1.0	10
		人口文盲率（%）	0.5	5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0	15
		教育事业支出占地方政府支出比例（%）	1.0	20
		全社会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	1.5	5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1.0	70
		义务教育入学率（%）	1.0	100
		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5	15
		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人）	1.5	500
	医疗卫生指标0.5	人均期望寿命（岁）	1.5	75
		人口自然增长率（‰）	1.0	5
		婴儿死亡率（‰）	1.5	3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	2.0	50
		每万人拥有医院病床数（床）	1.5	90
		公共卫生医疗支出比例（%）	2.5	6.9
	生活水平指标1.0	居民文体消费率（%）	1.5	40
		恩格尔系数（%）	0.5	15
		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m^2）	1.0	30
		每万人商业服务网点（个）	1.0	700
		饮用水水源达标率（%）	1.0	100%
		人均食品支出比重（%）	1.5	35
		城镇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美元）	2.0	4000
		人均娱乐、教育和文化支出比例（%）	1.5	40
	基础设施指标1.5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	1.5	25
		电话主线普及率（线/百人）	1.0	90
		每万人轿车拥有量（辆）	1.0	4000
		人均生活用电量（千瓦时）	1.5	2500
		城市民用建筑集中供水（电、热）普及率（%）	2.0	100
		航空港年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1.5	4500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台）	0.5	20
		使用公共交通上下班比例（%）	1.0	60

续　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
		指标项	权重	
现代化指标0.5	生态环境指标1.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	80
		环境保护投入占投资额比例（%）	1.0	5
		城市绿化覆盖率（%）	1.0	35
		人均公园面积（m^2）	1.0	20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0.5	80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	1.0	80
		人均绿地面积（%）	0.5	20
		污水排放处理达标率（%）	1.0	100
		万元工业产值能耗（吨/标准煤）	0.5	0.24
		年城市空气质量好于或等于2级的天数（天）	1.0	365
		悬浮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微克/m^3）	0.5	90
		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微克/m^3）	0.5	60
		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微克/m^3）	0.5	90
	防灾减灾及城市安全指标0.5	中心城防洪标准（年）	2.5	200
		每10万人刑事案件数（件）	2.0	800
		每10万人交通死亡人数（人）	2.0	7
		救灾资金占财政支出比重（%）	3.5	5
国际化指标0.4	资本国际化指标2.5	设立代表处的金融机构和组织数量（家）	1.5	150
		开设分支银行的银行数（家）	2.5	200
		世界500强企业来京投资的数量（家）	1.5	50
		FDI占本地投资比重（%）	2.0	10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目	2.5	200

续 表

<table>
<tr><th rowspan="2">二级指标</th><th rowspan="2">二级指标</th><th colspan="2">三级指标</th><th rowspan="2">评价标准</th></tr>
<tr><th>指标项</th><th>权重</th></tr>
<tr><td rowspan="22">国际化指标 0.4</td><td rowspan="15">国际交往指标 1.5</td><td>旅游国际化指数（外国游客与城市人口之比）（%）</td><td>1.5</td><td>80</td></tr>
<tr><td>举办大型国际会议数量（次）</td><td>1.5</td><td>50</td></tr>
<tr><td>国际航空线（条）</td><td>1.0</td><td>50</td></tr>
<tr><td>设在上海市的联合国机构及主要国际组织总部（联络处）数量（个）</td><td>1.5</td><td>32</td></tr>
<tr><td>外籍居民占上海市人口比重（%）</td><td>1.0</td><td>10</td></tr>
<tr><td>年举办的大型国际会议数量（次）</td><td>2.5</td><td>20</td></tr>
<tr><td>友好城市数量（个）</td><td>1.0</td><td>30</td></tr>
<tr><td>外汇市场交易量（亿美元）</td><td>1.0</td><td>150</td></tr>
<tr><td>外贸依存度（%）</td><td>1.5</td><td>80</td></tr>
<tr><td>城市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万人次）</td><td>1.0</td><td>5000</td></tr>
<tr><td>国际机场数（座）</td><td>1.5</td><td>3</td></tr>
<tr><td>46 家生产性服务企业开展业务得分</td><td>1.0</td><td>100</td></tr>
<tr><td>最大 100 家服务公司（GaWc100）设立办事机构的数量（个）</td><td>2.0</td><td>100</td></tr>
<tr><td>旅游外汇收入（亿美元）</td><td>0.5</td><td>150</td></tr>
<tr><td>（续）</td><td></td><td></td></tr>
</table>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项	权重	评价标准
国际化指标 0.4	信息网络化指标 2.5	信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2.0	60
		每千人互联网用户数（户）	1.0	300
		信息产业对 GDP 增长直接贡献率（%）	1.5	45
		信息化综合指数	2.0	4000
		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人）	1.0	6080
		每千人有线电视用户数（有线电视用户/千人）	1.0	100
		家庭上网率（%）	1.5	30

资料来源：张可云，现代国际城市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估研究——以北京和上海为例（未发表的横向课题资料）。

（一）一般性指标影响预测

1. 人均 GDP（美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帆博士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虽然中国经济

总量比较庞大，但举办奥运会预计每年将为中国 GDP 的增长贡献一个百分点。上海世博会总投资达 450 亿元人民币，超过北京奥运会。乐观估计，人均 GDP 也将有逐步提升。

2. 城市化率（%）

由于世博会举办地址在上海市中心黄浦江两岸，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的滨江地区，主要区域内城市化已经完成，只是复建翻新，对城市化率贡献不大。在城市化对非农人口尤其是人口迁移影响的预测来看，在长期来看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3.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世博会由于会展服务业带动的第三产业提升，会展旅游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达到 1:9 水平（李旭，马耀峰，2008）。目前上海会展业的相关产出效应在 1:6 左右，离国际平均水平还有一段距离。目前上海三产比重已经超过 5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将有大幅提升。

（二）现代化指标影响预测

1. 经济指标

上海世博会的总投资将有可能超过北京奥运会，而今年或许将超过 2000 亿（北京治理环境污染、60 项重大工程、新体育场馆建设、奥运会举办、基础设施上总共投资 1045 亿元人民币），上海市信息中心课题组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出 2004 年到 2010 年期间，世博会将平均拉动上海 GDP 每年增长两个百分点，拉动就业每年新增 15 万人。上海世博会筹备、举办、会后三个投资阶段中，场馆、道路、轨道交通、餐饮、现代服务业、金融 6 个行业将直接受益，50 个行业间接受益世博会。金融、证券、保险、信息占第三产业比重会有大幅提升。就业指标略有提升。经济指标提升不容置疑。

2. 科技化指标

上海市科委从 2008 年年底开始组织专家研究，确定了世博科技攻关的主要领域，组织相应课题进行科技攻关。2009 年 2 月，国家科技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会同教育部、建设部、信息产业部等相关部门，制订了《世博科技行动计划》。目前，图像识别系统、电子标签、半导体照明、转基因食品生物识别、可降解材料餐具等项目均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今后几年内，国家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将根据世博会筹办的需要，以每年 6000 万元的资金投入，陆续支持一批项目。在占地 15 公顷的城市最佳实践区，中国制造的半导体照明将是照明主体，首次实现半导体照明在中国城市街区的大规模集中应用。主题馆、世博中心、南市电厂及中国馆等主要场馆的屋顶和墙面，将用来建立光伏建筑一体化并网发电系统，整座世博园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

将达5兆瓦，预计每年可节电4500万千瓦时。

作为流经世博园区唯一的一条天然河道，900米长的白莲泾生态修复；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气象灾害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等公共安全技术，今年都将进一步完善。“世博科技专项”自2005年实施以来，已布局项目140项，大部分已得以应用。对太阳能、半导体照明、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来说，世博会也将成为产业起飞的跑道，同时吸引外资R&D投入。科技指标将有显著提高。

3. 文化体育指标

2008年8月26日，胡锦涛主席在中韩世博会合作交流论坛上致辞并确表示，中国欢迎世界各国各地区以上海世博会为平台，充分展示城市文明成果、交流城市建设经验、传播城市发展理念、探讨城乡互动发展，探索新的更好的人类居住、生活、工作模式。世博会是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新契机，但对于文化体育指标提升不大。

4. 教育指标、医疗卫生指标

世博会对于该两项指标数值提升不大。

5. 生活水平指标

据专业机构预测，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对上海GDP增长的拉动约为3%～5%，对长三角地区投资的拉动将超过50%。另外，门票、餐饮、旅游纪念品等直接收入将接近110亿元，交通、住宿等间接旅游收入将达800亿元。居民文体消费率将有显著提升。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提升不大。

在迎世博的过程中，窗口单位也是一个反映城市文明的最直接的窗口，为了更好地提高社区窗口单位的服务水准。世博会城市志愿服务站志愿者是指在世博园区外的重要交通枢纽、商业网点、旅游景点、餐饮住宿、文化活动场所等人流集中区域设立的世博会城市志愿服务站，自愿无偿地开展文明宣传、信息咨询、语言翻译、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活动的世博会志愿者。世博志愿服务站对于每万人商业服务网点提升我们将拭目以待。

备受关注的申城第三水源地——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其水库、长江过江管、陆域输水管线三大主体，现已全面开工建设。投运后，该工程日供水能力约为719万立方米，超全市用水量的一半，其70%的供水将取用优质的长江水源，而上海的传统用水问题——合格水源严重短缺的局面，也将从根本上被改变。届时，受益人口有望超过1000万，申城饮用水质将达到II类水标准，有望赶上欧洲。饮用水水源达标率将有大幅提升。

人均食品支出比重、城镇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不大。

6. 基础设施指标

根据预算，世博会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为180亿元。除世博专用线13号

线外，2010年上海市规划轨道交通线路达到13条，其中4、6、7、8、9号线将直接为世博会服务，形成世博轨道交通服务网络的主体框架；“十一五”期间，包括世博专用隧道西藏南路隧道在内，上海将新建6条越江隧道。城市道路系统方面，2010年上海中心城将拥有210公里快速路，主干路420公里，次干路620公里的城市道路系统。其中新建世博配套道路39条，约110公里；水上巴士方面，上海世博会期间，世博园区外设有4个水门，航运船舶规模为35艘，其中旅游船13艘，客渡船22艘。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使用公共交通上下班比例都会有显著提升。

世博期间实现世博旅游参观人数7000万人次、其中350万人次为海外游客的目标。航空港年旅客吞吐量也会有显著提升，但主要是短时提升。

7. 生态环境指标

自2000年“申博”以来，上海把环境保护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全市环保投入占同期生产总值的比重连续9年超过3%，累计达到2250亿元以上。环保投入的主要成效已逐渐显现。近年来，上海按照中心城区“退二进三”和郊区“三个集中”的战略，通过强化经济与环境综合决策和污染源头控制，大力推进产业集聚和污染集约化控制。2008年，上海市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3.7%，全市万元生产总值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与2000年相比分别降低了71%和67%。城市环境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全市所有11家燃煤电厂共1067万千瓦装机容量燃煤机组安装了烟气脱硫设施，基本实现电厂脱硫全覆盖；启动了青草沙水源地建设，着力构建“两江并举、多源供水”的饮用水源格局；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污水收集处理体系。苏州河、桃浦工业区、吴泾工业区等一批重点地区环境面貌明显改善，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目前，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已连续6年稳定在85%以上，近两年达到90%左右；水环境质量总体稳中趋好，主要河道水质得到进一步改善；绿化覆盖率从20%上升到38%，人均公共绿地从3.62平方米提高到12.5平方米。盖洛普咨询公司调查显示，87%的市民认为上海整体环境质量正在变好。世博会将成为引领未来城市发展模式的示范。生态环境指标的提升是世博会带给上海大都市的一大亮点。

8. 防灾减灾及城市安全指标

救灾资金占财政支出比重，特别是安保资金支出会有所提升，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安保开支高达3亿美元，该项指标会有波动。

（三）国际化指标影响预测

1. 资本国际化

2009年以来，上海总部经济发展继续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外商在上海

新设立总部经济机构31家，其中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6家、投资性公司5家、研发中心10家。落户上海的总部经济机构累计已达707家，其中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40家、投资性公司183家、研发中心284家。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将区县审批鼓励类、允许类外资项目的权限由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扩大到1亿美元。FDI投资审批也将逐步放开。这些举措对于资本国际化指标提升不言而喻。

2. 国际交往

旅游国际化指数、旅游外汇收入提升毋庸置疑。全球大大小小的国际组织有4万多个，却只有寥寥几个的总部设在中国，至2005年年末，上海已与50个国家的66个地区结成友好城市关系或友好交流关系。立足上合组织和世博会的平台契机，举办大型国际会议数量、设在上海市的联合国机构及主要国际组织总部（联络处）数量、友好城市数量、46家生产性服务企业开展业务得分、最大100家服务公司（GaWc100）设立办事机构的数量各项指标都将比以往有所增加。同时，上海对于外籍移民的吸引力也在逐步提升。

3. 信息网络化

中国移动斥资5亿在浦东金桥建立的上海的视频产品创新基地也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无线视频产品和内容运营中心，预计2010年视频基地用户将超过1000万户。在世博期间，上海移动的目标是实现800万手机支付，同时，在3年内为800家金融单位提供信息服务。到2009年年底，所有信息化系统都将进入测试运行维护阶段，200多个展馆的信息化运营维护保障工作也将随之全面展开，上海世博信息化服务基地也将正式建成。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信息化综合指数会有较大的增加。

上海市区将在世博会前实现有线电视数字化。上海东方有线方面表示，今年启动的大规模转换计划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目前东方有线的数字高清用户数量较去年已经有了成倍的增长，达到了75万，每千人有线电视用户数也将提升。

综合上述指标评价体系反复推算预测，最终得出，世博会召开短期对于上海建设国际城市实现率提升可以达到3～5个百分点，长期乐观估计可以提升实现率8～10个百分点。

三、世博会的“条件—路径”改善对于上海国际城市建设的影响

通过定性手法，研究对于举办世博会带来的条件改善和路径拓展分析世

博会与上海国际城市两者之间的关联。

（一）世博契机的环境条件改善——场馆基建完善、人居环境改善——城市形象路径拓展

2010年世博会展馆位于上海市中心黄浦江两岸，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的滨江地区。园区规划用地范围为5.28平方公里，其中浦东部分为3.93平方公里，浦西部分为1.35平方公里。

因为要建设世博园区拆迁了1.8万城市居民，作为拆迁房的浦江镇和三林镇的“世博家园”大大改善了这些居民的居住环境，这1.8万多的住户搬进了公寓楼，不用再一家老小挤在一间房间中，可以拥有舒适宽敞的房间了，八号线也已在浦江镇开通，交通不方便这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这样一来更符合人居环境的要求了，而且还能提高居民的生活素质，因为在老城乡的房子里，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在街道旁晾晒衣被、男人夏天赤膊的不文明现象很普遍，很多人还喜欢打打小麻将，工作也不好好去干。为了改善这些恶习，世博家园还设有老人日托中心、阅览室、棋牌球类活动室、舞厅和医疗保健所等，针对动拆迁居民中失业人员多、中老年人多、贫困家庭多的特点，两个世博家园新成立的多个居委会专门设立了就业援助员，帮助居民就近到家园里的菜市场、大卖场、物业公司里从事保洁、保安等工作，实现再就业。这样一来便于社区的管理，同时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场馆建设方面来看，从2007年11月10日主题馆开始建造后，中国馆以及各个国家主题馆都陆续开始建造，目前上海世博会永久性建筑“一轴四馆”——世博轴、世博中心、主题馆、中国馆和演艺中心已全部封顶进入内部装修，而且这一轴四馆充分运用高科技，体现环保节能的思想，在2010年世博会结束之后这五大场馆均被保留并将发挥其最大限度的实用性，相信在将来也会成为上海的一道新的风景线，就如同1889年法国巴黎世博会结束后，埃菲尔铁塔被保留如今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建筑物。

（二）世博契机的区域影响力条件改善——区域资源整合、集聚、辐射——区域中心路径拓展

利用世博会契机，加快长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长三角快速交通网络。以铁路、公路、海运、江运、空运为区域，交通框架结构，以多种功能和不同规模的城市为节点，逐步形成由上海为核心辐射城市，目前，上海的半小时辐射圈，以上海人民广场为中心，辐射到上海各区的每一个角落；1小时车程辐射圈已经到了苏州、嘉兴等地区，2小时车程辐射圈到南通、常州、无锡、杭州等地；4小时交通圈可到南京，上海正打造“三小时经济圈”。而且上海已计划修建到苏州、嘉兴的城市轻轨，并预计世博会前开通的

上海—杭州的磁悬浮列车（仅需26分钟），更加速了上海对周边的辐射力度。这样强有力的辐射，覆盖了长江三角洲的7500万人口，同时也使苏、浙两省的所有城市都意识到了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其他城市无不同样在努力寻找自身的城市定位，在资金、信息、人才、商品的流动中找到城市崛起的机遇，更好地来与上海对接。

利用世博会契机，加快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资源的整合。另外，上海目前还致力于建设国际贸易、金融中心，吸引大批中外金融机构及资本集聚上海，为长江三角洲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来源，这需要上海与周边地区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对区域内金融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同时也能缓解区域内金融资源的地区差异。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00多家落户长三角地区，2009年上半年长三角16个城市的GDP远超珠三角，GDP增长9.2%，也高于同期珠三角平均增速。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需要大量各方面的优秀人才，除了上海加快自身人才培养力度外，还需要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内来整合人才和智力资源，还能缓解日益紧张的就业压力。长三角经济带有全国较高的科技、教育、文化水平，世博会的举办必将促进以下几方面工作：完善各地之间的人才供需信息；优化人才吸引、培养、激励和使用政策，合理疏导人才流动；鼓励各类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跨地区投资，改变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状态；逐渐协调完善互补的人才流通体系，使上海与周边各省市人才的培养、使用和交流方面构成统一平台。

世博会对整个长三角区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交通、经济方面外，对于产业结构也影响重大，这方面会在后文中详细诉述，总之，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对于原本长三角区域有着强大的辐射作用，对于区域内部的合作联动又开辟了很多新的路径，值得我们继续探索。

（三）世博契机的国际影响力条件改善——对外交往密切、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化路径拓展

上海世博会的国际招展工作顺利推进，共有二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上海世博会，这是一个向国际展示上海的绝好机会。各个国家对于场馆建设都集思广益，力图将最好的创意在此次世博会上展现，这势必会吸引世界各地人们的眼球，同时也能较好提升上海的国际形象，更好地建设国际城市。

作为一个国际城市，上海首先必须成为全球性、综合性的城市，建设经济中心，使居民安居乐业，首先，要有较高的就业率，让居民可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优厚的福利，提供一个生活保障；其次，生活有了保障后，那么就对精神上有了更高的需求，在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完成之后，就想着要满

足精神生活了，因此要建造更多的社区中心，提供场所丰富居民的闲暇时光，多举办一些类似于展览馆、美术馆的展览，可以提高居民修养水平；最后，营造一个良好的城市社会环境，人们身处在这个巨大的社会环境中，很容易受到其他的影响，无论是家庭环境还是工作环境都会对人产生感化、启示作用，因此减少犯罪率，以人为本，创建最优城市环境。

其次，还应创新思想，融入城市发展。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果只是一味地遵循过去的原则，必然不会有所突破，遭遇“瓶颈”，2008 年上海市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350 亿元，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2.55%，相比前几年投入是逐步上升的，而且科技成果已是硕果累累，上海提倡的是“科教兴市”的策略，比如把信息化的技术投入到城市的建设中来，将上海市建成信息服务一体化城市。在城市的边缘区可多建设一些高科技园区，如张江高科，带动产业升级创新。我们还一定要重视科研成果，将新成果推广应用到我们未来城市的建设中去，将超前科技渗透到未来城市的创新中去，是十分有意义的。

最后，国际城市还应该是一个传媒之城，媒体已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必不可少的部分了，当今社会，报纸、电视节目、广播、文学作品、网络等媒介，信息的传播真是铺天盖地，要建设一个传媒之城就必须有影响力和认可度的媒体，崇尚言论自由，此次 2010 年的世博会，必定会引起全世界媒体的关注，想必对于上海国际形象的提升有着很大益处，从而也能拓宽上海国际化建设的道路，指明新的方向。

（四）世博契机的产业转型条件改善——产业升级与拉动消费——对内经济路径拓展

据预测，这次上海世博会将会有 7000 万人次的参观量，这无疑对于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区域的旅游产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为长三角地区旅游业提供了巨大的客源——不仅是上海还能带动周边旅游业，旅游产业所属第三产业，由此可见，世博会对产业结构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未来的城市必定是以第三产业为主体，世博会促进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和整合，首先是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和整合。第三产业具有地域文化的特征和特色，产生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预计世博会期间门票收入、餐饮、纪念品等直接销售收入将达到 91.1 亿元，旅馆业每天收入愈 1 亿元，据预算，旅游每增加收入 1 元，将带动零售、餐饮、酒店、运输业等相关行业收入达 4.3 元。如果这样一块大蛋糕只给上海独享的话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弊端，既然上海周边江浙地区本来的人文环境、历史背景就十分浓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国外友人在游览了上海之后很自然会想去周边走走，这样一来会促进都

市圈休闲产业和休闲都市的形成，提升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

此外，旅游产业的产业关联性很强，与许多产业有密切联系，加快例如基础设施产业（公路、铁路、航空等）、区域环境保护、文化产业、商业、餐饮业、旅馆业、旅游品生产等的发展。不仅可以繁荣当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还可增加就业。因此选择旅游产业作为突破口体制障碍较小，启动快，效益明显。具体措施如下：第一，以世博会为契机，组建长江三角洲旅游管理协会，此协会为非政府组织，可由上海大的旅游公司牵头，联合杭州、南京等各地的大型旅游公司和风景区共同组建，共同协调旅游路线的安排、旅游景点；还能促进展览业和旅游产业的相结合。世博会将促进展览业和旅游产业的相结合，形成现代都市会展旅游业，并沿着旅游产业价值链推动收益的扩大，能提升上海展会的国际化、品牌化、市场化程度，带动上海的经济和知名度。

在将来的发展过程中，会展产业将会是相当有前景的第三产业。世博会还能提升旅游产业的协调能力，使旅游产业、产业协会与政府之间都能协调合作。

（五）世博契机的资本融通条件改善——资本引入与资本国际化节奏提升——对外经济路径拓展

既然世博会能够吸引国内外这么多游客纷至沓来，自然也会带来一笔很客观的外商投资，世博园会区的主体工程项目总投资额达到 180 亿元人民币，这对于国内外的设计、建筑行业将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从 2007 年实际吸收外资金额为 79. 20 亿元到 2008 年实际吸收外资金额 100. 84 亿元，想必到 2010 年吸收外资金额数目一定还会继续增加。

上海仍将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世博会的举办对于零售服务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上海作为我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也是我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无论商业规模还是发展水平，在全国都处于领先位置，可以说，上海零售企业一直在领跑全国零售业，充分利用此次世博会机遇，在零售服务行业能够吸引资本的投入。

主办方将选择 10 ~ 15 家合作伙伴和 12 ~ 20 家高级赞助商，这无疑又是对外经济路径的拓宽，更好地吸收引进国外资本的投入，从而也能进一步地和国际贸易投机接轨。

（六）世博契机的展示条件改善——城市平台路径拓展

世界博览会是由一个国家的政府主办，有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参加，以展现其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成就及发展前景的盛会，对举办国的社会经

济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这次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第一次在一个常住人口超过1700万的城市举办。

世博会就是一个大舞台，上海就是搭建这个舞台的地方。作为展览性质的世博会，展示了博览会的同时也展示了上海，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同时给了上海一个进入第一层次国际城市的平台。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一次中国加强与世界交流，近距离对话世界多元文化，向世界学习的重要契机，更是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机遇。

世博会是一个全球性的盛会，无论是从空间，还是从内容等角度来讲，涉及的范围都非常广泛。由于不受国体限制，更不受地域影响，也没有民族、宗教、文化经济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参展国家来自世界各地，这就给主办国创造了足不出户便可宣传自己、广交朋友的机会。同时，参展国送展的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并且都是本国最具特色、最新、最先进的成果。东道主用较少的投入就能观察到、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举办城市将以此为契机，在第三产业、市政建设方面再上一个新台阶。届时，五洲朋友，六方宾客云集，其中蕴藏了大小商机无数。无疑，中国作为东道主可以更多地宣传自己，推销自己，也是显示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平台。

世界博览会不仅仅是为了商业性的目的，更为世界各国展示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各方面的成就以及发展的前景，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举办上海世博会将对举办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将对世界各国交流与合作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世博会将是显示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平台，是提升中国形象的“经济奥运会”。

（华东理工大学　李文静讲师　本科生　杨顺风　吕玉雯　吴璟琳）

世界城市的开放水平与特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面临深刻的社会转型。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同样也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2008年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达到9075美元；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达到了73.2%，然而，北京经济的开放程度却远低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世界城市。因此，通过研究世界城市，尤其是已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世界城市的经济开放水平和对外经济发展

方式，可以对北京在迈向世界城市过程中提升经济开放水平、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上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当今世界城市开放经济发展水平与特征

（一）全球性世界城市开放经济发展水平

在当今的世界城市体系中，纽约、伦敦和东京是被公认的全球性世界城市，其对外经济开放水平相当高。

1. 纽约

纽约是全美乃至世界的金融、商贸、服务和管理中心。纽约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美国重要的陆运、空运枢纽和海港城市，这也加速了该地区商品和人员的集散。纽约市消费品进出口额见表 8－5。2006 年，在全美商品出口额中，原产地为纽约州的商品出口额为 573.69 亿美元，在美国各州排名中位列第三位。

表 8－5　2003—2006 年纽约市消费品进出口额　单位：十亿美元

年　份	出口额	进口额
2003	71.9	147.5
2004	80.8	163.6
2005	90.8	176.3
2006	106.3	188.4

数据来源：美国统计年鉴。

纽约拥有肯尼迪（JFK）、纽瓦克（EWR）和拉瓜迪亚（LGA）三大国际机场。其中，肯尼迪国际机场和纽瓦克国际机场的货邮和旅客吞吐量均位于世界各大国际机场吞吐量前 30 位之列。

纽约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也位于全美前列。纽约所在的纽约州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之后，位列第三。[①]

表 8－6　1990—2006 年纽约州外商直接投资额　单位：十亿美元

年　份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FDI 流入	36.42	52.99	68.52	63.71	68.63

数据来源：美国统计年鉴。

① 由于缺乏纽约城市数据，因此这里选取的是纽约州的数据。

纽约也是跨国公司总部的云集之地。联合国公布的《2009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 2008 年世界前 50 位金融跨国公司中，总部位于美国的有 8 家，这其中，花旗银行、美林证券、摩根史坦利等 7 家公司的总部设在纽约。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3 家的总部或业务总部设在纽约，全球十大公共关系公司中也有 8 家总部设在纽约。

纽约人口要素聚集的国际化程度也很高。2008 年，纽约外籍居民数量超过 300 万，来自全世界 148 个不同的国家，外籍居民比例为 36.4%，外籍居民在纽约市的经济活动总值达到 2150 亿美元，约占纽约地区生产总值的 32%。

不仅是要素的聚集能力很强，纽约的经济辐射力同样位居世界前列。纽约都市圈，位居世界五大都市圈之首，它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和巴尔的摩 5 个大中城市以及它们附近的一些卫星城镇，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 20%，城市化水平达到 90% 以上。纽约是整个都市圈中地理和地位的双重核心，而它对整个都市圈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际金融界的“神经中枢”——华尔街。华尔街上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美联储、摩根史坦利等世界知名的金融机构不仅为都市圈内的新兴企业在创业初期提供了所需的风险投资，而且还为它们后续发展提供了更多资金上的支持，以及 IPO 上市等一系列金融服务。借助纽约的资本优势，纽约都市圈内的其他中心城市形成了相互补充、错位发展的格局。以波士顿为例，它在金融中心地位逐渐被纽约取代的同时，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即依托高水平的教育资源，发展高科技产业，这里也形成了美国第一个高科技产业聚集区。另外，费城的重工业、华盛顿的信息及通信产业和巴尔的摩的冶炼工业共同构成了纽约都市圈各具特色的地域分工格局，这一地带也形成了以纽约为中心的多核心城市群体系。

2. 伦敦

伦敦发展成为全球性世界城市和国际经济中心，是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早期伦敦就凭借其有利的港口条件成为国际转运贸易的中心。进入 21 世纪以来，伦敦的进出口贸易依然活跃，其进口额和出口额约占整个英国进出口额的 14% 和 18%。

伦敦早在 20 世纪初就已成为世界金融贸易服务中心，齐名于纽约和东京。伦敦全球性世界城市地位的形成与巩固与其一贯的开放性城市发展战略密不可分。在“二战”之后的 20 世纪 60 年代，伦敦就全面实施了以引进国际总部为主的开放性战略。如今，英国富时 100 指数中一半的企业和欧洲 500 强中超过 1/5 的企业都在伦敦设立了公司的总部，世界 500 强中 3/4 的企业也

都在伦敦设有办公室。有480家海外银行落户伦敦，这一数字不仅在世界领先，而且美国银行在伦敦的数量比在纽约还多，日本银行在伦敦的数量比在东京还多，注入伦敦金融城的资金数目比排行榜其后10个欧洲城市相加的总和还要多，这就足以看出伦敦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伦敦所具有的商业竞争力不仅在于金融市场，还在于其发达的创意产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伦敦发展思路上开放性的体现。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发展时期之后，伦敦的产业结构已发生了重大的调整，第二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逐渐减少，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逐渐增加。面对产业结构的转型，伦敦开始着力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将知识和创意转变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伦敦也因此成为音乐、时尚、广告和设计等行业的国际门户。目前，被誉为“世界创意工厂”的伦敦，其创意产业产值占英国创意产业产值的1/4还要多，其产出还在以每年超过8%的速度增长，有超过20%的劳动力在从事创意产业的工作。

伦敦拥有发达的交通。五个国际机场连接着伦敦金融城和欧洲其他的金融中心，其中，希斯罗机场（Heathrow）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它每年要接待6700万乘客，在2008年，它的旅客运输量在世界所有国际机场中位居第三。与世界紧密相连的伦敦也是全球海外移民最集中的城市，城市中外来移民的比例超过30%，使用的语言超过300种，有来自200个国家的9.7万名留学生在伦敦求学，这一数量在英语国家中也是最多的。

伦敦与周边地区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都市圈——伦敦都市圈。这个都市圈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包括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城市，面积有4.5万平方公里，人口有3600多万。伦敦是都市圈内的首位城市，向外的辐射作用明显；伯明翰自然资源丰富，其工业产值占到英国的20%；利物浦则是著名的商业港口；而曼彻斯特则已由纺织中心转变为了现代工商业和文化中心。

3. 东京

东京是全球性世界城市之一，也是东亚地域的核心城市，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从商品贸易水平来看，东京的外贸进出口额占日本外贸进出口额的五分之一以上。

表8-7　1995—2007年东京外贸进出口总额　单位：亿日元

年　份	1995	1998	2001	2004	2007
外贸进出口总额	205225.6	249298.5	269501.6	309554.4	388501.2

数据来源：东京都统计年鉴。

东京的世界500强企业数在2009年为51家，是世界各城市中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最多的城市。《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2008年世界前100位非金融跨国公司中有日本企业10家，其中有8家总部位于东京。另外，东京的商业一直在其产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十几年来，东京商业所创造的产值在东京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东京的商业流通中心地位一直没有改变。在2008年国际万事达公司发布的“全球商业中心”排名中，东京排在伦敦和纽约之后，位居第三位。

东京拥有羽田和成田两个国际机场，这两个国际机场加上东京另外六个机场每年能运送9700万乘客和300万吨货邮，是连接东京与世界的桥梁。东京吸引的海外游客数量在2008年达到534万人，这与纽约、伦敦等城市相比有一定差距，为此，东京在“东京都旅游产业振兴计划”中提出三项战略：向全世界展示东京的魅力，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接纳体制的整备，以招揽和吸纳更多的游客资源。在“向全世界展示东京的魅力”这个战略中，东京特别提出要通过举办大型活动来传送东京的魅力。现在，这些活动已初见成效，东京马拉松比赛、东京国际动漫展等成为了宣传东京的重要媒介，尤其是东京国际动漫展，已逐渐成为东京的一张城市名片。借助国际动漫展，动漫产业国际商品交易会得以成型，在动漫展期间还会召开相关的国际会议。现在，每年的东京国际动漫展都能吸引超过10万人前来参观。

东京既有着纽约所拥有的金融功能，又有着伦敦所拥有的政治功能，同时还是日本现代工业的中心，这样综合性的城市功能必然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辐射能量。东京都市圈有“都市圈”和“首都圈”两个概念。以东京为中心，半径80公里范围内的东京“都市圈”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与市区环线山手线相交的地铁轨道向四面八方呈放射状延伸，这些线路都通往都市圈的郊区。在东京的上班族中，有至少1/3来自横滨、千叶等东京周边城市，他们借助发达的轨道交通和精准的运行时间每天往返于市中心和郊区之间。事实上，只要住的地方离东京市中心直线距离不超过60公里，花在上班路上的时间就可以控制在60分钟之内。东京的轨道交通沿线都会有经营这些线路的公司开发的房产，尤其是一些“冷门”线路，政府会帮助轨道交通公司在沿线开发房产，建设新城，以吸引居民入住。依托密集的轨道交通网，东京向外的经济辐射力大大增强。“首都圈”则是包含以东京为中心，半径100公里范围内的广大区域，这一区域的人口密度达到1175人/km^2，是日本全国平均水平的3.4倍，生产总值占全国的37%，是日本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带。如今，在首都圈范围内已形成多摩、神奈川、琦玉、千叶和茨城南部等多个新城，各自担负着不同的城市功能。

（二）世界城市开放经济发展的特征

从以上对全球性世界城市的经济开放程度的描述可以看出，世界城市是连接全球经济的重要节点，城市对外经济联系非常密切，而且它还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当今世界城市在对外经济发展上已呈现出以下特点：

在对外发展程度上，单看传统的商品进出口这一项，全球性世界城市的年商品进出口额都在3000～3500亿美元之间，这一数字甚至比不上一些区域性世界城市，外贸依存度也在50%左右，但是，它却是全球时尚商品和创意商品的重要生产地和集散地，这里的“生产”指的是商品品牌的塑造及商品的设计，比如纽约拥有Anna Sui、Ellen Tracy、Bill Blass、Leslie Fay等一些世界著名的服装品牌，这些品牌的加工制作地点也许不在纽约，但是，它的款式设计等重要环节却一定是在纽约完成的，而设计等这些关键的环节正是后工业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产业转型之时抓住这些引领时代进步的新型产业是纽约、伦敦和东京一直保持着全球性世界城市地位的关键所在。另外，世界城市在对外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目前，全球性世界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均已超过了85%，而金融保险业在产值比重上均超过了15%，全球的资金在这里汇聚，难怪会有“华尔街的经济一打喷嚏，全球经济都要感冒”这种说法。但是，如果仅仅从产值结构上判断一个城市的对外发展程度是片面的。比如中国香港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要高于纽约、伦敦和东京，金融保险业的产值比重也与上述三个城市持平，但是中国香港在金融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却不及上述三个城市，重要的原因就是纽约、伦敦和东京拥有的金融机构全球总部及地区总部的数量要多于中国香港，这些金融机构对全球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作为总部的所在地的全球性世界城市，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自然大大增强。

在对外发展方式上，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全球性世界城市对比工业化社会的世界城市，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从与工业化阶段的世界城市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后工业化阶段世界城市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特点。

表8－8　工业化社会与后工业化社会世界城市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对比

工业化社会	后工业化社会
城市是工业资本的聚集地，大规模的对外联系主要体现在工业资本上	城市是金融资本、信息、技术、知识、人员等要素的聚集地，对外联系呈现多元化
在国际贸易中，有形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占主导地位	在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像国际旅游业、国际会展业这些服务性行业成为城市对外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产业部门

续　表

工业化社会	后工业化社会
城市对外投资和吸引的外资主要流入工业制造业领域	城市对外投资和吸引的各种要素流入服务性行业
在对外经济联系以商品贸易为主导的情况下，商品的进出口多是企业自身的行为，各部门间的联系不密切	城市对外经济发展已经不是单纯依靠一两个相互独立的产业部门和政府机关就能支撑起来的了，需要多个产业部门和政府机关的联动

从区域发展情况来看，世界城市往往是都市圈的重要辐射源，是带动本地区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首位城市。从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来看，其对外的经济辐射力是随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渐向外扩展的，先是在本地区、本国范围内，而后扩展到区域、洲际范围，直至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目前世界五大都市圈中，全球性世界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为首位城市所形成的都市圈就占了三个，可见其经济能量之高，经济辐射力之强。区别于全球性世界城市，区域性世界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就多局限在区域范围内，如中国香港、新加坡这些城市，对亚太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而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就要弱于纽约等城市。但是，无论处于哪个层级上的世界城市，都会对其周边地区产生一定程度的“经济外部性”，而世界城市周边形成的广阔腹地又会为世界城市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持，成为世界城市持续发展的强大的区域基础。

二、世界城市开放经济发展特征对北京的启示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快于国内的其他城市，而且伴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城市对外交往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北京的对外经济开放水平距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北京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型。

从开放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比来看，北京在外贸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额、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国际旅游接待人数、常住外籍居民数量等总量指标上都与世界城市有较大差距，而经济辐射能力更是与世界城市相去甚远。遵循世界城市开放经济发展趋势，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是北京缩小与世界城市差距的重要途径。通过世界城市开放经济发展的特征，可以对北京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品牌建设十分重要。这里不单单指国际知名的商品品牌，还包括

城市举办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活动和国际会议展览等。重视数量增长而忽视品牌建设将在长期上影响城市的国际知名度与美誉度。试问，北京拥有的国际品牌和每年举办的国际活动中有没有能像美国的好莱坞、东京的国际动漫展这样国际知名度高、已成为城市名片的品牌形象和活动呢？

第二，世界城市位于城市体系的顶端，其简单物质商品生产的职能在逐渐削弱的同时，已越来越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信息的传递者、经济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北京应当跳出建不建设经济中心这一命题，借助在信息处理、人才聚集、政策发布等方面的优势，抓住经济转型的机会，成为全球关注的国际经济资讯中心甚至资讯决策中心。

第三，世界城市已从工业社会的有形产品生产中心转变为无形产品生产中心。因此，服务贸易已成为一个城市开放经济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旅游、国际会展等的开展对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当前，许多世界城市都在创造各种条件吸引国际游客、国际会议和展览等资源的聚集。北京同样应当抓住这一发展机会，提升服务贸易整体开放水平。

第四，各产业及政府各部门间的联动机制需要建立起来。东京吸引国际会议资源的政策措施中，包含交通、通讯、旅游、商业、金融、教育等各行业，美国迪士尼主题公园的成功也是得益于各部门的联动打造的完整产业链。同样，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的建设、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聚集、服务贸易的发展、国际人才的吸引，这些都需要公共服务环境的整体优化和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第五，城市的聚集力和辐射力不可偏废。北京一直以来的要素聚集能力要远远大于经济辐射能力。不必说与世界五大都市圈相比，单是与国内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相比，经济辐射能力的差距就十分明显。促进资源的双向流动，提高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地区的区域发展水平，对于北京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和今后的持续发展都至关重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　王玺）

附录：

回首“2010城市国际化论坛”

论坛指南

主办单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作发起单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

承办单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协办单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科研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支持单位

《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

《现代国际关系》杂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北京发行集团

支持媒体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北京日报　中央广播电台

中国青年报　中国教育报

北京青年报　前线

中国科技报　大众科技报

北京晚报　社会科学报

转播技术团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传媒试验中心

论坛组委会

主　席

王稼琼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教授
史秋秋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
文　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副主席

陈之昌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丁立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授

顾　问

柯文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冯　培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丁　力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
王祥武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主任
杨世忠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授
王传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授
高　闯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教授
朱铁臻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梁守德　中国高校国际政治协会原会长、北京大学教授
陈光庭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郑海航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前副校长、教授《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社总编
卞洪登　亚太城市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陈　剑　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执行会长、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　岳　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李义虎　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湛军　北京发行集团总经理、研究员
李而炳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教授
孟祥青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
宫嘎·道尔基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刘贤镇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马来西亚分会会长

蔡　拓　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董力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交流部主任、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张兆民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郑址明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韩国分会会长

刘英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教育中心教授

张　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院长、教授

蒋三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组委会秘书长

段　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

组委会委员

崔新建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

程文进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活动部主任

王彦京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会管理部主任

杨志俊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室主任

王晋明　北京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乔卫兵　中国经济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经济出版社年鉴社社长

杨发喜　《求是》杂志社国际部副主任

庞中英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曼怡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

高　飞　外交学院科研处处长

李丽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郎丽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秘书长、教授

卢海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马立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　庚　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首旅集团首席研究员

林利民　《现代国际关系》杂志社总编

辛章平　《城市问题》编辑部主任

刘建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广告系主任

旷建伟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

李庆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张　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教授

蒋三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李　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经济学院教授
苏　珊　亚太城市研究会副秘书长、华点通国际顾问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彦云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院长、教授
杨连云　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赵喜玲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宣传部部长
邢春生　天津滨海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祝合良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规划处处长、教授
祝尔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首都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高东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学术研究部后勤建设教研室大校
张　伟　山东省城市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
张胜军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黄荣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
焦建国　《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社编辑部主任
程俐骢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薛进军　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组委会秘书处

秘书组：

组长：王颖

成员：申现杰　汤　凯

接待组：

组长：吴西亮

成员：王　玺　刘　颖

宣传组：

组长：王晓红

成员：汪朝晖　陆　辉

国际组：

组长：赵　文

成员：牛立超　张　楠

转播组：

组长：曹　健

成员：叶生博　辛　苑

创意组：

组长：王　瑞

成员：李　鸥　边秋月

会议议程

2010年09月11日（星期六）上午	
9:00～10:00	大会开幕式　北发大酒店一层多功能厅
主持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杨世忠教授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　柯文进　致辞 2.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史秋秋　致辞 3. 中国高校国际政治协会原会长　梁守德　致辞 4. 亚太城市韩国分会长　朴泰权　致辞 5. 北京市委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　王力丁　讲话 6.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傅华　讲话
10:00～10:20	茶　歇
10:20～11:10 主持兼点评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副院长刘欣葵教授	主题研讨　一层多功能厅 主题演讲1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体系的理论思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　文魁教授 主题演讲2　正确处理城市化进程中的五个关系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　连玉明教授 互动与点评　10分钟
11:10～12:00 主持兼点评人：中国经济出版社副总编乔卫兵博士	主题演讲3　建设世界城市应转变发展方式 亚太城市研究会秘书长　卞洪登博士 主题演讲4　建设世界城市与小城镇发展模式的选择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　邱爱军博士 互动与点评　10分钟
12:00～13:30	自助午餐　北发大酒店西餐厅

2010年09月11日（星期六）下午	
主题研讨（14:30～17:30） 一层多功能餐厅	
14:30～15:20 主持兼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庞中英教授	主题演讲1 Beijing：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as a New World City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顾朝林教授 主题演讲2 墨西哥城的经济增长方式分析 墨中经济技术合作理事会会长 艾夫任·卡尔沃 互动与点评 10分钟
15:20～16:10 主持兼点评人：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成贵研究员	主题演讲3 北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困境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杨开忠教授 主题演讲4 建设后工业形态的世界城市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院长 段霞 互动与点评 10分钟
16:10～16:25	茶 歇
16:25～17:15 主持兼点评人：北京社科院外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白志刚研究员	主题演讲5 打造世界图书、音响制品和文化买卖收藏之都 北京发行集团总经理 李湛军研究员 主题演讲6 打造国际美食之都：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餐饮产业定位 东方美食杂志社社长 刘广伟先生 互动与点评 10分钟
17:15～17:50	大会闭幕式
主持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高闯教授	1.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陈之昌 大会总结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王传生教授 致闭幕辞
18:00～19:30	晚 宴 北发大酒店中餐厅
主持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高闯教授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 王稼琼 致辞 2.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史秋秋 致辞

<table>
<tr><td colspan="2">2010年9月12日（星期日）9:00～11:30</td></tr>
<tr><td colspan="2">专题论坛一　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危机：理论与实践</td></tr>
<tr><td colspan="2">第五会议室</td></tr>
<tr><td>主持/召集人：
《求是》杂志社国际部
杨发喜副主任</td><td>特邀嘉宾：
上海世博会组委会联络办高级主管　孟育建
《求是》杂志社内参部主任　张西立
专题发言：
1. 世界城市内涵及形成的讨论
北京社会科学院　肖亦卓
2. 对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与发展规律的认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周伟副教授
3. 试析世界城市环境特点及北京的差距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刘欣葵教授
4. 国际化城市与城市黄金时代
中国国际城市主题文化设计院院长　付宝华
5. 国际视阈中的人文北京建设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　白志刚
6.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文化的意义、难点与致思理路
北京行政学院哲学教学部　李劲
7. 借文化之力　建世界之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　王小颖副教授
8. 世界城市建设与世界公民培育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林坚
9. 道德性政策何以成为都市发展的烫手山芋
台南大学行政管理系　吴宗宪
10. 新战略机遇期世界城市北京自主创新趋向透析
总后勤部学术研究部主任　高东广大校
参与讨论代表：
梁守德　乔卫兵　李湛军　刘广伟
付小均　李嘉珊　刘智勇　赵　宣
记录：谢雯菁</td></tr>
<tr><td>10:00～10:15</td><td>茶　歇</td></tr>
</table>

<table>
<tr><td colspan="2">2010 年 9 月 12 日（星期日）9:00～11:30</td></tr>
<tr><td colspan="2">专题论坛二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比较与借鉴</td></tr>
<tr><td colspan="2">第六会议室</td></tr>
<tr><td>主持/召集人：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原政委李而炳将军</td><td>特邀嘉宾：
亚太城市韩国分会会长　朴泰权
墨中经济技术合作理事会会长　艾夫任·卡尔沃
专题发言：
1. 转变发展方式是建设世界城市的要害
亚太城市研究会秘书长　卞洪登
2. 建设世界城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涉及的若干问题分析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陈剑
3. 日本的低碳城市建设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初晓波教授
4. 克里兰夫的国际化与教育发展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Professor James McLoughlin
5. 国际化：大学与城市共同成长的助推器
中国政法大学宣传部长　刘长敏教授
6. 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化：建设世界城市的必由之路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李嘉珊
7. 世界城市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模式及北京的选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系　谭善勇
8. 北京市与纽约市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比较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王晖副教授
9. 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世界城市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　王颖副教授
10.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思路——向绿色交通模式转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　张晓萍副教授
参与讨论代表：
崔美兰　王庆太　武桂馥　张国山　杜军
刘　敏　郑星汐　赵　文　马方方
记录：王玺</td></tr>
<tr><td>10:00～10:15</td><td>茶　歇</td></tr>
</table>

<table>
<tr><td colspan="2">2010年9月12日（星期日）9:00～11:30</td></tr>
<tr><td colspan="2">专题论坛三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评价体系</td></tr>
<tr><td colspan="2">观光会议室</td></tr>
<tr><td>主持/召集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段霞教授</td><td>特邀嘉宾：
北京市统计局高级统计师、副巡视员　潘建民
北京市档案局研究员、副局（馆）长　马素萍
专题发言：
1.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监测评价体系探讨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监测评价体系研究》课题组
2.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评价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黄鹭新
3.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研究
北京市社科院城市问题研究所　齐心副研究员
4. 北京与主要世界城市的相关指标比较及建设建议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韩文琰
5. 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研究所　卢静副教授
6. 主动参与国际分工　促进北京发展方式转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李婧教授
7. 北京与三大世界城市应急管理机制之比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系　张智新副教授
8. 首都低碳发展的国际合作与竞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张贵祥副教授
9.“世博会”对于上海市建设“世界城市”目标影响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文静
参与讨论代表：
文　魁　顾朝林　马力军　祝尔娟
章　浩　杜　澍　吕华斌　柯　晶
记录：赵茜</td></tr>
<tr><td>10:00～10:15</td><td>茶歇</td></tr>
</table>

备注：其余与会代表自行选择讨论专题。

论坛报道

论坛开幕式

主持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杨世忠教授

杨世忠：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在这天朗气爽、瓜果飘香、充满收获的季节里，我们欢聚一堂，喜迎"2010年城市国际化论坛"，在这儿隆重举行。继续就城市国际化进程中，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从中分享我们的观点，贡献大家的智慧，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在座的各位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嘉宾。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王力丁先生；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傅华先生；亚太城市韩国分会会长、韩国前文化旅游观光部部长朴泰权先生；中国高校国际政治协会原会长梁守德教授；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李而炳将军；作为论坛共同主办方的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史秋秋女士；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陈之昌先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柯文进教授；参加今天论坛的有来自中国上海、北京、中国台湾地区及美国、韩国、墨西哥等多家高校、研究机构、社会团体和多家新闻媒体110多位代表，我谨代表组委会对各位的国光临表示热烈欢迎。

城市国际化论坛于2008年、2009年成功举办两届，今年是第三届，一直以来论坛坚持跟踪"世界城市"的发展前沿，揭示世界发展的规律，分析北京等我国特大城市的国际化进程。通过比较借鉴国外国际城市化进程，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就我国城市的国际化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交流，取得了良好的学术效果和社会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巨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和困难，如何在转变发展经济方式过程中，明确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努力方向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紧要问题。本次论坛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奠定

世界城市基础”为主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这次论坛取得丰硕的成果。

首先，有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柯文进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柯文进致开幕词

柯文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在这充满喜悦的美好世界，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联合发起，北京市社会科学界研究会、首都经贸大学举办的“2010 城市国际化论坛”在这儿隆重开幕了。借此机会，我谨代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向给予本次论坛大力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出席本次论坛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和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2009 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影响下，北京国民经济依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依照北京“新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北京市确立了建设“世界城市”的分步走战略，这一目标的确立，不仅为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同时也对北京市政府管理等各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回顾和总结近年来北京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面对“世界城市”发展目标，有很多不熟悉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索、研究，按照“世界城市”的标准和发展的眼光、认识、管理和发展这样一个社会，围绕这些新问题和新挑战，城市国际化论坛前年我们讨论了奥运会后，北京城市国际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去年探讨了首都国际化进程中的安全问题，今天我们在这里将共同探讨推进北京市，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思路和举措，我想这些主题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我校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新变化而建立起的一种新型学术研究机构。成立五年来，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北京市社科联等诸多单位和一些人士的关怀和支持下，积极打造首都国际化进程研究基地，重点研究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城市比较，首都北京的国际化进程，以及区域合作中面临的各种国际问题，五年的发展已经

形成了一个跨学科、跨区域、跨行业的创新研究团队，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和良好的社会影响，成为北京市决策咨询、决策支持和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的研究基地之一。面对北京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新的发展机遇，我校愿为促进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这一重大研究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为推动首都北京进一步发展提供智力的支持，努力发挥我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

石相激而生灵光，水相搏而起涟漪。相信今天的论坛各位专家的真知灼见，定会使与会的各位同志身受启迪，受益匪浅，同时也会对推进首都世界城市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社会各界对于本次论坛的支持，感谢大家多年来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各项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史秋秋致辞

史秋秋：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共同举办的“2010 城市国际化论坛”开幕了，我谨代表论坛主办方，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今天到会的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昨天是教师节，桃李不言，下至成溪，这里也借此机会献上一份迟到的但却真诚的祝福，祝在座的各位老师们桃李遍天下、春晖遍神州。



2010 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十一五”期间北京发展成就卓然，2008 年奥运会、残运会的成功举办，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大庆的盛大圆满，使北京在初步具备建设“世界城市”条件的基础上，迈向了一个国际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和新起点。随着中国日益走向国际社会的前台，首都北京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首都北京也面临着来自人口、资源和环境诸多方面的挑战与压力，如何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等诸多问题，

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系统的思考与研究。在已经成功举办的 2008 和 2009 年城市国际化论坛上，各界学者分别围绕奥运会对城市国际化进程的推动，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安全问题两个主题，深入研讨，建言献策，在今年的城市国际化论坛上，我们将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世界城市”基础的主题，借鉴国外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揭示城市“世界城市”发展规律，分析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机遇和挑战。探讨如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明确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努力方向，为北京的科学发展寻找对策，贡献智慧。

建设世界城市，是市委市政府在首都发展新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强对“世界城市”的研究，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服务，是首都社科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作为全市社科类社会团体的联合组织，多年来充分发挥联系首都广大专家学者，整合首都社科资源的优势，密切追踪社会发展及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对各种社会问题作出前瞻性的把握和研究，相继推出了包括本次论坛在内的一系列与“世界城市”相关的学术活动。目前，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世界城市——北京发展新目标论坛”、以建设“世界城市”与提升首都文化软实力为主题的“2010 首都文化论坛”、以低碳经济与世界城市为主题的“2010 两届联席会议高峰论坛”等一系列高层次、有分量、有针对性的论坛。

不久，我们还将相继举办“世界城市与市民人文素质论坛”，和由一个主论坛、23 个学科分论坛组成的以“人文北京世界城市”为主题的 2010 学术前沿论坛。除此之外，我们还资助出版了一批与“世界城市”研究相关的学术专著，组织首都专家学者开展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与努力方向研究，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重点及对策措施研究，从奥运城市到“世界城市”研究，建设“世界城市”与城乡结合部党建研究，“世界城市”背景下的市民人文素质提升研究等，一批与“世界城市”相关的重点课题攻关，一些课题已经形成了阶段性的成果。

在城市国际化进程中，“世界城市”是国际化城市的高端形态，这就预示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衷心希望“城市国际化论坛”能够持续的为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相关人士搭建交流对话的平台，共同推进对包括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在内的城市国际化进程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探讨，使这个论坛真正成为城市国际化研究的思想库、智囊团。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也将一如既往的为首都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展学术研究，参与地方发展决策，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支持，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为中国的繁荣昌盛作出首都社科界应有的贡献。

“城市国际化论坛”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论坛始终坚持着与时俱进，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原则，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品质，我们相信在广大专家学者和师生们的共同参与下，本届论坛一定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各位专家的真知灼见一定能够对政府、学界和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开阔视野、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进而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作出社科界应有的贡献。

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社会各界一直以来对城市国际化论坛的关心和支持，预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中国高校国际政治协会原会长梁守德先生致辞

梁守德：首都经贸大学和北京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2010 城市国际化论坛”今天开幕了，我认为有重大的学习意义，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它是在我们高校具有前瞻性的，紧跟城市和发展的这样一次论坛。论坛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召开，而且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举办，我参加过几次，感觉到论坛越办越深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这也给我们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模式，它不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也是从世界的发展变化出发，而且很好地把中国和世界结合起来。

城市国际化论坛虽然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题，但它不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涉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传承，也涉及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政治的变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这样一个课题，城市国际化论坛的整个要求要把这样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特别是要把中国和世界的统一起来、结合起来，融合为一个主题、一个学科。揭示了这样一个模式，值得发扬下去。

今天整个全球化时代发展的所研究问题、观察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局限于某一个方面和某一个区域，在全球化时代里面必须把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融合起来，才能够正确地观察中国的问题，也才能够正确地观察国际上的问题。“国际化论坛”也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研究，“城市国际化论坛”是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是北京首都城市化的问题，我们探讨这个问题也必须突出中国特色，我们要借鉴学习“世

界城市”的发达国家的“世界城市”化的所经过的路程，但是也必须考虑，必须立足点在中国这个国土上面，要有中国的特色的研究，中国特色的研究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创新的问题。

世界城市有很多发达的先例，也有很多经验，但是它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下，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下，如何实现城市的国际化，如何实现中国城市的世界化，都是不能离开这样一个本土。所以既要借鉴，又要不忘本土，突出中国特色，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主题，这也是论坛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还有一个方面，它必须创新，必须探讨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新的模式，也必须要有先进的东西，这是这次论坛所能够成功的一个标志。

我受到邀请感觉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有几个想法想说一说，也是对会议的一个希望，也感谢主办方对我们高校国际政策研究会的支持，国际高校政策研究会在这样一个会上面我能够学到很多好的东西，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亚太城市韩国分会会长、韩国前文化旅游观光部长朴泰权先生致辞

朴泰权：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上午好。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参加本次论坛。这次论坛举办的是第三届，非常感谢主办方和在场的贵宾，还有在座的经济学的专家。我在韩国担任过国会议员，还有行政政府里面也担任过，我也是通过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的卞洪登总裁认识，一直维持友好的关系。

我下面讲一下关于国际化论坛的思想。通过 2000 年的历史北京城市不断的发展，北京也是奔向着 21 世纪，也是全球性国际化开发的城市。在场的各位专家也是非常了解北京的开发，城市的顺序。我对中国的大城市也是有所了解，包括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这几年来发展非常快。我听了前面各位专家的发言，也说了北京的优势，希望一直发展下去。



我从三个方面来总结一下。第一，现代化城市开发当中，首先自然环境造成当中的一个开发；第二，文化中心的活力城市来开发；第三，城市开发艺术性的未来城市。

第一，自然环境开发的城市里面包括公园式的建设。公园形式的开发里面包括三个主题，其中一是休闲、空间开发，二是近来活力化的促进开发，

三是城市生态维持的开发。

第二，文化中心的活力城市里面包括休闲街的特点，文化中心的特点里面包括三个阶段，一是社会阶段的交流开发，二是多文化的观光，三是特点地段。唐人街的形式也是可以融合到主题开发里面。

第三，未来艺术性的开发城市里面包括科学的艺术来开发。科学艺术性的城市开发里面包括城市景观的向上和生命力出现以及包括整合性的开发。现在在北京绿色建筑非常多，绿色建筑里面还有旧的建筑物，这两种包括在一起总体开发的，在北京城市开发当中也是非常有重要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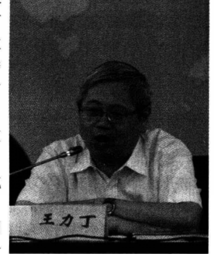
希望北京建设完以后将变成文化城市，再次感谢在场的贵宾和朋友。谢谢！

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王力丁主任讲话

王力丁：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论坛邀请我参加这次研讨会，首先预祝这次论坛圆满成功。

市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什么要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任务？我个人基于几点考虑。

一、建设“世界城市”是北京发展的内在要求，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圆满成功以后，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应当说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完成了新北京、新奥运的战略构想，提前11年完成了2020年我们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组织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推动新的科学发展，需要有一个新的奋斗目标、发展目标。



二、建设“世界城市”是多年来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长远的奋斗目标继续和发展。市委市政府多年来对北京发展目标的定位，始终定位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目标上。1997年市委八次党代会就提出了到21世纪中叶要将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国际化城市的目标，在2000年市委八届六次全会，我们研究确定新的“三步走”的战略中再一次提出，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要使北京成为当代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研究规划的时候，规划的文本中也再次提出必须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目标，不断的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

作用，规划中还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的阶段性的目标，这个目标也提出了三个阶段：一是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框架；二是到2020年力争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社会地位；三是到2050年左右把北京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要迈入“世界城市”的行列。市委市政府多年来提出的奋斗目标建设“世界城市”是一致的。

三、建设“世界城市”也是符合中央对北京工作的要求。中央对北京的发展建设十分关注，对北京的建设发展方向做出过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比如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中央对北京工作提出的四项指示中，要求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和全世界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建设成为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一流城市，建设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流城市，并且在世界上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等。

1983年中央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做出的十条批复，实际上已经明确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1993年和2005年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再次强调了这样的要求。最近习近平同志到北京视察工作时，充分肯定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和思路，并且要求我们努力打造国际活动的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的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给我们提出了五个工作的着力点。

建设“世界城市”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研究的东西很多，特别需要各方面的专家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大体有几个方面。

一、我们的国家总体上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的国情下来建设世界城市。因此，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路径、模式和其他的世界城市截然不同，各个世界城市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但又不能照抄照搬，如何把握世界城市的特点和规律？借鉴世界城市建设的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是我们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

二、建设世界城市体现了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北京作为首都，具有科技智力方面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如何发挥好这些优势，如何加快首都的发展，在推动建设世界城市的同时怎么样为国家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是我们迫切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建设世界城市是一个长远的发展目标，总揽全局、统筹兼顾，把握发展的主动权。迫切需要对建设世界城市的总体性目标和各个时期的阶段性任务进行统筹考虑。特别是如何抓住编制好“十二五”规划的机遇，着力解决好建设世界城市的重大问题，为建设世界城市打好基础，创造条件，营造

环境，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中，首都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矛盾和问题。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水平的制约，城乡建设管理体制机制，以及建设管理的水平和能力的制约等。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及首都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推动首都的科学发展，提高首都建设和管理的水平，也是我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总之，建设世界城市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的、复杂的发展任务，解决困难、推动发展，需要科学决策，也需要广大的专家、学者深入的研究。作为市委的参谋助手，我们市委研究室衷心的感谢各位专家热情的开展“世界城市”的研究，也感谢大家为市委市政府推动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建设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

北京市委宣传部傅华副部长讲话

傅华：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蔡赴朝同志，代表市委宣传部对“2010年城市国际化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出席论坛的各位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感谢。



正如刚才王力丁秘书长所指出的，建设世界城市，既是北京城市发展和中国走向国际社会前台的内在需要，更是赶上发展节奏，提高发展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的迫切要求。一方面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金融环境更加复杂，金融危机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际上是对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催生。另一方面，当前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已呈现出诸多阶段性特征，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只有按照“世界城市”的标准和发展眼光，秉持科学发展的理念，才能更好地谋划、建设和管理北京这座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资源丰富，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特大型城市。因此，对北京来说，国际化是基本趋向，也是系统工程，其表象是发展水平和风貌，其基础是发展方式和路径，而且精神起点乃是大气、包容、开放的城市精神。

本次论坛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奠定世界城市基础为主题，研判发展趋势，借鉴国际经验、揭示发展规律，把握北京在我国城市发展中的独特功能定位，

探索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经济社会指标和文化基础。主题鲜明，视野开拓，富有意义，相信这一定会是一次思想迸发、智慧激荡的精彩时刻，它所产生的成果，一定会对我们的这座城市产生久远而深刻的影响，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题研讨一

主持兼点评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副院长刘欣葵教授

主题演讲1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评价体系的理论思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　文魁　教授

主题演讲2 正确处理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五个关系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　连玉明　教授

主持人（刘欣葵）：

各位朋友、各位同行、各位嘉宾，本次主题研讨正式开始。中国的传统是学以致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这样一个实践是国际化论坛的诸多学者关心的主要话题，所以我们这次论坛有多篇论文都是关注“世界城市”建设的指标体系。作为本次论坛的开篇，我们就请城市国际化论坛的最初的开辟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任校长文魁教授给我们做主题演讲，文魁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评价体系的理论思考”，大家欢迎。

主题演讲1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评价体系的理论思考

文魁：

感谢我们会议主办方提供这样一次机会，北京提出来“世界城市”目标，标志着我们这座城市确立了一个新的方向，确立了一个新的航标。新的航标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具体的指标，所以世界城市指标是应该能够反映一座城市未来发展的综合性的条件素质，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指标体系，现在很多方面都在研究，包括我们学校，也包括社科院和统计局，这次会上也有大量的文章在进行探索，所以这个现在逐步深入。

对于这个指标体系的建成我们研究了一段时间，我们考虑它不应该是一系列指标的堆积和平衡的罗列，应该是有一个清晰的内在逻辑，要搞清楚内

在联系，奠定指标体系理论基础。所以我今天的发言想就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一些理论思考，为建立指标体系提供一个参考理论框架。我想说的有四方面：一是建立指标体系的出发点，二是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三是逻辑关系，四是潜在的意图是要构建新型世界城市北京模式。



一、建立指标体系的出发点

虽然我们已经明确了世界城市的发展方向，但世界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既清晰又模糊，说清晰有现成的，如伦敦、纽约、东京，而且已经有了一些成型的理论著作和原理观点。说模糊，就北京市要搞世界城市，首先什么是世界城市？为什么要建世界城市？如何把握世界城市的进程？这些问题似乎一下子很难说清楚，所以北京提出“世界城市”来以后理论界都在做，但是似乎也没有完全破题。我们设计的指标体系也必须以一个清晰的目标作为一个前提，所以作为北京发展的新航标，不能仅仅是一个概念，还要包括未来城市的理想，也就是理想的城市他的追求包含在里面。

所以不是简单的以伦敦、纽约、东京为模板，而要有清晰的明确奋斗目标，所以我们设计这样一个指标体系的话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这个指标体系一定是反映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的。也就是它是世界城市，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有些同志提出的目标跟它并不直接挂钩，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指标体系反映着我们对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认识和把握，只有把规律发展认识清楚，我们提出的指标才能够对应起来，所以它一定是“世界城市”。

二是出发点一定要超越世界城市。为什么要超越世界城市？我在后面提到要有新型世界城市，就因为现有的世界城市，这三个城市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追赶的先进之处，也是我们确立世界城市目标的内涵所在，但是这三个城市也存在许多弊端和不理想之处，他们走过的历史和历程也需要我们进行总结吸收，所以需要我们探索。新型的世界城市既要有世界城市的共性和民族的特性，以及北京自己自主的城市创新，这样两个出发点是不可缺少的。

体系的主要内容我思考了一段之后，一共五个方面，整理成稿的时候我又概括成几个量。一是功能性指标，所谓功能性指标就是指世界城市的特质，这里面包括一般城市的基本功能内涵，更要标明它明显区别于其他类型城市的特质。从人类出现城市形态以来，城市的功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比如最

早提出的容器功能，是人们在里面进行活动的容器。从现在城市的一般功能来看，对各种要素的集聚和扩散，在这个基础上进而产生了吸引和辐射。所以理解城市功能，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流”的概念，因为一座现代城市，它正是商品流、资金流、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的节点。

前几天我参加广州城市发展的研讨会，他们提出要搞“流量经济”，为了开这个会，我还查了一些资料，好多城市都在提“流量经济”，我说流量经济的概念不一定成立，但是经济流量肯定有。现在回过头看概念准不准确还在研讨，但是抓住流量和经济流实际上是抓住了城市功能的本质。

在各种流量中，“经济流”是基础，经济流的速度、规模、范围，它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城市。也就是流量波及的范围，它的强度、它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世界城市高端形态，一定是范围最大、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所以可以分出不同层次的等级。从这点看，所谓“世界城市”从功能上来看，“经济流量”应该是全球范围的，一般人认为首位国际城市是国际资本的节点，还有就是国际移民的集散地。

从这点看它的功能就应该是服务或者叫世界，影响全球。我用了一个“影响”，因为我们要奋斗的目标就是占据高端形态，现在注意一下用的是“主打”世界，还有讲是“控制”世界。这是第一方面的指标，这个指标我后面再说它是最关键的。

二、规模性指标

第一指标我概括为流量，第二指标我概括为体量。流量的形成发生于体量，也就是城市的经济规模，一般来说城市的体量越大流量越大，流量越广越快，城市的体量必然随之膨胀，流量与体量的关系，一般来说流量是因，体量是果，也会因为违背城市发展规律，也有可能人为的把一座城市搞的体量很大。但是这种体量由于没有流量的支撑就很难持续，最后还有可能导致城市的悲剧，就是有吸引没有扩散，都是自我消化，不能产生辐射。但是流量的扩张没有体量的保障也会受到严重的制约，从而影响城市进一步向高端升级。所以一座城市完成服务世界影响全球的功能，就必须也以“经济流量”相适应的经济体量。我们一般重视的都是体量，规模、GDP多大，总量有多少，我想这是我们观察一座城市是否具备世界城市功能的第二方面的指标。（可用于论文京津冀扩散的论证）

三、基础性指标

我把它概括为容量。芒福德曾经把城市说成无非就是容纳各种容器的巨型容器，我觉得还是挺形象的。城市最初的这种容器功能，对于认识现代城市流量功能同样有着重要的启发，容器的容量决定着城市的体量和所产生的

流量。要承载经济流量所需要的经济体量，就要具备相应的城市承载能力，我想这个容量就是讲的我们的承载力。这座城市要具备服务世界、影响全球特大的经济流量出现的经济体量，就要提供完备的城市基础、高效的城市运行能力和先进的城市管理水平，这就讲的是我们的城市容量。

四、禀赋性指标

禀赋性指标我简称是储量，城市的容量可以通过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加以扩容，容量可以扩，但是扩容就要有可利用的资源。比如现在北京正在修建地铁，而且规模是很大的，到2012年、2015年要比现在翻番，这实际上就是扩容。但是扩容必须有资源的保证，南水北调也是在扩容，南水北调必须有水可调，水实际上是一种资源。所以，储量就是讲的它的资源的状态，就是我们容量既要利用这个资源，同时又是在既定资源的约束下进行的。

所以，人不能随意改变城市发展的自然禀赋，人可以扩大，资源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它是不可逾越的边境。包括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地形地貌、水资源、土地供给、能源供给，这些都是我们讲的资源储量，储量是终极限制，我们不可以随意乱用。如果资源枯竭告罄，意味着城市将面临着不可持续的重大危机。

五、品质性指标

品质性指标我把它概括成是能量。城市的发展最终取决于城市的活力，一座城市要充满活力，活力来自于动力，也就是一座城市的能量。世界城市要对世界产生吸引力和影响力，这些影响力和吸引力表现为能量的很多，比如一座城市的产业结构，它的空间布局，它的体制、机制、办事是否便捷效率，与外界的连接，信息畅通，也包括科技创新、人才辈出，我们现在制定了很多政策在吸引人才，我想当我们“世界城市”建成之日的时候不是靠政策而是靠人自然就往这儿走，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们向世界提供人才，那才叫世界城市，要充满着活力，专注在源源不断的产生，人才源源不断产出。

我查了一些资料，像波士顿，波士顿在发展历史上几度处于低潮，但很快就能够起来，在于它的人才。现在成为“世界城市”的伦敦、纽约和东京在城市品质上有所不同，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即使建设成世界城市也必然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有品质。像我们提出“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积极行动计划都是反映我们在追求着城市的品质，和它深刻能量的内涵。

现在，我说一下五个指标的逻辑关系。这五个指标是一个内在联系逻辑非常严密的体系，流量指标是一个实质，流量的范围大小决定你在哪个层次的城市，达不到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流量，那你就不是“世界城市”，我们既然

说它是“世界城市”，所以基本的功能就要达到。

体量指标是功能指标所要求的，虽然一座城市的形成发展有它特殊的历史和环境，但是服务世界影响全球功能的实现，一定要有体量的形成，所以体量指标是功能指标的要求，也是实现的条件。基础容量的指标是体量所要求的城市基础设施，也是它实现的硬条件。这两者的关系，我这样一说可能有的同志不明白什么叫体量，什么叫容量。我举一个例子，比如现在北京城市发展的规模是一个体量，城市容器能不能承载它是容量。就拿汽车来说，我们现在有450万辆汽车，这是体量，大家都有感觉很不舒服，很不便捷，也就是它的容量到底多少？现在我感觉体量肯定是超过容量了，所以水多了放面，面多了放水，最后我们再扩容，扩容的同时体量也在增加，这两者之间不一样，有一定关系，它们都影响着流量。

禀赋指标，这是前项指标的存在基础，也是一个城市增长和扩张不可制约的，你的地、你的水、你的能源。

品质指标是保证指标实现的软条件，它是最最重要的。刚才我讲一个城市的活力能量表现在这里，同时它也是我们建设世界城市的着手点。

最后一个我简单地说一下，新型世界城市的北京模式。主要讲几个意思：一是我们现在构建世界城市指标体系它潜在意图，是要为我们城市未来的发展描绘一个蓝图。不是简单说现在世界城市什么样，而是把我们的城市建设成什么样。在这样的过程里，向世界城市迈进，吸取世界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教训。最近我看看世界城市发展史也得到了很多启发，其中有些问题我想有时间坐下来研究，但是现在还没有时间着手。大城市病，现在一些人类历史上有些城市的消亡、衰败，曾经非常繁荣，最后衰弱了，甚至消亡了，这样的例子并不少，应该很好的梳理一下。

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趋势。现在很多专家讲都市圈、城市带，最近在政协我们提出世界城市不只是北京，实际上是提的整个华北地区的理想目标，没有一个腹地，单独北京、单打独斗成为“世界城市”也是不可能的。（我论文应在此深加论述）

转变发展方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重要到什么程度？我看人民日报有一个评论，中华民族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有三个大的环节，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是改革开放，他认为第三个就是转变发展方式，抬的历史地位非常之高，我们需要慢慢理解。什么叫转变发展方式？在政协开会我简单地提了三个标准，什么叫转变了，什么叫没转变，转变没转变的标志是什么，我提出了三个，人民得实惠、资源能承载、环境不破坏。每一条都值得我们深思，是不是在这里面人民得实惠了、资源能够承载、环境不破坏。进

一步引申，他就是这个城市发展的主题和动力。最后我想借此机会明确地提出来“我们未来建立城市的方向和我们努力的方向，以及我们现在构建这样一个指标体系，就是要创建一种新型世界城市的北京模式”。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刘欣葵）：

谢谢文魁教授，文教授他是讲指标评价体系两个思路，一个是我们按照世界城市基本内涵突出其共性，同时按照新型城市的特点突出其特性，按照这两条思路下来，他以质和量两者相结合，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指标衡量，质和量的结合是有功能性的、基础性的、储量性的，有我们说的禀赋性的和品质性的。我特别赞赏文教授提出，我们的追求是功能性的，但是最终我们要落在品质性的，我们体现出来的是我们的品质，而我们真正的实力和追求最大的目标是功能。

再次谢谢文教授，接下来请连玉明研究员，他是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院长，我觉得连老师应该在城市现代化、城市国际化的研究中是非常早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就做这个研究论坛，连老师自身在城市的现代化管理和城市的国际化管理有很多建树，同时也是CBD长期的顾问。

主题演讲2

正确处理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五个关系

连玉明：

大家好。我发言的题目是“正确处理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五个关系”。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国际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城市的建设是一个体系，研究这个体系我想刚才文教授从指标这样一个角度对体系作了一个说明，我对这个体系将从城市国际化的关系入手。大家知道现在北京研究世界城市建设，应该说从研究的角度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开始从形态的研究，现在向体系的研究转变，对体系的研究一方面是指标，通过指标构建体系；另一方面是从关系入手，通过关系来理清体系。因此，研究世界城市这样一个体系，还要从城市国际化进程的关系入手。“关系”包括外在关系，也包括内在关系。

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外部关系来看，有几个关系。比如，我们说公认的世界城市，比如纽约、伦敦、东京，这些已经公认的世界城市，和正在建

设中的北京世界城市是一个什么关系，我觉得特别要研究东京和北京的关系。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如果从竞争的角度讲不是纽约和伦敦，是东京。第二是北京、上海、中国香港的关系，在中国有条件建设世界城市的也不光是北京，包括中国香港、上海和北京，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因为



这三个城市的关系，它涉及三个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问题，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世界城市建设中不可回避的，不可质疑的问题，以关系到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圈的建设问题。再一个关系就是北京与京津冀，环渤海与东北亚的关系。特别是北京在京津冀、环渤海、东北亚中间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还有一个北京和天津的关系，北京和天津如何进行合作，要不要建立一个京津的大都会，以及北京和中央、北京和全国的这样一些关系等，这些关系都是外部关系，也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必须和解决好的关系。我觉得这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但是我想研究关系首先是外部关系。

今天我重点想谈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的内部关系，也就是我题目里面所讲的正确处理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五个关系：一是世界城市与宜居城市的关系。2004 年提出了宜居城市的目标，现在又提出了世界城市，世界城市与宜居城市是什么关系。二是人口转型与产业转型的关系。我们讲转变发展方式可能重中之重是人口怎么转，产业怎么转。三是旧城的改造与风貌的保护关系。四是奥运的品牌与城市品质的关系。五是四个服务与四个中心的关系。

这五个关系也是矛盾，如果这五个矛盾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建设世界城市的动力，如果这五个矛盾处理得不好，它也许就会变成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的难题，甚至是阻力。比如，世界城市与宜居城市的关系，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世界城市是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了高度的工艺化、高度的城市化、高度的市场化和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这四个高度的必然产物，必然导致了两个基本结果，一是社会的风化，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就是说世界城市的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造成了负面影响是必须的。西方发达国家采用的办法是先污染后治理。我们怎么办？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来建设世界城市，我们是继续走西方的老路，还是要吸取西方的教训，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另外从宜居城市层面看，究竟什么是宜居？宜居的本质是人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福利的持续提升。生活品质和生活福利的最高价值是人的生命健康，决定人的生命健康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从人类生命的进化史来看，影响生命健康的关键性因素有三个基本标志。

一是热量，人要想生活得好，要想健康，必须吸收大量的热量，吃好吃的东西，热量这样一个决定因素，它是在欠发达的地区和不发达的时代最重要的标志。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这样一个热量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人均GDP到达3000美元，标志人的身体健康的标志是什么？营养平衡，所以现在我们讲少吃肉、多吃蔬菜，喝绿豆汤，锻炼身体，讲这么多东西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营养平衡，而营养平衡是生命健康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营养平衡发生在哪个阶段？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家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发达国家，在发达的经济发展阶段，人的生命健康的最重要的标志是空气和水，能不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能不能喝到清洁的水，也是衡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重要分界线。我们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别在什么地方。

刚才文老师讲到品质性的指标，品质的最终东西是什么？是人的生活品质。而决定人的生活品质的是什么？是清新的空气和清洁的水，这是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清新的空气和清洁的水就成为决定一个城市是否宜居的重要标志。与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无论世界城市还是宜居城市，最终的目标要不断的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和福利，促进人们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我们建设世界城市和宜居城市的基本原则。

下面还有比如人口的特征转型和产业转型的关系，旧城改造和风貌的保护关系，奥运的品牌和城市品质的关系，这四个方面的关系都是我们必须研究的。

我想重点讲一个关系，四个服务与四个中心的关系。什么叫四个服务？四个服务是中央服务于首都的政治使命和重要职责。第一，你要为中央打造成到机关服务。第二，为日益扩大国际交往服务。第三，为国家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发展服务。第四，为市民的生活和工作服务，这是中央赋予北京的重要使命。这个使命里面没有建设世界城市，四个中心讲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必须事先的功能定位和战略任务。

四个中心：第一，要建设政治文化中心。第二，要建设金融管理中心。第三，要建设科技创新工薪。第四，要建设国际商务中心。没有这四个中心，就不能开“世界城市”。所以怎么来处理好四个中心与四个服务的关系，既要首先中央服务与北京的政治使命，同时又有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功能。

立足四个服务，加快四个中心，在服务中发挥优势，在加快中寻找突破。因此，第一点是要加快政治中心建设。加快政治文化中心建设关键是六个战略：一是能不能把国际组织的总部作为体现大国首都、国际政治功能，集中释放国际影响力的路径。二是能不能把古都风貌的保护提升到“世界城市”的战略地位。三是能不能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世界城市建设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四是把挖掘和传承奥运文化遗产作为世界城市的战略品牌。五是把国际文化交流作为世界城市建设的战略核心。六是能不能把世界级的文化设施作为世界城市建设的战略制高点。

第二点是要加快金融管理中心的建设。这里面我特别强调一点，目前北京对于金融中心建设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在空间布局上多重发展、各自为政，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第三是要点加快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核心就是中关村，国家资助创新示范区，关键的关键是什么？加快海淀、昌平、石景山的合并，成立中关村新区。

最后加快国际商务中心建设。观察一个城市是不是世界城市，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就是CBD，所以CBD是“世界城市”的核心也是国际交往的传统，因此CBD建设的好不好，关系到世界城市建设的成败。因此，我想四个中心、四个服务怎么处理好它的关系，这可能是我们在研究世界城市体系中，在解决内部关系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关系。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

互动与点评

主持人（刘欣葵）：

连教授提出的五大关系，我理解是北京目前城市发展中的五个难题，也是五个优势和五个最重大的潜力。连老师最后落在了国际城市建设的战略，几大战略的一个思考，应该说具体制定北京城市这个指标以后，我们具体的一些战略思考，一些策略，一些策划、行动，应该可以考虑您的指导性的意见。

艾夫任·卡尔沃：

两位学者的发言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从我的想法还是要具体的、深入的把论坛的一些重点再讲一下，就一些重点的问题我想还是有必要深入的讨论。我想把题目更加引向深入，比如和圣保罗城市和一些大的城市，国际化城市在建设中的成就和他们的失误，再深入的研究和借鉴一下。

付宝华：

向两位专家领导问一个问题，咱们世界城市提出，比如像刚才说的世界城市纽约、伦敦、东京，我们搞世界城市，世界城市常态东西在发展过程中都已经体现出来了，只是咱们走向自己的风格道路，北京发展有没有一个鲜明主题？伦敦世界城市建立提出“文化之都”，他们从世界城市一下就领先了纽约和东京多少年，所以世界城市的概念伦敦现在不是“世界城市”，人家提出是“创意之都”这么一个鲜明的主题，我们北京能不能有一个前瞻性的东西来引领，这是非常重要的。请二位领导从这方面给解读一下。

连玉明：

这个问题应该由文老师来讲，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一定是新型的，超越原来西方发达国家，这种新型有两层含义：一是必须解决西方发达国家世界城市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就是社会的风化和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一定不能走老路。二是新型一定具有中国特色，具有首都特点的创新型的世界城市。一方面因为世界城市是一个目标，在目标确定以后，第一怎么走一个创新型的模式。第二怎么有自己的特色。可能是我们下一步重点要研究的问题，北京一个是模式的问题，一个是特色的问题，这是我对新型的两个理解。

文魁：

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既是理论上的难题，也是实践中的一个难题。北京提出“世界城市”，我们也考虑好长时间，奥运会以后、国庆60周年以后，北京靠大的活动推动到底是什么？我们提出“三个北京”，最后提出世界城市总的指导思想是要进入世界城市的行列，进入城市的高端，这个高端在国际上是有公认的，有一套理论而且主要是这三个。

但是我对比了一下，我最近看的两个指标体系都不尽如人意，一个是幸福感；还有一个指标是很实用的，是给各国派驻其他国家的给生活补贴，到底给不给，给多少，有一个美元的数据，这三个城市都在四五十名之后，所以世界现有三个“世界城市”，按我们来看并不是理想城市，只是国际资本的节点，而且它能够控制世界的形态，我们要进入这个里面的同时，还要必须保证城市生活质量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转变发展方式，你到底是为了谁，你是要控制世界的资本还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的城市要进入前列但一定新型，这种新型主要包括在各个方面我们是理想城市，它们现在并不理想。

上次开会有人讲世界城市真正都那么好吗？也没有那么好，也有贫民窟。我们未来的建设创新点到底是什么？我想“三个北京”是抓住一个品质的要害，从内涵来讲，我们扎扎实实地把它做好，就可以把我们的基础，未来什么东西一下子就上去了，这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奔着这个方向努力过程中

可能会找到。

主持人（刘欣葵）：

谢谢二位教授，也谢谢各位参与者，我们第一场论坛提出了很多开放性的主题，最后落到追求理想城市，谢谢各位。

主题研讨二

主持兼点评人： 中国经济出版社副总编乔卫兵博士

主题演讲3 建设世界城市应转变发展方式
亚太城市研究会秘书长　卞洪登博士

主题演讲4 墨西哥城的经济增长方式分析
墨中经济技术合作理事会会长　艾夫任·卡尔沃

主持人（乔卫兵）：



很高兴受大会的委托主持今天上午的第二场主题讨论。转型这个话题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转型应该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概念，我个人理解它不仅是经济转型，它更重要的是政治转型、社会转型，包括文化转型。应该说从绝对的意义上讲，我们人类一直处在转型之中，我们现在为什么谈论这个话题？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啊，目前走在了一个关键点上，所以我们现在谈了三个转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第三个，我们要转变发展模式，我们要提高劳动素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我们讲到世界城市，这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人类文明的主要代表、主要的标志都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首都作为国家的首善之区，把建设世界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的战略，这应该和我们整个的国家发展战略是相一致的，这两个大的话题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今天主题讨论的一个交叉点。

下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两位专家入座，一个是来自亚太城市研究会的秘书长卞洪登先生，有请。因为我们会议的安排有一个议程的调整，本来是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的副主任邱爱军博士演讲，但是因为来

自墨西哥城市的嘉宾下午有事，所以临时调到了上午。所以下面我们有请理事会会长艾夫任·卡尔沃先生就坐。

如何将城市发展和转型链接起来，首先我们邀请卞洪登先生做精彩的演讲。

主题演讲3

建设世界城市应转变发展方式

卞洪登：

我觉得就我两个身份职务相关联，我讲一下亚太地区的一些城市的经验和中国房地产协会，我现在是中国房地产协会的副会长，因为全国都在争房价问题，城市化和房地产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都应该怎么办？我这里面提出了未来的四个解决方案，由于时间关系，我把主要的题目简化的说一下。



我在第一个题目里面，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将郊区农村变成城市化，经济发展方式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我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方案，为什么这样？因为一是过去我们城市都是以城市为中心搞国际化，未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世界城市和国际化转变一个新的发展方式，这个发展方式就是上山下乡，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大家动员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大家都不愿意去，在这块上我觉得我们北京的城市现在应该要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现在不是要不要去的问题，从我们的经验上看，墨西哥城，这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墨西哥城不是一个墨西哥城建的，它周边有六个州相关联，这有点像京津冀六个城市相邻一样。

墨西哥城达到3000万人，其中2000多万人是在周边的州里面，我们在座的“阿州长”、他担任过墨西哥城的副市长、阿肯州的州长。它是墨西哥城北部的重症，也就是说它占了整个国家的8%的GDP，在这种情况下才构建了这么一个墨西哥城的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墨西哥城的模式实际上就典型

的上山下乡模式，所谓“下乡”把周边几个州的农民的土地，无限延长，不是像我们，我们有很多的政策控制农村土地不许使用，现在大禹治水用疏导法，你要用大禹的父亲砺堵塞法，就造成了60万平方米的违规房，这就是城市化自然发展所不可阻挡的带来的后遗症，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城市化发展的空间拓展问题。空间的拓展问题就是要突破我们现在的二元结构，要变成一元结构。

我还想就问题说一下第二个方面，第二方面我重点说一说北京城市在未来的发展上应该利用好70%的山区，做足山城文章，北京有168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可是我们的山区有10300平方公里，就是说70%是山地在那睡大觉，这是一个我们北京城里在堵车，首都变首堵，应该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今天早餐跟李先生交流的时候，他说重点问题研究就是未来的文化产业经济的问题，我说我们北京最大的资源宝库就在山上，在长城，就是我们刚才韩国部长所看到我们北京的优势，长城，全世界都知道，但是长城仅仅用来看是不行的，长城既然能让数万人去看，它同时也能用，同时也可以住。

我在开会的前一天，我们京津冀地区构建世界城市，要从房山、门头沟到延庆、昌平、密云，一直到平谷向东，大家知道秦皇岛的老龙头，要修一个300公里长的旅游快车专线，这个也就是北部疏导交通的大动脉的旅游专线。但是光旅游、光运输是可惜了，它还可以用一种新型的建设，我在中国台湾看到，它上面是高速公路，底下是几公里长的花市，我们顶多在城里面有一点停车场的利用率，可是你可以把它盖的更高一点，盖到三层的，就可以做一个300公里长的新长城宾馆，超级宾馆，这就是继我们老的长城七大奇迹为我们中国可能又争了一个光，多了一个第八大奇迹。世界上有300多公里长的宾馆吗？没有。可是我们燕山从东到西有数百个著名的景点没有被激活，在睡大觉，有的景点也是熙熙攘攘，我们要通过这样的热线，底下开车道解决交通问题，上面的景观路可以解决马拉松和自行车比赛的景观问题，这样从东到西也不扰民。

我们一搞自行车比赛就交通管制，很扰民，所以一城多用，这是我们构造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构想。这个构想来源于我之前提出的首都东扩，构建世界最大都市，并不是简单地说说，还要建设它的城墙在哪，它的城的框框在哪儿？我的框框是前面所说的未来的城市将来要上山下乡，还要东进西拓，还要南征北战，应该构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上山下乡的景象呢？上山是我刚才所说的东西长城300公里的超级宾馆旅游景观建设的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在南部已经有了快速的几大交通道，有高速公路、有高速铁路。另外东

进西出，东进到大海，到渤海，现在首钢都到渤海了，25 号我参加渤海的会议，那边热火朝天，首都的东部边界是渤海，西部的边界太行燕山山脉，在这样一个大的跨区里面京津冀大家都受益了。“首都”不是北京人的专利，“首都”是中国人的专利，“首都”能为它服务的近距离的有条件的就是通州以前行署 13 县，一部分给天津了，包括蓟县、宝坻，还有一部分给河北了，这些都要激活，实际上就形成了大的框架，我们未来的首都是这样的发展框架。

因为我刚才说的是山城，汉城也是一样，汉城汉江的两边是山城，农村土地都被征用了以后，结果农民和明星大腕住在一起，因为农民的土地升级了。现在讲到第二方面上山，汉城是这样，墨西哥城也是这样。墨西哥城最富裕的就是山城。

下面讲一下我们在这么大一个区间世界城市里面，仅仅建这么一个山城和这么一个把北京所有的农村变成一个新型的乡镇城市，就是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个地方，台湖，也是乡村变成一个小规型城镇，仅仅是这个也是不行的，我们还要有第三步曲，第三部曲我在这方面搜集了一些资料，我们要建设移民式的世界城市，要海纳百川。在这方面洛杉矶做得最好，洛杉矶现在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有 30% 是外国人构建的，我们这个地方连 0. 3% 都不到，这样世界之都是不符合未来的发展方向的。我们应该打造变“一国之都”为“万国之都”，世界的多元符号都可以容纳。

文校长讲的它是世界的大容器，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综合容器。因此，在洛杉矶的成功模式，洛杉矶这个地方我去过六次，我感觉这个城市就是点石成金、点沙成金，把所有戈壁沙漠都开辟城市化运营，使堵车问题比较好解决。我们这清规戒律太多，农民土地不能用，城市景观也不能上山破坏，所以他就不知道山上很多的方地，花草树木不需要重新去种，我们城市里面种点东西很困难，修了房子边上还要弄花草，山上都是现成的。

我们的资源也是现成的，全世界都想跟中国打交道，都想到首都来发展，可是容不下地，现在北京的哪个外语大学都人满为患，很困难。北京最后一个还应该实行跨区域的发展，只有实行跨区域发展的转变方式，才能使我们的首都最后变北京人的一城之都为京津冀的大家共同为中央抬轿子的百城之都。如果我们每个城镇都变成城市，变成洛杉矶的新型城市，每个乡镇都在发光，我们在做的台湖这个地区也在发光，。从这个地方原来是农田，现在我们可以来开会，还有再远一点，香河的天下第一城，现在也变成大家都去开会，说明什么问题？一座城市是解决不了大众需求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在座共同研究世界城市的问题，要想做成世界城市，我们就要有一城之都变成百

城之都的未来的长远的设计，我也希望通过这次世界城市研究，把我们的城市引申为未来的上山下乡型的世界城市，引申为“一城之都”变成“百城之都”，海纳百川的世界城市。

主题演讲4

墨西哥城的经济增长方式分析

艾夫任·卡尔沃：

各位上午好，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参加“2010城市国际化论坛”。我非常高兴看到我的朋友卞总对墨西哥城的介绍充满了热情，再一次向卞总邀请我来参加“2010城市国际化论坛”表示感谢。说一下我这30年来驻外涉及了30多个国家，那些国家都是人口非常多的，而且也都是大都市。比如我住在巴西的圣保罗，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意大利米兰，还住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城市就是墨西哥城，最后我来到了世界最大的城市对我来说那个最先进的、最现代化的城市，北京。



我指的现代化并不只是它的外表，而是指北京是在它的全方位的现代化，比如它的政治、文化、经济，涉及各个领域的现代化。20年前，我有机会成了墨西哥联邦州的州长，在墨西哥联邦墨西哥州有2500万人，在墨西哥城和墨西哥周边的联邦州，每天都互动着2000万人口左右，由于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性强，随着城市的扩展自然有很多方面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有很多方面，比如在银行建设、电信、网络、住房这些问题，都面临着新问题的出现。我们就应该问了怎么样解决城市和墨西哥州城市首都和扩张的墨西哥联邦州这些问题是怎么面对的？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现在一个比较年轻的州长，他面对这样一个大的墨西哥联邦州，墨西哥城和首都之间城的州长，他决定采取很多的政策来调整扩充墨西哥城长期发展的计划。让新型的卫星城拥有现代化的设施，具有快捷的交通，银行现代化的通信，把它建设新型城市的设想。新的卫星城墨西哥联邦州，建设这个新城的问题是为了避免人民在居住方面，还有流动方面的不便捷，让交通堵塞和不便捷的方式改变，让人们喜欢，让移动人口喜欢住在新的卫星城里面。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人要转变他从一个地方居住到这个卫星城里，比如他从城里去卫星城里，或者从卫星城里到墨西哥首都来，如果路上交通每天需要花三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没有并居到这个新的城市里面的时候，他要花这么长的交通时间。由于路上的交通不便，造成他一去3个小时，再加上8个小时的工作，回来3个小时，16个小时就造成了他自己的能力浪费、时间的浪费和经济的浪费，非常消耗体力。所以在建设卫星城的时候，我有三个方面的想法考虑，所以在考虑卫星城建设的时候，首先考虑要建一条280公里的公路，还要考虑建设一个通往来回交通的快轨，属于地铁式的交通快轨，把墨西哥的地铁延长。还有这个州的州长为建设280公里的铁路，还有他们这些快轨的修建，还有其他的地铁的延长，所有的这些计划形成了政治的发展计划，为此他曾两次来了中国。因为州长来到了北京以后，想借鉴在北京发展国际化城市的经验，把地铁的建设、公路的建设经验学去，而且也让两个城市互相交流，并且形成国际化城市发展的交流经验的平台，要形成这么一种模式，互换经验、交换经验。

特别是北京的安全能够建设这么一个安全性的首都的国际大城市，我们墨西哥城要向北京学习。北京要向墨西哥学习的一点，就是怎么样减少空气的污染，特别是还考虑到交通的拥挤，墨西哥是怎么解决它这个城市交通拥挤的问题。我举这样一个范例作为交流的例子。

为此，墨西哥联邦州为了实施这些计划，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性的计划。这样就形成了为了实现这个城市建设的具体设施的实施，让这些政策实施起来有保证，而且吸引各方面的外资引进有安全和可靠，对这些政策的实施形成了一些保障，无论是哪个党派在这个位置上当州长，哪个党派在执政，但是政策已经定下来了，要保证实施、连续性、持续性的发展。我再一次向参会所有的朋友和卞总表示感谢，谢谢。

互动与点评

主持人（乔卫兵）：

墨西哥城作为国际上知名的城市，和韩国的汉城，在伦敦、纽约、东京之外，是非常被国际认可的国际化城市。艾夫任·卡尔沃教授从墨西哥城市管理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了如何建设和管理墨西哥城，其中一个主要的观点通过建立卫星城。建立卫星城主要体现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世界城市主要是人口、经济、信息多种要素的集散地，同时如何把它有效地合理地分散出去。今天艾夫任·卡尔沃教授重点讲的是一个交通的改变，通过建立快速公路也

好、铁轨也好，这是我们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同时他也提出，墨西哥城也应该向北京这样有可能或者正在迈向世界城市的都市学习。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艾夫任·卡尔沃教授的精彩发言。

下面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请各位学者和嘉宾对刚才两位嘉宾的演讲提出问题。

白志刚：

请问教授，墨西哥城市规划有没有对人口的最高量的限制，就是资源承载有没有一个极限，有没有相应的人口调控的政策？

艾夫任·卡尔沃：

谢谢您的提问，墨西哥州和墨西哥首都，对于人口的进入和流动是没有限制的，也避免这方面对人们造成的限制，不要设任何的障碍，对人们的活动灵活和城市发展的灵活必须的保证。

白志刚：

它的水资源很多？

艾夫任·卡尔沃：

水资源像您所想像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墨西哥城非常缺水，它的水要从100公里以外的莱尔玛（音）那个地方引到墨西哥，从1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把水引过来。所以在有些季节是很缺水的，而且还限制水的供应，所以我们要把墨西哥城首都扩大化，让首都的人口分散化。

庞中英：

我的问题跟刚才白教授的问题是一样的，关于人口问题。我觉得在座的经济学家特别多，大概像人口、环境、资源的问题，像卞洪登教授说的上山下乡，以前环保时报有一篇评论说“北京人口达到5000万以后怎么办？京津这样一个城市走廊，将来城市人口突破1个亿怎么办？”这些问题我很想听到两位的评论。另外我觉得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普遍现象，中国建设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很对，因为发展中国家就是大批人口从乡村涌到城市，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有解决好，中国能不能解决，包括墨西哥城我不认为已经提供了解决大量人口涌到了城市这样一个发展的难题。

卞洪登：

这个问题非常好，引申了我很多发展研究成果。第一转变发展方式就能够解决庞先生所期待的结果。

庞中英：

转变方式还不够，要转变内容，要解决内容的问题。

卞洪登：

北京 1.6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不到 10% 的城市化占有率的空间，我们现在已经对社会公布的，有的说是 1000 平方公里以内，也有的说是 1000 平方公里多一点点，都没有达到 1600 平方公里 1/10 的城市占有空间，人口却超过了 70%，北京城市化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到了 70% 以上的城市化就属于先进国家，但是我们的空间占有率还不足 10%，这就是我提出来的还要上山下乡，有可持续发展的更大的空间。空间很大，能解决 5000 万人，甚至上亿人凝聚到世界最大首都的空间是现成的，只不过是转变方式在城市里面搞城市化、搞世界城市，还是上山下乡更多的是我所憧憬的那样我们的乡村容许农民让他们的平房跻身成为三层的别墅和五层的公寓，农民还可以住在一层，其他层的公民在进行城市化，去工作的时候还可以留守。

所以说未来的城市化并不会让农民失地、失业，反而更增加了他在公寓里面的经营收益，这样我们就会把城市能够真正的良性引申到乡村去。所以我们现在乡村里面的一些农家乐已经有了曙光，但是这是偷偷摸摸的，有些是不合法的，扩大容积率，很多人用他的乡村乐，把一层变为两层，变成了一个违规的小产权，因为他没有报户口，也报不下来，所以我们要转变方式，通过政府的许可把这个空间扩大。我们在座的人要研究一个城市的容量问题，我们现在城市的大都市里面已经盖到百层以上的容积率，但是不允许农民有一层的容积率提升，这是不科学的，未来要解决的，就是上山下乡的下乡就是扩大这样的空间，把容积率提高，提高土地利用率。

第二个问题要说的，北京城 70%，10300 平方公里在睡大觉，我刚才只是讲东西 300 公里长的世界最大的旅游宾馆，当然你可以搞三星级，也可以像迪拜而弄个七星级，可以任意往里添加配置，任意在里面编程序，靠北京的你就弄个七星级，大家可以观光。也可以在郊区，可以在雾灵山下，在山区县搞三星级，总之让旅游人都不要在城里面住，然后在拉到山上去玩，那样来回就会累坏了。外地人进城来，城里人出城去，搞一个大的旅游通道，作为一个开幕式，今后在空间拓展又会有很多的卫星城，我建议 10 公里建一个旅游卫星城，10 公里一个间距，这样把山区扩大。因为绿化是现成的，水是现成的，我们只不过需要新的设计来完善。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现在的空间，京津冀接近 5000 万人，未来外来城市可能会接近 1 亿人。

刘广伟：

请问艾夫任·卡尔沃教授，墨西哥餐饮情况，墨西哥是美食之都，本地的餐饮主要是什么特色？欧美的餐饮，包括中餐在那里是一个什么情况？

艾夫任·卡尔沃：

谢谢您的提问，我非常高兴回答您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世界以美食著称的几个大城市，美国、西班牙、墨西哥、中国。最近五年来，随着城市经贸的发展，墨西哥城也特别把中餐作为了一个发展重点，让大家知道能够用我们中国人习惯使用的筷子吃饭，通过这一点让我们墨西哥人了解了中国文化，而且把这个文化引申到了一个具体的，而更深刻的含义上去理解，让大家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的标志。我们两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都喜爱的地方在饮食文化方面，就是辣味，中餐的辣味和墨西哥餐的辣味结合起来，都是非常受到当地两国人民欢迎的。

从历史上，从1800年以前有一个著名的“老计划”，从那个时候把辣椒作为互相交流的重点，后来2000多年中断了这个交流，后来又重新立起来了以饮食文化的这样一个交流。

主持人（乔卫兵）：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和各位提问者的提问，我们这个讨论组合可能比较好一些，我刚才看到还有好几位嘉宾想提问，由于时间关系讨论到此结束。

卞总参加论坛，他本身成为话题的制造者，同时他也为论坛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要素，即国际化的要素。他每次能给我们请来好几位国际化的学者，使我们论坛的国际性视野进一步拓展。

转型和城市建设这两个话题是非常大的。我在开始的时候已经说过，转型本身我个人理解它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它不仅仅是经济的，也应该是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它是所有转型的一个基本的基础。世界城市的建设也不仅仅是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就可以实现的，我个人理解世界城市，包括像前面演讲的各位学者讲的，世界城市的建设也应该有各种指标，各种评判体系，也有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政治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尤其应包括当下的热门话题低碳环保，所有这些才应该是世界城市的理念。

我们在这么两个非常丰富立体的概念中，抽取了两个主要的概念讨论这样一个话题，这样的话题显然是我们这种简单的对话不能解决的问题。剩下我们将更复杂、更深刻的问题，留给下午和明天的专家继续讨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二位嘉宾给我们做的精彩发言。

主题研讨三

主持兼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庞中英

主题演讲5 北京作为一个世界城市的挑战和前景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顾朝林

主题演讲6　北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困境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杨开忠

主持人（庞中英）：

大家下午好，我们的论坛下午继续进行。我是人民大学的庞中英，非常荣幸、非常高兴主持下午的第一节主题研讨。我们下午有两位发言人，有一个小的调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顾朝林教授演讲以后，我们下一位演讲人是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开忠教授演讲。这两位演讲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对上午的发言的一个继续和深化。我观察到，通过上午的开幕式和主题演讲，我发现可能有一个小的矛盾，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包括上午提出来还要转变发展的内容，但是我们发现许多旧的东西，旧的发展方式和内容还在继续，这可能构成了一个很大的矛盾。

另外，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向全世界学习，开放式的学习，借鉴其他城市、其他发展模式的各种经验，去构建北京的世界城市的发展模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可能需要一种精神，就是一种批评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对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过去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有一个深刻的反思。

现在我们欢迎两位发言人、演讲人顾朝林教授和杨开忠教授就坐。顾朝林教授现在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理论城市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他是南京大学的博士，著名学者，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文稿），我就不再需要把它全部念下来。杨开忠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我也不详细的介绍了。

下面请顾朝林教授给大家做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北京作为一个世界城市的挑战和前景”。

主题演讲5

北京作为一个世界城市的挑战和前景

顾朝林：

我们的主题主要是谈北京世界城市的建设，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北京规划中，把它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的首都和新的世界城市。这篇文章是两年前开始写的，澳大利亚出了一本书叫《亚洲的城市》，这里面有关于北京的

一部分。意思是我们两年前就开始关注世界城市这样一个概念，最近市里面现在开始讨论“世界城市”概念，北京来建设世界城市的这样一个概念。

作者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英国的大学约翰·穆尔教授，今天的观点有国际视野的观点，不代表我个人。我们北京，我们的发展，两个重要的特征，这本书里面大概说了中国两个城市，一个北京、一个上海。北京是什么城市？一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二是新的世界城市。要谈世界城市，昨天晚上我又加了一个概念，在这里面讲什么是世界城市？今年上半年在咱们北京研究院，有一个题目请我去讨论，我讲了一些关于世界城市的概念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可能性。当然可能性肯定有，但是我的看法应该是任重而道远，不是说通过五年、十年建设世界城市，北京不可能。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观点呢？我们现在公认的世界承认在世界上面有三个城市，成为世界城市。第一伦敦、第二纽约、第三东京。北京要成为第四个世界城市，在五年、十年、二十年内基本上是看不见的，未来有没有可能性？未来有可能，通过我们的研究。

举一个例子，伦敦为什么能成为世界城市呢？我们知道它是全世界资本流的集中中心，全球100块钱在流动，有75块钱是从伦敦流出来的。东京成为世界城市，当然它过去是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被我们赶过去了，它的制造业，尤其是电子、通信，新技术这部分，它在20年过程中间，在危机之后它产生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北京要成为世界城市，最简单的一句，你把什么东西卖到全世界，你在全世界里面控制世界的生产要素的管理、流动和控制，你控制了什么？我们在过去有四大发明，有丝绸、有茶叶、有瓷器，我们现在把什么东西卖到全球全世界去？这预示我们需要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在这讨论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奠定世界城市基础，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建成一个世界城市。按照现在的增长方式，形成一个把我们的产品卖到全世界，把全世界的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这些要素集聚到北京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城市发展的基础。要有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开放的基础设施，才能集聚相关的这些要素。所以我们看世界城市这个词并不是一个新的词。1889年歌德就曾经使用了“世界城市”这样一个词。

在1966年彼特霍（音）英国城市规划专家写的一本书叫《世界城市》在这本书里面把伦敦、纽约和东京做了一个介绍，介绍它为什么是世界城市？它的世界城市的特征是什么？那么世界城市这个概念跟现在最近研究的全球城市，这两个概念现在相互之间有一些混用，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由于信息技术的变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流动性要素增加了，弹性的要素增

加了，在这样一个背景的条件下，全球的贸易方式也发生变化了，资本、信息、知识成为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是撒森提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北京下产生的城市就是全球城市的概念。

全球城市的概念并不是世界城市的概念，全球城市的概念在某一个领域，你在全球中间加入了全球网络里面去，发挥你在全球网络中间的地位的城市，我们叫它为“全球城市”。世界城市肯定是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并不一定是世界城市。研究路径里面有五个方面来研究这一种类型的城市，第一个是以跨国公司总部的选址区位分布数量界定全球或者城市的地位。在全球所有城市里面，你的跨国公司的总部有多少个，占了多少比重，这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来切入的。我刚才讲的75%的资本是从流出来的，那就是说你在国际金融中心中的位置是什么位置。

第三种方法是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来研究。前苏联那时候要做的时候让古巴去做糖，让中国搞农业，他们来发展工业，这叫国际劳动分工。什么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呢？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面，使得资本和技术流动，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趋势，经济的全球化，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把劳动力分成三种类型：一是做研究开发的知识类精英类的人；还有一部分是有技能的；还有一部分是蓝领的，出卖劳动力的。劳动力分成三种类型，在分成三种类型的过程中间，把研究开发生产力的这一部分集中在核心城市，比如在世界城市，或者是全球城市的领域里面在发展，把生产、分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是低经济增长水平的国家里面，这些劳动力一部分是有技巧的，有技能的，进入到管理层的，也就是白领的那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蓝领的工人，这样的一种过程就是说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按照这样一个理论，把全世界分成三个类型：一叫核心国、一个叫边缘国、还有一个叫半边缘的国家。核心国的就可能是世界城市，而在边缘和半边缘的国家是不会出现世界城市的。

第四种方法是从生产性的服务业的全球化集聚的角度来认识全球城市的概念。我们现在叫做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分出来。不是来研究实体经济，主要是虚拟的经济，软的经济型的这一块。这部分它在城市中间占的比重，我们现在讲起来是第三产业，当然第三产业里面我们又分成三种类型：一是消费型的服务业，开餐馆、吃饭、娱乐等。二是生产型的服务业，研究、开发、广告、会计等。三是我们的机关。所以在这三种类型里面生产型的服务业，它的水平，它对全球的管理、对资源的管理、控制的能力来看。你在全球中间站的位置，从这个里面来看我们的世界城市。

第五种方法是从世界城市的网络体系来看，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来研

究我们的世界城市，或者是全球城市。目前从学术界来说主要有五种方面，我们原来做世界城市的研究，我们要关注国际上面的学者，他们在关于全球城市或者世界城市研究的方法。

讲到北京，北京整体上来说它的趋势应该是向世界城市转变，这个城市究竟是在中国、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这个都在演化过程中间，但是像中国，我们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家，人口也是最多的一个国家，在加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中间，它必然会形成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城市，对世界的资源能够起管理、调控作用的城市，这种类型的城市肯定会产生。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从学术界讨论是完全有必要的。

今天讲关于北京四个方面的回顾，一是传统的北京它的发展路径是什么；二是城市发展规划中间我们离世界城市，或者全球城市之间是否有距离；三是它的可能性、目标是不是朝世界城市方面走；四是我们要成为世界城市，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从北京的发展轨迹来看，作为一个城市我们差不多有三千年的历史，作为一个首都我们有八百年的历史，这样一个城市的过程，大都当时建的就是全球的意义，不能说是世界城市，但是当时肯定是有全球的意义。从东西方的影响力，东方和西方的文化里面核心的这一部分，传统意义上来说北京要比上海更具有优势，要从历史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这些角度上面来说北京市成为世界城市，在这两方面我们是有非常多的优势。因为上海怎么来说它是一个新的城市，对于北京来说是一个新城市。

1949 年以后，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时经历了至少可以把他分为三个时期。由于时间关系，我接下来说一下挑战。

我们要建设世界城市，总体上来说我们认为应该有几方面的挑战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第一，社会的公正问题。

第二，环境的问题。

第三，奥林匹克后的这个时代的城市发展的问题。奥林匹克运动我们开了肯定对北京市的发展是划时代的意义，奥运后我们的北京我们的首都它的发展在什么台阶上走。

第四，关于文化的商品化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东方的文化，我们中国的文化的价值观，现在讲儒家的这些文化这些地位，怎么成为我们东方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发扬光大的地方就在北京。

第五，管制。我们有很多问题，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文化的、历史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我们怎么样实施管制。另外，怎么来转变我们规划的性质，我们怎么能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城市、中国的首都转变成为一个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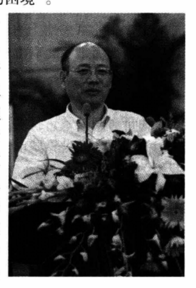
界城市，这个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本身就是一个首都，这个首都是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的首都，要把它转成世界城市，世界城市实际上就是世界首都。这样的一个定位上面功能定位上怎么发生转变，这是我们面临的几个方面的挑战。时间有限我就暂时讲到这里吧。

主题演讲 6

北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困境

杨开忠：

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参加这么一个研讨会。去年年底北京市市委市政府提出来“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这么一个论断以后，我先后在 20 多个场馆，跟不同的学者、专家、领导交流和报告世界城市的理论和实践。目前我又在主持编制北京“十二五”“世界城市”发展规划。包括我今天按照会议要求，我想讲“世界城市”建设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这方面的问题。我的题目叫“北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困境”。



我想讲的是困境与出路。现在在这方面是各有各的理解，我想最基本的方面恐怕有三个方面，为谁发展？发展什么？如何发展？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三个问题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获取我们北京的竞争优势。根据麦克波特竞争优势理论，我们提出来三种经济发展方式：第一种要素驱动，主要讲初级要素，它的驱动力主要是通过低廉的初级生产要素来获取竞争优势，它发展主要是以劳动和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为谁发展从宏观角度来讲主要是需求导向。第二种发展模式是规模导向，我们往往称为投资导向。第三种创新渠道、创新导向。这三种方式它发展什么？为谁发展？怎样运作和发展各自有自己的特点，我就不一一的介绍了。

第二个问题我想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北京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我个人看来已经跌于一种困境。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较，北京发展水平是显著落后的，北京经济发展方式有三个基本问题，但是核心的就是竞争力，竞争力的核心就是生产率。拿生产率来看，北京的显著低于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在劳动生产率上，2008 年北京劳动生产率仅仅相当于

2003年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的17%、18%～20%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是非常落后的。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的发展方式不断优化，这个从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进入到21世纪以来，北京相对于全国来讲，它转变的发展方式的发展速度在放慢，这个红线大家可以看出，进入2000年以后北京的生产率相对于全国生产率这样一个倍数。（见图）2000年将近4倍，下降到目前的2倍多一点。为什么这样一种跌于困境，现在北京市它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面对这样一个困境，在多方面表现出来。我当时概括了四个方面：一是北京的人均GDP严重滞后于GDP的增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影响了北京生活质量相应的提高。

从刚才顾教授讲到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以及生产型服务业本身的网络地位来看，它现在作为世界城市已经排到全世界第三位，生产型服务网络全世界排到第九位，这是外国人排的，是相当高的。但是一旦按生活质量排的时候，北京的地位大大下降，大概是70多位。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来，近年来北京的人均GDP增长跟它的GDP增长的差距持续保持，并有扩大的趋势。第二方面导致了北京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非常突出。大家知道这些年北京每年增加的人口数量是越来越大，早期大概每年35万，前些年奥运会左右是大概45万～50万，去年公布的是60万，实际上可能达到65万，也就是说现在每年北京增加一个大城市，所以导致北京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非常突出，交通拥挤，房地产价格高起，环境质量问题难以得到根本上的改观。

第三，社会的两极分化。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数据，北京城镇高低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由2000年3.3倍，扩大到2008年的4倍以上，实际上我估计差距还会增大。

第四，由于发展方式转变陷入困境，所以北京它的知识产权的国际垄断优势现在是相当的缺乏，在全球的辐射力非常薄弱。我们从北京的服务贸易可以看出来，高级的服务贸易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知识的贸易，北京现在在服务贸易里面真正占主体地位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些传统的服务贸易，像运输、旅游，以及建筑安装与劳务承包。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像质询服务，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这方面占的比例相当的低，远较不及伦敦、纽约和东京，也赶不上新加坡。

北京的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进入到21世纪以后它转型相对放慢，而跌于困境。我想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初级要素的比较利益的机会成本。我们国家尽管这两年初级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比较快，但是我们跟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我们这个劳动力价

格，包括现在的资源价格和环境的服务价格仍然是相当的低。另一方面，北京在全国这样一个初级要素的市场之中，它是一个高度具有竞争优势的。外地农民工为什么往北京跑？因为生活水平各个方面条件都好，所以北京的发展依靠初级生产要素可能说有非常、非常大的空间，很多人愿意到北京来，这就导致北京普通老百姓工资很难迅速的上升。我们现在北京最低工资在全国不是最高的，多方面原因，除了政策以外，其中就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要求企业家，要求个人放弃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去进行创新，把发展转移到依靠创新的轨道上来，这个比较利益的这个机会成本相当大。我在做国家的“十一五”京津冀和长三角的创新体系规划中，我们调查中很多企业给我们回答是，我干吗要创新，我现在用初级生产要素赚钱很好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二是规模利益的机会成本。中国市场非常大，比如我们讲课，可能在座的各位老师都讲过课，老师教学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也搞研究，我相信相当一部分老师把精力放在到处讲课，为什么？我们国内市场比较大，我们一个 PPT 可以讲若干次，面对不同的细分市场，每次可能 1 万块钱、2 万块钱、3 万块钱、5 万块钱、甚至 10 万块钱，这么高的收益我为什么要放弃，从而进行创新呢？没有动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老师就把精力放在不断地讲一个东西，在北京、在全国各地进行循环演讲，收益很高，但是我们的创新没有。

三是高创新风险。由于我们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相关的社会诚信的文化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创新的风险非常大。我们缺乏知识产权保护。

四是分割。知识、人才、资本这些要素的分割，产学研之间的分割，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这使我们创新的成本也变得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从要素驱动型、规模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遮阳的一种转变，它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

怎么走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困境？从六个方面同时推进，缺一不可。

第一，我们北京应该制定和提升产业的准入标准，实施更加严厉的产业发展的许可证制度。

第二，想办法提高最低的工资标准，严格执行企事业单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高用工成本。劳动的价格真实反映在北京的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的情况。

第三，改革户籍制度，实施严格的人口准入制度。现在在座很多人不离开北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离开了回不来，假如我离开北京以后能够很容

易回来，我想你该离开北京就会离开北京。另一方面要实行严格的高标准的人口准入的制度。人口准入制度在美国各个州之间都是存在的，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转型的国家，在我们这样一个二元经济十分突出的国家之中，我们特大城市的人口准入的标准和程序可以更加严格。

第四，实行严格土地，包括房屋的用途管制制度。现在一个房间经常八平方米住八个人，这在美国是不可以的，美国不仅仅这样不可以，美国很多城市一家老小三辈住在一块都不可以，爷爷跟孙子住在一个房子里面都不可以，都是犯法的。当然我们不一定这样严格，至少我们应该规定有些用途的限制，我想北京应该探讨这样一种东西。

第五，实施更加严厉的节能降耗减排政策，提高节能、节水和环保的标准。现在环保标准跟欧洲美国城市比较起来是相当低的，所以我们应该花大力气按照国际城市、世界城市的标准去提升我们的节能、我们的环保标准，但北京有自己的地方发展情况，节水可能是北京非常特殊的，所以我们要有特殊的标准。

第六，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创新环境，降低创新风险和成本，包括专利的保护制度，也包括城市文化的建设。现在在国家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里面已经有了很多政策，这些政策对我们改善环境都非常有意义。最近中关村要推进人才特区的政策，我想这都非常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创新环境。由于时间关系，我简单的报告到这里，谢谢各位。

互动与点评

主持人（庞中英）：

还有五分钟时间，分别给教授提两个问题。

张贵祥：

杨开忠教授在我们首都圈论坛每年都来，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清华大学的顾朝林教授，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因为他在地理学界是研究国际化真正的专家。国家化方面都是他负责。我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北京现在建设世界城市实际上是面向未来，它有好多机遇和挑战，但是也遇到好多问题，比如挑战国际形势、政治军事的格局，再有我们碳汇这方面，国家碳压力也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建设世界城市压力也很大，虽然有很多机遇。请两位介绍一下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节能节水转变发展方式，另外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实际上和世界城市相比差别还是很大，制定“十二五”规划有哪些抓手，怎么解决这些矛盾？

张智新：我刚才听杨教授说走出困境提了六条建议，您提到严格产业准入和严格人口准入，我想问这两个准入和您所同时追求的那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人口的自由流动，他们怎么处理这个矛盾？

主持人（庞中英）：

现在请杨教授先回应。因为顾教授是第一个发言的。

杨开忠：

首先我回应第二个问题。这是不矛盾的，在原则上应该说自由流动的要素。但是自由流动如果它会影响带来一些外部性的话，带来一些社会问题的话，政府基于这个东西还是可以进行干预的，所以从理论上不矛盾。从实践上来说，即使在美国这样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它们对人口的流动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管制。比如从这个州到那个州，你要享受州民的待遇比如你要享受这个教育，享受居民的待遇，你至少在这里呆一年。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都是不矛盾的。

刚才讲北京世界城市在当前低碳环保上，面对这样一个东西怎么有一些抓手。第一，我觉得面对当前绿色、低碳、环保的时代，我更觉得不能够简单把它看成是我们发展的一种保护环境，发展的一种负担，实际上现在绿色、环保、低碳已经成为我们在全球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方式或方法，所以我们建设世界城市要抓住这个机遇，大力的发展绿色、低碳和环保经济。这里面包括低碳市场和环保商品，这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机遇。在丰台丽泽金融商务区我特别强调他们，一定要把环境商务作为你们发展非常重要的方向。

第二，当我们建设世界城市，北京打好绿色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仅仅有绿色还不行，下一步怎么推进世界城市建设，除了绿色以外，我个人感觉有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世界城市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东西，纽约、伦敦、东京跟北京比永远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是一样的问题，世界城市就是对于全球经济有控制力的城市。控制力来自于什么地方？归根到底就是对全球经济进行控制。一种是你有人家没有的知识产权，所以我掌握着诀窍，即使我跑到南美洲那去我人生地不熟，但是我能把当地打败，我能控制当地的生产消费，所以我们要下大决心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真正把知识财权的垄断优势提高到我们的战略高度上来。二种从根本意义上讲，因为具体有很多抓手，怎么使我们的跨国公司，现在尽管全世界500强，北京已经排到第三位，但是我们的500强北京占到80%，大部分应该是关起门享受的都是大国的公共经济优势，没有形成全球的网络，形成全球的布置网络这

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这可以解决国家走出去战略进行大力的推进。

主持人（庞中英）：

请顾老师回应一下。

顾朝林：

我前面特别强调，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要把什么东西带到全世界，你凭什么控制世界的资源，世界的网络，凭什么？我们目前这样一个时期，不是东京形成世界城市时期的背景，东京当时通过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电子技术它形成了。我们现在凭什么？我们现在是绿色经济，碳方面，我们现在是最大的一个排放国，碳排放也是最多的，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形成我们低碳的技术、低碳的产品等，这可能也是一个机遇，在这样一个机遇下面，也许我们能够从这里面走出来，能够形成未来的世界城市。

举个例子，碳上面，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产业。怎么搞循环绿色经济。第二个是交通。交通现在动车高速铁路，我们马上要卖到全世界去了。三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里面我们有东方文化的传统，消费的模式，也许我们从这里面能够走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我用的是"也许"这两个字来说，那抓手是什么？抓手是创新，没有创新就形不成产品，没有产品卖到全世界，你就不可能成为世界城市。

主持人（庞中英）：

谢谢顾教授和杨教授的精彩演讲，我们挑战是巨大的，困境也是切实的。但是出路也是有的，问题与治理，两位教授提供了基本思路和解决方案，我们第一节是批评性质的，我想会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有积极意义的。我这一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主题研讨四

主持兼点评人：北京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成贵

主题演讲7　建设世界城市与小城镇发展模式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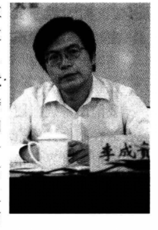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　邱爱军

主题演讲8　建设后工业形态的世界城市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城市学院院长　段霞

主持人（李成贵）：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的讲演。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成贵，在这之前我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了15年，这次组委会给我们农委发了邀请，邀请一把手王晓东来，但是他比较忙，考虑到我在我们单位分管研究，所以就派我来了，本来我原计划如果有时间我讲一下我们农委农口对世界城市的一些观点，因为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这边跟组委会联系说已经排好了，说最后让我来主持一下，当主持也是我的荣幸，所以我非常高兴。接下来这一节我们有两位演讲，一位是段老师，组委会的秘书长；一位是邱爱军副主任，他是发改委下面中国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的。首先请邱爱军主任演讲。

主题演讲7

建设世界城市与小城镇发展模式的选择

邱爱军：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向大家学习。上午和前面已经介绍了很多关于世界城市的理论，我们作为一个政策研究的部门，对理论的研究不是那么多，从政策研究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在发展世界城市的时候，那如果说把小城镇放到这里，我们的机构主要是做小城镇发展的研究，在全国做一些调研，进行一些政策的总结。

去年我也承接了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的课题，做了北京市小城镇发展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北京提出了“世界城市”。但是我在看这些世界城市相关理论和文献之后，再反过来思考北京市的小城镇，如果把北京小城镇放在整个大环境来看，我们可能需要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才能来看小城镇的发展是不是能够向上午卞洪登先生提的那样，我们都发展山区，把山区架成新的高速路，在底下做各种各样的空间，因为时间有限，我就讲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小城镇的现状分析；二是小城镇的发展模式和现状。

北京尽管它的人口比较多，但是跟省份相比，作为一个直辖市它的总体经济条件还相对较好，总量上可能能够支持小城镇和乡村的发展，2009年人均GDP超过1万，城乡的恩格尔系数也比较接近，在2009年看到城乡收入比也下降了，而且低于全国水平。但是这些都是取决于北京市财政对乡镇的一

些支持，这跟全国相比它的支出也比较高。

第二，从北京市全市来看区域的乡镇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较严重。我们做了一个数据的比较，山区乡镇和平原乡镇来看做比较的话，经济总收入、人均经济总收入和一般经济收入都有一些明显的差距，具体的数字在这里，可以看到人均GDP准收入乡村仅仅占了不到30%，而镇里准收入也40%都不到，财政收入差距更大。如果说整个数据放到里面，差距就更大了。



第三，北京市乡镇数量比较多，从人口规模看比较少，我们根据1999—2007年数据来看，东部和上海实际上它进行了一些扯乡并镇的一些做法，但是北京在这方面截止到2009年还比较慢，总体来看规模比较小。从每个镇的人口数量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北京和上海的差距就很大，当然我们在这里还放了天津和东部地区，因为这里还有一定的比较性，当然我们讨论世界城市的时候，可能往往只是看北京和上海，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差距是非常大的，镇均人口变化在上海很明显冥想的看2003—2007年有一个突变，但是北京没有。因此，人口的集聚程度有待提高。前面我们整体讨论北京可以看到城镇化很高，2008年是84.5%，但是如果来一个一个的看，来看一般乡镇和重点城镇的时候，用“城市化率”这个词会有人不能从那么小的区域看，我们可以说它是城镇人口的集中度，可以看到镇和全市的水平差距非常大的，连一半都不到。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要建设世界城市，我们把乡镇考虑在内的话，那整个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是非常大的。而在全国来看，2008年小城镇镇区人口超过10万的镇有152个，北京从这样的角度比差距比较大。

第四点，建制镇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我们用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来看，用企业人均缴纳税金和单位面积用电量、人均财政收入和就业密度进行了比较，看北京、上海和东部地区。从图上可以看出，因为2008年的数字没有公布，所以我们采用的是2007年的北京和上海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但是从这上面来看，跟东部从经济上来看，实际上你看后三项指标的时候，北京和东部的差距后两项指标还是差距比较大的。前面人均缴纳税金，这个有一定的不可比性就是说有一点，总体上还是可比较的指标，但是因为有一个注册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可能就有一些差异了。这个是三次

产业的比重，在这里看似乎北京市的小城镇的三产比重比较高，好像是说是不是说发展程度比较高，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在细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实际上是相对较弱的方面。因为上海市的二产比例高，经济量就大，带来的就业和整个经济发展东西就多，而北京的三产比例虽然高，但它属于低端的一些服务业，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它的发展水平还相对于上海来说是比较低的。

因为从乡镇人员数也可以看出来，它容纳的就业量还是比较小的。这个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比较，北京小城镇的三产分布在比较多的地方，但是由于它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大概的效果是富民不富镇的结果，可能北京市的农民没有数据上显示得那么低，是比较富的，但是如果从镇整体来看比较弱。第二个是土地的制约，从产业来看，北京叫就业基地，基地比较小，布局比较窄，形成的经济力量不是那么强。

我从上海和北京的比较来看，有两个原因：一是北京本身因为它不是制造业的中心，所以它对小城镇的辐射比较小。二是北京向周边转移的时候，很多产业布局在市周边，小城镇接受辐射比较小。上海长三角地区的小城镇也好，县市也好，上海的小城镇形成了很大的支撑，所以它的发展要强一些。但是我们比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时候，发现北京的条件还是相对水平要高一些，我们用了卫生、教育、医疗、图书、剧院等这样的人均指标来看，发现总体上的水平还是不错的。路网密度差距也不是特别大，基础设施我们用了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这样的一系列指标，这样的成果跟“十一五”期间北京市采取的五项基础设施工程等这样一些工程的实施是非常有效的，从全国来比，北京市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做的工作是相对较多的，而且效果也比较好。

现在有一个新的变化，北京市进行了一个乡镇的调整，原来的乡镇 183 个有 68 个纳入了新城，这样就确定了 42 个重点镇，其余有 73 个一般的乡镇。北京呈现更为集中的发展趋势，而不是放射性的，这样和上午一些专家讲到的，如果你不能够迅速地把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增长和中心的连起来的时候，扩散的效率和吸纳的能力就发挥起来没有那么快。

我的基本判断就是说，小城镇的经济发展滞后现在制约了北京市的发展。另外现在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式是一个关键因素。我们来看已有的地方，总体上有五种，一种是农民自发推动型的。温州龙岗。二是大企业推动型，比如浙江横店影视中心。三是大项目摆放型。把上海市的汽车产业园摆在了安亭，国际汽车城放在安亭。这样就整个发展起来了。四是村级经济推动型。天津大寺镇由于每个村都很强，每个村都发展产业，所以推动了整个镇的发

展。市场需求导向型。河北崇礼西湾子镇，虽然离北京有点远，属于张家口，但是以北京的人口为服务对象，来发展他的滑雪和旅游，结果反到成长起来了。

这些地方都运用了一些市场化的基础设施的应用模式，这一点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北京没有用的那么多。另外上午大家都谈到了，发展有很多是基于土地，土地到底怎么样用，一方面上午的专家提到，向更多的空间拓展，另外改变现有的制度。我们现在看的这样几个模式，在现有的制度下，做一些政策的改进和尝试，这里有几个例子和大家分享。其实北京的“小产权”的改造，现在还不能做到把小产权变成合法的大产权，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是不可以的，做一些改进是可以的，我这里提到了，北京的“小产权”、天津的“宅基地换房”、嘉兴的“两分两换”、四川省的“金土地工程”、重庆的“地票市场”、广东的“三旧改造”，他们分别用不同的形势，其实核心是农村怎么样在现有的框架内做一些改进，使它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能够促进小城镇的发展，使得小城镇的发展过程中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利益，由于时间限制，我不再细说了。

最后，我想北京小城镇的发展，一是要强化服务，二是提升质量。强化服务是指围绕中心城区的人口的生活需求，发展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二是围绕中心城市的休闲需求发展沟域经济，在沟域经济里面已经发展了很多，但是现在档次可能需要提升，需要有更多高品质的。如果我们到国外考察的时候，规模上不一定高，但是上午文魁老师讲到你要看流量，如果你是小城镇人口少，但是流量大，你就可以做强，我们在做沟域经济的时候小城镇的人口少流量做大。

第三个是依靠中心城区高端机构需求，发展高端会务经济的，我们在边缘地方有很多好的资源环境，不要说山区没用，实际上山区为了高质量的空气和水在起作用，在那些地方我们可以发展更高端的，收费更高的一些服务。

第四个是环保，新型的产业在北京有很多机会。

最后一点文化中心内在的潜力，打造文化创意基地，可以在小城镇做得很好。谢谢大家！

主题演讲8

培育适应后工业发展的新经济形态

段霞：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前辈、老师，还有领导。今年会议主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世界城市基础”，有一些体会希望跟大家分享。



今天很多专家提到世界城市对全球体系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些是人家奋斗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的结果，而不是因，不搞清楚世界城市的发展动力，单纯强调 GDP、人均 GDP 和各式各样的国际流量、交往指标，会本末倒置。世界城市的本质是具备服务世界、辐射全球的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本质性要求会有所不同，但是衡量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能否代表今天城市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尽管国内大多数城市还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欧美国家的大多数城市却转向后工业阶段，这样一个变化确确实实在欧美国家的大都市发生了。

今天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就要研究城市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通过发展培育适应后工业社会发展的新经济形态，通过努力够上今天世界城市文明的新高度，成为代表城市发展未来与方向的榜样性城市。

后工业社会是指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后，社会进一步发展呈现出与工业社会不同的诸多新特征的社会形态。这些新特征包括：

（1）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资源依赖、环境依赖转化为知识依赖、人才依赖、创新依赖；

（2）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型、高附加值、高创意型经济组织为主，金融、信息、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成为主要组成部分；

（3）企业管理从指挥命令型转向激发创新型，产权意识、品牌意识、低排放意识、文化意识、国际竞争意识明显增强；

（4）国内和国际市场打通，生产型社会逐步向消费型和可持续发展社会过渡，知识分子地位上升，学习型、创新型社会建立。

（5）政府组织的职能从指挥型转向服务型，国际意识和国际交流能力上升，公民意识增强，各类社会组织的地位上升，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上升，强调多元和谐和复杂性社会问题的解决；

（6）文化凸显多元、开放和大众参与特点。社会由物质消费型逐步转向文化消费型，文化创意成为社会生活的本质组成部分，休闲文化、娱乐文化广泛普及，高雅文化、专业文化创意能力提升。

（7）具有鲜明民族性、历史感和区域性的创意产业和文化事业，成为地区文化认同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人文素养水平成为评判个人、组织、城市、社会发展的标志性准则。

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北京已率先迈过了后工业的门槛，各种数据都证明了这一点，北京的城市禀赋、容量和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特点与转向后工业的特征吻合。刚才陈主任说不要讲太多概念，证明数字我就不讲了。一个结论是北京第三产业已经超过了75.8%的GDP比例，吸纳的就业人口超过了73%，知识阶层、受教育程度、白领阶层比例，还有知识阶层在社会结构的中轴和控制作用，证明北京已经迈过了后工业的门槛。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如果按照工业社会要求来讲，北京受资源禀赋区域位置的限制，它可能无法建设成一个工业时代的世界城市。而后工业的非物质型生产的特征，赋予了北京这样一种历史机遇和发展前景。因此，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不仅要研究世界城市的一般特征，更重要的是研究发展阶段特点，形成后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新的发展方式。

培育适应后工业社会发展的新经济形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现在我们老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知道发展休闲产业、创意产业，但往往停留在口号、概念上。后工业社会对很多工业社会的发展理念、财富创造方式、运营管理方式都是颠覆性的，比较遗憾的是这块研究比较少。比较这两种形态我们会发现。

一是工业社会追求效率优先，关注GDP，后工业社会更关注人的幸福。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一是全球化的发展，大量产业转移出去，大都市留下了跨国公司的总部、研发机构和相关的服务业，这个过程中，世界城市因为对全球经济的服务成为了重要的节点，从而有了掌控能力。另外，后工业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也使得在收入支出中，人们的物质性消费占的比例很小，消费主要来自于精神层面，内心的感受和自我价值实现，所以，在工业社会是理性消费，买东西价格优先，到了后工业社会消费需求更加多样化，因为每个人的内在需求不同而变得感性。

二是创新、创意、体验、学习与服务一样，成为创造高附加值经济的新

方式。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人类实际上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发展到出现了第四种经济形态——体验经济，在我们提经济方式转变时，不能仅仅关注高科技产业和新型环保型产业，还要特别关注创新、创意、体验、学习这样一些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前段时间文化部社会发展中心负责人问我，我们有很好的非遗产品，为什么卖不出去，关键是卖什么和怎么卖？工业社会卖产品，后工业时代不仅可以卖产品，卖个性化产品，更重要的是卖体验和感受，在创造体验环境、讲授故事的环境中发展城市的观光娱乐文化教育等产业，创造新的非物质财富生产方式。我们国家的展览馆、博物馆，还有各式各样的文化消费演艺场所，依然是一种宣传与展示场所，远远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变化。

三是制造业要从单一流水线产品向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个性化定制生产发展。在工业社会因为理性消费、价格优先原则形成了统治性的产品大规模生产，在后工业社会中信息技术可以通过网络使厂家了解客户需求并完成个性化生产，发展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品种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商品已经从过去的等价交换发展到可以一物多价。工业社会通过流水线完成的产品，在后工业社会只是一个半成品，还可以通过个性化定制这个阶段加以完善。比如在网上订购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对别人只有喝茶功能，但也许这个杯子是爱人送的，上面有他的照片和祝福，对定制者有着特别的意义，他愿意用十倍、二十倍的钱去定购它。在这样一个个性化定制过程中生产的产品与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就存在着一个价格差，类似于甚至远远大于过去的农业和工业产品之间的一个剪刀差。这是我们在经济转型中需要关注的。

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思考怎么样才能以知识产出为标志，改造一产和二产，创造新的非物质性产品，研究后工业社会的财富创造方式。比如在伦敦有专门为电影公司服务的机构，无偿提供电影公司需要的各种伦敦的信息，而且还提供资助基金，但是有严格的眼球，比如必须以伦敦为背景，讲述伦敦老百姓的故事，规定吸纳当地人就业的比例等，目的是吸引大家关注伦敦，做成真正的眼球经济。另外，建设后工业形态的世界城市，最重要的是培养具有后工业社会创新能力的人才，通过一种学习体验型的城市环境去培养这样的年轻人。现在北京缺乏这样的环境。上个月我去布鲁塞尔动漫馆，那里有长达两公里长的涂鸦大道，城市的美不仅在于他的建筑，而在于他是否充满灵动，建筑会说话，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能够讲述城市的历史变迁和魅力故事。这样的城市才是代表后工业文明发展的城市，才能培养出新的社会形态需要的新的生产性要素，真正成为非实体经济中心型、非物质财富消耗型、非物质独占型的世界城市。

北京正在建设的世界城市是后工业形态的世界城市，到目前纽约、伦敦、东京也处于探索之中，没有现成经验可以照搬。北京能不能顺利完成这样一种转型，一定要去研究后工业的特点，要考虑转型成本，考虑需要多长的时间去完成这样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间，北京要放慢经济速度，也许全国保8%的增长率，北京不一定“保八”，三大世界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或者90年代都有一个经济发展的低谷，我们允不允许北京有低谷。在转型过程中退一步是必要的，是完成转型创造条件，必须的蛰伏。否则可能会丧失机会，像底特律、曼切斯特等转型不利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因此，要对北京今天的发展阶段有清醒的认识，必须看到这种变化，并积极做好战略调整。为了转型必须放慢经济发展速度，要向中央讲明情况，不能跟着全国一盘棋，要有超前的政策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还不只是考虑内涵指标，更重要的是大的战略谋划，需要有大的智慧。谢谢大家!

互动与点评

主持人（李成贵）：

感谢段老师，很独到的思考，还有一些文化的品位。段老师刚才提了一个概念我觉得特别好，城市品质，这个词非常深刻，我利用主持人的特权，稍微讲一下我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我到市农委以后，关于建设世界城市主要提了两个观点，一是发挥“三农”的作用，提升北京的城市品质，要改革土地制度，做成北京城市建设的战略空间。昨天下午这会市委召集我们开会，“十二五”北京农业的发展，我们说北京农业应该是北京世界城市的第一张名片，比如坐飞机来到北京都是从上面往下看，从远往近看。北京搞农业要重视高速走廊，在一个是沟域经济，我们要充分认识农业在世界城市建设中的价值，我们说北京的GDP是1万亿，我们在计算一下北京市的农林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也是1万亿，而且还有一些没有计算的，爱因斯坦说了可计算的都是不重要的，不可计算的都是重要的。我们认为“三农”提升城市品质。

二是世界城市建设要特别关注土地利用。北京要特别关注城市土地利用，1.64万平方公里，2000万人口，我去了锡林郭勒，它一个乡的面积比我们北京都大，前几天我到昌平走了一圈，50公里的沟域经济，发现山沟里面一小片地一小片地，比如就我们这一块地也是保护起来了。农机不能用，水都无法导但是你不能弄，我们跟中央提了我们要因地制宜，我们20世纪50年代搞3000字的文件，13处讲这个因地制宜，异地的占补挂钩，我刚才看问校长

看这个华北，我认为这个站的比较高，我认为他还是站的比较高，这是一定要有区域的概念，刚才邱主任讲了一些全国的情况，包括这个重庆，5 月份我和厉以宁去重庆调研，看这个的票情况，我们北京市要搞，我认为北京市要搞，至少是临近区域我老家是张家口。承德保定这一块，北京去那边搞点土地，北京多一些建设用地，这边的房价降下来，那边的农民也受益，承德那方面，这个问题在提，但是这个问题难度比较大，现在国土资源部有一个文件在征求意见，前几天我们政协委员提了 13 条意见，他们吸收了 5 条，其中就有现在的异地占补平衡挂钩啊，已经收缩到县一级，这次国土资源部明确规定以县为单位的，这个事情啊北京世界确实面临这些问题，我们在研究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我呢利用自己的特权啊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观点，现在按照规定，还要给两位演讲者提个问题，一个嘉宾一个问题。

李义虎：

段霞这个会我们参加过好多次了，每一次都有收获。这样一个问题也是一个信息吧，段霞研究课题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信息，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般的杂志，但是，北大的一个教授孔庆东写的，他写这样一个题目，说我们国家计划要建设三都，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北京都、上海都、中国香港都，中国香港都是中国香港、澳门、深圳。上海都以上海为中心，把昆山、苏州垄断到一块，然后推动发展。这跟北京东扩，以及除了原有的北京市范围之外，京津冀这样一个范围，在功能、在品位上重新整合，然后建成北京都。他那篇文章我看了已经几天了，可能记忆上有点问题，但是我记得可能还比较准确。我第一次听说有这回事，我在其他场合参加讨论，比如全国人大还没有议论过这事。但是孔教授那篇文章的口吻就是这个事比较肯定的了。大陆整个区域规划都要重新调整，比如新疆，按照基本的设想就是南疆省和北疆省。这样的信息在研究的时候，还包括发改委的主任，站的层次更高了，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些信息，或者对您这个研究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段霞：

他刚才说的如果在区域经济中间，学中文的，他们比较讲究名词，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三大都市圈，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在您讲的过程中很重要的现象，为什么现在有区域的重新整合？比较有意思的，我认为跟后工业相联系。在过去的工业社会是权力型的、中心型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的城市都是按照行政区划来做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所有的城市为成为全球经济文化体系或者经济政治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来参与这样一个分工。它的大节点会带动小节点，在这个问题上许多的地区都在发生变化，无论政府允不允许，这么多城市搞大都市在批评，但是自觉不自觉地进

入到国际化过程之中会出现的。到后工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去中心化、去等级化，去这些化的过程中间，它慢慢的就会是更强的一种地区合作的自主选择，国家为了吸引这种变化有一些安排，包括西部的开发，整个这样一个过程都是全球发生变化，国家也需要这种战略安排，地方发展也需要，同时建设世界城市也需要这种腹地。包括刚才李主任也讲，到底农业农村在世界城市中处在什么位置？农业不仅仅说它是世界城市的一个基地粮仓，它更重要的是未来世界城市的一个美丽的图画，甚至包括邱爱军讲的类似于小城镇的农家乐好多的设计，它如果做好以后真的是一片很好的体验经济和创意经济的组成。

主持人（李成贵）：

现在学者想说什么观点都可以，包括网络很多各式各样的说法。大概10年前，我提出来中国行政区划很长时间没改了，这个问题我想中国几十年没有搞这个事，正声车市，县市不能市管县，可能以后也需要搞。我从学者变成官员，到政府以后，我需要政策必须形成气候以后，很多事情不是某一个人冒了一句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进不了视野，听到了它也认为过于超前了。

主题研讨五

主持兼点评人　北京社科院外国问题研究所所长　白志刚

主题演讲9　打造世界图书、音像制品和文化买卖收藏之都——一个文化创意与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在北京发展的定位
北京发行集团总经理　李湛军

主题演讲10　打造国际美食之都：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餐饮产业定位
东方美食杂志社社长　刘广伟

主持人（白志刚）：



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大家好。以上的发言都非常的严肃、庄重，现在的两位学者和领导发言一定会引起大家更大的兴趣，从他们发言的题目来看都是关于文化产业的。但是什么是文化产业，我个人理解就是有关老百姓，说的再通俗再白一点就是吃喝玩乐。现在请二位老总、社长跟我们谈

谈吃喝玩乐的问题。首先请李湛军总经理、研究员给我们演讲，大家欢迎。

主题演讲9

打造世界图书、音像制品和文化买卖收藏之都

——一个文化创意与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在北京发展的定位

李湛军：

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大家下午好。去年的时候在北广传媒任职的时候管的是新媒体，书里有我去年的一个稿子，去年的标题是“城市突发事件下的市民恐慌心理的疏导和引导”，后面是吆喝的手机电视。今天又转业变成的卖书人，所以今天又吆喝卖书。今天根据文化创意产业的命题，我想了一下，打造世界图书、音像制品和文化买卖收藏之都，这个题目我没有起好，但是下面的内容是我思考的问题。

我现在讲一下北京市按照中央文化创意产业的精神，今年有了比较大的动作。2010年5月31日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成立，北京市出现了第一家资产规模超过200亿特大型国有文化产业集团，眼下正在进行的北青报和京报集团的资源整合将会让北京市出现第二家资产超过百亿的特大型国有文化产业集团。目前，北京发行集团也正在根据中央和北京市委关于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指示精神，思考下一步进入资产规模和经营收入超过200亿元的发展战略。



我今天讲六个问题：一、不同地域不同资源不同优势的城市需要有不同的定位、不同的产业设计和不同的产业布局。我们知道，一个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定位有其特定的规律，不同地域不同资源不同优势需要有不同的定位，不同的产业设计和不同的产业布局。比如，美国的洛杉矶是电影之都、英国的伦敦是创意之都、东京是古旧书店之都，在东京竟然拥有2000多家古旧书店，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到东京去淘宝，我们在东京待了两天，采购了1500万的文物，很多文物在中国是不容易找到的，我们采购大量的，很多国家的文物都到东京去，法兰克福是会战之都，韩国首都首尔附近的波州市是一座国际图书城。我们还注意

到不同的城市对产业发展有不同的追求，一个国家对它的文化产业布局也有各自不同的强调，英国强调的是博物馆和体育，美国强调的是版权产业，日本更多强调的是动漫，韩国是韩剧和游戏。之所以不同层次、不同国家对自己的文化创意产业有不同的发展定位，是源于文化创意产业布局有它的特定规律。

北京的定位是什么呢？北京未来文化产业标准，应该以什么为主？什么行业的创意产业内容更能彰显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的独特风采和魅力呢，这就引出我们下一个话题。世界级城市标志性文化创意产业标准和条件。作为一个世界城市，它的文化创意产业不可能是单一的，不仅需要丰富多彩的各类文化产业，而且还需要文化创意产业整体的发展规模，它的发展态势也是比较高速发达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都要追求等量相关，全面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一个城市没有标志性的文化产业，首先，它根本不可能进入世界城市的行列，其次，它也不具备独特的世界文化影响魅力。

那么进入世界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标准有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有几条：第一，该产业是否已经形成固有的市场盈利模式，如果是靠财政补贴圈养的宠物性行业，那属于公益事业，公益事业如何能进行市场，成为持久产生利益的创意产业呢，如果仅靠政府拨款，或者依赖特殊政策给予的市场垄断生成模式，这样的行业可以做大，很难做强，最后很难发展成世界城市标志性行业。

第二，该产业虽然已经形成固有的市场盈利模式，但是还是不行，还必须是看它是否已经形成具有市场核心竞争力的态势，如果没有形成市场核心竞争力，那么这样的产业也是无法做大，更无法做强的，随时有可能被击垮和被淘汰掉的市场风险。所谓市场核心竞争力，主要指的是具有可持续的别人无法竞争的市场经营能力。

第三，该产业还必须具有产业规模化生产模式，特别是要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或者是能控制上下游产业链的延伸，市场销售和产品调剂并具有市场的扩张能力，不是仍停留在以往的小作坊经营模式。

根据这三条来衡量，我认为北京目前具备成为世界城市标志性行业条件的文化创意产业屈指可数。比如，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局面？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产业由于客观环境相关政策历史成因，以及转制改革起步晚，所以很多距离世界先进城市的差别比较大。要么它们可能是做的比较大、做的比较强，但是一旦失去政府的保护性政策和扶持措施，这些行业抗击市场风险、抗击市场打击的能力就会出现问题。我们先以广播电视为例，2008 年度各省市广

播电视的总收入广东省总收入118亿，上海市的总收入115亿，江苏省的广播电视总收入是98亿，我还没有查完那么多，就查了这么几家。再看看北京广播电视的总收入是72亿，不要说世界级的标准，就是国内行业相比广播电视行业都很难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创意产业。

再看看北京演艺文化产业，北京各个演艺集团改制较晚，目前多数剧团还处在要吃财政补贴过日子。即便是我们国家大剧院也是一样，是入不敷出的。虽然有一些小的社团能有些小收益，但是距离产业最大最强的日子还很远。

再看报刊行业，与世界报刊业染上的怪病一样，中国的报刊也经过一段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之后，受互联网的影响和打击，正进入它的衰退期。继著名的《花花公子》《读者文摘》相继倒闭以后，整个中国的报业也进入了衰退期，有人预言，除非有外来资金资助，否则报业有可能在未来的30年内走向消亡。同样中国的报业目前能盈利维持生存也越来越少。不仅中央报刊就是北京很多报刊也是一样，报刊之所以沦陷到这样的悲惨境地，我认为主要是收入模式过于单一，可以说中国媒体目前的经营模式普通靠广告支撑，广告收入占他们收入的90%以上，这些纸质媒体一旦遇到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互联网和电视竞争就败下阵来了，但即便现仍是高枕无忧的盈利大户广播电视行业也面临着纸质媒体可能面临的危险。

以北京电视台为例，2008年北京电视台全台经营收益是27.69亿元，其中广告达到25亿元，其他经营收入为2.69亿元，这些数字表明广告收入占如此高大，收费单一盈利模式这种情况长期不改，一旦三网融合、三频合一、IPTV进入到市场旺盛期的时候，一旦移动技术的普及、数字存储大空间的提升，人们将轻松的由看电视转向到用电视的时候，传统的广播电视行业同样步入纸质媒体惨淡经营的境地，可是这项技术的突破也为期不远，就在眼前。

四、北京图书、音像制品发行和文物买卖收藏行业初步具备成为世界城市标志性行业的条件。首先北京图书、音像制品发行和文物买卖收藏行业已经形成了固有的市场盈利模式，市场化经营是这一行业领域的主要发展模式，完全靠国家财政支持，政府补贴，税费减免，特殊垄断市场政策支撑的该行业服务网点几乎都不存在。国有民营和私人等多元化经营构筑造就了北京这一行业在全国市场的主导地位，目前北京该行业从业人员2万多人，创作产值80亿人民币，占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总产值的5%。这个5%虽然数量不大，但它是纯粹市场经营来的，与一些靠政策特殊垄断的收入是不一样的，它的含金量是高的，抗风险的。

第二，北京图书音像制品发行文物买卖收藏行业，不仅已经形成固有的

市场盈利模式，而且已经形成具有市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团。以我们北京发行集团为例，目前形成了五大市场核心竞争力，这次大家在这里开会，我希望大家有空参观一下我们的国际图书城和后面的物流配送中心。我们这项体系的建立是全世界目前最先进的，也是最强大的。上个月我到日本动漫集团参观，它号称是世界第一，于我们相比他们的实力只是我们的50%，我们目前已经形成的国际性的五大市场核心竞争力。一是我们拥有一批高卖量的巨大图书商城网点，西单图书城，每年销售额5亿多元，当天一日销售额超过400多万，王府井和中关村图书城超过2亿，亚运村图书城和望京图书城超过1亿多元，前5名我们有3名，如果排名前10名我们能进前5名。

二是拥有世界最大型的图书物流配送中心，我们的台湖图书城和物流配送中心建筑总面积25万平方米，投资近20个亿，前配送50多万个品种，配送销售超过50多个亿。其中15亿是自己配送。

三是我们拥有了以中国书店为品牌的文物古旧图书字画，收买队伍。琉璃厂年销售2亿，去年被接受为古旧书协会员，明年承办“古旧书协2011年的年度大会”，我们还有一支中外文图书进口队伍。

四是做大做强北京文化图书行业的方向，时间问题我就不讲了。

现在讲一下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各个行业长期以来要么是事业单位，要么是公益事业，要么是垄断行业，造成了这支队伍普遍缺少市场意识的人才和骨干，更缺少具有资本运作能力的人才，有的企业和行业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产业盈利模式。比如北京的新媒体产业，楼宇电视、地铁电视、公交电视许多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盈利的模式。北京许多大小影剧院和体育场馆进入问题等。不管是奥运会还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我们有一支特别善于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的可靠团队，但是我们缺少一支自己开拓市场，寻找上级，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人才队伍。如果没有上级的项目和上级的拨款，我们很多文化创意产业部门和单位就找不到实施，这种家养的产业或企业一旦断奶就会举步维艰。二是问题与其他物质生产行业相比，文化创意产品由于涉及的精神产品制作，更容易受到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有些干预常常会影响到企业与民营和私有经济展开公正的竞争。因为政府的部门往往束缚不了民营企业，常常束缚自己的国有企业。

三、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不足打击侵权力度不够。甚至开一眼闲一眼，特别是互联网的侵权和盗版，已经造成的全国音像产业的几近崩溃。我曾经管过北京音像公司，这个公司前些年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盈利大户，但是今天盗版的侵权影响，人均工资才能发放2000块钱，冬天我考察工作的时候连暖气

都没有全支付，甚至每年消防队的泡沫粉都拿不出钱。去年是国庆60年，全国竟然没有一个企业敢自己做一份视角的产品。

文化创意产业的进出口关系问题，严重影响文化创意产业走出国门的问题。比如我们购买了很多中国的文物，但是往往高额的关税使得我们又重新放弃。

转变中国民众长期以来一直把文化创业看作公益事业的传统观念，不能一收费就社变。从而让文化创意产业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运作，这样文化企业才能正常的发展。北广传媒的一个子公司歌华有限，机顶盒每个月收费是18块钱，可是成本是38块钱，但是老百姓能接受的一部电话座机费每个月收24块钱大家没有意见，我们涨1块钱都难，这样产业就很难正常发展，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发展，它的产品素质就降低下来，要改变长期把文化产业看作公益事业的传统观念。

第六，一些政府部门陈旧式的送钱送礼外宣方式严重影响到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海外市场的战略营销出路问题。比如奥运期间，驻外使领馆将上百万的产品纪念品到处向国外单位送，各种所谓的外宣礼品。包括这次上海世博会，有些博物馆盖不起来，还提供赞助。今天我听庞中英教授讲到，西班牙看到我们资助落后的国家，说你们能不能支持我们，他们自己很富有，不支持我们，我们就不参加了。为什么上海世博会大家批评也很多，弄了半天中国的百姓看的多，外国的没有多少，弄成中国的国际博览会。发言到此结束，谢谢!

主题演讲10

打造国际美食之都：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餐饮产业定位

刘广伟：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受组委会的邀请参加这次论坛，上午我听了很多专家领导的发言，也很有收获。我觉得“世界城市”是一个大题目，我是研究吃的，对吃也就是餐厅，或者叫美食，或者叫烹饪，和北京打造世界城市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吃的东西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控制力，在全球的概念下。我想在这里和大家一块分享。

我讲的题目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应该打造独具特色的东方美食之都”。

世界城市要有中国特色，这里我也不用多讲了，上午很多专家一直在这

样讲，因为我们不能照搬和模仿现有的三大世界城市的一些模式和经验，那样我们也没有自己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个性，我很赞同这样的观点。所以我说在彰显个性上，我们的“吃”能不能发挥点作用？下面是我们想探讨的。

在世界城市里面要有文化的亮点。这里举了几个例子，上午也有很多专家举这些例子，中国的“吃”，中国的“美食”是不是一个亮点呢？影响全球，中餐是不是可以影响全球呢？我们做这个行业是充满信心，我们认为中国的“吃”是可以影响全球的。1850 年在美国开的第一家中餐馆，现在全球大概有 30 万家中餐馆，它已经在影响着全球，只是没有统一的网络、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



东方美食之都的提出，我那上面一开始准备的是打造世界美食之都，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成都最近被命为“国际美食之都”、“世界美食之都”，我觉得“东方美食之都”这个定位更适合北京走向世界。第一它符合世界称谓，让外人接受。“外人”就是到访北京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起名字不要光靠我们自己想，又是世界的，又是国际的。

第一，不高不低的清和称谓。世界美食之都、国际美食之都有点高，所以北京一共有五万家餐厅，国际的餐厅大概有 5000 家，到 10% 左右，到访的客人也不是很多，跟那三个城市都很难相比。我们自己喊的太高也不容易得到人家的认可。再就是用“东方”这两个字能够根植于深厚的东方文化沃土之中，东方文化是一个大概念，而我们中国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我们用这个称谓更有内涵。中餐是东方美食的代表，在世界上也是被认知的，毫无疑问的。北京打造东方美食之都是一个什么概念？应该打造成什么样子？第一，要有世界各地的人到北京来品尝美食，这个有待于我们整个北京市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能够更开放，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能够有更多的异族的人愿意到北京来。

第二，在北京能吃到世界各地的风味。既然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世界各地的风味都应该有，不管占多大比例，我们出差也会有这种感觉。你到巴黎吃很多的大餐，吃上一个星期你就想吃个饺子和面条，所以要有各地的风味。

第三，更要能吃到东方美食的典型代表，独具魅力的中国各地美食。中国的“八大菜系”这是美食主要的结构内容。能够让中餐成为是世界各地人

来北京的一个重要理由，能够成为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美食之都就打造成功了。美食之都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国际机构颁发的，是客人用嘴和舌头投票的，是公认的。

我们说吃，怎么深度认识一下吃，味觉是审美的意思。在我们的名片和同事的名片上都有一句话，叫“古老的东方有一种用嘴巴鉴赏的艺术”。因为它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大家容易忽视它。我们说绘画、雕塑是视觉审美的艺术；音乐、京剧是听觉审美的艺术；美食是味觉审美的艺术，是以味觉、嗅觉为主的五觉审美艺术，是大艺术。厨师是艺术家、是烹饪艺术家。“烹饪艺术家”这个词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的杂志最早叫《东方美食》，后来细化了做了好几本，其中有一本就叫“烹饪艺术家”，当时报到新闻出版署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疑问，这是什么意思啊？现在这本杂志已经正式的批准了。等于新闻出版部门认可这个词汇了。关于味觉审美在美学理论当中没有划入进去，西方是讲究快餐，我认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要在中国产生，因为中国是讲究吃文化的国度。

中餐是国家的软实力，餐饮文化是大文化，我们想一想最早的礼仪是从饮食开始的，饮食不够的时候大家去抢，相互的谦让这就是礼仪。我们桌子上的菜的摆设有礼仪，我们的坐法有礼仪，我们的吃法有礼仪，吃里面蕴含着很多文化和礼节在里边。

中国美食在世界很有影响力，有 30 万家中餐厅。北京有五万家中餐厅，大家不知在美国有 5 万家中餐馆，美国从 1850 年开了第一家，到现在 160 年已经有 5 万家了，当然餐馆很小，由于出去的人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都是各个行业为了生存的，但是中餐的影响力是已经存在了。重视餐饮把它当作一张名片去推广，在其他的国家已经有了先例，韩国就成立了一个韩餐世界文化战略，还有一个推广委员会，是总统夫人做主任。日本也有日本料理的海外推广机构。法国总统表示要把法餐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他要让法餐成为全球餐饮的领导者，所以我认为中餐文化的发展应该纳入国家的战略，中餐是一个宝库，我们应该去挖掘，去认识它。中餐属于中国制造，在我们的传统概念，网络、生物、光能等高科技是中国制造。其实回过头想一想，中餐完全有创造的内涵，即原创、版权、品牌、标准，还在不断的创新。个性是很鲜明的，所以中餐作为中国创造，是中国的一张非常响亮的名片，是一张闪闪发光的金字招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应该亮出这张招牌，挖掘、擦亮。

现在的世界三大城市的吃文化是什么状态呢？纽约，纽约是美国的都市，它的饮食文化突出的代表是快餐，他们没有优秀的正餐文化，美餐的概念就是快餐，也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肯德基、麦当劳这类的东西。伦敦，伦敦没

有自己的美食文化，它很缺少美食传统，尽管英语的文化很强势，世界很多人都说英语，包括我们考职称也是用英语，但是英餐的文化远远不如中餐。世界上有两个强势的文化，一个是英语的文化，二是中餐的文化。英语的文化靠侵略，靠工业革命以后强势传播的，中餐的文化是靠内涵的味道传播的。东京，东京是有饮食文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刺参，生食的文化，但是更多的文化是中国是一脉相承的，在东京中餐馆最多，东京所有的五星级酒店里都有中餐厅。所以北京在这个领域里有一个空间，完全可以超越他们三个城市，所以北京打造世界城市这块资源应该利用起来。

世界十大美食之都，去年福布斯提出了十大美食之都，北京排在第八，巴黎是世界三大美食的法餐之一，意大利是罗马和米兰，西班牙也有两个城市，美洲只有一个墨西哥，所以今天我向墨西哥教授提一个问题，但是我听他不是专门研究餐饮业的，具体的他恐怕也答不上来。但是墨西哥它的美食是很有名的，它靠美食，如果我今天不在这说出来，可能大家想不到墨西哥是一个美食之城，它是把这个作为一种资源。在十大美食城市当中，纽约和伦敦都没有入选，中国有十大美食城市，基本的事态是南强北弱。辣圈有三个。

城市人文特色，北京在这方面餐饮是两头粗，低端市场产品粗，高端市场吃法粗。

饮食有四个阶段，吃饱、吃好、吃健康、吃文化，吃文化的体验，吃艺术的享受。第四阶段刚才段教授讲的就是后工业，后工业在饮食上很明显，现在人们讲究经济实惠的现象正在向物有所值转变。中国的四大菜系，我们国家的菜确实很有特点，风味非常多，有四个文化圈、三个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

在北京知名餐馆，因为北京是首都，有很好的基础，在全国各地一流的餐厅大概有50%都在北京开了，这是北京打造“美食之都”一个很好的基础，老字号也很多，川菜这些字号也都进了北京。外来的品牌，北京现在的餐饮。打造“东方美食之都”我想首先是对客户群的定位，有三种客户，一是北京的居民，二是新居民，在北京住可能没有户口，中外都有，包括学生，三是两种旅游者，国外和国内的。我们根据这三种人满足他们的需求，有三个同心圆，最中间的是北京风味，中间是中国风味，边缘是世界风味，三角形的容量，也就是说，我们最突出的还是中国各地的美食风味。

这是要打造东方美食之都的几个体系，中餐的、人才的。中餐的特色口味多，60多种味型，丰富多彩。2万余款菜，50种技法。另外中餐很健康，中餐的内涵非常健康，因为是荤素搭配。

人才保障，作为北京这个大都市也很奇怪，缺少一个很好的美食学院，我认为北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美食学院，我这十几年全国各地跑，跑出去就看学校看餐厅。北京这样一个都市没有这样一个院校很遗憾，这个学校最好建设到CBD，最好由首都经贸来办。

餐饮企业尽管很大，但是没有一个系统去管它，所以有很多难处。水、电、气、暖跟其他的不一样价，税负很重，我们要开放，作为世界美食之都。我看到了几个评价体系，这个体系里面都没有饮食或者美食这样的项目，我希望引起专家们的重视，能够把饮食看成文化的角度、艺术的角度，还是文化的角度把它纳入进去，谢谢大家！

互动与点评

主持人（白志刚）：

谢谢刘广伟先生的致辞。现在请大家提问题，可以提两个问题，每位一个问题。

杨发喜：

刚才听了两位专家的演讲非常有启发，中央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国的市场将来民营企业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出版权，民营出版社，不知道李总裁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湛军：

我们国家目前对产品的制作和播出是有限制的，不但是民营企业不能进入。现在三网融合最大的就是工信部，电信部门要求分享广电系统的直播权，对于广电系统来说由于资金缺乏，如果把制作权让出去，那么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就会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所以广电系统坚决不让，这是目前的政策。我想中央之所以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进行，特别是要组建国有超大型的文化产业集团，完全是为了今后放低门槛，开放产业制作的前期准备。比如，现在电影制作，电视剧制作已经开放了，否则就没有华谊兄弟今天的产业地位，我想其他的随着政策法规完善，以及国有企业做强做大的情况下的可能会同步进行。

刘新葵：

我想问一下美食专家，我在城市管理中经常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传统的民间美食，比如糖葫芦、烤地瓜、煎饼果子，原本我认为它会成为街头风景，但是设备很不卫生，从事的人文化又特别低，装备也非常的不漂亮，但是由于这些美食在我们生活中非常有用，它非常便宜，我们城市管理把他们作为

小摊小贩进行清理，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把它技术改造和更新，成为服务较低层次，就是比较便宜的，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食品的一个升级，然后也形成相对民间的一种产业，有没有可能？

刘广伟：

你提的问题也是经济的问题，因为这种小食品非公但是价格不高。今天下午讲后工业化转变过程，烤地瓜如果在座的人20块钱吃一个可以，这样他就能做起来，如果2块钱吃一个，那北京的房租，他只能推小车了。所以这些需要有政府的扶持，这是我刚才讲的其实中国饮食是一个宝库，应该把它给挖掘出来，但是需要有政府的扶持，像北京的高房价，很多特色的小吃都是很难生存的。

白志刚：

谢谢两位嘉宾的提问和专家的精彩回答，文化产业研究是一项跟世界城市密切相关的研究，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还关系到我们中国，特别是北京的文化特色和吸引力。

最后，我想说一句感想，感谢大会的组织者，可能是有意无意的最后给我们安排了这样两位专家的发言，他们在我们的物质大餐之间给我们提供了一顿非常丰盛的精神文化大餐，但愿今天晚上大家都有好胃口，谢谢！

大会闭幕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高闯主持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陈之昌作大会总结



大家好，受此次论坛主办单位的委托，我就今天的城市国际化论坛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我们10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世界城市基础这一主题展开了研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今天的主题研讨一共有10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有5位专家主持并且做了精彩的点评。通过主题演讲和点评，论坛对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二是世界城市发展规律及其启示；三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和阶段性特征；四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进一步明确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努力方向。通过这四个专题的深度研讨，使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学术基础更加扎实，也使我们城市国际化论坛达到了新的高度。

围绕建设世界城市的新趋势与新挑战，论坛在筹备过程当中，开展了征文活动，在论坛召开之前，组委会一共收到学术论文35篇，今天上午交流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将在明天上午举行三场专题论坛。这三场专题论坛的主题分别，是世界城市建设理论与实践；北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比较与借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评价体系。请大家踊跃参加，继续深入研讨。

总结这次专家学者们经历两天的发言，我们简单概括了四个特点：一是发言题目涉及广泛。比如今天发言的专家涉及这样几个问题，连玉明教授的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五个关系，邱爱军主任的建设世界城市与小城镇发展模式的选择，顾朝林教授的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段霞教授的建设后工业时代的世界城市这样一些宏观层面的选题。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题目，比如刚刚进行的最后阶段的专题发言，李湛军研究员打造世界图书音像制品和买卖收藏之都，刘广伟先生的打造国际美食之都，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餐饮产业定位等。可以说选题多样内容丰富，使得我们这期论坛显得十分的充分，精彩纷呈，成效明显。

二是借鉴了国内外城市的发展经验。比如今天上午发言当中谈到的墨西哥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的经济增长方式，及所遇到的问题。和有关专家将要在明天上午的论坛上分别就日本的低碳城市建设，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模式，及北京的选择克利夫兰的国际化与教育发展，还有我们世博会对上海市建设世界城市目标的影响等，都将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借鉴经验。

三是紧跟当前形势，贴近现实需求。比如今天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评价体系的理论思考。明天的分论坛上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将给大家提供像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监测评价体系探讨，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评价，研究世界城市指标体系的体会等，都是贴近实际，具有实操性的成果。

四是仅仅围绕主题，发言的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比如今天下午杨开忠教授的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面临的困境，今天上午卞洪登博士对北京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议。明天分论坛的陈健研究员将就建设世界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涉及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王颖老师将介绍发展循环经济，建设世界城市的积极意义。刘新培教授将从世界城市环境特点上谈北京的差距和发展思路等，这些选题和内容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当然，在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推进北京市建设世界城市的步

伐仍然是摆在我们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希望大家继续不断的深入探讨。

以上是对今明两天专家学者发言的简单的概括。经过几年的努力和发展，城市国际化论坛已经形成的品牌效应，聚集了一批功底深厚的专家学者，在这个平台上从事研究，研究成果越来越多，而且质量越来越高。有些已经被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采纳，也吸引了相关学术界和社会机构的密切关注，正是各位专家学者同人的积极参与和长期的大力支持，才使城市国际化论坛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各位专家学者在学术理念上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通过学术交流，学者们以文会友，在学术交流中沟通感情，开阔视野，交流研究心得，这也是举办论坛的意义所在，成果之一。

在2010年城市国际化论坛研讨阶段将要结束之际，请允许我代表论坛组委会向积极参与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一年来，筹备论坛的首都经贸大学，特别是段霞教授领导的团队做出了艰苦的努力，我仅代表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社科联向首都经贸大学，特别是段霞老师的团队表示衷心的感谢。

短暂的学术相聚即将结束，我们期待着明年再次相会，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明年这个时候能够带着新的研究成果参加论坛，共同推动城市国际化论坛迈上新的台阶，谢谢大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传生教授致闭幕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满怀着金秋的喜悦和丰厚的硕果，“2010年城市国际化论坛”大会即将落下帷幕，这是令人激动而又难忘的相聚，100多位专家学者凝聚在这里，共同探讨和交流对城市国际化这一重大而前瞻性问题的看法，大家踊跃发言，积极沟通，发表了一系列深刻而又富有想像力的见解，让我们分享了智慧的成果，在相关领域达成了重要共识，形成了一系列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有启示作用的思想成果。

在论坛即将结束之际，我谨代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祝贺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并对各位专家、朋友的积极参与表示衷心感谢。

从上届城市国际化论坛闭幕后，秋秋书记、之昌主任、文魁校长，及各位老师、专家，就开始策划和筹备此次论坛。一年来，得到了北京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城市问题》杂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现代国际关系》杂志、《经济管理与研究》杂志、中国经济出版社和北京发行集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从而，搭建了一个相当好的交流平台，使大家能够在这里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当今世界格局正处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化，全球气候变暖两大难题，在推动世界发生着深刻变化，绿色革命将成为科技革命的最重要发动力量和发展趋势。低碳经济将成为发达国家摆脱经济危机最主要的突破点，同时也把中国进一步推到了国际社会的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台。

中国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将承受更大的国际压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动力。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不断上升，北京作为大国首都的国际关注度和影响力也日渐上升，在这种形势下，北京已经把建设世界城市作为下一步的战略目标，与纽约、东京、伦敦等世界城市相比，北京同样具备丰富的科技智力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和国际事务协调的能力很强，这一切都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和发展条件。

另外，如刚才各位专家所谈到的，如何积极主动解决未来北京城市国际化所面临的问题，进一步把各项改革引向深入，探索世界城市发展规律，构建适合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探索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新的阶段性特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关注和深思。

本次论坛从多个角度，对世界城市的内涵、动向和及其规律，世界城市评价指标，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原则与方向等诸多专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发人深省、令人深思。

我相信本次会议的成果将对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展望未来，我们相信，中国的经济一定能够在调整中抓住格局调整的重大历史机遇，保持平稳发展，中国的城市国际化水平将会更上一层楼。

我们对此满怀信心，未来我们也将一如既往的关注中国的国际化的发展问题，为中国城市国际化的发展建言献策，作为主办方之一，我们诚望与诸位专家一起将城市国际化论坛建设成为品牌化的平台，国际化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能为诸位继续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有价值的学术讨论，使城市

国际化论坛在探索真理、服务北京、面向全国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感谢为论坛顺利召开而付出辛勤劳动的组织人员、工作人员，感谢诸位领导、专家、同志们和同学们，希望明年我们在北京再聚首，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论坛报道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世界城市基础

——“2010 城市国际化论坛”隆重举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联合发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2010 城市国际化论坛”于 2010 年 9 月 11 - 12 日在北京举行。

本次会议主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世界城市基础。”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要瞄准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发展战略，以更高标准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设世界城市既是北京城市发展和中国走向国际社会前台的内在需求，更是改善北京经济发展结构、增强中国国家竞争力的迫切要求。

目前，北京的社会发展显现出后工业、高收入、现代性社会的诸多特征，这样的变化既是我们长期努力的结果，又是我们未曾经历、并不熟悉的社会。北京必须从过去的国内先进城市转向国际先进城市，按照世界城市的标准和发展眼光认识、管理和发展这样的社会。



如何判断未来10至20年国际社会可能发生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揭示世界城市发展规律，比较借鉴国外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认识北京在中国城市体系中所处的相对超前的发展阶段，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明确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努力方向，是本次论坛的研讨重点。

论坛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杨世忠教授主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柯文进、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史秋秋、亚太城市韩国分会会长朴泰权等出席论坛并先后致辞。史秋秋女士强调，首都北京面临着来自人口、资源和环境诸多方面的挑战与压力，如何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等诸多问题，这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系统的思考与研究。还需借鉴国外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揭示城市“世界城市”发展规律，分析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明确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努力方向，将会是其中的关键。

参加论坛的有来自中国上海、北京、中国台湾、美国、韩国、墨西哥等多家高校、研究机构、社会团体和多家新闻媒体110多位代表。此次论坛涉及的国际化进程中的世界城市建设问题呈现多层次、多角度、多领域的特点，包括了世界城市指标体系、北京世界城市目标定位、国际分工、循环与低碳经济、文化与电影产业、公民培育、区域协同、城市安全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文魁教授，首先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评价体系的角度，就指标体系的出发点、主要内容、内在逻辑关系等方面畅谈了自己的观点。中国高校国际政治协会的梁守德先生，强调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突出中国特色的角度，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的关键。亚太城市韩国分会会长介绍了北京建设文化城市的主要构想与做法。此后，共有7名专家就不同领域的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问题提出了建议性意见。

任何构想的实现都离不开理论支持。针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问题，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王力丁先生阐述了提出建设“世界城市”任务的缘由。他认为：建设“世界城市”是多年来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长远奋斗目标，也是北京市发展的内在要求。

世界城市的建设是一整体体系。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院长连玉明先生分别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外部关系、内部关系两方面阐述了相应观点，认为这些关系是矛盾所在同时也是动力。

论坛同时带来了西方国家先进的世界城市建设理论与具体措施。墨中经济技术合作理事会会长艾夫任·卡尔沃先生指出，北京建设现代化城市并不只是它的外表，而是指北京是在它的全方位的现代化，比如它的政治、文化、

经济，涉及各个领域。

之后，论坛分成三个专题分论坛进行小组讨论。即世界城市建设，理路与实践；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比较与借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评价体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高闯教授主持大会闭幕式。论坛闭幕式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传生教授热情致辞，对本次论坛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大会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与理论观点，能尽快转化成现实的法规或措施，真正造福民众。陈之昌先生表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联合发起城市国际化论坛的目的在于借助论坛的年会机制，进行跨学科、多机构的学术资源整合和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探索，探索中国城市国际化进程的发展规律，为北京乃至中国其他城市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 卡斯特，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 弗里德曼，陈闽齐译．世界城市的未来：亚太地区城市和区域政策的作用［J］．国外城市规划，2005（5）：11－20.

[3] 刘卫东．论全球化与地区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被动嵌入［J］．世界地理研究，2003（1）：1－8.

[4] 梅丽霞，王缉慈．权力集中化、生产片断化与全球价值链下本土产业的升级［J］．人文地理，2009（4）：32－37.

[5] 萨森著，周振华等译．全球城市：纽约 伦敦 东京［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6] 王缉慈，童昕．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产业群［J］．战略与管理，2001（6）：28－36.

[7] 任远，陈向明．全球城市一区域的时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8] 姚为群．全球城市的经济成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9] 屠启宇，金芳等．金字塔尖的城市：国际大都市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0] 姚士谋，陈振光，朱英明等．中国城市群［M］．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11] 傅兰妮编．全球化世界中的城市：治理、绩效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2] 斯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13] 周振华．崛起中的全球城市［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4] 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所．世博经济研究，2007.

[15] 郭定平．世博会与国际大都市的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7.

[16] 周秀琴，李近明．文明的辉煌：走进世界博览会历史［M]．学林出版社，2007.

[17] 郑时龄．世博会规划设计研究［M]．同济大学出版，2006.

[18] 诸大建，姜富明．世博会对上海的影响和对策［M]．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19] 吴建中．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M]．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8.

[20]（美）海勒著．文明的进程：世博会的发展与思考［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

[21] 孟育建．大城市群：悄然向我们走来［M]．中国政协，2006.

[22] 孟育建．上海世博会的低碳实践［M]．展览通讯，2009.

[23] 邱爱军，孟育建．世博会与城市经济的繁荣［M]．中国经贸导刊，2009.

[24] 孟育建．太阳能在上海世博会的展示与利用［M]．中国贸促，2010.

[25] 段霞．首都国际化进程研究报告［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26] 北京，走向世界城市［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27] 潘家华，魏后凯．中国城市发展［M]．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8] 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M]．文汇出版社，2010.

[29] 崔宁．城市事件下城市空间再构——以上海世博会为例［M]．东南大学出版，2008.

[30] 周振华．城市发展：愿景与实践——基于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案例的分析［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1] 吴志强．上海世博会可持续规划设计［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2009.

[32] 上海世博局主题演绎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会主题解读［M]．东方出版中心，2009.

[33]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统计年鉴2010［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34] 邓洪波等．把握发展规律　探索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模式［J]．时代经贸，2010（3）：34－44.

[35] 段霞．建设后工业形态的世界城市［J]．北京规划建设2010（5）：14－20.

[36] 金元浦．北京：走向世界城市［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37] 联合国人居署，吴志强等译．和谐城市：世纪城市状况2008/2009

[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38] 倪鹏飞. 全球竞争力报告 (2009—2010) [M].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

[39] 任远, 陈向明. 全球城市——区域的时代 [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40] 苏雪串.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条件和特点分析 [J]. 北京规划建设, 2010 (5): 28 – 30.

[41] 屠启宇. 谋划中国的世界城市 [M].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42] 张颖慧. 上海体育赛事发展的国际比较——以与纽约、伦敦、墨尔本的比较为例 [J]. 体育科研, 2010 (1): 21 – 26.

[43] 周振华. 崛起中的全球城市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44] 连玉明. 世界城市, 北京的抉择 [J]. 人民日报, 2010.

[45] 张华青. 论政治现代化与公民文化 [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1).

[46] 谢舜. 和谐社会: 理论与经验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57.

[47] (美) 奥斯特罗姆等.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 [M]. 王诚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92 : 134.

[48] (美) 道格拉斯·C. 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49] [美] 丝奇雅·沙森. 全球城市 (2001 年新版) [M]. 周振华等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83 – 116.

[50] 屠启宇. 世界城市指标体系研究的路径取向与方法拓展 [J]. 上海经济研究, 2009 (6): 77.

[51] 2010 首都论坛论文集 世界城市: 北京发展新目标 [C].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0. 6.

[52] 贝尔琴. 全球视角中的城市经济 [M].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53] 曹红阳. 中国的世界城市发展道路研究 – 以北京为例 [D]. 2007. 6.

[54] 金元浦. 北京走向世界城市 [M].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3.

[55] 约翰·弗里德曼, 陈闽齐译. 世界城市的未来: 亚太地区城市和区域政策的作用 [J]. 国外城市规划, 2005. (20): 5.

[56] 刘玉芳. 国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探讨 [J]. 城市发展研究 14 卷, 2007 (4).

[57]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8] 倪鹏飞，彼得．卡尔．克拉索．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7—2008）[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59] 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 [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60] 屠启宇．世界城市指标体系研究的路径取向与方法拓展 [J]．上海经济研究，2009（6）.

[61] 张茅．北京建设国际交往中心研究 [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62] 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 [J]．城市经济、区域经济，2001（6）.

[63] 郭建龙．中国国际化大都市研究述略 [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自然科学版，1998（2）.

[64] 刘玉芳．国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探讨 [J]．城市发展研究，2007（4）.

[65] 倪鹏飞．2009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城市：中国跨向全球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6] 倪鹏飞，彼得·卡尔·克拉索．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7—2008）——城市：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67] 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8] 章友德．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9] 沈金箴，周一星．世界城市的涵义及其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启示 [J]．城市问题，2003（3）.

[70] 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 [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71] 吴洁．城市现代化与国际化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J]．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学报，2000（2）.

[72] 肖耀球．国际性城市评价体系研究 [J]．管理世界，2002（4）.

[73] 喻国明．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基本指标体系及操作空间——来自青岛市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特尔斐法"研究的报告 [J]．城市问题，1995（1）.

[74] 周一星．新世纪中国国际城市的展望 [J]．管理世界，2000（3）.

[76] 龚秀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问题及国际经验借鉴，农村经济与科技，2010（1）.

[77]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加快低碳城市建设刻不容缓 [J]．北

京观察，2010（3）：32－36.

[78] 周国梅，唐志鹏，李丽平．资源型城市如何实现低碳转型［J］．环境经济，2009（10）：31－36.

[79] 吴文哲．伦敦愿与北京携手发展低碳经济［J］．国际金融，2010（3）18－19.

[80] 王东．积极推进低碳经济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J］．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2010（3）：1－3.

[81] 胡兆量．低碳化和高端化：北京建设国际大都市两议［J］．城市问题，2010（3）：2－4.

[82] 刘志林等．低碳城市理念与国际经验［J］．城市发展研究，2009（6）：1－7.

[83] 刘文玲，王灿．低碳城市发展实践与发展模式［J］．中国人口 2010（4）：17－22.

[84]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9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85] 辛章平，张银太．低碳经济与低碳城市［J］．城市发展研究，2008（4）：98－102.

[86] Emma Harvey 著，李娟娟译．低碳城市—低碳规划与城市设计”［J］．新视点，2009（1）：44－51.

[87] 张锦高，宋斌．政府发展循环经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国行政管理，2007（3）.

[88] 龚秀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问题及国际经验借鉴［M］．农村经济与科技，2010（1）.

[89] 刘淇．北京市委确定 2010 年发展目标　瞄准建设世界城市目标［N］．2009 年 12 月 27 日，北京日报第一版．

[90] 李成勋．城市品牌起源、选择和培育［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3）：24－27.

[91] 刘友挂．创意产业对城市品牌竞争力的影响及城市品牌营销对策——以广州为例［D］，广州外语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5－27：30－32.

[92] 孔建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2）：15－16.

[93] 王晖．城市品牌战略的规划方法刍议——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为例［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3）：43－45.

［94］张京成．北京应尽快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J］，科技潮，2010（6）：66－70.

［95］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世界城市建设，求是，2010（10）.

［96］《唐山大地震》．城市营销运作新典范［J］．领导与决策，2010－8－32.

［97］徐飞鹏，刘淇．深刻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N］．北京日报，2009－11－26（2）．

［98］付宝华，修维华．城市主题文化与世界名城崛起［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99］吴子俊．纽约·伦敦·新加坡城市管理［M］．北京海天出版社，2006.3.

［100］吴子俊．东京·首尔城市管理［M］．海天出版社，2006.3.

［101］［美］丝奇雅·沙森著，周振华等译．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102］［西］若尔迪·博哈尔（Jordi Borja），［美］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等著 姜杰等译本土化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城市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3］盛文，翟宝辉，张晓欣．城市国际化评价研究述评［J］．中华建设，2009（4）.

［104］刘淇．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努力提高首都科学发展水平　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J］．前线，2010（1）.

［105］华表，小辉．打造世界城市　建设魅力北京［J］．科技智囊，2010（3）.

［106］金元浦．北京：走向世界城市［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10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108］列宁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18.

［109］列宁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73.

［110］参见盛文，翟宝辉，张晓欣．城市国际化评价研究述评［J］．中华建设，2009（4）.

［111］金元浦主编．北京：走向世界城市［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649.

［113］《北京交通发展纲要（2004－2020）》，北京交通委员会网站．

［114］市委研究室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借鉴国际经验，治理北京城市交通拥堵对策研究》．

［115］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资料：国际城市发展动态，2008

［116］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纽约——世界“总部中心城市”的循环经济，

［117］车春鹂，高汝熹．国际三大都市圈中心城市产业布局实证研究及启示．科技管理研究，2009. 9.

［118］蒲勇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政策［M］．华文出版社，2000.

［119］王丰岐，宗刚．北京如何发展可持续的都市型工业．经济导刊，2008. 2.

［120］吴进红．开放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21］赵弘．总部经济［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122］陈志龙．21 世纪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展望［J］．人防科研，2001.

［123］崔曙平．国外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现状和趋势．2007. 6.

［124］雷蒙·斯特令，束昱．美国地下空间利用的现状与问题，地下空间，1992. 4.

［125］傅健，国外城市地下空间的发展对我国的借鉴，山西建筑，2008. 1.

［126］王梦恕．21 世纪是隧道及地下空间大发展的年代．岩土工程界，2000. 6.

［127］王秀英，王梦恕．城市的安全发展与地下空间利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3.

［128］沈荣华．国外防灾救灾应急管理体制［W］．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129］http://www. expo2010. cn/.

［130］http://www. london. gov. uk/mayor/economic_ unit/docs/wp_ 22_ creative.

［131］http://www. metro. tokyo. jp/CHINESE/PROFILE/policy07. htm.

［132］http://www. stats. gov. cn/tjsj/qtsj/gjsj/2009/t20100407_ 40263 2590. htm.

[133] http://www.gzpi.gov.cn/gzscse/lxpd/lxkx/200809/t20080905_ 82053.html.

[134] http://www.beijing.gov.cn/rwbj/bjgm/gjyhcs/default.htm.

[135] http://www.jasso.go.jp/statistics/intl_ student/data09_ e.html.

[136] http://www.bjjnhb.com.cn/xwkx/200807/t264718.htm.

[137] http://china.huanqiu.com/roll/2009-09/585106.html 2009-09-22.

[138] http://en.wikipedia.org/wiki/Talk: Creative_ Cities_ Network.

[139] Friedmann 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 17.

[140] Geddes, Patrick. Cities in Evolution.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49.

[141] Hymer, S. 1972.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pp.

113-140, in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edited by J. N. Bhagwat. i New York: Macmillan.

[142] Braudel, F.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London: Fonana, 1984: 76.

[143] Friedmann J. and Wolff G..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2, 6 (3): 309-344.

[144] Friedmann 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 17 (1): 69-83.

[145] Friedmann J. Where We Stand: 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8.

[146] Andy Thornley: URBAN PLANNING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London, Sydney and Singapo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LONDON Discussion Paper No. 2, May 1999.

[147] Castells. M: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96.

[148] Corporation of London 1999, Competitiveness of London's Financi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Sector.

[149] Freeman, Alan: Measuring and Comparing World Cities.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2004. 1.